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7)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七卷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版是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依照“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是根据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决定，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编译、苏联国家政治书籍出版社于 1955 版开始出版的。在中文版的译校过程中参考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文字。

目 录

第七卷说明	7- 2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出版启事	3—4
弗·恩格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泰晤士报”	7—8
卡·马克思。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9—125
一 1848年的六月失败	12
二 1849年6月13日	39
三 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	74
四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111
弗·恩格斯。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127—235
一 莱茵普鲁士	134
二 卡尔斯卢厄	155
三 普法尔茨	171
四 为共和国捐躯！	19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	236—253
评格·弗·道梅尔“新时代的宗教。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	236
评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请求德国陪审官保护全体维护 帝国宪法的战士的正义呼声”	243
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英国革命史讨论”	24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一）	254—268
弗·恩格斯。10小时工作制问题	269—275
弗·恩格斯。英国的10小时工作制法案	276—28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 同盟书。1850年3月	288—29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新莱茵报。政治经济 评论”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	300—342
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一）当前的时代。（二） 模范监狱”	300
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阿·谢努的“密谋家， 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 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共和国的诞生”	313
评艾米尔·德·日拉丹“社会主义和捐税”	33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二）	343—346
卡·马克思。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	347—35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351—35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	355—357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35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 同盟书。1850年6月	359—366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普鲁士流亡者	367—36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伦敦的普鲁士密探” 一文的附函	37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伦敦的普鲁士密探	371—374
卡·马克思。给“地球”报编辑的信	375—377

卡·马克思。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	378—379
弗·恩格斯。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	38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威塞尔报”编辑部 的信	381—382
弗·恩格斯。德国农民战争	383—483
一	386
二	399
三	420
四	436
五	441
六	468
七	478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 教育协会的声明	484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给亚当、巴特爾米和维迪 尔先生的信	485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约·格·埃卡留斯的“伦敦 的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一文的编者按语	486
弗·恩格斯。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	487—491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国际述评（三）	492—540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 的声明	541—542
弗·恩格斯。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543—545
弗·恩格斯。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 展望	546—577

卡·马克思。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法兰西共和国 宪法	578—592
---------------------------------------	---------

附 录

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	595—596
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	597—599
卡尔·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招股启事	600—601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报告	602—604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605—606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报告	607—609
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610—611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年5、6、7月 的报告	612—614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决议。1850年9月 15日	615
1850年9月15日的中央委员会会议	616—622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8月1日至9月 10日的报告	623—624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致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 建议书	625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626—629
奥·布朗基献词的德文译文的前言（附献词全文）	630—632
注释	635—689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690—705

人名索引	706—737
报刊索引	738—740
译后记.....	741

插 图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封面.....	5
弗·恩格斯的“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 手稿的第一页	547

第七卷说明

第七卷说明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收集了 1849 年 8 月至 1851 年 6 月所写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时期中主要是从理论上总结法国和德国 1848—1849 年革命战斗的经验,进一步制定无产阶级的策略,为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工人阶级独立政党而斗争。

1849 年 8 月底马克思来到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前中央委员会的大部分委员很快也集中在这里,马克思便和他们一起着手改组同盟及其中央委员会的工作。1849 年 11 月恩格斯抵达伦敦,他也参加了中央委员会。马克思和恩格斯为巩固无产阶级政党而开展了巨大的工作:他们尽力使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其领导核心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的工作活跃起来,他们参加了该协会创立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见本卷附录中该委员会的文件),通过这种办法尽量把革命流亡者团结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周围。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其他国家无产阶级运动的革命活动家,如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以及英国左派宪章主义者也建立了紧密的联系,于 1850 年秋和他们一起创立了“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创办一个承继光荣的“新莱茵报”的刊物,是巩固无产阶级政党的非常重要的方法。1850 年 1 月在汉

堡开始发行的卡·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就是这样的刊物。

在本卷第一篇文章关于杂志发行的“启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规定了新刊物的任务：“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策略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马克思在这个杂志上登载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比任何人都透彻地分析了法国革命事件的原因、性质和具体进程。恩格斯于1895年在为马克思这本身写的导言中指出，如果说在“共产党宣言”中唯物主义历史观曾被大体地应用于全部近代历史，在“新莱茵报”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用这个理论解释了当前的政治事变，那末马克思在这里第一次给自己规定这样一个任务：“在一个对全欧洲都很紧要而典型的许多年的历史发展时期中，把所有各个政治事变的内在因果关系揭示出来，从而依据作者的一般见解把这些政治事变归因于终究是经济原因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年莫斯科中文版第1卷第96页）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原理，如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相互作用，阶级斗争、政党和思想在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国家及其各种政体的作用，革命改造在人类历史上的伟大意义——这一切在马克思这本著作中都得到具体的阐述，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马克思根据群众革命斗争的实际经验，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发展了他的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他指出，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它可以加快历史发展进程，发挥人民群众的巨大创造力，并且指出，19世纪革命中有决定意义的力量是无产阶级。马克思证明，工人阶级必

须夺取政权，他在这里第一次运用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个经典术语，阐明了这种专政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方面的任务。马克思在这里谈到，革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是根本不同于在革命进程中破产的小资产阶级空想理论的，他这样描写了它的基本特点：“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见本卷第 104 页）马克思的这个经典定义被当做科学共产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而列入了人类思想宝库。

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首次得出了一个精确的科学公式，简明地表述了无产阶级在社会的经济改造方面的历史任务：“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见本卷第 47 页）科学共产主义以这个公式来毅然对抗在马克思以前的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来对抗提出“财产共有”这种含糊要求的空想共产主义。

马克思这本著作作用很大的篇幅来分析农民的状况和作用、分析它和无产阶级的相互关系。马克思指出，法国农民遭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遭受的剥削只是形式上不同，他们的剥削者是一个，即资本。农民把无产阶级看作是他真正的保卫者和同盟者，因为“只有资本的倾复，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对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见本卷第 98 页）这样，马克思根据法国阶级斗争的经验，作出了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和政治上的结论：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

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经典著作而载入了史册。但是，恩格斯于 1895 年在他为这本著作写的导言中曾指出，该书夸大了资本主义的成熟程度和法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可能性，由此而产生了一个不正确的观念，仿佛社会主义革命即将到来。恩格斯写道：“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明显地证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101 页）资本主义生产那时还有很大的扩展力，整个说来还是沿上升线发展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50 年 3 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以及他们在这个时期所写的其他某些著作，对无产阶级革命的主客观前提也作了这样过高的估计。弗·伊·列宁在谈到马克思和恩格斯断言革命临近的这类错误时，曾经写道：“但是，不断提高全世界无产阶级，使它超出渺小的、平庸的、芝麻大的任务的水平的革命思想的巨人所犯的这类错误，比起那些歌唱、哀号、呼吁和赞美关于革命的空虚、革命斗争的徒劳、反革命的‘立宪’日子的美妙的官僚自由主义的庸俗智慧要高尚、伟大千倍，在历史上要珍贵、真实千倍。”（“列宁全集”第 4 版第 12 卷第 337—338 页）

如果说在“法兰西阶级斗争”中从理论上总结了法国革命的经验，那末在 3 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以及象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和“德国农民战争”这些著作中，就总结了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经验。

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50 年 3 月所写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是科学共产主义的重要文献之一。弗·伊·列宁认

为这个著作“很有意思，很有教益”（“列宁全集”第4版第8卷第433页）。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同盟书”中指出，“共产党宣言”所发挥的理论原理在革命进程中被完全证实了。同时在“同盟书”中阐明了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1848—1849年的革命经验所提出的一些新问题，从而在制定革命无产阶级的纲领和策略上向前大大地进了一步。

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很快就会发生新的革命高潮，而这个高潮会首先使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取得政权，因而在“同盟书”中说明了无产阶级政党对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策略。他们证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不能把革命进行到底，所以迫切需要使德国无产阶级摆脱他们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贯彻从1849年春天起就规定的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组织上完全分立的方针，他们在“同盟书”中特别强调指出，工人党在未来的革命中必须独立地、最有组织地进行活动。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首要任务是在德国建立工人党的秘密组织和公开组织，使同盟的所有秘密组织成为公开的工人团体的中心和核心，以便在这种工人团体中，在讨论工人的立场和利益时不受资产阶级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反对一切宗派主义，他们解释道，无产阶级政党必须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来对付反动派，和他们结成临时同盟，但是必须保持和巩固自己的独立组织，实行不依赖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革命政策。

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在“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所确立的基本主导思想，就是不断革命的思想。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原理早已包含在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8—1849年登在“新莱茵报”上的许多文章中，而本卷收入的一些文章如“法兰西阶级斗

争”等又发展了这个学说。“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最为详尽地表述了这一学说。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个文件中写道：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使革命仅仅取得不大的资产阶级性质的改革，便希望赶快结束革命，而无产阶级政党则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社会。”（见本卷第 292 页）为了保证不断的革命取得胜利，工人必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自治机关或工人俱乐部、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相并立；工人应当把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政府放在工人群众的监督之下。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武装工人、组织独立的无产阶级自卫军，是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必要条件。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在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列宁把马克思的不断革命的学说发展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并且根据俄国和其他各国工人阶级的斗争经验制定了新的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托洛茨基分子为了反对列宁关于社会主义可能首先在一个国家内胜利的理论，曾经歪曲了马克思关于不断革命的理论；苏联共产党捍卫了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的理论，从思想上击溃了托洛茨基分子。

本卷中的 6 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 3 月的“同盟书”有着密切的有机联系，前者也贯穿着必须尽快建立

“革命政党在全德各地的强大秘密组织”的思想；这个文件详尽地叙述了同盟的状况，确定了同盟对待德国各派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态度。

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不仅是一本历史著作，而且是目击者叙述的故事，是这里所记述的事件的积极参加者的生动证言。它深刻地分析了运动发生的原因，各阶级各政党的立场，并且鲜明地描绘了运动的各个情节，中肯地介绍了参加运动的各个活动家。恩格斯在这里严厉地批评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领袖用漂亮的空话代替革命行动的作法，批评他们一直优柔寡断，在斗争的紧要关头摇摆不定，以致出卖了革命运动。这本著作总结了人民群众在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最后阶段中的斗争经验，包含了关于革命党在武装起义和国内战争中的策略的许多重要原理。

弗·恩格斯写的历史著作“德国农民战争”，同总结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经验的任务也是有联系的。弗·恩格斯后来写道：“德国 1525 年革命和 1848—1849 年革命间的类似之处，是异常显眼的，以致使我当时不能完全不谈它。”（“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1954 年莫斯科中文版第 1 卷第 616 页）恩格斯在分析 16 世纪德国的革命事件时，从农民战争的历史和 1848—1849 年德国革命的经验中得出许多重要结论。他指出，德国人民这两次强大运动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 16 世纪德国市民阶级和 19 世纪德国资产阶级采取了叛卖立场。正如弗·伊·列宁着重指出的，恩格斯还指出了这些运动的另一个共同的特点：“被压迫群众因其小资产阶级生活地位的限制而行动分散，缺乏集中性。”（“列宁全集”1958 年人民出版社版第 25 卷第 191 页）这就是革命阶级在德

国人民两次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中表现软弱和遭受失败的原因之一。同时，恩格斯还着重指出了这两次运动由于历史时代的不同而具有的重大区别。

恩格斯所以重视德国非常突出的一段革命斗争，还由于他希望在德国到处精疲力竭和悲观失望的情况下，使人民记取他们追求革命解放的传统。恩格斯在他的著作中巧妙地描绘了 16 世纪中革命的农民和平民的战斗领袖的雄伟形象，并且指出农民群众中蕴藏着多么强大的革命精力。同时，恩格斯还说明，农民的特点使农民不能独立地把斗争进行到底。恩格斯这本著作的全部内容都证明，必须利用农民的革命可能性，农民同无产阶级结成联盟有着巨大的意义。

“德国农民战争”是对德国整整的一个历史时期进行唯物主义分析的卓越范例，在这种分析中，理论上非常深刻的总结和政治上非常尖锐的结论有机地结合起来了。恩格斯并没有想独立地研究资料（全部事实材料都是从德国历史学家威·戚美尔曼的一本书中引证来的），他在历史著作中第一次揭露了宗教改革和农民战争的社会经济的原因、当时发生的政治和宗教的斗争的阶级本质，而德国资产阶级的唯心主义历史学家却认为这种斗争“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见本卷第 399 页）。

书报评论和批判文章在本卷占有相当大的篇幅，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文章反驳了革命无产阶级在思想方面的敌人，揭穿了他们的立场的阶级本质，尖锐地批判了他们大量的腐朽思想和反对革命运动的方法。

在针对基佐的小册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所写的书评中指出，就是从前经历过激烈的阶级斗争和革命的进步资产阶级

历史学家，也由于在这种斗争和革命面前心惊胆颤而完全丧失了解历史的能力，从而他们作为学者也就发现自己破产了。例如，基佐极力为他的政治活动进行辩护，拒绝对历史事件作阶级分析，用唯心主义的、政治和宗教的空话来代替科学研究。在针对基佐的小册子所写的评论中，精辟地分析了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及其社会前提，指出了这次革命的全欧意义及其与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区别。

统治阶级的另一个著名思想家、封建社会主义的代表托马斯·卡莱尔也遭受了和基佐相同的命运。如果说从前卡莱尔由于反对了庸俗而小气的英国资产阶级，捍卫了1789年的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宪章运动而起了一定的好作用，那末在1848年革命时期以及革命以后的时期便成了革命和民主的凶恶敌人。针对托·卡莱尔的“当代评论”所写的评论尖锐地批评了他的主观唯心主义的理论，特别是他所宣传的“英雄崇拜”。评论证明，卡莱尔是怎样在崇拜个人、尊敬英雄的幌子下，维护甚至助长资产阶级的一切卑鄙行为。那些花言巧语归根到底完全是为了维护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和奴役，否认人民群众在历史上的任何作用。和卡莱尔的主观唯心主义的观点相反，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在这篇评论中捍卫了唯物史观，强调了人民群众在历史发展中的伟大创造作用。

主观唯心主义的个人崇拜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及其历史学家和政论家中也流行得十分广泛，它在卡贝、魏特林及其他空想社会主义者信徒的第一批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组织中也有一定的影响。马克思和恩格斯坚决反对个人崇拜，因为个人崇拜妨碍建立工人的阶级组织和发扬其独创精神。针对法国两个警探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的诬蔑性抨击文章所写的评论中，马克思主义

奠基者写道：“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在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描绘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象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见本卷第 313 页）。这篇评论还尖锐地批评了阴谋活动和宗派主义，指出了这些现象在工人运动中的恶劣作用。这里强调指出，阴谋家的目的不是把革命无产阶级组织起来，而是人为地加速革命的发展，“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的密谋活动”（见本卷第 321 页）。这是些革命的炼丹术士，他们虚无主义地对待革命理论，他们轻视培养无产阶级的阶级觉悟的任务。

这些深刻的理论原理所反对的宗派主义阴谋分子即使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内部也很有势力，因而很快就使得同盟发生分裂；所以对阴谋活动和宗派主义进行这种批评，对于同盟是非常有现实意义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书报评论和短评，批评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和思想家（如路·西蒙·哥·金克尔等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根据具体事例指出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软弱性，阐明了巩固革命党的手段即批评的意义。在“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中，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坚持了这样一个思想：在革命和反革命发生决定性的搏斗时，人民“应当站到革命的一边，不管代表革命的是谁，是法国人也好，是中国人也好”。马克思和恩格斯从革命利益的角度来观察各民族间的相互关系，从而制定的这个革命策略的

基本原理,受到弗·伊·列宁的特别重视。

对道梅尔的著作的评论,揭露了由德国庸人们惯用的庸俗箴言拼凑起来的可怜著作,即道梅尔企图用以充作“新世纪的宗教”的这本著作的反革命性质。这本用从各种作者那里摘录来的引文所拼凑的作品,充满了对下层人民的蔑视和对革命的恐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这本书是被革命吓破胆的德国小市民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在思想上已经破产的显著证明。道梅尔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预先形成了后来的造神说;弗·伊·列宁把造神说描述为蠢笨的小市民所喜爱的自我直观,绝望和疲惫的市俗的思想。

本卷中对艾米尔·日拉丹写的“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评论,是继续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所作的批判。这篇评论对于资产阶级税收制度的本质,对于在资本主义农业中地产从集中到分散和从分散到集中的循环运动,发表了深刻的意见。评论同时对法国德国当时较为流行的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也进行了尖锐的批评。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废除国家的口号和德国‘无政府之友’”这篇未完成的手稿,与上述评论内容相近。在这篇手稿中对“废除国家”这种无政府主义思想的批评和对德国这种思想的根源的分析有很大的理论意义。

在乔·哈尼发行的“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杂志上刊载的弗·恩格斯写的“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和在恩·琼斯主编的“寄语人民”杂志上刊载的卡·马克思写的“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书,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左派宪章主义者亲密合作的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邀请他们亲近的拥护者为这些刊物写文章,这些人的作品也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直接参与

下写成的。为这些杂志写文章的目的，是要在英国无产阶级的刊物上宣传“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把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贯彻到英国工人运动中去。

恩格斯在“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中证明说，不应当把在立法上对工作日的限制看做是工人运动的最终目的，采取同反动的敌人资产阶级结成联盟的办法，工人的状况不可能得到根本的改善，工人阶级“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见本卷第274页）。恩格斯这篇文章，对英国无产阶级争取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斗争的意义，对缩短工作日对英国无产者在身体和精神的发展上的良好影响，是有些估计不足的。后来马克思在“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中，对这条法律及其对工人阶级的意义，作了更全面的估价。

马克思的“法兰西宪法”一文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它对资产阶级的民主作了深刻的批判。马克思以法兰西宪法为例指出，在资产阶级宪法中大肆吹嘘的民主权利，总是附带规定许多使民主权利化为乌有的例外和限制。马克思还指出了资产阶级立宪主义的另一个特点，就是宪法规定的“自由”和在绝大多数情况下的实际作法是互相脱节的。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有很大的理论意义。这些述评对许多国家当前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重大事件作了科学的分析，包含着许多在历史的进一步发展进程中得到证实的预测。比如，在1850年1月至2月所写的国际述评（一）中就预言俄国和土耳其将发生新战争，这次战争必然会转变为欧洲大战。这篇文章第一次指出了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对于美国经济发展、世界贸易和大工业生产在欧洲大陆上取得胜利的意义。马克思和恩

格斯预测说，随着美国经济实力的蓬勃发展，欧洲老资本主义国家如英国和法国将会日益依赖于美国，这个预言也被证实了。“欧洲文明国家要不陷入象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见本卷第 264 页）。恩格斯直到他逝世为止一直都抱有这种观点，这一点从他在 1892 年所写的“美国总统的选举”一文中可以看得出来。国际述评（一）表明，马克思和恩格斯深信中国革命将会获得胜利。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国际述评中根据 1848 年革命经验论证了“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个原理，即经济危机是革命危机的最强大的杠杆之一，而另一方面，“繁荣的恢复会破坏革命，会为反动派的胜利创造条件。”（“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 1 版第 27 卷第 184 页）如果说在头两篇国际述评中还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预料经济危机很快就会到来，新的革命高涨也会随之产生，那末在最后一篇述评（1850 年 5 月 10 月）中，他俩直截了当地说，资本主义国家已进入工业繁荣时期，因此革命运动的新高涨暂时是根本谈不到的。“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见本卷第 514 页）

马克思主义的奠基者从这个结论出发，确定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新策略，并且同宗派主义阴谋活动分子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因为这些分子用唯心主义的唯意志论观点代替了对历史条件的客观分析，促使同盟走上为时过早的发动和阴谋颠覆活动的道路。马克思和恩格斯同为了网罗同盟者而和小资产阶级首领结成无原则的联盟的维利希和沙佩尔冒险集团进行了斗争，结果共产主义者同盟 1850 年 9 月发生分裂，这个集团从同盟中被开除出去。

由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便退出了多数会员拥护维利希和沙佩尔集团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同完全与分裂分子团结一致的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亚当、维迪尔、巴特尔米等）断绝了关系。本卷中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退出伦敦教育协会的声明，致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的信件，以及附录中关于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的 1850 年 9 月 15 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和其他许多文件，都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奠基者反对维利希和沙佩尔集团的斗争。

编入本卷的弗·恩格斯的手稿“1852 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不是为报刊写的，照恩格斯的说法，是“一种自己进行练习的作品”。这篇手稿对 18 世纪末期以来欧洲各国的军事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 analysis，对这些国家在 19 世纪中叶军事经济的潜力作了阐述。恩格斯在这篇手稿中对于取得胜利的无产阶级革命军队中的军事艺术发展道路，发表了许多深刻的意见。他指出，这种军队将拥有空前的实力，因为它们的群众性、机动性和突击力量不断增强的基础，将是新社会的生产力的大大提高，技术和文化的大大发展。

本卷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致许多报馆编辑部的一批公开的信件和声明，反映了马克思和恩格斯于 1849—1851 年在团结革命流亡者方面的实际活动。其中一部分文件的内容是揭露欧洲各国反动专制的和资产阶级的政府的谍报制度和革命流亡者所进行的迫害活动。

*

*

*

本卷所刊载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有 10 篇在全集第一版中没有收入；其中有些著作在第 1 版第 8 卷（1930 年）的序言中只是

引用过。对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的著作所做的评论这里全文载出，与全集第1版中的节本不同。

本卷附录里刊载的文件，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亲自参加拟定的。大部分材料是第一次译成俄文发表的。

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

卡·马克思

和

弗·恩格斯

1849年8月—1851年6月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出版启事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¹
出版启事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将于 1850 年 1 月开始出版。

卡尔·马克思主编。

本杂志以“新莱茵报”为名，应该被看作是该报的继续。本杂志的任务之一，就是发表一些探讨过去事件的评论来阐述“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以来的一段时期。

报纸最大的好处，就是它每日都能干预运动，能够成为运动的喉舌，能够反映出当前的整个局势，能够使人民和人民的日刊发生不断的、生动活泼的联系。至于杂志，当然就没有这些好处。不过杂志也有杂志的优点，它能够更广泛地研究各种事件，只谈最主要的问题。杂志可以详细地科学地研究作为整个政治运动的基础的经济关系。

目前这个表面平静的时期，正应当利用来剖析前一革命时期，说明正在进行斗争的各政党的性质，以及决定这些政党生存和斗争的社会关系。

本杂志每月出版一期，每期篇幅至少 5 印张。预订每季 24 银格罗申，订费在收到第一期时付清。每期零售 10 银格罗申。本杂

志由汉堡舒贝特书局负责发行。

希望“新莱茵报”的朋友们在当地组织订阅，并尽快地将订
单寄交下面署名的人。寄给本杂志的稿件及待评的新书，请自付
邮资。

“新莱茵报”出版负责人

康·施拉姆

1849年12月15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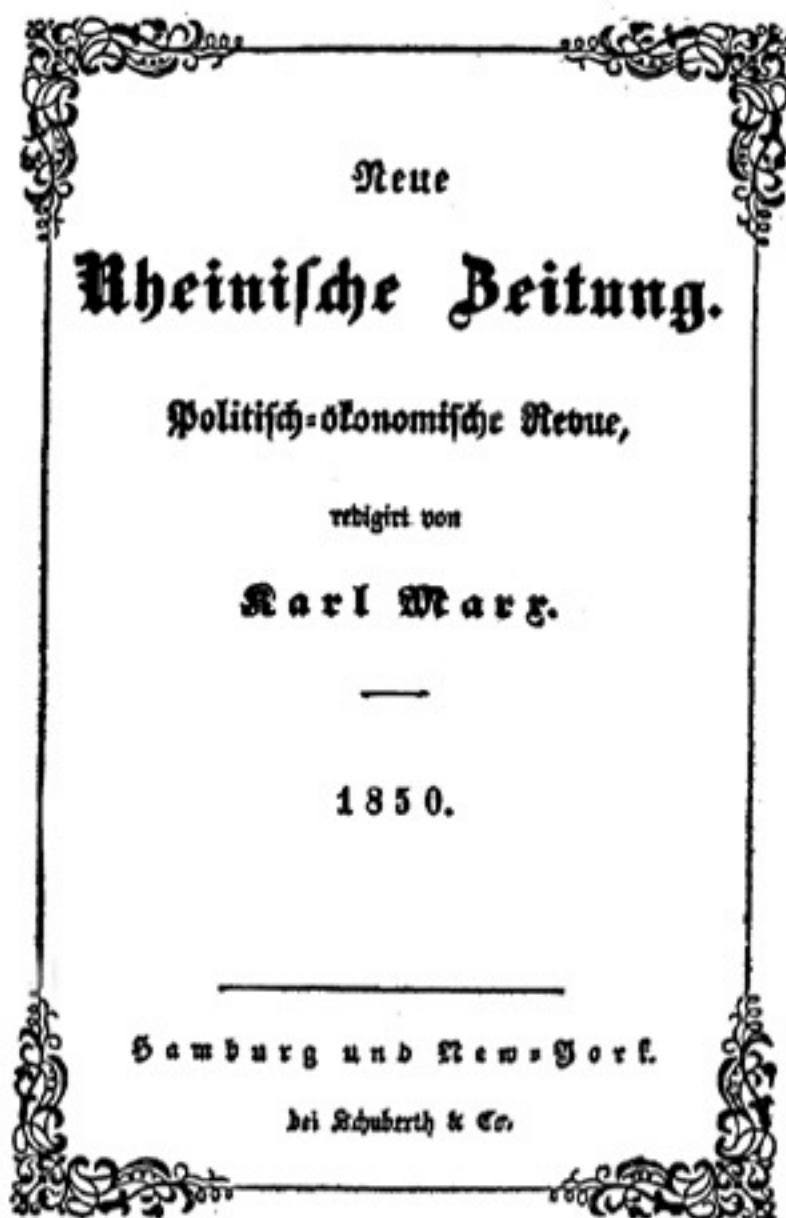
载于1850年1月8日

“西德意志报”第6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德意志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封面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封面

弗·恩格斯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和“泰晤士报”
给“北极星报”²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上星期五“泰晤士报”³登了一封署名为“反社会主义者”的信，信中向英国公众和内政大臣揭露一位卡尔·海因岑先生在“德意志伦敦报”上所陈述的某些“恶毒学说”⁴。这位海因岑先生被当做了“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光辉的火炬”。这些“恶毒学说”大体上被归结为一个充满善意的号召，号召在大陆上即将发生的革命中，杀掉“200万个反动分子”。

“泰晤士报”的编辑把自己报纸的篇幅变成了登载公开的警察情报及政治性告密的地方，对于编辑的这种行为，我们完全请您自己来评价。但是，我们非常惊奇的是，“欧洲的居领导地位的报纸”竟把海因岑先生当做“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光辉的火炬”。“欧洲的居领导地位的报纸”无论如何应该知道，海因岑先生不但不是这个党的光辉的火炬，而且正好相反，从1842年起他不顾失败地一直竭力反对同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有关的一切。因此，“德国社会民主党”从来也没有，今后大概也不会对卡尔·海因岑先生的谈话和文章负责。

至于上述“恶毒学说”所造成的危险，那末“泰晤士报”应

该已经知道,海因岑先生在德国最近 18 个月的革命动荡时期不仅没有想在实践中实现这些学说,而且连脚也没有踏上过德国的土地,没有在德国发生的任何一次革命中起过什么作用。

如果认为一个连最没落的德国皇帝也从来没有损害过的人,会给强大的不列颠帝国带来危害,那末,亲爱的先生,在我们看来,抱有这种想法是对英吉利民族的一种侮辱。因此,我们倒想建议“泰晤士报”最后感谢卡尔·海因岑那种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 *Courage malheureux*〔无济于事的勇敢精神〕。

编辑先生,请接受最崇高的敬意!

德国社会民主党人

1849 年 11 月 28 日于伦敦

弗·恩格斯写

载于 1849 年 12 月 1 日

“北极星报”第 632 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北极星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马克思

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⁵

卡·马克思写于1850年

1月—11月1日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
经济评论”第1、2、3和5—6期

署名：卡尔·马克思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杂志
上的原文曾按1895年
版本校对过

1848年至1850年的 法兰西阶级斗争

除了很少几章之外，1848—1849年的革命编年史中每一较为重要的篇章，都题名为革命的失败！

但是，在这些失败中陷于灭亡的不是革命。陷于灭亡的乃是革命前的传统的残余，即那些尚未发展到尖锐阶级对立地步的社会关系中的产物；陷于灭亡的是革命党在二月革命以前没有摆脱的一些人物、幻想、概念和方案，这些都不是二月胜利所能使其摆脱的，只有一连串的失败才能使它摆脱。

总之，革命向前进展并为自己开拓道路不是由于它获得了直接的悲喜剧式的胜利，反而是由于它产生了一个团结而坚强的反革命，即产生了一个敌人，而主张变革的党只是在和这个敌人做斗争中才发展成了真正革命的党。

下面几篇论文的任务，就是要证明这点。

1848年的六月失败

七月革命之后，自由派的银行家拉菲特陪他的 compère [教父] 奥尔良公爵向市政厅凯旋行进时，失口说出了一句话：“从今以后，银行家要统治国家了”。拉菲特道出了这次革命的秘密。

在路易-菲力浦时代掌握统治权的不是法国资产阶级，而只是这个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集团：银行家、交易所大王和铁路大王、煤矿和森林的所有者以及与他们相勾结的那部分大土地所有者，即所谓金融贵族。他们盘踞王位，他们在议会中强订法律，他们分配各种俸禄优厚的官职，从内阁大臣起至官立烟草店止。

真正工业资产阶级是正式反对派中的一部分，就是说，它的代表在议会中只占少数。金融贵族的专制愈是发展成为纯粹的专制，而工业资产阶级本身又愈是以为在 1832 年、1834 年和 1839 年各次起义⁶被残酷镇压后，自己对工人阶级的统治已经巩固了，则它的反对态度也就愈坚决。卢昂的工厂主格朗丹在制宪国民议会和立法国民议会中是最狂热拥护资产阶级反动势力的，在众议院中却是基佐的最激烈的反对者。后来曾以妄图在法国反革命派当中挤上基佐那样的地位而出名的莱昂·福适，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末年，为了工业的利益进行过反对投机事业及作为投机事业

双关语：《compère》——“教父”，也有“同谋者”的意思。——编者注

走狗的政府的笔战。巴师夏曾以波尔多和所有法国酿酒厂主的名义煽动反对当时现存的统治制度。

所有各个阶层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农民阶级，都完全被排斥于政权之外。最后，置身于正式反对派的行列里或是完全处在 *pays légal* [选举权享有者的范围] 之外的有上述诸阶级的思想代表者和维护者，即它们的学者、律师、医生等等，——简言之，就是它们的那些所谓“天才人物”。

财政困难使七月王朝一开始就依赖资产阶级上层，而它对资产阶级上层的依赖又经常使财政困难日益加剧起来。当没有恢复预算平衡，没有恢复国家收支平衡的时候，是不能使国家行政服从于国民生产利益的。然而，若不缩减国家支出，即若不损害现存统治制度支柱的利益，若不改变税收制度，即若不把很大一部分税负加到资产阶级上层分子肩上，又怎能恢复这种平衡呢？

国家负债倒是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中通过议会来统治和立法的那个集团的利益。国家财政赤字，正是他们投机的对象和他们致富的主要泉源。每一年度结束都有新的财政赤字。每过 4 年或 5 年就有新的公债。而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金融贵族获得新的良好机会去盘剥经常被人为地保持在濒于破产状态的国家，因为国家不得不按最不利的条件向银行家借款。此外，每一次新的公债都使他们获得新的机会，通过交易所活动来掠夺一般投资于公债券的大众，而这种交易所活动的诀窍，是政府和议会多数派议员所通晓的。一般说来，银行家和他们在议会中和王座上的同谋者由于利用国家信用的不稳定状态和掌握国家的秘密，才有可能制造公债券市价的突然急剧的波动，这种波动每次都要使许多较小的资本家倾家荡产，使大投机者难以置信地暴富起来。正因为国

家财政赤字直接符合于资产阶级当中掌握统治权的那个集团的利益，所以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的国家非常开支超过了拿破仑统治时的国家非常开支一倍以上；法国每年输出总额平均很少达到7亿5000万法郎，而每年国家非常开支却差不多达到4亿法郎。此外，这样由国家经手花出的巨额金钱，又为欺诈包工，贿赂往来、偷盗窃取以及各种各样的舞弊勾当造成了良好机会。在发行公债时盗窃国家资财是批发式地进行的，而在执行官方包工合同时则又零售式地重复进行。议会与政府之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各个官厅与各个企业家之间反复重演着。

统治阶级，在铁路建筑上也如在国家的一般支出与公债上一样，乘机进行了掠夺。议会把主要的开支转嫁于国家，而保证那投机的金融贵族得到黄金果。大家都记得众议院中的那些丑闻，当时偶然暴露出：多数派的全体议员，包括一部分内阁大臣在内，都曾以股东身分参与过他们后来以立法者身分迫令国家出资进行的那些铁路建筑工程。

反之，任何一点点财政改革，都因受银行家反抗而遭到失败。例如，邮政改革就是如此。路特希尔德起来抗议了。难道国家敢于缩减它赖以支付日益增加的国债利息的财源吗？

七月王朝不过是剥削法国国民财富的股份公司；这个公司的红利是在内阁大臣、议会、24万选民和他们的随从之间分配的。路易-菲力浦便是这个公司的经理——坐在王位上的罗伯尔·马凯尔⁷。这个制度经常不断地威胁和损害商业、工业、农业、航业以及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而这个资产阶级在七月事变时在自己的旗帜上写下的是 *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廉价政府。

既然金融贵族颁布法律，指挥国家行政，支配全部有组织的

社会势力,而且借助于自己的统治地位和报刊来操纵社会舆论,所以无论在什么地方,上至宫廷,下至 *café borgne*〔最低级的妓馆〕,到处都是一样卖淫,一样无耻欺诈,一样贪图不靠生产而靠巧骗他人财产来发财致富;尤其是在资产阶级社会的上层,不健康的和腐朽的欲望泛滥横流,甚至和资产阶级法律都步步抵触,投机得来的财富自然是要在这种形式之中去寻求开心的用场,于是享乐变成淫荡,金钱、污秽和鲜血就同归一流。金融贵族,不论就其发财致富的方式来说,或就其享乐情形来说,都只不过是流氓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社会上层的再生罢了。

当1847年,在资产阶级社会最高贵的舞台上同样地公开表演那些通常使流氓无产阶级进入妓馆、残废院和疯人院,走上被告席、苦役所和断头台的丑剧时,法国资产阶级中没有参加政权的各个集团高叫“腐败!”人民大声疾呼:《*A bas les grands voleurs! A bas les assassins*》〔“打倒大盗!打倒杀人凶手!”〕工业资产阶级看到了自己利益受到的威胁,小资产阶级充满了道义的愤慨,人民的想象力被激怒起来了。诸如《*La dynastie Rothschild*》〔“路特希尔德王朝”〕、《*Les juifs rois de l' époque*》〔“高利贷者是现代的国王”〕等等的疯刺作品,充斥了巴黎全城,这些作品都在不同的程度上揭露了和诅咒了金融贵族统治。

Rien pour la gloire!〔不为荣誉花一文钱!〕荣誉不能带来任何利润!*La paix partout et toujours!*〔无论如何都要和平!〕战争将使3分息和4分息公债券行价降低!——这就是交易所投机者的法国写在自己旗帜上的字样。因此,它的对外政策归结起来就是让法国自尊心遭到一系列的凌辱。当奥地利吞并克拉柯夫而完成了对于波兰的掠夺时,当基佐在瑞士宗得崩德⁸战争中积极

地站到了神圣同盟方面时，法国民族自尊心更是感到了特别强烈的愤激。瑞士自由党人在这次微小战争中的胜利提高了法国资产阶级反对派的自尊心，而巴勒摩人民的流血起义则象电流一样激动了麻痹的人民群众，唤起了他们的伟大革命回忆和热情。

最后，由于两个具有世界意义的经济事件的发生，普遍不满的爆发便加快起来，而不平的怨言便发展成了起义。

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虫害和歉收，加深了人民中的普遍不满。1847年的物价腾贵，在法国也如同在欧洲大陆其他各国一样，引起了流血的冲突。金融贵族过着花天酒地的无耻生活，同时人民却不要为起码的生计而斗争！在比桑歇饥荒暴动的参加者被处死刑⁹，而在巴黎大腹便便的欺诈者却被王室从法庭中抢救出来。

加速了革命爆发的第二个重大经济事件，就是英国的工商业总危机。1845年秋季铁路股票投机者整批破产的事实已经预示了这次危机的来临，在1846年有一系列偶然情况如谷物税即将废除等等使它延缓了一下，到1847年秋天终于爆发了。最初的表现就是伦敦经营殖民地货物贸易的商人破产，接着便是土地银行破产和英国工业区工厂倒闭。还没有等到这次危机的全部后果在大陆上彻底表现出来，二月革命就爆发了。

这场损害了工商业的经济瘟疫，使金融贵族的专制统治变得更加不堪忍受了。反对派的资产阶级，在法国各处发起了支持选举

奥地利在俄国和普鲁士同意下吞并克拉柯夫，是在1846年11月11日；瑞士宗得崩德战争，是在1847年11月4日至28日进行的；巴勒摩的起义爆发于1848年1月12日；在1月末，那不勒斯军队对该城进行了一连9日的炮击。（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

改革的宴会运动,这种改革必定会使他们能在议会中取得多数,并推翻交易所内阁。在巴黎,工业危机还引起了一个后果:大批工厂主和大商人在当时的条件下已不能再在国外市场做生意,只得纷纷向国内市场方面发展。他们开设起大公司,使大批小杂货商和小店主被他们的竞争弄得倾家荡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巴黎资产阶级中间这一部分人破产的很多,为什么他们在二月事变中采取了革命行动。大家都知道,基佐和议会以露骨的挑战方式回答了选举改革的提议,路易-菲力浦决定要任命巴罗组阁的时候已经太迟了,事情竟闹到人民与军队冲突起来,军队因国民自卫军采取消极态度而弄得束手无策,七月王朝不得不让位给临时政府。

在二月街垒战中产生出来的临时政府,按其构成成分必然是分享胜利果实的各个不同党派的反映。它只能是各个不同阶级间的妥协,这些阶级曾共同努力推翻了七月王朝,但他们的利益是互相敌对的。临时政府中绝大多数是资产阶级的代表。赖德律-洛兰和弗洛孔代表着共和主义小资产阶级,代表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是“国民报”¹⁰方面的人物,代表王朝反对派的是克莱米约、杜邦·德·累尔等。工人阶级只有两个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最后,拉马丁在临时政府中本来是不代表任何现实利益,不代表任何一定阶级的;他体现了二月革命本身,体现了这次总起义及其幻想、诗意、臆想的内容和辞句。可是,这个代表二月革命的人物,按其地位和观点看来是属于资产阶级的。

如果说巴黎由于政治上的中央集权而统治着法国,那末工人在革命的动荡时期却是统治着巴黎的。临时政府的第一步,就是企图由陶醉于胜利的巴黎去诉诸清醒的法国,借以摆脱这种压倒一切的影响。拉马丁不承认街垒战士有权宣告成立共和国。据他

说，只有法兰西国民大多数才有权这样作，必须等待法兰西国民投票表决，巴黎的无产阶级不应该以篡夺权力玷污自己的胜利。资产阶级只允许无产阶级进行一种篡夺，即对于斗争权的篡夺。

直到 2 月 25 日中午时分，共和国还没有宣告成立，然而内阁的一切职位都已被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即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们所瓜分了。但是工人这一次已决心不再象 1830 年 7 月那样任人欺骗。他们决心要重新开始斗争，以武力争得共和制度。拉斯拜尔前往市政厅去声明此事。他以巴黎无产阶级的名义，命令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和国；如果人民的这个命令在两小时之内不付诸执行，他就要带领 20 万人回来质问。阵亡战士尸骨未寒，街垒尚未拆除，工人也还没有解除武装，而唯一可以用来与工人相对抗的力量不过是国民自卫军。在这种情况下，临时政府的那种治国安邦的智谋和按律行事的拘谨精神立即消失不见了。在两小时的期限未满足以前，巴黎的各处墙壁上就已赫然出现具有历史意义的大字：

R épublique française ! Liberté, Egalité, Fraternité, (法兰西共和国！自由，平等，博爱！)

以普选权为基础的共和国一宣告成立，那些驱使资产阶级投入二月革命的有限目的和动机也就无人记起了。不是资产阶级中的少数个别集团，而是法国社会中所有各个阶级，都突然被吸收到政权中来，被迫离开包厢、正厅和楼厅而走上革命舞台去扮演各种角色！君主立宪制被推翻后，国家不受资产阶级社会支配的这种假象就归于消失，因而由此种假象所引起的许多派生性的冲突也一并消失了！

无产阶级既强迫临时政府，并通过临时政府强迫全法国实行

共和制度，它就立刻以一个独立政党的姿态走上了前台，但是同时它却招致了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来和它作斗争。它所获得的只是为本身革命解放作斗争的基地，而并不是这种解放本身。

相反，二月共和国首先应该是使资产阶级的统治成为更加全面的统治：由于成立这个共和国，一切有产阶级都跟金融贵族同等获得了参加政权的机会。共和国使大多数的大土地所有者即正统主义者摆脱了七月王朝使他们陷进去的那种政治地位低微的状态。无怪乎“法兰西报”¹¹曾与反对派方面的报纸一起进行鼓动，无怪乎拉罗什雅克兰曾在2月24日的众议院会议上表示赞助革命。普选权已把法国的命运交归那些占法国人民绝大多数的名义上的所有主即农民掌握。最后，二月共和国打碎了资本隐藏于其后的王座，因而资产阶级的统治现在已公开地显露出来了。

正如在七月事变中工人争得了资产阶级君主国一样，在二月事变中工人又争得了资产阶级共和国。正如七月君主国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置有共和机构的君主国一样，二月共和国也不得不宣布自己为设置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的无产阶级把这个让步也争到手了。

工人马尔歇提出了一项法令，其中规定刚成立的临时政府保证工人能以劳动维持生存，使全体公民都有工可做等等。当临时政府过几天后已忘却自己的诺言，好象是把无产阶级完全忽略过去了的时候，就有两万工人群众涌向市政厅，大声高呼：组织劳动！成立专门的劳动部！临时政府经过了长时间的讨论之后，终于不得不设立了一个专门常设委员会，要它去探求改善工人阶级状况的办法。这个委员会由巴黎各手工业同业公会的代表组成，由路易·勃朗和阿尔伯两人任主席。把卢森堡宫拨给它作会址。这

样，工人阶级的代表就被逐出了临时政府的议事厅，面临时政府中的资产阶级分子就把国家的实权在行政枢纽完全保持在自己手中了。在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近旁，在银行和交易所近旁，建立了一个社会主义的礼拜堂，这个礼拜堂的两个祭司长路易·勃朗和阿尔伯所负的任务就是要发现乐土，宣告新福音，并使巴黎无产阶级有事可做。与任何尘世的国家政权机关不同，他们既没有任何经费预算，也没有任何执行权力。他们得用自己的额骨去撞碎资产阶级社会的柱石。卢森堡宫里在忙着探求点金石，而市政厅里却在铸造通用的钱币。

可是必须指出，巴黎无产阶级的要求既然越出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范围，确实也只能在卢森堡委员会的朦胧形式中得到表现。

工人与资产阶级协力进行了二月革命；现在工人企图在资产阶级身边捍卫自己的利益，——须知他们确实把一位工人安插在临时政府里面坐到了资产阶级多数派旁边哩。组织劳动！但是雇佣劳动本身已是用资产阶级方式组织劳动。没有雇佣劳动，就没有资本；没有资产阶级，就没有资产阶级社会。专门的劳动部！但是，难道财政部、商业部和公共工程部不是资产阶级的劳动部吗？设在这些部近旁的无产阶级劳动部，只能是一个虚弱无能的部，只能是一个仅有善良愿望的部，只能是一个卢森堡委员会。正如工人们相信能在与资产阶级并存的情况下解放自己，同样，他们也以为能够在与其他资产阶级国家并存的情况下在法国国内完成无产阶级革命。但是，法国的生产关系是受法国的对外贸易所制约的，是受法国在世界市场上的地位以及这个市场的规律所制约的。难道法国能够打破这种生产关系，而挑不起一场对于统治世界市

场的英国有强烈影响的欧洲革命战争吗？

当一个身为社会革命利益汇集中心的阶级起来斗争的时候，它就会直接在自己的地位中找到自己革命活动的内容和材料：它消灭敌人，采取适合斗争需要的办法，而它自己行动的后果就推动它继续前进。它并不从理论上研究本身的任务。而法国工人阶级不是处于这样的地位的，它还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革命。

一般说来，工业无产阶级的发展是受工业资产阶级的发展所制约的。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统治下，它才能获得广大的全国规模的存在地位，这种存在地位能够把它的革命提高为全国规模的革命；只有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下，它才能创造出现代的生产资料，这种生产资料同时又是它所能用以达到革命解放的手段。只有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才能除掉封建社会的物质根蒂，并且为无产阶级革命铺平它唯一能借以实现的地基。法国的工业是整个大陆上最发达的工业，而法国的资产阶级是整个大陆上最革命的资产阶级。但是二月革命难道不是直接反对金融贵族的吗？这一事实证明工业资产阶级还没有在法国占居统治。工业资产阶级的统治只有在现代工业已按本身需要改造了一切财产关系的地方才有可能实现，而工业又只有在它已夺得世界市场的时候才能达到这样强大的地步，因为国家的境界是不能满足其发展需要的。但是，法国的工业，甚至对于国内市场，也大都是赖有略经改头换面的保护关税制度才掌握得住。所以在革命发生时，法国无产阶级虽然在巴黎拥有实际的力量和影响，足以能够推动它超出自己所有的手段范围去继续前进，但是在法国外省各地，它却只是集聚在个别零散的工业中心，几乎完全消失在占压倒多数的农民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充分发展的现代的反资本斗争，登峰造极的反资本斗争，即工

业雇佣工人反对工业资产者的斗争,在法国还不是普遍现象。在二月事变之后,这种斗争更不能成为革命的全国性内容,因为在当时,反对次要的资本剥削方式的斗争,即农民反对高利贷和反对抵押制的斗争,小资产者反对大商人、银行家和工厂主等即反对破产的斗争,还隐蔽在反对金融贵族的普遍起义外壳下面。所以,无怪乎当时巴黎无产阶级努力捍卫自己的利益是把这些利益和资产阶级利益并列在一起,而不是把自己的利益提出来当作社会本身的革命利益;无怪乎它三色旗面前降下了红旗¹²。在革命进程还没有把站在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国民大众即农民和小资产者发动起来反对资产阶级制度,反对资本统治以前,在革命进程还没有迫使他们承认无产阶级是自己的先锋队而靠拢它以前,法国的工人们是不能前进一步,不能丝毫触动资产阶级制度的。工人们只能用可怕的六月失败作代价来换得这个胜利。

由巴黎工人创造出来的卢森堡委员会终究有一个功劳,这就是它从欧洲讲坛上揭露了19世纪革命的秘密:无产阶级的解放。“通报”¹³当不得不正式宣传一些“荒诞呓语”时弄得面红耳赤,这些“荒诞呓语”原先是埋藏在社会主义者的邪书里,只是间或作为一种又可怕又可笑的遥远的奇谈传进资产阶级的耳鼓。大惊失色的欧洲忽然从它那资产阶级性的假寐中觉醒过来了。于是,在把金融贵族和一般资产阶级混为一谈的那些无产者的观念里,在根本就否认有阶级存在或至多也只认为阶级不过是君主立宪制产物的那些共和主义笨伯的想象里,在先前被拒于政权之外的那些资产阶级阶层的甜言蜜语里,——资产阶级的统治已随着共和国的成立而被排除了。这时,一切保皇党人都变成了共和党人,巴黎所有百万富翁都变成了工人。与阶级关系这种想象的消灭相适

应的辞句，就是 *fraternité*——普遍的和睦与博爱。这样轻松地抹杀阶级矛盾，这样温柔地调和和对立的阶级利益，这样痴心妄想地超越阶级斗争，一句话：博爱——这就是二月革命的真正口号。只是由于纯粹的误会才使社会分裂成了一些阶级，于是2月24日拉马丁就把临时政府叫作《*un gouvernement qui suspende ce malentendu terrible qui existe entre les différentes classes*》〔“消除各阶级间所存在的可怕误会的政府”〕。巴黎无产阶级就沉醉在这种厚道的普遍博爱气氛中了。

同时，临时政府既被迫宣告共和国成立，就尽力地使这个共和国切合于资产阶级和各省的心意。它以废止政治犯死刑而表示否定法兰西第一共和国那种血腥恐怖手段；在报刊上可以自由坚持任何观点；军队、法庭、行政，除了少数例外，仍然是握在昔日的达官贵人手中；七月王朝的重大罪犯没有一个受到惩处。“国民报”方面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引以自慰的，是他们把君主国的名称和衣裳改换成旧共和国的名称和衣裳。对他们说来，共和国只不过是旧资产阶级社会的一件新制舞衣罢了。年轻的共和国认为自己的天职就是不要恐吓任何人，自己反而要对一切都害怕，而且要依靠柔顺和不抵抗主义来保全自己和制服敌人。它向国内特权阶级和国外强横的国家高声陈述了自己爱好和平的情怀：自己活，让别人也活，——这就是它的口号。恰好在这个时候，紧跟着二月革命，德国、波兰、奥地利、匈牙利和意大利的人民——每个国家的人民都按照自己所处情势的特殊条件——起来革命了。俄国和英国——后者本国情况也不稳定，而前者则被吓呆了——对此都感到惊慌失措。这样，共和国面前连一个全民族的敌人也没有碰到，因而也就没有什么重大的外部纠纷来刺激活动力，

加速革命过程，推动临时政府前进或将其抛弃。巴黎无产阶级是把共和国看作自己的产儿的，所以临时政府所采取的每一个有助于这个政府巩固其在资产阶级社会中的地位的措施，自然都受到它的欢迎。它很乐意地协助科西迪耶尔执行警察职务来保护巴黎城内的私有财产，并且让路易·勃朗调停工人与雇主关于工资的争议。它认为在欧洲面前保全共和国的资产阶级荣誉是它自己的 *point d'honneur* [荣誉问题]。

共和国不论在国外或国内都没有碰到什么抵抗。这种情况就使它丧失了力量。它的任务已不是要用革命手段改造世界，而是要它自己去适应资产阶级社会的条件。从临时政府的财政设施上最能清楚地看出它是如何狂热地担当起这一任务来的。

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自然是被动摇了。国家信用是靠确信国家听凭高利贷金融家剥削来维持的。但是旧的国家已经消失了，而革命又首先就是反对金融贵族的。最近这次欧洲商业危机的震荡还没有完全终止。破产还在相继发生。

这样，在二月革命还没有爆发以前，私人信用已被麻痹，商品流转已遇到困难，生产已被破坏。革命危机加强了商业危机。既然私人信用是靠确信全套资产阶级生产关系和整个资产阶级制度仍旧完整保存和不可侵犯来维持的，而革命已在使资产阶级生产根本受到威胁，已在使无产阶级经济奴役状态受到威胁，已在用卢森堡的怪象去与交易所相对立，那末这样的革命该使私人信用受到什么影响呢？无产阶级的解放，就等于资产阶级信用的消灭，因为它是意味着资产阶级生产和资产阶级制度的消灭。国家信用和私人信用，这就是表明革命强度的经济寒暑表。信用降低多少，革命的热度就上升多少，革命的创造力就增加多少。

临时政府想要抛掉共和国的反资产阶级外貌。为此首先就必须保证新国家形式的交换价值，保证它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私人信用必然要跟着共和国在交易所中的行价的确定而又上升起来。

为了使人甚至不会疑心共和国不愿意或不能够履行它从君主国继承下来的债务，为了使一般人相信共和国具有资产阶级的信实精神和支付能力，临时政府采取了丢人而且幼稚的浮夸手段。在法定偿付期限未满足时，它就已给国家债权人付清了 5 分、4 分 5 和 4 分息的债券的息金。资本家一看见临时政府这样提心吊胆急于收买他们的信任时，他们那种资产阶级的踌躇满志、非我莫属的神态就立刻全部恢复了。

自然，临时政府的金钱支绌，并没有因它采取这种耗尽本身现金储备的矫揉造作办法而稍许减轻。金钱支绌已不能再掩饰下去了，于是小资产阶级、仆役和工人就不免要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偿付政府对国家债权人备好的这种称心满意的礼物的价值。

政府宣布，凭储蓄银行存折取款，不得超过 100 法郎。所有存放在储蓄银行中的款项都被没收，由政府下令变为不予偿付的国债。这就激起了原已处境困窘的小资产者对于共和国的愤恨。小资产阶级这时所领到的已不是储蓄银行的存折而是国债证券，于是它就不免要把这种证券拿到交易所去出卖，因而不得不听任交易所中的高利贷大王们去宰割，即听任那些正是二月革命打击对象的人们去宰割。

银行是在七月王朝时代掌握统治权的那班金融贵族的总府。正象交易所把持着国家信用一样，银行操纵着商业信用。

二月革命不仅直接威胁到银行的统治，而且威胁到银行本身的生存；所以银行自始就设法把不守信用弄成普遍现象，借以破

坏共和国的信用。它突然停止对银行家、工厂主和商人发放信贷。这种手腕既没有立刻引起反革命，就必然反而使银行本身受到打击。资本家们把他们那些贮藏在银行地窖里的钱款取走了。纸币持有者们都连忙跑到银行出纳处去兑换金银。

临时政府本来是有可能不用强力干涉而完全合法地迫使银行宣告破产的；它只要保持消极的态度，让银行听天由命就得了。银行破产就会立刻象洪水泛滥一样把金融贵族，把这个七月王朝的黄金台柱，把共和国的这个最强大最危险的敌人从法国土地上扫除干净。而银行破产之后，如果政府建立一个国家银行并把全国信用事业置于国家监督之下，那末资产阶级自身也必定会把这当做自己在绝境中的一线生路。

但是，临时政府并没有这样做，反而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性的行价。不仅如此。它还把一切外省银行变成了法兰西银行的分行，因而就使法兰西银行能网布法国全境。后来，临时政府又向法兰西银行借款，并把国有森林抵押给它作为担保。这样一来，二月革命就直接地巩固和扩大了它本来应该推翻的银行统治。

同时，临时政府又日益被有增无已的财政赤字压得直不起腰来。它乞求大家来为爱国主义担负牺牲，但是一点用处也没有。只有工人才施舍给它几个钱。于是只得采取英勇手段——施行新税。然而向谁去征税呢？向交易所的豺狼、银行大王、国家债权人、食利者和工业家去征税吗？但这样去作是不能取得资产阶级对于共和国的同情的。这样作就会一方面破坏国家信用和商业信用事业，另一方面又使它受到很大的屈辱和牺牲。但是，总得有人从自己腰包里掏出钱来才行。到底是谁为资产阶级的信用事业作了牺牲呢？就是 Jacques le bonhomme¹⁴，农民。

临时政府对所有4种直接税每法郎加征45生丁的附加税。官方的报刊欺骗巴黎无产阶级,说这项税负主要是落在大地产上,即落在复辟王朝恩赐的10亿巨款¹⁵占有者的身上。实则这项税负首先落在农民身上,即落在法国绝大多数人民身上。农民不免要负担二月革命的费用,于是他们就构成了反革命方面的主力军。45生丁的税,对于法国农民是个生死问题,而法国农民又把它弄成了共和国的生死问题。从这时起,法国农民心目中的共和国就是45生丁的税,而巴黎无产阶级在他们看来就是专靠他们出钱来逍遥享乐的浪费者。

1789年的革命一开始就使农民免除了封建负担,而1848年的革命,却为了使资本不致受到伤害并使其国家机器能照常运转,首先就对农民加上了一项新税。

临时政府只有一个方法才能排除这一切困难,并使国家脱出其旧日的轨道,这就是宣告国家破产。大家都记得,赖德律-洛兰后来曾向国民议会详尽地描述,说他如何义愤填膺地驳斥了交易所的高利贷者、法国现任财政部长富尔德所提出的这种建议。可是,富尔德当时劝他接受的却是智慧树上的苹果哩。

临时政府既承认旧资产阶级社会所发的要国家负责付款的期票,于是就受到旧资产阶级社会支配了。它不是以一个威风凛凛的债权人身分跑去向资产阶级社会索取革命的陈年旧帐,反而陷进了应该向资产阶级社会还债的积欠债务人的地位。它只得巩固摇摇欲坠的资产阶级社会关系,来履行那些只有在这种社会关系范围内才必须履行的义务。信贷已成了它维持生存的必要条件,而它对无产阶级所作的让步和对无产阶级许下的诺言,却已成了它无论如何都必须打破的桎梏。工人解放——即令只是一句关于这

种解放的言词——都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危险了，因为主张工人解放就是经常反对恢复靠绝对确认现存的经济的阶级的关系来维持的信用。所以，一定要把工人干掉才行。

二月革命已把军队抛出巴黎了。国民自卫军，即资产阶级各个阶层的势力，成了唯一的军事力量，但是它并不觉得自己充分强大能把无产阶级对付下去。况且，国民自卫军已被迫实行——虽然是经过了极顽强的抵抗和用尽了一切阻挠办法之后，虽然只是局部实行，渐渐实行——议武装的无产者加入自己的行列。这样一来，就只剩下了一条出路：使一部分无产者去与另一部分无产者相对立。

为了这个目的，临时政府就编了 24 营别动队，每营 1000 人，由 15 岁到 20 岁的青年组成。这些青年大部分属于流氓无产阶级，而流氓无产阶级在一切大城市里都可遇见，并且是与工业无产阶级迥然不同的。这个阶层是产生盗贼和各式各样罪犯的泉源，其组成部分都是专靠社会餐桌上的残羹剩屑生活的分子，无一定职业的人们，即游民——*gens sans feu et sans aveu*；他们依各人所属民族的文化水平高低不一而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随时随地都保持着拉查罗尼¹⁶的特点。他们的性格在受雇于临时政府的青年时期是极不稳定的，虽能作出轰轰烈烈的英雄勋业和自我牺牲的事迹，但同时也能干出最卑贱的盗窃行为和最齷齪的卖身勾当。临时政府每天付给他们 1 法郎 50 生丁薪饷，就是说，收买了他们。临时政府给他们穿上特别制服，就是说，使他们在外貌上跟身穿工作服的人们有所区别。他们的指挥官，一部分是由政府指派常备军军官担任，一部分是由他们自己选出的一些资产阶级年轻子弟担任，这些资产阶级子弟满口要为祖国牺牲和为共和国效忠的

高调都把他们迷住了。

这样，当时与巴黎无产阶级相对立的，就有一支从无产阶级自己当中募得的年轻力壮、拚命蛮干的 24000 人的军队。无产阶级在巴黎街道上向别动队高声欢呼“万岁”。它把别动队看成是自己在街垒战中的前卫战士。它认为别动队是与资产阶级的国民自卫军相反的无产阶级自卫军。它的错误是情有可原的。

除了别动队之外，政府还决定在自己周围募集一支产业工人军。马利部长把 10 万个因危机和革命而失业的工人编进了所谓国家工厂。在这个响亮名称的后面不过是以 28 苏的工资雇用工人去进行厌烦单调和效率极低的土工罢了。国家工厂就是露天的英国习艺所¹⁷。临时政府以为它是通过国家工厂组成了第二支无产者大军来反对工人自己了。但资产阶级这次是把国家工厂估计错了，也如工人把别动队估计错了一样。它原来是创立了一支暴动军。

但有一个目的是达到了的。

国家工厂——路易·勃朗在卢森堡宫所宣传的那种人民工厂就叫这个名字。马利的工厂是按照与卢森堡计划完全相反的计划建立起来的，但因为它们打着相同的幌子，也就往往引起了犹如西班牙家臣喜剧中那样的误会。临时政府自己暗地里散布谣言，说这些国家工厂是路易·勃朗的发明，尤其因为国家工厂的鼓吹者路易·勃朗是临时政府中的一员，于是这种谣言就更加显得真实可信了。在半天真半故意地混同这两种东西的巴黎资产阶级看来，在法国和欧洲当时受到播弄的社会舆论看来，这些习艺所乃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第一步，因而社会主义就受辱于众人之前了。

虽不是就其内容来说，但就其名称来说，国家工厂乃是无产

阶级反对资产阶级工业，反对资产阶级信用制和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具体表现。因此，资产阶级把自己的全部仇恨都倾注到这些国家工厂上面了；它认定这些国家工厂是它一旦强大到能够跟二月革命的幻想公然决裂时就可以打击的对象。小资产者也认定这些已成为共同攻击对象的国家工厂，是他们可以发泄自己的一切不满和烦恼的目标。他们咬牙切齿地盘算着，这班好吃懒做的工人该是消耗着多少金钱，而他们自己的境况却是一天比一天变得艰难了。装装样子的工作尽有国家年金可得，社会主义不过如此罢了！——他们这样嘟囔着说。他们认为自己生活穷困的原因就在于国家工厂，就在于卢森堡委员会的豪言壮语，就在于巴黎工人的示威游行。最狂热反对共产党人的莫须有的阴谋诡计的，莫如这些濒于破产而毫无得救希望的小资产者了。

这样，在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间的行将来临的搏斗中，一切优势，一切最重要的阵地，一切中等社会阶层，都掌握在资产阶级手中。而恰在这个时候，二月革命的浪潮却又在欧洲大陆上显得那样汹涌澎湃；每一次来的邮件，或从意大利那里，或从德国那里，或从欧洲极东南地区都传来新的革命消息，支持着人民的普遍陶醉情态，不断地给人民带来一些表明他们胜利的新证据，而这个胜利本身的果实却已从他们自己手中滑掉了。

3月17日事件和4月16日事件，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内部所蕴蓄着的伟大阶级斗争的初次交锋。

3月17日事件暴露了无产阶级不能采取任何坚决行动的模棱态度。无产阶级举行示威游行的最初目的，是要临时政府再回到革命轨道上去，使它在有一必要时就把资产阶级的阁员排出去，并使国民议会和国民自卫军的选举延期举行¹⁸。但是在3月16日，

由国民自卫军代表的资产阶级,举行了反对临时政府的示威游行。他们喊着《à bas Ledru- Rollin 》〔“打倒赖德律- 罗兰!”〕的口号涌到市政厅去。这就使人民不得不在3月17日高呼:“赖德律- 罗兰万岁!临时政府万岁!”为了要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他们只得出而保护他们觉得陷于危急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他们没有使临时政府服从于自己,反而巩固了临时政府的地位。3月17日事件以一种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结束了。诚然,巴黎无产阶级在这一天再度显示了自己强大的力量,但这只是加强了资产阶级——在临时政府内部和外面的资产阶级——击破无产阶级的决心。

4月16日事件是临时政府串通资产阶级制造的一个误会。当时在马尔斯广场和跑马场有许多工人举行集会,要讨论国民自卫军总部当前的选举。突然有一种风声飞快传遍巴黎全城各处,说在马尔斯广场上有大群武装工人由路易·勃朗、布朗基、卡贝和拉斯拜尔领导集会,打算从那里进攻市政厅,推翻临时政府,宣布成立共产主义政府。立刻就有人发出总集合警报,——后来赖德律- 罗兰、马拉斯特和拉马丁三人互相争立头功,——于是一小时以后就有10万人荷枪整装以待,所有通向市政厅的道路都被国民自卫军占据了,巴黎全城各处都有人高呼“打倒共产主义者!打倒路易·勃朗、布朗基、拉斯拜尔和卡贝!”无数的代表团跑来向临时政府表示效忠,准备要拯救祖国和社会。最后,当工人们来到市政厅前面,正要把他们在马尔斯广场上募集的爱国捐款献给临时政府的时候,他们才很惊奇地知道,原来资产阶级的巴黎刚才曾在布置极为严密的虚幻斗争中战胜了他们的影子。4月16日的这场可怖的乱子,便成了把军队召回巴黎(整个这出拙劣的喜剧的真正目的原在于比),并在外省各处举行反动的联邦主义的

示威游行的借口。

5月4日，由直接普选产生的国民议会开会了。普选制并没有具备旧派共和党人所寄托于它的那种魔力。旧派共和党人把法兰西全国人民，或至少是把大多数人民看作具有同一利益和同一观点等等的 *citoyens* [公民]。这是他们的一种人民偶像崇拜主义。但是，选举所表明出来的并不是他们的想象中的人民，而是真正的人民，即人民所分裂成的各个不同阶级的分子。我们已经知道，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在选举中为什么表示拥护跃跃欲试的资产阶级和渴望复辟的大土地所有者。然而，普选制虽不如共和党人笨伯所想象的那样具有魔力，但它同时却具有另一种高超无比的长处：它能发动阶级斗争，迫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迅速消除自己的幻想和失望；它一下子就把剥削阶级所有各个集团提到国家高峰，从而揭去他们脸上的骗人的假面具，而具有资格限制的君主制度则只是使资产阶级中的一些集团丧失信用，使其余的集团可能隐藏在幕后并且一律蒙上反对派的光彩。

在5月4日开幕的制宪国民议会中，占有压倒优势的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是“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甚至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起初也只是戴着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假面具才敢出头讲话。当时只有假借共和国名义，才能发动斗争来反对无产阶级。

共和国，即法国人民所承认的共和国开始存在的时期，应该是从5月4日算起，而不是从2月25日算起；这并不是巴黎无产阶级强令临时政府接受的那个共和国，不是设置有社会机构的那个共和国，不是在街垒战士眼前浮现过的那个幻想。国民议会所

从本页到第67页的国民议会都是指由1848年5月4日到1849年5月的制宪国民议会（制宪议会）。——编者注

宣告成立的、唯一合法的共和国，并不是一种反对资产阶级制度的革命武器，反而对资产阶级制度实行的一种政治改造，是重新在政治上加强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改造，——简言之，就是资产阶级共和国。这种论断是从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的，并且在一切共和派资产阶级和反共和派资产阶级报刊中得到了响应。

我们已经看到：二月共和国在事实上不过是，而且也只能是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但是临时政府在不产阶级直接压力下，不得不宣布它是一个设有社会机构的共和国；巴黎无产阶级还只能在主观上、在想象上越出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而当需要行动的时候，则其全部活动都是有利于资产阶级共和国的；许给无产阶级的那些诺言已成了新共和国所不堪忍受的威胁，临时政府在它整个存在的时期都是在不断对无产阶级的要求进行斗争的。

整个法国都通过国民议会对巴黎无产阶级进行审判。国民议会立即与二月革命的一切社会幻想实行了决裂，公然宣布了资产阶级共和国，并且只是资产阶级共和国。它匆忙地从自己所任命的执行委员会中排除了无产阶级的代表——路易·勃朗和阿尔伯；它否决了设立专门的劳动部的提案，并且以暴风雨般的赞许声同意了特雷拉部长所作的声明：“现在的问题只是要劳动回复原有的状态。”

然而还不只如此。二月共和国是工人在资产阶级消极支持下争得的。无产者很正当地认为自己是二月斗争中的胜利者，并提出胜利者的狂傲要求。必须在巷战中战胜这些无产者，一定要叫他们明白，当他们不是联合资产阶级而是对着资产阶级作战的时候，他们是注定要失败的。先前，在建立对社会主义有所让步的二月共和国时，曾经是需要无产阶级联合资产阶级向君主国进行

战斗的；现在，为了要使共和国摆脱它向社会主义作过的让步，为了要正式确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统治，却已需要再来一场战斗了。资产阶级不免要用武器来打消无产阶级的要求。资产阶级共和国的真正摇篮并不是二月胜利，而是六月失败。

无产阶级以自己的行动加速了结局的到来，因为它在5月15日冲入了国民议会，作出了一个徒劳无功的尝试；目的本来是想恢复自己原有的革命威望，结果却只是使自己精干的领袖落到了资产阶级狱吏手中¹⁹。Il faut en finir！此风不可长！这个呼声表明了国民议会要迫使无产阶级进行决战的决心。执行委员会颁布了许多挑衅性的法令，如禁止民众集会等等。从制宪国民议会的讲坛上发出了公开向工人挑衅、侮辱工人和谩骂工人的言论。但是，主要的攻击对象，如我们所看到的，还是国家工厂。制宪议会饬令执行委员会来对付这些国家工厂，而执行委员会本来是只等候国民议会用命令方式批准它自己定出的计划的。

执行委员会开始是多方阻难工人进入国家工厂，把计日工资改成了计件工资，并把一切不是在巴黎生长的工人都赶到索隆，借口说是要调到那里去做土工。这种工程，正如从那里失望归来的工人向自己的同行工友们所说的那样，不过是用以掩饰工人被逐事实的一种好听词令罢了。最后，6月21日，“通报”上登载了一项法令，命令用强力把一切单身工人逐出国家工厂，或是编入军队。

工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若不甘愿饿死，就要展开斗争。他们在6月22日以大规模的起义做了回答——这是现代社会中两大对立阶级间的第一次大交锋。这是为保存或消灭资产阶级制度而进行的战斗。蒙在共和国头上的一层幕布被撕破了。

大家都知道，当时那些没有领袖、没有共同行动计划、没有

经费和多半没有武器的工人，是多么无比勇敢、无比巧妙地扼制了军队、别动队、巴黎城内的国民自卫军以及从外省开来的国民自卫军联合势力，一连坚持了整整 5 天之久。大家都知道，资产阶级为自己所经受的死亡恐怖进行了闻所未闻的残酷报复，残杀了 3000 多名俘虏。

法国民主派的正式代表人物受到共和主义思想影响太深了，以致在六月战斗已经过去几星期的时候，才开始觉察到这次战斗的意义。他们当时简直是被那冲散了他们虚幻的共和国的火药浓烟熏得头昏眼花了。

请读者允许我们从“新莱茵报”中引出一段话来表达六月失败给我们的直接印象：

“二月革命的最后一点正式的残余物——执行委员会——已象幻影一样在严重事变的面前消散了；拉马丁的烟火变成了卡芬雅克的密集的炮火。这就是 *fraternité*，就是一方剥削他方的那些互相对立的阶级之间的博爱，这就是在二月间所昭示的，用大号字母写在巴黎的三角墙上、写在每所监狱上面、写在每所营房上面的 *fraternité* 用真实的、不加粉饰的、平铺直叙的话来说，这种博爱就是内战，就是最可怕的国内战争——劳动与资本间的战争。在 6 月 25 日晚间，当资产阶级的巴黎张灯结彩，而无产阶级的巴黎在燃烧、呻吟、流血的时候，这个博爱便在巴黎所有的窗户前面烧毁了。博爱只有在资产阶级利益还和无产阶级利益结合在一起的时候才继续存在。

学究们拘守 1793 年旧的革命传统；社会主义的空谈家曾为人民向资产阶级乞求施舍，并且被许可做冗长的说教和败坏自己的声誉，直到把无产阶级的狮子催眠入睡为止；共和党人要求全部

旧的资产阶级制度，只是不要戴王冠的首领；王朝反对派从事变中得到的不是内阁的更换，而是王朝的崩溃；正统主义者不是想脱去奴仆的服装，而是仅仅想改变一下式样，——这些人物就是人民在实现自己的二月革命时的同盟者……

二月革命是一个漂亮的革命，是一个得到普遍同情的革命，因为当时激烈反对王权的各种力量之间的矛盾还在尚未充分发展的状态中平静地安睡，因为构成这些矛盾背景的社会斗争还只是一种虚幻的存在，还只是一种词句上和言语上的存在。相反，六月革命则是一个丑恶的讨厌的革命，因为这时行动已经代替了词句，因为这时共和国已经摘掉了保护和掩饰过它的王冠，显露了恶魔的原形。秩序！——这是基佐的战斗口号。秩序！——基佐的信徒塞巴斯提昂尼曾在俄军攻下华沙时这样高喊。秩序！——法国国民议会和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粗野的应声虫卡芬雅克这样高喊。秩序！——他所发射的霰弹在炸裂无产阶级的躯体时这样轰鸣。在1789年以来的许多次法国资产阶级革命中，没有一次曾侵害过秩序。因为所有这些革命都保持了阶级统治和对工人的奴役，保持了资产阶级秩序，尽管这种统治和这种奴役的政治形式时常有所改变。六月革命侵害了这个秩序。六月革命罪该万死！”（1848年6月29日“新莱茵报”）²⁰

六月革命罪该万死！——欧洲各处响应道。

资产阶级逼迫巴黎无产阶级发动了六月起义。单是这一点已注定无产阶级要失败。并不是直接的已被意识到的要求驱使无产阶级去这样企图用武力推翻资产阶级，而且无产阶级也还没有能力解决这个任务。“通报”只得正式向无产阶级声明说，共和国对它的幻想不得不予以尊重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唯有它的失败才使

它认识了这样一条真理：它要在资产阶级共和国范围内稍许改善一下自己的处境都只是一种空想，这种空想在一开始企图实现的时候就会成为罪行。于是，原先无产阶级想要强迫二月共和国予以满足的那些要求，那些形式上过分而实质上琐碎无聊甚至是资产阶级性的要求，就由一个大胆的革命战斗口号取而代之，这个口号就是：推翻资产阶级！工人阶级专政！

无产阶级既将自己的坟墓变成了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摇篮，从而也就迫使资产阶级共和国现了原形：原来它是以前巩固资本统治和劳动奴役为其公认的任务的国家。资产阶级的统治制度既已摆脱了一切桎梏，于是它由于眼前经常站立着一个遍体鳞伤而决不调和与不可战胜的敌人，——其所以不可战胜，是因为它的存在就是资产阶级自身生存的条件，——就不免要立刻变成资产阶级的恐怖政治。在无产阶级暂时被挤出舞台而资产阶级专政已被正式承认之后，资产阶级社会内的各个中等阶层，即小资产阶级和农民，就不免要随着他们境况的恶化以及他们与资产阶级对抗的尖锐化而愈益紧密地靠拢无产阶级。正如他们从前曾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加强一样，现在他们必定要认为他们的灾难是由于无产阶级的失败。

如果说六月起义在大陆各处都加强了资产阶级对于自己处境的认识，并且促使它公开与封建君主制结成了联盟来反对人民，那末究竟谁是这个联盟的第一个牺牲品呢？就是大陆的资产阶级自身。六月失败没有让它能巩固自己的统治，没有让它能使人民在半满意和半失望中停留于资产阶级革命的最低阶段上。

最后，六月失败使欧洲各个强暴国家识破了一个秘密，即法国为了能在国内进行内战，无论如何都必须要与各邻国保持和平。

这种局势就把已经开始争取本身民族独立的各国人民置于俄罗斯、奥地利和普鲁士的摆布之下，但同时这些国家的民族革命的成败也就因此要依无产阶级革命的成败为转移，它们那种表面上不依社会大变革为转移的独立自主性就消失了。当工人还处于奴隶地位时，无论匈牙利人、波兰人或意大利人，都不会获得自由！

最后，神圣同盟的胜利已经使欧洲的形势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根据这些变化可以预料，法国发生的任何一次新的无产阶级起义都必然会引起世界战争。新的法国革命将不免要立刻越出国家范围去夺得欧洲的舞台，因为只有在这个舞台上才能够实现 19 世纪的社会革命。

总之，只有六月失败才造成了所有那些使法国能够担起欧洲革命首倡作用的条件。只有浸过了六月起义者的鲜血之后，三色旗才变成了欧洲革命的旗帜——红旗！

于是我们高呼道：革命死了，革命万岁！

二

1849年6月13日

1848年2月25日使法国获得了共和制，6月25日则强使法国接受了革命。在6月以后，革命意味着推翻资产阶级社会，而在2月以前，它却意味着推翻一种国家形式。

6月的斗争是由资产阶级中的共和派所领导的，胜利自然是把政权变归了他们掌握。戒严状态把手足被缚而无力抵抗的巴黎压倒在他们脚下了，而在外省则到处笼罩着戒严状态的精神气氛、胜利了的资产阶级那种耀武扬威、扬眉吐气的骄横以及农民肆无忌惮的私有狂。这样，在下层方面就没有任何威胁了！

与工人的革命力量被击破的同时，民主主义的共和党人即小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政治影响也被击破了，他们的代表者在执行委员会中是赖德律-洛兰，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山岳党，在新闻界是“改革报”²¹。他们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一起在4月16日进行过反对无产阶级的阴谋，同这些人一起在六月事变时攻打过无产阶级。这样，他们就自己破坏了他们那个党所赖以支持的基础，因为小资产阶级是只有当它背后有无产阶级为其后盾的时候，才能保持自己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阵地。他们被踢开了。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公然破坏了自己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时期勉强地而且是满腹鬼胎地跟他们结成的虚假同盟。作为同盟者已遭到轻蔑遗弃的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墮落到了替三色旗共和党人保镖的地步，

他们不能从三色旗共和党人那里取得任何让步，但是每当三色旗共和党人统治亦即共和国仿佛受到资产阶级中那些反共和集团的威胁时，他们就必定要维护这个统治。最后，这些集团，即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自始就是在制宪国民议会中占少数的。在六月事变以前他们除非戴上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假面具就甚至不敢出面；六月胜利使整个资产阶级的法国都暂时团结到了卡芬雅克周围，认为他是自己的救主，而当反共和党在六月事变后不久又重新独立出现时，军事独裁和巴黎戒严状态只容许它非常畏缩谨慎地伸出自己的触角。

自 1830 年起，资产阶级共和党人集团以其作家、演说家和“天才人物”为代表，以其名位野心家、议员、将军、银行家和律师为代表，集聚在巴黎“国民报”的周围。在外省，“国民报”设立有自己的分馆。“国民报”派是三色旗共和国的王朝。他们立刻就占据了一切国家职位——内阁各部、警察总局和邮政总局的职位，地方行政长官的职位和军队中高级军官的空缺。他们的将军卡芬雅克执掌着行政权力，而他们的总编辑马拉斯特已成为制宪国民议会常任议长了。同时他在接见宾客时，却又象一个司礼官执行着代表“正直的”共和国款待宾客的职责。

甚至那些革命的法国作家，也因怀着一种崇拜共和主义传统的思想而有一种谬见，仿佛在制宪国民议会中是保皇党人占统治地位。恰恰相反，在六月事变之后，制宪议会仍然完全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代表者，并且三色旗共和党人在议会外的影响愈是降低，制宪议会就愈坚决地摆出自己的共和主义气派。当问题在于捍卫资产阶级共和国形式时，制宪议会在自己方面就拥有民主主义共和党人的选票；当问题在于捍卫这个共和国的内容时，那

制宪议会甚至连它讲话的方式也与资产阶级中的保皇集团没有什么区别了，因为构成资产阶级共和国内容的正是资产阶级的利益，正是它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剥削的物质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制宪议会生命和活动并不是体现了保皇主义，而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共和主义，它归根到底不是死去，也不是被杀害了，而是活生生地腐烂掉了。

在制宪议会统治的全部期间，当它在舞台前头给可敬的观众表演的时候，在舞台的深处却进行着一刻不停的牺牲祭——军事法庭不断地对被捕的六月起义者判决治罪，或是不经审判就实行放逐。制宪议会居然老实承认，它把6月的起义者不是当作罪犯审判，而是当作敌人来消灭。

制宪国民议会首先第一步行动就是成立了调查委员会，来调查6月事件和5月15日事件，并调查社会主义党派和民主主义党派的领袖们在这些事件中所参加的活动。调查的直接对象就是路易·勃朗、赖德律-洛兰和科西迪耶尔。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急于要除掉这些敌手。他们再也找不到比王朝反对派过去的首领奥迪隆·巴罗先生更为适当的人选来替他们实行复仇了。这个自由主义的化身，这个 nullité grave（目中无人的小人），这个艰涩的空谈家，不只要为王朝复仇，而且还要和那些把他的内阁首相地位弄掉的革命家算账。当然保险他一定要狠狠地干上一通！正是这个巴罗被任命为调查委员会主席，而他也就制造出了一桩控诉二月革命的十足的诉讼案，这个案件归结为如下各点：3月1日——游行示威，4月16日——阴谋，5月15日——谋害，6月23日——内战！他为什么没有把他这番博学的刑事探究工作引伸到2月24日事件呢？“辩论日报”对此做了回答²²：2月24日事件是一

种罗马开国奠基的事件啊。国家的起源散失在神话世界中，而神话是只许相信，不许讨论的。路易·勃朗和科西迪耶尔被交付法庭审判了。国民议会已完成了它在5月15日开始进行的自身清洗工作。

由临时政府拟定而由古德肖重新提出的对资本课税的方案（通过对抵押征税的形式），被制宪议会否决了；限制工作日为10小时的法律被废止了；重新施行了负债者监禁制度；占法国人口一大部分的文盲被取消了参加陪审的资格。他们的选举权又何尝不可以一并剥夺呢？重新施行了报纸缴纳保证金的制度，结社权受到了限制。

但是，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在他们急忙实行为旧有资产阶级关系恢复其旧有保证，并消除革命浪潮所遗留下的一切痕迹时，却遇到了一个将使他们遭受意外危险的反抗。

在六月事变中，为拯救财产和恢复信用而斗争得最热狂的，莫过于巴黎的小资产阶级——咖啡店和餐馆的主人、marchands de vin（酒商）、小商人、小店主、小手工作坊主等等。小店铺奋然而起，向街垒进攻，以求恢复从街头到店里去的通路。但是，街垒后面站的是小店主们的顾客和债务人，街垒前面站的是他们的债权人。当街垒被击毁，工人被击溃，而小店主们在胜利陶醉中奔回到自己店里去的时候，他们忽然发觉店门已被财产的救主即信用的官方代理人堵住了，他拿着威胁的通知单迎接了他们。期票过期了！房租过期了！债票过期了！小店铺垮了！小店主垮了！

拯救财产！但是，他们所居住的房屋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做生意的店铺不是他们的财产；他们所出卖的商品不是他们的财产。无论是他们的店铺，或是他们吃饭用的盘子，或是他们睡觉用的床

铺,都已不再归他们所有了。拯救这种财产,正是反对他们自己,——是为着那些将房屋租给了他们住的房东,是为着那些给他们期票贴了现的银行家,是为着那些贷给了他们现金的资本家,是为着那些把商品信托给小店主们售卖的工厂主,是为着那些把原料赊卖给小手工作坊主的批发商,而拯救这种财产。恢复信用!但是,恢复了元气的信用已表明出自己是一个活生生和满怀复仇心情的凶神,这首先就表现于它把那无力支付的债务人连同其妻室儿女一起逐出了住屋,把他的虚幻的财产交给了资本,而把他本人则抛进了那在六月起义者尸体上重又赫然耸立起来的债务监狱。

小资产者惊愕地认识到,它把工人击溃之后,就使自己毫无抵抗地陷入它那些债权人的掌握中了。它那从2月起就象慢性病一样地延续着的、仿佛没有被人注意的破产,如今在6月以后已被正式宣布了。

小资产者的名义上的财产,只有在人家需要驱使他们去为拥护财产进行斗争的时候,才不受到人家的侵犯。现在,既已和无产阶级算清大帐,也就可以跟小店主来算小帐了。在巴黎,过期的期票总值在2100万法郎以上,外省则在1100万法郎以上。巴黎有7000多家商店老板,自2月以来就没有缴过房租。

如果说国民议会决定要调查自2月以来的政治犯罪,那末小资产阶级则要求调查2月24日以前的公民债务。大群的小资产者纠集在交易所的大厅里,用威胁口吻申述了自己的要求:每一个商人在他已证明自己只是由于革命引起的不景气才遭到破产,而他的生意情况在2月24日以前曾是良好的时候,就应该由商业法庭准许延长偿付债务的期限,而债权人则必须在偿付少量利息的条件下取消自己的诉讼。这个问题,曾以《concordats à l'

amiable》〔“友好合同”〕法案形式在国民议会中进行讨论。国民议会正在踌躇不决的时候，突然听说有起义者的妻室儿女数千人，在圣丹尼门前准备请愿要求大赦。

小资产阶级看见复活的六月幽灵就战栗了起来，而国民议会就又变得强硬无情了。债权人和债务人的 concordats à l' amiable——友好合同——中最重要的条款遭到了否决。

这样，当国民议会中的资产阶级的共和代表早已把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代表推开之后，这种议会范围内的分裂就获得了资产阶级的现实经济意义：小资产阶级债务人被交给资产阶级债权人去任意摆布了。这些债务人当中有一大部分已完全破产，其余的人则在完全受资本奴役的条件下继续经营自己的业务。1848年8月22日，国民议会否决了 concordats à l' amiable，而1848年9月19日，即在戒严最厉害的时候，路易·波拿巴亲王和在文森监狱囚禁着的共产主义者拉斯拜尔当选为巴黎城的代表。资产阶级则选举了犹太银行家和奥尔良党人富尔德。这样，各方面都同时向制宪国民议会，向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和卡芬雅克公开宣战了。

不言而喻，巴黎小资产者的大批破产不免涉及比直接受害者更多得多的人，因而重又破坏了资产阶级的商品流转，同时六月起义的耗费又更加扩大了国家财政赤字，国家财政收入又因生产停滞、消费和输入缩减而愈益降低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只能靠发行新公债去找出路，而新公债又使他们更加受到金融贵族的束缚。

小资产者从六月胜利中得到的是破产和拍卖，而卡芬雅克部下的鹰犬即别动队得到的则是娼妇们温情的拥抱，以及在马拉斯特这位同时扮演“正直的共和国”东道主和行吟诗人角色的三色

旗武士的沙龙里大家对“年轻的社会救主们”纷纷表示的欢迎。但是，别动队这样受到社会优待、领取过高薪俸，却使军队感到恼怒；同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通过自己的“国民报”用以吸引了一部分军队和农民同情的那些民族幻想，已经尽行消失了。卡芬雅克和国民议会在北意大利扮作仲裁者串通英国把它出卖给奥地利，只这么一天的政绩就把“国民报”派18年来扮演反对派所得的成果化为乌有了。再没有哪一个政府比“国民报”派政府更缺乏民族气质了；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象它这样依赖英国，而“国民报”派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原是每天都靠搬用卡托的 *Carthaginem esse delendam*〔迦太基应被毁灭〕这句话过日子的；再没有哪一个政府象它这样屈从于神圣同盟，而“国民报”是曾要求过基佐那样一个人撕毁维也纳条约的。历史的恶作剧竟使“国民报”的前任外交组编辑员巴斯蒂德当了法国外交部长，使他以自己的每一件公文来驳斥自己的每一篇论文。

军队和农民曾一度相信，军事专政将把对外战争和“荣誉”提到法国的日程上来。可是，卡芬雅克并不体现着用军刀对资产阶级社会实行专政，而是体现着借助军刀实行资产阶级专政。兵士现在只需要当作宪兵用。卡芬雅克板着一副古老共和主义委屈求全的面孔，隐藏着 he 甘心屈从于做资产阶级的官所必须接受的屈辱条件的真相。L'argent n'a pas de maître！金钱无主人！卡芬雅克竟也和制宪议会一样把第三等级的这句老格言理想化了，把它译成了如下的政治语言：资产阶级无国王，资产阶级统治的真正形式是共和国。

制宪国民议会所应该进行的“伟大的根本性工作”就是要拟定出这个形式，要拟定出共和宪法。正如把基督教历改名为共和

历，把圣巴托罗缪节改名为圣罗伯斯比尔节决不会使天气有什么改变一样，制定这个宪法也没有并且也不能使资产阶级社会有什么改变。凡是问题超出了改换服装的范围的地方，这个宪法就把已经存在着的事实记录下来。于是，它郑重其事地登录了共和国成立的事实，施行普选权的事实，由单一全权国民议会代替两个权力有限的立宪议院存在的事实。于是，它就登录了并且法定了卡芬雅克独裁的事实，把永恒的、无责任的、世袭的王权改成了暂时的、有责任的、由选举产生的王权，即改成了任期 4 年的总统制。其次，它把国民议会在受过 5 月 15 日和 6 月 25 日的惊吓后专为保证自身安全而预先赋予议长的那种非常权力，也提高成为根本法了。宪法里其余的东西都是术语问题。从旧君主国的机器上撕掉保皇主义的标签而贴上了共和主义的标签。先前任“国民报”总编辑而现任宪法总编辑的马拉斯特，颇为贤能地完成了这项学院式的任务。

制宪议会好象那个智利官吏，当地下的轰鸣已经预告那必定把他脚下的土地冲走的火山爆发即将到来的时候，还在预备划分地界来更精密地确定地产的范围。制宪议会在理论上从事于制定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主义的精确表现形式，而实际上它却是专靠否定一切公式、使用 sans phrase〔赤裸裸的〕暴力、宣布戒严状态来支持的。它在开始制定宪法的前两天，延长了戒严状态的期限。从前，通常是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已经达到了均势，在新的阶级关系已趋于稳定，统治阶级内部的各个斗争党派彼此已经达到妥协，因而有可能继续相互进行斗争并把疲惫的人民群众排除于斗争范围外的時候，才制定和通过宪法的。这次的宪法却根本不是批准了什么社会革命，而是批准了旧社会对于革命的暂时胜利。

在六月事变以前制定的最初宪法草案中，还提到了《droit au travail》——劳动权，还提到了这个初次概括无产阶级各种革命要求的笨拙公式。现在这个公式却已转化为 droit à l'assistance——享受社会慈善救济权，——但试问有哪一个现代国家不是这样或那样饲养着自己的乞丐呢？劳动权在资产阶级的意义上说乃是一种胡说，乃是一种可怜的善良愿望，其实劳动权是表示控制资本，而控制资本又表示占有生产资料，使其受联合的工人阶级支配，从而消灭雇佣劳动、资本及其相互间的关系。“劳动权”是以六月起义为后盾的。制宪议会既然已在事实上把革命无产阶级置于 hors la loi——法律之外，也就不免要在原则上把它的公式从宪法——法律的法律——中删去，把“劳动权”当作邪说来加以诅咒。但制宪议会还不就此罢休。正如柏拉图把诗人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一样，制宪议会把累进所得税永远逐出了自己的共和国。实则这种税不仅是在现存生产关系范围内或多或少可行的一种百分之百的资产阶级措施，并且还是唯一能使资产阶级社会各中等阶层依附于“正直的”共和国，减少国家债务并打退资产阶级中反共产主义多数攻击的手段。

在 concordats à l'amiable [友好合同] 问题上，三色旗共和党人实际上是为迎合大资产阶级而牺牲了小资产阶级。他们既用立法方式禁止了累进所得税，就是把上面这一个别事实提高成为一个原则。他们把资产阶级改革跟无产阶级革命同等看待。既然如此，到底还有哪个阶级留作为他们共和国的支柱呢？大资产阶级。但是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是反对共和的。如果说他们利用了“国民报”方面的共和党人来重新巩固旧经济关系，那末，在另一方面，他们曾打算利用旧社会关系巩固的机会来恢复那些与其相

适应的政治形式。在 10 月初，卡芬雅克就已不得不任命路易-菲力浦时代的大臣杜弗尔和维维延做共和国的部长，尽管他自己党内愚蠢的清教徒们拚命叫喊表示反对。

三色旗宪法既已拒绝对小资产阶级作任何妥协，既没能吸引任何新的社会成分来归附新的国家形式，同时又匆忙恢复了最顽强和最狂热拥护旧制度的那个集团历来享受的不可侵犯权。它把临时政府险些侵犯到的法官终身制提高成为根本法了。于是，它所推翻了的一个国王，就化身为这种终身制的法制刑讯官而成千倍地复活起来了。

法国报刊全面地揭示了马拉斯特先生宪法中所包含的矛盾，如两个主权者——国民议会和总统——同时并存等等。

但是，这个宪法的主要矛盾是在于下面这点：它所要使其社会奴役地位永恒化的那些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竟由它经过普选权给予了政治权力，而它所批准其旧有社会权利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却又被它剥夺了维持这种权力的政治保证。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被宪法强塞在民主主义的框子里，而这个框子时时刻刻都在帮助资产阶级的敌人取得胜利，并使资产阶级社会的基础本身成为问题。它向一方面要求不要从政治的解放前进到社会的解放，而向另一方面则要求不要从社会的复辟后退到政治的复辟。

资产阶级的共和党人是不大理会这些矛盾的。既然他们已经不是必要的人物，——他们只有作为旧社会反对革命无产阶级斗争中的先锋队才是必要的人物，——所以，他们在胜利后几个星期就不再是一个政党，而降为一个派系了。宪法在他们手中是一个大阴谋。宪法首先应该确定他们那个派系的统治。总统应该仍

由卡芬雅克充任。立法议会应该是制宪议会的继续。他们打算把人民群众的政治权力弄成一种虚构。他们甚至指望能很容易地利用虚构来经常恐吓资产阶级中的多数，使其从六月事变时期的两条道路中选定一条：或者是“国民报”派的天下，或者是无政府状态的天下。

9月4日开始的制宪工作已于10月23日结束了。在9月2日，制宪议会决定在未颁布补充宪法的所谓必要的补充法律以前不宣布解散。然而它却决定早在12月10日，即在它自己的生命活动尚未终结很久之前，就已要使它自己的产儿即总统出现于人世。它确信宪法产生出来的一定会称得起是母亲的儿子。为了慎重起见，当时决定如果候选人中没有一人获得200万选票，则总统选举权就由国民转归制宪议会行使。

真是无益的谨慎！宪法实施的第一天就是制宪议会统治的最后一天。在投票箱里面放的原来是制宪议会的死刑判决书。它寻找“母亲的儿子”，但它所找到的却竟是“伯父的侄儿”。扫罗-卡芬雅克获得了一百万选票，而大卫-拿破仑却获得了六百万选票，胜过了扫罗-卡芬雅克5倍²³。

1848年12月10日是农民起义的日子。只是从这一天起，才开始了法国农民方面的二月革命。这种表示他们投入革命运动的象征反映出笨拙的狡猾，反映出奸诈的天真，反映出矫揉造作的高尚，是一种深思熟虑的迷信，是一种令人伤心的滑稽剧，是一种荒诞绝顶的颠倒时代现象，是世界历史中的玩笑，是文明头脑难以了解的象形文字，——这一象征显然带有代表着文明内部野蛮风气的那个阶级的印记。共和国以一个收税人的姿态向这个阶级表明了自己的存在，而这个阶级则以一个皇帝的姿态向共和国表明了

自己的存在。拿破仑是充分表现了 1789 年新形成的农民阶级的利益和幻想的唯一人物。农民阶级把他的名字写在共和国的门面上，宣布要对外国进行战争，在国内要为自己的阶级利益进行斗争。拿破仑在农民眼中不是一个人物，而是一个纲领。他们举着旗帜，奏着音乐走到投票箱跟前去，高呼：《Plus d'impôts, à bas les riches, à bas la république, vive l'Empereur》——“打倒捐税，打倒富人，打倒共和国，皇帝万岁！”。隐藏在皇帝背后的是一个农民战争。由他们投票推翻的共和国是一个富人共和国。

12 月 10 日发生的事变是农民推翻现存政府的 coup d'état [政变]。自从他们把法国的一个政府取消而给它创出了另一个政府的那一天起，他们的视线就经常注向于巴黎了。他们曾在一瞬间扮演了革命剧中的登场人物，此后就再也不能强迫他们充当合唱队的无所作为的消极角色了。

其余各阶级帮助完成了农民阶级的选举胜利。对无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就意味着撤换卡芬雅克和制宪议会的倒台，意味着取消资产阶级共和主义，意味着推翻六月胜利。对小资产阶级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债务人统治债权人。对于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选举拿破仑意味着公开和他们曾不得不暂时利用来对付革命的那个集团实行决裂，这个集团想要在宪法中把暂时的东西固定起来而使他们马上就感到不能容忍。拿破仑代替卡芬雅克，这对大资产阶级中的多数说来是君主国代替共和国，是王朝复辟的开端，是向奥尔良公爵方面羞怯点头示意，是隐藏在紫罗兰当中的百合花²⁴。最后，军队投票选举拿破仑，就是投票反对别动队，反对和平牧歌而拥护战争。

这样，正如“新莱茵报”所说的，法国一个最平庸的人获得

了最多方面的意义²⁵。正因为他没有任何意义，所以他能表明一切，——只是不表明他自己。虽然拿破仑的名字在各个不同阶级的口中具有极不同的意义，但是所有各个阶级都在自己的选票上连同这个名字写出如下的口号：“打倒‘国民报’派，打倒卡芬雅克，打倒制宪议会，打倒资产阶级共和国！”杜弗尔部长曾在制宪议会中公开声明了这一点：“12月10日乃是第二个2月24日。”

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en bloc〔共同〕投票拥护拿破仑，是为了表示反对卡芬雅克，并反对为了把全部选票都集中于一个候选人身上而使制宪议会没有可能最后决定问题。可是，这两个阶级的最先进部分却提出了自己的候选人。拿破仑是联合反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切党派的普通名称，赖德律-洛兰和拉斯拜尔则是专有名称——前者是民主小资产阶级的专有名称，后者是革命无产阶级的专有名称。无产者及其社会主义领袖高呼投拉斯拜尔一票。而投拉斯拜尔的票只是带有示威的性质；这是表示反对任何总统制，即反对宪法本身的一种群众抗议；同时这又是投票反对赖德律-洛兰；这是表明无产阶级作为一个独立党派脱离民主主义党派而分立的第一次行动。相反，后一党派，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及其在议会中的代表者——山岳党，对赖德律-洛兰的候选是象它惯常庄严地愚弄自己那样十分认真的。不过，这是它要想与无产阶级对峙而作为独立党派出现的最后一次企图。不仅共和主义资产阶级的政党，而且还有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及其山岳党，都在12月10日被击败了。

“平庸的”：德文是 einfältig，本来含义是“单重的”，转义为“平庸的”。“多方面的”：德文是 vielfältig，本来含义是“多重的”，转义为“多方面的”。——编者注

法国现在除了有一个山岳党之外，还有一个拿破仑——这就证明前后两者都不过是他们在名义上所代表的那些伟大现实现象的毫无生气的讽刺图象罢了。正如带着蛊惑家姿态和借用着 1798 年辞句的山岳党，是对于旧山岳党的一种拙劣的模仿一样，打着皇帝鹰旗和戴着三角帽的路易-拿破仑，也是对于老拿破仑的一种拙劣的模仿。这样，迷信 1793 年的传统和迷信拿破仑的传统同时都归于结束了。革命只有在它取得了自己专有的、独特的名称时，才现出了自己本来的面目，而这点又只有在新的革命阶级即工业无产阶级已经庄严地出现在革命前台时，才成了可能的事情。可以说，12 月 10 日事件之所以使山岳党觉得出乎意料和感到惊惶失措，至少是因为农民粗野的玩笑打破了对旧革命作经典式比拟的迷梦。

12 月 20 日，卡芬雅克宣布辞职，制宪议会就宣告路易-拿破仑为共和国总统。12 月 19 日，即在自己专制统治的最后一日，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案。它若把自己不经审讯而判处 15000 个起义者流放的 6 月 27 日法令宣布取消，岂不就是表示自己根本否定六月屠杀吗？

路易-菲力浦的最后一个首相奥迪隆·巴罗，成了路易-拿破仑的第一个总理。正如路易-拿破仑认为自己的统治不是始自 12 月 10 日，而是始自 1804 年的上议院决议一样，他给自己找到的内阁总理，也认为自己的总理职务不是始自 12 月 10 日，而是始自 2 月 24 日的敕令。作为路易-菲力浦的合法继承人，路易-拿破仑保留下旧的内阁以缓和政府的变动，况且这个旧内阁因为还没有来得及出现于人世，所以还没有来得及被用坏。

他选择的这个办法是资产阶级各保皇派的领袖们提示给他

的。这位旧日王朝反对派的首领曾无意识地充当了转向“国民报”派共和党人的过渡桥梁，现在他完全有意识地充当从资产阶级共和国转向君主国的过渡桥梁，当然是更为合适的了。

奥迪隆·巴罗乃是那个唯一因从未争到首相位置而不及丢尽脸面的旧反对党的领袖。革命很迅速地把所有各个旧反对党相继推上国家高峰，好象就是为了让它们不只在行为上，而且在言论上都不得不放弃或否认自己旧日的辞句，使它们终究被人民当作一团可恶废物尽行抛弃到历史的垃圾堆里去。巴罗，这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化身，18年来一贯以外表的显赫来掩盖自己内心的卑劣和空虚，简直是极尽变节之能事。虽然他有时也因现今的荆棘与过去的月桂之间过分尖锐的对照而感到惊恐，但他只要往镜中一望，——就又重新恢复了他那种作为一个总理所具有的自持力和作为一个人所具有的自负心理。在他前面镜子里容光焕发的是基佐，——就是那个向来都令他羡慕和经常都把他当作小学生轻蔑看待的基佐，——简直就是基佐本人，但是却生着奥迪隆的奥林匹克式前额。他只是没有发觉到自己身上的一件东西——迈达斯的耳朵²⁶。

2月24日的巴罗，只是通过12月20日的巴罗才表露出来；他原是一个奥尔良党人兼伏尔泰主义者，而正统主义者兼耶稣会教徒的法卢又作为信仰部部长跟他联成一气了。

几天之后，内政部就交给马尔萨斯主义者莱昂·福适掌握了。法学、宗教、政治经济学！在巴罗的内阁里，这一切样样俱全，此外它还把正统主义者与奥尔良党人结合在一起了。所缺少的只是一个波拿巴主义者。波拿巴还隐藏着自己想要扮演拿破仑的意图，因为苏路克还没有扮演杜山-路维杜尔²⁷。

“国民报”派立刻被革除了它所已占据的一切高级职位。警察总局、邮政总局、总检察署、巴黎市政局——这一切都落到了旧日的君主制走卒的手中去了。正统主义者尚加尔涅一身兼掌了塞纳省国民自卫军、别动队以及正规军第一师团指挥大权；奥尔良党人毕若被任命为阿尔卑斯军司令。这种官职上的更迭，在巴罗内阁时期，总是连续不断地发生。巴罗内阁的第一件事情，便是恢复旧日保皇主义行政机构。顷刻间，官方的舞台——布景、服装、台词、演员、配角、哑角、提词员、演员部位、戏剧动力、冲突本质和整个局面——全都变样了。不过那过了时的制宪议会，仍然留在原来的位置上。但是自从国民议会任命波拿巴，波拿巴任命巴罗，巴罗任命尚加尔涅之后，法国就从共和国建立时期进入到共和国已经建成的时期了。而在一个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这个制宪议会又有什么用呢？在大地已创立成功之后，它的创造者除了逃到天上去，就别无他事可作了。制宪议会决心不去仿效他的榜样，国民议会是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最后一个避难所。如果说它已被夺去了行政权力的一切杠杆，那末它手中不是还留有立宪大权吗？它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无论如何都要保持自己的主权岗位，并借着这个岗位去夺回失去的阵地。只要一推翻巴罗内阁而代之以“国民报”派的内阁，则保皇派的官吏就得立即退出一切官厅，而三色旗的人物就将得胜回朝了。国民议会决定要推翻内阁，而内阁自己就给予了国民议会一个方便得简直是它连想象也想象不出来的施行攻击的绝妙机会。

我们记得，在农民的眼目中，路易·波拿巴是意味着打倒捐税！可是，他在总统椅子上还只坐了6天，在第七天的时候，即在12月27日，他的内阁就提议把临时政府已下令取消的盐税保存下去。盐税和酒税分享着充当法国旧财政制度替罪羊的特权，特

别在农民的眼中是如此。巴罗内阁对于农民所选中的这个人，再不能教他一句比“恢复盐税！”更为尖刻辛辣的话来嘲弄其选民了。随着盐税的恢复，波拿巴就丧失了自己身上的那点革命味道，——农民起义的拿破仑就象一个模糊的幻影一样消散了，所剩下的只是一个体现着保皇主义资产阶级阴谋的令人莫测的形影。而巴罗内阁把这一公然打破幻想的横蛮步骤作为总统施政的第一步，却是不无用意的。

制宪议会也就很高兴地抓住了这个一箭双雕的机会——既能够借以推翻内阁，又能够借以扮成保护农民利益的角色去攻击农民所选中的那个人。它否决了财政部长的提案，把盐税减少为原来数额的 $\frac{1}{3}$ ，从而使5亿6000万的国家财政赤字又增加了6000万，而在通过了这个不信任案之后，就来静待内阁的辞职。你看它对于它自己周围的新事物以及它自己已经改变的地位，该是多么不了解啊。内阁背后有总统，而总统背后又有600万选民，每一个选民都往票箱中投进了对制宪议会的不信任票。制宪议会把国民的不信任票退还给国民。真是一种可笑的交换！制宪议会公然忘记了它的不信任票已经失去强制性的行价。它否决盐税只是加强了波拿巴及其内阁要把它“干掉”的决心。从此就开始了贯穿着制宪议会整个后半段生存时间的长期决斗。1月29日事件、3月21日事件、5月8日事件是这个危机时期的 *journées* [巨大事件]，是6月13日事件的先兆。

法国人——例如路易·勃朗——把1月29日事件看成是国民议会与总统在宪法上的矛盾的表现：一面是具有主权、不许解散、由普选权产生的国民议会，另一方面是只在纸上对国民议会负责而实则也象国民议会一样由普遍投票批准的总统；并且总统

一身集中了百倍分散地分配于国民议会各个议员身上的全部选票；况且总统掌握有全部行政权力，而国民议会则只是作为一种道义力量飘荡于行政权力之上。对于 1 月 29 日事件的这种解释，是把在议会中、报刊上、俱乐部里表现的斗争语言形式同斗争的真实内容混同了。路易·波拿巴和制宪国民议会根本不是代表着同一个宪制权力中彼此对立的两个方面。波拿巴并不是一个跟立法权力对立的行政权力。波拿巴乃是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这个共和国和自己借以建立起来的那些工具相对抗，和资产阶级中革命派的名利为怀的奸计和思想上的要求相对抗，这一派人建立了共和国，现在却因发觉自己所建立的共和国完全象一个复辟的君主国而感到惊异，于是就想把立宪时期连同它那些特殊条件、幻想、语言和人物勉强延长下去，不让那个已经成熟了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以其最终完成的和典型的姿态出现。正如制宪国民议会是代表着滚回到它中间去了的卡芬雅克一样，波拿巴代表了还没有脱离他的立法国民议会，即代表了已经成立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国民议会。

波拿巴当选一事，只有当一个名字所包含的各种不同的意义已经表露的时候，只有当这个事实已在新国民议会选举中重演了一次的时候，才能得到解释。旧国民议会的代表权，已于 12 月 10 日被宣告废止了。这样，在 1 月 29 日发生冲突的，就不是同一个共和国里的总统和国民议会，而是一方为尚在建立中的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另一方为已经建成了的共和国的总统，即体现共和国生命过程中两个全然不同时期的两个权力。一个阵营里是个不大的共和主义资产阶级集团，——唯有它才能宣布共和国成立，用巷战和恐怖手段从革命无产阶级手里夺去共和国，并在宪法中定

出这个共和国的各种理想式的特征；另一个阵营里则是资产阶级中的全部保皇主义大众，——唯有它才能在这个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实行统治，剥去宪法的那套思想上的服饰，并利用自己的立法机关和行政机关来真正实现为奴役无产阶级所必需的各种条件。

1月29日发生的暴风雨，是在整整一个月后中酝酿建来的。制宪议会想通过对巴罗内阁投不信任票来迫使它宣布辞职。但巴罗内阁却为回报这点而提议制宪议会自己对自己表示最终的不信任，判处自己以自杀死刑，宣布自己自动解散。一个极无声望的议员拉托，在内阁指使下于1月6日把这个提案提交了制宪议会，提交了这早在8月间就已决议在它尚未制定许多补充宪法的必要的补充法律前决不自行解散的制宪议会。拥护内阁的富尔德向制宪议会率直地声明说，解散制宪议会是“为恢复陷于动摇的信用”所必需的。的确，制宪议会一味拖长临时状态，硬要弹劾巴罗而使波拿巴跟着成为问题，弹劾波拿巴而使业已建成的共和国跟着成为问题，岂不就是破坏信用吗？奥林匹克式的巴罗立刻就变成了狂怒的奥兰多，因为他已感觉到了人家又要把他终于弄到手了的内阁总理位置夺去，连两个星期的总理老爷福也不会让他享足，这个位置是共和党人已经一度迫使他等待了整整一个“德村尼姆”即一连10个月之久的啊。于是巴罗就比暴君还要残暴地来对待这个可怜的议会了。他嘴里最柔和的话是：“它是根本没有前途的。”而它此时确实也只是代表着过去了。巴罗又讽刺地补充说：“它不能在共和国周围确立什么为巩固共和国所必需的设施。”确实如此！随着议会对无产阶级的极度敌视态度受到挫折，它的资产阶级精神也受到了挫折，而随着它对保皇党的敌视态度重新

复活，它的共和主义热情也重新复活。所以，它就加倍地不能以适当的设施来巩固它所再不能理解的那个资产阶级共和国了。

依靠拉托的提议，内阁在全国各地掀起了请愿的大风暴；每天从法国各处往制宪议会头上飞来的一束一束的 *billets-doux* [情书]，都或多或少断然地请求它解散自己，并立下自己的遗嘱。制宪议会则掀起了反请愿运动，其中表示请求它继续存在下去。拿破仑与卡芬雅克之间的竞选斗争，就以表示赞成或表示反对国民议会解散的请愿斗争形态复活了。请愿是对 12 月 10 日事件的补充注释。这种鼓动在 1 月里继续进行了整整一个月。

制宪议会在它与总统发生的冲突中，不能借口说它是普选权的产儿，因为敌人正是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它的。它不能依靠任何合法权力，因为问题是在于反对法定权力。它不能如它早在 1 月 6 日和 26 日试图过的那样用表示不信任的方法来推翻内阁，因为内阁并不需要它来表示信任。它所剩下的唯一出路就是起义。当时构成起义战斗力量的是国民自卫军共和派部分、别动队以及革命无产阶级各中心机关——俱乐部。六月事变的英雄别动队在 12 月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也好象在六月事件以前国家工厂是革命无产阶级的有组织的战斗力量一样。正如先前制宪议会执行委员会一经决定要把无产阶级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要求结束，就粗暴地攻击了国家工厂一样，波拿巴的内阁一经决定要把资产阶级共和派那些已使它不堪忍受的要求结束时，就来向别动队进行攻击。它下令解散别动队。其中有一半被解职和抛到了街头上，另一半则被重新改组，由民主制的组织改成了君主制的组织，而薪饷则减低到正规军的普通薪饷水平。别动队陷入了六月起义者的地位，于是报纸上每天都刊载有别动队的公开悔过声明，表

示承认自己在 6 月间犯的罪过,并恳求无产阶级宽恕。

而俱乐部呢?自从制宪议会通过对巴罗的不信任而表示不信任总统,通过对总统的不信任而表示不信任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通过对这个共和国的不信任而表示不信任一般资产阶级共和国时起,在议会的周围就必然地团结了二月共和国中的所有一切制宪分子,所有一切想要推翻现存共和国和用强力手段把它回复到原有状态,想要把它变为表现他们自己阶级利益和原则的共和国的党派。凡已发生的一切,都好象没有发生过一样;凡从革命运动中所结晶出的一切,又都重新消溶了;斗争又是为着各个党派各有其不同理解的含糊的二月共和国而重新开始了。转瞬之间,各个党派重又采取了它们旧有的二月时期的立场,不过没有抱着二月时期的幻想。“国民报”方面的三色旗共和党人又来依靠“改革报”方面的民主主义共和党人,推出他们来做议会斗争前台上的急先锋。民主主义共和党人又来依靠社会主义共和党人(1月27日发表的公开宣言已宣告了他们的调解和团结),并在俱乐部里准备着发动起义的基础。内阁的报刊把“国民报”方面的三色旗共和党人看作复活的六月起义者,原是不差的。他们为要保持自己在资产阶级共和国中的主脑地位,就设法使资产阶级共和国本身成为问题。在1月26日,部长福适提出了关于结社权的法案,其中第一条就是“禁止俱乐部”。他提议把这个法案当作刻不容缓的法案立即进行讨论。制宪议会否决了关于所谓刻不容缓性的问题,而1月27日赖德律-洛兰就提出了一项由230个议员署名的法案,其内容是说内阁因犯违反宪法罪应交付法庭审判。其实,提议把内阁交付法庭审判不是意味着泄露审判官即议会多数的无能,就是意味着控告人对这个多数本身的一个软弱无力的抗

议，而就在这样的時候却偏偏要这样做，——这就是后辈山岳党此后在每次危机关头打出的那张伟大的革命王牌。可怜的山岳党已被自己名称的重负压碎了！

布朗基、巴尔贝斯、拉斯拜尔等人曾于5月15日率领巴黎无产阶级冲入制宪议会的会场，企图把它解散。巴罗准备对同一个议会在道义上把5月15日事件重演一遍，想强令它自行解散，并封闭它的会场。同是这个议会还曾委托巴罗对五月事件的罪犯进行审讯；而现在，当巴罗已在对制宪议会扮演着保皇党的布朗基角色，而制宪议会已在跑往俱乐部去，想从革命无产阶级方面，从布朗基党方面找同盟者来反对巴罗的时候，残酷无情的巴罗就提议把五月囚犯从陪审法庭方面转变他们“国民报”派所设计的 *haute cour* [最高法院]，来和制宪议会为难了。值得注意的是，怕失去内阁位置的恐惧心意从我们巴罗的脑袋中挤出了堪与博马舍的机智相比的机智珍珠。国民议会经过长期的踌躇后接受了他的提议。国民议会在对待五月起义者的问题上，又回复了它的正常性质了。

如果说制宪议会在与总统和内阁的斗争中不得不上起义的道路，那末总统和内阁在与制宪议会的斗争中则不得不上政变的道路，因为他们在法律上没有任何可能把制宪议会解散。但是，制宪议会是宪法之母，而宪法又是总统之母。总统举行政变就会取消宪法，因而也就会消灭自己的共和主义的法律基础。那时他就只有拿出皇帝的权利，而皇帝的权利又要唤起奥尔良王室的权力，但这两种权利都是比之正统王朝的权利相形见绌的。合法共和国的颠复，只能使它那个对极物即正统王朝重新得势，因为这时奥尔良党人还只是二月事件中的失败者，而波拿巴只是12月10日事件中的胜利者，双方所能用以对抗共和派的篡夺行为的，

都只是自己那种从君主国方面同样用篡夺手段得来的权利。正统主义者知道情况对他们有利，就来公开进行阴谋活动。他们能盼望尚加尔涅将军来做他们的蒙克²⁸。正如在无产者俱乐部里公开宣告过红色共和国的到来一样，在他们的俱乐部里也公开宣告了白色君主国的到来。

只要有一次被顺利镇压下去的起义，就可使内阁免除一切困难了。“合法性会害死我们！”——奥迪隆·巴罗这样叫喊道。起义就使人可能借口挽救 *salut public* [社会治安] 来解散制宪议会，借口拯救宪法本身来破坏宪法。奥迪隆·巴罗在国民议会粗暴的发言，建议封闭俱乐部，公然撤销 50 个三色旗行政长官职务而代之以保皇党人，解散别动队，尚加尔涅凌辱别动队长官，在基佐政府时代就已为人所不容的列米尼耶教授被恢复职位，正统主义者的狂妄行为受到宽容——凡此一切都是为了要挑动起义。但起义势力总是默不做声。它所等候的是来自制宪议会的信号，不是来自内阁的信号。

最后，1月29日来到了，在这一天要讨论马蒂约·德·拉·德罗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正统主义者、奥尔良党人、波拿巴党人、别动队、山岳党、各俱乐部——大家都在这一天进行阴谋活动，既阴谋反对自己假想的敌人，又阴谋反对自己假想的同盟者。波拿巴骑着马在和谐广场检阅一部分军队，尚加尔涅装模作样地举行有声有色的战略演习，制宪议会发现自己的会场已被军队包围了。作为交错起来的一切希望、疑惧、期待、酝酿、紧张、阴谋汇集中心的制宪议会，猛如雄狮，在这个对它空前严重的世界历史关头，一刻也没有犹豫。它的举动好象是一个战士居然不只害怕动用自己的武器，而且还觉得自己应该保全敌

人的武器。它以视死如归的气概签署了自己宣告自己死刑的判决书，否决了关于无条件否决拉托提案的提案。它自己已处于戒严状态之下，于是就把自己的立宪活动以巴黎戒严状态作为必要界限而加以限制。次日它就决定对内阁在 1 月 29 日所加于它的恐怖进行调查，而它的这种报复办法是和它相称的。山岳党暴露了自己缺乏革命斗志和政治见识，居然让“国民报”派利用它来做这出阴谋大喜剧中的宣告人。“国民报”派作了最后一次企图，想要在已经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保持它曾在共和国产生时期拥有过的那种垄断政权的地位。它遭到了失败。

1 月危机时的问题是在于制宪议会的存亡，而 3 月 21 日危机时的问题则是在于宪法的存亡；前一场合是关系到“国民报”派的人员，后一场合则是关系到这个派的理想。不言而喻，“正直的”共和党人是把他们超然物外的思想出卖得要比世俗政权的占有权便宜些的。

3 月 21 日，在国民议会的日程上是福适所提出的反对结社权的法案：查封俱乐部。宪法第 8 条保证一切法国人有结社权。因此，禁止俱乐部就是公然破坏宪法，而制宪议会却不免要亲手批准对自己的这个圣物的亵渎。然而须知俱乐部是革命无产阶级的集合地点，是它的秘密活动场所。国民议会本身是禁止工人们联合起来反对自己的资产者的。而俱乐部不是整个工人阶级联合起来反对整个资产阶级，又是什么呢？不是组织独特工人国家去对抗资产阶级国家，又是什么呢？难道这不是无产阶级的制宪议会和起义军备战部队吗？宪法首先是要确立资产阶级统治；因此，宪法所说的结社权显然只是指容许那些能与资产阶级统治，即与资产阶级制度共处的社团存在。如果说宪法为了理论上的体面运用

了笼统的公式，那末难道没有政府和国民议会来解释并在具体场合运用这个公式吗？而且，如果说在共和国原始时期，俱乐部实际上已因戒严状态而被禁止了，那末难道在已经整顿好的、已经建成的共和国里，就不能依法加以禁止吗？三色旗的共和党人所能用来反对这样平淡解释宪法的，不过是宪法上的堂皇辞令罢了。他们中间有一部分人，如巴涅尔、杜克累尔等等，投票拥护了内阁，从而使它获得了多数。另一部分人，则以天使头目卡芬雅克和教会之父马拉斯特为首，在关于禁止俱乐部的条文通过之后，就与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一同退到一个委员会的房子里去“开了一个会”。国民议会瘫痪了，它已没有为通过决议所必需的法定票数。这时克莱米约先生在委员会的房子里及时地提起，从这里出去的道路直接通到街头，并且现在已不是1848年2月，而是1849年3月了。“国民报”派恍然大悟，就回到了国民议会的会场，随着是再度受欺的山岳党也回去了。山岳党经常为革命的念头所苦恼，但它同样又经常寻求合乎宪法的结局；所以它总是觉得站在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后面比站在革命无产阶级前面更为自在。这出喜剧就这样收场了。制宪议会自己通过决定，认为违背宪法条文是对宪法意义的唯一正确的解释。

还有一点需要解决，这就是已经建成的共和国对欧洲革命的态度，即它的对外政策。1849年5月8日，在行将寿终正寝的制宪议会里充满了异常愤慨的气氛。日程上所列的问题是法军进攻罗马，法军被罗马人击退，法军在政治上受到耻辱和在军事上遭到失败，法兰西共和国对罗马共和国进行了背信弃义的谋害，第二个波拿巴首次出征意大利。山岳党再一次打出了自己的主要王牌：赖德律-洛兰照例在主席桌上放了一份控告内阁——这一次

并且是对波拿巴——违反宪法的控诉书。

5月8日动议的理由，后来又在6月13日动议中重述了一遍。我们来看看这次出征罗马是怎么一回事吧。

卡芬雅克早在1848年11月中旬就派遣了一队军舰到契维塔未克基亚，去保护教皇，把他接到船上并载往法国。教皇得去为“正直的”共和国祝福，并保证卡芬雅克当选为总统。卡芬雅克想要连同教皇把神甫勾上，连同神甫把农民勾上，而连同农民又把总统位置勾上。卡芬雅克的远征按其直接的目的说来虽是一个选举广告，同时却是对罗马革命的抗议和威胁。这里面包含有法国为保护教皇而进行干涉的苗头。

这次为保护教皇和反对罗马共和国而协同奥地利和那不勒斯一起进行的干涉，是于12月23日在波拿巴内阁第一次会议上决定的。法卢坐在内阁里，这就是意味着教皇坐在罗马，并且是坐在教皇的罗马里。波拿巴不再需要教皇来帮助他成为农民的总统，但他需要保持教皇权力来为自己保持农民的拥护。农民的轻信使他当了总统。他们一失去信仰，就会失去轻信态度，而他们一失去教皇，就会失去信仰。至于那些借波拿巴的名字来实现统治的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那末须知在恢复国王之前，必须先恢复那使国王神圣化的权力。问题不仅在于他们的保皇主义思想，——若没有受教皇世俗权力支配的旧罗马，就没有教皇；若没有教皇，就没有天主教；若没有天主教，就没有法国宗教；而若没有宗教，那末旧的法国社会又会成为什么样子呢？农民所享有的对于天国幸福的抵押权，保证着资产者对于农民土地的抵押权。因此，罗马革命，也如六月革命一样，是对于所有权，对于资产阶级制度的可怕的侵犯。在法国恢复了的资产阶级统治，要

求在罗马恢复教皇权力。最后，打击罗马革命者，就是打击法国革命者的同盟军；已建成的法兰西共和国内各反革命阶级间的联盟，是自然要以法兰西共和国与神圣同盟结成的联盟，即与那不勒斯和奥地利结成的联盟来作补充的。内阁会议12月23日的决定，对制宪议会来说并不是什么秘密。1月8日赖德律-洛兰已就此事向内阁提出了质问，内阁当即表示否认，于是国民议会就转而进行下面的事项了。国民议会是否相信了内阁的话呢？我们知道，在整个1月里，它总是忙于对内阁投不信任票的。但是，如果说扯谎已是内阁分内的事情，那末假装相信这种拯救共和国体面的谎言，就已是国民议会分内的事情了。

这时，皮蒙特被攻破了，查理·阿尔伯特宣告退位了，奥地利军队叩着法国的大门，赖德律-洛兰提出了激烈的质问。但是内阁已证明了，它在北意大利只是继续了卡芬雅克的政策，而卡芬雅克只是继续了临时政府即赖德律-洛兰的政策。这一次，它甚至获得了国民议会的信任票，并且被授予全权在北意大利暂时占领适当地点，以作为与奥地利进行关于撒丁领土不可分割问题和罗马问题的和平谈判的后盾。大家知道，意大利的命运是由北意大利战场上的会战来决定的。所以，必须是或者让罗马随着伦巴第和皮蒙特一并陷落下去，或者是法国向奥地利，亦即向欧洲反革命势力宣战。难道国民议会忽然把巴罗内阁当作旧日的公安委员会了吗？或是把自己当作国民公会了吗？如果这样的话，那末法国军队又为什么要在北意大利占领某一个地点呢？原来在这层透明的面纱下掩藏着的是对罗马的远征。

4月14日，14000名士兵由乌迪诺率领乘船往契维塔未克基亚出发；4月16日，国民议会通过决议给内阁拨发12万法郎的军

费，以便使它能把地中海上准备随时用以进行干涉的舰队驻留 3 个月之久。这样，国民议会就授给了内阁为干涉罗马所必需的一切手段，同时却装着是在迫使内阁去反对奥地利。它没有看见内阁所作的事，只是听见内阁所说的话。这样的信仰，甚至在以色列也是找不到的。制宪议会陷入了不敢过问已建成的共和国应作什么事情的地位了。

最后，在 5 月 8 日，喜剧的最后一场演出了。制宪议会要求内阁立即采取措施，使远征意大利的进军恢复其原定的目的。波拿巴当晚就在“通报”上刊载了一封信，对乌迪诺表示最崇高的谢意。5 月 11 日，国民议会否决了正是弹劾这个波拿巴及其阁员们的控诉书。而山岳党没有去撕碎这个骗局，却把议会的喜剧弄成了一个悲剧，以便自己能在这里扮演富吉耶-丹维尔的角色，但也不过是在租来的国民公会狮子皮底下暴露出自己身上那张小资产阶级的牛犊皮罢了！

制宪议会后半期的生命史，可以概括如下：1 月 29 日，它承认资产阶级各保皇集团是它所建成的共和国中的当然主人；3 月 21 日，它承认违背宪法是实现宪法；在 5 月 11 日，它又承认堂皇宣布的法兰西共和国与争取自身解放的欧洲各族人民结成的消极联盟等于法兰西共和国与欧洲反革命势力结成的积极联盟。

在退出舞台之前，这个可怜的议会在自己诞生一周年即 5 月 4 日前两日，还称心满意地否决了大赦六月起义者的提议哩。制宪议会既已丧失了自己的全部权力，既已为人民所切齿痛恨，既已为那曾利用它做工具的资产阶级所粗暴地推开和轻蔑地抛弃掉，既已被迫在自己的后半生表示否认自己的前半生，既已失去了自己共和主义的幻想，过去没有做出大事而将来又没有什么希望，只

是在活活地一点点地腐烂下去，所以它就只知勉强复活自己的尸体，经常召唤着六月胜利的魂灵，重温着六月的胜利，再三判处着已被判处的人们，这样来使自己能确信自己还存在于人世。真是专靠六月起义者的血为生的吸血鬼啊！

它遗下了以前的国家财政赤字，并且这种赤字更因六月事变的费用、盐税的取消、为废除黑人奴役制度而给予种植场主的偿金、远征罗马的费用以及酒税的取消而增大了；酒税这一项是制宪议会临终时才取消了的，它活象一个幸灾乐祸的老人，乐于给自己幸福的继承者硬加上一个令人身败名裂的债务。

3月初开始了立法国民议会的选举运动。有两大集团互相敌对：一是秩序党，一是民主社会主义党或红党；站立在这两大集团中间的是所谓“宪法之友”，——“国民报”派的三色旗共和党人企图在这个名称下弄成一个特别的党。秩序党是在六月事变后立即成立的，但是只有在12月10日以后，当它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即与“国民报”派决裂的时候，它存在的秘密才暴露了：它是奥尔良党人与正统主义者所联合组成的一个党派。资产阶级分裂成为两大派，一是大地主，一是金融贵族和工业资产阶级，这两大派曾先后独占政权，前者在复辟时期独占过政权，后者在七月王朝时期独占过政权。波旁乃是代表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名称；奥尔良乃是代表另一个集团的利益占优势的王室名称；只有在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同时又不停止其相互间的竞争。如果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高级纯粹的统治形式，那末，它不是以正统主义者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主义者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

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国民报”派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并不是他们阶级中具有经济基础的什么大集团的代表。他们的作用与历史任务只是在于：在君主制时期，他们与各自只知道自己的特殊政治制度的两个资产阶级集团相反，而提出了资产阶级的共同政治制度，即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将它加以理想化，并饰以古代的阿拉伯式花纹，但首先当然是把它当作自己朋党的统治来欢迎的。“国民报”派看见自己所创立的共和国顶峰上站立着联合的保皇党人时感到莫名其妙，而联合的保皇党人则同样对于自己共同统治的事实感到莫名其妙。他们不了解，如果他们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一派分开来看是保皇主义的，那末他们的化学结合的产物却就必然是共和主义的了；他们不了解，白色王朝与蓝色王朝一定要在三色旗的共和国里互相中和起来。秩序党的两个集团既与革命无产阶级以及那些日益倾向于作为自己中心的革命无产阶级的过渡阶级相对抗，就不得不发动自己的全部联合力量并保全这个联合力量的组织；每个集团都不免要为反对另一集团的复辟独霸意图而提出共同的统治，即提出资产阶级统治的共和形式。于是我们就看到，这些保皇党人起初还相信能立刻实行复辟，尔后又咬牙切齿地同意保存共和国形式，最后却竟承认他们只有在共和国中才能和睦相处，并把复辟无限期地延搁了。共同统治自然使这两个集团中的每个集团都加强建来，使每个集团都越发不能和不愿服从另一集团，即越发不能和不愿恢复君主制。

秩序党在自己的选举纲领中公开地宣布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即保全这阶级统治的生存条件：财产、家庭、宗教、秩序！当然它是把资产阶级的阶级统治以及这阶级统治的条件描绘为文明的统治，描绘为物质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周转关系的必要条件。秩

秩序党拥有巨额的资金,它在法国各地都成立有支部,它以薪资豢养旧制度的一切思想家,它享有现存政府权力的全部威势,它拥有散布于全部小资产者和农民大众中不领薪的臣仆军队,这些小资产者和农民还远离着革命运动,把大财主看作是天然保护他们那种小财产和小偏见的人物。秩序党在全国有不可胜数的小国王为其代表,能够把一切拒绝选举其候选人的人当作暴动者来惩罚,能够解雇叛乱的工人、不顺从的雇农、仆役、听差、铁路官吏、司书、一切在公民生活上受它支配的职员。最后,秩序党在某些地方竟能维持住这样一种欺人之谈,即仿佛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阻碍了12月10日的当选者波拿巴施展其神奇的力量。我们在谈秩序党时没有提及波拿巴党人。他们并不是资产阶级中的一个重要的集团,而只是一团迷信的老弱残废和无信仰的青年冒险家的混合体。秩序党在选举中获得了胜利,往立法议会送进了绝大多数的议员。

在联合的反革命资产阶级面前,小资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中一切已经革命化的成分,自然必定要与革命利益的主要代表者,即与革命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我们已看到,议会里的小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代表,即山岳党,曾如何由于议会中的失败而去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代表结成联盟,而议会外的真正的小资产阶级曾如何由于 *concordats à l' amiable*〔友好合同〕被否决,由于人家蛮横坚持资产阶级利益以及由于破产而去与真正的无产者接近。1月27日,山岳党与社会主义者庆祝了相互间的和解;而在1849年的2月大宴会上它们又确认了这种联合行动。社会党与民主党,工人的党与小资产者的党,就结合成了社会民主党,即结成了红党。

法兰西共和国一度因紧跟六月事变而来的绝望挣扎陷入了麻木状态,从撤销戒严状态时起,即从10月19日起,又接连不断地

经历了一连串寒热病似的颤抖。最初是争夺总统位置的斗争 ;接着是总统与制宪议会的斗争 ;因俱乐部而引起的斗争 ;布尔热的审判案²⁹ ,在这次审判案当中 ,与总统、联合的保皇党人、“正直的”共和党人、民主主义的山岳党人及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等渺小人物对比起来 ,无产阶级的真正革命家就显得好象是些只能由世界大洪水遗留于社会表面的 ,或者是只能先于社会大洪水而存在的原始的庞然大物 ;选举鼓动 ;对布莱阿的刺杀者之处决³⁰ ;接连不断的对报刊的控告 ;政府对于宴会运动所施行的暴力的警察干涉 ;保皇党人的蛮横挑衅 ;路易·勃朗与科西迪耶尔的肖象被悬在耻辱柱上 ;制宪议会与已建成的共和国之间的不断斗争 ,这斗争每回都驱使革命回到自己最初的出发点上去 ,每回都使胜利者变为失败者 ,失败者变为胜利者 ,并且顷刻间就改变各党派和各阶级的地位、它们的决裂和结合 ;欧洲反革命的迅速前进 ;匈牙利人民的光荣斗争 ;德国各处的起义 ;远征罗马 ;法军在罗马城门前的可耻失败——在这运动漩涡中 ,在这历史的动荡痛苦的进程中 ,在这革命的热情、希望和失望的惊心动魄的起落中 ,法国社会的各个阶级对于从前以半世纪为单位来计算自己的发展时期 ,却必须以星期为单位来计算了。有很大一部分农民和许多省份已经革命化了。因为一则他们已对拿破仑感到失望 ,再则红党答应给予他们的不是名称 ,而是内容 ,不是空幻免除租税 ,而是收回已付给正统主义者的 10 亿法郎、调整抵押贷款和消灭高利贷。

甚至军队也感染了革命的寒热症。军队投票拥护波拿巴 ,原是表示拥护胜利 ,但波拿巴却给军队带来了失败。军队投他的票 ,原是投票拥护一个小士官 ,本以为他是一个伟大的革命统帅 ,而他却还给了军队许多高傲的将军 ,实则他自己竟还是一个平凡的

士官。无庸争辩，红党，即联合的民主党，纵然得不到胜利，也必定会获得巨大的成就：巴黎、军队和大多数的省份，都必定要投票拥护红党。山岳党的领袖赖德律-洛兰在5个省内当选了，秩序党的领袖没有一人得到这样的胜利，真正无产者的党中的候选人也没有谁得到这样的胜利。这次选举结果给我们揭示了民主社会主义党的秘密。一方面，山岳党这个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在议会里的先锋，不得不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空论家联合，而在6月遭受了沉重的物质失败的无产阶级，不得不在精神胜利方面去寻求达到新高涨的途径；既然其余各个阶级的发展程度还不许可无产阶级夺取革命专政，它就不免要投到无产阶级解放的空论家的怀抱中去，即投到那些社会主义流派的创始人的怀抱中去。另一方面，革命的农民、军队和外省都站到了山岳党方面。这样，山岳党就成了联合革命力量的指挥官，而它与社会主义者的协议就消除了革命阵营内部的任何分裂。在制宪议会生存的后半期中，山岳党体现了制宪议会的共和主义的热情，而使人忘记了它在临时政府、执行委员会和六月事变时期的罪孽。在“国民报”派全能时代被撵出了舞台的山岳党，现在随着“国民报”派因态度不彻底而听受保皇党内阁压制的程度而抬起头来，并且获得了议会中的革命代表者的作用。的确，“国民报”派能拿出来与其他各派即保皇主义各派相对立的，除了沽名钓誉的人物和唯心的空谈之外，是什么也没有的。而山岳党则代表着摇摆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群众，他们的物质利益要求着民主的机构。与卡芬雅克和马拉斯特相比，赖德律-洛兰和山岳党是站在真正革命的立场上，而由于革命斗志的表现只是限于进行议会性的攻击、草拟控诉书、提出威吓、高声喊叫、发表雷鸣似的演说和提出不外是些辞令的

极端措施,所以这种重要角色的意识就使他们变得更为勇敢了。农民所处的地位与小资产阶级大致相同,他们的社会要求也大致一样。所以,社会的一切中间阶层既然被卷入革命运动,就必定要把赖德律-洛兰视为他们的英雄。赖德律-洛兰是民主主义小资产阶级的主要人物。与秩序党的斗争,必定首先把这种秩序的半保守、半革命和全然空想的改良家提到第一位来。

“国民报”派,“*quand même*〔坚决〕的宪法之友”,*républicains purs et simples*〔纯粹的共和党人〕,在选举中被击得一败涂地。他们只有极少数选进了立法议会;他们的最著名的领袖,连马拉斯特这个总编辑,这位“正直的”共和国之奥菲士也包括在内,都退出了舞台。

5月28日³¹立法议会开幕,6月11日,5月8日的冲突重又恢复。赖德律-洛兰代表山岳党提出了弹劾总统和内阁的违反宪法炮击罗马的控诉书。6月12日,立法议会否决了这个控诉书,正如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它一样,但是这次无产阶级迫使山岳党走上了街头——固然并不是去打巷战,而是去游行。只要指出这次运动是以山岳党为首的,就足以知道这次运动要被镇压下去,而1849年6月不过是1848年6月的既可笑又拙劣的滑稽模仿罢了。6月13日的伟大退却,只是由于被秩序党封为伟人的尚加尔涅提出了还要更伟大的战斗报告警,才显得逊色了。如爱尔兰维修所说的那样,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要有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12月20日,只存在有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的一半,即只

奥菲士是希腊神话中的诗人和歌唱家。——译者注

存在有总统。5月28日，补全了另一半，即立法议会。在建立中的资产阶级共和国，是由1848年6月反对无产阶级的空前搏斗载入了历史生辰簿上的；在1849年6月，已建成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又由它与小资产阶级所演出的难以形容的滑稽剧载入了这个生辰簿。1849年6月是对1848年6月实行报复的尼密吉达。在1849年6月，并不是工人被打败，而是站在工人与革命之间的小资产者遭到了毁灭。1849年6月，并不是雇佣劳动与资本间表演着的流血悲剧，而是债务人与债权人所表演的一出包藏有牢狱之灾的可怜的戏剧。秩序党获胜了，它已大权独揽，——现在，不免要显示出它的本质了。

三

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

12月20日，立宪共和国的雅努斯式的头还只显示出它的一副面孔，即行政权力的一面，带有路易·波拿巴的模糊的平淡线条。1849年5月28日，它已显示出它的另一面，即立法权力的一面，盖满了由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的狂欢酒宴所留下的许多伤痕。立法国民议会的诞生完成了立宪共和国的建立，即建成了一个共和制的国家形式，在这个国家形式中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亦即确立了构成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保皇主义集团的统治，联合起来的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的共同统治，秩序党的统治。这样，法兰西共和国就成了保皇党同盟所有的财产，同时欧洲反革命列强同盟又向三月革命的最后避难所举行了全面的十字军讨伐。俄国侵入了匈牙利，普鲁士军队向维护帝国宪法的军队进攻，而乌迪诺则炮轰罗马。欧洲危机显然已在接近决定性的转折点，全欧洲的目光都注向巴黎，而全巴黎的目光则都注向立法议会。

6月11日，赖德律-洛兰登上立法议会的讲坛。他没有发表演说，他只提出了弹劾内阁部长们的控诉书，赤裸裸的、毫无掩饰的、完全基于事实的、扼要的、沉重的控诉书。

进犯罗马就是进犯宪法，进犯罗马共和国就是进犯法兰西共

雅努斯是古代罗马的门神，它有前后两副面孔。因此，人们总以他来比喻两面派的人物。——译者注

和国。宪法第 V 条³²说：“法兰西共和国永不使用武力去反对任何民族的自由”，而总统却在使用法国军队去反对罗马自由。宪法第 54 条规定行政权力未得国民议会同意不得宣布任何战争。制宪议会 5 月 8 日通过决议，断然命令内阁尽速使罗马远征恢复它最初的目的，可见它同样是断然地禁止对罗马进行战争，而乌迪诺却在炮轰罗马。这样，赖德律-洛兰就是叫宪法本身来做他控诉波拿巴及其内阁部长们的证人。他代表宪法向国民议会的保皇主义多数派当面发出了威胁的声明：“共和党人定能采取一切手段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即使要诉诸武力也是在所不惜的！”山岳党以百倍的声音跟着喊道：“诉诸武力！”多数原则报以可怖的喧嚷声；国民议会议长要赖德律-洛兰遵守秩序；赖德律-洛兰重复了自己挑战性的声明，最后在议长桌上放下了一件要求将波拿巴或其内阁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的提案。国民议会以 361 票对 203 票的多数就炮轰罗马问题通过的决议，不过是转而进行下一项议程罢了。

难道赖德律-洛兰希望借助宪法来击败国民议会，而借助国民议会来击败总统吗？

诚然，宪法是根本禁止侵犯他国人民自由的，但是，据内阁所说，法军在罗马所进犯的不是“自由”，而是“无政府势力的专横”。难道山岳党有自己在制宪议会中的全部经验而仍然不懂得，宪法的解释权不是属于宪法制定人，而只是属于宪法接受者吗？仍然不懂得，对于宪法条文是应该就其切合实际的意义去解释，而资产阶级的意义就是其唯一切合实际的意义吗？仍然不懂得，波拿巴和国民议会保皇主义多数派是宪法的真正解释者，正如教士是圣经的

从这里起到本文结束止，国民议会一词是指从 1849 年 5 月 28 日起至 1851 年 12 月止的立法国民议会（立法议会）。——编者注

真正解释者,而法官是法律的真正解释者一样吗?当制宪议会在世时,象奥迪隆·巴罗这种人就曾破坏过它的意志,难道新由普选产生出来的国民议会还必须认为自己是受已故的制宪议会的遗言所束缚的吗?赖德律-洛兰在援引制宪议会5月8日决议时,难道竟已忘记就是这个制宪议会在5月11日否决了他第一次要把波拿巴及其部长们交付法庭审判的提案吗?竟已忘记这个制宪议会业已宣告总统及其内阁部长们无罪,从而业已承认炮击罗马是“合乎宪法的”吗?竟已忘记他在本质上只是对一个业已宣告的判决提起上诉,并且是由共和主义的制宪议会去向保皇主义的立法议会上诉吗?宪法在一项特别条文中号召每一个公民来保护它,因而它本身就是求助于起义的。赖德律-洛兰正是依据着这一项条文。但是,在另一方面,难道国家的各个权力机构不是为保护宪法而建立的吗,难道违反宪法的行为不是只有在国家的一个宪制权力起来反对另一个宪制权力的时候才会有的吗?而当时共和国的总统,共和国的部长们和共和国的国民议会却是协调一致的。

山岳党在6月11日所企图发动的,是“纯粹理性范围内的起义”,即纯粹是议会范围内的起义。它指望被民众武装起义的远景所吓坏的国民议会多数派去消灭波拿巴及其部长们,因而消灭他们自己的权力及他们自己当选的意义。难道制宪议会顽强要求罢免巴罗—法卢内阁时,不是已经企图用类似手段推翻波拿巴当选的事实吗?

难道在国民公会时代不是有过由议会里的起义突然使多数派与少数派对比关系发生根本转变的实例吗,——那末为什么前一代的山岳党能做的事情,后一代的山岳党就不能做呢?——况且当前的局势看来也是有利于这种举动的。民情的激愤,在巴黎已

达到使人惶惶不安的程度；军队照其在选举时的投票看来，并不是拥护政府的；立法议会的多数派还太年轻，未及牢固组织起来，而且它是由老年人所组成的。如果山岳党把议会里的起义搞成功了，国家的权柄就会直接落到它的手中去。至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它热烈渴望的，照例是莫过于斗争在它头上的云端里发生，在议员们的阴影之间发生。最后，民主主义的小资产阶级以及它的代表者——山岳党是想借议会里的起义达到自己的伟大的目的：把资产阶级的势力粉碎，同时却不让无产阶级有行动自由，或只是让它在远景中出现；把无产阶级拿来利用，但是不让它成为危险的东西。

在6月11日国民议会进行投票之后，山岳党的若干党员和秘密工人团体的代表们举行了一次会谈。后者极力主张当天晚上就发动起义。山岳党断然拒绝了这一个计划。它无论如何不肯丢掉运动的领导权；它对待盟友是与对待敌人一样疑心多端的，而它在这方面原是对的。1848年6月的记忆，从未这样强烈地激动过巴黎无产阶级的行列。然而无产阶级是受它与山岳党联盟的束缚的。山岳党在议会中代表着大部分的省，它夸大了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它握有国民自卫军内的民主主义部分，最后它又有小商店的道义上的支持。在这个时候，违反山岳党意志发动起义，对于无产阶级说来——况且无产阶级的行列又因受霍乱瘟疫和迫使大批无产者离开巴黎的失业影响而变得松懈了——就是徒然重演1848年的六月事件，但却是在已没有当时那种推动无产阶级进行拚命斗争的情势下重演这事件。工人代表们采取了唯一合理的办法。他们责成山岳党败坏它自己的声誉，即迫使它在它的控诉书被国民议会否决时超出议会斗争的范围。在6月13日整天内，无产阶级一

直保持着这种怀疑、注视的态度，等待民主主义的国民自卫军与军队之间开始严重坚决的搏斗，以便在那时投入斗争，把革命推向前进，使革命超出强加于它的那些小资产阶级的目的。如果一旦胜利，无产阶级的公社则已经成立好了，这公社必定要与正式的政府并行地活动。巴黎的工人已接受了 1848 年 6 月的流血教训。

6 月 12 日，部长拉克罗斯自己向立法议会提出了立即开始讨论控诉书的动议。政府在当夜采取了准备防御和进攻的一切措施；国民议会的多数决心要把反叛的少数逼上街头，少数本身也已经无法退却了，非应战不可了；控诉书以 377 票对 8 票被否决了；拒绝投票的山岳党，气愤地跑到了“爱好和平的民主派”的宣传厅里，跑到了“和平民主日报”³³的编辑部里。

山岳党一退出议会会场就丧失了力量，也如巨人安泰一脱离自己的母亲即大地，就丧失了力量一样。山岳党人在立法议会会场内是参孙，而在“爱好和平的民主派”厅堂里就成了普通的庸人。掀起了冗长、嘈杂而空洞的论争。山岳党满怀决心不惜采取任何手段要迫使人们尊重宪法，“只是不诉诸武力”。山岳党的这个决定，得到了“宪法之友”的一个宣言³⁴和一个代表团的赞助。“宪法之友”是“国民报”派即资产阶级共和党的残余所自命的称号。它残留在议会中的代表者，虽有 6 人投票反对否决控诉书，而其余的人全都投票赞成否决控诉书；卡芬雅克虽把他的军刀供秩序党御用，但是这一派在议会外的极大部分，却如饥似渴地抓住这个机会以求摆脱其政治贱民地位，并挤入民主政党的行列。的确，他们岂不正是这个以他们的盾牌，以他们的原则，以宪法为

参孙是圣经里的神话英雄，据说有非凡的力量。——译者注

护身符的民主政党的自然持盾者吗？

直到天明之前，“山岳党”一直在分娩的苦痛中。它产下了一个“告人民的宣言”，于6月13日早晨在两家社会主义报纸³⁵的不显眼的角落里刊登了出来。这个宣言宣布总统、各部部长、立法议会多数派“处于宪法之外”(hors la Constitution)，并号召国民自卫军和军队，最后还号召人民“起来反抗”。“宪法万岁！”就是它的口号，即无非是表示要“打倒革命！”的口号。

与山岳党的宪制宣言相呼应的，是6月13日小资者所举行的一次所谓和平示威游行。这是从沙托-得奥出发沿着林荫路行进的列队游行；3万人中大部分是不带武器的国民自卫军，其中夹杂有秘密工人团体的成员，他们沿着林荫路高呼：“宪法万岁！”。游行者们在喊这个口号时的呼声是机械的，冷漠的，不是由衷的，这些呼喊声并没有扩大成为轰隆的雷声，反而在群集于人行道上的民众中遭到了嘲讽的反应。唱歌的声音很多，但没有发自胸腔的声调。当游行队伍走到“宪法之友”的会场所在的楼房前面时，在那楼房的三角墙上出现了一个雇佣的宪法使者，竭力挥动他那戏院捧场者的帽子，挣破他那巨大无比的肺，向朝拜者们头上冰雹般地撒出“宪法万岁！”的叫声，——这时，似乎游行者自己刹那间也感觉到了这个场面实在滑稽可笑。大家都知道，尚加尔涅的龙骑兵和来福枪兵在和平路和林荫路的拐角上为游行者准备了怎样一种全非议会式的接待；游行者怎样顷刻间就向四面奔散，只是在奔跑中稀稀疏疏地发出“拿起武器！”的喊声，以执行6月11日议会中发出的起义号召。

和平游行行列被强力驱散，隐约传闻有赤手空拳的公民在林荫路上被杀害，街道上愈来愈慌乱，当这一切似乎都在预告起义

即将来临的时候,集合在阿扎尔街上的山岳党人大部分就逃散了。赖德律-洛兰带领着一小群议员,拯救了山岳党的名誉。他们在占据了国民宫的巴黎炮兵队的保护下,跑到艺术及手工博物馆去,等候国民自卫军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来援救。但是山岳党人徒然等候了第五军团和第六军团;这些慎重的自卫军让自己的代表者去听天由命,巴黎炮兵队本身还阻扰民众建筑街垒,极端的混乱使得不可能做出任何决定,正规部队端着上好刺刀的枪向前逼进,一部分议员被逮捕了,另一部分则逃跑了。6月13日事件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说1848年的6月23日是革命无产阶级起义的日子,那末1849年的6月13日就是民主主义小资产者起义的日子,这两次起义中的每一次,都是发动起义的那个阶级的典型的纯粹的表现。

只有在里昂城内,事变才发展成了顽强的流血的冲突。在这里,工业资产阶级与工业无产阶级直接对立起来,工人运动不象在巴黎那样被约束在普遍运动范围内,没有被它所决定;所以,6月13日事件在这里的反映就丧失了它原来的性质。在其余各处对6月13日事件发生过反响的外省地方,这个事件并没有燃烧起来,不过是表现为一道冷清清的闪电罢了。

6月13日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一期,立宪共和国是在1849年5月28日随着立法议会的开幕而开始其正常生存的。这整个序幕充满着秩序党与山岳党之间,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之间的喧嚣的斗争;小资产阶级徒然反抗了这个共和国的确立,而为了这个资产阶级共和国它自己曾在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不断进行过阴谋,曾在六月事变中拚命攻击过无产阶级。6月13日这天摧毁了它的反抗,而把联合保皇党人的立法独裁弄成了既成

的事实。从此时起，国民议会就单只是秩序党的公安委员会了。

巴黎置总统、部长们和国民议会多数派于“被告地位”，后者则置巴黎于“戒严状态”。山岳党宣布立法议会多数派“处于宪法之外”；而多数派则以违反宪法罪名把山岳党交付最高法院审判，并使这个党内仍有生命力的一切都受到剥夺公权的惩罚。山岳党只剩下了一个无头无心的躯干。少数派只是企图举行议会里的起义，多数派则把自己的议会专制提升为法律。这个多数派发布了新的议会规章，借以消灭讲坛上的言论自由，并授权国民议会议长用各种惩戒手段，如提出谴责、科以罚金、停发薪金、暂时逐出会场、逮捕等手段，来惩罚议员违反规则的行为。这个多数派在山岳党的躯干上悬挂的不是什么刀剑，而是一根鞭子。残留下来的山岳党议员，为保全名誉计，本应示威式地卸去代表职任。这样行动就会加速秩序党的解体。秩序党在甚至再没有一种对抗的影子来促使它团结的时候，就必定会分裂成它原来的构成部分了。

当小资产阶级已被夺去议会力量时，它的武装力量也一并被夺去了；巴黎炮兵队以及国民自卫军第八、第九和第十二军团都被解散了。相反，金融贵族的军团在6月13日袭击了布列和卢乌的印刷厂，毁坏了印刷机，捣毁了共和派报刊编辑处，非法逮捕了它们的编辑、排字工人、印刷工人、收发员和递送员之后，却得到了国民议会讲坛方面的奖励。在法国全国各处，凡是有共和主义嫌疑的国民自卫军，都同样被解散了。

新的出版法，新的结社法，新的戒严法，巴黎各处监狱关满囚犯，政治流亡者被驱逐出境，一切超出“国民报”限度的报纸概被封禁，里昂及其邻近5个省被迫服从军人的粗暴专横的统治，检察机关到处实行监视，早已清洗过许多次的大群官吏重受清洗

——这都是反动派获胜时必不可免和经常重复的惯用办法，其所以在六月大屠杀和六月放逐后还值得提起，只是因为这次它们并不单是用来对付巴黎，而且也用来对付各省，不单是用来对付无产阶级，而且首先是用来对付中等阶级。

国民议会在6月、7月和8月间的全部立法活动，都充满着各种镇压法律，这些法律授予了政府以宣布戒严的权利，更紧地勒住了报刊的喉头，并消灭了结社权。

可是，这一时期的特点不是事实上利用胜利，而是原则上利用胜利；不是国民议会通过各种决议，而是为这些决议确定理由，不是行动，而是词句，甚至与其说是词句，还不如说是使词句生动起来的音调和姿势。保皇主义信念公然肆无忌惮地表露出来，对共和国施以贵族式的轻蔑侮辱，娇媚而轻浮地道出复辟这一目的，一句话，大言不惭地破坏共和主义礼貌，这便是使这一时期具有其特殊音调和印记的风气。“宪法万岁！”——是6月13日的失败者所喊的战斗口号。因此胜利者也就不必虚伪地讲究什么宪制即共和主义的言词。反革命已战胜了匈牙利、意大利和德意志，所以他们已经看到复辟是在叩着法国的大门了。秩序党各派领袖之间发生了十足的竞争；他们争先恐后地力图在“通报”上以书面证明他们的保皇主义立场，坦白他们在君主制时期所犯的某些自由主义过失而表示悔悟，恳求上帝与人们宽恕。每天都总有人在国民议会讲坛上宣布二月革命是社会的灾难，每天都总有一个正统主义者的外省地主庄严地宣称他从未承认过共和国，每天都总有一个背弃和出卖了七月王朝的懦夫追述其英雄勋业，说只有路易-菲力浦的仁政或其他的误会才妨碍了这种英雄勋业的实现。结果，好象在二月事变中值得惊叹的，并不是获得胜利的民众表

现了宽仁态度，倒是保皇党人表现自我牺牲与温和态度而让民众战胜了他们。有一位人民的代表提议把二月事变负伤人员抚恤金发一部分给市近卫军，因为他们是二月事变时唯一有功于祖国的。另一位代表提议在卡卢塞尔广场建立奥尔良公爵骑象。梯也尔称宪法为一片脏纸。在讲坛上有奥尔良党人相继发言，表示后悔他们曾阴谋反对正统王朝；同时又有正统主义者相继发言，表示责备自己，说他们对非正统王朝的反抗加速了一般君主国的倾复。梯也尔后悔他曾阴谋反对摩莱，摩莱后悔他曾阴谋反对基佐，巴罗则后悔他曾阴谋反对他们3人。“社会民主共和国万岁！”被宣布为违反宪法的口号；“共和国万岁！”则被视为社会民主主义的口号来加以迫害。在滑铁卢战役的周年纪念日，有一个议员宣称：“我对于普鲁士侵入法国，没有象对于革命流亡者进入法国那样害怕。”为了回答因在里昂及其邻近诸省造成的恐怖而发出的怨言，巴拉盖·狄利埃说道：“我宁愿要白色恐怖而不愿要红色恐怖”（《J' aime mieux la terreur blanche que la terreur rouge》）。每当从国民议会上的发言者说出反对共和国、反对革命、反对宪法、拥护君主国、拥护神圣同盟的警句时，全场都报以狂热的掌声。甚至当最微小的共和仪式套语——例如以《Citoyens》〔“公民”〕一语称呼议员——受到违背时，也都使秩序的骑士们欢欣鼓舞。

7月8日在戒严状态影响下以及在无产阶级一大部分拒绝投票情况下举行的巴黎补缺选举，法国军队占领罗马，红衣主教进入罗马³⁶，以及随之而至的异端审判和僧侣恐怖，——这一切都使六月胜利又添上新的胜利，使秩序党陶醉更甚了。

最后，在8月中旬，保皇党人宣布国民议会休会两个月，这部分地是为了要出席那些刚刚召集的各省议会，部分地是由于他

们已为好几个月来的保皇主义狂妄累得疲劳过度了。他们以公然恶作剧的风度留下了一个由 25 位议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国民议会的代理人，作为共和国的守卫者，其中包括有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的一些精粹，如摩莱与尚加尔涅。但是这种恶作剧的意味却比他们意料中的还要深长些。他们原已被历史判定要去促使他们所心爱的君主国恢复，同时却又被历史注定要去维护他们所憎恶的共和国。

随着立法议会的休会，结束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二期，即其保皇主义的狂暴嚣张时期。

巴黎的戒严状态重又撤销，报刊重又恢复了。在社会民主主义报纸停刊的时候，在实行镇压措施与保皇主义嚣张的时期中，立宪君主派小资产阶级的老旧的文坛代表“世纪报”³⁷，转向于共和主义；资产阶级改革派的老旧的机关报“新闻报”³⁸，转向于民主主义，而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老旧的典型机关报“国民报”，则转向于社会主义。

公开的俱乐部越来越不可能存在，秘密团体就随之愈益普遍增多和加强起来了。被视为纯粹商业团体而容许存在并且没有任何经济意义的工人生产协会，在政治方面对无产阶级起了纽带的作用。6月13日已把各种半革命党派的正式上层拆去，然而留下的群众却生长出了他们自己的头脑。秩序的骑士们以预言红色共和国的恐怖来吓唬人，但是反革命在匈牙利、在巴登和在罗马获胜后所干出的卑鄙兽行和极端恐怖，却已把“红色共和国”洗成白色了。而法国社会的不满的中间阶级，开始觉得与其接受实际上完全无望的红色君主国的恐怖，还不如接受其恐怖还成问题的红色共和国的诺言。在法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者比海璠对革命

宣传做了更多的供献。A chaque capacité selon ses oeuvres !〔每个天才均按其所行而定！〕

这时，路易·波拿巴利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到外省去作隆重的巡游，最热忱的正统主义者跑到爱姆斯去参拜圣路易的后裔³⁹，而秩序党的大批议员则在刚召开的各省议会中着手进行阴谋。务必要使各省议会说出国民议会多数派还不敢说出的话，务必要使他们要求立刻修改宪法。依据宪法，只有在1852年专门为修改宪法而召集的国民议会上才可以进行这种修改。但是，如果大多数省议会主张修改宪法的话，难道法国的呼声还会不能迫使国民议会牺牲宪法的贞洁吗？国民议会所期望于这些省议会的，正如在伏尔泰的“亨利亚特”中尼姑们所期望于叛乱兵的一样。但是，除了少数例外，国民议会的彭提弗里在外省碰到了为数并不少的约瑟夫。绝大多数人都不愿理解这种烦恼的开导。宪法的修改，被应该用来实现修改宪法的工具即各省议会的表决所阻碍了。法国，并且是资产阶级的法国，已经发表了意见，发表了反对修改宪法的意见。

在10月初，立法国民议会重新复会——*tantum mutatus ab illo* !〔但它是多么不同了啊！〕它的面貌已经全然改变了。各省议会出人意料地否决了修改宪法，这就使国民议会回到了宪法的界限内，并且给它提示了它生存的界限。奥尔良党人因正统主义者往爱姆斯巡礼而产生疑心，正统主义者则因奥尔良党人跟伦敦⁴⁰来往而惶惶不安，两派双方的报纸都煽旺了火焰，衡量了各自的王位僭望者们相互间的企求。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一致怨恨

马克思在这里戏弄圣西门主义者的著名公式。——编者注
味吉尔“亚尼雅士之歌”。——编者注

波拿巴派的阴谋，这些阴谋表现于总统的隆重巡游，表现于他那多少露骨的企图摆脱宪法束缚的行为，以及波拿巴派报纸的傲慢论调；路易·波拿巴则怨恨国民议会只承认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有权进行秘密活动，并怨恨内阁经常为维护这个国民议会而背叛他。最后，内阁本身在对罗马的政策上，以及在由阁员帕西提议的而为保守派骂作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得税上发生了分裂。

巴罗内阁向重新召开的立宪议会所提出的第一批议案之一，就是要求拨发 30 万法郎给奥尔良公爵夫人作为寡妇年金。国民议会同意了这个要求，又在法国负债簿上增添了 700 万法郎的数目。这样，路易·菲利浦就继续成功地扮演着《pauvre honteux》——羞怯乞丐——角色，而内阁却不敢向议会提议增加波拿巴的薪俸，议会看来也不愿意允许这种增加，于是路易·波拿巴又照例要二中取一：Aut Caesar, aut Clichy！〔不做凯撒，就进债狱！〕

内阁第二次要求拨发 900 万法郎来弥补罗马远征费用，又更加剧了波拿巴方面与内阁和国民议会方面之间的紧张关系。路易·波拿巴在“通报”上公布了他写给侍从武官埃德加尔·奈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他以一些宪法上的保证约束教皇政府。教皇则发表了一个声明，即所谓《motu proprio》〔“出乎真意”〕⁴¹，拒绝对他那恢复起来的权力加以任何限制。波拿巴的信故意无所顾忌地揭开了他的内阁的台幕，使他自己能在楼厅观众面前显现为一个心地善良的，但是甚至在自己家里也未被了解和受着束缚的天才。他以“自由心灵渴望振翼飞腾”⁴²的神情来讨好卖俏，已不是第一次了。委员会的报告人梯也尔完全忽略了波拿巴振翼飞腾的意图，而只限于把教皇的声明译成法文。企图为总统救出面子而提议要国民议会对象拿破仑的书信表示赞同的并不是内阁议员，

却是维克多·雨果。《Allons donc ! Allons donc》〔“滚开！滚开！”〕——多数派以这种无礼而轻率的感叹声埋葬了雨果的提案。总统的政策？总统的信？总统自己？《Allons donc ! Allons donc》谁会把波拿巴先生的话信以为真呢？维克多·雨果先生，难道你以为我们相信你是真正相信总统吗？《Allons donc ! Allons donc》

最后，波拿巴与国民议会间的决裂，又因召回奥尔良王室和波旁王室的议案的讨论而加速了。总统的表兄弟，威斯特伐里亚前王的儿子，乘内阁议员们没有出席时，向议院提出了这个提案，目的不外是要把正统主义派和奥尔良派的王位僭望者弄得与波拿巴派的王位僭望者不相上下的地步，或者确切些说，弄到低于波拿巴派王位僭望者的地步，因为后者至少在事实上是站在国家政权高峰之上的。

拿破仑·波拿巴居然无礼到如此地步，竟把召回被放逐国外的王室与大赦六月起义者合成了一个提案。多数派所表示的愤怒，立即迫使波拿巴收回了这个竟将神圣东西与可恶东西，将王室血统与无产者败类，将社会恒星与社会沼泽游火褻渎地混为一谈的办法，并给这两个提议中的每一个以应有地位。多数断然否决了召回王室的提案，而贝利耶这位正统主义派的狄摩西尼，更是透彻无遗地阐述了这次投票的意义。把各个王位僭望者贬为普通公民——这就是波拿巴的目的！有人居然想要夺去他们身上的圣光，夺去他们所剩有的最后一点尊严，流亡国外的尊严！贝利耶喊叫道：如果有一个王位僭望者忘记了他的尊贵的出身，而以一个普通的私人身分回到法国来往的话，那末人家会怎样看待他呢？这

就再明显不过地告诉了波拿巴，他之处在国内是什么也没有赢得的，而如果联合保皇党人需要他在这里作为一个中立人物坐在总统位子上，那末真正的王位僭望者则必须以流亡的雾气遮住俗人的目光。

11月1日，路易·波拿巴以一件咨文回报了立法议会，他在这件咨文中用颇辛辣的言词通知说他已撤销巴罗内阁而成立新内阁。巴罗—法卢内阁是保皇党联盟的内阁，而奥普尔内阁则是波拿巴的内阁，是总统反对立法议会的工具，是听差内阁。

波拿巴现在已不再只是1848年12月10日的中立人物了。他作为行政权的首领，已成为一定利益的中心了，反无政府状态的斗争使得秩序党本身不得不加强了他的势力，而且如果说他已失掉人心，那末秩序党则是根本不得人心的。难道他不能指望，一方面是奥尔良党人与正统主义者的竞争，另一方面是某一君主复辟的必要性，将会迫使这两派承认中立的王位僭望者吗？

从1849年11月1日起开始了立宪共和国生命的第三期，这一时期是于1850年3月10日结束的。宪法机构间的那种受到基佐赞美的习见的玩意，即行政权力与立法权力间的争端已经开始了。但是并不止此。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着 *status quo* [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 *in petto* [心里] 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看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

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

康德认为共和国作为唯一合理的国家形式，是实际理性的基准，是一种永远不能实现而又是我们应该永远力求和企图实现的基准，同样，君主国就是这些保皇党人的基准。

这样，立宪共和国从资产阶级共和党人手中产生出来时原是一个空洞的思想公式，而落到联合保皇党人手中时就成了一个充满内容的生动的国家形式了。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么多的真理。

联合内阁的倒台和听差内阁的登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被任为新内阁财政部长的是富尔德。把富尔德弄成财政部长，就等于把法国的国民财富正式交付给交易所，通过交易所并为交易所的利益来管理国家财产。富尔德一被任命，金融贵族就在“通报”上宣布了它的复辟。这个复辟是必然补充着其余一切复辟，而与它们一起形成为立宪共和国链条中的环节。

路易-菲力浦从未敢于任命真正的 loup-cervier [交易所豺狼] 为财政部长。正如他的君主国是资产阶级上层统治的理想名称一样，在他的各届内阁中，特权的利益必定要带着证明个人大公无私的思想名称。在资产阶级共和国里，不同的君主国——正统王朝的和奥尔良的君主国——所曾隐匿于后台的东西，到处都已出现于前台了。它已把君主国所曾捧到天上东西都降到地上来了。它已用统治阶级利益的资产阶级专有名称代替了仙人的名称。

我们的全部叙述都已经表明，共和国从其存在的头一天起就不仅没有消灭金融贵族的统治，反而巩固了这个统治。但是，它

对金融贵族的让步，是违反本意而屈从命运作出的。从富尔德就职时起，政府的主动权重又归还到金融贵族的手中去了。

有人会问，资产阶级联合势力怎么能忍受那在路易-菲力浦时代以把资产阶级其余各阶层排出政权范围或使其听命就范为基础的金融贵族统治呢？

答案很简单。

首先，金融贵族本身在保皇主义联合势力内部构成为重要的领导集团，这个联合势力的共同政府权力称为共和国。难道奥尔良党人中的演说家和“天才人物”不曾是金融贵族旧日的同盟者和共谋者吗？难道金融贵族本身不是奥尔良党人队伍中的黄金重镇吗？至于正统主义者，那末他们早在路易-菲力浦时代已实际参加了一切交易所投机、矿山投机和铁路投机生意的狂妄。一般说来，大地产与金融贵族结成联盟，乃是一种正常的现象。英国就是证明，甚至奥地利也是证明。

在法国，国民生产水平比之国家债务是低得不相称的，国家的息金乃是投机生意的最主要的对象，而交易所则是希图以非生产方法增殖的资本的主要投资市场，——在这样一个国度里，所有一切资产阶级和半资产阶级中的无数人们，不能不对国家债务，对交易所投机生意，对金融感到有切身利益。难道所有这些二流的交易所投机生意参加者，不会把在巨大的规模上从总体方面代表着同一利益的那个集团，视为他们的天然靠山和首脑吗？

国家财富落入金融贵族手中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经常有增无已的国家负债状态。而这种国家负债状态的原因何在呢？就在于国家支出经常超过收入，在于这种不相称的状态，而这种不相称的状态既是国家公债制度的原因又是它的结果。

为了摆脱这种负债状态,国家必须限制自己的支出,即精简政府机构,缩小其规模,尽可能减少管理范围,尽可能少用官吏人员,尽可能少干预公民社会方面的事务。秩序党是不能走这条道路的:随着各方面威胁秩序党的统治和它那个阶级生存条件的危险愈益增长,它就不免要愈益加强自己的镇压措施,加强自己由国家出面的官方干涉,加强自己通过国家机关去到处出头露面。当侵犯人身和财产的罪行日益频繁的时候,宪兵人数是不可减少的。

或者是国家必须试图避免借款,把特别税加在最富裕阶级身上而至少暂时使预算得到哪怕是一时的平衡。但是秩序党难道应该为了使国家财富摆脱交易所剥削,而把他们自己的财富献上祖国的祭坛吗? *Pas si bâte!* [它没有这么傻!]

总之,若没有法兰西国家中的根本变革,就决不会有法国国家财政上的变革。而与国家财政必然联系着的有国家债务,与国家债务必然联系着的有国债投机买卖的统治,有国家债权人、银行家、银钱商和交易所豺狼的统治。只有秩序党中的一个集团才对金融贵族的垮台感到有直接利益,这就是工厂主。我们所指的既不是中等的,也不是小的工业家,而是在路易-菲利浦统治时构成王朝反对派广大基础的工业巨头。他们的利益无疑是要求减少生产费用,从而也就是要求减少列入生产费用项下的捐税,也就是减少国家债务(国债的息金是列入捐税项下的),换句话说,他们的利益是要求金融贵族垮台。

在英国,——法国最大的工厂主与他们的英国敌手比较起来都是小资产者,——我们确实看到工厂主,例如有个科布顿、有个布莱特带头对银行和交易所贵族举行十字军讨伐。为什么在法国没有这种情形呢?在英国占统治地位的是工业,而在法国占统治地

位的则是农业。英国工业需要 free trade(自由贸易),而法国工业则需要保护关税,除需要其他各种垄断外还需要全国性的垄断。法国工业并不支配着法国生产,所以法国工厂主并不支配着法国资产阶级。他们为要捍卫住自己的利益,使之不受资产阶级其他各集团侵害,就不能象英国工厂主那样站在运动的前头从而把自己的阶级利益提到第一位上;他们必须跟随在革命后头,并为那些与他们阶级的共同利益相反的利益服务。在2月间,他们没有了解自己的地位,但2月已叫他们学乖了。究竟是谁最直接受到工人的威胁呢,难道不是雇主,即工业资本家吗?所以在法国,工厂主必然成为秩序党中最狂热的分子。诚然,金融巨头削减他们的利润,但是这和无产阶级完全消灭利润比起来,又算得什么呢?

在法国,小资产者干着通常是应由工业资产者去干的事情;工人执行着通常应由小资产者去执行的任务;那末工人的任务又由谁去解决呢?没有谁去解决。这任务不是能在法国解决的,它在这里只是被宣布出来而已。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不能在本国范围内解决这个任务的⁴³;法国社会内部各阶级间的战争将要变成一个各国间的世界战争。只有当世界战争把无产阶级推到支配世界市场的那个国家的领导地位上,即推到英国的领导地位上的时候,工人任务的解决才能开始。可是,在这里并非终结而只是获得组织上的开端的革命,不会是一个短暂的革命。现在这一代人,是和那些由摩西带领通过沙漠的犹太人相仿佛的。他们不只是一要夺取一个新世界,而且要退出舞台,以便让出地盘给那些适于新世界的人们。

我们回过来说富尔德吧。

1849年11月14日,富尔德登上国民议会的讲坛,说明他的

财政制度：赞扬旧租税制度！保留酒税！拒绝帕西提议施行的所得税！

帕西也并不是革命家，他是路易-菲力浦的一位老部长。他是杜弗尔一类的清教徒，是七月王朝替罪羊戴斯特的最知心的朋友。帕西也曾称赞旧赋税制度，他也曾提议保留酒税，但同时他又揭开了财政赤字的帷幕。他宣称，只有征收一种新税——所得税，才能避免国家破产。以前曾向赖德律-洛兰推荐过宣布国家破产的富尔德，现在向立法议会推荐了国家财政赤字。他应许节省，而这种节省的秘密后来暴露出来了：例如，开支减少了 6000 万法郎，而债款却增加了两亿法郎，这只是数字分类和决算上的一些戏法，结果都归结于举借新债。

在富尔德任期内，金融贵族有资产阶级其余各个互相竞争的集团和它并驾齐驱，它的食欲当然就没有象在路易-菲力浦统治时代那样表现得横蛮无耻。但是制度是依照旧的：同样是国家债务不断增加，同样是财政赤字被伪装起来。过了些时候，旧日的交易所欺诈行为就更加露骨地表现出来了。证据是：关于阿维昂铁路的法律，巴黎全市一时都在谈论的国家证券价格令人莫测的涨跌，最后便是富尔德和波拿巴在 3 月 10 日选举中没有成功的投机。

在金融贵族正式复辟以后，法国人民很快就不免要重新回到 2 月 24 日那样的境况了。

1847 年 7 月 8 日，在巴黎元老院里开始了对于巴尔曼蒂耶和居比耶尔将军（被控贿赂官吏以图取得盐场特权）以及当时公共工程部长戴斯特（被控收受前两人的贿赂）审判案。后者在受审时企图自杀。所有这 3 人都被判处很重的罚金。戴斯特除罚金外还判处了 3 年监禁徒刑。（恩格斯在 1895 年版上加的注）

制宪议会为了发泄对自己的继承人的仇恨，故意废除了 1850 年度的酒税。旧税既已废除，新债就无法偿付了。秩序党中的一位白痴克雷通还在立法议会休会以前，就已提议要把酒税保存下去。富尔德以波拿巴派内阁的名义采纳了这个提议，而在 1849 年 12 月 20 日，即波拿巴宣布就职一周年纪念日，国民议会就颁令恢复酒税。

极力为这次恢复酒税作辩护的不是一位金融家，而是耶稣会首领蒙塔郎贝尔。他所持的论据是异常简单的。赋税是喂养政府的娘奶；政府是镇压的工具，是权威的机关，是军队，是警察，是官吏、法官和部长，是教士。谋害赋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谋害秩序卫士，而秩序卫士是保卫资产阶级社会的物质和精神生产不受无产阶级野蛮人侵犯的。赋税是与财产、家庭、秩序和宗教相并列的第五位天神。而酒税当然是一种赋税，并且不是一种寻常的赋税，而是一种古老的、浸透君主主义精神的、尊贵的赋税。Vive l'im- pôt des boissons !〔酒税万岁！〕Three cheers and one more !〔万岁，万岁，万万岁！〕

法国农民要设想魔鬼的时候，就把他设想成税吏。自从蒙塔郎贝尔把赋税宣布为天神的时候起，农民就变成成为不信神的人，变成成为无神论者，并投到魔鬼即社会主义怀抱里去了。秩序的宗教轻率地失去了农民，耶稣会教徒轻率地失去了农民，波拿巴轻率地失去了农民。1849 年 12 月 20 日永远断送了 1848 年 12 月 20 日的名声。“他伯父的侄儿”并不是他家族中第一个受蒙塔郎贝尔所说的预示着革命风暴的酒税之害的。真正的伟大的拿破仑在圣海伦岛上曾经说过，恢复酒税是使他垮台的最大原因，因为这使法国南部的农民脱离了他。这税在路易十四统治时代就已是民众憎

恶的主要对象（贝布阿吉尔贝尔和沃邦两人的著作）。第一次革命废除了它，而拿破仑在1808年间又把它在形式上稍加改变后重新采用起来了。当复辟王朝进入法国时，为它开路的不仅有哥萨克骑兵，而且还有废除酒税的诺言。当然 *gentilhommerie*（贵族阶级）是不一定要遵守他们对 *gens taillable à merci et miséricorde*（无权的下层阶层）所许下的诺言的。1830年许诺了废除酒税。这一年是根本不爱行其所言和言其所行的。1848年许诺了废除酒税，也如它许诺了其他一切一样。最后，什么都没有许诺过的制宪议会，如我们已经说过的，在自己的遗嘱中命令从1850年1月1日起废除酒税。但是恰巧在1850年1月1日前10天，立法议会又把它重新实行了。这样，法国人民总是白费气力地企图赶跑这项赋税：当他们把它从门口摔出去的时候，它又从窗口飞进来了。

人民普遍憎恶酒税，并不是没有原因的：在这项赋税中集合了法国赋税制度的一切可憎之点。它的征收方式是可憎的，分配方法是贵族式的，因为对最普通的酒和对最高贵的酒征税的税率都是一样；从而，随着消费者财富的减低，税额便按几何级数逐步增加；这是倒转的累进税。它是对于伪造和仿造酒品的奖励，因而就使劳动阶级受到经常的毒害。这税使每个人口在4000人以上的市镇都在城门口设立税卡，使每个这样的市镇都变成以保护关税抵制法国酒的异邦，这样就减少了酒的消费。大酒商，尤其是那些全靠卖酒为生的所谓小 *marchands de vin*，即酒店老板，都是酒税的死敌。最后，酒税既使消费额减少，就使产品的销售市场缩小。它既使城市工人无法买酒来喝，就使酿酒农民无法把酒卖出。而法国酿酒人数大约有1200万。因此全体人民对于酒税的憎恶就可以理解，尤其是农民对于酒税的狂热仇恨也就可以理解。而

且,他们不是把恢复酒税视为一个多少带着偶然性的单独事件。农民具有一种世代相传的特殊历史传统,他们已从这一历史经验中形成了一种信念:任何一个政府要想欺骗农民时,就向他们许诺废除酒税,而当它已把农民骗住时,它就把酒税保留起来或恢复起来。农民根据酒税来试验政府的香臭,试验政府的倾向。12月20日恢复酒税,就是表明路易·波拿巴也是和别人一样的人物。但他又不是和别人一样的人物,他是农民创造出来的,所以农民在有数百万人签名的反对酒税的请愿书中,就把他们一年前所投给“他伯父的侄儿”的选票收回去了。

占法国人口总数 $2/3$ 以上的农村人口,主要是所谓自由的土地所有者。他们的第一代,由于1789年革命而无偿地免除了封建贡赋,不付任何代价地取得了土地。但是,以后各代人却以地价形态偿付了他们那些半农奴式的祖先当时曾以地租、什一税、徭役等等形态偿付过的贡赋。一方面由于人口愈益增加,另一方面由于土地愈益分散,小块地的价格也就变得越加昂贵,因为这些小块土地分割得越零碎,对于它们的需求也就越大。但是农民购买小块地的价格越提高,则农民负债程度即抵押程度,就必然随着增大起来,——不管这小块地是由他自己购得,或是作为资本由共同继承人分给他,都是一样。加在土地上的债务,称为土地抵押,即土地典当。正如在中世纪大地产周围积集着特权一样,在现代的小块地周围积集着押据。另一方面,在小块地制度下,土地对于所有者全然是生产工具。但是土地的肥沃程度随着土地被割碎的程度而递减。使用机器耕作土地,分工制度,大规模的土壤改良措施,如开凿排水渠和灌溉渠等,都愈来愈不可能实行,而耕作土地的非生产费用却按照这生产工具本身被割碎的比例而递

增。这一切情况，都与小块地的所有者是否拥有资本无关的。但是土地被割碎的过程愈发展，小块地连同其极可怜的农具就愈益成为零细经营的农民的唯一资本，向土地投资的可能就愈少，贫农〔Kotsass〕就越感到缺乏利用农学成就所必需的土地、金钱和学识，土地的耕作就愈益退步。最后，纯收入按照总消费增长的比例而减少，按照农民私有产阻碍农民全家从事他种生计的比例而减少，然而这私有产已不能保障农民的生活。

这样一来，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和土地面积的不断分小，生产工具即土地则按照同一比例而昂贵，其肥沃程度则按照同一比例而减低，农业则按照同一比例而衰落，农民所负债务则按照同一比例而增加。而且，曾经作为结果的东西，反转来成了原因。每一辈人都留下更多的债务给其后辈，每一辈新人都在更困难更不利的条件下开始生活，抵押债务又产生新的抵押债务，所以当农民已不能再以其小块地作抵押而借得新债时，即不能把新的押据再叫土地担负时，他就直接落入高利贷者的掌握中，而高利贷的利息也就越发巨大了。

这样，法国农民以对押地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又以向高利贷者非抵押借款缴付利息的形式，不只是把地租，不只是把营业利润，总之，不只是把全部纯利交给资本家，而且甚至把自己工资的一部分也交给资本家，这样他就下降到爱尔兰佃农的地步，而这全是在私有者的名义下发生的。

这个过程，在法国由于日益增长的赋税负担和诉讼费用加快了速度。这种诉讼费用，一部分是法国法典对地产所规定的许多手续本身所直接引起的；一部分是互相接壤和互相交错的许多小块土地所有人间的无数纠纷所引起的；一部分是农民的官司狂所

引起的，这些农民对于财产的全部乐趣都是归结于狂热地保卫想象的财产，保卫所有权。

根据 1840 年的统计资料，法国农业生产总额为 52 亿 3717 万 8000 法郎。从这个总数中必须除去 35 亿 5200 万法郎的耕作成本，这里包括农民的消费在内。余下来的纯生产量是 16 亿 8517 万 8000 法郎，从这里要去掉 5 亿 5000 万法郎支付押地借款利息，1 亿法郎付给法官，3 亿 5000 万法郎用于赋税，1 亿零 700 万法郎用以支付公证费、印花费、典当税等等。纯生产量剩下的只有 $\frac{1}{3}$ ，即 5 亿 3800 万法郎；全人口每人所得的纯收入不到 25 法郎⁴⁴。这项统计资料自然并没有把土地抵押以外的高利贷利息或律师费等估计在内。

现在当共和国在法国农民旧有的重担上添加了新的负担时，农民的情况更是可想而知了。很明显，农民所受的剥削和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剥削，只是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剥削者是同一个：资本。单个的资本家通过抵押和高利贷来剥削单个的农民；资本家阶级通过国家赋税来剥削农民阶级。农民的所有权是一种符咒，它至今还使农民遭受资本支配；资本一向就是借口这个所有权来唆使农民反对工业无产阶级。只有资本的倾复，才能使农民地位提高；只有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政府，才能终结他们在经济上的贫困和社会上的衰落。立宪共和国是它的剥削者们联合实行的专政；社会民主主义的红色共和国，是它的同盟者的专政。而天平的升降，是看农民投进票箱的选票来决家的。他们自己应该决定自己的命运。——社会主义者在小品文中，在论丛中，在日历中以及在各种各样的小册子中，都曾是这样说的。这些思想已因秩序党的论战文章而使农民更易于了解；秩序党也向农民呼吁，它

把社会主义者的思想和意向加以公然无耻的夸大和歪曲，因而恰好打中了农民的心坎，激起了农民渴望尝试禁果的情怀。但是最容易理解的语言是农民阶级自己在行使选举权时所获得的实际经验，是农民阶级在革命的急剧发展进程中接连遭到的失望。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

农民情绪逐渐发生的转变，已现出种种征兆了。它已表现于立法议会的选举，表现于当时在里昂周围5个省内宣布的戒严状态，表现于在6月13日事变后几个月由吉伦特省选出一个山岳党人来代替“无双议院”〔Chambre introuvable〕的前任议长；表现于在1849年12月20日由加尔省⁴⁵选出一位红色议员来代替一位去世的正统主义的议员，而加尔省原是正统主义者的乐园，是1794年和1795年对共和党人施行最恐怖的暴行的地方，是1815年terreur blanche〔白色恐怖〕的中心，在这里公开杀害过自由主义者和新教徒。这个最守旧的阶级的革命化，在酒税恢复后表现得最明显了。1850年1月和2月间的政府所颁布的措施和法律，差不多完全是用来对付各省和农民的，这就是农民觉醒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

奥普尔的通令，使宪兵在对各地大小行政官尤其是对自治局长的关系上成为刑讯官，并且到处实行谍报制度，直到穷乡僻壤；取缔学校教师法，使身为农民阶级的教育者、保护人、思想家和顾问的学校教师处于受地方行政官任意摆布的地位，把身为学者阶级中的无产者的学校教师象追逐野兽一样从一个村庄赶到另一个村庄；取缔自治局长法案，在自治局长们头顶上悬起了一把免

历史上一般这样称呼在1815年间紧接拿破仑第二次退位后选出的那个极端保皇主义的和反动的众议院。（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

职的达摩克利斯剑，时时刻刻把他们这些农民公社总统跟共和国总统和秩序党对立起来；军令，把法国 17 个军区改变成为 4 个帕沙辖区⁴⁶，并使兵营和野营变为法国人的民族沙龙；教育法，秩序党用以宣布说法国愚昧状态和强制愚化是它在普选制下生存的必要条件，——所有这一切法律和措施究竟是什么呢？就是拚命企图重新使各省和各省农民受制于秩序党。

作为镇压措施来看，这些是些放空炮的拙劣办法。重大的措施，如保留酒税和保留 45 生丁税，嘲弄般地拒绝农民关于归还 10 亿法郎的请愿等等——这一切立法上的雷电一下子就从中心大批袭来而震惊了农民阶级。上述各项法律和措施使攻击手段和反抗行动具有了普遍的性质，使它们成为每所农舍中的话题，使革命在每个农村中滋长起来，把革命带到全国各地并把它农民化起来。

在另一方面，波拿巴提出这些法案和国民议会采纳这些法案，岂不是证明了立宪共和国的两个权力在镇压无政府势力方面，即在镇压奋起反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切阶级方面，是协调一致的吗？难道苏路克不是在发出了自己那个粗暴咨文⁴⁷后，立刻就在卡尔利埃⁴⁸——这个人是对富歇的一种污秽庸俗的模仿，正如路易·波拿巴自己是对拿破仑的一种平庸模仿一样——随后所发出的咨文里向立法议会保证他忠实于秩序事业吗？

教育法给我们指明了年轻的天主教徒和年老的伏尔泰主义者间的同盟。联合的资产阶级的统治，不是亲耶稣会的复辟王朝与卖弄自由思想的七月王朝的联合专制统治，又是什么呢？资产阶

根据希腊传说，纪元前 4 世纪时叙拉古王迪奥尼西阿斯于饮宴时，在他的廷臣达摩克利斯的头顶上用一根马鬃悬挂着一把宝剑。表示千钧一发岌岌可危的意思。——译者注

级各个集团在互相争夺支配权中彼此攻击时给予人民的那个武器，在人民已跟它们的联合专政对立的时候，难道不应该又从人民手里夺过来吗？任何事情，甚至连 *concordats à l' amiable* [友好合同] 法案的被否决也都没有比这种对耶稣会教义的谄媚更使巴黎小店主感到愤慨了。

然而，秩序党各个集团间的冲突，以及国民议会与波拿巴间的冲突，还是在照样继续着。使国民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在举行了自己的 *coup d' état* [政变] 之后，即在组成了自己的波拿巴派内阁之后，立即就把那些重新擢升为行政长官的王朝残废人物招拢来，要他们以鼓动连选他当总统的违宪活动作为他们任职的条件；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卡尔利埃封闭了一个正统主义者的俱乐部来庆祝他的就职；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创办了他自己的报纸“拿破仑”⁴⁹，这报纸公开说出了总统的秘密欲望，而部长们却未免要在立法议会的讲坛上对这些欲望表示否认；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不顾一切不信任投票而坚决不肯辞退自己的部长们；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每天额外多发 4 苏薪饷，企图以此讨好士官，又以剽窃欧仁·苏的“巴黎的秘密”中的办法，即设立“荣誉贷款银行”，借以讨好无产阶级；最后，使议会感到不高兴的，是波拿巴公然无耻地通过部长们提议将残存的六月起义者放逐于阿尔及利亚，以使立法议会 *en gros* [一下子] 就丧失人心，而总统自己却以实行个别赦免的办法来 *en détail* [逐渐地] 博得人心。梯也尔说出了关于《*coup d' état*》[“政变”] 和《*coups de tâte*》[“冒险举动”] 的威胁话，而立法议会则对波拿巴进行了报复，办法是否决他为私人利益提出的一切法案，而对于他为共同利益提出的一切法案则都用喧嚷的猜疑态度予以考查，看波拿巴是

不是以加强行政权力为借口来扩大他个人的权力。一句话，立法议会以轻蔑相待的阴谋来进行了报复。

再则，使正统主义者也感到烦恼的，是那班更机灵的奥尔良党人重又夺得了几乎一切国家要职，是中央集权制的扩大，而他们则是希望靠实行地方分权获得成功的。的确，反革命在用强力实行中央集权，即为革命造成一套机构。反革命既为银行券规定了强制的行价，于是就把法国的金银也都集中于巴黎银行，因而就为革命建造了一个现成的军用钱库。

最后，使奥尔良党人感到烦恼的，是他们那个旁系王朝的原则又受到重新浮现的正统王朝原则的对抗，是他们自己经常受到他人的吆喝和鄙视，正象一个贵族丈夫鄙视资产阶级出身的夫人一样。

我们已经一步一步地考察过，农民、小资产者、社会的一般中等阶层如何逐渐站到了无产阶级方面，如何逐渐跟正式共和国处于公开敌对地位，以及他们如何被这个共和国当作敌人来对待。愤恨资产阶级专政，要求改造社会，要把民主共和机构保存起来作为实现这种改造的工具，团结在作为决定性革命力量的无产阶级周围，——这就是所谓社会民主党即红色共和国党的一般特征。这个“无政府党”——如它的敌人所称呼的——正和秩序党一样，是各种不同利益的一种联合。从稍微改良旧社会紊乱状态到推翻旧社会秩序，从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到革命恐怖主义——这就是构成“无政府党”起点和终点的两个极端间的距离。

废除保护关税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工业集团的垄断。整顿国家财政就是社会主义！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金融集团的垄断。自由输入外国粮食与肉类就是社会主

义 因为这样作就是危害秩序党第三个集团即大地产集团的垄断。英国资产阶级最先进的一部分即自由贸易派的要求在法国就都成了社会主义的要求。伏尔泰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因为它是攻击秩序党第四个集团即天主教集团的。出版自由，结社自由和普及国民教育就是社会主义，都是社会主义！因为这一切都危及秩序党的一般垄断啊！

在革命进程中，情势已是极迅速地成熟了，连各种色彩的改良之友，要求极其温和的中等阶级，都被迫团结在主张变革的最极端的政党的旗帜周围，团结在红旗周围。

可是，虽然“无政府党”中各个主要构成部分所持的社会主义思想，各因一定阶级或阶级集团所处经济条件以及由此产生的一般革命要求不同而有所不同，但它在一点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它宣布自己是解放无产阶级的手段，并把这个解放标榜为自己的目的。在某些人说来，这是故意骗人的，而在另外一部分人说来则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这些人以为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过来的世界对于一切人都是最好的世界，以为它能实现一切革命要求和消除一切革命冲突。

隐藏在“无政府党”的声调大致相同的一般社会主义词句下的，首先有“国民报”、“新闻报”和“世纪报”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较为一贯地力求推翻金融贵族统治而使工商业免除旧有的束缚。这是代表工商业、农业利益的社会主义，这种利益因为与那班参加秩序党的工商业、农业巨头的私人垄断利益不相符合而受到他们摒弃。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也和任何其他一种社会主义一样，自然也吸引了一部分工人和小资产者。跟这种资产阶级社会主义不同的是本来意义的社会主义，即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Parex-

cellnce(地道)的社会主义。资本剥削这个阶级时主要是以债权人姿态出现的,所以这个阶级要求设立信贷机关;资本是以竞争来扼杀它的,所以它要求设立由国家维持的组合;资本是以集中来战胜它的,所以它要求施行累进税、限制继承权并由国家出资进行巨大工程以及采取其他各种强力抑止资本增长的措施。既然它梦想和平实现自己的社会主义,——至多也只容许再来一次短促的二月革命,——所以它自然就把未来历史过程想象为正在或已经由社会理想家协力或单独设计的种种体系的实现。于是这些社会主义者就成为折衷主义者或信奉着现有社会主义体系,信奉着空论的社会主义,这种社会主义是只有当无产阶级尚未成长到自己那个自由历史运动以前,才在理论上代表着无产阶级的。

这种乌托邦,这种空论的社会主义,想使全部运动整个都服从于运动中的一个段落,用个别学究的头脑活动来代替全部社会生产,而主要是幻想借一些细小手法和巨大伤感情怀来消除完全必要的阶级革命斗争,其实它只是把现代社会理想化,把这个社会描绘成一幅没有阴暗面的图画,并且力求违抗这个社会的现实去实现自己的理想。所以,当无产阶级把这种社会主义让给小资产阶级,而各种社会主义首领间的斗争又表明每个所谓体系都是特意强制社会变革中一个过渡段落以与其他各个段落相对抗时,无产阶级就愈益团结在革命社会主义周围,团结在被资产阶级叫作布朗基思想的共产主义周围。这种社会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由于本文叙述范围所限，我们不能更详细地来讨论这个问题。

我们已经看到：正如在秩序党中必然由金融贵族占居领导一样，在“无政府党”中也必然是由无产阶级占居领导。当结成革命联盟的各个不同阶级在无产阶级周围团聚起来的时候，当各省愈益变得不可靠，而立法议会本身愈益对法国的苏路克所提要求表示牢骚不满的时候，——为填补6月13日被逐的山岳党人空缺的那个延搁已久的补缺选举就临近了。

备受敌人轻视而又时刻受假朋友欺凌的政府，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逃出这个不堪忍受和摇摇欲坠的境况，这个办法就是暴动。巴黎发生暴动就会使政府有所借口来在巴黎和各省宣布戒严，从而操纵选举。另一方面，当政府战胜无政府势力之后，秩序之友就不免要对政府表示让步，否则他们自己就会显得象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了。

于是政府就来着手工作。1850年2月初，政府砍伐了自由之树⁵⁰，来向人民挑衅。徒劳无功！如果说自由之树已丧失了安身之所，那末政府自己却已弄得惊惶失措，并被它自己的挑衅所吓退了。国民议会以冷淡的不信任态度回答了波拿巴的这种求解脱的拙劣企图。从七月纪念柱⁵¹上取去长生花圈，也没有得到较大一点的成功。这在一部分军队中引起了革命示威游行，并使国民议会有所借口来对内阁投以多少隐蔽的不信任票。政府报刊以废止普选权和勾引哥萨克人入境侵犯来进行恫吓，也是徒劳无功。奥普尔在立法议会中向左翼分子直接挑战，也是枉费心机；他挑拨左翼分子跑到街上去并说政府已准备好对付他们，也没有奏效。奥普尔所取得的结果只是议长令其遵守秩序，而秩序党就以默然幸灾乐祸的神情许可了一位左翼议员对波拿巴的篡夺欲加以嘲弄。

最后，政府预言 2 月 24 日将有革命发生，也是枉然。政府所取得的结果只是人民在 2 月 24 日毫无表示。

无产阶级没有任人挑拨去进行暴动，它要干的是革命。

政府的种种挑衅举动只是加强了对于现状的普遍不满情绪，并没有阻碍住完全处于工人影响下的选举委员会为巴黎提出下列三位候选人：德弗洛特、维达尔和卡诺。德弗洛特是于 6 月遭受放逐，只因波拿巴有一次企图博取人心才获得赦免的，他是布朗基的朋友，曾经参加过 5 月 15 日的发动。维达尔著有“论财富的分配”⁵²一书，因以共产主义作家闻名，他曾在卢森堡委员会内当过路易·勃朗的秘书。卡诺是一位组织过胜利的“国民公会”议员的儿子，“国民报”派中威信丧失得最少的成员，临时政府和执行委员会中的教育部长，因曾提出民主主义的人民教育法案而成了一个抗议耶稣会教徒所定教育法的具体象征。这 3 个候选人代表着 3 个互相结成同盟的阶级：为首的是一个六月起义者，代表着革命无产阶级；其次是一个空论社会主义者，代表着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最后，第三个候选人是代表着资产阶级共和党，这个党的民主主义公式在与秩序党冲突中就获得社会主义的意义而早已失去本来的意义了。这是象在 2 月那样的为反对资产阶级和政府而结成的普遍联合。但这一次是无产阶级居于革命联盟主脑地位。

不管敌人如何拚命反对，社会主义的候选人终于取得了胜利。甚至军队也投票表示拥护六月起义者而反对自己的那个军人部长拉伊特。秩序党惊呆了。各省选举没有给它带来安慰：选举结果是山岳党获得多数。

1850 年 3 月 10 日的选举！这是 1848 年六月事件的翻案：那些放逐和屠杀过六月起义者的人们回到了国民议会，但他们是低

声下气，由被放逐者陪伴并且喊着后者的原则回来的。这是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翻案：曾被国民议会骗走的山岳党回到国民议会来了，但它回来时已不再是革命的指挥官，而是革命的先头号兵了。这是12月10日事件的翻案：拿破仑以他的部长拉伊特为代表落选了。法国议会史中只有过一次类似的情形：查理十世的部长奥赛在1830年间的落选。最后，1850年3月10日的选举，是使秩序党得到多数的5月13日选举的翻案。3月10日的选举是对5月13日多数的抗议。3月10日是一个革命。隐藏在选票后面的是铺路石。

“3月10日的投票是一场战争”，——秩序党的最极端的分子之一，赛居尔·达居索这样高声叫道。

立宪共和国随着1850年3月10日而踏进了一个新阶段，即解体的阶段。多数派方面的各个集团重又互相联合起来，并与波拿巴联合起来了；他们又来拯救秩序；波拿巴重又是他们的中立人物了。如果他们有时也想起自己的保皇主义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对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可能性已感到无望了；如果波拿巴有时也想起他是王位僭望者的话，那只是因为他对自己继续做总统的可能性感到无望罢了。

为了表示回答六月起义者德弗洛特的当选，波拿巴在秩序党的指挥下任命曾对布朗基和巴尔贝斯、赖德律-洛兰和吉纳尔提起诉讼的巴罗什来做内政部长。为了回答卡诺的当选，立法议会通过了教育法；为了回答维达尔的当选，国民议会扼杀了社会主义的报刊。秩序党企图以自己报刊的喇叭声来压倒自己所感到的恐惧。“剑是神圣的”，——它的一个刊物这样叫道。“秩序的保卫者应该对红党开始进攻”，——另一个刊物这样声明说。“在社会主义与社

会之间进行着一个你死我活的决斗,一个不停息的冷酷的战争;在这个殊死战争中,两方必有一方灭亡;如果社会不消灭社会主义,那社会主义就要消灭社会”,——秩序的第三只雄鸡这样叫道。筑起秩序的街垒、宗教的街垒、家庭的街垒来吧!一定要把巴黎的12万7000个选民收拾掉!给社会主义者来一个巴托罗缪之夜!而秩序党在刹那间确实是曾相信它准能获得胜利的。

受它的各个报刊攻击得最猛烈的是“巴黎的小店主”。巴黎的小店主已把六月起义者选举为自己的代表了!这就是说,1848年6月是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1849年6月13日是不会重演了;这就是说,资本的道义势力已被摧毁了,资产阶级的议会只代表着资产阶级了;这就是说,大私产一命呜呼了,因为它的臣民——小私产——已到毫无私产者的阵营中去寻求解救了。

秩序党自然要去采取它那必不可免的老办法。“加强镇压!”——它高声叫道,——“把镇压加强10倍!”但是它的镇压势力已减少了10倍,而它受到的反抗已增强了100倍。难道不是连最主要的镇压工具——军队,都需要加以镇压吗?于是秩序党就说出了它的最后一言:“必须把窒息着我们的合法状态铁环打断。立宪共和国是不可能的了。我们一定要运用自己的真正武器来作战。自1848年2月以来,我们总是用革命的武器并在革命的基地上对革命作战,我们接受了革命的机构;宪法是保护围攻者而不是保护被围攻者的堡垒!我们藏身于特洛伊木马的肚子里潜入了神圣的依利翁城,但我们并不是象我们的祖先希腊人那样潜入进去的,

1572年8月24日(8月24日为圣巴托罗缪节)的前夕,巴黎天主教徒对胡格诺教徒的大屠杀。——译者注

双关语:《grecs》是“希腊人”,也是“骗子”。(恩格斯在1895年版上加的注)

我们不是占领了敌人的城池,反而是自己成了俘虏。”

宪法的基础是普选权。废止普选权,——这就是秩序党的最后一言,资产阶级专政的最后一言。

在1848年5月4日,1848年12月20日,1849年5月13日,1849年7月8日,普选权承认了资产阶级实现这种专政的权利。在1850年3月10日,普选权谴责了它自己。把资产阶级统治视为普选权的结论和结果,视为人民主权意志绝对的表现,——这就是资产阶级宪法的意思。但是,当这个普选权,这个人民主权意志的内容已不再是归结为资产阶级统治的时候,宪法还会有什么意思呢?难道资产阶级的直接责任不正是要把选举加以调整,使其倾向于合理的制度,即倾向于资产阶级的统治吗?难道普选权每次取消现存国家权力而又从本身中间再造出新的国家权力,岂不就是消灭全部安定状态,岂不就是时刻把一切现存权力弄成问题,岂不就是破坏权威,岂不就是威胁着要把无政府状态本身提升为权威吗?在1850年3月10日之后,谁还会怀疑这点呢?

资产阶级既将它向来用作护身符并从中汲取支配一切的力量
的普选权抛弃,也就是公开承认:“我们的专政至今是遵照人民意志存在的,今后它却一定要违反人民意志而巩固起来了。”所以,资产阶级现今不在法国境内寻求靠山,而在法国境外,在外国,在外寇入侵中寻求靠山,这种作法是首尾一贯的。

这个第二号科布伦茨⁵³既选定法国本土作为居留地而号召外国入侵,也就是甘与一切民族情感为敌。它既然攻击普选权,也就是为新的革命造成了普遍的口实,而革命正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口实的。任何局部的口实,都能使革命联盟中各个集团互相分离,使他们彼此间的差异突露出来。但是普遍的口实却把一些半革命性

的阶级弄得眼花缭乱,使它们对于即将来临的革命的明确的性质,对于它们本身行动的后果怀有一种自欺的幻想。任何一个革命都需要有一个宴会问题。普选权就是新革命的宴会问题。

可是,联合的资产阶级中各个集团既已抛弃它们联合权力的唯一可能形式,既已抛弃它们阶级统治的最强大最完备的形式,即抛弃立宪共和国,而向后跑回到较低级、不完备、较软弱的形式即君主国去,它们就是自己给自己作出了判决。它们正象是一个老人,他为了要恢复自己的青春活力,居然拿出自己童年时代的衣服,妄想把他的枯萎的四肢硬塞进去一样。它们的共和国只有一个功绩,就是它充当了革命的温室。

1850年3月10日事件带有这样一句题词:

Après moi le déluge〔我去后哪管他洪水泛滥〕。

四

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

（这是前3章的续文，是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最后两期即第五第六两期合刊所载“述评”中摘出来的。那里首先叙述了1847年爆发于英国的商业大危机，说明欧洲大陆政治纠纷因受这次危机影响而尖锐化并转变为1848年2月和3月的革命，随后又指出，早在1848年即已开始而于1849年又更其加强的工商业的繁荣，如何打消了革命高潮，并使反动派胜利成为可能。然后专门讲到法国时就作了如下的论述：）

从1849年，特点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卢昂和缪尔豪森的棉纺织厂的生产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象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是个障碍。同时，西班牙的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的繁荣。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大大增加。由于资本的增加在法国产生许多投机企业，名义上这些企业是为了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大批的公司相继成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高唱社会主义的广告直接面向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一种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

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9个月为6300万法郎，1849年的前9个月为9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9个月为9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1849年出口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支付。当时，流通的银行券，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亿7300万法郎（1492万镑）。1849年11月2日，流通的银行券是4亿8200万法郎，或1928万镑，这就是说，增加了486万镑，而1850年9月2日是4亿9600万法郎，或1984万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的，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因此，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400万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金增加1亿2800万法郎，即500万英镑，这一事实显然证明，我们在本刊以前的一期中断定金融贵族不仅没有在革命中垮台反而更加巩固了，原是正确的。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票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票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该行就解除了为银行券兑换硬币的责任。它有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亿5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票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

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1848年5月2日的另一法令允许该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亿4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亿2500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整个法国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所有法国的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的银行⁵⁴。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从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⁵⁵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为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巴黎随着临时政府大唱高调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象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这个问题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依然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痛苦不堪。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还要低，农民因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而负债累累和穷困不堪，他们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3年来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证明，居民中间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始终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样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

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输出的多寡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即使危机首先使大陆爆发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还是产生在英国。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的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给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条件以实际的威胁,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的一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在人民坚持下,4月28日举行了新的选举,这样,人民自己把自己跟小资产阶级一道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了。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了选,而且在下莱茵地区也当了选。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力量很大的巴黎委员会,促使他接

受下莱茵地区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的意义：最后的决定又被拖延下来，人民的紧张情绪也松弛了，他们已经习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愿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了。最后，温情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使3月10日选举失去了革命意义（其意义在于恢复六月起义的声誉）；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件事看成是献媚于轻佻女郎的玩笑。由于敌人不坚决而胆量更大的秩序党，反对这个良善的候选人，而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位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⁵⁶，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冑被报纸扯成了碎块，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鼓舞了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山岳党已经心花怒放了，认为它可以用纯合法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用掀起一场使无产阶级再度登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借助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座位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居多数席位。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完全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安然自得的态度，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项法案负责任。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项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17个城主⁵⁷。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开始异口同声地劝说人民要保持体面，要保持 *calme majestueux*（最大的冷静），要安然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

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会消灭所谓革命报刊，可见现在的问题是报刊自卫的问题。冒牌的革命报刊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它签署了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问题提交初步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做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派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朗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权利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产生权利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哀求地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革命是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的。

5月22日，问题的初步讨论以462票对227票的多数而告结束。有些人曾经十分庄严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赋予他们代表权的人民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不是自己去行动，而是突然让全国行动起来，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由于企图为自己雪耻，而写了一份记录他们与强奸宪法毫无关系的事实的抗议书，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发表，而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屯驻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的决定无限期的拖延，报刊提出的保持冷静的号召，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阶级的最大的冷静，而主要是工商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试图。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

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了更大的毅力。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作是不祥的灾难。山岳党照例以大吵大嚷表示正义的不满，但是议长杜班不让山岳党的演说家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就席不动，而日拉丹则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有个补充，即制定新出版法。后者不久就会问世。经过秩序党的大量修正而变得更加严厉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上刊载的小说附加印戳费（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对周刊和月刊上满一定页数的一切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纸的死亡看成是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案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指向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在这之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单户期票，它的可靠程度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报刊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然而，就连“好”报刊，也由于不祥的匿名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外省的各个代表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相

貌。“好”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恶劣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是白费力气的。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了它。共和主义政论家是相当著名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象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一样的卖身求荣、见钱眼开、为了金钱而一生为什么都作辩护的 penny- a- liners [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象卡普菲克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象“辩论日报”的勒姆安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時候，被吹嘘为国家之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⁵⁸、“立宪主义者报”⁵⁹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陷于愚蠢透顶的地步。

在讨论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如此下流，竟一味给路易·菲力浦时代的老知名之士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采。

从选举法和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场的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即两份 *testimonia paupertatis* [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是站在永恒的正义和一切永恒的真理的方面⁶⁰。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3期第16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着 *status quo* [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 *in petto* [心里] 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

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着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销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甚至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末多的真理。”

Républicains malgré eux〔不得已的共和派〕这出喜剧，即反status quo的喜剧和现状的不断巩固；波拿巴与国民议会之间的一贯冲突；秩序党内经常出现的分裂为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它的各派经常的重新团结；每一派都想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的企图；相互的仇视，陷害，谋杀，常常拔剑动武，而结果总是baiser Lamourette〔拉摩勒特式的接吻〕⁶¹，——整个这一出平平淡淡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演得象最近6个月那样精彩。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作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波拿巴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波拿巴政府放弃了政权哪？难道波拿巴对抗国民议会的主要本能不就是他有600万选民吗？在波拿巴这方面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下贱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薪俸增加300万法郎来酬劳这种让步。国民议会在它宣布法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能否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呢？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通过指出人民被抢劫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办法也采取了严厉

见本卷第88—89页。——编者注

暗喻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编者注

的口气。进行了许多喧嚷的企图达成协议的活动；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固定增加 300 万法郎的要求，而决定只拨给波拿巴 216 万法郎的临时补助金。它对此并不满意，它之所以作了这种让步，只是因为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主张这样做。这样，这 200 多万的款子实际上不是决定给波拿巴的，而是表决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赏赐者的心情接受了这个 *de mauvaise grâce* [勉强] 抛掷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了攻击，而当讨论出版法过程中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的时候，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⁶²对国民议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主编被传来向国民议会请罪，并被科以最高的罚金 5000 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蛮横的文章攻击议会，而政府为了报复起见，以破坏宪法的罪名控告了几家正统派的报纸。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行动不受国民议会的任何阻碍，需要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各个流派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各个议员的个人利益，也需要会议延期。两者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的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 8 月 11 日延期到 11 月 11 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使它的信任票本身具有了不信任总统的性质。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参加由 28 人组成的在议会休假时期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常设委员会⁶³。为了向总

统证明多数人对制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几个“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共和派分子。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看来，秩序党的两大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要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它们斗争时所标榜的两个皇室的合并。报纸上满是圣列奥纳尔德斯的路易-菲力浦的病床前所讨论的和解计划；但是路易-菲力浦的逝世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她劫夺过，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的利益的结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流派恰恰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皇室的温情的爱恋，相反的，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象他们的竞争者到圣列奥纳尔德斯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到维斯巴登谒见亨利五世，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逝世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 *in partibus infidelium* [在野]⁶⁴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他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⁶⁵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竟毫不掩饰他们公开敌视正统派的态度。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会了。它们大多数都赞成用或多或少的保留条件来限制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君主制复辟，但又不加以比较确切的说明；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认为自己权力和胆量都太小，因而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希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法的宪制的方法解决问题，就是说，

决不能容许波拿巴在 1852 年 5 月辞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之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政党相逢之日。结果必然要发生各个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皇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的力量。行政权一加强,它的执有者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为加强其共同的实力而采取的每一步骤,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力,增加了他在紧急关头以武力阻挠用宪制方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其反对秩序党的斗争中会不惜破坏宪法的一个基础,正象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惜破坏宪法的另一基础,即废除普选权一样。很可能,他甚至会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国民议会。总之,制宪的解决办法会使整个政治 status quo〔现状〕岌岌可危,而资产者觉得在 status quo 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象觉得,在 1852 年 5 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一切买卖活动,期票,婚约,公证书,抵押,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朝不保夕,——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危险。在动荡不定的政治 status quo 的背后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于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延期解决的办法。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就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后对所热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了长期而深入的辩论而做的结论。由此可见,可耻的是强大的秩序党认为自己不得不认真对付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仇恨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龌龊的人物对愈来愈使他成为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却糊里糊涂。他的党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完全是他的名字的魔力和他一贯模仿拿破仑造成的。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回答了对维斯巴登和圣列奥纳尔德斯的拜谒。波拿巴分子对他这个人的魔力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们派出成火车成马车的巴黎流氓无产阶级组织十二月十日协会的成员到处跟着他捧场喝采。他们根据该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通过自己的傀儡之口说出或者意味着共和主义的温顺的话，或者意味着坚忍和倔强的精神的话，作为总统施政的座右铭。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但是这次出访还是极不象个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他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起来了，于是他着手在军队里进行宣传。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大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兵士。如果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困难当中善于靠突如其来的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末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Vive Napoléon, vive le saucisson》〔“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式的结果，暴露出了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方面跟尚加尔涅方面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想登王位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加之，尚加尔涅由于在 1849 年 1 月 29 和 6 月 13 日的行为，竟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在胆怯的

资产者看来成了以蛮横的干涉砍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 的新亚历山大。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的可怜，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作为总统的监视人。他自己以波拿巴的庇护者的身分卖弄过风骚——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对待波拿巴和阁员们愈来愈高傲。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公布时会发生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完全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一个人描绘成它整个阶级中并不存在的有力人物，以这种办法把他吹捧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是“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能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的双肩上的无耻的欺骗和神秘的骄傲，跟萨托里阅兵时和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灵机一动，就足以使资产阶级恐慌心理的幻想产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人物，就足以把这位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领取抚恤金的退伍将军。

波拿巴有一次曾喊使陆军部长跟讨厌的庇护者因纪律问题而发生冲突，来对尚加尔涅进行报复。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时，拥护制宪的尚加尔涅的不满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逃避在议会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对这些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把陆军部长奥普尔撤了

戈尔迪之结用以喻借武力方能解决的难题。相传戈尔迪以其乘舆之辮与轭用结系住，牢固不可解，声言有能解此结者，得以统治小亚细亚，亚历山大大帝拔剑斩开此结。——译者注

职，任命他为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星的心腹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诺马耶是在最近一次阅兵式上使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默默走过的罪魁。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尔涅开始表示抗议，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总汇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在不祥的征兆下召开了新的会议。但是，这将是杯水之浪。一般地说，旧把戏还会重演。尽管秩序党各派的原则维护者嚎啕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然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仅仅因为缺钱就已经屈服了的波拿巴，不管自己过去进行了怎样的抗议，也要把这种延长的权力当作纯粹从国民议会手里得到的职权接受下来。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status quo* 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派互相攻击，互相削弱，使对方无地自容；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就会加强，以至最后归于消灭，直到经济关系本身终于重新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甚至使所有这些互相争吵的政党跟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斗殴，使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破了产，使他们的资本转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弗·恩格斯

弗·恩格斯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⁶⁶

弗·恩格斯写于 1849 年
8 月底—1850 年 2 月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政治=
经济评论”第 1、2、3 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黑克尔、司徒卢威、布伦克尔、勃鲁姆和齐茨
把所有德意志君主 都打倒杀死！”⁶⁷

这是一段付歌，是南德的“人民自卫团”在从普法尔茨到瑞士边界的所有的道路上和旅店到处高唱的一段歌词，它沿用了“在大海怀抱中”⁶⁸这个为人所熟悉的又象圣歌又象手摇风琴声的调子。这段副歌总括了“维护帝国宪法大起义”⁶⁹的全部性质。这两行歌词描绘出了这次起义中伟大人物的最终目的、值得赞美的坚定信念和令人肃然起敬的对“暴君”的憎恨，同时也描述了他们对于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全部观点。

二月革命及其进一步的发展在德国所引起的一切运动和动荡之中，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为突出地表现了典型的德意志的特点。它的起因、它的发生、它的方向、它的整个进程都是纯粹德国式的。正如 1848 年 6 月的那些日子表明了法国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程度一样，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也表明了德国的尤其是南德的社会和政治发展的程度。

整个运动的灵魂是小资产阶级，主要是所谓的市民阶层，而这个阶级在德国，特别是在南方，恰恰是占着主要的地位。正是小资产阶级参加了“三月同盟”⁷⁰、民主立宪同盟、爱国同盟、许许多多所谓的民主同盟以及几乎一切的民主派报纸，从而给帝国宪法带

在汉堡印刷“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时，“德意志君主”这几个字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而被删掉。——编者注

来了不计其数的但又不关痛痒的“格留特利的誓言”⁷¹，并且还进行了反对“不听话的”君主的斗争。而这一斗争的唯一的直接后果，自然也只是他们自己感到履行了国民义务而洋洋自得罢了。正是那以法兰克福议会的坚定的所谓左翼为代表的，即特别是以斯图加特议会和“帝国摄政”⁷²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正式领导了整个运动；最后，小资产阶级在各邦的地方委员会、安全委员会、临时政府和制宪议会里面都占统治地位，而上述这些机构都在萨克森、莱茵省和南德的捍卫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多少获得了一些荣誉。

假若事情由小资产阶级来决定的话，那它未必会抛弃处处以法律为依据来进行合法、平和而又软心肠的斗争的这种立场，未必会借助于火枪和石块来代替所谓的精神武器。自1880年起德国以及法国、英国的一切政治运动的历史向我们表明，这个阶级在它还没有觉察出任何危险的时候，总是吹牛，爱讲漂亮话，有时甚至在口头上坚持最极端的立场；可是一旦面临小小的危险，它便胆小如鼠、谨小慎微、躲躲闪闪，一旦其他的阶级郑重其事地响应和参加由它所发起的运动，它就显得惊恐万状、顾虑重重、摇摆不定；一旦事情发展到手执武器进行斗争的地步，它为了保存自己的小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就预备出卖整个运动，最后，由于它的不坚决，一旦反动派取得胜利，它总是特别受欺骗和受凌辱。

但是，在小资产阶级的后面，在在都有其他的阶级来响应由它所发起并为它的利益而服务的运动，它们促使这个运动更加明确、更加坚强有力，而且尽力一有可能就去掌握运动。这些阶级就是无产阶级和相当大的一部分农民，此外，小资产阶级的进步派别也往往暂时依附它们。

以较大城市的无产阶级为首的这些阶级，对待这些唱高调的

忠于帝国宪法的保证,比任何小资产阶级鼓动家都要认真得多。如果说小资产者正象他们所不断发誓的那样,为了帝国宪法不惜“牺牲一切”,那末,工人、还有许多地方的农民也是情愿这样做的;不过有一个情况虽然没有人提起过但各党派心中都是非常清楚的,那就是在胜利之后,小资产阶级必然要维护这部帝国宪法而反对这些工人和农民。这些阶级曾经推动小资产阶级和现存的国家政权公开地决裂。如果说,他们未能制止住自己的小商人式的盟友甚至在斗争高潮的时刻就干叛卖的勾当,那末,他们至少有一点可以感到满意,即反革命胜利以后,这种叛卖行为却受到了反革命分子的惩罚。

另一方面,在运动的初期,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中比较坚定的派别也曾依附过小资产阶级,这正象英国和法国历次小资产阶级运动中发生的情形完全一样。资产阶级从来都不是作为一个整体实行统治的;且不谈至今在自己的手中还保存着一部分政治权力的封建阶级,就是大资产阶级本身在战胜封建主义以后,也立即分裂为执政党和在野党,它们通常一方代表银行,另一方代表工厂主。其次,和执政派别相反,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在野的进步派别,却和小资产阶级有着共同的利益,并和它联合起来共同进行斗争。在德国,武装的反革命恢复了差不多是由军队、官僚和封建贵族独霸的统治,那里尽管还存在宪法的形式,但资产阶级只不过是扮演着极其平凡的配角,因此,那里具有更多的理由来实行这种联合。然而,德国的资产阶级比起英法的资产阶级来要怯懦得多,只要有一点点再发生混乱即进行真正决战的可能,它便会张皇失措地退出斗争的舞台。这一次的情形也是这样。

其实时机决不是不利于斗争的。法国那时迫近选举,这次选

举不论谁得多数票，保皇党也好，红党也好，结果总会削弱制宪议会的中间派，加强两个极端的政党，使得尖锐化了的议会斗争通过人民运动而得到解决；一句话，选举必然会使《journée》〔“决定性的一天”〕来临。在意大利，罗马城下进行着战斗，罗马共和国成功地进行了防御，反击了法国干涉者的军队。在匈牙利，马扎尔人以不可阻挡之势向前猛进；帝国军队被赶过了发格河与莱达河；在维也纳，人们天天都在等着听炮声，匈牙利的革命军随时都可能到达；在加里西亚，人们在等待邓宾斯基率领波兰-马扎尔军队到来，而俄国的干涉，看来对马扎尔人不仅不是祸事，相反地，它必然会把匈牙利的斗争变为欧洲的斗争。最后，在德国笼罩着一种非常强烈的激昂情绪；反革命实行进攻，军阀、官僚和贵族愈来愈横行无忌，内阁中的老牌自由派经常不断地干着贩卖的勾当，君主们背信弃义的事件一个紧接着一个，凡此种都使得整批整批的过去拥护秩序的人投入了运动派的怀抱。

斗争就是在这种种情况下爆发起来的，我们在下面的文章里，就要来描写这个斗争。

由于所有的材料都还非常不完备而且非常混乱，由于所搜集的参加者的口述材料几乎都根本不可靠，由于过去出版的所有论述这次斗争的著作的作者都抱有纯粹的个人目的，所以不可能对事件的全部进程进行批判的叙述。因此，我们只好限于叙述一些自己耳闻目睹的东西。值得庆幸的是这些东西已足以说明整个运动的性质，固然，单凭个人印象我们不能说明萨克森的运动和梅洛斯拉夫斯基向尼喀河的进军，但是“新莱茵报”杂志可能在最近找

“君主们”这个词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在印刷时被删掉。——编者注

到个机会至少对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进军作一些必要的说明⁷³。

参加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人有许多还关在监牢里，另外一些人已经得到机会回国了，还有一些人仍然侨居国外，整日期待回国机会，他们中间没有最糟糕的人物。在关系到这些斗争的参加者时我们必须采取谨慎态度，这是大家可以理解的；现在有许多人重新住在国内没有遭到迫害，如果我们没有由于叙述那些表现出他们真正英勇非凡的精神的事件而把他们暴露出来，他们是不会责备我们的。

一 莱茵普鲁士

读者还记得，维护帝国宪法的武装起义是5月初首先在德勒斯顿爆发的⁷⁴。大家知道，得到农村居民的支持但被莱比锡小市民出卖了的德勒斯顿街垒的战士们，经过6天的战斗之后，被敌人以优势兵力打败了。这里的战士不超过2500名，他们的武器是形形色色各种各样的，他们的炮兵只有两三尊不大的轻型臼炮。而王室军队除了萨克森的几个营以外，还有两个普鲁士团。他们拥有骑兵、炮兵、步枪手和一个针发枪营。在德勒斯顿，王室军队大概比在任何地方都表现得更为胆怯；然而，同时无可怀疑的是，德勒斯顿的战士们在和这些优势敌人作战时要比维护帝国宪法运动期间的任何人都更勇敢。当然，巷战是与野战完全不同的。

在柏林，由于实行戒严和解除武装，到处都一直保持着宁静的气氛。甚至也不曾把铁路炸毁，以便在柏林城下就把普鲁士增援部队截住。布勒斯劳那里曾企图发动街垒战，但政府对此早有戒备，因此，这个城市更是注定陷入军刀的专政之下。德国北部其余地区失去了革命中心，陷入了瘫痪状态。只有把希望寄托给莱茵普鲁士和德国南部；而在德国南部的普法尔茨此时也已经动了起来。

由于书报检查的缘故，这里的《feig》（“胆怯”）一词曾改为《kläglich》（“可怜”）以缓和语气。——编者注
波兰称为：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自 1815 年以来，莱茵普鲁士被认为是（有充分的理由这样认为）德国最先进的省份之一。它有两个优越性，两个优越性兼有的情况无论在德国的任何其他地方都是找不到的。

莱茵普鲁士和卢森堡、莱茵黑森、普法尔茨共同有这样一个优越性：1795 年以来，法国革命及其所取得的、在拿破仑时代又得以巩固下来的社会、行政和立法各方面的成果，给予了这些地区以直接的影响。革命党在巴黎失败以后，军队便把革命带到了法国国外。在这些刚解放了的农民子弟的冲击下，不仅神圣罗马帝国的军队土崩瓦解了，而且贵族和僧侣的封建统治也分崩离析了。在莱茵河左岸已经有两代人不知封建主义为何物：贵族已经被剥夺了特权，土地所有权从贵族和教会的手中转入农民的手中，土地都被分成小块，农民也象在法国一样是自由的土地私有者。在城市里，行会和宗法式的贵族统治比德国其他的地方早 10 年就消失了，而让位给自由竞争了，最后，Code Napoléon [拿破仑法典]⁷⁵总结了革命的全部法规，在法律上承认了整个这种完全改变了的秩序。

另外，莱茵普鲁士拥有全德最发达、种类最繁多的工业，这也就是它同莱茵河左岸的其他各邦比起来所具有的主要优越性。在亚琛、科伦和杜塞尔多夫这 3 个行政区几乎所有的工业部门都有了：棉纺、毛纺和丝纺工业应有尽有，还有附属于这些工业的漂白业、印花业和染色业，也有炼铁业和机器制造业；其次，采矿业、军火生产和其他的金属生产都集中在这块没有多少平方哩的面积上，并且给德国的空前稠密的人口提供了就业的条件。马尔克铁矿和煤矿区与莱茵省紧相毗连，它部分地满足了莱茵省在原料上的需要，并在工业方面和莱茵省保持着联系。这里有德国

最好的水道，距海又近，矿藏又丰富，这都促进了工业的发展，另外，工业部门还敷设了许多铁路，并且每天都在扩大自己的铁路网。德国对世界各地的非常广泛的进出口贸易，和世界市场的一切大中心的直接频繁来往，以及在原料和铁路股票上的相反的投机买卖等，与这里工业有着密切的联系。总之，莱茵省工商业发展的程度，虽然在世界市场范围内并不是微不足道的，但在德国说来，却是独一无二的。

在莱茵普鲁士，由于工业（它也是在革命的法国的统治下繁荣起来的）和与之有关的商业的发展而形成了强大的工商业大资产阶级以及与其对立的人数众多的工业无产阶级；这两个阶级在德国其他各地只是零散地存在于一些地方，并且还处在萌芽阶段，然而，它们却几乎是唯一决定着莱茵省独特的政治发展的两个阶级。

莱茵普鲁士比德国其他受法国人的影响而革命化了的地区优越的地方是它的工业，比德国的其他工业区（萨克森和西里西亚）优越的地方是它继承了法国革命。这是德国唯一的一个社会发展几乎完全达到现代资产阶级社会水平的地区，这里有发达的工业、广泛的贸易、资本的积累、地产的自由；在各城市中占主要地位的是强大的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在乡村里占主要地位的是人数众多和负债累累的小农；资产阶级通过雇佣劳动制来统治无产阶级，通过抵押来统治农民，通过竞争来统治小资产阶级；最后，资产阶级的统治得到了商业法庭、工厂法庭、资产阶级的陪审制和整个法权的承认。

莱茵省的居民为什么要憎恨一切普鲁士的东西，现在还不明白吗？普鲁士简直是把法国革命和莱茵省一道纳入了自己的国家；

它不仅把莱茵省居民当做被征服的外国人来对待，而且还当做战败了的叛乱者来对待。普鲁士不但不本着日益发展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精神来改善莱茵省的立法，而且甚至想强迫莱茵省居民接受普鲁士法，而普鲁士法是一种迂腐的、封建而庸俗的混合物，它即使在东波美拉尼亚也未必适用。

1848年2月以后的革命事件清楚地表明了莱茵省的特殊状况。莱茵省不仅使普鲁士的资产阶级，而且使整个的德国资产阶级具有自己的典型代表——康普豪森和汉泽曼；它使德国的无产阶级具有唯一的不仅在言论上或者以一些善良的愿望来代表无产阶级而且表达了它的真正利益的一个机关报，这就是“新莱茵报”。

尽管如此，但是莱茵普鲁士过去很少参加德国的革命运动，究竟是什么缘故呢？

不应该忘记，30年代的运动是为了空谈家和律师的那种立宪主义而进行的，它对于从事更为实际的事业即从事工业企业的德国莱茵资产阶级没有任何利益；当各小邦还在幻想德意志帝国的时候，在莱茵普鲁士无产阶级就已经公开地起来反对资产阶级了；在1840—1847年，即在资产阶级的真正立宪主义运动的时期，莱茵的资产阶级曾经是居于领导地位的，而在1848年三月事件的时候，在柏林它对斗争的结局曾起了决定性的影响。然而，为什么莱茵普鲁士在公开的起义中从来就没有获得过任何成就呢？为什么在这里根本就不可能实行全省的总起义呢？为了说明这一切，最好是简单地叙述一下莱茵省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

在德勒斯顿，斗争刚刚才爆发起来；在普法尔茨，斗争随时都可能发生。巴登、维尔腾堡、法兰克尼亚，都举行了群众大会，几乎已经谁也不隐讳自己要以武器来彻底解决问题的决心。在整

个南德，部队的情绪是摇摆不定的。普鲁士同样是处于群情激昂的状况中。无产阶级因为在 1848 年 3 月间自认为已争到手的那些权利又被人用欺骗的手段夺去了，所以只是等待机会报仇雪恨。小资产阶级处处都企图把一切不满分子联合成一个拥护帝国宪法的大党派，同时还希望自己来领导这个政党。在一切的报纸上，在所有的俱乐部和酒吧间，那种与法兰克福议会共存亡、不惜为帝国宪法而牺牲一切的誓言，简直是琳琅满目，处处可闻。

在那个时候普鲁士政府也已经展开了敌对的活动，它召集了相当大的一部分后备军⁷⁶，即威斯特伐里亚和莱茵所有的后备军。在和平时期发布征召后备军的命令是违法的，这不仅激起了小资产阶级的愤怒，而且也激起了富裕资产阶级的愤怒。

科伦市参议会宣布召开莱茵省各市、镇参议会的代表大会。政府禁止召开这次会议；于是，人们决定不拘泥于形式，尽管有禁令，大会还是召开了。各市、镇参议会，即大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的代表们都宣布自己是帝国宪法的拥护者，他们要求普鲁士政府接受帝国宪法，要求内阁辞职，并且要求取消后备军征召令，他们完全公开地威胁政府说，一旦政府拒绝这些要求，莱茵省便与普鲁士脱离关系。

“鉴于第二议院在表示主张无条件接受本年 3 月 28 日所公布的德意志宪法以后被普鲁士政府所解散，从而人民的代表权和表决权也就在现在这一决定性时刻被普鲁士政府所剥夺，下面签名的莱茵省城市和乡镇的代表们举行了会议，共商国事。

会议在特利尔市议员采尔和科布伦茨市议员威纳尔的主持下，在书记科伦市议员贝克尔和杜塞尔多夫市议员布洛姆第二的协助下，通过如下的决议：

(1)会议声明，承认本年 3 月 28 日帝国议会所公布的德意志帝国宪法为

确定的法律，并且在普鲁士政府引起的冲突中，站在德意志帝国议会方面。

(2) 会议号召莱茵省全体居民，特别是能手持武器的所有男人，以大大小小的团体的名义集体地宣布：愿意履行自己的职责并坚决捍卫德意志帝国宪法、贯彻帝国宪法的规定。

(3) 会议要求德意志帝国议会尽速采取最有效的措施，使德意志各邦人民，尤其是莱茵省的人民在进行反抗时能够团结一致和坚强有力，只有团结和强大才能打乱具有良好组织的反革命势力的计划。

(4) 会议要求帝国政府尽速使帝国军队宣誓效忠于宪法，并保证将这些军队集中起来。

(5) 下面签名的代表们应该使用他们所掌握的一切手段，争取使帝国宪法在自己的市、镇的范围得到承认。

(6) 会议认为勃兰登堡-曼托伊费尔内阁辞职以及在现行选举制度不变的条件召开两院会议，是绝对必要的。

(7) 会议特别认为不久前对部分后备军的征召是没有必要的、极端危害国内和平的措施，所以希望立即撤销此项命令。

(8) 最后，下面签名的代表们深信，拒不理会本声明的内容，将给祖国造成极为严重的危险，甚至可能使普鲁士不能保全现今的版图。

1849年5月8日在科伦通过。”

(签名)

我们只想补充一点，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当主席的那位采尔先生，过了几个礼拜以后，却以法兰克福帝国内阁⁷⁷的帝国专员的身分到了巴登；在那里，他不仅号召大家保持安静，而且和当地的反动分子共同策划了后来在曼海姆和卡尔斯卢厄所发生的反革命行动。此外，大概他至少还同时作为军事奸细替帝国将军波伊克尔效过劳。

我们认为确定这样一个事实是很重要的。大资产阶级——3月以前的莱茵省自由主义之花——从一开始就企图在莱茵普鲁士领导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它的言论、它的决议、它的所有行为，

使它不能不对以后事件担负责任。有不少人真的相信了市、镇议员先生们的话,尤其是相信了他们关于莱茵省脱离普鲁士的那种威胁性的说法。一件事情,只要有资产阶级的参预,那就可以认为已经注定成功,就可以指望一切阶级的居民的支持,因而也就可以去冒点险了。小资产阶级的算盘就是这样打的,于是它急忙地摆出了一副不可一世的姿态。不言而喻,这一点也不妨碍小资产阶级的假牌盟友大资产阶级一旦机会到来就将它出卖,而且到后来,当事情的结局十分悲惨的时候,还要在事后嘲笑它的愚蠢。

然而,激奋的情绪却有增无已;来自德国各个地方的消息都充满着战争气味。最后,事情演变到了装备后备军的地步。各营的人集合了起来,他们坚决声明不穿军装。少校们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做后盾,一点办法也没有,而事情没有闹到威逼和动武的地步他们倒称幸不已。他们把人们解散了,重新指定了一个装备的期限。

政府当时本来能够轻而易举地给后备军的军官以必要的支持,但故意地听任事态发展到那个地步。而现在,它却一下子就使用起武力来了。

那部分不服从命令的后备军,主要是属于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反抗的中心是爱北斐特和伊塞隆、佐林根和埃奈泊河谷。前两个城市立即就有军队开去了。

开赴爱北斐特的有第十六团的一个营,有一个枪骑兵连和两门大炮。城里面一片慌乱。后备军的士兵们经过深思熟虑后,仍然决定来一次冒险。许多农民和工人对政治漠不关心;他们最怕的就是政府一翻脸便使他们遥遥无期地离开家园。当他们想到反抗的后果时,心情就变得沉重起来:species facti〔构成犯罪〕、触

犯战时条例、罚苦役，甚至可能枪决！总之，处于战斗状态的后备军士兵的数目（他们都有武器在手）一天比一天稀少了，最后，只剩下约 40 个人。他们在城外的一个小饭馆里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在那里等候普鲁士人到来。在市政厅大厦周围有市民自卫团和两队市民射击手；他们摇摆不定，并和后备军进行了谈判，但是无论如何他们都要准备保护自己财产。在街道上到处是人群，这里有在政治俱乐部宣誓矢忠于帝国宪法的小资产阶级，有各种类型的无产者：既有坚决革命的工人，也有醉熏熏的运货马车夫。谁也不知道应该做什么事情和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

市参议会想和军队进行谈判。司令官拒绝了谈判，并开进了城内。军队耀武扬威地走过街头，到市政厅大厦的旁边列开队伍和市民自卫团对面相持。谈判开始了。有人从人群中向士兵扔了几块石头。前面所说的为数约 40 人的后备军，经过长时间的商议以后从城市的其他地方开到这里来了，他们也驻在军队的对面。

突然人群中发出了释放囚犯的呼声。在紧靠着市政厅大厦的监狱里，有 69 名佐林根工人已被监禁了一年，罪名是捣毁了要塞旁的铸钢厂。再过几天就要开庭审判。人群涌向监狱，要把他们放出来。大门被撞开了，人们就一拥而入，囚犯被放出来了。然而正在这个时候军队开了过来，一排枪响，从牢门跑出来的最后一个犯人应声倒地，脑袋被打得粉碎。

人群后退了，但他们大喊道：到街垒上去！转瞬间，通向市中心的所有通路都被街垒封锁了。没有武器的工人很多，在街垒后面有武器的不超过 50 人。

大炮移到前面来了。无论是刚才的步兵或是现在的炮兵都射击得过高，大概是故意搞的。这两部分军队都是由出生在莱茵省

或威斯特伐里亚的人组成的，他们都是用意善良的。后来，冯·乌滕霍芬上尉率领第十六团第八连来到了前面。

在第一座街垒的后面有3个手持武器的人。他们喊道：“不要向我们开枪，我们只打军官！”上尉命令道：“注意！”在街垒后面有个射手喊道：“你要是敢喊‘预备’，我们就地干掉你。”“预备，放！”一排枪响，而在那一瞬间，上尉也就倒下去了。子弹正中他的胸膛。

士兵们仓惶后退了，连上尉的尸体也没带走。又响了几枪，有些士兵负了伤。指挥官不想在起义的城市中过夜，便率领自己的部队出了城，同部队一起露宿在离城步行一小时之遥的地方。在各个地方，大兵一撤走，跟着就筑起了街垒。

普鲁士人撤退的消息，当天晚上就传到了杜塞尔多夫。人们大群大群地聚集在街头；小资产阶级和工人都兴奋异常。接着又传来消息说将有新的军队派到爱北斐特去，这个消息就成了发动的信号。有一些工人，他们不愿武器的不足（自1848年11月起市民自卫团就被解除了武装），不顾有相当强大的驻防军，也不顾这里以前公国小首府的宽阔而笔直的街道对起义者不利，就发出了号召：到街垒上去。新街和保凯尔街上构筑了几座防御工事；在这个城市的其他地方，一方面是由于早已有军队集结在那里，另一方面是由于富裕市民和小市民胆怯，而不曾构筑任何的工事。

傍晚时分战斗开始了。这里也象别的地方一样，打街垒战的战士很少。不仅如此，他们到哪里去弄到武器和弹药呢？难得他信能够给予兵力占优势的敌人以持久的和坚强的抵抗，有几个本来可以守住的街垒，只是在敌方广泛地使用大炮之后，才于清早时分陷入普鲁士人之手。大家知道，这些行动谨慎的英雄们在第二天对女仆、老人和其他的和平居民进行了血腥的报复。

就在普鲁士人从爱北斐特被赶走的那天，本来有一个营（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是第十三团的一个营）开赴伊塞隆去镇压当地的后备军。但是在那里这个计划也破产了：后备军和人民刚一知道军队迫近的时候，就在通往城市的所有进路上构筑了街垒，荷枪实弹以待敌人。这个营没有敢打就后退了。

爱北斐特和杜塞尔多夫的战斗以及伊塞隆的街垒，是贝尔格-易尔克工业区大部地方实行起义的信号。佐林根的居民用袭击的办法夺取了格莱弗拉特的军械库，用那里缴获的枪枝弹药武装了自己；哈根的居民大批大批地参加了运动，武装了自己，占领了通往鲁尔的要冲，并派遣了巡逻队去进行侦察；佐林根、龙茨多弗、勒姆谢德、巴门及其他的城市都派遣了自己的队伍到爱北斐特去。在这个区域的其他地点，后备军也参加了运动，并愿听法兰克福议会的调配。在爱北斐特、佐林根、哈根和伊塞隆，安全委员会代替了那些被驱逐了的区政权利地方政权。

关于这些事件的消息，自然是被夸大得更加骇人听闻：整个乌培河谷和整个鲁尔地区被形容成一个巨大的有组织的起义阵营；传说在爱北斐特有 15000 个武装人员，在伊塞隆和哈根两地也有同样数目的武装人员。政府由于突然大吃一惊而在最忠顺的地区的这次起义面前表现得束手无策，镇压无方，这也大大地促使那些言过其实的谣言更加流传起来。

但是，不管这些可能的夸大可以打多少折扣，下面的这个事实终归是无可怀疑的：公开的、暂时还是所向无敌的起义曾席卷了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的各个主要据点。这一事实是无可辩驳的。此外，还有消息说德勒斯顿仍是屹立不动，西里西亚发生了骚乱，普法尔茨的运动加强了，在巴登军队里爆发了胜利的起义，

大公逃之夭夭，马扎尔人驻扎在雅布龙卡河和莱达河畔。简言之，这是 1848 年 3 月以来出现在民主党与工人党面前的一切革命时机当中最有利的一个时机，当然必须要利用这个时机。莱茵河左岸必须支援右岸。

那末，应该采取什么措施呢？

莱茵省中比较大的城市，不是有坚固的堡垒和炮台控制着的要塞城市，例如科伦和科布伦茨等，就是有大批驻防军的城市，例如亚琛、杜塞尔多夫和特利尔等。此外，莱茵省还在威塞尔、幽里希、卢森堡、萨尔路易，甚至美因兹和明登这些要塞的控制之下。所有这些要塞和驻防军的兵力一共至少有 3 万人之多。最后，科伦、杜塞尔多夫、亚琛、特利尔早已被解除武装。因此，莱茵省的各个革命中心都已经陷入了瘫痪的境地。在这里，正如杜塞尔多夫的例子所已表明的，任何举行起义的企图都不能不以军队的胜利告终；如果譬如说在科伦再有一次这样的胜利，那末不论还有什么其他的好消息传来，贝尔格-马尔克区起义者的士气都会一蹶不振。在莱茵河左岸的摩塞尔河、埃斐尔和克雷弗尔德工业区，运动虽然可能开展，但是有 6 个要塞和 3 个经常有防军驻守的城市把这个地区包围住了。与此相反，莱茵河右岸已经起义的各个地区，都是人烟稠密的辽阔地带，那里森林茂密、山峦重重，简直可以说是专门为进行起义战争而创造的一个环境。

这样，支援起义地区只可能有一个办法：

首先，在要塞和驻有防军的城市中，应该避免任何无益的发动；在莱茵河左岸的小城市、工厂区和乡村中，应当进行佯攻，以便使莱茵的驻防军保持着紧张的状态；

最后，应该把可以调动的力量投入莱茵河右岸的起义地区，使

起义更加扩大，并设法在这些地方通过后备军来建立革命军的核心。

普鲁士的初出茅庐的揭发专家们，请不要因为我在这里暴露了一个有关叛国行为的阴谋，而过早地高兴吧。遗憾的是，这里并不存在什么阴谋。上面提出的3点措施并不是阴谋计划，而是本文作者正在他为了促进第三点的实现而前往爱北斐特时所提出的普通建议。由于民主党与工人党组织的瓦解、由于大多数地方领导人（他们都出身于小资产阶级）的优柔寡断和过分小心、最后还由于时间不够，所以事情没有发展到进行密谋活动的地步。如果说，在莱茵河左岸到底还是发生了试图破坏的活动，如果说，在克姆彭、纽斯和附近的地方发生了骚动，在卜留姆以袭击方法夺取了军械库⁷⁸，那末，这些事件决不是按一个总计划安排的，而只不过是居民的革命本能所引起的。

其实，在起义区内的情形远不象莱茵省其他地方的人们所想象的那样。固然，爱北斐特这个城市，从它的街垒（虽然这些街垒构筑得极其紊乱和仓猝）从它那许多的岗哨和巡逻队以及其他的武装人员、从它那全体涌上街头的居民（只有大资产阶级没有出来）从它的红旗和三色旗⁷⁹来看，是的确不错的。但是，城里的其他方面却是一团糟。小资产阶级靠着从一开始就成立起来的安全委员会，抓到了运动中的领导权。可是在刚刚达到这一步以后，却又对它自己权力害怕起来，尽管它的这点权力是微不足道的。它所采取的的第一个步骤，就是要市参议会即大资产阶级来承认它的权力的合法性，而且为了答谢市参议会的这种盛情，还吸收了5名市参议员参加安全委员会的工作。使用这种方法巩固起来的安全委员会立刻就把所有危险工作摆脱掉了：它把外部的安全移交给

军事委员会去负责，自己只保留对军事委员会的监督权，以节制其行动。那些被本城之主亲手移置在法律基础上的战战兢兢的安全委员会里的小资产者们，用这种办法使自己和起义完全隔绝了之后，就可以仅限于安定一下人心，料理一下日常事务，调解一下“误会”，抚慰一下起义者，把事情高高地挂起来，并且借口必须先等待派到柏林和法兰克福的代表团的回音而阻止任何坚决果断的行动。其余的小资产阶级，当然也完全追随着安全委员会，到处号召保持安静，尽力阻止进一步采取任何防御措施和加强武装的行动，而且始终摇摆不定，不知应该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来参加起义。在这个阶级里面，只有为数很少的一部分人下定决心在城市遭到进攻时拿起武器来实行自卫，而绝大多数的人则努力使自己相信，只要威胁一下，就能把政府吓得不得不停止炮击爱北斐特并实行让步；在其他方面，这绝大多数的人也事事给自己留下一条退路以防患于万一。

在战斗开始后的最初一瞬间，大资产阶级象遭到五雷轰顶似的吓破了胆。在它那受惊的想象中呈现出一片烧杀抢掳，灾祸无边的景象。安全委员会（它的大部分委员是市参议员、律师、首席检察官以及有威望的人士）的成立，出乎意料地使大资产阶级的生命和财产有了保障，大资产阶级因而欢喜若狂。从前那些大骂卡尔·黑克尔、里奥泰、赫希斯特等这些先生们是嗜血成性的恐怖分子的大腹贾、染坊主和工厂主们，现在却成群结伙地蜂拥到市政厅去，象得了狂热病似的把那些被他们目为吸血鬼的人们拥抱来拥抱去，并掏出成干的塔勒摆在安全委员会的桌子上。不言而喻，当运动被镇压下去之后，这些狂热崇拜和拥护安全委员会的人，又不仅对运动本身而且也对安全委员会及其委员们开始散布种种最荒唐而卑

鄙的谎言 ,并且还以同样的狂热感情来感谢普鲁士人把他们从空前的恐怖主义之下拯救出来。象黑克尔先生、赫希斯特先生和首席检察官海茵茨曼先生等这些无辜的制宪派市民 ,又被他们描写成脸上写着与罗伯斯比尔、丹东同宗的恐怖分子和吃人生番了。从我们这方面说 ,我们有责任为上面所提到的那些正人君子们彻底洗清这种罪名。总之 ,大部分大资产阶级都想尽一切办法携家带着尽早地搬到杜塞尔多夫去 ,以便受到戒严令的保护 ,只有胆量较大的一小部分人留了下来 ,准备在任何情况下也要保卫自己的财产。在起义期间 ,市长躲在一辆四轮朝天的马车下 ,上面盖满了牲畜粪。在斗争的时刻团结一致的无产阶级 ,当安全委员会里面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刚一发生动摇时 ,也分裂了。手工业者、真正的工厂工人、部分丝织工人坚决地支持运动 ,然而正是这些组成无产阶级核心的工人们 ,却几乎是手无寸铁。如所有在劳动中需要体力多于技能的工人一样 ,身体好、挣得多、不开化因而情绪反动的染色工人 ,从最初的那些日子起就表现得十分冷淡。在街垒战的日子里 ,他们是所有产业工人当中唯一继续安静地工作的工人。最后 ,流氓无产阶级 ,同在任何地方一样 ,在运动的第二天就暴露出谁给钱就听谁使唤的习性 ;他们早晨向安全委员会要武器和薪饷 ,午饭以后却卖身于大资产阶级 ,为大资产阶级看家护院 ,到傍晚时候就去破坏街垒了。整个说来 ,流氓无产者是站在资产阶级方面的 ,因为资产阶级给他们的钱最多 ,他们就是拿着资产阶级的钱不亦乐乎地消磨运动结束以前的所有时光。

由于安全委员会怠惰和懦怯 ,军事委员会意见分歧(在这个委员会里面本来就是消极派占多数的) ,从开初就难以采取任何坚决果敢的行动。第二天反动便开始了。马上就可以看出 ,在爱北斐特 ,

只有打着帝国宪法的招牌、只有和小资产阶级实行调和,才可能指望有所成就。而这里的无产阶级,一方面不久前才刚刚从狂饮和敬神的泥坑中挣脱出来,因此连一点点关于无产阶级本身解放的观念都还未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另一方面,在本能上对资产阶级怀着深仇大恨,对于资产阶级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要求抱着十分淡漠的态度,因而不可能满腔热情地来捍卫这类三色旗的利益。结果,坚决行动派,即唯一认真地对待防御的那一派,就陷入了不妙的境地。他们宣布:拥护帝国宪法。但是小资产阶级不信任他们,在人民面前对他们百般地加以诽谤,阻碍他们在加强武装和巩固城防方面的一切措施的执行。任何一道真正能够加强城市防卫力量的命令,只要碰到安全委员会的任何一个委员,就会立刻被取消。任何一个胆小的庸人,如果发现自己的门前在构筑街垒,他就会立刻跑到市政厅去弄一道取消命令来。守在街垒上的工人们应领的饷金(他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了不致饿死所最必需的起码数目而已),只有经过一番周折,安全委员会才肯发给,而且数目少得可怜。战士们的薪饷和给养都不按时发放,并且还常常少发。在五、六天的期间内,对服役人员没有检阅或集合过一次,以致没有人晓得,在需要的时候,究竟可以出动多少兵力。仅仅到了第五天的时候才试图给战士们编队,然而这一次编队搞得不成功,编队时连现有的战斗力量究竟有多少都还完全没弄清楚。安全委员会的每一个委员都是自作主张。所颁布的命令彼此极为矛盾,所有的命令几乎只有一点是彼此相同,即粗心和紊乱越来越厉害,因而无法采取任何强有力的步骤。所有这一切都彻底打消了无产阶级参加运动的兴头,只用了几天的工夫,大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就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尽可能使工人消极冷淡起来。

当我在 5 月 11 日到达爱北斐特的时候 ,那里至少有 2500—3000 名战士。但是他们之中可靠的只有外埠来的增援部队和为数不多的爱北斐特的武装工人。后备军是动摇的 ,其中大部分人因想到会被判处苦役而感到惊恐万状。起初 ,这样的人并不太多 ,但是他们的人数由于从其他部队流入一些不坚定的和胆小怕事的分子而日益增多起来。最后 ,在这里从一开始就反动的和专为镇压工人而组织起来的市民自卫团 ,宣布保持中立 ,他们只有一个愿望 :保卫自己的财产。但这一切都只是过了几天以后才发现的 ;当时由于运动停止发展 ,外埠增援部队和工人有一部分走散了 ,真正的战斗力量日益减少了 ,而市民自卫团却日益统一起来了 ,他们越来越公开地表现了自己的反动意图。在最后的几个晚上 ,他们竟毁掉了几座街垒。武装的增援部队起初毫无问题在 1000 人以上 ,可是到 5 月 12 日、13 日就已经少了一半 ,最后 ,当宣布总集结令的时候才发现 ,能够指靠的全部武装力量 ,充其量也不过有 700—800 人。后备军和市民自卫团都拒不参加这次的集结。

这还不算 ! 起义的爱北斐特的四周全都是所谓“中立的”居民点。巴门、克罗年堡、连涅浦、吕特林豪森等地方都没有加入运动。这些地方的革命工人当中那些持有武器的都到爱北斐特去了。市民自卫团(所有这些地方的市民自卫团都纯粹是工厂主手中用以压制工人的工具 ,而且是由工厂主、工厂监工和完全依赖工厂主的小铺老板组成的)为了“秩序”和工厂主的利益而统治了所有这些居民点。至于工人们本身 ,他们由于极其分散地住在各乡镇 ,所以与政治运动发生了隔阂 ,而且在为人所熟悉的那些强制措施和关于爱北斐特运动性质的诽谤性报道的影响之下 ,有部分的工人站到工厂主方面去了 ;这些诽谤性的报道也不断影响了农民。况且 ,

运动的发生正是在 15 个月的经济危机之后,这时工厂主终于重新获得了许多订货,而大家知道,对于有活干的工人是休想讲革命的,这种情况也在爱北斐特发生了强烈的影响。不言而喻,在这样一些情况之下,“中立的”邻居只不过是隐蔽的敌人而已。

不但如此,而且和其余的起义地区的联系也完全没有建立起来!偶尔有一些个别的人来自哈根;伊塞隆方面的消息几乎一点也不知道。有些人自告奋勇愿做联络特使,但是没有一个人可以信赖。据说,爱北斐特和哈根之间的许多信差在巴门和它附近的地方被市民自卫团扣留了。唯一有联系的地方是佐林根,而那里的情况也与爱北斐特完全一样。佐林根的工人虽然向爱北斐特派遣了 400—500 名战士,但他们的组织性仍然很好,意志仍然很坚定,因此完全能够在本市抵抗资产阶级和市民自卫团,不然的话那里的情況可能更糟糕。如果爱北斐特的工人也象佐林根的工人那样先进,那样有组织的话,那完全可能获得成功。

情况既已如此,那就只有一个办法:必须采取一些迅速而坚决的措施使运动重新蓬勃发展起来,使运动获得新的战斗力量,使运动的内部敌人瘫痪下来,在整个贝尔格-马尔克工业区组织尽可能强而有力的运动。第一步就应该解除爱北斐特市民自卫团的武装,把他们的武器分发给工人,然后强制课以赋税作为这样武装起来的工人的给养。这一步骤将意味着坚决彻底抛弃安全委员会先前那种消极怠惰的态度,使无产阶级获得新的力量并且瘫痪“中立”区的反抗力量。而第二步措施的任务是从这些“中立”区内也设法弄到武器,继续扩大起义并有计划地组织整个地区的防御;能否采取这第二步措施要看第一步是否成功。其实,只要有安全委员会的命令并且能够支配哪怕仅仅 400 名佐林根的工人,

就可以在刹那间解除爱北斐特市民自卫团的武装。后者的勇气是不值得一谈的。

为了保证还在牢狱中的爱北斐特五月事件参加者的安全，我认为有责任申明，所有这种建议都完全是由我个人单独提出来的。从安全委员会经费刚开始支绌起，我便主张解除市民自卫团的武装。

但是，可尊敬的安全委员会却根本无意采取这种“恐怖措施”。我所做的，或者毋宁说是我和部队的某些指挥官（他们全都幸运地脱离了险境，有一部分人现在侨居美洲）共同自作主张而做出的唯一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夺取了克罗年堡市民自卫团存放在当地市政厅大厦里的约 80 支步枪。这些步枪分发得极其轻率，大部分都落入好酒贪杯的流氓无产者之手，他们在当天晚上便把这些枪枝卖给了资产阶级。那些资产者先生们派人四出到民众中去，以相当高的价钱尽量地收买枪枝。这样，爱北斐特的流氓无产者就把几百支因临时政府的疏忽和糊涂而落入他们之手的步枪卖给了资产阶级。而资产阶级就用这些枪枝武装了工厂的监工和忠于资产阶级的染色工人等等，而“心地善良的”市民自卫团的队伍也就一天天地加强起来了。

安全委员会的先生们对于改善城市防御的任何建议所给予的回答是，所有这一切全不需要，普鲁士人没有到这里来的胆量，他们不敢进入山地等等。他们自己很明白：这是在散播最荒唐的无稽之谈，从四周的高地甚至用野战炮也能轰击到这个城市，稍微象个样子的防御也是没有的，在起义停止发展而普鲁士人又拥有巨大的优势力量的条件下，只有发生某种极为特殊的事件才可能挽救爱北斐特的起义。

其实，普鲁士的将领们，看来也不特别愿意向几乎是人生地不熟的地方大举进军，至少在还没有集结起真正压倒优势的战斗力的时候是这样的。爱北斐特、哈根、伊塞隆和佐林根这4个不设防的城市竟使那些小心翼翼的战争英雄们敬畏到了这样厉害的程度，以至他们下令从威塞尔、威斯特伐里亚和东部的几个省份调集了一支配备有大量骑兵和炮兵的两万人的大军，其中有一部分是乘火车来的；这支军队不敢贸然进攻，却在鲁尔境外完全按照军事学的原则进行战略布署。最高司令部和总参谋部、右翼、中央——一切都在这里布置得井井有条，好象它们面临的是一支非常强大的敌军，好象是要同贝姆、邓宾斯基打仗，而不是同几百个既没有组织、装备恶劣，又几乎无人领导、被给他们以武器的人暗地出卖了的工人进行一场众寡悬殊的战争！

大家都知道起义的结局是怎样的。大家都知道，工人们讨厌了小资产阶级的一贯拖拉、三心二意、胆小怕事以及消极怠惰的背叛行为，最后离开了爱北斐特，投奔帝国宪法能够给他们以某种保障的其他德国地方去了。大家都知道，他们曾经遭到普鲁士枪骑兵和被唆使来反对他们的农民的多么凶恶的追击。大家都知道，他们刚一离开，大资产阶级马上又爬了出来，命人拆除街垒，并搭起了凯旋门以便迎接将要到来的普鲁士英雄们。大家都知道，哈根和佐林根由于资产阶级的直接背叛而落入了普鲁士人之手，只有伊塞隆和第二十四团这些已经满载战利品的德勒斯顿的征服者们还坚持了两个多小时的力量悬殊的战斗。

有一部分爱北斐特、佐林根和缪尔海姆的工人到达了普法尔茨。他们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同乡，后者都是在袭击了卜留姆的军械库之后到这里来的。他们和同乡们一起在维利希的志愿军团

中建立了一个连，这个连几乎完全是由莱茵省人组成的。凡是他们的战友都可以证明：他们无论在哪里打仗，都表现得非常英勇，尤其是在牟尔克城的最后一次决战中，更是英勇过人。

爱北斐特的起义之所以值得比较详尽地阐明一下，就是因为在 这里，各个不同阶级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的立场，表现得最为鲜明、最为彻底。贝尔格-马尔克区其他城市中的运动和爱北斐特的运动完全一模一样，而不同的地方就是在那些城市里各个阶级参加或是不参加运动并不那样明显，因为在那些地方，各个阶级本身就并不象在这个区的工业中心那样相互间区分得非常明显。在普法尔茨和巴登几乎完全没有集中的大工业以及随之而产生的成熟的大资产阶级，阶级的关系较为隐晦，具有比较平和的和宗法的性质，所以体现这次运动的各个阶级之间的交错关系更加复杂。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一点，同时也会看到，在那里，所有这些参加起义的分子最终也都聚集在作为整个光荣的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核心的小资产阶级周围。

去年 5 月间莱茵普鲁士起义的尝试清楚地说明，在革命运动中德国的这个地方能够占据一个怎样的地位。在莱茵普鲁士，周围有 7 个要塞，其中有 3 个是德国第一流的要塞，经常驻有几乎 $\frac{1}{3}$ 的普鲁士军队。它的铁路四通八达，有一支运输船队归军事当局调配；在这样的条件下，莱茵的起义只有遭到某种完全特殊的情况才有成功的机会。只有要塞掌握在人民的手里，莱茵省的居民才能够以武力取得某些成就。但这样的事情只有遇到军事当局被某些外部的重大事件吓昏头脑或者军队整个地或部分地加入了运动的情况下，才会发生。在其他任何情况下，莱茵省的起义都注定要遭到失败。如果巴登的队伍向法兰克福迅速推进，普法尔茨的队伍向特利

尔迅速推进的话,那就很可能使得起义马上在摩塞尔河与埃斐尔、在拿骚、在黑森的两个公国中爆发起来,使得当时还是可靠的中莱茵各邦的军队加入运动。如果这样的话,毫无疑问,莱茵的所有的军队,特别是整个第七和第八炮兵旅,也都会学他们的榜样,或者至少是非常明显地表示出自己的情绪来,弄得普鲁士的将领们束手无策。也很可能有几个要塞会转到人民手中来,这样,即使不是爱北斐特,那无论如何也会是莱茵河左岸的大部地区会得到挽救。所有这些,也许还远不止于这些,都因为绝顶聪明的巴登委员会实行了拙劣的、小市民式的、前怕狼后怕虎的政策而终成泡影。

随着莱茵工人的失败,被工人们认为唯一能公开而坚决地捍卫他们的利益的报纸——“新莱茵报”也倒闭了。总编辑虽然也是莱茵普鲁士当地的人,但却被逐出普鲁士去了;其他的编辑们也都受到或者监禁或者马上被流放的威胁。科伦的警察极其坦率地宣布要这样对付他们,而且极其具体地指出,它掌握了每个人的足够的罪证,所以有的是办法来处治他们。这样一来,报纸恰恰在销售量空前迅速增长、收入有余的时候却不得不停止发行。编辑们都分散到德国各个已经起义的或就要起义的地方去了;有些人到了事态又要发生转折点的巴黎⁸⁰。这些编辑们在今年夏天的革命运动期间或者在运动以后,没有一个人能免于被捕或流放;因此,也就没有一个人能逃过科伦警察殷勤地为他们安排好了的命运。有一部分排字工人跑到普法尔茨,加入了军队。

莱茵的起义同样是必然得到悲惨的结局。莱茵省^{3/4}的地区宣布了戒严,数以百计的人被投入监狱,随后有3个袭击卜留姆军械库的参与者被枪决,起义就此告终,其时适逢霍亨索伦王朝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诞辰的前夕。Vævictis〔惨哉败者〕!

二 卡尔斯卢厄

巴登的起义是在最有利的、只能进行暴动的条件下发动起来的。全体人民一致痛恨政府所进行的背信弃义、笑里藏刀、凶残狠毒的政治迫害。反动的阶级即贵族、官僚和大资产阶级是人数不多的阶级。在巴登，大资产阶级可以说才刚刚处于萌芽状态。除开这些人数不多的贵族、官吏和资产者，除开那些仰仗宫廷和外国富翁过活的卡尔斯卢厄和巴登-巴登的小铺老板，再除开海得尔堡的一些教授和卡尔斯卢厄郊区的几个村庄以外，整个这个地区都同心同德地站在运动的方面。在别的起义中都必须把军队打败，可是这里的军队却站在运动的最前列，甚至把运动进行得超过了奥芬堡会议⁸¹的资产阶级领导者们的愿望，因为这里的军队受贵族军官的欺压比任何其他地方都更厉害，其次，民主党派已经对他们进行了一年的教育工作，不久前又由于实行了一种普遍兵役制而使得军队里面的叛乱者更增多了。正是军队在拉施塔特和卡尔斯卢厄把“运动”变成了起义。

因此，武装起义的政府在一开始执行自己职务的时候，就得到了现成的军队、充足的军械库、组织完备的国家机器、充实的国库以及几乎是万众一心的居民。其次，这时正逢莱茵河左岸普法尔茨的起义已经展开，正好给自己的左翼作了掩护；在莱茵普鲁士，起义固然是受到了严重的威胁，但尚未彻底败北；在维尔腾堡、在法兰克尼亚、在黑森的两个公国和在拿骚，甚至连军队

里面也都普遍地流露出昂然激奋之情，只要在这些军队里面点起星星之火，便可以使巴登的起义在整个德国南部和德国中部重演。这样就将会有不下于 5—6 万的正规军掌握到起义者的手里。

在这种条件下，应该怎么办，是十分简单十分清楚的，所以现在当起义被镇压之后，每个人都懂得了这一点，并且都肯定地说自己从一开始就谈到了这一点。那时应该即刻把起义急速扩展到黑森-达姆森塔德、法兰克福、拿骚和维尔腾堡。应该立刻从现有的正规军中征集 8000—10000 人（利用铁路，这件事两天以内就可以做到），把他们派到法兰克福去“捍卫国民议会”。起义所取得的一个紧接一个的胜利简直使失魂丧胆的黑森政府陷入了瘫痪的状态；它的军队显然是同情巴登人的；它也象法兰克福参议会⁸²一样不能进行任何反抗。驻守在法兰克福的库尔黑森、维尔腾堡和达姆斯塔德的军队是站在运动方面的；在那里的普鲁士人（大部分是莱茵省出生的人）发生了动摇，奥地利人则为数不多。巴登人的到来（不管是否有人企图反抗他们），必然会把起义的旗帜带到黑森的两公国的中心和拿骚去，必然会使普鲁士人和奥地利人撤退到美因兹去，必然会使德国的软弱无能的所谓国民议会在起义军民面前感到肉跳心惊。在这以后，如果在摩塞尔河、埃斐尔、维尔腾堡和法兰克福起义还是没有马上爆发，那还可以有很多其他方法把起义扩展到这些省份里去。

其次，应该把起义的力量集中起来，为起义提供必要的资金，通过立即废除全部封建义务来使绝大多数的农业居民愿意参加起义。设立一个总的军事和财政的集中管理机构，使这个机构有权发行纸币，并首先在巴登和普法尔茨发行，有权在巴登以及起义军所占领的一切地区废除全部封建义务。所有这一切，都足以使

起义更加百倍地强大起来。

但是，这一切应该在最初的时刻就火速地全都做到，唯有快才能保证胜利。在巴登委员会成立一个星期以后就太晚了。莱茵的起义已经被镇压下去了，维尔腾堡和黑森没有起来战斗；军队本来情绪昂扬，对起义很有利，但这时已经是靠不住了，他们终于重新完全服从于自己的反动军官的势力。起义已丧失了全德的性质，而变为纯巴登的或巴登-普法尔茨的地方性的起义。

我在斗争结束以后才知道，前巴登军少尉弗·济格尔（他在起义期间，起初是“上校”，继而又是“总司令”，他博得了一点是好是坏有些难讲的小小声誉）从一开始便向巴登委员会提出了一个转入进攻的计划。这个计划的长处在于它包含着这样一种正确的思想，即在一一切条件下都必须进攻；但从其他方面来讲，这个计划却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最冒险的计划。济格尔想率领一个巴登的军团首先向霍亨索伦挺进，在那里宣布建立霍亨索伦共和国，继而占领斯图加特，并且在维尔腾堡把起义发动起来以后，再由斯图加特推进到纽伦堡去，最后在也己掀起起义的法兰克尼亚的心脏安下大本营。我们可以看出，这个计划完全忽略了法兰克福在士气方面的作用，只有拿下了法兰克福才能使起义具有全德的性质，同时才能使美因河沿线在战略上起重要作用。我们还可以看出，这个计划的前提是，应当具备的战斗力量完全不是实际上可能有的战斗力量；它并未打中要害，而且最后——在一次完全可以称为唐·吉阿德式或席尔式的进军之后——必然会在黑森和拿骚的军队还没有转到起义者方面来因而建义者未能得到增援

巴登议会很早以前就批准发行 200 万纸币，但是连一个钱也还没有用掉。——恩格斯原注

以前，使得南德军队中最强悍、唯一坚决敌视起义的军队即巴伐利亚军能够立即出来对付起义者。

新政府借口几乎全体士兵都已解散回家而根本不同意发动任何的进攻。先不说这只是不多的个别部队，特别是近卫团里的情况，就连那些曾解散回家的士兵们过了3天以后，也几乎全部又回到自己的部队里来了。

不过，政府还有其他一些完全不同的理由来反对发动任何进攻。

领导整个巴登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是布伦坦诺先生；在这位律师的身上具有几分德意志小邦群众活动家所免不掉的一些抱负不算大的虚荣心和表面上的坚强信念（这在南德一般地是博得任何声望的首要条件），并且还兼有一些外交家的狡诈，凭着这点狡诈，大概除开唯一的一个人以外，他足以能够把周围的一切人完全制服。布伦坦诺先生——这现在已经不值得一提了，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党（巴登最强大的党）在奥芬堡会议上所获得的成绩只不过是改变了大公的政策而已，而这样的改变只有由布伦坦诺祖国执政才可能做到。大公的回答和普遍的激愤在拉施塔特的军队中引起了起义，而这是违背布伦坦诺的意志和愿望的。在布伦坦诺先生被抬上巴登委员会领袖地位的时候，他已经被运动抛在后面，因而已经不得不想法子把运动拖住。于是乎就发生了卡尔斯卢厄事件；大公逃之夭夭了，而这些使布伦坦诺先生成为政府首脑并且可以说是给予他独裁大权的形势，却打乱了他的全部计划，使得他竟不得不用自己的权力来反对给予他以这种权力的运动。当人民为大公的逃窜而雀跃欢呼的时候，布伦坦诺先生和矢忠于他的巴登委员会却象热锅上的蚂蚁似的坐

卧不安。

这个委员会几乎全部是由信念异常坚定而头脑却异常糊涂的巴登庸人所组成的，亦即由那些生怕宣布建立共和国并且看到任何一点点果断的措施就哀告上帝的“纯粹共和主义分子”所组成的；这个地道的庸夫俗子的委员会，当然完全在布伦坦诺的掌握之下。律师赫希斯特在爱北斐特所扮演过的那一角色，在这里是由律师布伦坦诺扮演的，而且活动范围更扩大了一些。至于说布林德、菲克勒尔和司徒卢威这3个从狱里释放出来而进入巴登委员会的外人，布林德深深陷入了布伦坦诺的阴谋诡计的圈套，以致孤掌难鸣，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被赶到巴黎去当个巴登的代表；菲克勒尔被指定到斯图加特去执行一种危险的任务；至于司徒卢威，布伦坦诺先生则认为他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因而也就放心地容他留在巴登委员会里面，不过时时监视着他，尽力不使他成为一个声望孚众的人物，这一点，布伦坦诺先生也是完全做到了的。大家知道，司徒卢威和其他的人一起建立了“坚决（或者毋宁说是稳步）前进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经过一次失败的发动以后，便被解散了⁸³。过了几天，司徒卢威多少是以“亡命者”的身分出现在普法尔茨，并准备在那里重新出版他的刊物“德国旁观者”。但是，样本才刚刚出来，普鲁士人就来到了。

巴登委员会（从最初起它就纯粹是布伦坦诺手里的工具）选出了一个执行委员会，而这个委员会的首脑仍然是布伦坦诺。不久，这个执行委员会几乎完全暗中顶替了巴登委员会，它至多把预算和已实施的措施交给巴登委员会去批准，并且还把它的一些多少有点靠不住的成员打发走，分派到各区或军队里去担负各种各样的次要工作。最后，执行委员会完全撤销了巴登委员会，而

用在布伦坦诺一手包办下选出来的“制宪议会”代替了它，而执行委员会本身则摇身一变成了“临时政府”，不用说这个政府的头儿自然又是布伦坦诺先生。他于是任命了各部的部长。他所任命的都是象弗洛里安·默尔德斯和迈尔霍弗这类的部长！

布伦坦诺先生是个十足的巴登小资产阶级的代表。他不同于小资产者群众和他们的其他代表人物的地方只在于：他的眼光看得太远了，所以没有他们那许多幻想。布伦坦诺先生最初一开始就出卖了巴登的起义，因为他最初一开始就比巴登的任何一个官方人物都更清楚地了解情况；他采取的那些措施就是为了保证小资产阶级的统治，也正因为如此，这些措施必然把整个起义全部断送。当时布伦坦诺的声望大得无边，而在7月以后又受到他从前的崇拜者的辱骂，其秘密都在于此。巴登的小资产者大多数是同布伦坦诺一模一样的叛徒，但他们同时又是受骗者，而对于布伦坦诺却不能这样说。小资产者的背叛是因为懦弱，他们的受骗是因为愚蠢。

巴登也象整个的南德一样，几乎没有大资产阶级。巴登的工业和商业是微不足道的。因此这里只有很少数的、很分散的、不大成熟的无产阶级。居民中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农民中的大多数）、小资产者和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即那些分散在小城市里的城市工人（当时还没有一个能够产生独立的工人政党的大中心城市），现在，或者至少到现在为止是处在占绝对优势的小资产阶级的社会影响和政治影响之下的。至于农民，他们更是分散在全国各地，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加之他们的利益又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有些是一致的，有些可以说是相似的，因此他们同样也处于小资产阶级的政治庇护之下。所以，以律师、医生、教员、个别商人和书商为代表

的小资产阶级,自从 1848 年 3 月起,一方面是直接地,另一方面是通过自己的代表控制了巴登的整个的政治运动。

在巴登其实从来就没有过社会主义的宣传鼓动,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正是在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不存在着对立,因而小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占居了优势。外来的社会主义思想的苗头,无论是由比较发达的国家回国的工人带进来的还是由于受法国或德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文献的影响而产生的,在巴登还不能够为自己开拓一条道路。红色的飘带和红色的旗子在巴登只不过意味着资产阶级共和国,至多夹杂着一点恐怖主义,而司徒卢威先生所发现的“人类六大祸害”⁸⁴,尽管在资产阶级看来是无可指责的,然而这在能引起群众反响的东西当中已经是最厉害的了。巴登的小资产者和农民的最高理想,从来就是一个不大的、从 1830 年起存在于瑞士的那种资产阶级—农民共和国。渺小的、清心寡欲的人们有其小小的活动场所;以范围略加扩大了市镇,即“州”组成一个国家;工业规模小、停滞不动,其基础是手工劳动,因而使社会状况也就同样停滞不动和萎靡不振;贫富悬殊不大,到处全是小康和中等状况;没有君主,没有皇室费,没有常备军,没有多少赋税,没有积极干预历史的活动,没有外交——只有地方上的琐碎的街谈巷议和 en famille [家庭的] 小小纠纷等这类的内政;没有大工业,没有铁路,没有世界贸易,没有百万富翁和无产者之间的社会冲突,但是却有着一种充满虔诚笃信和君子之风的幽静而舒适的生活,适应于知足常乐的人们要求不高的生活,在历史上无声无嗅的生活,这就是存在于瑞士大部地区的、也是巴登小资产者和农民久已梦想建立的幽静的世外桃源。假若,巴登的或者说南德的小资产者,在热情奋发到最大限度的时刻,

脑子里竟然产生了关于整个德国的概念，那末，在他们的幻想中所呈现出来的未来的理想的德国就是一个规模较大的瑞士，也就是一个联邦共和国。例如，司徒卢威先生在自己的一本小册子⁸⁵里面就已经把德国划分为24个州，有同样数目的州长和大大小小的议会，并且甚至在小册子后面还附上一幅已经划分就绪的地图。假若德国真有一天变成了这样的世外桃源，那就会使它降低到甚至在它最可耻的时代都想象不出的低级阶段。

其实，南德的小资产者已不止一次地亲身体会到：即使革命是在他们自己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的旗帜下发生的，也会很轻而易举地把他们所心爱的幽静的世外桃源卷入大规模的冲突和真正的阶级斗争的漩涡中去。因此，小资产阶级不仅在一切的革命动荡面前惶惶不安，甚至在他们自己的烟草啤酒的联邦共和国的理想面前也竟然胆战心惊。因此，他们一心向往帝国宪法，认为这部宪法至少可以满足他们眼前的利益，而只赋予皇帝以中止权，同时还使他们在适当的时机以合法的手段实行共和制。因此，当巴登的军队未经邀请便往他们的餐桌上送来现成的起义时，他们就惊惶失措了，因此，他们也怕把起义扩展到未来的巴登州的范围以外去。要知道，这场火灾也可能在无意中蔓延到存在着大资产阶级和人数众多的无产阶级的那些地方，因此，在这些地方政权就可能转入无产阶级的手里，那时候，惨哉财产！

在这样的情况下，布伦坦诺先生究竟干了些什么事呢？

他在巴登替小资产阶级干了小资产阶级自己曾在莱茵普鲁士有意识做过的事：出卖了起义，然而却拯救了小资产阶级。

布伦坦诺出卖运动，绝不象后来终于失望了的巴登小资产者所想的那样，是在他采取最后的行动的时候，是在牟尔克河失败以

后逃跑的时候,而是一开始就把运动出卖了。运动之所以被出卖给了普鲁士人,正是由于那些最受巴登的小市民以及和他们在一起的部分农民甚至部分手工业者所赞不绝口的措施所造成的。布伦坦诺也正是由于自己的变节,才成了一个有声望的人物,才激起了小市民们的那种狂热,从而使他们紧紧地依附自己。小资产者只看到迅速恢复起来的秩序和宁静,只看到运动本身的短时期的停滞,而并没有发觉运动被出卖了;后来他们看出,他们因为参加运动而倒了霉,运动正走向毁灭,而他们自己也要和运动一起毁灭,这时他们才大嚷大叫被出卖了,而且象一个受了欺骗的笨人那样极为愤恨地痛斥自己最忠实的仆人,然而为时已经太晚了。

当然,布伦坦诺先生也是受了骗的。他希望参加这个运动能使他成为“温和的”党派的即小资产阶级的伟大人物,但他却不得不在夜色的掩护下背弃了自己的党,自己的好友(这些人突然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而可耻地开了小差。他甚至希望在大公那里能够弄到一个部长席位,他这种英明的打算所获得的嘉奖,是他受到了一切党派的拳打脚踢,永远丧失了扮演任何角色的可能性。当然,你可能比任何一个德意志的侏儒邦国的全体小资产者都会来得聪明些,但终归你可以看到,你的最美妙的希望幻灭了,而你的最崇高的意向也被玷污了!

布伦坦诺先生自他执政的第一天起,就尽力把运动限制在小市民的范围以内,使运动几乎未曾想越过这个范围。布伦坦诺在矢忠于大公的卡尔斯卢厄的市民自卫团(就是那个还在几天以前和起义者厮杀的市民自卫团)的护卫下,进入了等级代表议会大厦⁸⁶,以便从这里来制止运动。使逃兵归队的工作进行得极其缓慢,改编各个营的工作也进行得不怎么快。但是,解除了武装的

曼海姆的小市民却武装得倒不慢，然而，大家都知道，他们这些人都不想打仗，并且在瓦格霍伊泽尔附近一战之后，甚至大部分人加入了曾背叛曼海姆的龙骑兵团。至于向法兰克福或斯图加特进军，至于把起义扩大到拿骚或者黑森，甚至连提都不用提了。刚一提出类似的建议，就会象济格格的建议一样马上遭到拒绝。发行纸币的建议会被认为是国事犯，被认为是共产主义的议案。从普法尔茨派来的信使络绎不绝；他们报告说，普法尔茨没有武器，没有步枪，更不用说大炮了，并且也没有弹药，并且说，为了扩大起义，尤其是为了占领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两要塞所必需的一切东西，那里都需要；但从布伦坦诺先生那里什么都不能得到。普法尔茨建议马上就建立军事总司令部，甚至把两个区联合起来受一个统一政府的管辖。但是所有这些办法都由于拖延、阻挠而不能实现。据我所知，普法尔茨唯一得到的东西，就是数目不多的金钱的支持；后来，已经是很迟了的时候，才送来了8门大炮和不多的弹药，但没有炮手和驾具，最后，才奉梅洛斯拉夫斯基的直达命令，开了一个巴登的步兵营和两门臼炮，如果我的记忆力不错的话，其中的一门炮只射过一发炮弹。

这种拖延和拒绝采取最必要措施（这些措施能够促进起义的开展）的行为，也就是出卖了整个的运动。在内部的问题上，也完全消极怠惰。关于废除封建义务的事情只字不提；布伦坦诺先生知道得很清楚，在农民里面，特别是在上巴登隐藏着的革命分子很多完全超出了他的心愿，因此，他必须在他们还没有更深地卷入运动之前，就很快地将他们制止住。新来的官员们大都是布伦坦诺的走狗，或者全都是些无能之辈；所有的旧军官们，除开那些在近年来的反动时期使自己丢尽脸面因而逃之夭夭的人们以

外，全都留任了原职，这就使得全体愿意宁静的市民们大为高兴。甚至连司徒卢威先生在5月的最后几天也认为赞扬一下“革命”是适宜的，因为一切都很风平浪静地过去了，几乎所有的官员都留任了原职。在其他方面，布伦坦诺先生和他的代理人也采取了如下的活动方针：尽可能使一切都转回到旧轨道上来，尽可能减少混乱和骚动，并且使国家尽快地失去自己的革命的面貌。

在军事机构中也盛行着这种因循守旧的作法：人们只干那些不能不做的事情。军队没有指挥官，没有训练，也没有秩序；无能的“陆军大臣”艾希费特以及他的继任人叛徒迈尔霍弗甚至连象点样的军队的配置也不会。军用列车毫无目的地、毫无意义地在铁路上开来开去。各步兵营今天调到这个方向，明天又调到那个方向，谁也不知道为什么这样作。警备队的士兵因为没有事干成天进出于小饭馆。显然，这是存心使他们的精神颓丧，政府是想把他们尚存的最后一点军纪也消灭干净。对于第一批征集的所谓的人民自卫团即凡是能手执武器而年龄未逾80的男子的组织工作，是委任著名的约翰·菲利浦·贝克尔去进行的。贝克尔是一个瑞士籍的公民和瑞士军的军官。我不知道，布伦坦诺对于贝克尔在执行他的使命时施加的阻力究竟有多大。但是我知道，在普法尔茨的军队撤退到巴登地区以后，当不能再拒绝这些衣着褴褛装备很坏的普法尔茨部队的坚决要求的时候，布伦坦诺为了推卸责任说了下面的一段话：“要依着我，他们要什么就给什么，但是大公回来的时候，至少要让他知道，谁把他的积蓄都挥霍光了！”因此，要是说巴登的人民自卫团一部分表现很坏，而一部分毫无组织，那末在这里，主要的罪过无疑地应由布伦坦诺和个别地区中他的那些心怀恶意的或庸碌无能的官员们来承担。

马克思和我在“新莱茵报”被迫停刊以后，最初踏上巴登的领土是在5月20日或21日，也就是在大公出走后的一个多礼拜，当时在边防上的，或者确切些说，没有边防的这种极端的疏忽大意使我们惊奇不已。从法兰克福到黑彭海姆的这条铁路全被维尔腾堡人和黑森人所组成的帝国军队所占领；甚至在法兰克福和达姆斯塔德也布满了军队；所有的车站，所有的居民点都被强大的部队所占据；有秩序的岗哨一直伸展到国境线上。可是，从国境到魏茵海姆连一个人也看不到；在魏茵海姆也是这样。唯一的预防措施，就是拆毁黑彭海姆和魏茵海姆之间的大部分铁路线。只是在我们来到魏茵海姆期间，才开来了一支不大的不满25人的近卫团部队。在魏茵海姆和曼海姆之间又是一片天下太平的景象。最多这里或那里出现一些个别的微带醉意的人民自卫团，他们倒有些象掉队的士兵，或者象逃兵。自然，什么国境上的检查也就更谈不上了。可以在任何方向随意地越过国境。

在曼海姆，不管怎样，整个看来还有点象军事时期的样子。一伙一伙的士兵站在街上，或坐在小饭店里；人民自卫团和市民自卫团在操场上进行操练，当然大部分人很不熟练，而教官也很糟糕。在市政厅里，有许多的委员会、新旧军官、穿军装和短衫的人们在开会。人民和士兵、志愿兵混在一起。他们在狂饮，欢笑，彼此十分体贴。但是转眼便可看出，最初的热潮已经过去了，许多人感到大失所望。士兵们心怀不满；他们说，我们举行了起义，而现在事情该轮到应该担任领导的非军事人员了。可是他们却一直拖拖拉拉，因而把事情弄坏了。士兵们对自己的新来的军官们也不大满意；新军官和大公的旧军官的关系不好，虽然，旧军官每天都有几名在开小差，但许多人在当时还是在服役；他们都迫

不得已地陷入了悲惨的境遇里，而不知道怎样自拔。终于怨声四起，大家都抱怨缺少一个刚毅而干练的领导。

在莱茵河的另一岸，在路易港，运动在我们看来要好得多。在当时，在曼海姆许多青年显然是第一批征集的，他们好象没发生过什么事情似的，还在安然地干自己的事，但在路易港所有的人却都武装起来了。诚然，后来发现，在普法尔茨也并非到处都是如此。在路易港，在志愿兵和士兵之间是完全相外无间的。在小饭店里（在这里当然也是挤得满满的），“马赛曲”和其他诸如此类的歌声却不绝于耳。在这里，没有谁在诉苦，也没有谁在抱怨，大家都在欢笑，都把自己的灵魂和肉体贡献给了运动，在那时，他们（特别是步枪手和志愿兵们）还完全情有可原地和天真无邪地幻想自己的力量所向无敌。

在卡尔斯卢厄，运动具有更加庄严的形式。这里已经指定在下午一时在“巴黎”旅馆举行宴会，但是宴会一直等到“巴登委员会的先生们”莅临时才开始。类似这样一些引人注意的细微的迹象，就已经使运动具有令人愉快的官僚气派了。

我们曾经对巴登委员会的各位先生们谈过在前面提到他一个看法，这就是从一开始就必须向法兰克福挺进，使起义继续扩大，现在，再来这样做想必是太迟了，如果在匈牙利没有坚强有力的打击，或者在巴黎没有新的革命，那末整个运动就没有希望了。很难想象，诸如此类的异端邪说究竟在这些巴登委员会的市民中间引起了怎样的愤怒。只有布林德和戈克才站在我们的方面。现在，当事件已经表明我们是正确的时候，那些先生们当然也要断言，仿佛从一开始他们也是坚持进攻的。

在卡尔斯卢厄，当时已经看出大规模争权夺位的端倪，这种

争权夺位的行动在“集中德国的全部民主力量”这个大名目下被吹嘘成拯救祖国的行动。任何一个人只要在某个时候，某个俱乐部里多多少少糊里糊涂地发表过一次演说，或是在某一张偏僻地方的民主小报上号召过人们憎恨暴君，他都要急忙奔向卡尔斯卢厄或凯则尔斯劳顿来，以便在那里马上变成一个伟人。用不着特别强调指出，在这里作出来的事情是完全与集中起来的那些力量相符合的。例如，在卡尔斯卢厄就有一位著名的所谓的哲学家阿塔·特洛尔⁸⁷，是法兰克福议会的前任议员，是以前尽管有我们这位阿塔·特洛尔的百般献媚但仍不免被曼托伊费尔查封了的所谓的民主小报的总编辑。这位阿塔·特洛尔费了很大的心思弄到了一个巴登驻巴黎大使的小职位，他认为自己特别有资格担任此职，其原因就是在过去他在巴黎住了两年，但却没有学会法语。他的确很幸运，得到了布伦坦诺先生的国书，但是，当他把行装已经收拾妥当的时候，布伦坦诺却突然派人来叫他，最后可以说是直接从他的口袋里拿走了国书。不言而喻，阿塔·特洛尔这时为了刁难布伦坦诺先生，便故意跑到巴黎去了。另外一个有坚定信仰的公民——海因岑先生也在卡尔斯卢厄，这位公民几年来一直用革命化和共和化来威胁德国。大家知道，在二月革命以前，这位可尊敬的活动家随时随地都号召“战斗”，但是当革命爆发起来以后，他却认为最好是站在瑞士的中立的高山之巅来观察德国的各种起义。现在，他也终于乐意加入与“压迫者”战斗的行列了。如果根据他以前说的“科苏特是个伟人，但他却忘掉了雷永”这句话来下判断的话，预料他可能会马上组织起前所未有的、非常巨大的毁灭性的力量来对付普鲁士人。可是，事实并非如此！既然更远的计划看来已经无法实现，那末，我们这位憎恨暴君的人，

据说，也就仅限于建立一支精锐的共和部队，同时抽功夫给“卡尔斯卢厄日报”⁸⁸撰写几篇为布伦坦诺辩护的文章，时常到“坚决前进俱乐部”走一走。俱乐部被解散了，精锐的共和主义者并没有出现，最后海因岑先生发觉，甚至连他都不可能再为布伦坦诺先生的政策辩护了。这位未被公认的、谁都不需要的、备受凌辱的海因岑先生，连一个“压迫者”都没有打死就来到了下巴登，而后从这里又到了瑞士。现在，他正在对“压迫者”们进行报复：他住在伦敦，in effigie〔在想象中〕把他们成千成万地加以斩首。

我们第二天清晨离开了卡尔斯卢厄去访问普法尔茨。

关于巴登起义以后的进程，关于这次起义的一般政治领导和民事管理，我要说的也不多了。当布伦坦诺感到自己十分强大的时候，他一举而消灭了以“坚决前进俱乐部”为代表的恭顺的反对派。“制宪议会”是无条件地赞同布伦坦诺的全部措施的，因为议会的选举是在布伦坦诺的巨大声望的影响下，并且在支配一切的小资产阶级的影响下进行的。“握有专政政权的临时政府”（在虚构的国民公会下的专政！）整个地是处于他的领导之下的。他就是这样继续进行统治，阻挠起义的革命的和军事的发展，tant bien que mal〔马马虎虎地〕处理日常事务，热心地保护大公（他一直认为大公是他真正的合法君主）的储蓄和私人财产。他在“卡尔斯卢厄日报”上声明，大公随时都会回来，而城堡也的确一直都上着锁，好象里面的住户只不过是出外旅行去了似的。他每天都对普法尔茨派来的人许下一些不明确的诺言；而所能得到的最大收获是，建立在梅洛斯拉夫斯基领导下的军事总指挥部，签订关于废除曼海姆和路易港之间桥头税的条约，然而，这丝毫不妨碍布伦坦诺先生下令在曼海姆方面照旧征收这种关税。

最后，当梅洛斯拉夫斯基经过瓦格霍伊泽尔和乌布施塔特的战役而被迫带着他的剩余的军队越过高出跨过牟尔克河的时候，当不得不把卡尔斯卢厄和在那里的大量储备物资放弃的时候，当牟尔克河畔的失利决定了运动的命运的时候，巴登的市民、农民和士兵们的幻想于是都破灭了，他们都叫嚷说布伦坦诺干了叛卖的勾当。布伦坦诺靠小资产者的胆小、农民的不自立以及工人的不够集中而维持的全部威望，一下子就丧失净尽了。布伦坦诺由于他自己的“制宪议会”控告他犯了背叛人民的罪过，在茫茫夜色的掩盖下逃到了瑞士，藏身于苏黎世州的费尔塔连。

可以使人感到安慰的是，布伦坦诺先生因自己的叛卖行为而受到了足够的惩罚：他的政治地位完全毁灭了，他成了所有政党都鄙视的人。巴登的运动遭受到失败这件事情本身倒没有决定性的意义。巴黎的6月13日和戈尔盖的拒绝向维也纳挺进，即令当时有可能将运动推广到黑森、维尔腾堡和法兰克尼亚去，也使巴登和普法尔茨尚存的一切可能成功的机会丧失净尽。失败有可能更光荣些，但是无论如何也是不可避免的。然而，什么事情使革命的政党不能宽恕布伦坦诺先生和支持他的那些胆小如鼠的巴登的小资产者呢？这就是：在卡尔斯卢厄、夫赖堡和拉施塔特发生了屠杀，在拉施塔特囚室内因伤寒病而被普鲁士人悄悄地杀害了无数不知名的人，在这些罪行中，他们都有直接的责任。

我想在本刊第二期中叙述一下普法尔茨的局势，最后描写一下巴登-普法尔茨的运动。

三 普法尔茨

我们从卡尔斯卢厄出发到普法尔茨去，首先到了本来是德斯特尔先生和临时政府的所在地斯拜尔。但在那时，他们已经迁到了凯则尔斯劳顿，政府认为这个地方是“普法尔茨战略上最好的据点”，因而使那里成为最终的政府所在地。到了斯拜尔，我们没有见到他们，却见到了维利希和他的志愿兵。他和一支几百人的部队使得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 4000 多人的警备队处在紧张状态之中，切断了他们的供应，并千方百计地使得他们坐卧不安。在我们到达的那一天，他带领 80 名左右的步枪手攻打了盖尔曼尔斯海姆警备队的两个连，一枪没放就把他们赶回了要塞。第二天早晨，我们和维利希一齐出发到了凯则尔斯劳顿，在那里我们找到了德斯特尔、临时政府和整个德国民主派的精华。在这里，当然也谈不上什么正式参加对于我们党是完全陌生的这个运动。因此，过了几天，我们就回到了宾根；在路上我们和几个朋友因为有参加起义的嫌疑而被黑森的士兵逮捕；我们被押解到达姆斯塔德，而后被送往法兰克福，到了法兰克福才终于被释放。

在这以后不久，我们便离开了宾根，马克思受了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⁸⁹的委托前往将要发生决定性事件的巴黎；他应当代表德国的革命政党去会见法国的社会民主主义者⁹⁰。而我则返回凯则尔斯劳顿，想留在那里最初作一个普通的政治流亡者，以后如果有适当的时机和爆发了战争的话，或许在这个运动中占居

“新莱茵报”唯一能占居的地位——士兵的地位。

谁只要到普法尔茨去一次,他就会明白,在这个富产葡萄酒的美好地方,运动应该是十分令人欢喜的。人们终于摆脱了那些骑在他们脖子上的笨拙迂腐的爱喝啤酒的巴伐利亚旧官僚,指派了一些快活的喜爱普法尔茨葡萄酒的人来代替他们。人们终于从严厉的巴伐利亚警察制度的刁难中解脱出来。这种刁难行动曾经被那在其他方面极其庸俗的“飞行传单”⁹¹杂志非常有趣地嘲笑过,这种刁难行动比其他的任何东西都更厉害地折磨了爱好自由的普法尔茨居民。恢复小饭馆的自由是普法尔茨人民的第一个革命行动;整个普法尔茨变成了一个大大饭馆,在这6个星期当中“为了普法尔茨的人民”而饮的酒,数量简直难以计算。虽然在普法尔茨积极参加运动的人远不如巴登那样广泛,虽然在这里还有许多反动的地区,但是,全体居民在普遍地嗜好葡萄酒这点上来说是一致的,就连情绪最反动的小市民或农民也都迷恋于这种共同的乐趣。

要了解几个星期以后普鲁士军队会给这些喜气洋洋的普法尔茨居民带来多么不愉快的失望,并不需要什么特别的远见。而在普法尔茨,不沉湎于十分安宁的气氛的人,却是屈指可数的。只有极少数的人才相信普鲁士人可能到来,但是大家都深信,即使他们来了,也可以不费吹灰之力把他们打回去。的确,这里并没有那种由信念坚定所生产的忧郁(由于有这样的忧郁,在巴登人民自卫团的每个军官的前额上都写上了“严肃认真,人所固有”这样一句箴言,但是这并不能防止我下面就要谈到的那些十分惊人的事件的发生),在这里也没有象巴登的小市民性质的运动所赋予大多数参加者的那种庄严的美德。在普法尔茨,人们只是偶尔“严肃”过。在这里,“热情”与“严肃”只不过是装饰一下共同的欢乐。但是,尽

管如此,这里人是十分“严肃”和“热情”地认为,自己在世界上一切力量面前,特别是在普鲁士军队面前,都是不可能战胜的;即使在静静沉思之余,产生了轻微的怀疑,也会被下面这种不可辩驳的论据所消除:“情况即使是这样,也不应该说出来。”然而,运动愈益开展,纠集在萨尔布鲁根和克罗茨纳赫之间的普鲁士步兵营的数量愈益显著地增多,自然,这种怀疑也就会愈益经常出现,同时恰恰在怀疑和胆怯的人中间关于“为自己自由所鼓舞的人民”(人们是这样称呼普法尔茨人)战无不胜的这种吹嘘,也就愈益厉害。这种吹嘘很快就发展成了一套整套麻醉人的东西,因而它得到了政府的支持,削弱了加强防御的任何行动,使每个反对它的人都有被当作反动分子加以逮捕的危险。

这种无忧无虑、这种关于“热情”及其万能的吹嘘,再加上“起义”所拥有的微不足道的物质资源和起义赖以发生的狭小地区,都构成了普法尔茨运动的滑稽可笑的一面,并且给少数由于远见和独立地位而能够自由判断的人提供了不少笑料。

外表上看来,普法尔茨的运动是快乐的、无忧的和从容的。在巴登,每个初出茅庐的常备队或人民自卫团的少尉,都束紧身上的笨重军服,炫耀自己的银质肩章(后来在战斗的那天又立即藏在口袋里),而普法尔茨人的行动却理智得多。人们刚一感觉到6月初旬的灼热,便脱下了所有的呢制大礼服、背心和领带,而换上了便服。随着旧官僚制度的推翻,人们好象也从一切陈旧的令人忧闷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了,穿衣也随随便便,唯一考虑的就是要方便和适应季节,随着衣着差别的消失,在日常交往上的任何其他差别也马上消失了。由于社会上各个阶级都聚集在同样的公共场所,也就使得任何社会主义的空想家都可能从这种无拘束的

交往中看到普遍友爱的曙光。

普法尔茨临时政府的特点也是这样。临时政府中几乎都是些好心肠的葡萄酒爱好者，他们惊讶的是，他们在忽然之间不得不代表以巴考士为标志的自己家乡中的临时政府。虽然如此，但也不能否认，这些有胆量的执政者比起在“信仰坚定”的布伦坦诺领导下的巴登邻居，举止好得多，事情作得比较多。他们至少是有着善良的意志，他们虽然酷嗜葡萄酒，但是与卡尔斯卢厄的那些庸俗而严肃的先生们比较起来，理智上却清醒得多，他们之中只有少数人因为别人嘲笑他们用安静的方法搞革命，嘲笑他们采取无力的不完整的措施而感到委屈。

普法尔茨的临时政府一旦得不到巴登政府的支持，便一事无成。它对于巴登，完全尽了自己的义务。它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了使节，一次又一次地作了让步，其目的无非是争取达成协议；结果这一切都徒劳无益：布伦坦诺先生都坚决地拒绝了。

当巴登政府得到了，一切现成的东西的时候，普法尔茨政府却什么也没有得到。它没有经费，没有武器，而在自己的领土上却有许多反动的地区和两个敌人的要塞。法国立即禁止武器运入巴登和普法尔茨，普鲁士和黑森扣留了运到那里去的所有武器。普法尔茨政府立刻派遣了代表到法国和比利时去购买和运送武器，武器买到了，但没运来。可以指责政府的是，它行动不够果断，特别是在国境线上麇集着走私贩的时候，它不去组织秘密的运送；可是大部分的责任应由它的代表来负，因为这些人非常疏忽大意，有时就只满足于一些空洞的诺言，而不设法运送法国武器，哪怕运

到萨尔布鲁根和劳特尔堡也好。

至于经费问题，那末，在小小的普法尔茨，纸币所能带来的益处是很小的。政府既然处在财政困难之中，那它至少也要大胆地采取一种按累进率规定的强制公债，虽然累进率不大。

唯一可以指责普法尔茨政府的地方就在于，它由于觉得自己软弱无力而过分地沾染了普遍的无忧无虑和由此而来的关于本身安全的种种幻想的毛病；因此，它不但不毅然决然地投资于国防建设（诚然投资有限），反倒期望山岳党在巴黎取得胜利，匈牙利人占领维也纳，甚至出现某种能够挽救普法尔茨的真正奇迹，如普鲁士军队中发生起义等等。因此，才不大关心往这个地方运送武器的问题，而不知道，在这里就连 1000 支能用的火枪也是有着巨大的意义，在这里仅仅是在普鲁士人到来的那天，终于才把第一批即最后一批 40 支步枪从国外即从瑞士运来；因此，轻率地挑选了民政委员和军政委员，使得他们里面大都是最无能的糊涂虫和空想家；因此，留用了数量很多的旧官僚和所有的法官；最后，因此，就看不起一切的、甚至容易作到的办法，其实利用这些办法，就有可能包围以至于占领兰都，这一点，我在下面还要讲到。

在临时政府幕后站着德斯特尔，他是一个秘密总书记，或者如布伦坦诺先生所说的，是一个“凯则尔斯劳顿温和派政府周围的红色奸党”。不过，属于这个“红色奸党”的还有其他的德国民主主义者，尤其是逃亡到此地来的德勒斯顿起义的参加者。在德斯特尔的身上，普法尔茨的执政者们获得了他们所不大懂得的行政问题的知识以及革命的智慧，这种革命智慧总是限于完成最直接的、无疑地可以实现的任务，从而它在贯彻具体的措施时从来也不会茫然不知所措，因此这种革命的智慧就更加令他钦佩。德

斯特尔就凭这一点而博得了很大的威信和政府的绝对信任。虽然，有时候德斯特尔对待运动也很认真，例如，他也想通过实行自己的、在当时是完全不适宜的市镇施政条例带来颇大的益处，但是，毫无疑问，正是他推动了临时政府来执行他那多少比较果断的一切措施，特别是在一些个别的问题上发生冲突时，他总是能够拿出出现成的适当的解决办法。

如果说在莱茵普鲁士反动的和革命的阶级一开始就是互相对立的，如果说在巴登最初向往运动的阶级——小资产阶级，随着危险的逼近而对他们所发动起来的运动逐渐转变自己的态度，起先是冷淡，以后则是敌视，那末，在普法尔茨，对运动表示反对的与其说是居民中的个别阶级，不如说是只照顾本地利益的个别地区，不过有的从一开始就反对，有的逐渐才反对的。在斯拜尔，市民阶级总之一开始就是反动的，在凯则尔斯劳顿、纽施塔特、茨魏布吕肯等地，它是随时间的推移而反动起来的，但反动派的主要力量则是盘踞于分散在全普法尔茨境内的各个农业地区里。要消除斗争的各方的不明确的立场，只有一个办法：直接进攻用来进行抵押贷款和抵押高利贷的活动的私人财产，使它对于债台高筑和受高利贷者百般盘剥的农民有些好处。但是，这个唯一能使全体农民立刻愿意参加起义的办法，是以领土比普法尔茨宽广得多而且城市中社会关系比普法尔茨发达得多作为前提。这个办法只有在起义的初期，在起义推向摩塞尔河和埃斐尔的同时才有可能实施，因为，在这些地方的农业区中也存在着同样的关系，而且在这里，这种关系又与莱茵省各城市中工业的发展相辅相成。但是，在普法尔茨也象在巴登一样，并没有设法向外推广运动。

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能用来和反动地区做斗争的办法就很

少了，只有派遣几支不大的武装队伍到叛乱的地方去讨伐，逮捕，特别是逮捕领导反抗的天主教牧师等等，任命得力的民政委员和军事委员，最后就是宣传。这些大部分带有滑稽可笑的性质的讨伐，只有短时期的效果；宣传不起任何作用；而那些摆架子没本领的委员们，做起事来大都是错误百出，或者只知道喝大量的普法尔茨葡萄酒，并且在这样情况下不免要粗卤地吹嘘一番。

在中央行政机关的宣传员、委员和官员中，民主主义者占居极为显要的地位，他们来到普法尔茨的人数比来到巴登的还要多。来到这里的不仅有从德勒斯顿和莱茵普鲁士的起义中逃出来的参加者，而且还有许多想在这里为祖国服务的其他的多少比较热情的“人民活动家”。普法尔茨政府不同于卡尔斯卢厄政府，它正确地感觉到，一些本地的“天才人物”就连领导这样的运动的任务也是担负不了的，因而愉快地接待了上面所说的这些人。在普法尔茨停不上两个钟头，便会接到成打的建议，让你去担任各种各样的、总之是很光荣的职务。民主主义者先生们由于看到普法尔茨-巴登运动并不是地方性的运动（虽然这个运动越来越具有局部的和无足轻重的性质），而是全德民主派光荣起义的光荣曙光，总之，由于他们看到自己的或多或少的小资产阶级的倾向左右了运动，因而也就热烈地响应了这样的建议。但是，他们中间的每个人同时又认为，他们所要的职位只能是使他们的要求（自然多半是贪得无厌的要求）在全德运动中丝毫不被忽视的那种职位。在刚开始的时候，事情还好办。凡是愿意效劳的人，都会马上取得办公厅主任、政府委员、少校或中校的职位。但是谋取职位的人逐渐增多了，而职位则越来越少了，于是便形成无谓地追逐职位的庸俗风气，这在旁观者看来是一个滑稽的场面。“新莱茵报”总

是十分惊异地指出，德国民主主义者身上有一种古怪的事务主义与观点混乱、令人讨厌和庸碌无能等的混合物，而这种讨人嫌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又丝毫不差地重新出现在普法尔茨的官员和宣传员的身上，关于这一点，大概是无需特别来赘述的。

自然，也曾经有人建议我去担任许多文职和武职，如果在无产阶级的运动中，我会毫不犹豫地接受这样的职位，但在当时的条件下，我都一概拒绝了。我唯一同意的一件事，就是为临时政府在普法尔茨广泛推销的小报纸⁹²撰写几篇宣传性的论文。我知道，这样也是毫无作用的，但是由于德斯特尔和政府的某些成员的一再请求，我终于接受了这个工作，这样至少也可以证明我的善意。当然，由于我在用语上不十分客气，第二篇文章就遭到了反对，被认为是过于“刺激人的”论文；我没有多费唇舌便收回了文章，当着德斯特尔的面撕毁了，事情也就到此为止。

在来到普法尔茨的民主主义者当中，最优秀的是那些不久前曾在自己的家乡参加过战斗的人们：萨克森和莱茵普鲁士的民主主义者。为数不多的萨克森人大都在各个中央办公厅工作，他们工作努力，行政管理知识非常丰富，头脑冷静而清醒，没有任何奢望和幻想。莱茵省人，大都是工人，多数参加了军队；最初搞机关工作的人，后来也拿起了武器。

设在凯则尔斯劳顿的水果蔬菜商场⁹³大厦里面的中央机关办公厅里充满了一种非常快活的气氛。在普遍 *laisser aller* [松懈] 的情形下，在完全不积极参加运动的情形下，在工作人员空前多的情形下，工作一般说来是不多的。人们几乎不得不只做一些日常的行政工作，可是，就连这些工作也作得 *tant bien que mal* [马马虎虎]。如果没有什么紧急的通知，如果没有一个爱国的市民提

出有关救国的深思熟虑的建议，如果没有一个农民前来诉苦或是没有一个乡镇派代表团来，那末，在绝大多数的办公室里是无事可做的。人们都打哈欠，闲聊天，讲笑话，说一些不三不四的俏皮话，或者制定一些战略计划，他们从这间屋走到那一间屋，尽量设法消磨时间。谈话的主题自然是众说纷纭的当前政治事件。对于情报的收集毫不注意。旧的邮政官员几乎毫无例外地留任原职，这样的人当然是很不可靠的。除他们以外，还设置了“战地信箱”，由投到起义者方面来的普法尔茨轻骑兵⁹⁴来管理。边区的警备司令和委员们毫不关心边界那边的动静。政府收到的报纸只有“法兰克福报”⁹⁵和“卡尔斯卢厄日报”，而我直到现在还很愉快地经常想起一件令我惊讶的事情，那就是在一个娱乐场所里的一份几天以前的“科伦日报”⁹⁶上，我看到了关于 27 个普鲁士步兵营、9 个炮兵连和 9 个骑兵团集结的消息，以及它们在萨尔布鲁根和克罗茨纳赫之间如何配置的具体情况。

最后，我要谈一个主要的问题即军事组织的问题。巴伐利亚军队中约有 3 千名普法尔茨人带着全部家私投到起义者方面来了。同时还有数量相当多的志愿兵参加了军队，其中有的是普法尔茨人，有的是来自其他地方的人。此外，临时政府发布了动员第一批军役年龄的人，首先是所有 18 岁到 30 岁的未婚男子入伍的命令。但是这种动员不过是纸上谈兵，这一方面是由于军事委员们无能和草率，另一方面是由于武器不足，再一方面是由于政府本身漠不关心。在普法尔茨，组织防御的主要障碍是缺少武器，因而必须用一切办法来获得武器。如果不可能从国外得到武器，那就必须收集普法尔茨所有的一切火枪、步枪以及猎枪，发给积极的战士。事实上，不仅有大量的武器是在私人的手里，而且，还

有不下于 1500—2000 支的步枪（还不算马枪）掌握在市民自卫团各个支队的手里。至少可以要求私人交出武器，也可以要求那些不是第一批应征和不想去当志愿兵的市民自卫团的士兵交出武器。但是这类的事情一点也没有做。经过长久的坚持，最后才作出了这样的有关市民自卫团的武器的决定，但是决定并没有实行；由 300 多个小市民组成的凯则尔斯劳顿的市民自卫团作为警备队，全都穿着军装拿着武器，每天都在水果蔬菜商场的前面进行操练，而普鲁士人在进城以后，还是称心如意地将这些先生们解除了武装。到处的情形都是这样。

在官方的报纸上曾经号召林业部门的职员和森林看守人到凯则尔斯劳顿来成立一支步枪队；但他们也不想来。

在全普法尔茨已经下过命令，或者至少发出过号召，要制造大镰刀；有一些镰刀的确是造出来了。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的莱茵-黑森部队中，我曾经看到装运了几桶镰刀刀身，准备送往凯则尔斯劳顿。这两个据点之间大约有乘行 7—8 小时的路程。4 天后政府不得不把凯则尔森劳顿放弃给普鲁士人，而大镰刀却还没有运到。如果把把这些大镰刀分发给未动员的、所谓第二批征集的市民自卫团，来补偿必须让它们交出来的枪支，那末事情就会好了；然而，并没有这样办，懒惰成性的小市民们却仍旧留下了自己的手枪，而年轻的新兵则不得不以大镰刀来进攻配备有大炮和针发枪的普鲁士人。

枪支普遍地感到缺乏。可是，检阅用的马刀不知为什么反倒多得惊人。谁领不到枪支，谁就忙挂上一把叮当作响的战刀，好象只是这样就可以使他成了一个军官。正是在凯则尔斯劳顿，这样自封的军官数不胜数，他们这种可怕武器的响声在大街上日夜不绝于耳。特别是大学生们，他们运用这种新的方法来威吓敌人，

并且要求建立一支完全由步行骑兵组成的学院军，以便获得拯救祖国的特殊荣誉。

此外，还有半连归附起义者的轻骑兵，但是由于他们照管战地邮箱等等，已经四处分散，因而不可能组成一个单独的战斗队伍。“陆军中校”安内克所指挥的炮队中，有几门3磅炮和一定数量的小白炮，但我记得没有看见3磅炮的驾车。在凯则尔斯劳顿的水果蔬菜商场前面放着收集在一起的再好也没有的装置白炮的旧铁炮身。可是，其中大部分却搁置不用。有两个最大的炮身放在巨大的特制的炮架上运走了。巴登政府最后卖给普法尔茨配备一个炮兵连所用6磅炮（都是经过多次使用而磨损了的）和数量不多的弹药，但是架车、炮手和必需的弹药却不够用。弹药可以尽力制造，架车可以通过组织农民和征用骡马而 *tant bien que mal*（马马虎虎）地得到保证；至于炮手，那末找了几名巴伐利亚的老炮兵，他们用巴伐利亚军队采用的笨拙而复杂的操练方法来训练别人。

军事领导权落在非常无能的人的手里。在临时政府中领导军政部的赖哈德先生，是一个工作勤恳的人，但不够刚毅果敢，没有专门知识。普法尔茨战斗部队的第一任总指挥官是冒险分子芬奈尔·冯·芬奈堡，他由于行为暧昧很快就被撤职了；波兰军官拉吉耶暂时担任了他的职务。最后听说，巴登和普法尔茨军队的总指挥将由梅洛斯拉夫斯基来担任，而普法尔茨军队的指挥则会让施奈德“将军”（也是波兰人）来担任。

施奈德将军来到了。他是个矮胖子，与其说他象“请去打仗的麦尼劳斯”⁹⁷，不如说他象一个已经不算年轻的享乐人。施奈德

麦尼劳斯是古希腊神话中斯巴达国王，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的英雄，美人海伦的丈夫。——译者注

将军威风十足地担任了指挥官，听取了有关情况的汇报，并且马上给军队发布了一系列的命令。这些命令大部分所涉及的问题是军服（要便服式的）和军官的不同符号（三色袖带或者是绶带），以及让服役期满的骑兵和步枪手自愿参军的号召（这种无益的号召已经有过 10 次之多）等等诸如此类的事情。施奈德自己首先以身作则，马上购置了一件缀有三色丝带的骠骑兵短外衣，以便引起军队的尊敬。在他的命令中确实有重要实际意义的东西，只不过是重复早已发布过的命令或者少数干练军官早就提出过，但一直没有实现的建议，这些命令和建议只有现在凭着指挥军队的将军的威望才有可能执行。在其他方面，施奈德“将军”是依靠上帝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是大享口福的人物，——象他这样毫无能耐的人唯一能够作出的高明事情，也只能是这些。

在凯则尔斯劳顿的其他军官里面，唯一能干的人是泰霍夫，他就是充当普鲁士军上尉时曾和纳茨梅尔一起袭击了柏林军械库⁹⁸的那个人，他当时把兵器库交给了人民，在他被判决在要塞监禁 15 年的时候，从马格德堡逃走了。泰霍夫作为普法尔茨参谋总长，处处都显示出是个能干的、慎重的和镇静的人，也许镇静得有些过分，因此难以相信他能够具有那种在战场上往往有决定意义的当机立断的精神。“陆军中校”安内克在组织炮兵的工作上是一个无能而又疲沓的人，虽然他领导弹药制造厂是称职的。在乌布施塔特郊区，他作为统率没有赢得月桂冠，在拉施塔特，梅洛斯拉夫斯基委任他管理封锁时期的物资供应，但在城市还没有被包围以前，他便丢下马匹，令人奇怪地逃到莱茵河对岸去了。

在个别地区里，军官们的情况也不好。某些波兰人有的是在施奈德以前来的，有的是同他一起来的。但是，由于波兰流亡者

中最优秀的代表们已经都在匈牙利，不难想象，这些波兰军官的成分是十分复杂的。他们大部分人都急于弄到相当数量的乘用马匹，发布几道命令，至于命令执行与否，并不特别关心。他们态度十分傲慢，认为他们可以象对待受压制的波兰农奴那样来对待普法尔茨的农民，他们既不了解地理、语言，也不懂得指挥，所以，他们作为军事委员，即作为各个营的组织者，事情做的很少，或者说几乎根本没有做。在运动的进程中，他们不久就都跑到施奈德的指挥部来了，而以后当施奈德遭到自己士兵的攻击和毒打的时候，他们很快又溜走了。他们当中的优秀人物来得太晚了，因而来不及充当组织者来给予什么支援了。

在德国军官里面，能干的人也很少。莱茵-黑森的队伍中本来有一些有军事才能的人，但是这支队伍却是由一个根本不称职的霍伊斯纳来指挥，却是处在齐茨和班贝尔格尔（这两位英雄后来在卡尔斯卢厄英勇地逃跑了）的更为不幸的道德和政治的影响之下。在普法尔茨山区，有一个从前的普鲁士军官席梅尔普芬尼希组织了一支队伍。

只有两名军官还在普鲁士人进攻以前，他们的积极的战斗活动就已经很出色了，这就是维利希和布伦克尔。

维利希率领一支不大的志愿军，担负着先监视而后包围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这两个要塞的任务。逐渐集合在他的指挥之下的部队有：一连大学生、一连在伯桑松同他住在一起的工人、三连人数不多的来自兰都、纽施塔特和凯则尔斯劳顿的体操家、两连出生于附近地区的市民自卫团以及一连多半是逃到这里来的以前参加卜留姆和爱北斐特起义的配备着大镰刀的莱茵普鲁士人。他们最后一共有 700 人到 800 人；但是不管怎样，这是全普法尔茨最可

靠的士兵；下级军官大都是服过军役的人，其中有的人已经习惯于在阿尔及利亚打游击战。维利希率领这支不大的战斗力量驻扎在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间，在乡村中组织了市民自卫团，用它来守护道路和放哨，他们击退了两个要塞的袭击，尽管敌人，特别是盖尔曼尔斯海姆警备队的力量占优势。维利希封锁兰都非常成功，他几乎截断了一切供应，割断了输水管路，堵住了克渭希河，因而使得要塞的所有地窖都被淹没，并且缺少饮水；每天晚上他都派遣自己的侦察兵去骚扰警备队，侦察兵不仅清除了弃置在外面的工事，把那里捡到的哨房用的火炉以每个5盾的价格全部卖光，而且他们还深入到要塞的堑壕，常常迫使警备队用24磅炮向一名上等兵和二名兵士开火，炮火很猛烈，但却伤不到人。这段时期在维利希的志愿军历史上大概是最光辉的一页了。假若他当时拥有哪怕几门榴弹炮，甚至几门野战炮，那末只要相信每天派到兰都去的、进出于兰都的侦察员的情报，那末，这个警备队士气不振、实力不强和人心思变的要塞，在几天之内就可占领。甚至不要大炮，再继续封锁一个礼拜，也就会使它投降。在凯则尔斯劳顿有两门很好的7磅榴弹炮，足以能在晚间焚烧几间兰都的房子。如果把这些炮安置在适当的地方，就可能发生罕有的事件：使用几门野炮就可以占领兰都这样的要塞。我每天都劝说凯则尔斯劳顿的参谋总部，必须至少这样来尝试一下。结果，白费唇舌。有一门榴弹炮留在了凯则尔斯劳顿，另一门运到了洪堡，在这里差一点没落入普鲁士人之手。这两门炮一弹未发便放置在莱茵河对岸了。

然而，“陆军上校”布伦克尔比维利希更为出色。布伦克尔“上校”以前是个葡萄酒推销员，曾以希腊之友的身分到过希腊，以后又在伏尔姆斯做过葡萄酒的买卖，毫无疑问，他在这整个极为光荣

的运动里面,也是一位最出众的军事人材。他总是自持矫健地骑着马,身边带着无数的参谋人员,他身材高大,身体健壮,有一副傲慢的相貌和与黑克尔一样的壮观的胡须,有天生的洪钟般的声音以及一切使南德“人民活动家”胜人一等的其他品质,不过大家知道,这些品质中是根本不包括智慧的。布伦克尔“上校”给人一种印象,就是拿破仑看到他也不得不退避三舍,他有资格在本文开头我们引用的那段副歌里被提到。布伦克尔“上校”觉得即使不要“黑克尔、司徒卢威、齐茨和勃鲁姆”的援助自己也有力量赶走德国的所有君主,他于是马上就干起来了。他想要不以一个士兵身分,而以一个葡萄酒推销员身分来进行战争,为了这个目的,他决定夺取兰都。那时维利希还没有来。布伦克尔集结了在普法尔茨所拥有的全部队伍:常备队和人民自卫团,有组织的部队和游散的部队,骑兵和炮兵,直向兰都挺进。在要塞的前面,设置了军事委员会,组织了进攻纵队,确定了炮台的位置。但是,炮兵是由几门从 $\frac{1}{2}$ 到 $1\frac{3}{8}$ 磅的轻臼炮组成的,载运大炮的工具是同时用来运输弹药的干草运输车。但配备给这批各式各样轻臼炮的全部弹药只不过是一枚24磅重的炮弹而已;至于火药,则根本谈不到。当这一切都商量妥当的时候,他们便视死如归地前进了。他们一直到了要塞的斜堤,未遭到丝毫的抵抗;他们又继续前进,到达了要塞门口。走在前面的是兰都来的起义士兵。在城墙上出现了几名士兵,作为军使。有人向他们喊话,叫他们打开城门。极为和善的交谈开始了,一切好象极为顺利,不料城墙上突然炮声轰鸣,散弹从进攻者的头上飞驰而过,霎时间全部英勇的军队及其普法尔茨的欧根⁹⁹亲王都狠狠地奔逃了。大家都跑呀,跑呀,跑得象风驰电掣,连从城墙上不久以后发射的几枚炮弹也不能掠过逃跑者头上,而只能飞过他们遗弃

的枪支、弹带和背囊。布伦克尔“上校”先生由兰都跑了几个钟头以后，终于停了下来，他重新集合了自己的军队，带领他们回营去了，——虽未得到要塞的钥匙，但是并不因此而失去他那骄傲的姿态。只用3门轻臼炮和一枚24磅的炮弹就能夺取兰都的这个罕见功绩，就是这样完成的。

散弹是由于几名巴伐利亚的军官看到自己的士兵准备打开要塞的大门而匆忙发射的。士兵们自己改变了瞄准方向，因而没有伤人。而当兰都的警备队看到这种碰运气的射击所产生的作用时，当然关于投降的事情也就不再提起了。

然而，英雄布伦克尔并不是一个甘心这种失败而不想报复的人。现在他决定夺取伏尔姆斯。他从他指挥过一个营的福兰肯塔尔出发挺进。驻守在伏尔姆斯的几名黑森的士兵四散奔逃，于是英雄布伦克尔便随着鼓声进入了自己的故城。在设早宴以隆重庆祝伏尔姆斯解放之后，又举行了一次首要的庆祝会，即让20名因病留在城里的黑森士兵宣誓忠于帝国宪法。然而，就在获得这些巨大成就的当天夜里，波伊克尔的帝国军队已把大炮布置在莱茵河右岸，第二天清早就很不客气地以隆隆的炮声惊醒了这位胜利的征服者。毫无疑问，帝国军队是用真正的炮弹和榴弹从对岸射击的！英雄布伦克尔一句话也没说就集合了自己的勇士，悄悄地退出伏尔姆斯，回到了福兰肯塔尔。至于他以后的英勇功绩，将会有诗神在适宜的地方加以歌颂。

当在各地地区里，不同性格的人都按自己的方式消磨时间，士兵们和人民自卫团的战士们不去操练，反而在小饭馆里引吭高歌的时候，在凯则尔斯劳顿，军官先生们却忙着考虑一些极为深远的战略计划。问题的中心就是依靠几乎只存在于想象中的战斗力量来对付拥有3万名以上士兵和

60门大炮的这样一支确实存在的军队,是否可能保持住象普法尔茨这样一个几面无掩蔽的小小省份。正因为所有的方案在这里都同样是无益的和荒唐的,正因为在这里不存在制定任何战略计划的一切条件,所以这些深谋远虑的军事家们,这些普法尔茨军队的杰出人物们,才决定要想出一个战略上的奇迹,来断绝普鲁士人到普法尔茨来的通路。每个初出茅庐的尉官、每个腰佩马刀的学院军的莽汉(学院军终于在施奈德先生的支持下组织起来了,而且其中所有的人都得到了尉官军衔)、每个事务人员都在对着普法尔茨的地图皱眉苦思,希望能发现一个战略上的万灵妙丹。不难想象,这会导致怎样滑稽可笑的后果。匈牙利的战争方法特别受到了赏识。从施奈德“将军”一直到最后一个还未得到公认的陆军中的拿破仑的口中,时刻都可以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我们应该根据情况放弃一部分领土,撤退到这边或那边,山上或山谷。”在所有的小饭馆里都在高谈“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每个伍长、每个士兵、每个街上的小孩也都说“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而临时政府由于十分晓得不应该干预这些事情,由于感到不管怎样行动最后都与他毫不相干,于是也好心地喊着“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我们应该象科苏特一样行动,不然我们会灭亡”。——普法尔茨和科苏特!

在我还没有直接描述军事行动之前,还应该简略地叙述一下许多报上都提到过的关于我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短时期被捕的事件。在普鲁士人到来的前几天,我陪送我的友人莫尔到普法尔茨的边境基尔赫海姆博兰登去执行他所担负的使命。这儿驻扎着一部分莱茵-黑森部队,里面我们有一些熟人。傍晚,我们在客店里和这些熟人以及这个部队的其他志愿兵团聚在一起。在这些志愿兵

里有几个是我们曾经多次谈到过的认真严肃的、满腔热情的“实干派”，他们认为武器虽少，但热情充沛，击溃世上的任何军队都是没有什么困难的。这些人在军事方面以前最多只见过换哨，他们从来也没考虑过采用物质手段来达到某种目的，因此，正如我后来多次有机会亲自见到的那样，他们大部分人在初次交锋时就如此地大失所望，以至急忙逃之夭夭了。我曾问过一个这样的英雄人物，他是不是确实认为单靠普法尔茨现有的 3 万把马刀和 3500 支枪（其中许多马枪是生锈的）就能击败普鲁士人；正当我要欣赏这位实干派由于最高贵的热情受挫伤而表现的崇高愤怒时，突然警卫队进到屋来宣布我被逮捕了。就在这时候，我看见有两个怒容满面的人想从后面向我扑来。一个自称为民政委员弥勒，另一个是我唯一不曾进一步认识的政府委员格莱纳先生，我所以没有和他进一步认识，一则是因为他经常离开凯则尔斯劳顿（这位先生偷偷地将自己的不动产变成了动产），再则是由于他有一副令人可疑的垂头丧气的相貌。我的老朋友莱茵-黑森部队的上尉马上站起来申明，如果我被捕，他和这支部队的相当多的优秀人物都将即刻离开部队。莫尔和其他的人想以武力保护我。在场的人分成了两派。场面可能变得很有趣；我声明说，我当然甘愿被逮捕：让所有的人终于都看到，普法尔茨运动到底是怎样的。这样，我就随着警卫去了。

第二天早晨，在齐茨先生对我进行可笑的审问之后，把我交给了一个民政委员，而民政委员又把我交给了宪兵。宪兵得到命令把我当做奸细看待，所以给我加上了手铐，押着我步行到了凯则尔斯劳顿；我被控告的罪名是不够尊重普法尔茨人民的起义，煽动人们反对政府；这里顺便带一句，这个政府我从来都没谈起过。在路上，由于我据理力争而给了我一辆车子。在凯则尔斯劳顿（莫尔已经在

我之前到了这里),我发现几位政府委员因为威武的格莱纳的失策,尤其因为对我的虐待而感到极为难堪。当然我当着宪兵给了这些先生们一些颜色看。由于格莱纳先生的报告还没有收到,有人提议要我作口头保证就释放。我拒绝作口头保证,并起身到区的监狱去了,——正如按照德斯特尔的建议所决定的那样,没有押送队的护送。德斯特尔声明,这样对待他的党内同志,他无法再留在政府里工作了。刚来不久的契尔奈尔态度也非常坚决。那天晚上,这件事传遍了全城,所有的坚决派的拥护者马上都站到我这方面来了。此外,有消息说,这个事件在莱茵-黑森队伍中引起了骚动,他们大都想解散回家。这一切就更足以向我每天与之打交道的那些临时政府的委员们证明,必须满足我的要求。我在监狱中非常痛快地度过了24小时之后,德斯特尔和施米特也到我这里来了;施米特对我说,我应当毫无条件地被释放,政府希望我今后不要拒绝参加运动。他另外还告诉我,已经颁布命令,今后严禁给政治犯带镣铐,并且继续追究造成这种不合理的待遇的责任,及调查逮捕情况及其原因。政府(格莱纳先生还没有向它打过任何报告)就是如此用各种方法尽它当时的一切可能来使我感到满意,此后双方都丢掉了官腔,在“顿奈斯堡”共饮了几大杯葡萄酒。第二天早晨,契尔奈尔启程到莱茵-黑森部队进行安抚工作,我也托他带去一张几行字的便条。格莱纳先生回到凯则尔斯劳顿的时候神色非常沮丧,因而受到了同事们的加倍的申斥。

这时候,普鲁士人开始从洪堡向前推进,由于现在事情开始发生引人注意的转变,由于我不愿放过取得军事经验的机会,最后,由于“新莱茵报”*honoris causa*(为了荣誉)应该在普法尔茨-巴登军队中有自己的代表,于是我也腰佩战刀到维利希那里去了。

四 为共和国捐躯！

“为了德意志共和国的繁荣，
必须把那 36 个王座推翻；
弟兄们，无情地将它们摧毁，
勇敢地挺起我们的胸膛，迎向子弹！
为共和国捐躯，
这是我们伟大而光荣的命运，这是我们所选定的目的！”

当我乘车到纽施塔特去打听维利希的大本营当时驻扎在什么地方的时候，在列车上听到志愿兵们都唱这首歌。

这样看来，为共和国捐躯，这就是，或者至少必须是今后我所选定的目的了。我对于这个新的目的有一种十分奇怪的感觉。我仔细地端详了一下这些年轻的、漂亮的、英俊的志愿兵小伙子的面孔。从他们的相貌上看不出在目前为共和国捐躯是他们选定的目的。

我从纽施塔特出发，乘坐一辆征用的农民的载货车，到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间的欧芬巴赫夫，因为维利希还在那里。刚过艾登科本就碰上了农民按维利希的命令所设置的第一批岗哨；以后在每个村庄的进出口以及所有的交叉路口，都有这样的岗哨，没有起义政权的证明文件任何人都不能通过。显然已经接近有军事行动的地点。我在半夜才到达欧芬巴赫，并立刻作了维利希的副官。

当天（6月13日）维利希的一支不大的队伍打了一次漂亮的

仗。在前几天，维利希曾得到一营巴登人民自卫团即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的支援，因而充实了自己的志愿队；他从这个营里抽调 50 名左右的人开往盖尔曼尔斯海姆，让他们先到贝尔海姆。在他们的后面，在克尼特尔斯海姆还驻有志愿队的一个连，以及一些用大镰刀武装起来的士兵。一营巴伐利亚人带着两门大炮和一个轻骑兵连突然出击。巴登人没有进行任何抵抗便逃之夭夭；其中只有一个人被 3 个骑马的宪兵赶上了，他拚命地进行了自卫，直到最后被军刀砍得遍体鳞伤，才跌倒在地上，被进攻的人杀害了。当逃兵到了克尼特尔斯海姆的时候，驻守在这里的连长（这个连一共不到 50 人，其中有些人只有大镰刀）便出来迎击巴伐利亚人。他巧妙地把自己的人分做几组，坚决地以散兵线向前推进，结果兵力超过 10 倍的巴伐利亚人，经过两小时的战斗，被迫退到了巴登人所放弃的乡村；最后，维利希部队派来了一些援兵，又把巴伐利亚人赶出了这个乡村。巴伐利亚人大约伤亡了 20 人，退到了盖尔曼尔斯海姆。遗憾的是，我不能指出这个勇敢的有才干的青年军官的名字，因为他现在的处境可能还不安全。在他的连里只有 5 个人受伤，伤情都不严重。这 5 个人里面有一个是法国的志愿兵，他还没来得及射击，前臂就受了伤。尽管如此，他还是打完了自己的 16 发子弹，当时他由于受伤自己不能装子弹，他就让一个拿大镰刀的士兵替他装，以便尽可能射击敌人。第二天，我们曾到贝尔海姆去视察战场和筹划新的作战布署。巴伐利亚人曾向我们的射手猛烈发射圆炮弹和散弹，但是只不过把树枝打了下来，铺满了整个的道路，只不过打中了连长旁边的一棵树。

那天，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都到齐了，准备最后在贝尔海姆一带驻扎下来。这个营又体面，装备又好；特别是它的军官

们，尖尖的胡须，黝黑的面庞，一个个威风凛凛、生龙活虎，看来简直是一群头脑开化的吃人生番。幸好他们并不那样可怕，这一点我们慢慢就会相信。

我听说几乎没有有什么弹药，大多数的战士每人只剩下五六发子弹，只有很少一部分人有 20 发，现有的弹药甚至填不满参加昨天战斗的战士们的空子弹带，这些使我感到很惊奇。我当时就自告奋勇到凯则尔斯劳顿去弄些军火来，于是当天晚上就出发了。

农民的载货车走得很慢，其次，在各次停歇的时候又必需再去征用车辆、道路又不熟悉等等诸如此类的困难也耽搁了些时间；等我到达迈卡麦尔（距纽施塔特差不多还有一半路程）的时候已经天亮了。在这里，我遇上了从皮尔马森斯来的人民自卫团的一个支队，押着 4 门大炮，送往洪堡。这 4 门大炮在凯则尔斯劳顿已被认为是遗失了的。这个支队穿过茨魏布吕肯和皮尔马森斯，经过非常难走的山路走到这里，才终于踏上了平原。我们这些来自皮尔马森斯的战士们冲破了重重难关，经过了夜行军，喝足了葡萄酒，因而心理上很紧张，总觉得好象敌人紧紧在后面追赶着，其实，普鲁士的先生们一点也没有急于追踪他们。

过了几个小时（这天是 6 月 15 日）我到了纽施塔特。全体居民都走上了街头，其中包括士兵和志愿兵（在普法尔茨，穿着便服的人民自卫团战士都一律称作志愿兵）。运货车、大炮、马匹堵塞了所有通往城里的街道。一句话，我落入了全体撤退的人马稠密的普法尔茨军队中间。临时政府、施奈德将军、总参谋部、各个办公厅全都在这里。凯则尔斯劳顿连同它的水果蔬菜商场、“顿奈斯堡”餐馆、啤酒店——“普法尔茨战略上最好的据点——被放弃了，目前纽施塔特这个地方成了普法尔茨混乱状态的中心，这

种混乱状态只是在现在打起仗来的时候，才达到了顶点。于是，我就探听明白了全部情况，尽量地搜集火药、铅块和现成的子弹，——难道这些一仗没打就溃不成军的军队还会需要军火吗？——然后经过无数次的奔波，最后在一个邻近的村子里才找到了一辆大车，当晚押着所获得的军火，在几个人护送之下启程而回。

在动身之前，我探望了施奈德先生，问他有没有什么东西要转达给维利希。这个老馋鬼交给我几道毫无意义的命令，还郑重其事地说道：“看，我们现在丝毫不差地象科苏特那样行动。”

普法尔茨起义者之所以最后竟丝毫不差地象科苏特那样行动，原因如下。在“起义”的全盛时期，即在普鲁士人进攻以前，普法尔茨约有 5000—6000 名使用各式枪枝的战士，还有 1000—1500 名使用大镰刀的战士。所有这 5000—6000 战士首先是来自志愿队（维利希领导下的和莱茵-黑森地区的志愿队），其次来自所谓的人民自卫团。每一个区都任命了一名军事委员，负责组织一个营。每一个营的核心和教练员都是从各该区部队中转向起义方面来的士兵。如果是在作战的情况下，实行严格的纪律和经常不断的军事训练，那末把常备队同新招收的战士混在一起的这种做法，可能会取得非常良好的效果，但是在这里却坏了事。由于武装不足，这些营没有组织成功；无所事事的士兵把军纪、军容一概置诸脑后，大部分人都开了小差。到后来在一些区里算是组成了几个营，在另一些区里则只有几个武装的小队。以大镰刀做武器的战士是根本没有用的。他们总是妨碍着别人，在任何真正的战斗中都根本无法使用；他们一部分被留下作为所属营的临时附属部队等候为他们弄得武器，一部分则编为一支特别部队由一

位不太精明的泰恩上尉指挥。公民泰恩是最道地不过的莎士比亚笔下的毕斯托；这位公民在英雄布伦克尔率领下从兰都附近逃跑时被自己的刀鞘绊了一下子，就把刀鞘折断了，后来却激愤地发誓说“一颗 24 磅的燃烧弹把它给炸成两半了”；这位独一无二的毕斯托在此以前曾被任用来平定反动势力占领下的村庄。他对执行这项任务十分热心，以致农民们虽然对于他和他的队伍极其尊敬，可是只要他只身落到他们手里，每次都得挨一顿痛打。据说，每当执行这样任务回来以后，他手下的战士们都把自己的大镰刀打碎了，而他本人在到达凯则尔斯劳顿后则以福斯泰夫¹⁰⁰的神气大谈自己和农民厮斗的惊心动魄的故事。

因为靠这样的队伍什么事情也办不成，于是梅洛斯拉夫斯基（他是 6 月 10 日才来到巴登军大本营的）就命令普法尔茨的队伍向莱茵河边打边撤，尽可能占领曼海姆那里的莱茵河渡口，如不可能，就在斯拜尔或克尼林根转到莱茵河右岸，然后从巴登方面守住莱茵河的渡口。在命令发出的同时，有消息说，普鲁士人从萨尔布鲁根侵入普法尔茨，开了几枪以后，就迫使布置在边境上的为数不多的我军战士朝凯则尔斯劳顿方向败退。同时，一切多少有组织的部队朝凯则尔斯劳顿和纽施塔特方向集结；人心开始异常慌乱起来，一大部分新兵逃跑了。一个来自 1848 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志愿队的青年军官拉科夫率领着 30 名士兵去搜罗逃兵，用了两天两夜的工夫，弄到了 1400 人；他把这些人组成一个“凯则尔斯劳顿营”，这个营在战事结束以前是一直由他指挥的。

从战略方面讲，普法尔茨的地势很简单，就连普鲁士人也不致在那里出任何差错。莱茵河畔有一道河谷，有步行 4—5 小时的路程那样宽，任何天然障碍物都没有。普鲁士人畅行无阻地走了

3天,从克罗茨纳赫和伏尔姆斯到了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在多山的普法尔茨高地上有一条自萨尔格闵德至美因兹的“帝国公路”通过,这条公路大半段不是在山坡上就是在宽广的河谷旁。这里也是几乎没有任何天然屏障,因而一支人数少、战术差的军队连一点点可以据守的地方都找不到。最后,紧靠着普鲁士边境线,在洪堡那里从“帝国公路”分出一条修筑得很好的道路,一段沿着河谷,一段顺着佛日山的山坡,经茨魏布吕肯和皮尔马森斯直通兰都。固然在这条路上天然屏障多一些,但是如果军队人数少、没有大炮,就无法把这条路封锁住,特别是当一支敌军有可能利用平原的地势把通向兰都和比尔查伯伦的退路切断的时候。

由于这些原因,普鲁士人的进犯非常顺利。头一下子是从萨尔布鲁根打向洪堡;有一支纵队从洪堡直抵凯则尔斯劳顿,另有一支纵队经皮尔马森斯打到兰都。在这以后紧接着就有第二支队伍开始向莱茵河谷进犯。这支军队在甚尔赫海姆博兰登首次遭到了驻扎该地的莱茵-黑森队伍的猛烈抵抗。美因兹的步枪手们尽管有不小的伤亡,但他们还是以极顽强的精神坚守皇家花园。到最后,因为被敌人抄了后路,他们才撤退。其中有17个人作了普鲁士人的俘虏。他们就被“英勇的军队”的喝醉了酒的英雄们绑到树上,立即枪杀了。这一卑鄙的行为就是普鲁士人对普法尔茨的“短促的但是光荣的讨伐”的开始。

这样,普鲁士人就完全占领了普法尔茨的北半部,而恢复了他们的两个主力纵队之间的联系。他们现在只要沿平原向前推进,解兰都和盖尔曼尔斯海姆之围,就有可能占领普法尔茨的其余部分,并把还可能坚守在山里的队伍一网打尽。

在普法尔茨,有将近3万普鲁士人,他们拥有大量的骑兵和

炮兵。在普鲁士亲王和希尔什菲尔德率领最精锐的队伍向前进犯的平原地带，在他们和纽施塔特之间，仅仅有一些已经涣散了的、无力抵抗的人民自卫团的队伍和几支莱茵-黑森队伍。他们只要向斯拜尔和盖尔曼斯海姆迅速推进，所有集中在，更确切些说所有乱聚在纽施塔特和兰都的4000—5000普法尔茨起义军就会被击溃、驱散、赶跑或俘虏。然而，普鲁士先生们虽然在枪杀手无寸铁的俘虏时那样机敏，但在战斗中却极端优柔寡断，在追击敌军时松懈无比。

普鲁士人及其他的帝国军队所遇到的敌军人数比他们少，常常一共才只有他们的 $\frac{1}{5}$ ，最多也不会超过 $\frac{1}{3}$ ，组织性又很差，而且在有些地方是由一些平庸无能的人指挥的，可是在这样的敌军面前普鲁士人和那些帝国军队却表现出令人吃惊的萎靡不振；如果我在描述这次讨伐的全部过程时还必须多次指出他们这种萎靡不振的表现，那显然我决不是想把这种状况说成是由于普鲁士人有些太胆小而产生的，更不是——读者大概已经看出——把我们的军队幻想为异常英勇的军队。同样，我也并不象一些反动派那样，想把这种现象解释成什么普鲁士人心肠宽厚，或是他们怕俘虏得太多而感到累赘。普鲁士的文武官僚，在战胜弱小的敌人时总要大事庆贺，以向手无寸铁的人残酷地进行报复为乐事，他们早就因这种行径而扬名于世了。他们在巴登、在普法尔茨就是这样干的，有下列事实为证：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许多人被枪杀，在卡尔斯卢厄的养雉场里许多人夜间被枪杀，在所有各个战场上杀死负伤和放下武器的敌军的事件数不胜数，为数不多的俘虏也遭到残害，夫赖堡、拉施塔特的战地军事法庭把许多人判处死刑，最后，拉施塔特的犯人被拷打、得不到饭吃、被关在又潮湿、又拥挤、又不透气的牢

房里,再加上这一切所引起的伤寒病,结果被慢慢地、秘密地、更其残酷地杀害了。普鲁士人作战行动松懈当然是由于怯懦,就是说,是由于指挥官们怯懦。且不说我们的普鲁士英雄们在用兵和练兵方面的迟慢、怯懦的迂腐气,这种迂腐气本身就使得他们根本不可能行动果敢、当机立断,且不说他们的繁琐的军规,这些军规的制定就是为了间接地防止过去那些可耻的失败的——这都暂且不说,我们要谈的是:如果普鲁士人对手下的士兵信任的话,难道他们能够采用这种在我们看来是无聊的、对他们说来是丢人的作战方法吗?全部问题正在于此。将军先生们知道,自己的军队有 $\frac{1}{3}$ 是不听话的后备团,这些团只要起义军打一次胜仗,就会转到那边去;将军先生们也知道,这样很快就会使一半常备军以及全体炮兵,都要背离他们。在这种情况下霍亨索伦王朝和它的“万世的王位”¹⁰¹要落到什么样的地步,这一点人人都会看得很清楚。

因为要更换车辆和护送人员,所以我要在迈卡麦尔等到16日早晨,在这里,一清早从纽施塔特开出的军队已经又赶上了我。昨天还在讲进攻斯拜尔,现在看来又放弃了这个计划,军队直奔克尼林根桥。我在15个来自皮尔马森斯的半野蛮的农民(他们都是生于普法尔茨深山密林中的人)的护送之下由此动身。当已经快到达欧芬巴赫的时候,我听说维利希率领着自己的队伍开向位于兰都西北的一个小市镇弗兰克维勒去了。于是,我就翻回头,走了将近半天的工夫,到了弗兰克维勒。在那里,我不但找到了维利希,而且也找到了普法尔茨军队的全体先头部队,他们为了避免通过兰都和盖尔曼斯海姆之间这段路而选择了兰都以西的一条路。临时政府及其官员们、总参谋部以及一大批对于两方面都依附的游手好闲的民主主义者,都驻在一所旅馆里。施奈德将军

正在吃早饭。所有的人都在跑前跑后地忙碌着：在旅馆里，临时政府的委员们、指挥官们和那些游手好闲的人跑来跑去，在大街上士兵们也是东跑西跑。后来，军队的主力：布伦克尔先生、特罗钦斯基先生、石特拉塞尔先生以及所有其他各位先生骑着战马率领着自己的勇士们也陆续来到。情况更混乱了。好容易才慢慢地派出几支队伍朝茵普弗林根和坎德尔方向前进。

从表面上看不出这支军队是在退却。混乱在这里从一开始就是常见的现象；虽然年轻的战士们现在已经开始对不习惯的行军感到厌倦，可是他们还是照旧在小酒馆饮酒取乐、喧哗吵闹、声言要在最短的时间内把普鲁士人消灭掉。尽管对胜利抱着这样的信心，但是，只需一个骑兵团配备上几门马拉的大炮，就足以能够把这一伙快乐逍遥的人们赶得四处奔逃，把“莱茵-普法尔茨自由军队”赶跑。这只要当机立断，再加上一些勇气就能做到，可是在普鲁士军中既谈不到当机立断，也谈不到什么勇敢的精神。

次日早晨我们出发了。退却的队伍的主力开向克尼林根桥，而维利希则率领所部和德雷埃尔营开进山区去打普鲁士人。我们的一个约由兰都的50名运动员组成的连队一直开到几个最高的山上，开到约翰尼斯克雷茨。席梅尔普芬尼希和他的队伍还屯扎在皮尔马森斯到兰都的那条路上。当时应该把普鲁士人挡住，并且在辛特尔-维登塔尔切断他们到比尔查伯伦和劳特尔的去路。

在这时候，席梅尔普芬尼希已经放弃了辛特尔-维登塔尔，退守林塔尔和安维勒尔。这里有一个转弯，恰好在这个地方，克渭希河谷两岸群山形成一个狭谷，在这个狭谷的后面就是林塔尔村。这个狭谷有一支特殊的野战警备队守着。夜间，这支警备队的巡逻队告诉我们，敌军向他们开火了：一清早，来自茨魏布吕

肯的前民政委员魏斯和年轻的莱茵省人麦·约·贝克尔带来消息说普鲁士人逼近了，要求派巡逻队去进行侦查。可是因为没有去侦查，狭谷两面的高地没有占领，于是魏斯和贝克尔就决定自己去进行侦查。当敌人逼近的消息愈益频繁地传来的时候，席梅尔普芬尼希手下的战士们开始在狭谷口构筑堡垒；维利希前来巡视了阵地，他下令占领高地，命令把毫无用处的堡垒拆除。然后他又急忙地赶回安维勒尔去率领自己的队伍。

当我们穿过林塔尔的时候，我们初次听到了枪声。我们急速地穿过了村子，看到了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战士们在公路上列开队伍，大多数人用的是大镰刀，只是少数人用枪；有些人已经投入战斗。普鲁士人边射击边向高地进攻；席梅尔普芬尼希就睁着眼白白地让他们占领了他自己应该去占领的阵地。我们的队里还没有落一颗枪弹；所有枪弹都高高地从我们头上飞了过去。当枪弹嗖嗖地从手使大镰刀的战士们头上飞过的时候，整个队形就乱了起来，四处喊声大作。

我们费了好大力气才从这支队伍旁边通了过去，他们几乎把道路都堵住了，使得秩序大乱，加之手里使的是大镰刀，什么也不能干。连、排长等也和士兵一样毫无办法、惊慌失措。我们的步枪手被派去夺取高地，一部分在左边，一部分在右边。此外，又派两个连去增援左方的步枪手并包抄普鲁士人。主力纵队仍留在山谷内。一些步枪手占领了转角地方堡垒废墟后面的阵地，向站在百步以外的普鲁士队伍开枪射击。我带了几名士兵跑到了左边的山上。

我们刚刚登上荆棘丛生的山坡，面前就是一片广阔的原野；普鲁士步枪手从对面树林边用他们的锥形枪弹向我们射击。我又调

上来几名志愿兵，他们无可奈何地而且有些畏缩地爬上了山坡，我把他们尽可能地安置在隐蔽之处，开始观察地形。当被派到左方去包抄的队伍还没有到达普鲁士人侧翼的时候，我无法带着一队兵通过宽达 200—250 步的毫无掩蔽的地带；我们最多也只能原地不动，因为本来掩蔽得就已经很差了。可是普鲁士人尽管有枪有尖头子弹，而他们的枪法却非常糟糕。我们几乎毫无掩蔽地在最猛烈的火力之下呆了半个多小时，而高明的敌军步枪手却只打中一枝枪的枪身，打穿了一个人的衣襟。

我必须最后弄清楚，维利希驻在哪里。我的战士们答应坚守阵地，于是我就折回爬下山坡。下面一切都秩序井然。普鲁士人的主力部队由于遭到大道上以及大道右方我军步枪手的猛烈射击，被迫稍稍后退。忽然，从左方，从我站过的那里，我们那几名志愿兵丢开了自己的阵地不管，慌忙地跑开了。原来，在极左翼的那几个连（由于很多人掉队而人数减少了）认为通过前面小树林的那条路太长了，于是在一位在贝尔海姆打了胜仗的上尉指挥下，径直穿过战场。他们遇到了猛烈的射击；上尉和很多士兵倒下了，其他的人没有了指挥官，因而在敌人的优势下屈服了。现在普鲁士人赶到了前面，绕到我军的右侧，从上面向我军战士猛烈射击，这样就迫使我军战士向后退却了。很快整个的山全都落于普鲁士人之手。他们从山上猛烈向我们射击；我们已经无法可想，于是开始撤退。道路被席梅尔普芬尼希的队伍和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堵塞了，他们行军的行列是按照绝妙的巴登传统，每个横排不是 4—6 人，而是半个步兵排即 12—15 人，所以把公路从左到右整个排满了。我们的人只得通过泥泞的草地向着村子前进。我同几名步枪手则留下来掩护撤退。

这一仗所以打输，一方面是因为席梅尔普芬尼希违反维利希的命令而没有占领高地，而我们手下能打仗的队伍人数极少，无法从普鲁士人手中夺回这些地方，另一方面是由于席梅尔普芬尼希的战士和德雷埃尔那一营人一点用处也没有，再一方面是由于被派去包抄普鲁士人的那个上尉性情很急躁，以致几乎丢了性命，使我们的左翼暴露无遗。然而，我们遭到这次失败还是幸运的事情，不然我们在辛特尔-维登塔尔可能遭到四面包围，因为当时普鲁士人的一个纵队已经在向比尔查伯伦进发中，兰都之围已解。

在撤退的时候，我们折损的人比战斗时还多。我们的队伍在行进中秩序混乱无比，人声嘈杂，普鲁士人的枪弹不时飞入我们的拥挤的队伍。我们约有 15 个人受了伤，席梅尔普芬尼希也在内，他在战斗一开始就打伤了膝盖。普鲁士人这次追赶我们也是很松懈的，很快就停止了射击。只有山坡上的几个步枪手继续追赶我们。在安维勒尔，即距离战斗地点半小时路程的地方，我们安安静静地吃了一顿饭，然后向阿尔贝斯维勒进发。我们所最急需的已经弄到手了：3000 盾的强制公债，这笔钱是在安维勒尔就已经准备好了的。后来普鲁士人把这叫做掠夺钱财。他们被胜利冲昏了头脑，竟然也认定我军的曼托伊费尔上尉（同柏林的可尊敬的曼托伊费尔是一家人，前普鲁士下级军官，后来投诚到我们这方面来了）已在林塔尔一战被打死。其实曼托伊费尔先生不但没有被打死，而且从那以后，甚至还在苏黎世的运动会上得过锦标。

在阿尔贝斯维勒，我们增加了两门来自巴登的大炮，还有梅洛斯拉夫斯基派来的援军的一部分。我们打算利用这一批力量再一次在这些地方摆开阵地；但我们得到情报：普鲁士人已经到了兰都，因此我们只好径向兰根坎德尔进发。

在阿尔贝斯维勒，谢天谢地，我们摆脱了和我们一起走的没有作战能力的队伍。席梅尔普芬尼希的队伍由于没有了指挥官，已经开始有些溃散，自行奔赴坎德尔。这支队伍还时常把走不动的或因其他原因掉队的战士留在各个小饭店里。德雷埃尔的那个营在阿尔贝斯维勒发生了骚动。维利希和我就去问那些战士们他们要干什么。大家都默不作声。后来，一个年纪很老的志愿兵喊道：“他们要赶我们去送死！”一个连一仗都没打，在撤退时只有两名最多不过3名轻伤员的队伍里，喊出这样一句话，听来非常滑稽可笑。维利希命令这个战士走出来，交出武器。这个带几分醉意的白胡子老头执行了命令，哭哭啼啼地讲了一大堆话，主要意思是说他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事，简直使人感到啼笑皆非。这时在这些非常善良但纪律很坏的战士们中间发生了普遍的不满。因此，维利希就下令全连立即离开，他说，他已经听够了废话和怨言，一分钟也不愿再指挥这样的士兵。这一连人没有多加分辩，向右一转就走了。5分钟以后这个营其余的人随着那一连去了，维利希并拨给了他们两门大炮。他们是不愿意被“赶去送死”，不愿意遵守纪律的！我们倒情愿让他们离开。

我们转到右面山上，向茵普弗林根那边前进。不久我们就挨近了普鲁士人；我们的人和他们互相对放了几枪。整个晚上不时发出枪声。我在最先遇到的村子里耽搁了一下，以便差人去给我们由兰都的运动员组成的连队下达指示。我不知道他们收到我的指示没有，但他们平安地转移到了法国，从法国又转移到巴登。由于这样耽搁了一下，我掉了队，只好一个人走向坎德尔。在路上

有几队掉队的士兵游荡着，所有的小饭店都容纳不下了。看起来，一切喜象全都悲惨地失掉了。军官没有士兵，士兵没有军官，这是一群各个队伍中掉队的形形色色的志愿兵，有的地下走，有的乘着马车，全都急急忙忙地奔赴坎德尔。普鲁士人根本不想认真地追击他们。茵普弗林根距兰都只有一小时的路程。维尔特（在克尼林根桥的前面）距盖尔曼尔斯海姆则有4—5小时的路程，可是普鲁士人并没有立即派军队到这两个据点中的任何一处去，其实他们如果派出军队，在这边可以拦截掉队者，在那边可以拦截全军。普鲁士亲王获取的荣誉的方法真是与众不同！

在坎德尔，我遇到了维利希，可是没看到他的军队，他的军队都在前面，驻扎在城外。军队虽然没看到，却看到了临时政府、总参谋部和那一大群游手好闲的人。这里和昨天弗兰克维勒的情形一样，到处都挤满了军队，不过这里的秩序更坏，情况更混乱。每一分钟都有军官跑来寻找自己的队伍，也有士兵跑来寻找自己的指挥官，没有人能告诉他们在什么地方能找到。情况已经到了全盘瓦解的程度。

次日早晨，即6月18日，全体都列队通过维尔特，过了克尼林根桥。虽然有很多兵士四散回家了，但剩下的军队，加上从巴登来的援军，总共还有5000—6000人。他们昂首阔步地开过维尔特，样子满象刚刚夺取了这个村子，大步向前迎接新的胜利。他们仍然觉得自己的行动和科苏特一样。只有一个巴登的常备营还保持着军纪，他们路过小饭店时能够不留下几名士兵在那里。最后来到的是我们的队伍。我们留下来担任掩护，直到可以把桥拆掉为止；当一切完毕的时候，我们转移到了巴登，协助拆桥工作。

巴登政府，为了宽恕6月6日胆敢反对共和主义者¹⁰²的那些

卡尔斯卢厄的强悍的小市民，于是就把军队扎在近郊。而我们则坚决要求把我们的队伍驻扎在卡尔斯卢厄；我们需要大大地整顿一番，设法添置各种军装用品，此外，我们认为在卡尔斯卢厄完全应该驻有一支可靠的革命队伍。但是布伦坦诺先生早已想到我们了。他派我们到达克斯兰顿去，这个村子距卡尔斯卢厄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一些人告诉我们那里简直是黄金国。我们到了那个地方，发现那里是全区最反动的窝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费了很大力气才弄到一些稻草；全队有一半人得睡光地板。家家户户也都是愁眉苦脸的。我们迅速地做出了决定。布伦坦诺先生收到了我们的警告：如果我们得不到好一些的驻地，我们在第二天早晨，即6月19日将到卡尔斯卢厄去。这样说就这样做了。清晨9点钟，我们动身出发。我们离开村子还没有走到手枪射程那么远，就遇到布伦坦诺先生带着一名参谋走来了。布伦坦诺先生极尽恭维奉承之能事，用尽花言巧语，企图使我们远离卡尔斯卢厄。说什么这个城里已经住了5000人；较富有的人家都逃走了，中等人家里住的人已经过多了，他们的负担已经过重了；他不会让维利希的英勇的、为人所绝口赞扬的队伍安置在条件很坏的地方，如此等等。但是不管他怎么说也没有用。维利希要求把逃跑的贵族领主们的空闲宅第拨给我们几个。布伦坦诺不愿这样做，于是我们就动身到卡尔斯卢厄去宿营了。

在卡尔斯卢厄，我们为本连使用大镰刀的战士弄到了武器，还弄到了一些大衣呢料。我们设法尽快地把服装靴鞋修补一下。我们的队伍又新加入了一些人，有几个是我在爱北斐特起义时认识的工人，此外还有金克尔和齐赫林斯基。金克尔是参加伯桑松工人连当步枪手的，齐赫林斯基是德勒斯顿起义军总司令的副官，在

起义军撤退时，他指挥过掩护部队。他参加了学生连当步枪手。

我们一方面补充装备，一方面也没有忘记战术训练。我们紧张地进行了演习，我们驻扎在这里的第二天，就演习从皇家广场袭击卡尔斯卢厄。小市民们对这些次演习普遍地大为恼怒。这就证明他们非常清楚地了解到事情的危险性。

最后，我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征用大公宅内的那批一直被做为圣物牢牢地保藏着的武器。当我们正准备为我们从那里拿到的 20 支枪定制弹筒帽的时候，我们得到情报说，普鲁士人在盖尔曼尔斯海姆过了莱茵河，现在驻屯在格拉本和布鲁赫萨尔。

我们立即（这是在 6 月 20 日晚上）出动，并携带两门普法尔茨军的大炮。当我们到达布兰肯洛赫（从卡尔斯卢厄朝布鲁赫萨尔方向步行一个半小时的地方）的时候，我们找到了克雷门特先生和他的一营人，听说普鲁士人放出的岗哨距布兰肯洛赫约一小时的路程。在我们的士兵们背着枪吃晚饭的时候，我们开了一个军事会议。维利希提议立即向普鲁士人进攻。但克雷门特先生宣称他的军队缺少经验，不能在夜间出击。因此，我们决定：我们立刻向卡尔斯多尔夫进发，拂晓前向普鲁士人发动进攻并努力突破他们的阵地。如果成功，我们想就到布鲁赫萨尔去，并且尽可能打入这个城市。这时克雷门特先生就在天明取道弗里德里希斯塔尔出击，支援我们的左翼。

将近半夜时分，我们启程了。我们所采取的步骤还是相当冒险的。我们的力量只有不足 700 人和两门大炮。我们的战士比其余的普法尔茨军队更有训练、更可靠，他们都是经过战火考验的。我们用这样一支力量所要打击的敌人兵团，无论如何都比我们更有训练，他们的下级指挥官比我们的下级指挥官经验丰富得多，我

们有些连长只在市民自卫团里呆过几天；敌人兵团的人数我们知道得不确切，但至少不下于 4000 人。可是我们的队伍曾经受过力量对比更加悬殊的战斗的考验，而我们这次出征在人数对比上又根本不能指望更有利些。

我们派了 10 名大学生先行百步担任前哨。接着就是第一队，队前面有 6 名巴登龙骑兵，这 6 名龙骑兵是分配给我们执行联络任务的。第一队后面是 3 个连队。再后面一些，是大炮和其余的 3 个连队。整个队伍由步枪手殿后。有这样一道命令，在任何情况下不准开枪，行进时要一点声音都没有，只要一发现敌人就以刺刀迎击。

不大的工夫，我们就远远看到了普鲁士人岗哨上的灯光。我们一直走到施培克，没受到袭击。主力部队停了下来，只有先头部队继续前进。忽然枪声四起；在村口的路上，稻草燃着了，火光耀眼，警钟急鸣。我们的步枪手从左右两侧包抄村庄，队伍开进了村里。村子里也燃起了篝火；我们走到每一个角落都提防着敌人的射击。但是四面寂静无声，只是在市议会大厅那里有一个特别的岗哨，放哨的都是农民。普鲁士的岗哨已经撤走。

我们现在已经看出：普鲁士的先生们，尽管自己的兵力占着巨大的优势，可是他们不把他们那套迂腐的警戒条例执行到繁琐不堪的程度，是不会感到安全的。他们这个边哨的位置和大本营相距有整整一小时的路程。假如我们也象这样用放哨的任务来折磨我们的不习惯于战争劳苦的战士们，那我们就要有无数的人被累垮。我们深信普鲁士人是胆小鬼，而且我们认为他们对我们的畏惧比我们对他们的畏惧更为厉害。情况也确是这样。我们的岗哨，我们的宿营地，直到抵达瑞士边界以前没有遭到一次袭击。

不管怎样，普鲁士人现在受到了警告。是不是我们应该回去了呢？我们不准这样做，我们继续前进。

在纽特哈尔特又响起了警钟；但是这一次既没有信号火也没有枪声。我们的队伍靠拢了一下，通过这里的村庄，踏上山路，直奔卡尔斯多尔夫。这时我们的先头部队距我们只有 30 步远。刚刚上了山，我们的先头部队就发现对面有一个普鲁士哨兵向他们喊话。我听到“什么人？”这句话后，就跑向前去。我的一个战友说“他完了，我们不会再看到他了。”可是向前这一跑却使我免遭惨祸。

事情是这样，就在这一刹那，敌人的哨兵开火了，我们的先头部队不是把他用刺刀刺倒，而也开了火。在行军中和我并行的龙骑兵胆小成性，立刻拨转马头向队伍里面猛冲，撞倒了好几个人，把前面的几排（可能是 4 个也可能是 6 个）完全冲乱，然后飞奔而去。就在这时候，左右两边敌人的马哨开始向我们射击，在万分慌乱之际，我军有几个糊涂虫竟向自己队伍的主力开火，而别的糊涂虫也跟着他们干起来。转眼之间，前面的一半队伍散了，兵士们有的到处乱窜，有的四处逃跑，也有的在大路上乱成一团。伤员、背包、帽子、枪枝被杂乱地丢弃在嫩绿的稞麦田里。这还不算，四面俱是粗野混乱的喊叫声、枪声和子弹的呼啸声。嘈杂的声音刚刚平息了一些，我就听见我们停放在后面很远处的大炮被急急忙忙地拉跑了。这两门大炮给我们后半截队伍带来的灾害和龙骑兵给我们前半截队伍带来的灾害完全一样。

尽管我这时由于看到我们的士兵都被吓得象小孩子一样心惊胆怕而感到很气恼，可是我觉得普鲁士人非常可怜，他们虽然预先得知我们来临的消息，但是却放了几枪就停了火，也是慌慌张

张地退走了。我们的前哨仍旧停在原来的位置，并没有遭到任何袭击。只要一个骑兵连或一阵密集的射击就足以能够把我们赶得狼狈而逃。

维利希离开前哨队伍急忙驰赴本队。伯桑松连最先重新整队，其余的受了些申斥的人也加入了这个连。天已破晓了。我们受到的损失是6人负伤，其中一名是我们的一个参谋官，他就是当我跑向前哨一分钟以后在我刚刚离开的地方被龙骑兵的战马撞伤的。此外，有几个人显然是被我们自己人的枪弹打伤的。为了不让普鲁士人得到一件哪怕是最没用处的战利品，我们把所有被丢掉的装备品都仔细地收拣了起来，然后慢慢向纽特哈尔特折回。在最先遇到的几幢房屋后面埋伏下步枪手，他们就以房屋做为掩护体。可是普鲁士人并没有来，齐赫林斯基又去侦察了一次，发现他们仍旧呆在山后面，他们从山后对他开了几枪，但没有打中。

给我们解运大炮的几个普法尔茨农民已经押着一门大炮穿过了村子，另一门翻倒在地上。赶车人把套索割断，拉了5匹马逃跑了。我们只好把炮扶起来，只用一匹辕马拉着它继续前行。

在到达施培克的时候，我们听到右方，在弗里德里希斯塔尔那边有越来越厉害的互相射击的声音。克雷门特先生终于开始了进攻，但是比约定的时间迟了一小时。我提议我们从侧面进攻来支援他，以补救错过的时机。维利希也有同样的意见，他命令我们顺着第一条拐向右边的路前进。我们队伍的一部分转到了那边，这时从克雷门特那里来了一名传令官报告说克雷门特已经撤退。既然如此，我们就开向布兰肯洛赫。不久我们遇到了从总参谋部来的博伊斯特先生，他看到我们完整无恙而且队伍整整齐齐表示很奇怪。逃到卡尔斯卢厄的可恶的龙骑兵，到处乱讲，说什么维

利希战死了，所有的军官都阵亡了，队伍四处逃窜，全被消灭了。说什么敌人对我们使用了霰弹和“燃烧弹”。

在到达布兰肯洛赫以前，我们遇见普法尔茨和巴登的军队，最后还有施奈德先生和他的参谋部。这个老奸巨滑的骗子大概整夜都安安静静地睡在床上，他竟还有脸向我们大叫道：“你们上哪里去，诸位先生？敌人在那边！”我们自然也同样回敬了他一句，从他旁边经过，到了布兰肯洛赫我们想了一些办法来略事休息和用餐。两小时以后施奈德先生带着他的军队转回来了，自然他也没有看到敌人，回来后就坐下来吃早饭。

现在施奈德所统率的人，连来自卡尔斯卢厄一带的援军算在一起，约有 8000—9000 人，其中有 3 个巴登的常备营和两个巴登的炮兵连。共有大炮约 25 门。由于梅洛斯拉夫斯基的命令有些不明确，更重要是由于施奈德先生庸碌透顶，所以普法尔茨的军队还全部停留在卡尔斯卢厄一带，而普鲁士人却已经在盖尔曼尔斯海姆的桥头堡掩护之下过了莱茵河。梅洛斯拉夫斯基下过一道通令（见他写的巴登战役的报告¹⁰³）：从普法尔茨撤退以后，要守住从斯拜尔到克尼林根的莱茵河渡口，还下过一道特别命令：掩护卡尔斯卢厄，并以克尼林根桥做为全军的集合点。施奈德先生则理解为：在没有接到新的命令以前，他应该继续留在卡尔斯卢厄和克尼林根。假如他按照梅洛斯拉夫斯基通令的意图派一支配备有炮兵的精锐队伍去打盖尔曼尔斯海姆的桥头堡，那就不会这样荒唐地命令姆尼夫斯基少校带着 450 名新兵，连大炮也没有，就去夺回桥头堡；3 万普鲁士人也就不会畅行无阻地渡过莱茵河；我们同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联系就不会中断；普法尔茨的军队也就会及时地赶到瓦格霍伊泽尔战场。然而普法尔茨的军队却不是这样

做的，它在瓦格霍伊泽尔激战那一天，即6月21日，慌乱地奔跑于弗里德里希斯塔尔、魏茵加腾，布鲁赫萨尔等地之间，不知道敌军在哪里，东跑西跑地白白浪费时间。

我们被命令到右侧去，经魏茵加腾沿山坡推进。我们就在6月21日这一天中午从布兰根洛赫出发了，离开魏茵加腾的时间约在傍晚5点钟。普法尔茨军队终于开始感到不安了，他们发觉敌军实力是占优势的，到当时为止，至少可以说到那一仗以前他们一向所表现那副惹人瞩目的目空一切、满不在乎的神气不见了。从这时起，普法尔茨和巴登的人民自卫团，后来渐渐地常备军也和他们一样，到处都好象看见了普鲁士人似的，在他们中间每天都不止一次地受到这样的虚惊，因此常常引起全面的混乱，常常造成极端滑稽可笑的场面。过了魏茵加腾，刚登上一个高岗，就有巡逻队和农民向我们跑来，大叫道：“这里有普鲁士人！”我们的队伍就排成战斗队形冲上前去。我折回城里去发警报，因此我丢掉了自己的队伍。自然，这一阵惊慌混乱后来证明是毫无道理的：普鲁士人已经离这里向瓦格霍伊泽尔去了，维利希还在同一天晚上就进入了布鲁赫萨尔。

我在奥贝格罗姆巴赫同奥斯渥特先生和他的普法尔茨营过了一夜，第二天早晨同他们一起向布鲁赫萨尔进发。离城不远，迎面跑来了几辆马车，上面坐着掉队的兵士，他们大叫“这里有普鲁士人！”全营立刻骚动起来，好容易才使他们听命继续前进。自然这次又是谎报；在布鲁赫萨尔，找到了维利希和普法尔茨军前卫残存的队伍；其余各队陆续来到，而普鲁士人连影子也没有。除军队和指挥官以外，德斯特尔先生、前普法尔茨临时政府、还有戈克（他从布伦坦诺的独裁专政开始建立的时候起可以说差不多

是专门跟着军队帮办民政事宜的),都在这里。军队的给养情况很坏,秩序非常混乱。只有大本营里的那些人们象往常一样生活得舒舒服服。

我又从卡尔斯卢厄的现存弹药中领到了相当数量的子弹,当晚开拔,和我们一同开拔的还有全体前卫部队。他们到乌布施塔特扎了营,我们则向右转,到翁特略威斯海姆去在土地上掩护队伍的侧翼。

从外表看来,现在我们是一支强有力的队伍。我们又新增加了两支援军。一支是兰根坎德尔的营,这个营的战士正从自己的诞生城市逃向克尼林根桥,营里的《beaux restes》〔“剩下的宝贝”〕加入了我们的队伍,这些人里面有一名上尉、一名中尉、一名旗手、一名司务长、一名下士和两名士兵。另一支是举着红旗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这支队伍约有60人,这些人简直象生番一样,在征用物品方面已不止一次地立下了英雄的功绩。此外,我们又配备了4门巴登的大炮和一营巴登人民自卫团,这个营叫做什么克尼尔、克纽尔还是克尼里姆营(名字究竟怎样叫已无法确定)。克尼里姆营真不愧是克尼里姆先生指挥下的营,而克尼里姆先生也称得起是这个营的指挥官。这些顽固死硬的人们都是糟糕透了的空谈家和懦夫,而且总是喝得醉醺醺的;我们下面可以看到,有一种为人所唾弃的“热情”驱使着他们立下了最伟大的英勇功绩。

6月23日早晨,维利希收到在乌布施塔特指挥着普法尔茨前卫部队的安内克写来的报告,报告的内容是:敌人迫近,我军已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撤退。维利希接到这个奇怪的消息非常吃惊,立刻骑马赶到那里,训勉安内克及其手下的军官要在乌布施塔特

展开战斗并亲自视察了阵地，指出架设大炮的位置。然后他赶了回来，命令我们的战士们进行战斗准备。当我们正在调动队伍的时候，我们接到了从布鲁赫萨尔来的由泰霍夫签署的下列命令：我军主力部队正向海得尔堡进发以便今天就能赶到明戈尔斯海姆，我们应同时取道奥登海姆开赴瓦尔丹格洛赫在那里过夜并等待主力部队胜利的消息和有关我们下一步行动的命令。

司徒卢威先生在任意编造的“巴登三次人民起义的历史”第311—317页¹⁰⁴上有一篇关于6月20—26日普法尔茨军队作战的报告。这篇报告完全是为无能的施奈德进行辩护，而且不确切和歪曲事实的地方非常之多。从以上所述，已经可以清楚地看出如下几点：(1)说施奈德“在到了布鲁赫萨尔(6月22日)几小时后就得到了瓦格霍伊泽尔的作战情况及其结果的情报”，是不正确的；(2)可见，说“因此他改变了计划，撤消原定向明戈尔斯海姆进军的计划”，说22日他就已经“决定同他那一师的主力部队留在布鲁赫萨尔”，也是错误的(前面谈到的泰霍夫的手令写于22日夜)；(3)说“预定在23日早晨进行大规模的侦察”是错误的；事实上，是预定把队伍开赴明戈尔斯海姆；(4)司徒卢威硬说什么“所有各个队伍都接到命令一听到枪声时就朝枪声的方向前进”；(5)还说什么“右翼的队伍(维利希)以未听到枪声来解释自己在乌布施塔特战役中的退却”，——我们下面将会看出，这一切全都是拙劣的谎言。

我们立即行动起来。在奥登海姆准备用早饭。拨给我们担任联络工作的几名巴伐利亚的轻骑兵驰向左方，绕着村子，侦察有无敌军。普鲁士骑兵已经到过这个村子，在当地征集了一批草料，准备迟一些再来取。我们没收了这些草料，开始为我们没有解散

的队伍分发葡萄酒和粮食，正在这时候，一个轻骑兵飞奔而来叫道：“这里有普鲁士人！”一刹那间，位置离我们不远的克尼里姆那一营人乱了起来，变成了一群疯子，到处乱跑，吵闹喊叫，怨天骂地，而少校先生由于控制不住他的受了惊的战马，只好把自己的队伍让老天爷去管。维利希乘马来到，恢复了秩序，我们才继续前进。而普鲁士人自然是根本没有发现。

在奥登海姆后面的高地上，我们听到了从乌布施塔特那边传来的轰轰炮声。炮声很快地听得更清楚了。有经验的人已经能够从炮声中辨别射出的是普通炮弹还是霰弹。我们开会研究了一下是继续照原方向前进还是沿炮声的方向前进。既然我们有明确的命令，而炮声听来又是来自明戈尔斯海姆那边，这就是说我们应该前进，于是我们就决定向危险性更大的方向——向瓦尔丹格洛赫前进。万一普法尔茨军队在乌布施塔特打了败仗，我们差不多就要被封锁在山里，处境将非常危险。

司徒卢威先生说什么乌布施塔特之战“假如侧翼部队能及时发动进攻，本来是能够取得辉煌战果的”（第314页）。可是炮声持续连一个小时都不到，而我们赶到马特菲尔德和乌布施塔特之间的战场则需要两个至两个半小时，也就是说我们要在战斗结束后一个半小时才能到达那里。司徒卢威就是这样写“历史”的。

在距欧芬巴赫不远的地方，我们停歇了一下。当我们的队伍饮水用餐的时候，维利希发出了几份紧急文件。克尼里姆营在欧芬巴赫发现了一个象是市属酒窖的地方，他们把它没收了，把整整桶整桶的酒搬出来，一小时的工夫全都喝得酩酊大醉。早晨对于普鲁士人的一场虚惊所引起的满腹懊恼，乌布施塔特那边传来的炮声，这些英雄们彼此之间以及他们对自己军官的不信任心理

——这一切在酒的刺激下，突然地变成为公开的暴乱。他们要求立即全军转回去，因为他们不愿意在敌人面前无休止地穿山越岭。这自然是根本不可能的，于是他们就擅自地掉回头去走掉了。生番似的“罗伯特·勃鲁姆纵队”也跟他们去了。我们任他们离去，然后便向瓦尔丹格洛赫进发了。

这里是一个很深的凹地，在这里过夜无论如何是不安全的。因此我们就停息下来，打探周围地区的地势及敌军分布情况。这时，农民中间流传着一个不太明确的消息，好象尼喀军已撤退。还传说什么一支不小的巴伐利亚军队取道辛斯海姆和艾宾根在向布列顿推进，什么梅洛斯拉夫斯基本人已隐姓埋名极为秘密地经过这里，在辛斯海姆曾险些被捕。炮兵骚动了起来，连我们的大学生也抱怨起来。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就把炮兵遣回，然后向希尔斯巴赫进发。在希尔斯巴赫我们知道了48小时以前尼喀军撤退的详细情况，知道了巴伐利亚人驻在辛斯海姆，距我们有一个半小时的路程。据判断，他们有7000人，但后来知道实际上达1万人之多。我们的人数至多不过700。我们的兵士们不能再继续前进了。因此，我们把他们安置在仓库的库房里（象往常一样想把他们集中在一起），布置下很强的班哨，然后就去安歇了。当我们在第二天即24日的早晨动身的时候我们已清清楚楚地听见巴伐利亚军队开近的声音，我们走后最多有一刻钟的工夫，巴伐利亚人就到了希尔斯巴赫。

两昼夜以前，即6月22日，梅洛斯拉夫斯基曾在辛斯海姆过夜，而当我们到达希尔斯巴赫的时候，他早带着他的队伍到了布列顿。贝克尔率领后卫部队也走过了辛斯海姆。因此，他不可能如司徒卢威先生在第308页所说的那样，23日那天在辛斯海姆过

夜，因为在晚上 8 点钟，也许还会更早一些，那里就有了巴伐利亚人，他们在头天晚上还同梅洛斯拉夫斯基打了不大的一仗。梅洛斯拉夫斯基从瓦格霍伊泽尔撤出而取道海得尔堡奔赴布列顿的行动，被这次行动的参加者认为是最危险的一着。6 月 20 日至 24 日梅洛斯拉夫斯基所指挥的军事行动：在海得尔堡迅速地集结队伍打击普鲁士人，瓦格霍伊泽尔一仗打败后迅速撤退，这一切当然都是他在巴登的全部活动的最光荣的一页；但是这种战术碰到了这样懈怠的敌人，危险性并不怎么大，在 24 小时后我们率领着一支不大的队伍竟能顺利地希尔斯巴赫全部撤退就说明了这一点。甚至我们还畅行无阻地通过了弗列辛根狭谷（梅洛斯拉夫斯基曾预料 23 日在那里要受到攻击），然后向毕希克前进。我们打算在那里停下来，以便在必要时掩护梅洛斯拉夫斯基在布列顿扎下的营盘，使他不致于第一个受到打击。

在我们途经艾宾根、采森豪森和弗列辛根的时候，到处都被人投以惊异的眼光，因为尼喀军的全部队伍，包括后卫，都早已从这里开过去了。当我们到达毕希克的时候，号兵吹起了军号，居民们着了慌，他们以为是普鲁士人来了。正在为梅洛斯拉夫斯基军营征集军粮的布列顿市民自卫团的队伍，把我们当成了普鲁士人，慌乱起来，直到我们拐了弯，他们看到我们穿的是便服，才放了心。我们马上征用了他们准备好的食品，刚刚吃完就得到消息：梅洛斯拉夫斯基率领所部从布列顿出发了，于是我们就赶紧奔赴布列顿。

我们在布列顿住了一夜，由市民自卫团布置岗哨守卫。我们征用了一批运货车，以便在次日早晨把全体队伍运往埃特林根。我们再没有其他的办法重新同主力部队汇合，因为布鲁赫萨尔在 24

日就被普鲁士人占领了，如果那条经迪德尔斯海姆通向杜尔拉赫的道路被敌人占领（我们后来知道确是被占领了），我们就无法打仗了。

在布列顿，大学生推选了几名代表来见我们，声称他们不愿意在敌人面前无尽无休地行军，请求放他们走掉。我们当然答复说，在面临着敌人的情况下是绝对不准走的；如果他们要想开小差，那是他们自己的事。于是，几乎有半连人走掉了。其余的则一个一个地不断开小差，很快就只剩下一些步枪手了。在整个行军过程中，这些大学生一般地都象是些永不满足和胆小如鼠的贵公子，他们总是要求知道全部作战计划，腿上擦破了一点他们就要叫苦，如果行军时不能让他们过得完全和假日游览一样地舒适满意，他们就会怨声载道。在这些“知识分子代表”中间，只有几个人例外，这几个人表现了真正的革命品质和勇敢非凡的精神。

敌人在我们离开半小时以后进入了布列顿，这是我们后来听说的。我们到达了埃特林根，在埃特林根，科尔文-维尔兹比茨基先生建议我们开往杜尔拉赫，贝克尔奉命在该地牵制住敌人，直到卡尔斯卢厄撤退完毕为止。维利希派了一名轻骑兵给贝克尔送了一封信去，问他能否再坚持一些时候。一刻钟以后派去的人回来报告说在路上遇到了贝克尔的队伍，他们已经全部撤退了。因此我们就开往全军汇合地点拉施塔特。

到拉施塔特夫的路上的景象混乱无比。大批的各色各样的队伍，有的列队前进，有的混杂在一处休息。我们费了很大劲才在酷热的烈日之下、在一片混乱之中把我们的战士集合在一起。在拉施塔特城堡前的斜堤上面屯驻着普法尔茨军队和巴登军几个营的军营。普法尔茨军队兵员的数目大大减少了。还在乌布施

塔特战役以前，齐茨先生和班贝尔格先生就在卡尔斯卢厄召集了最精锐的队伍——莱茵-黑森队伍。这两位为自由而战的英勇斗士向这支队伍宣布什么一切都完了。敌军力量的优势太大了，现在完好无恙地回家还有可能，他们——议会空谈家齐茨和英雄人物班贝尔格——不忍心让大家无辜地流血或遭受其他的横祸，因此他们宣布这支军队解散。莱茵-黑森军队的战士们听了这种可耻的提议自然非常愤怒，他们气得想把这两个叛徒抓起来枪毙。德斯特尔和普法尔茨政府也下令通缉他们。但是这两位可敬的公民已经躲起来了。在以后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勇敢的齐茨已经平安无事地从巴塞尔来袖手旁观了。1848年9月齐茨先生曾经“号召坚决的行动”¹⁰⁵，1849年5月他又是鼓动农民起义的最积极的议会吹牛家之一，可是在这两次，他都是在起义当中最先置人民于不顾的人中间名列前茅。在基尔赫海姆博兰登，最先逃跑的人中间就有齐茨先生，而他的步枪手却进行了决战，牺牲在枪弹之下。

莱茵-黑森的队伍本来已经和其他队伍一样，由于兵士开小差而大大削弱，由于巴登的撤退而士气不振，而现在一下子垮得丝毫也振作不起来了。一部分战士四散回家了，另一部分经过改编，一直战斗到底。其余的普法尔茨军队驻扎在拉施塔特的时候，听说7月5日以前回家的都将被赦免，因而军心涣散。一半以上的人员都跑掉了，各个营人数都减少到一连人的样子，下级军官大都离散，剩下来的不足1200人的队伍差不多是无济于事了。至于我们这一支队伍，虽然决没有泄气，但是由于损失、生病、大学生开小差，也有所削弱，剩下来的只有500人多一点。

当晚，我们在库本海姆宿营，这里已经驻有别的队伍。第二

天早晨，我同维利希到拉施塔特去，在那里又遇到了莫尔。

报刊和各个民主团体对巴登起义中牺牲了的那些多少算是出身于有教养的阶级的人物，又写文章又作诗，歌颂备至。至于承担了战争全部重担、战死沙场的千千万万的工人，那些活活痍死在拉施塔特牢房中的人们，以及目前身居异乡，在所有流亡者中间唯一在流放中受尽贫穷困苦的折磨的人们——关于这些人谁也没有提起过。工人受剥削，这是由来已久和非常习见的现象，所以我们的正牌的“民主派”先生们只可能把工人当作一种易燃物看待，把他们当作鼓动和剥削的对象，或者拿他们来做炮灰。我们的“民主派”愚蠢极了，浑身浸透了资产阶级气息，所以他们无法理解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无法理解工人阶级的未来。因此，对于真正的无产阶级品质他们也是仇视的。无产阶级所具有的这些品质是：自尊心非常强，决不肯对他们阿谀逢迎；眼光非常远大，决不肯被这些“民主派”先生们所利用，然而每次发生推翻现政权的运动的时候工人阶级总是拿起武器奔向前方，在任何革命运动中这些品质都直接体现着无产阶级的党。但是，如果所谓的民主派不想对这样工人的品质做出正确的估价，那末，无产阶级的党则有责任来表扬这些工人的功绩。科伦的约瑟夫·莫尔就是这些工人之中最优秀的一个。

莫尔的职业是钟表匠。很多年以前他离开了德国，参加过法国、比利时和英国的所有公开的和秘密的革命团体。1840年他参加了成立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工作¹⁰⁶。二月革命以后他回到德国，不久就和他的朋友沙佩尔一起担负起科伦工人联合会的领导工作¹⁰⁷。1848年科伦九月事件¹⁰⁸后曾流亡伦敦，不久又改名换姓回到德国，在情况极不相同的各个地区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别

人都不敢去执行的危险任务他都一力承担起来。在凯则尔斯劳顿我又遇到了他。他在这里接受了到普鲁士去进行工作的任务，他所要执行的任务一旦被发觉马上就有被枪毙的危险。在第二次执行完这样的任务以后，他顺利地闯过了所有敌军的驻地，一直来到拉施塔特，到了这里立即加入了我们这支队伍，加入了伯桑松工人连。过了3天他就阵亡了。我失去一位老朋友，党则少了一个最不知疲倦的、无所畏惧的和可靠的先进战士。

无产阶级的党在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里的力量相当强大，特别是在志愿队里，例如在我们这一队，在流亡者军团等等。这个党敢于对一切其他党派这样说：无论哪个党派也无法对无产阶级的党的任何成员提出丝毫的责难。最坚定的共产主义者也是最勇敢的兵士。

第二天，即27日，我们的队伍深入山地，朝罗腾菲尔斯的方向往前转移了一些。军队所划分的各种战斗单位，各单位负责的地区，逐渐地确定了下来。我们属于右翼第一师，指挥是托梅上校，他就是那位在麦凯斯海姆要把梅洛斯拉夫斯基逮捕起来的那位先生¹⁰⁹，但是却儿戏似地让他仍旧留任这个职位。从27日起，这一师归梅尔济来指挥。济格尔提让由维利希任普法尔茨军队的司令官，维利希予以谢绝，而担负了师参谋长的职务。这一师的分布线是从格恩斯巴赫、从维尔腾堡的边界线到罗腾菲尔斯的那一边。左方紧靠着集结在库本海姆周围的奥博尔斯基师。前哨部队进驻界口和祖尔茨巴赫、米歇尔巴赫、文克尔。给养起初不好，不能按时发下，27日以后有所改善。我们这一师的全部人马是：巴登军的几个常备营、普法尔茨军队中留下来的由布伦克尔率领的一部分人、我们的队伍、还有一个至一个半炮

兵连。普法尔茨军队在格恩斯巴赫及其附近驻防，常备军和我们的队伍在罗腾菲尔兹及其附近。大本营设在罗腾菲尔兹对面，埃利莎贝顿魁尔的一座旅馆里。

28日，我们——师参谋部人员、我们队伍的参谋部人员、还有莫尔、金克尔以及其他的志愿队人员——在这座旅馆里坐下来喝咖啡的时候，忽然得到情报说我驻米歇尔巴赫的前卫部队遭到普鲁士人的攻击。虽然我们完全有根据认为敌人的意图只不过是进行侦察，但我们还是立即出动了。情况果然不出所料。当我们到达的时候，曾被普鲁士人暂时夺去的位于峡谷中的米歇尔巴赫村已经夺回。双方隔着峡谷从两面的山坡射击了一阵，白白浪费了许多弹药。我只看到一个人被打死，一个人被打伤。当常备军在从距离600—800步远的地方盲目地发射自己的子弹的时候，我队战士则按照维利希的命令十分坦然地把枪枝放在一起，在虚构的敌军身边，在虚构的火网之下休息。只有步枪手走下林木丛生的斜坡，在常备营的一部分战士支援下，把对面山坡上的普鲁士人赶跑了。我们的一个步枪手用他那枝简直象是手提式大炮的大枪向敌人射击，在差不多相距900步远的地方把一个普鲁士军官打下马来，这个军官手下的全连人马立即折回，逃入林中。落到我们手中的有几个被打死打伤的普鲁士人，还有两名俘虏。

第二天，全线总攻击开始了。这一次普鲁士先生们使得我们连午饭都来不及吃。我们得到的消息说第一次进攻是在毕什维尔，即奥博尔斯基师同我师驻防区交界处发动的。维利希极力主张我们的队伍尽可能留驻在罗腾菲尔兹作为后备，因为无论如何要防备在相反的方向，即在格恩斯巴赫方面受到敌人的主攻。但是梅尔济反对这样做，他说，大家都知道，我们这里常常是

在一个营遭到了进攻的时候，其余各营不立即全体出动予以支援，这个营就会发生哗变，全体都会逃跑。于是，我们就向毕什维尔前进了。

维利希和我率领一连步枪手沿牟尔克河右岸，向毕什维尔进发。在距离罗腾菲尔斯有半小时路程的地方，我们和敌人遭遇了。步枪手分成散兵线散开，维利希则纵马折回，督促落在后面不远的一支队伍赶上前线。我们的步枪手在果木树葡萄架的掩护之下同敌人对持了一段时间，敌军火力非常强大，我们的战士亦猛烈地予以还击。但是后来有一支强大的敌军纵队沿大路冲向前来增援他们的步枪手，这时我军左翼的步枪手后退了，无论怎样也无法说服他们守住阵地。右翼则向山地前进，然后同我们的队伍汇合了。

我觉得对于我们的步枪手简直毫无办法，于是我干脆丢开他们不管，向山上插有我们队伍的旗帜的地方奔去。有一个连落后了，连长本来是一个裁缝，可以算得是一个勇敢的小伙子，当时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我把他的战士并入了其余的队伍，这时遇到了维利希。他刚刚命令伯桑松营布成散兵线，在后面又把所有其余的队伍（包括派往山地去掩护右翼的那个连）布成两条战线的阵势。

我们的散兵线遭到了猛烈火力的射击。我们面临着的敌军是普鲁士步枪手。他们有步枪，有尖头子弹，而我们的工人只能用旧式火枪来对付他们。然而，他们在我们右翼的步枪手的参加下、支援下，工人们坚决地转入进攻，结果距离拉近了，特别是右翼，这样很快就抵消了武器不好的弱点，普鲁士人被打退了。两条战线的阵势几乎紧接在散兵线的后面一直保持没动。在这个时候，在我们左方牟尔克河谷里运来了两门巴登的大炮，用这两门大炮向

停在路上的普鲁士步兵和炮兵开了火。

激战进行了约一个小时,射击的火力异常猛烈,普鲁士人节节后退;我们的步枪手已经打到毕什维尔,这时普鲁士人得到了增援,派了几个营向前挺进。我们的散兵线后退了;第一战线排枪齐发,第二战线略向左方转入谷地后也开了火。但普鲁士人以密集的队伍全线发动进攻。掩护我军左翼的两门巴登大炮已向后退,在右翼方面,普鲁士人已经下了山,于是我军被迫撤退。

我们刚刚撤出了敌人的交叉火力点,就在山坡上占据了新的阵地。先前,我们的阵地是面向莱茵平原,面向毕什维尔和尼德尔维尔,而现在则是面向奥贝尔维尔方面的普鲁士人所控制的山地。现在,那些常备营也终于来到火线上,我们队伍中的两个连再次被调到前面布成散兵线,常备营就同他们一起投入战斗。

我们的伤亡很重。我们少了约30人,其中包括金克尔和莫尔,而四散逃走的步枪手还不算在内。金克尔和莫尔率领着本连的右翼和若干名步枪手向前走得太远了。步枪手的指挥官,来自莱茵普鲁士特罗涅肯的埃梅尔曼(他是森林守护队长,他去打普鲁士人就象是去猎兔一样)把步枪手们带到一个地方,从那里射击普鲁士炮兵辎重队,迫使它急忙退却。可是正在这时候,从谷地冲出了一连普鲁士人,向我们开火射击。金克尔倒下了,头部负了伤,只好抬着他,一直到他能重新自己走路时为止;可是他们很快就落在交叉火力的射击之下,必须想办法脱身。金克尔不能随着大家走了,他跑到一个农民家里,在那里被普鲁士人抓住痛打了一顿。莫尔的腹部中了一枪也被俘了,很快就因伤重而死。齐赫林斯基也负了伤,被跳弹打中颈部,但他仍然留在队伍里面。

当主力部队原地不动,而维利希驰赴战场的另外一端的时候,

我急忙向牟尔克河上位于罗腾菲尔低凹地区的那座桥跑去，那座桥算是一个汇合点。我是想得到来自格恩斯巴赫的消息。但是我还没有到那座桥，就看见陷入火海的格恩斯巴赫的上空烟雾腾腾，到了桥上我听说这里的人已听到格恩斯巴赫方面轰隆炮声。后来我又到桥那边去了几次，格恩斯巴赫来的消息一次比一次糟糕；在桥旁边集聚的巴登常备军一次比一次多，这些军队刚一上火线就失魂丧胆了。最后，我听说敌人已经到了加根瑙。现在马上应该朝此方向迎击敌人。维利希带着队伍过了牟尔克河，去占领罗腾菲尔对面的阵地，他还带了恰好落到他手里的4门大炮。我去找我们那两个成散兵线前进的连，这时他们已经向前走很远了。我到处都迎面碰到常备队，大部分都没有军官。其中一支队伍由一个医官率领着，他趁此机会向我作了一番自我介绍：“您想必认识我，我叫诺伊豪斯，是图林根运动的领导人！”这些非常可爱的人到处都把普鲁士人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因为四处都看不到敌人便回来了。我没有找到我们那两个连（他们也由于同样的原因而取道罗腾菲尔折回），于是又奔向桥那边去了。在那里我遇到了梅尔济和他的参谋部、军队。我请求他至少拨给我两三个连去支援维利希。得到的答复是：“把全师带走都可以，只要您有办法对付这帮人。”这些士兵曾到处击败敌人，停歇下来一共才只有5个钟头，而这时他们却躺在青草地上，组织溃散，士气低落，毫无用处；敌人在格恩斯巴赫对他们进行包抄的消息对他们产生了致命的影响。我继续向前走。我遇到的那个从米歇尔巴赫回来的连也根本不中用了。当我重新回到原来大本营中我们的队伍的时候，忽然从加根瑙跑来了大批普法尔茨难民，还有毕斯托-秦恩带着他那一帮现在已配备上火枪的乌合之众。维利希到处侦察了好久，

选定了一个既能控制牟尔克河河谷又能同时相当有利地进行步枪射击的炮兵阵地，可是炮兵们却拉着大炮飞驰而过，连长也无法阻住他们。他们于是又到桥上梅尔济那里。就在这个时候，维利希把梅尔济写的一封信拿给我看，信里说一切都完了，他将向奥斯那边撤退。我们没有别的办法，也只好和他们一样，立即向山地前进，当时的时间大约 7 点钟。

格恩斯巴赫的情况是这样：波伊克尔所率领的帝国军队（前一天已被我方巡逻队在维尔腾堡界内的海勒纳尔伯发现）和布防在边境上的维尔腾堡军队一起，在 29 日午后进攻格恩斯巴赫。他们先对我方前哨人员用了一个背信弃义的援兵之计，高喊不要开枪，说他们是自家弟兄，可是等到相距 8—10 步远的时候他们一齐开火，于是使得我军哨兵不得不撤退。然后他们就用榴弹轰击格恩斯巴赫，并纵火烧城。当大火已经烧到根本无法救的时候，济格尔先生（梅洛斯拉夫斯基派他到那里去要不惜一切牺牲保住阵地）亲自下令给布伦克尔先生及其部下边战边撤。在布伦克尔先生的一个副官当着他（济格尔先生）和维利希的面讲述这件莫名其妙的怪事的时候，济格尔先生正象他在伯尔尼一样，并不否认这一事实。由于下了这样一道命令——“边战”（！）边放弃牟尔克河上的全部军事部署的中心据点，——战斗自然是全线失败，而且巴登军的最后一个阵地也丢了。

普鲁士人虽然在拉施塔特打了胜仗，但是也并不十分光采。我军只 13000 人，大部分都士气低落，而且除少数例外，指挥都不好；敌人的军队加上打到格恩斯巴赫的帝国军队，一共至少有 6 万人。虽然在力量对比上他们占了这样大的优势，可是他们却一次也不敢认真地进行正面攻击，而是采用懦夫的背信弃义的手段，破

坏了我们不能进入的维尔腾堡领土的中立。如果不是格恩斯巴赫留守的人少得那样奇怪，如果不是济格尔先生下了前面所提到的那道令人难忘的命令，那末尽管普鲁士人使用了那样背信弃义的手段，他们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至少在最初不会有什么好处），最后仍然必须进行正面攻击。毫无疑问，我们的阵地决不能说是难以攻破的，再过一天也一定会被夺去；然而这样的胜利会使普鲁士人付出更多得无比的牺牲，而且会大大破坏他们的军事声誉。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们才选择了破坏维尔腾堡中立的办法，而维尔腾堡也竟然不动声色地任其破坏。

我们这支不超过 450 人的队伍穿过山地向奥斯那边撤退。这里道路上挤满彻底瓦解了的军队、马车、大炮等等；一切都极为混乱。我们继续前进，在金茨海姆停下来休息了一下。第二天早晨在过了毕尔以后，我们招收了一批逃亡者，并在奥贝拉赫恩过了一夜。最后一仗是在这一天打的。德意志-波兰军团，另外还有贝克尔师的几支队伍一起在奥斯击退了帝国军队并从他们手中夺得一门榴弹炮（梅克伦堡的），这门炮后来顺利地运到了瑞士。

军队是完全瓦解了。梅洛斯拉夫斯基和其他的波兰人都辞去指挥的职务；奥博尔斯基上校于 6 月 29 日晚上，还在战场上就放弃了自己的职守。可是这种暂时的瓦解本身还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普法尔茨军队彻底溃散已经有三四次了，而且每次又都 *tant bien que mal*〔马马虎虎〕地重新组织起来。现在还有两个办法可以尝试一下，那就是尽可能慢些撤退，在所有不得留给敌人的地方征集兵员以补充队伍，并迅速地把上巴登的夫赖堡和多瑙埃申根征集来的兵员集中起来。这样，他们还能够在短期内多少整顿一下秩序和军纪，在夫赖堡前面的凯则尔什图尔或者在多

璫埃申根做最后一次拚死的但是光荣的战斗。然而不论政治领导者还是军事领导者，都比兵士们更加泄气。他们对军队以及整个运动都抱着听天由命的态度，一直撤退下去，被打得落花流水，束手无策，垂头丧气。

在格恩斯巴赫一仗之后，所有的人都耽心被敌人从维尔腾堡方面包抄，这就使得普遍士气低落的情况更为严重。维利希的队伍带了两门山炮——发给我们的火炮除这两门以外都在经过卡培尔以前就丢下了——沿卡培尔河谷向山地进发，以便从维尔腾堡边界来进行掩护。我们行军经过黑森林的时候，一次也没有遇上敌人，简直是作了一次愉快的旅行。我们在7月1日经阿列尔海里根到达奥本璫，2日通过洪茨科普夫山峰到达沃尔法赫。7月3日我们在这里得到消息说政府现在夫赖堡，而且连这个城市也打算放弃。我们听到这个消息，立即奔赴该地。我们想要使临时政府的委员先生们和当时在济格尔这位英雄人物领导之下的最高司令部不要一仗也不打就把夫赖堡双手送给敌人。我们从沃尔法赫动身得迟了一些，深夜才到达瓦尔德基尔希。我们在这里听说夫赖堡已经放弃了，政府和大本营的驻地已转移到多璫埃申根。这时我们又接到了一道直接下达的命令，要我们占领西蒙斯瓦尔德河谷，在那里构筑工事，并把我们的参谋部设在福特万根。因此我们只得折回布莱巴赫去。

济格尔先生现在把自己的军队驻扎在黑森林山脊的那一边。防线的布置是：从寥拉赫起，经托德璫和福特万根，朝施拉姆堡的方向，伸延到维尔腾堡的边界。左翼有梅尔济和布伦克尔，沿着莱茵河谷向寥拉赫前进；其次有曾做过推销员的多尔先生，他以黑克尔军的将军的身分被任命为师长，驻守霍伦塔尔地区；再

其次是我们的队伍，分布在福特万根和西蒙斯瓦尔德河谷；最后，在右翼方面，贝克尔的队伍驻在圣格奥尔根和特利堡。济格尔先生率领着一支后备军驻扎在山脊那边的多瑙埃申根。这时的战斗力量虽然常常有人逃跑大大削弱，并且没有新兵来补充，但是还有约 9000 人和 40 门大炮。

从大本营，从夫赖堡、乌塔赫河畔的纽施塔特和多瑙埃申根来的一道又一道的命令，充满着决一死战、视死如归的精神。的确，大家都估计敌人会从维尔腾堡出动取道罗特威尔和菲林根，再次袭击我军的背后；但是大家有极大的决心把敌人打垮，不论情况如何也要守住黑森林山地，正如有一道命令中所说的，“对敌人的一切动静都几乎不予理睬”。这就是说，济格尔先生想好了办法使自己能够在 4 小时内从多瑙埃申根堂而皇之地自瑞士境内撤退，然后他就可以安安稳稳地在沙福豪森坐视我们被包围在山地里的命运如何了。我们很快就会看到这种视死如归的精神造成了一个多么令人开心的结局。

4 日，我们带着两个连（160 人）到了福特万根，我们部队的其余的人应当占据西蒙斯瓦尔德河谷和居顿巴赫、圣梅尔根的山路。在圣梅尔根，我们曾和多尔先生的队伍为邻，在雪恩瓦尔德和贝克尔的队伍为邻。所有的山路都构筑了工事。5 日，我们驻在福特万根。6 日，从贝克尔那里传来消息说普鲁士人攻打菲林根¹¹⁰；同时他要我们在费伦巴赫袭击敌人以支援济格尔的行动。贝克尔还告诉我们说他自己的主力队伍在特利堡构筑了很牢固的防御工事，他本人等到济格尔一拿下菲林根，马上就到特利堡去。

要我们去进攻根本不可想象。我们这支不满 450 人的队伍负有守住 3 平方英里地面的任务，所以连一个人也抽不出来。我们

必须驻留原地，并且这样通知了贝克尔。随后不久，大本营来了一项紧急命令，派维利希立即奔赴多瑙埃申根，担任指挥全部炮兵的任务。当我们准备好正要动身的时候，有一队人民自卫团开到了福特万根，后面还有炮兵和人民自卫团的其他几个营。原来是贝克尔率领自己的队伍到了。据说，他的战士们个个思变。我向一位朋友，“少校”参谋奈林格尔打听了一下，才知道其中的缘故。原来他，奈林格尔在指挥特利堡的阵地的時候，刚刚下了构筑工事的命令，军官们就交给他一份由全体军官签名的声明，声明中说军心已变，如不立刻下令拔营，那他们军官就要带着自己的队伍一起离开。我一看签名，原来又是那勇敢的德雷埃尔-奥贝尔米勒营！奈林格尔没别的办法，只好把这个情况报告给贝克尔，然后就来到了福特万根。贝克尔立即动身来追赶他们，所以他和他的全部人马才来到了福特万根，而那些胆小如鼠的军官和士兵早在这里饱尝了我们志愿兵的冷嘲热骂。这些人弄得面红耳赤无地自容，到晚上贝克尔终于把他带回到他们原来的阵地。

我们这时也开往多瑙埃申根，随后去的还有伯桑松连。普鲁士人蜂涌而至，直奔大路而来。菲林根被他们占领了。可是，我们一路上并没有发生战事，晚上10点钟的时候，伯桑松连也来到了。在多瑙埃申根我遇到了德斯特尔，听他说，司徒卢威先生在夫赖堡的制宪议会¹¹¹上要求立即迁往瑞士，因为一切都完了；英雄布伦克尔采纳了这个提议，今天早晨他们已经路过巴塞尔转移到瑞士境内去了。这两个消息完全得到了证实。英雄布伦克尔的确在7月6日到巴塞尔去了，尽管他恰恰是距离敌人最远的人。他迟走了一些时候，这段时间不多也不少，恰恰够用来特别征集一批物资，为此他和济格尔先生，后来和瑞士当局发生了纠纷。英

雄司徒卢威先生,在6月29日还向人民宣称布伦坦诺先生以及每一个想同敌人进行谈判的人都是叛徒,谁知3天以后,在7月2日他却大大泄气,以至厚颜无耻地在巴登制宪议会上提出如下的建议:

“为了使上巴登的居民不象下巴登居民那样遭受战争灾祸,为了不再牺牲宝贵的鲜血,由于必须挽救尚可挽救的一切(!),应当把巴登议会的代表们和革命的全体参加者的7月10日以前的薪饷发给他们,再给以适当数量的路费,然后全体人员连同现金、储备物资、武器等等一并撤入瑞士境内!”

勇敢的司徒卢威这个高明的建议是在7月2日提出的,而这时候我们正停留在沃尔法赫、在黑森林山地,那里距夫赖堡是10小时的路程,距瑞士则是20小时的路程!司徒卢威先生真是够天真的,他自己在所著“历史”一书第237页上还描述了这回事,而且还非常自鸣得意。采纳这一建议只能有一个结果,即普鲁士人将尽全力进逼我们,以便“挽救尚可挽救的一切”,也就是说要抢夺我们的现金、武器和储备物资,因为执行了上述决定,这样来大力追击是一点危险也没有的;其次,我们的军队马上绝大多数人都会散去,整队整队的人马都会自行转赴瑞士,事实也正是如此。我们的队伍在这种情况下,处境也将最坏;我们驻留在巴登境内是到12日为止,而我们的军饷却发到17日。

济格尔先生不去想办法把菲林根从敌人手中夺回,而却首先决定在多瑙埃申根的后面,许芬根附近占领一块阵地,等待敌人。但是就在当天晚上又决定转移到接近瑞士边境的施图林根。我们赶紧派人骑马到福特万根给我们的队伍和贝克尔的队伍去送信。这两支队伍也都是要取道纽施塔特和邦多尔夫到施图林根去的。维利希到纽施塔特去迎接队伍,我则留在伯桑松连里。我们是在里德贝林根过的夜,第二天,即7月7日午后到达施图林根。8日,

济格尔先生检阅了一下自己的已经散失了一半的军队，并下令不再乘行，以后要行军（到边界线！），说完，他就走了。他留给我们半个炮兵连和一道下给维利希的命令。

这个时候，从福特万根传来了全面退却的消息，首先传到贝克尔那里，然后传到我们的驻扎在前面的几个连。我们的队伍先在福特万根集合，在纽施塔特遇上了维利希。贝克尔的驻地比起我们前面的队伍来距福特万根近一些，和我们走的是同一条路，可是他却迟一些时候才到达那里。他在路上遇上了一些堡垒，阻碍了他的前进。后来瑞士报纸上说这些堡垒是我们的队伍构筑的。这是不对的。我们的队伍只是在黑森林山脊的另外一边的道路上构筑了工事，根本没有在特利堡至福特万根这条路上构筑工事，这条路我们甚至没有去占领。此外，我们的志愿兵只是在贝克尔的前卫部队进入福特万根的时候才离开这个城镇。

在多瑙埃申根决定，全军剩余的部队在乌塔赫河那边埃金根和丁根之间集合，在那里等待敌人的临近。在这个地方，我们把队伍的两翼扎在瑞士的边境，凭着我们的力量不弱的炮兵，还能够来一次最后决战。甚至也许由于普鲁士人侵入瑞士领土而把瑞士也卷入战争。但是维利希来到以后，我们读了勇敢的济格尔的命令真是万分惊奇，他的命令里有这样的话：“主力部队开赴丁根和瓦尔茨胡特，并在那里占据坚固的阵地（！）。请你设法尽可能坚守阵地（施图林根和埃金根的阵地），守得越久越好。”可是丁根和瓦尔茨胡特的“坚固的阵地”背有莱茵河，前有敌人容易达到的高地！这只能意味着我军打算过泽金根桥转移到瑞士去。可是济格尔这位英雄在谈到司徒卢威的这个建议时不是说过，如果这个建议被采纳，他济格尔就第一个起来反抗吗？

我们紧靠乌塔赫河岸占据了阵地，并把队伍分布在埃金根和我们参谋部所在地乌推辛根之间。我们在这里接到了济格尔先生的一份更加奥妙的文件：

“命令。丁根大本营。1849年7月8日。送埃金根维利希上校。由于沙福豪森州现在已经对我采取敌对态度，所以我已经不可能占据我们商量好的那个阵地。你队的行动当适应这一形势，开赴格利森、劳赫林根和丁根。我明天将由此动身，可能到瓦尔茨胡特去，也可能到阿尔伯河去（即到泽金根去）……总司令济格尔。”

这太过分了。当晚，维利希和我驰赴丁根，“总军需官”施林凯对我们说了实话，实际上是要到泽金根去。到了那里再渡过莱茵河。济格尔起初还拚命地拿出“总司令”的身分来压人，但对于维利希没有起什么作用。最后维利希到底迫使济格尔下令返回，开向格利森。向泽金根进军的借口是必须同多尔会师，说什么多尔也在向那里行进，还说什么那里有坚固的阵地。这个阵地分明就是1800年莫罗在他发动的战役刚开始时所占的阵地，而这块地方只是具有这样一个缺点，即它的正面完全不是敌人向我军推进的方向。至于高贵的多尔，他急忙表示自己不用济格尔先生的帮助，也能转移到瑞士去。

在苏黎世州和沙福豪森州之间有一小块巴登的领土，这块地方有埃什泰顿和罗特什泰顿两个居民点，四面都在瑞士领土包围之中，只是在巴尔特斯韦尔那里有一条窄窄的通道。应当在这里占据最后的阵地。巴尔特斯韦尔后面道路两旁的高地对我们说来是个很好的炮兵阵地，在我们的大炮万一不得不转入瑞士领土的时候，我们的步兵还足够用来掩护它们。经商议的结果，我们留在这里以便摸清普鲁士人是想进攻我们还是想围困我们。主力部

队（贝克尔也汇合了进来）就在这里扎了营。维利希选定了炮兵阵地（后来，我们发现选定的炮兵阵地变成了停炮场）。我们自己担任后卫，慢慢地跟着全军前进。9日晚上开向埃尔秦根，10日开向里德尔恩。这一天在军营里开了一个军事大会。只有维利希一个人主张守下去，济格尔、贝克尔等人都主张退入瑞士境内。当时有瑞士特派员在场，好象是库尔茨，他宣称，如果再打仗的话，瑞士将拒绝提供避难所。在表决时，维利希和两三个军官占少数。我们的队伍除他一人以外谁也没有出席。

当维利希还在军营里的时候，拨给我们的那半个炮兵连接到了撤走的命令，没有通知任何人就离开了。除了我们的队伍以外，所有其他各部队也奉命到军营里去。夜里，我同维利希再次驰赴罗特什泰顿大本营。当我们在拂晓往回赶的时候，在路上遇到全军人马撤离驻地，极为混乱地涌向边界。就在11日当天清晨，济格尔先生就率部转入瑞士境内，到达拉夫茨，贝克尔先生率部到达雷瑙。我们把我们的队伍集合了起来，先到了军营，然后到埃什泰顿。在埃什泰顿，将近中午的时候，收到济格尔从埃格里绍派传令官送来的一封信。信上说，他已经平安地到达瑞士，军官们仍旧保留他们的军刀，我们应尽快地到那里去。原来他只有到了中立国境才想起我们来！

我们取道罗特什泰顿直抵边界，仍在德国的领土上安营露宿，而12日早晨把枪枝卸下了子弹，作为最后一批巴登-普法尔茨军进入瑞士境内。就在同一天，和我们同时，另外一支驻守康斯坦茨的队伍放弃了这个城市。一个星期以后，拉施塔特由于有人叛变而陷落，整个德国，直到边陲之地，都又暂时地落入反革命之手。

* * *

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之所以失败，是由于本身的不彻底性和内部的缺陷。从 1848 年六月革命失败的时候起，对于欧洲大陆上的文明国家说来，问题已经是要末由革命的无产阶级来统治，要末由二月革命以前的统治阶级来统治。中间的出路已经是不可能的了。特别是在德国，资产阶级看来没有能力进行政治统治；在同人民的斗争中间，它之所以能维持自己的统治，完全是因为它又向贵族和官僚让了步。帝国宪法表明，和德意志思想体系连在一起的小资产阶级企图实现一个不可实现的、目的是要延缓决战日期的妥协。这个企图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认真对待运动的人并不认真对待帝国宪法，而认真对待帝国宪法的人却不认真对待运动。

虽然如此，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还是取得了重要的成果。首先，它使局势简单化了。它结束了无休止的妥协的企图。在这次运动失败以后，取得胜利的只可能要末是以立宪主义稍加粉饰的封建官僚君主制，要末是真正的革命。而革命现在在德国只有当无产阶级的全面统治建立起来的时候才能结束。

其次，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在德国的那些阶级矛盾表现得还不很尖锐的地方，大大地促进了阶级矛盾的发展。巴登尤其如此。如我们所看到的，巴登在起义以前几乎没有阶级斗争。因此，小资产阶级名正言顺地统辖着所有其他反对派阶级；因此，居民显得万众一心；因此，巴登人，也象维也纳人一样，迅速地反对变为反叛，抓住每一个机会发动起义，甚至不怕和正规军队打野战。但是起义刚刚一爆发，阶级就发生了明显的分化，小资产阶级从工人、农民中分离出来了。以布伦坦诺先生为代表的小资产

者的臭名从此万世远扬。小资产者是被普鲁士军阀的统治逼得走投无路才厌恶目前的压迫制度而追求任何其他的制度，甚至工人建立的制度也可以；在最近的运动中他们将比在过去所有各次运动中更积极得多；但是，谢天谢地，他们永远也不能再象布伦坦诺专政时期那样占有独立的和统治的地位。工人和农民在目前军阀统治之下受的苦难并不比小资产阶级轻，上一次起义的经验对他们说来并没有白废。他们的责任之一就是要为死难的弟兄们报仇，所以他们将设法在最近的起义中使领导权掌握在自己手里而不让小资产阶级抓去。虽然任何起义的经验也代替不了阶级的发展（这种发展只有在大工业长期存在的过程中才能实现），但是巴登通过自己的上一次起义以及起义所取得的成果，却进入了德国的那些在未来的革命中占有头等重要地位的省份之列。

从政治观点来看，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本来注定要失败的。从军事观点来看，这个运动也是注定要失败的。它的唯一可能成功的因素不在德国，而是在于巴黎共和党人6月13日的胜利，可是6月13日的运动却遭到了失败。在这次事件以后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最多也只可以算是一幕流血的滑稽剧而已。事实正是如此。愚蠢和叛卖行为使它最后遭到失败。除少数人外，军事领袖们不是叛徒就是愚蠢的、粗鄙的、怯懦的个人野心家。而那些少数例外的人也得不到其他方面譬如说布伦坦诺政府方面的任何支持。在下次革命风暴中，凡是只能把曾任黑克尔军队将军或维护帝国宪法运动的军官算作自己唯一的功绩的人，完全应该请他们立即退出去。无论对指挥官还是对士兵都应该这样办。巴登人民身上本来具有非常好的军事素质，但是从起义一开始，这些素质就被人滥用和轻视，所以就造成了我们详细描述过的那个悲惨局面。整个的

“革命”变成了一幕不折不扣的喜剧，而唯一能够借以自慰的是在人数上 6 倍于我们的敌人，其胆量却只有 $\frac{1}{6}$ 。

然而，这幕喜剧由于反革命势力嗜血成性，却得到了悲剧性的结局。在行军中，在战场上不止一次地惊慌失措的战士们在拉施塔特监狱的牢房里就义时却很英勇从容。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求饶，也没有一个人发抖。德国人民不会忘记拉施塔特的执行枪决的刑场和监禁囚徒的牢房；他们不会忘记那些下达这些令人发指的命令的统治者，同时也不会忘记那些因自己的怯懦而导致这样恶果的叛徒——卡尔斯卢厄的和法兰克福的所有布伦坦诺之流的人物。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第2期上发表的书评¹¹²

评格·弗·道梅尔“新时代的宗教。
创立综合格言的尝试”
共两卷 1850年汉堡版

“纽伦堡有一个人，一般说来非常开明，对新事物决不置若罔闻，而对民主派的阴谋却恨之入骨。他曾经崇拜隆格，把隆格的照片挂在自己的室内。但是当他听到隆格拥护民主派以后，便把隆格的照片挂到厕所里去了。有一次他这样说：假如我们生活在俄国人的鞭子下，我将感到多么幸福！他在动乱时期死去，我以为，他虽然年迈苍苍，但是，他所以在当时葬入坟墓，完全是由于对所发生的事情感到忧伤所致。”（第2卷第321—322页）

假如这位令人可怜的纽伦堡的庸人不是死去，而是从“德国记者”¹¹³，从席勒和哥德的著作，从旧教科书和租书店的新书中摘录些片断和格言，编成文集，他也许不会死亡，而道梅尔先生也就不必辛辛苦苦地去编辑两大卷的综合格言的创立这本书了¹¹⁴。自然，那样我们就不会有了解新时代的宗教同时认识第一个殉道

G .Fr .Daumer .《Die Religion des neuen Weltalters .Versuch einer combinatorisch- aphoristischen Grundlegung》. 2B- de, Hamburg, 1850 . —— 编者注

者的良机了。

道梅尔先生的著作分“绪论”和“本文”两部分。在绪论中，这位德国哲学的忠实的埃卡尔特¹¹⁵深深地忧虑这样一件事情，即两年来甚至那些有思想的有教养的德国人也都被引入歧途，他们为了纯粹“表面的”革命活动而抛弃了珍贵的思想成果。他认为现在已是重新唤起优良的民族情感的适当时机；他指出这样轻率地抛弃整个德国的文化（由于有这种文化，德国公民才成了现在的样子）会造成怎样的后果。他利用只有在他那空虚的博学宝库才能找到的最有力的格言来恢复德国文化的全部内容，这样他给德国文化带来的损害并不亚于给德国哲学带来的损害。他那本贯穿着德意志精神的卓越作品的选集在枯燥和庸俗方面甚至超过了专供名门闺秀阅读的异常平凡的读物。从歌德和席勒对第一次法国革命的市侩味的抨击以及“惊动狮子很危险”¹¹⁶这样的经典警句起，到现代的文学作品止，这位新宗教的高僧从其中所竭力寻求的所有语句，都表现了德国人对他们讨厌的历史运动咕哝不满的因循心理。这类人的权威，如弗里德里希·劳麦，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罗赫纳，摩里茨·卡利埃尔，阿尔弗勒德·迈斯纳，克鲁格，丁盖尔施泰特，隆格，“纽伦堡信使”，麦克斯·瓦尔道，施特恩堡，海尔曼·莫伊勒，路易莎·阿斯通，埃克尔曼，诺阿克，“文艺杂谈”，阿·孔茨，吉拉尼，泰·蒙特，萨菲尔，谷兹科夫，一位“娘家姓加特雷尔”的人等，都是新宗教庙堂的柱石。在这里遭到同声咒骂的革命运动，在道梅尔先生看来，一方面不过是由于“德国记者”的赞助而盛行于纽伦堡的极其庸俗粗野的政客手腕，另一方面不过是一道梅尔先生以极为荒诞的观点来看待的民众越规行为。他获取知识的来源是和上述权威完全相称的：除了

不止一次提到的纽伦堡的“德国记者”外，还有“班堡报”，慕尼黑的“农村信使”，奥格斯堡的“总汇报”等等。这些庸俗鄙夫一直认为无产阶级不过是粗鲁堕落的贱民，它们看到 1848 年巴黎六月的大屠杀中杀死了 3000 多这种“贱民”便拍手称快，但是他们由于人家嘲笑了多情善感的动物保护协会却愤懑不已。

道梅尔先生在第 1 卷第 293 页上感叹地说道：“在这些野蛮人看来，不幸的动物在人类残暴的手下所遭到的可怕折磨都是些‘小事’，不必感到不安！”

道梅尔先生认为，现在的一切阶级斗争都只不过是“粗野”反对“文明”的斗争。他不从这些阶级生活的历史条件去解释阶级斗争，而把阶级斗争的原因归结为某些心怀恶意的人玩弄阴谋诡计，利用民众的卑鄙本能，唆使他们反对有教养的等级。

“这种民主改良主义……激起了社会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的嫉妒、愤怒和渴慕，这是使人变得更高尚更善良并为文明达到更高水平打下基础的好办法！”（第 1 卷第 289 页）

道梅尔先生甚至不知道“社会的下层阶级对上层阶级”要坚持多么激烈的斗争才能达到即使纽伦堡那样的“文化水平”，才能出现反对道梅尔 à la [式]¹¹⁷的火神摩洛赫的勇士。

第二部分：即“本文”从正面叙述了新的宗教。这位德国哲学家因为自己对基督教的斗争被人遗忘，因为人民对宗教这个唯一值得哲学家注意的对象表示冷淡，所以在这里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怒气。为了给自己被竞争排挤掉的行业恢复过去的名誉，我们的贤者对于旧宗教进行了不断的谩骂以后只好创造新宗教。但是这种新宗教是与第一部分完全相同的，它不过是继续搜集了德国庸俗作品中的一些格言、题赠诗和 *versus memoriales* [纪念诗]。这本新可兰经的各章¹¹⁸，尽是些把德国现存制度从道德上加加以美

化、以诗歌进行粉饰的空言泛语。这些空言泛语虽然抛弃了直接的宗教形式，但是并没有失去和旧宗教的亲密的血缘关系。

“只有通过新的宗教才能产生全新的世界秩序和关系。宗教能作出多大贡献，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就可以作为这方面的例证。抽象的单独的政治是软弱无能和毫无效果的，1848年开展的革命运动就可以非常明显地证明这一点。”（第1卷第313页）

从这种意义深刻的论点中我们可以看到，这位德国“思想家”是非常浅薄无知的，譬如他把可怜的德国巴伐利亚的“三月胜利”看成是1848年和1849年的欧洲运动，他要求逐渐为自己开辟道路和逐渐集中的伟大革命最初稍一爆发就能产生“全新的世界秩序和关系”。在英明的道梅尔先生看来，整个复杂的社会斗争，在近两年中从巴黎到德布勒森，从柏林到巴勒摩发生的这种社会斗争的前哨战只不过是使1849年1月“厄兰根立宪协会的希望变得非常渺茫了”（第1卷第312页），只不过是对于那种打扰道梅尔先生，使他不能安心研究哈菲兹、穆罕默德和倍尔托特·奥艾尔巴赫的新斗争感到恐惧。

正是道梅尔先生的这种无耻的肤浅见解，使得他完全无视这样的事实：古代“世界秩序”彻底瓦解以后才产生了基督教，基督教不过是这种瓦解的表现；“全新的世界秩序”不是从内部依靠基督教产生的，而是在匈奴人和日耳曼人“从外部攻击罗马帝国的僵尸”的时候才产生的；在日耳曼人进行侵略以后，不是“新的世界秩序”按照基督教建立起来，相反的，而是基督教随着这种世界秩序的每一个新阶段的到来而有所改变。我们倒希望道梅尔先生举出一个例子来说明旧世界秩序是随着新宗教的出现而改变的，而且这种改变是在没有非常激烈的“外在的抽象的政治”动

乱中进行的。

非常明显，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历史变革，人们的观点和观念也会发生变革，这就是说，人们的宗教观念也要发生变革。但是，现在的变革和过去一切变革不同的地方恰恰在于人们最终识破了这种历史变革过程的秘密，因而他们不再以崇尚词藻的超验形式的新宗教来崇拜这种实际的“外在的”过程，而是抛弃一切宗教。

新的世界至理名言甚至超过了克尼格的教言¹¹⁹，因为它不仅包含着对待人所必须的规诫，而且包含着对待动物所必须的规诫；在新的世界至理名言的恳切的道德说教之后，——在所罗门的箴言之后，就是新所罗门的雅歌。

“自然和女人不同于人类和男人，前者是真正神圣的……人类为了自然而自我牺牲，男人为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乃是真正的、唯一真实的温顺和克己，是最高的、甚至是唯一的美德和笃敬。”（第2卷第257页）

在这里我们看到，我们的诡辩的宗教创始人的浅薄无知怎样转变为显然的畏怯。道梅尔先生在逃避威胁他的历史悲剧，求救于所谓的自然，即笨拙的农村田园诗歌，宣扬女性崇拜以掩饰他自己对女性的屈从。

但是，道梅尔先生的自然崇拜是非常特殊的。他落得甚至比基督教还反动。他企图用现代化的形式来恢复基督教以前的古代的自然宗教，不言而喻，在他那里，所有这一切都是关于自然的基督教德意志的宗法式的空谈，下面的诗就是个例子：

亲爱的大自然母亲啊
让我踏着你的足迹前进，
用你的手来引导我

象牵在你手上的孩子。

“这样的诗已经过时了，然而这是不利于文化、进步和人类幸福的。”
(第2卷第157页)

我们看到，自然崇拜不过是小镇居民礼拜天散步时看到杜鹃把卵产在别的鸟巢里(第2卷第40页)，看到眼泪有使眼睛表面保持润湿的作用(第2卷第73页)等诸如此类的事情而象孩子一样表示惊奇不已，并且在最后畏敬战栗地向他的孩子们朗诵克洛普什托克的春天颂¹²⁰(第2卷第23页及以下各页)。现代自然科学和现代工业一起变革了整个自然界，结束了人们对于自然界的幼稚态度和其他的幼稚行为，而对于这样的现代自然科学却只字未提。相反的，我们却听到些神秘的暗示和关于诺斯特拉达莫司的预言、苏格兰人的洞察力以及动物的磁性¹²¹等令人不解的庸人猜测。巴伐利亚的落后的农村经济，即僧侣和道梅尔之流都同样可以滋生的土壤，现在已是用现代农作技术和现代机器来加以耕耘的时候了。

对于女性的崇拜也和对于自然的崇拜一样。当然，道梅尔先生对于妇女现在的社会地位是一声不响的，相反的却只谈妇女本身。他竭力使她们成为借内容空泛和哲理玄妙的词藻来进行崇拜的对象，以便借此来安慰妇女的无权地位。例如，他安慰妇女们说：妇女一出嫁，她们的才能便随之而消失，因为那时她们要生男育女(第2卷第237页)，甚至到60岁还能给婴儿哺乳(第2卷第251页)等等。道梅尔先生把这叫做“男人为了女人而自我牺牲”。为了在自己国家找到男人自我牺牲所必需的理想女性，他不得不求助于上一世纪的各种贵妇。这样，对女性的崇拜又归结为文学家对他们可尊敬的女保护人的一种可怜的依据。

附，就象威廉·麦斯特¹²²那样。

道梅尔先生在他的耶利米哀歌里大谈其没落的那种“文化”，是纽伦堡作为帝国自由市而欣欣向荣时期的文化，是纽伦堡的工业——艺术和手工业的混合物——起着重要作用时的文化，是和德国小资产阶级同趋没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的文化。如果说以前的阶级，例如骑士阶级的没落能够为悲剧艺术的巨著提供材料，那末小市民阶级当然就只能表现出穷凶极恶的软弱态度和提供一些桑科·判札式的格言和谚语的集录。道梅尔先生是枯燥乏味的失去了一切幽默的汉斯·萨克斯的后继。德国哲学痛心疾首地恸哭在它的养父——德国小市民阶级——的灵床前，这就是新时代的宗教在我们面前展示的动人情景。

写于 1850 年 1 月—2 月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 2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评特利尔的路德维希·西蒙 “请求德国陪审官保护全体维护 帝国宪法的战士的正义呼声” 1849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版

“我们投票反对了帝国元首的世袭权力；在第二天选举帝国元首的时候，我们弃权了。但是当问题根据由普选产生的议会中多数人的意志最后得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就宣布愿意服从。要是我们不这样做，那就证明我们根本不适合于市民社会。”（第43页）

这样，按照“特利尔”的路·西蒙先生的意见，法兰克福议会的极左派议员就已经“根本不适合于市民社会”了。这样，在“特利尔”的路·西蒙先生看来，市民社会的范围比圣保罗教堂¹²³的院墙还窄了。

不过，西蒙先生在他1849年4月11日的自白中很机智地揭开了他以前的反对立场和他以后的转变的秘密。

“从3月以前的外交界的浑水里升起了寒冷的迷雾。迷雾将结成乌云，险恶的暴风雨将会来临，它会首先摧毁我们集会的教堂的尖塔。请大家小心谨慎些，考虑考虑避雷针吧，它可以使你们免受闪电的袭击！”¹²⁴

换句话说：诸位先生，现在事情关系到我们的性命！

法兰克福左派仅仅为了使多数派不离开议会而在讨论主权问

Ludwig Simon von Trier 《Ein Wort des Rechts für alle Reichsverfassungskämpfer an die deutschen Geschworenen》. Frankfurt a. M., 1849. ——编者注

题的时候以及在帝国代表团可耻地回来以后¹²⁵向多数派所提出的哀求的建议，所表示的可怜的妥协，当时左派在各方面都准备妥协的卑鄙企图，所有这些在西蒙先生下面的言论中都变得非常高尚了：

“由于去年发生的事件，‘妥协’一词已经变成非常可怕的嘲笑的对象了。如果不冒着被嘲笑的危险，就几乎不敢再提这个词。可是，二者必居其一：要么大家彼此妥协，要么象野兽一样相互攻击。”（第 43 页）

这就是说，要么各政党把斗争进行到底，要么通过任意的妥协把斗争置于一旁。自然后者是比较“文明”和“人道”的。而根据西蒙先生上述的理论，他可以无限地进行妥协，依靠妥协他就能留在任何“市民社会”里。

已成过去的帝国宪法在下面的哲学演绎中给自己找到了辩护的理由。

“帝国宪法实质上表明，不采取新的强制措施是可能的……它是民主君主政体的生动（！）表现，因而也是原则矛盾的表现。世界上已经存在许多这样的事物，它在原则上是矛盾的，可是以后的生活正是从原则矛盾实际存在的这种情况中发展来的。”（第 44 页）

显然，运用黑格尔辩证法总比引用席勒的诗要困难些。如果说帝国宪法虽然有“原则矛盾”也要“在实际上”存在，那么它至少应当“在原则上”反映出“实际上”存在的矛盾。“实际上”站在一边的是普鲁士和奥地利，即军事专制主义，站在另一边的是德国的人民；而德国人民三月起义的果实被骗走了，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盲目地相信可怜的法兰克福议会而受骗的，他们正是在这个时候最后决定重新投入反对军事专制主义的斗争。这个实际的矛盾只有通过实际的斗争才能解决。而帝国宪法反映了这种矛盾吗？一点也没有。它只反映了

1848年3月时的矛盾，即普鲁士和奥地利还未重新聚集力量，反对派由于部分失败而分散、削弱和缴械以前的矛盾。其次，它只反映了圣保罗教堂的先生们的天真幻想，他们以为在1849年3月还能授意普鲁士和奥地利的政府颁布法律，使自己始终保住永远有利而又永远安全的德意志帝国的巴罗的地位。

后来西蒙先生向自己和他的同事祝贺说，无论什么都没有能动摇他们对帝国宪法的自私迷恋。

“你们这些哥达的叛徒，羞愧地承认吧，我们即使在热情冲动的时候也没有受任何诱惑的影响，我们仍然忠实于我们所说的话，丝毫也没有背弃我们的共同创举！”（第67页）

其次，他还指出他们为维尔腾堡和普法尔茨立下的丰功伟绩；指出他们6月8日的斯图加特决议，在这个决议中，他们把巴登置于帝国的保护之下，虽然帝国当时实际上已经处在巴登的保护下¹²⁶；他们的决议只不过证明他们下决心“丝毫”也不放弃怯懦行为并且强制别人接受连他们自己都不相信了的幻想。

西蒙先生以下面的极为精湛的论据驳斥了所谓“帝国宪法只不过是共和国的假面具”的非难：

“只有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政府的斗争都进行到底了，这种非难才能成立……可是，谁断定说毫无例外地反对一切政府的斗争都进行到底了呢？谁能预测到战争胜负和斗争情况的一切可能的变动呢？如果一旦发生这样的情况，即互相敌对的弟兄（政府和人民）经过残酷斗争后已筋疲力竭，不分胜负，彼此对峙着，结果他们产生了和平及和解的心情，难道我们能去稍微损害一下那用以彼此握手言和的德国宪法的旗帜吗？看看自己周围吧！请把手放在胸前！倾听一下自己良心的呼声，你就一定会回答说，不，不，完全不！”（第70页）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西蒙先生在圣保罗教堂百发百中的善辩弓箭，就是从这个真是善于辞令的箭囊中取出来的。这种动人的激情虽然十分庸俗，但是有它独特的趣味。他表明，法兰克福的先生们怎样安心地呆在斯图加特，等到敌对的政党双方斗争得筋疲力竭，以便在适当时机出现在疲惫不堪的战士中间，推销和解的万灵药方——帝国宪法。西蒙先生对他的同事了解之深，可以从下面的事实看出，这些先生现在还聚集在伯尔尼的克斯列加斯路的卞茨酒店，等待重新发生斗争，以便在各政党“筋疲力竭，不分胜负，彼此对峙着”的时候，插足其间，建议他们为了妥协而接受最明显地表现了软弱和寡断的帝国宪法。

“但是，不管怎样，我告诉你们说，无论远离祖国，远离家乡，远离老父老母而走着放逐的孤独小径是多么痛苦，我决不会为了人间的幸福，不要纯洁的良心，而要叛徒的良心谴责和统治者的不眠之夜。”（第 71 页）

如果能够放逐这些先生们该多好！难道这时他们不随身携带象征法兰克福速记记录中所说的那样的祖国，并且从这些记录中呼吸到真正的祖国空气，感到美妙无比的怡然自得吗？

如果西蒙先生认为他是在为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大声疾呼，那末这完全是一种虔诚的谎言。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并不需要他的“正义的呼声”。他们自己保卫自己反倒更好些更有力些。但是西蒙先生必须以此来掩饰自己，以便遮盖这样的事实：为了在各方面都声名狼籍的法兰克福人，为了编造帝国宪法的人和为了他自己，他认为必须发表一篇 *oratio pro domo* [自卫演说]。

写于 1850 年 1 月—2 月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 2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评基佐“英国革命为什么会成功？ 英国革命史讨论”1850年巴黎版

基佐先生的小册子的目的是要证明，路易-菲力普和基佐的政策本来不应该遭受1848年2月24日的失败，只是由于法国人品质恶劣，才使得1880年的七月王朝经历了18年艰苦岁月后终于遭到了可耻的破产，使它不能象1688年以来的英国王朝那样维持很久。

从这本小册子里可以看出，即使ancien régime〔旧制度〕下最聪明的人物，即使无论如何也不能不认为是天才历史学家的人，也被致命的二月事变弄得昏头昏脑，以致完全不能理解历史，甚至完全不能理解自己过去的行动。基佐先生不是根据二月革命的经验来理解1830年的法国王朝和1688年的英国王朝的历史情况及社会阶级状况的根本不同之处，而是用一些说教式的词句来抹杀它们之间的一切区别，并且在结语里保证说，2月24日破了产的政策“保存了国家，只有这个政策才能消灭革命”。

如果把基佐先生想要回答的问题确切地表述出来，那就是：为什么资产阶级社会在英国以君主立宪制的形式向前发展，要比在法国长久？

下面的一段文字可以说明基佐先生是怎样认识英国资产阶级发展过程的。

“乔治一世和乔治二世在位时，社会思想界的潮流起了变化，对外政策已不再是它们关心的主要对象，内政、维护和平、财政问题、殖民问题、商业问题、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怀的事情。”（第 168 页）

基佐先生在威廉三世的统治下只发现两个值得一提的情况：一是议会与国王之间保持的均势，一是通过反对路易十四的斗争欧洲保持的均势。在汉诺威王朝，突然“社会思想界的潮流起了变化”，但人们不知道是怎样变和为什么变的。我们在这里看到，基佐先生如何把法国议会辩论中最陈腐的老生常谈应用到英国历史上去，他认为这样就解释了英国历史。基佐先生当部长的时候也有过同样的想法，以为他肩负着保持议会与国王之间的均势以及欧洲的均势的任务，而事实上他所作所为不过是把整个法兰西国家和整个法兰西社会零售给巴黎交易所的高利贷财阀而已。

至于说反对路易十四的战争是为了消灭法国商业和法国海上力量的纯粹商业战争，在威廉三世时由于银行的建立和国债的形成¹²⁷，金融资产阶级的统治受到初次的崇拜，由于一贯实行了保护制而为工业资产阶级创造了进一步发展的条件，——这些在基佐先生看来是不值一谈的。对他来说，只有政治上的漂亮话才有意义。他甚至没有提到，在女王安统治下，执政党所以能够保全自己和君主立宪制，是由于它们依靠国家政变把议会的职权延长到 7 年，从而几乎完全消灭了人民对政府的影响。

在汉诺威王朝时代，英国已经发达到能够进行现代式的商业战争来反对法国了。英国自己仅仅在美洲和东印度直接与法国作

战，而在大陆上则满足于雇佣象弗里德里希二世这样外国君主来与法国作战。而当对外战争刚一采取另一种形式时，基佐先生就声言“对外政策已不再是关心的主要对象”，而为“维护和平”所代替。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议会制度的发展以及议会斗争已成为政府和社会舆论最为关怀的事情”，这可以根据在沃尔波尔内阁时期发生的贿赂丑行来判断。而这些丑行，其实和基佐内阁日程上发生的丑行并无丝毫差别。

依照基佐先生的意见，英国革命之所以比法国革命进行得更顺利，可以由两个主要的原因来解释：第一，英国革命浸透着宗教的性质，因而它丝毫没有抛弃过去的一切传统；第二，英国革命一开头就不是作为破坏力量而是作为保守力量出现的，而议会捍卫了现行的旧法律，使它不致受到王权的侵害。

在谈第一点时，基佐先生忘记了：在法国革命时使他心惊胆怕的自由思想正是从英国输入法国的。洛克是这种自由思想的始祖，而在舍夫茨别利和博林布罗克那里自由思想就已经具有一种巧妙的形式，这种形式后来在法国得到了十分顺利的发展。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有意思的结论：基佐先生认为毁灭了法国革命的那种自由思想正是具有宗教性质的英国革命的重要产物之一。

在谈到第二点时，基佐先生完全忘记了：法国革命最初也象英国革命那样保守，甚至比英国革命保守得多。专制制度，特别是象最后在法国出现的那种专制制度，在那里也还是一种新东西，而议会曾经为了保护旧的法律，保护旧等级君主制的 *us et coutumes*〔风俗和习惯〕起来反对过这种新东西。法国革命的第一步就是恢复自亨利四世和路易十三以来就垮台了的三级议会，而在英国革命中却没有这样典型的保守主义的实例。

根据基佐先生的看法，英国革命的主要结果是国王再也不可能违反议会和下议院的意志实行统治。整个革命似乎可以归结如下：最初国王和议会双方都超越应有的权限，都作得有些过分，直到最后在威廉三世时期，双方才建立了适当的均势，彼此才互不侵犯。至于王室权力从属于议会就意味着王权从属于某一阶级的统治，基佐先生认为这是毋庸赘述的。因此他认为没有必要去详细研究这一阶级如何获得十分大的权力，以至最后使国王成为它的奴婢。在基佐先生看来，查理一世和议会之间的全部斗争完全是围绕着纯粹政治特权而进行的。究竟为什么议会和它所代表的阶级需要这种特权，却只字未提。关于查理一世直接危害自由竞争因而使英国工商业的处境日益不能忍受，关于经常的财政困难使得查理一世愈想反抗议会却愈不得不依靠议会，这些基佐也极少提及。因此，在基佐先生看来，一切革命都是由于少数不满足于一般自由的捣乱者的恶意和宗教狂热而引起的。基佐先生同时也没有能力来阐明宗教运动和资产阶级社会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共和国在他看来当然也不过是一些野心勃勃、狂热冲动和心怀恶意的人所搞出来的名堂。至于在这个时期，在里斯本、那不勒斯和墨西拿也企图建立共和国¹²⁸，而且也同英国一样建立荷兰式的共和国，这样的事实他也丝毫不提。虽然基佐先生丝毫也没有忽略法国革命，但他从来也没有得出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结论：任何国家只有经过残酷的斗争和通过共和国的政府形式才能从君主专制过渡到君主立宪，甚至当时旧王朝由于失掉人心而不得不让位给想篡夺政权的旁系亲属。因此，关于英国复辟王朝垮台的问题，他只能告诉我们一些最无聊的一般的东西。他甚至没有指出下面这个垮台的直接原因：宗教改革使新兴大地主害怕天主教

的恢复，因为天主教一旦恢复，他们当然得归还所有过去他们掠夺来的教会土地，这样一来，英国全部土地的 $\frac{7}{10}$ 都得易手；工商业资产阶级对天主教有所恐惧，因为天主教完全不利于他们的活动；斯图亚特王朝为了自己和宫廷贵族的利益，毫不在乎地把所有英国工商业利益出卖给法国政府，即卖给当时唯一能在竞争中威胁英国并且在许多方面取得胜利的国家的政府，以及其他等等。既然基佐先生到处漏掉最重要的关键，所以他就只有极端不能令人满意地平凡地叙述事件的政治方面了。

基佐先生最大的谜——英国革命的保守性的谜（他只能用英国人特有的稳重作风来解释这个谜），应当这样来解释，即资产阶级与大部分大土地所有者之间建立了长期的联盟，而这种联盟使英国革命在本质上有别于用分散土地来消灭大土地所有制的法国革命。这个和资产阶级有联系的大土地所有者阶级（它其实在亨利八世时就已经出现了）与1789年的法国封建地主不同，它对于资产阶级的生存条件不但不加反对，反而完全抱容忍的态度。这个阶级的地产事实上不是封建性的财产，而是资产阶级性的财产。这些土地所有者一方面供给工业资产阶级以手工工场所必需的劳动力，另一方面又能使农业的发展与工商业状况相适应。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有共同利益，这就使土地所有者和资产阶级结成联盟。

在基佐先生看来，随着立宪制在英国的确立，英国的历史就终止了。他认为，此后的一切都不过是托利党和辉格党之间的愉快的打秋千的游戏，也就是说有些象基佐先生和梯也尔先生间发生的激烈舌战。其实，正是随着君主立宪制的确立，在英国才开始了资产阶级社会的巨大发展和改造。凡是基佐先生认为充满平

静安宁、田园诗意的地方，实际上正在展开极为尖锐的冲突和极为深刻的变革。在君主立宪制下，手工工场才第一次发展到前所未有的规模，以致后来让位给大工业、蒸汽机和大工厂。居民中的许多阶级消亡了，代之而起的是具有新的生存条件和新的要求的新阶级。一个新的更强大的资产阶级诞生了；当旧的资产阶级在和法国革命进行斗争的时候，新的资产阶级已在夺取世界市场。这个阶级变得如此神通广大，以至在改革法案还没有把政权直接转变到它手中就能强迫敌手颁布几乎仅仅对它有利并满足它的要求的法律。它在议会中获得直接代表权，并且利用这种权力来消灭土地所有制保存下来的最后一点点的残余实力。最后，资产阶级这时便忙于彻底摧毁基佐先生所赞叹不已的那座英国宪法的华美建筑。

正当基佐先生因为法国社会生活的恶魔——共和主义和社会主义——未能动摇唯一能拯救世人的英国君主制的基础而向英国人祝贺时，英国社会上的阶级矛盾却达到了任何国家所未有的尖锐程度。在这里，拥有无比的财富和生产力的资产阶级正遭到其力量和集中程度也同样是无比的无产阶级的反对。这样一来，基佐先生所以赞扬英国，是因为在英国，在君主立宪制的掩盖下，即使把世界其他国家加在一起也远不如这里多和激进的社会革命因素已获得了发展。

当英国历史发展的线索打成一个结，而基佐先生自己已不能用纯粹政治上的空谈甚至在表面上解开这个结的时候，他就乞灵于宗教的空谈，乞灵于上帝的武装干涉。于是，就有例如圣灵突然降临于军队并阻止克伦威尔自封为国王等等的说法。基佐求助于神灵来逃避自己良心的谴责，借助于文体

来逃避世俗公众的指摘。

其实，不但 *les rois s' en vont* [国王要滚蛋]，而且 *les capacités de la bourgeoisie s' en vont* [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也要滚蛋]。

写于 1850 年 2 月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 2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国际述评（一）¹²⁹

A tout seigneur ,tout honneur !〔按地位高低来分享荣誉 !〕从普鲁士谈起。

普鲁士国王正在尽一切力量使目前协议勉强维持和妥协不能使双方满足的局面¹³⁰陷于危机。他钦定了宪法 ,并且经过种种不愉快的周折建立了修改宪法的两院。两院为了使宪法完全为国王所接受 ,把凡是不合国王口味的条款统统删掉 ,以为这样国王就会马上向宪法宣誓。结果事实并非如此 !弗里德里希 - 威廉为了向两院证明“国王的忠诚” ,给它们写了一封御函 ,提出了“改善宪法”的新提案 ,通过这些提案 ,势必使上述文献表面上仅有的一点所谓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的保障也丧失净尽¹³¹。国王以为两院会否决这些提案 ,可是 ,提案却根本没有遭到否决。如果说两院对国王已经大失所望 ,那末两院现在担心的是国王会对它们大失所望。两院仅仅为了不致被解散回家 ,仅仅为了使国王最后能庄严地向宪法宣誓 ,竟不惜通过贵族特权 ,特别法庭 ,国民兵役 ,地产长子继承权¹³²等所有的提案。这就是普鲁士立宪派资产者进行的报复。

国王很难想出一种能使两院感到过分的侮辱。最后 ,他觉得不得不声明 :“他将要立的誓约对他来说愈是神圣 ,他愈要忠心地担负上帝所赋予他的对祖国锦绣河山的义务” ,他的“国王的忠

诚”愈不允许他向那虽然赋予他一切而对国家却毫无裨益的宪法宣誓。

早已瓦解的“联合议会”¹³³的先生们,现在又集聚在两院里了,他们之所以深怕被抛到三月事件以前的老路上去,是因为这样他们又会面临一场革命,而这场革命将不会给他们带来什么玫瑰花。况且,在1847年他们还有能力否决借口建设东部铁路而提出的贷款,但是在1849年他们一开始事实上就批准了这项贷款,而事后才必恭必敬地请求给予批准拨款的理论上的权力。

与此同时,两院外的资产阶级对陪审法庭宣判被控告犯有政治罪行的人无罪一事颇感自慰,并以此表现它对政府的反对立场。这样一来,在这些诉讼案中,政府方面和被告及听众所代表的民主派方面都不断使自己威信扫地。关于这一点,回想一下“一贯的立宪主义者”瓦尔德克案件、特利尔案件¹³⁴等等就很清楚了。

年迈的阿伦特提出过“什么是德国人的祖国?”³⁵的问题,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回答说:爱尔福特¹³⁶。写出一部模似“伊利亚特”的“老鼠与青蛙之战”¹³⁷并不十分困难,但是迄今还没有人甚至敢打算模仿“老鼠与青蛙之战”。而现在有人却用爱尔福特计划巧妙地模仿了甚至是圣保罗教堂里的老鼠与青蛙之战。显然,这个渺茫的议会是否真的会在爱尔福特召开,或者正教沙皇是否会禁止它,正象福格特先生所草拟的对议会的权限的抗议书(他为此无疑地会跟费奈迭先生取得协议)一样,是完全不关紧要的。对所有这些别出心裁的东西感到兴趣的,只有某些所谓深谋远虑的政论家和普鲁士资产者,前者在自己的社论中认为“大德意志”或

“小德意志”的问题是无穷无尽的而且也是必不可少的探讨题目，后者沉湎于一个乐观的信念中，即普鲁士国王会在爱尔福特同意他在柏林拒绝了的一切。

如果法兰克福的“国民议会”必须或多或少地按原样在爱尔福特重建起来，那末旧的联邦议会就会通过《Interim》〔“临时协议”〕¹³⁸重新复活，同时必将成为它的最简单的表现形式，即奥普联合委员会。Interim 在维尔腾堡已经生效，并且不久在梅克伦堡和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也会生效。

普鲁士长期以来一直依靠发行纸币，Seehandlung〔海外贸易公司〕¹³⁹的秘密贷款和国库余存勉强维持它的预算，只是现在才被迫走上靠贷款度日的道路，而奥地利国家已经完全陷于破产。1849年前9个月，赤字为1亿5500万盾，到12月底，可能达到2亿1000万盾至2亿2000万盾；获得新贷款的企图彻底破产之后，国家信用在国内外完全无法维持；国内的财源——普通税，强征的苛税，发行纸币等——完全涸竭；必须向极度贫困的本国强征为了摆脱山穷水尽的局势而定的新税收，可以预料，这种税收大概是完全得不到的，——以上就是奥地利财政极度困难的主要特征。同时，奥地利的国家机构也愈来愈快地土崩瓦解。政府慌忙地企图用中央集权来阻止这一瓦解过程，结果枉费心机；解体现象已经波及该国最边缘的地区；甚至对那些作为奥地利主要支柱的最不开化的民族，对达尔马提亚、克罗地亚和巴纳特的南斯拉夫人，对“忠诚”的边境人¹⁴⁰来说，奥地利也成为极为厌恶的了。现在只有一个挣扎的办法，还能带来一线得救的希望，那就是对外战争。奥地利必然

德荷两国的旧币，1盾约合1.69马克。——译者注

要发动的这场对外战争,一定会使奥地利很快地彻底崩溃。

俄国也没有充足的金钱来支付换取自己荣誉的代价,何况购取这种荣誉时又必须交付现金。正教沙皇尽管在乌拉尔和阿尔泰有驰名的金矿,在彼得巴甫洛要塞的地下室里有无数的财宝,在伦敦和巴黎似乎完全由于现金多余而收购有价证券,但是他仍然认为,不仅必须制造种种借口从保存在彼得巴甫洛要塞里作为纸币基金的现金储备中借取500万银卢布,下谕在巴黎交易所上抛售自己的有价证券,而且还必须请求不大相信人的伦敦西蒂区老板们借予3000万银卢布的贷款。

1848年和1849年的运动,使俄国深深卷入了欧洲的政局,以至如果它不愿意它那关于土耳其、君士坦丁堡“这把它门户上的钥匙”¹⁴¹的老计划永久不能实现,它现在就必须尽快地实现这个计划。西欧反革命的胜利,西欧革命政党的力量的日益增长,俄国本国的形势和它的财政状况的恶化,迫使它尽快地采取行动。不久之前,我们看到了在东方问题上这出新戏的外交序幕¹⁴²;再过几个月,我们就可以亲眼看到正戏了。

对土耳其的战争必然会演成一场欧洲战争。这最合神圣俄罗斯的心意,这样一来,它就有可能在德国站得住脚,竭力使那里的反革命进行到底,帮助普鲁士占领纽沙特尔,最后向革命的中心巴黎挺进。

英国在这场欧洲战争中不会是中立的。它必定要出面反对俄国。英国是俄国的最危险的对手。如果大陆的陆军深入俄国腹地,必然会在俄国领土上分散兵力,自行削弱,如果它们越过古波兰

伦敦的金融和商业中心。——译者注

俄国的古称。——译者注

的东部边境向前挺进，几乎完全有重演 1812 年事件的危险，那末英国可能选中俄国最要害之处给以打击。何况，英国还可以驱使瑞典人夺回芬兰，为英国舰队打开彼得堡和敖德萨的大门。大家知道，俄国舰队是世界上最糟的舰队，占领喀琅施塔得和什吕谢尔堡要比占领圣让得阿克和圣万得拉¹⁴³来得容易。俄国一失去彼得堡和敖德萨，就成了一个被砍掉双手的巨人。这里还必须补充一点，俄国无论在出售原料和购买工业品方面如果离开英国哪怕是 6 个月也难以支持，这一点在拿破仑封锁大陆时就表现得很明显，而目前更加是如此。俄国一断绝与英国市场的联系，几个月后就会遭受严重的困难。英国则相反，它不仅可以在若干时期内不要俄国市场，而且可以从其他市场上获得各种俄国的原料。我们可以看到，令人望而生畏的俄国并不怎么可怕。但是，俄国在德国市民看来所以显得如此可怕，是因为俄国会直接制服他们的君主，是因为德国市民有一种完全正确的预感：野蛮的俄国大军很快就会遍布德国并在这里在某种程度上起着救世主的作用。

整个说来，瑞士对神圣同盟采取的态度，宛如个别说来普鲁士议会对其国王采取的态度一样。所不同的只是，瑞士总算有个替罪羊——德国流亡者，它可以在他们的身上两倍地、三倍地发泄受到神圣同盟打击时的那一肚子气，况且，替罪羊无人保护，命运好坏要看它是否仁慈。固然，日内瓦、瓦得和伯尔尼的一部分瑞士“激进主义者”曾经抗议了联邦会议对神圣同盟和流亡者所奉行的软弱政策。但是，另一方面，联邦会议把它的政策宣称为“绝大多数瑞士人的政策”，这种说法是正确的，事实也确是如此。同时，中央政府还继续在内政方面以最和平的方式进行小资产阶级的改革，如确立统一的关税，币制，邮政，度量衡，这些改革获得了小资产阶级

的赞扬。固然,中央政府还不敢实行废除雇佣兵条约的决定,直到现在每天还有一群群旧州居民到科摩去服那不勒斯的兵役¹⁴⁴。但是,不管瑞士对神圣同盟怎样顺从和殷勤,它终究会受到不可避免的风暴的侵袭。在对宗得崩德的战争以后,特别是在二月革命之后的第一次陶醉之中,一向胆小怕事的瑞士人让人家把自己引上了采取冒失行动的道路。他们竟敢作了可怕的事情,希望最终成为独立自主的人;他们抛弃列强所保证的1814年的宪法,而制订了新宪法,他们不顾条约的约束,承认了纽沙特尔的独立。为此,不管他们怎样卑躬屈膝,殷勤侍奉,甘当警察,也会受到惩罚。瑞士一旦被拖入欧洲战争,它的处境是很不妙的;因为,即便瑞士侮辱了神圣同盟,另一方面它还是叛变了革命。

在法国,资产阶级为了它本身的利益作了反动势力的首领,共和政体给反动势力提供了最广泛而彻底地大举进攻的可能性;在这里,镇压革命采取了最无耻最残暴的手段。在短短的一个月当中,一个打击跟着一个打击接踵而来:恢复直接使半数农民破产的葡萄酒税,发出甚至让宪兵充当监视官吏的特务的奥普尔通令,发布关于地方官员可以任意撤换小学教员的教员法,发布关于神甫治校的教育法,发布流放殖民地法,而最后这项法令表现了资产阶级对六月起义者满怀极为强烈的复仇心,由于缺乏其他处治办法,便使六月起义者遭受阿尔及利亚气候的致命摧残。更不用说6月13日以来仍然继续大批驱逐无辜的外国人的作法了。

这种资产阶级的残暴的反动行为的目的显然是恢复君主制度。但是,君主制度的复辟遇到几个王位僭望者本身和在国内支持他们的那些政党的有力阻挠。正统派和奥尔良党人是两个大体上势均力敌的最强大的保皇主义的党,第三个党是波拿巴党,力量相

当薄弱。路易-拿破仑虽然得到 700 万张选票,但甚至连个真正的政党也没有,只有一个小集团。他执行共同的反动政策时,总是得到议会多数人的支持,但是,只要他这个王位僭望者的单独的利益一冒头,不仅议会多数派会背弃他,而且他的阁员也会背弃他,每当这种场合,他的阁员都揭穿他的骗局,不仅如此,而且还迫使他第二天发表书面声明,表示对他们的信任。因此,他跟多数派之间的纠纷,不论其后果怎样严重,迄今只是一些可笑的插曲,在这些插曲里共和国总统每次都扮演被愚弄者的角色。同时,不言而喻,每个保皇政党都冒险暗中跟神圣同盟勾勾搭搭。“国民议会报”无耻已极,竟公开用俄国人来吓唬人民。现在已经有足够的事实说明路易-拿破仑正在勾结尼古拉一起进行阴谋活动。

当然,反动势力加强的同时,革命政党的力量亦在日益壮大。由于土地分成小块,税收负担沉重和大部分税收甚至资产阶级也认为是纯粹为了增加国库收入的有害税收,广大农民群众遭到破产,因而他们对路易-拿破仑和反动议员的诺言感到失望,投入了革命政党的怀抱,宣告信奉社会主义,虽然他们信奉的社会主义当时还很幼稚,还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甚至在正统主义影响最深的省份里,革命情绪也十分高涨,加尔省最近举行的选举可以说明这一点:在保皇主义和 1815 年的“白色恐怖”的中心加尔省,现在当选的是一个“红色分子”¹⁴⁵。深受在商业和政治方面又占居象路易-菲力浦时代一样的地位的大资本的压迫的小资产阶级,也跟在农民的后面。形势变化如此之大,就连叛徒马拉斯特和杂货商的报纸“世纪报”也不能不表示赞成社会主义者。表现为各个政党之间相互关系的各个阶级之间的关系,在目前几乎跟 1848 年 2 月 22 日一样。不过现在所涉及的问题不同,工人的觉悟更高

得多了，此外，过去一向在政治上死气沉沉的农民阶级也被卷入运动，被吸引到革命中来了。

正因为这样，所以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必然企图尽快地废除普选权；即使抛开国际关系不谈，这种必然性也是革命迅速胜利的保证。

目前整个局势是多么紧张，从人民代表勃拉迪耶提出的可笑的法案中就可以看出：他企图借助于国民议会的有 200 条款的法令来防止政变和革命。在这里和其他首府，金融贵族是多么不相信表面上已经恢复起来的“秩序”，这一点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路特希尔德王朝的各个支系几个月以前把公司合同仅仅延长了一年，——日期这样短，在大规模商业活动的编年史上是罕见的。

在最近两年中，大陆一直充满了革命、反革命和与此有关的无休止的舌战，而工业发达的英国却在完全不同的方面取得了成绩：英国的工业日益繁荣。1845 年秋季 *in due course*〔如期〕爆发的商业危机曾两次中断，一次是在 1846 年初，由于议会通过自由贸易的决定¹⁴⁶而中断，一次是在 1848 年初，由于二月革命而中断。海外市场积压的大量商品在这个时期逐渐找到销路。并且，二月革命恰恰在这些市场上消除了大陆工业的竞争，而英国工业由于大陆市场的破产遭到的损失要比它在危机的进一步发展中国本来要遭到的损失只稍微多一些。二月革命一度几乎使大陆工业完全停顿，这就帮助了英国人轻而易举地度过危机的年头，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促进了海外市场存货的倾销，并使 1849 年春季工业的新高涨成为可能。这种高涨（其实它还是影响了大陆的相当一部分工业）近 3 个月来竟达到了这样的水平，就连工厂主也说，他们

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好时光，——这种说法总是出现在危机的前夕。工厂的订货非常多，因此都加紧生产，千方百计地不执行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增加更多的劳动时间。在所有的工业区，大批新工厂正在兴建，旧工厂亦在扩大。现金涌入市场，游资企图抓住到处发财的机会，期票贴现助长了投机并投进了生产或原料贸易，几乎所有商品都绝对地涨价，而一切商品都毫无例外地相对地涨价。总之，英国由于名副其实的“繁荣”而大享其福。不过这里有个问题：这样悦人的好时光能继续多久呢？无论如何不会很久。许多大市场，例如东印度差不多已经商品充斥。甚至在目前，与其把商品运到真正巨大的市场，还不如运到世界贸易的集散地，从那里可以转运到最有销路的市场。由于 1846—1847 年，特别是 1849 年英国工业的生产力比 1843—1845 年有了很大的增长，由于这样的增长直到目前还在继续，其余的市场，特别是南北美洲和澳洲的市场不久也会商品充斥。最初的关于市场充斥的消息一经传开，马上就会在投机活动和生产里发生“恐慌”，这种情况可能就发生在春末，最迟不过七八月。不过，这次危机由于必然跟大陆的重大事件一起爆发，所造成的后果会与以前历次危机完全不同。以前的历次危机是工业资产阶级取得新成就和再一次战胜土地所有者及金融资产阶级的信号，而这次危机将是现代英国革命的开端，在这个革命中，科布顿将会扮演奈克尔的角色。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美国。美国最大的事件是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其意义超过了二月革命。时间仅仅过了 18 个月，现在就已经可以预料到，这一发现所带来的成果甚至将会比美洲大陆的发现所带来的要大得多。在 330 年当中，所有欧洲与太平洋的贸易一直是以惊人的长期耐久性绕道好望角或合恩角来进行的。所有打通

巴拿马地峡的建议都由于进行贸易的国家的无谓的争吵而失败了。从发现加利福尼亚金矿到现在,仅过了18个月,而美国佬就已经着手建设铁路,修建大公路,开凿以墨西哥湾为起点的运河;从纽约到查理斯,从巴拿马到旧金山已经有轮船定期航行;太平洋的贸易已经集中在巴拿马,绕道合恩角的航线已经过时了。在纬度30度上的漫长海岸是世界上最美丽最富饶的地区之一,以前它几乎是荒无人迹的地方,而现在它在我们眼前正变成一个富足的文明区域,聚集着一切种族和民族的代表:从美国佬到中国人,从黑人到印第安人和马来亚人,从克里奥洛和美司代佐到欧洲人。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源源流入美洲和亚洲的太平洋沿岸地区,甚至把最倔强的野蛮民族也拖进了世界贸易——文明世界。世界贸易第二次获得了新的方向。世界贸易中心在古代是泰尔,迦太基和亚历山大,在中世纪是热那亚和威尼斯,在现代,到目前为止是伦敦和利物浦,而现在的世界贸易中心将是纽约和旧金山,尼加拉瓜的圣胡安和利奥,查理斯和巴拿马。世界交通枢纽在中世纪是意大利,在现代是英国,而目前将是北美半岛南半部。古老欧洲的工业和贸易如果不愿意象16世纪以来意大利的工业和贸易那样衰落不振的话,如果不愿意让英国和法国变成今天的威尼斯、热那亚和荷兰的话,就必须作巨大的努力。再过几年,在我们面前将会出现一条固定航线,从英国通往查理斯,从查理斯和旧金山通往悉尼、广州和新加坡。由于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开采和美国佬的不断努力,太平洋两岸很快就会象现在从波士顿到新奥尔良的海岸地区那样

南美之欧洲血统的土著后裔。——译者注

西班牙人、葡萄牙人与印第安人的混血儿。——译者注

指圣胡安德尔苏尔港。——编者注

人口密集、贸易方便、工业发达。这样，太平洋就会象大西洋在现代，地中海在古代和中世纪一样，起着伟大的世界交通航线的作用；大西洋的作用将会降低，而象现在的地中海一样成为内海。欧洲的文明国家要不陷入象意大利、西班牙和葡萄牙目前那样在工商业上和政治上的依附地位，唯一的条件就是进行社会革命；这个革命现在还不算迟，还能够根据现代生产力所促成的生产本身的需要来改变生产和交换的方式，这样，就可以创造出新的生产力，保证欧洲工业的优势，从而使地理上的不利条件得以弥补。

最后，再谈一谈有名的德国传教士居茨拉夫从中国回来后宣传的一件值得注意的新奇事情。在这个国家，缓慢地但不断地增加的过剩人口，早已使它的社会条件成为这个民族的大多数人的沉重枷锁。后来英国人来了，用武力达到了五口通商的目的。成千上万的英美船只开到了中国；这个国家很快就为不列颠和美国廉价工业品所充斥。以手工劳动为基础的中国工业经不住机器的竞争。牢固的中华帝国遭受了社会危机。税金不能入库，国家濒于破产，大批居民赤贫如洗，这些居民开始愤懑激怒，进行反抗，殴打和杀死清朝的官吏和和尚。这个国家据说已经接近灭亡，甚至面临暴力革命的威胁，但是，更糟糕的是，在造反的平民当中有人指出了一部分人贫穷和另一部分人富有的现象，要求重新分配财产，过去和现在一直要求完全消灭私有制。当居茨拉夫先生离开20年之后又回到文明人和欧洲人中间来的时候，他听到人们在谈论社会主义，于是问道：这是什么意思？别人向他解释以后，他便惊叫起来：

“这么说来，我岂不到哪儿也躲不开这个害人的学说了吗？这正是中国许多庶民近来所宣传的那一套啊！”

虽然中国的社会主义跟欧洲的社会主义象中国哲学跟黑格尔哲学一样具有共同之点，但是，有一点仍然是令人欣慰的，即世界上最古老最巩固的帝国 8 年来在英国资产者的大批印花布的影响之下已经处于社会变革的前夕，而这次变革必将给这个国家的文明带来极其重要的结果。如果我们欧洲的反动分子不久的将来会逃奔亚洲，最后到达万里长城，到达最反动最保守的堡垒的大门，那末他们说不定就会看见这样的字样：

REPUBLIQUE CHINOISE
LIBERTE , EGALITE , FRATERNITE
| 中华共和国 |
| 自由，平等，博爱 |

1850 年 1 月 31 日于伦敦

普鲁士资产阶级的愿望实现了：“忠诚的人”已经在这个宪法使他有可能进行统治的前提下宣誓忠于宪法。在 2 月 6 日以后的几天中，两院的资产者完全满足了他这个愿望。他们在 2 月 6 日以前曾经说过：为了使国王向宪法宣誓，我们必须让步；宣誓完了以后，我们就可以另来一套。而 2 月 6 日以后他们却说：宪法经过宣誓已经肯定下来，我们有了一切保障，因此可以放心地让步了。1800 万马克的军费（用来动员 50 万士兵对付至今尚不知道的敌人）未经辩论，无人反对，几乎一致地批准了；预算 4 天工夫就表决了。一切政府提案一瞬间就经两院通过了。可见，德国资产阶级象从前一样，并不缺乏怯懦的口实。

善意的两院使普鲁士国王有充分的可能确信立宪制度比专制制度优越，确信立宪制度不仅对被统治者说来是优越的，而且对统

治者说来也是优越的。如果回忆一下 1842 年至 1848 年的财政困难：如企图向海外贸易公司和国家银行借款的行为徒劳无益，路特希尔德加以拒绝，联合议会否决贷款，国库枯竭，如果用这一切比较一下 1850 年的财政活跃的情况——三次预算中的 7000 万的赤字两院同意弥补，债券和国库券大量发行，政府与国家银行的关系比任何时候它与海外贸易公司的关系都要好，而且另外还有 3400 万批准作为储备的贷款，那末，这两种情况是多么明显的对照！

根据陆军大臣的言论看来，普鲁士政府认为迫使它动员所有军队来维护欧洲的“秩序和安宁”的事件是很可能爆发的。普鲁士的这个声明十分响亮而明确地宣布它将回到神圣同盟的怀抱。新的十字军打算远征的敌人是谁，这是很明显的。无政府状态和暴乱的中心法国的巴比伦必须消灭。直接进攻法国，还是首先佯攻瑞士和土耳其，这在很大的程度上取决于巴黎事态的发展。不管怎样，普鲁士政府现在有经费在两个月之内把兵力从 18 万扩充到 50 万；40 万俄国兵在波兰，沃伦和贝萨拉比亚严阵以待，奥地利至少有 65 万现役兵员。单单为了供养这么多的军队，俄国和奥地利就不得不在今年发动侵略战争。至于这次远征的矛头首先指向谁，不久前发表的一份耐人寻味的文件就可以说明这一点。

“瑞士国民报”在最近一期上发表了一个好象是奥地利的雪恩海斯将军所写的备忘录，其中叙述了侵入瑞士的全面计划。这个计划的要点如下：

普鲁士在美因地区靠近铁路集结 6 万人左右的兵力；黑森人、巴伐利亚人和维尔腾堡人组成的一个兵团，一部分集中在罗特威尔和图特林根附近，一部分集中在肯普腾和梅明根附近。奥地利在弗拉尔堡和通向音斯布鲁克的地区陈兵 5 万人并在意大利的西斯托-卡林特和莱科之间地区组织第二个

兵团。同时,用外交谈判去麻痹瑞士。只要进攻的时机一到,普鲁士人很快就把他们的军队沿着铁路线开入莱尔拉赫,把小股部队开入多瑙埃申根;奥地利人集结在布勒琴士和弗尔特库尔赫附近,而意大利军队集结在科摩和莱科附近。一个族留在华里斯地区,以威胁比林索那。尔后各国大使提出最后通牒,并且撤离瑞士。于是就开始军事行动;主要的借口是恢复 1814 年的联邦宪法和宗得崩德各州的独立。进攻的方向集中在琉森。普鲁士人经过巴塞尔向阿尔河推进,奥地利人经过圣加伦和苏黎世向利马特河推进。前者占领从左洛图恩到苏尔查赫的地区,后者占领从苏尔查赫经过苏黎世到乌茨纳赫的地区。同时,15000 名奥地利军队经过库尔切入什普留根,跟意大利军团会师,然后一起经过莱茵河上游盆地向圣哥达尔进攻,在那里再跟经过华里斯和比林索那的兵团会师,并策动各个旧州起义。这时,由沙福豪森的比较小的部队补充起来的主力部队的进攻和琉森的占领,就可以切断这些州和瑞士西部的联系,从而把山羊跟绵羊分开。同时,根据“1 月 30 日的秘密协定”在里昂和科马尔提供 6 万军队的法国,就利用占领罗马的同样借口去占领日内瓦和汝拉。这样,伯尔尼就无法支持下去,“革命”政府或者被迫立刻投降,或者跟自己军队一起饿死在伯尔尼的阿尔卑斯山脉。

大家看,这个计划是很不错的。它周密地考虑到地理条件,预定首先占领比较平坦和富饶的瑞士北部,用联合兵力夺取瑞士唯一重要阵地,即阿尔河和利马特河的对岸阵地。这个计划的优点在于,它预定切断瑞士军队跟富产粮食地区的联系,暂时把交通不便的山区留在瑞士军队手里。因此,这个计划可能就在初春实现,计划实现得愈早,被困在山区里的瑞士人的处境就愈困难。

上面所谈的文件是违背作者的意志而发表的,还是专门为了让瑞士的报纸发现和公布它而编造的,单凭它的内容是很难肯定的。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末这个计划的目的完全在于迫使瑞士人进行迅速的广泛的动员,从而造成国库空虚,使瑞士人更听命

于神圣同盟，使关于同盟国意图的舆论完全发生错误。目前在大肆宣扬俄国和奥地利的备战和对瑞士的作战计划，这种情况似乎在证明这个设想。备忘录本身有一个地方建议在地方部队集结和出动之前，以最快的速度进行一切战役，占领尽可能多的领土，这也使人有同样的感觉。不过，还有许多深刻的理由也可以说明，这个备忘录是真实的，确实存在这个入侵瑞士的计划。

有一点是肯定的：神圣同盟在今年或者首先会进攻瑞士或土耳其，或者直接进攻法国，在这两种场合下，联邦会议的命运都是早已注定了的。不论是谁首先进入伯尔尼，是神圣同盟也好，是革命也好，联邦会议本身由于采取怯懦的中立政策注定必然灭亡。反革命决不会满足联邦会议的让步，因为它或多或少是革命的产物；革命一刻也不会允许在欧洲的中心，在3个最热中于运动的国家中间存在这样一个变节的怯懦的政府。瑞士联邦会议的所做所为是处于近代列强包围中的小国获得虚假的“独立”和“自主”的最明显的例子，我们希望这也是最后的例子。

写于1850年1月31日至2月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弗·恩格斯 10小时工作制问题¹⁴⁷

为工人阶级的利益而斗争的战士在答复主张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即所谓“曼彻斯特学派”¹⁴⁸的论据时，往往仅限于愤慨地揭露他们学说的不道德和卑鄙自私的性质。如果每当有人冷酷地对工人说，他们永世注定充当机器，充当主人可以随使用来争取资本的更大光荣和资本的更快积累的物品，每当有人对他们说，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保证“他们国家的强盛”和工人阶级本身的继续存在，而身受傲慢的爱金如命的厂主老爷阶级的凌辱、压抑、肉体摧残和精神折磨的工人对此却毫不气愤，那末，这些工人就完全命该如此了。没有这种革命的义愤填膺的感情，无产阶级的解放就没有希望。但是，支持工人的英勇反抗精神是一回事，在公开的争论中对付他们的敌人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方面，单凭愤慨，单凭怒气迸发，不管多么正义都毫无用处，这里需要的是论据。毫无疑问，自由贸易派即使在心平气和的充分争论中，即使在自鸣得意的方面，即在政治经济学方面，也会很容易被无产阶级利益的捍卫者驳得体无完肤。

至于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厚颜无耻地论断说，现代社会的存在取决于他们今后是否还能靠工人的血汗来积累财富，那末，我们只要略加评论就够了。在历史上各个时期中，绝大多数的人民都不

过是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充当了一小撮特权者发财致富的工具。但是所有过去的时代,实行这种吸血的制度,都是以各种各样的道德、宗教和政治的谬论来加以粉饰的:牧师、哲学家、律师和国家活动家总是向人民说,为了个人幸福他们必定要忍饥挨饿,因为这是上帝的意旨。而现在却完全相反,自由贸易论者蛮横地说:“你们工人是奴隶,并将永远做奴隶,因为只有你们当奴隶,我们才能增加自己的财富和幸福,因为你们不做奴隶,我们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就不能继续统治。”于是,压迫的秘密现在终于大白于天下;现在幸亏有自由贸易论者,人民才终于能够清楚地了解自己的地位;现在问题终于直截了当地提出来了:有我无你,有你无我。因此,我们认为公开的敌人比虚伪的朋友好,蛮横的自由贸易论者比伪善的贵族慈善家好,教友派信徒布莱特比艾释黎勋爵好。

10小时工作制法案经过在议会里,各次选举运动里,报刊上,工业区的每一个工厂和作坊中历时40年的残酷的长期斗争,已经通过了。一方面有人描绘了极为悲惨的情景:谈到儿童发育受到阻碍,他们被折磨得难以生存,谈到离开了厨房和幼儿的妇女的情况,谈到整代的人在为不治之疾所折磨,谈到无数的人牺牲了生命,谈到在整个国家人们的幸福都已破灭,——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那本来就已非常富有的一小撮人发财致富。这里没有丝毫的捏造,这一切都是事实,都是铁的事实。尽管如此,但是谁也没有决心要消灭这种丑恶的制度;而只是说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这种制度的作用。另一方面,出现了一些冷酷无情的政治经济学家,即靠这个制度发财的人所雇佣的奴仆,他们用一系列的象比例计算那样无可辩驳的正确推论来证明,在“国家毁灭”的恐怖下,现行制度必须保持不变。

应当承认，工厂工人的维护者完全没有本领驳倒经济学家的论据，甚至很少下决心和他们进行争论。这是因为在现存社会制度下，资本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无数的人都被迫向资本出卖自己的劳动，在这种情况下，这些论据都象对方所引用的事实一样，是无可辩驳的。是的，在现存的社会制度下，英国及其各阶级的人民完全离不开本国工业的繁荣，而这种繁荣在现存制度下完全离不开毫无限制的买卖自由，离不开从国家的各种资源中吸取最大限度的利润。

的确，在现存的制度下，保证现在帝国赖以生存的这种工业繁荣的唯一办法就是开支一年年少而生产一年年多。可是，怎样才能开支少而生产多呢？为此必须首先使生产工具〔the instrument of production〕即机器和工人今年比上一年工作得更多；第二，必须用新的更完善的生产方法来代替以前所采用的生产方法，即用完善的机器来代替人；第三，必须降低工人的工资，降低他们的生活费用（谷物的自由贸易等等）或干脆把他们的工资降到最低的水平。可见，不管怎样，总是工人吃亏；可见，只有以英国工人的死亡作为代价才能挽救英国！这就是技术成就、资本积累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国内外竞争给英国造成的状况和必然结果。

可见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从它本身和它的最终目的来看，毫无疑问是个骗人的步骤，是不适用的，甚至是反动的措施，它本身包含着自我毁灭的根苗¹⁴⁹。这个法案一方面没有破坏现存的社会制度，另一方面也没有促进它的发展。10 小时工作制法案不是使这个制度迅速发展顶点，发展到统治阶级的一切资源都消耗殆尽，于是使统治权转到另一个阶级手里，使社会革命无法避免，而是竭力强使社会回到早已让位给现存制度的既往阶段。只要观

察一下不顾自由贸易论者的反对而使议会通过了这个法案的那些政党，这一点是十分明显的。是不是工人阶级掀起风潮，用自己的威胁行动争得这个法律的呢？不是，当然不是。如果是这样，工人早就争取到宪章了¹⁵⁰。而且来自工人当中的领导缩短工作日运动的那些人决不是可怕的革命者。这大部分是忠实于教会和国王的温和的和可尊敬的人物。他们对于宪章运动敬而远之，而对于一种温情的保守主义却心向往之。他们从来没有使任何一个政府感到畏惧。施行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是自由贸易的反动敌人，是土地所有者、金融资本家、殖民地各公司和航运公司的代表，即贵族和本身害怕那些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进行统治的那一部分资产阶级的同盟。他们施行这个法律是不是出于一种对人民的同情？根本不是。他们过去和现在都是靠掠夺人民过活的。虽然他们比较不那么露骨，更加温情些，但是丝毫不比厂主强。他们不愿意被厂主排挤掉，所以出于对厂主的憎恨而施行了这个法律，以便赢得人民的同情并且阻止厂主的社会力量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长。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的通过不是证明工人阶级有力量，而只是证明厂主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来获得他所想获得的东西。

从那时起，厂主实际上保证了自己的统治地位，通过议会达到了在谷物贸易和海运方面实行自由贸易原则的目的。土地所有者和航运公司的利益由于厂主这颗新起的明星而遭到牺牲。厂主的势力越强大，就越对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束缚感到头痛。他们开始公开地破坏这个法案：他们恢复了轮班制，迫使内政部颁发指令，让工厂视察员毫不追究这种破坏法律的行为；最后，由于对他们的商品的需求日益增长，某些讨厌的视察员的批评意见也使他们无法容忍，于是他们把问题提到财务法庭，而财务法庭仅

仅以一纸判决就完全废除了10小时工作制法案¹⁵¹。

由于厂主力量的成长,40年宣传的成果这样一日之间便被毁掉了,厂主为了达到这点只要短时间的“繁荣”和“需求的增长”就够了;英国的法官证明说,他们和牧师、律师、国家活动家和政治经济学家一样,只不过是统治阶级(不管它是土地贵族阶级,是金融贵族阶级或是厂主贵族阶级)雇佣的奴仆。

这是不是说,我们反对10小时工作制法案,我们主张保存这种靠榨取妇女和儿童的血汗和脂膏而发财致富的可恶制度呢?不是的,当然不是的。我们不但毫不反对,甚至我们还认为,工人阶级在取得政权的第一天,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劳动,将采取远比10小时工作制法案,甚至比8小时工作制法案更彻底得多的措施。但是,我们以为,1847年所实行的那个法案,并不是工人实行的,而是他们的暂时同盟者(社会上的反动阶级)所实行的,由于继这个法案之后并没有任何进一步措施来彻底破坏劳动和资本之间的关系,这个法案是不合时宜的,不现实的,甚至是反动的措施。

尽管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存在,但是,工人阶级在这件事情上还是得到了利益。工人们不应当为厂主暂时的欢喜而惶然不安,最终工人将会感到欣喜,而工厂主将会感到悲痛。原因如下:

第一,这些多年以来为宣传10小时工作制法案所耗费的时间和精力,虽然没有得到什么直接的结果,但是也并没白费。参与这种宣传工作,使得工人得到一个有效的办法来相互了解,意识到自己的社会地位和自己的利益,把自己组织起来,认识到自己的力量。工人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和从前不一样了;整个工人阶级经过了这种宣传,就在力量、知识和组织方面比以前强过百倍。工人阶级从前是互不相识和没有任何共同联系的单个人的总和;

现在它已经成了强而有力的意识到自己力量的统一整体〔body〕，这个整体已被认为是“第四等级”，而且很快就会占第一把交椅。

第二，工人阶级根据自己的经验深深地相信，他们的地位要得到任何可靠的改善，不能够依靠别人，而应当亲自争取，首先应当采取的办法是夺取政权。工人现在应当懂得，在他们还没有获得使工人可能在下院占多数的普选权之先，他们社会地位的改善永远不会有保障。从这个角度来看，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发生效力会给民主运动带来很大的好处。

第三，1847年的法律实际上被废除，会使厂主沾染严重的生产过剩寒热病，以致危机一个接着一个地发生，现存制度的一切资料和资源都将耗尽，使革命无法避免，这次革命将使无产者很快就取得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使社会得到比1793年和1848年的革命时期更为彻底的改造。我们已经看到，现存的社会制度和工业资本家的统治是密切联系着的，而这种统治又在降低生产成本的同时不断扩大生产是分不开的。但是，这样扩大生产是有一定限度的，它不可能摆脱现有市场的限制。当扩大生产超出了现有市场的限制的时候，就会产生危机，引起破产和贫困。曾经有过不少这样的危机，以往由于开辟了新市场（1842年开辟的中国市场）或者更好地掌握旧市场以及通过降低生产费用（例如通过实行谷物自由贸易）都安然渡过了。但是，这也是有限的。新市场现在已经再无法开辟，而要进一步降低工资也只有一个办法，即实行激进的金融改革和通过取消国债来减少税收。如果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没有足够的勇气一直走这条路，或者如果这种暂时办法在一定的時候也将用尽，那末生产过剩就会置他们于死地。其实很明显，在需要不断扩大生产的制度下，不能进一步扩大市场，

厂主的统治就会寿终正寝。再以后的情况将是怎样的呢？自由贸易论者说，将是“普遍破产和紊乱”。我们肯定说，将是社会革命和无产阶级的统治。

英国工人们！即使 13 小时工作制的“夹子”重新为你们、你们的妻子和孩子设下，你们也不必悲观失望。不管这杯酒多么苦，都得饮下去。你们越快经历这件事就越好。你们可以相信，你们那些傲慢的厂主虽然取得了他们称之为对你们的“胜利”的东西，但是他却为自己掘好了坟墓。10 小时工作制法案实际上被废除，这是一个大大加速你们解放时刻到来的事件。你们的法国和德国的工人弟兄们永远不会满足于 10 小时工作制的要求。他们一直都竭力争取彻底摆脱资本的暴虐无道的压迫。如果在技术、生产熟练程度和人数方面，你们有更多得多的可能得到自己的解放和为你们大家生产足够数量的财富，当然，你们是不会满足一些小恩小惠的。这样你们不要再要求实行“劳动保护措施”，而应当勇敢地立即开始斗争，争取无产阶级的政治和社会的统治地位，从而使你们有可能自己来保护自己的劳动。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2 月中旬

原文是英文

载于 1850 年 3 月“民主评论”

俄文译自“民主评论”

署名：弗·恩·

弗·恩格斯 英国的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

英国的工人遭到了严重的失败，而且他们的失败是在他们最料想不到的方面。英国 4 个最高法庭之一的财务法庭几个礼拜以前宣读的判决书，实际上废除了 1847 年颁布的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中的主要东西。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历史提供了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英国阶级矛盾发展的特殊形式，因此值得仔细加以研究。

大家都知道，随着大工业的产生，就开始了厂主对工人阶级的前所未闻的、毫无限制的和肆无忌惮的剥削。新机器使成年男人的劳动成为多余的，看管机器所需要的是妇女和儿童，因为他们更适合这个工作，同时比男人的工资少。于是工业剥削立即殃及工人的整个家庭，把他们监禁在工厂里；妇女和儿童只要还没有累倒，就必须日以继夜地工作而不得休息。在日益需要儿童的情况下，习艺所里穷人的孩子就成了十足的交易对象。他们从 4 岁起，甚至从 3 岁起，就成批地以签订学徒契约的形式卖给出价最高的厂主。从前对儿童和妇女进行了无耻的和残酷的剥削，这种剥削对自己的牺牲者是从不放松的，一直到吸尽他们最后一滴血，耗尽他们肌肉和血管的最后一点力气，才肯罢休；英国老一代的工人对于这种剥削至今还记忆犹新，许多人都还记得那弯曲的脊背或残废的四肢，都

还记得健康坏得根本无法恢复的身体。最坏的美国种植场里的奴隶的命运比起当时英国工人的命运也还是幸福的。

国家很早就已经不得不采取措施来制止蔑视文明社会一切要求的厂主们进行毫无限制的肆无忌惮的剥削。但是，这些第一次规定的立法限制是极端不够的，并且很快就无人实行了。只有经过了半个世纪，在建立大工业以后，当蓬勃的工业发展有了固定的途径时，只有在 1833 年，才可能实行一项有积极作用的法律，这一法律至少总算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令人发指的行为。

早在这一世纪之初，在一些慈善家的领导下，建立了一个政党，提出的要求是从立法上限制工厂每日的工作时间为 10 小时。这个政党于 20 年代在萨德勒的领导下，他死后在艾释黎勋爵和理·奥斯特勒领导下进行了宣传工作，并且把宣传工作一直进行到确实施行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时候为止，它逐渐除了工人以外也把贵族和一切仇视厂主的资产阶级派别都团结在自己的旗帜下面。工人和英国社会上五花八门的最反动的分子这样联合起来，使得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宣传完全脱离了革命的工人宣传。诚然，宪章派是一致赞同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的，他们是基本群众，在一切讨论 10 小时工作制的会议上都同声响应；他们把自己的报纸交归 10 小时工作制委员会管辖；但是没有一个是宪章派分子正式跟贵族和资产阶级中的 10 小时工作制拥护者一道来行动，没有出席曼彻斯特的 10 小时工作制委员会(Short-Time-Committee)的会议。这个委员会完全是由工厂的工人和监工组成的。但是，加入这个委员会的工人都是些被笨重不堪的劳动折磨和摧残得十分严重的、默不作声的、畏敬上帝和温顺驯服的人，他们对于宪章主义和社会主义感到虔诚的畏惧，对于国王和宗教表现了应有的尊敬；他

们对工业资产阶级的仇恨显得十分软弱无力,他们只善于奴颜婢膝地崇拜贵族,因为至少贵族还降低身分来关心他们的疾苦。拥护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的这些人的工人保守主义还反映了工人最初对工业进步所持的反对立场:他们力图恢复旧日的宗法状态,甚至行动最激烈的时候也不过是破坏机器。10 小时工作制派的资产阶级和贵族的首脑们的反动性,并不亚于这些工人。他们都是些温情的托利党人,大多数是空想思想家,他们非常怀念已被消灭了的宗法式的隐蔽剥削,非常怀念随着这种剥削而来的对宗教的笃信,对家园的依恋,对美德的尊尚,对生活的圈限,怀念那种固定不变的世袭相传的制度。这些眼光短浅的人一看到资产阶级产业革命,就头昏脑胀。他们的小资产阶级的心灵为新的象魔术一般突然增长起来的生产力所激怒,因为这种生产力不几年就从地球上扫除了以前社会中被认为是最受尊敬、最不可侵犯和最重要的阶级,而换上了新的,前所未有的,其利益、感情、整个生活方式和思想方法都和英国旧社会制度极为矛盾的阶级。这些善心的思想家从不放过任何机会,从道德、人道和同情心的角度来反对赖以完成这个社会改造过程的残酷无情,而提出正在消亡的宗法社会制度的宁静、安逸和善良作为社会的理想,以与之相对抗。

在 10 小时工作制问题引起社会注意的时期,社会上一切自身利益受到产业革命损害、生存受到这一革命威胁的派别都和上述这种人联合起来了。银行家、交易所经纪人、船主、商人、土地贵族、西印度的大地主、小资产阶级,所有这些人在这样的时期中都日益在 10 小时工作制的那些宣传者的领导下团结起来。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给这些反动的阶级和派别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来联合无产阶级反对工业资产阶级。它虽然大大阻碍了

厂主的财富、势力以及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迅速增长，但是，使工人得到的，仅仅是物质上的利益，甚至单纯是身体上的利益。它使工人的身体免于过早的衰弱。但是，它没有给工人提供什么东西，可以使工人在反动的同盟者心目中成为危险的人物，因为它没有给他们带来政治权利也没有改变他们作为雇佣工人的社会地位。相反的，10 小时工作制的宣传经常使工人受他们的有产阶级同盟者的影响，甚至有时受他们领导，而自从实行改革法案和产生宪章派的宣传以来，他们越来越想摆脱这种领导。只是直接与工业资产阶级进行斗争的工人，联合不直接剥削他们、也反对工业资产阶级的贵族以及其他的资产阶级派别，特别是在产业革命的初期，乃是十分自然的。但是，这种联盟改变了工人运动的性质，使之掺杂了很大的反动成分，只有现在这种反动成分才逐渐消失；这种联盟大大地加强了反动分子在工人运动中的地位，即加强了例如手工织工的地位，这种工人的生产部门仍是手工工场时期的部门，因此自然感到工业进步是一种威胁。

在 1847 年一切旧的议会政党都已瓦解了，而新的政党又还没有组织起来的混乱时期里，终于通过了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这对于工人来说是很幸运的。这个法案经过了一系列的紊乱投票才被通过，投票的结果显然是偶然的，在投票的时候，除了主张自由贸易的厂主和热烈拥护保护关税论的土地所有者两方面以外，没有一个政党的投票是一致的和一贯的。通过法案是贵族、部分皮尔分子和部分辉格党人针对工厂主所设的诡计，为的是对工厂主在废除谷物法方面所获得的巨大胜利进行报复。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不仅使工人满足了身体上必需的要求，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使他们不致由于厂主的疯狂剥削而损害了健康，

另外它还使工人不与温情的空想家为伍，不与英国一切反动阶级合作。自从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不再成为高谈阔论的主要内容以后，奥斯特勒这种人鼓吹宗法的空谈，艾释黎勋爵这种人保证同情别人的动人言词再也找不到听众了。工人运动只是到现在才完全集中力量来走改造整个现存社会的第一步，即由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在这个问题上，贵族和资产阶级的反动派别即工人不久以前的同盟者，作为工人不共戴天的敌人，作为工业资产阶级的同盟者而反对工人。

由于产业革命，英国赖以夺取和统治世界市场的工业，成了英国生产上起决定作用的部门。英国的繁荣完全取决于它的工业的盛衰，随工业的变动而变动。由于工业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工业资产者即厂主就成了英国社会里起决定作用的阶级；工业家在政治上占居统治地位，一切阻碍大工业发展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遭到消灭，就成为必然的了。工业资产阶级便行动起来了。从 1830 年到现在的英国历史是工业资产阶级接连战胜联合起来的反动敌人的历史。

正当法国七月革命使金融贵族获得统治地位的时候，英国在这以后不久，于 1832 年所通过的议会改革法案却使金融贵族垮台下野了。银行、国家债权人和证券投机商，总之，借给贵族巨额款项的金融商人到那时候在选举垄断的五光十色的掩护下几乎单独地统治了英国。大工业和世界贸易越向前发展，他们的统治尽管作了一些让步，仍然越来越变得无法忍受。资产阶级其余的派别和英国无产阶级以及爱尔兰农民结成同盟，把金融资产阶级推翻了。人民以革命进行威胁，资产阶级大量的向银行兑换它所发行的银行券，使得银行濒于破产。金融贵族及时地作了让步，它

的让步使英国避免了本身的二月革命。

改革法案使国内所有的有产阶级，直到最小的店铺老板都能参加政权。资产阶级的各派因此而获得了法律根据，借以能够提出自己的要求和表现自己的权力。在法国，资产阶级各派从 1848 年六月胜利时起在共和国里互相进行的斗争，在英国从改革法案通过时起也在议会里进行了。不言而喻，这两个国家的条件完全不同，而产生的后果也完全不同。

工业资产阶级既然利用改革法案取得了进行议会斗争的场所，就不能不取得接二连三的胜利。它通过限制挂名领高薪的职位¹⁵²，使依附于金融资本家的贵族受到损失，以 1833 年的济贫法¹⁵³使穷人受到损失，以降低税率和实行所得税使金融贵族和土地所有者丧失不纳税的自由。随着工业家取得胜利，他们的附庸增多了。大大小小的贸易都开始向他们缴纳贡税。伦敦和利物浦都拜倒在自由贸易即工业家的救世主的脚下。但是随着他们取得胜利，他们的需求和野心也增长了。

现代的大工业只有在经常扩大，经常夺取新市场的条件下才能存在。大量生产的无限可能性、技术的不断发展和进一步完善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资本和劳动力的不断排挤，迫使现代的大工业非这样不可。在这里，任何停滞都只是破产的开始。但是，工业的发展取决于市场的扩展。由于工业在当前的发展阶段上，增加生产力比扩大市场要迅速得多，于是便产生周期性的危机；在危机期间，由于生产资料 and 产品的过剩，经济机体中的流通过突然停止；在多余的产品没有找到新出路以前，工业和商业几乎完全陷于停顿。英国是这种危机的策源地，这种危机的麻痹性的影响必然会波及世界市场的最遥远和最偏僻的角落，在各处都使大部

分的工业和商业资产阶级遭受破产。这种危机非常清楚地向英国社会的各部分人表明了它们对厂主的依存关系，要避免这种危机只有一个办法：或者依靠夺取新市场，或者依靠加剧剥削旧市场来扩大销路。如果把 1842 年以武力在中国开辟了以往顽强地闭关自守的市场这种为数不多的特殊场合撇开不谈，那末，唯一的办法就是通过工业的途径来开辟新市场和加剧剥削旧有市场，就是说要降低价格和减少生产费用。不过，要减少生产费用就只有采用新的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减少利润或者降低工资。而采用更完善的生产方法并不能避免危机，因为这样就会使生产增加，从而需要新的市场。降低利润在危机时期是根本谈不到的，因为这时即使折本出售也都愿意。工资也是如此，同时工资还和利润一样，为不以厂主的意志和愿望为转移的规律所左右。工资毕竟是生产费用的主要组成部分，所以经常降低工资是扩大市场和避免危机的唯一办法。但是，只有工人的生活资料价格便宜了，工资才能降低。英国工人的生活资料由于采取了谷物、英国殖民地产品等等的保护关税以及间接税而价格一直高昂。

这一点可以说明，为什么工业家们不断地大力普遍宣传贸易自由，特别是废除谷物税。这一点可以说明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的原委，即为什么从 1842 年起每一次商业和工业的危机都给他们带来新的胜利。废除谷物税使英国的土地所有者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废除食糖等等的差别税使殖民地的土地所有者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废除航运法¹⁵⁴使船主作了工业家的牺牲品。当时他们宣传限制国家开支，降低税收以及给予最可靠的那一部分工人以选举权。他们希望使新的同盟者参加议会，以便更快地取得直接的政治统治，因为只有借助于这种统治，他们才能清除已经失去任

何意义但却花费很大的英国国家机器上的传统附属品，如贵族、教会、挂名领高薪的职务、半封建的法学界等。现在在不久的将来即将产生的新的商业危机，根据各方面情况看来，将会和大陆上极为重大的新冲突同时爆发，毫无疑问，这次危机至少会使英国在自己的发展中有上述的进步。

但是，在工业资产阶级这样不断大获全胜的时候，反动派却用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把它束缚起来了。通过这个法案的时候既不是繁荣时期，也不是危机时期，而是这样一个过渡时期，即工业受生产过剩的影响还非常严重，以致能够动用的只是自己的一部分资源，因此工厂主自己也不让整天工作。只是在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限制了厂主间的竞争的时候，它才被接受。但是这样的时候很快就为新的繁荣时期所代替。空虚的市场需要重新输送商品，投机倒把又重新猖獗，因而需求倍增；工厂主来不及制造产品。现在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已经变成了他们无法忍受的束缚，因为他们比以前任何时候都需要充分的独立性和可能性来无限制地支配一切工业资源。如果不让工业家在短暂的繁荣时期尽一切力量进行剥削，最近一次危机到来的时候他们的下场不知将会怎样？10 小时工作制法案必将取消。如果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在议会里废除它，也需要尽量不去实行它。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限制 18 岁以下的少年和女工每日的工作时间为 10 小时。因为妇女、少年和儿童占工厂工人的大部分，其必然后果就是所有的工厂每天都只能工作 10 小时。但是，当繁荣时期工厂主需要增加劳动时间的时候，他们总会找到出路的。象过去那样，在问题关系到工作时间限制更大的 14 岁以下的儿童的时候，他们开始多雇佣一些妇女和少年来帮忙和轮换。这样，他

们可以使自己的工厂和成年工人每天工作 13、14、15 小时，但是适用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工人却每天工作仍不超出 10 小时。这就有些违背了法律的条文，尤其是违背了法律的整个精神和立法者的意图。工厂视察员向法庭提出了控告，由于治安法官之间不一致，他们的判决也是分歧的。越是繁荣，工业家就越大张旗鼓地反对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以及工厂视察员的干涉。内政大臣乔·格雷先生命令视察员对轮班制 (relay 或 shift system) 采取容许的态度。但是，他们当中许多人都以法律为根据，而不理会这个命令。最后，有一个特别典型的事件告到财务法庭，而法庭的主张却有利于工厂主。这种判决实际上就是废除了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工厂主又成了自己工厂的全权主人。在危机时期，他们可以开工 2 小时、3 小时或者 6 小时，而在急剧发展的时期则开工 13 小时到 15 小时，工厂视察员再也无权过问此事。

既然保护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的主要是反动派，既然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完全是反动阶级通过议会来批准的，那末现在我们就知道，根据法案被通过的方式，它完全是反动的措施。英国整个社会的发展是和工业的发展、工业的进步有关的。一切阻碍这种发展的制度都要限制社会的发展或者采用外在力量来调节社会发展，并控制这种发展，——这些制度都是反动的，无能为力的，并将为这种发展所消灭。轻而易举地就制胜了古老英国的整个宗法社会，制胜了贵族和金融资产阶级的革命力量，当然不会使自己受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的拮据。艾释黎勋爵及其伙伴想通过准确的解释来恢复已失去效力的法案的一切企图，是不会有结果的，或者在最好的情况下只能得到昙花一现的表面的成果。

不过，10 小时工作制法案对工人来说仍然还是必要的，是工

人生理上所必需的。没有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英国整个年轻一代的工人的身体就会垮了。但是，现在工人所要求的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和萨德勒、奥斯特勒和艾释黎所宣传的以及 1847 年反动的同盟所通过的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两者有很大区别。由于法案不能长久存在，由于法案轻而易举地就被取消（只是一纸法庭判决书就取消了，甚至不需要议会的废除法令），根据过去自己的反革命同盟者后来的一些言论，工人们了解到，和反动派联合是不值得的。他们了解到，采取某些无足轻重的措施来反对工业资产阶级，对他们没有什么好处的。他们了解到，工业资产阶级现在仍然是唯一能够在目前领导运动的阶级，要阻碍他们完成这个进步的使命是徒劳无益的。正因为如此，所以工人尽管一刻也不能平息对工业家的公然痛恨，但是，现在他们却非常情愿支持工业家宣传彻底实行贸易自由、财政改革和扩大选举权的活动，而不愿再让慈善的骗局把自己诱到联合起来的反动派的旗帜之下。他们感觉到，只有工业家将来起完作用的时候，他们的时机才会到来，因此正确的本能告诉他们，要加速必然使工业家获得政权从而为他们复灭准备好条件的发展过程。但是，工人并没有因此而忘记，他们协助工业家建立统治也就是协助他们切齿痛恨的直接敌人建立政权，他们只有推翻工业家为自己夺得了政权，才能得到自身的解放。10 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废除再一次生动地向他们证明了这一点。现在要恢复这个法案的效力，只有在普选权的统治下才有意义，而普选权在工业无产者占 $\frac{2}{3}$ 的英国就意味着工人阶级的单独的政治统治和一切与此密切相联的社会制度的各种革命变革。正因为如此，工人现在所力争的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和财务法庭才宣布无效的那个法案是完全不同的。这已经不是个别

的麻痹工业发展的意图，这是彻底改造现存社会制度和逐渐消灭以往存在的阶级矛盾的一系列措施中的一环，这已经不是反革命的措施，而是革命的措施。

10小时工作制法案最初由厂主擅自作主而后通过财务法庭事实上加以废除，这首先就促使繁荣时期缩短，危机加速到来。但是，加速危机的到来，同时也就是加速英国社会的发展过程和实现这种发展的最近目标——工业无产阶级推翻工业资产阶级。工业家们扩大市场和消灭危机的手段是非常有限的。科布顿提议的缩减国家开支的办法，不是纯粹的辉格党人特有的瞎吹，就是等于一次真正的革命，哪怕它只能起暂时缓和的作用。即使缩减国家开支将通过最广泛的革命方式来实行（就英国工业家能够成为革命者而言），那末又怎样能防止下一次的危机呢？英国工业家拥有的生产资料的发展力量比他们的销售市场的发展力量要大得多，显然，英国工业家正迅速地走近这样的时期，即他们的非常手段将会用尽，现在还处于一次危机和下一次危机之间的繁荣时期在过分增长的生产力的压力下将完全消失，危机和危机之间只有短时期的半停滞状态的微弱的工业活动；那时，如果这样反常的状态没有治疗自己的方法，如果工业的发展不同时唤醒唯一能领导社会的阶级即无产阶级，那末工业、商业和整个当前社会一方面由于没有得到运用的有生力量过剩，另一方面由于十分匮乏而必然遭到毁灭。那时无产阶级革命将是不可避免的，而且革命的胜利也是毫无疑问的。

这就是事情的正常进程，这种进程必然产生于整个英国当前社会的状况。大陆上的冲突和英国发生的革命变革能把这个正常的进程缩短多少，在最近的将来我们就能看到。

那末 10 小时工作制法案该怎样办呢？

自从为了充分扩大现代工业的一切资源甚至世界市场也仍嫌太小的时候起，自从现代工业为了使它的力量重新获得充分的活动场所而必须进行社会革命的时候起，限制工作时间已经不是反动的措施，不是工业发展的障碍了。相反的，这种限制会自然而然地规定下来。英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把大工业集中在国家手里，即集中在居于统治地位的无产阶级的手里，而随着工业的集中，与竞争相联系的、使现在劳动时间的调整和工业的进步发生冲突的一切关系也将会消灭。因此，解决 10 小时工作制的问题，也象解决以资本与雇佣劳动的矛盾为基础的一切问题一样，唯一的办法就是依靠无产阶级革命。

弗·恩格斯写于 1850 年 3 月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 4 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¹⁵⁵

1850年3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弟兄们！

在1848—1849年这两个革命的年头中，共产主义者同盟在两方面受过了考验：第一，它的成员到处都积极地参加了运动，不论在报纸上、街垒中以及战场上，都是站在唯一坚决革命的阶级即无产阶级的最前列。其次，共产主义者同盟受过的考验是1847年各次代表大会和中央委员会的通告以及“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运动的观点都已证明是唯一正确的观点，在这些文件中的各种预见都已完全被证实，而从前同盟仅仅秘密进行宣传的关于现代社会状况的见解，现在人人都在谈论，甚至在广场上公开进行宣扬。不过，同盟从前的坚强的组织却大大地削弱了。大部分直接参加过革命运动的成员，都认为秘密结社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单单进行公开活动就够了。个别的区部和支部放松了自己跟中央委员会的联系，最后甚至渐渐地完全断绝了这种联系。结果，当德国民主派即小资产阶级的党派日益组织起来的时候，工人的政党却丧失了自己唯一的巩固的基地，至多也只是在个别地方为了本地的目的

还保存着组织的形式,因此在一般的运动中就落到了完全在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支配和领导下的地位。这种状况必须结束,工人的独立应该恢复起来。中央委员会由于了解到这种必要性,所以在1848—1849年冬天就已委派约瑟夫·莫尔到德国去进行同盟改组工作。可是莫尔所负的使命没有起重大的作用,这一方面是由于德国工人当时还没有充分的经验,另一方面是由于去年5月发生的起义使得这次使命不能继续执行。莫尔本人拿起武器加入了巴登-普法尔茨军队,于6月29日在牟尔克战役中阵亡了。他的牺牲使同盟丧失了一位最老的、最积极的和最可靠的成员,他曾参加过各次大会和中央委员会,以前曾非常成功地执行过好几次奉命出差的任务。在1849年7月德法两国革命政党遭到失败之后,差不多全体中央委员会委员都在伦敦重新聚集起来,他们用新的革命力量补充了自己的队伍,又大力开始进行同盟改组的工作。

同盟的改组只有通过一个特使才可能实现,所以中央委员会认为指派一个特使现在就动身是十分必要的,因为目前即将爆发新的革命,工人党必须尽量有组织地、尽量一致地和尽量独立地行动起来,才不会再象1848年那样受资产阶级利用和做资产阶级的尾巴。

弟兄们,我们早在1848年就对你们说过,德国的自由资产者很快就会执掌政权,并且立刻就会利用他们刚刚获得的政权来反对工人。你们已看到,这个预言是证实了。1848年三月运动之后,资产者果然是立刻就夺得了国家政权,并且随即利用了这个政权去迫使工人即自己的战斗中的同盟者回到他们从前的被压迫的地

位。资产阶级如果不是与那个在 3 月间被打败了的封建党派结成联盟,甚至最后把统治权重又让给这个封建专制主义党派,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尽管如此,它终究为自己创造了一些条件,一旦革命运动现在能够走上所谓和平发展的道路时,就可能由于政府发生财政困难而使统治权终于转到它手里去,而使它自己的利益有所保障。为了保证自己的统治,资产阶级甚至不必采用令人民憎恨的暴力措施,因为所有这一切暴力手段封建反革命派都用过了。但是,发展是不会经过这条和平道路的。相反的,革命已经迫近了,而这次革命不管将来是由法国无产阶级的独立起义引起的还是由神圣同盟对革命的巴比伦的侵犯引起的,都会加速这种发展。

德国自由资产者于 1848 年在和人民的关系上所扮演过的叛徒角色,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将由民主的小资产者来扮演,而民主的小资产者现今在反对派方面所处的地位,正和自由资产者在 1848 年以前所处的地位相同。这个党派,这个对于工人讲来比从前的自由派更为危险的民主派,是由下列 3 种人组成的:

一、大资产阶级中最进步的那部分人。他们所抱定的目的是要立刻完全推翻封建主义和专制制度。这一派的代表是从前的柏林的妥协派,即那些曾经主张拒绝纳税的人。

二、立宪民主派的小资产者。他们在上次运动中所抱定的主要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多少有些民主的联邦国家,也就是要建立他们的代表、法兰克福议会左派以及后来的斯图加特议会和他们自己在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中所争取的那种国家。

三、共和派的小资产者。他们的理想是建立一个象瑞士那样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他们现在由于好心好意地想消灭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大资产者对小资产者的压迫而自称为“红色党

人”和“社会民主党人”。这一派的代表是各次民主大会和民主委员会的成员，民主协会的领导和民主报纸的编辑。

所有这三派在遭受失败之后现在都自称为“共和党人”或“红色党人”，完全就象法国的共和派小资产者现在自称为社会主义者一样。在凡是他们认为还有可能用立宪的办法来维护自己目的的地方，如在维尔腾堡、巴伐利亚等地方，他们总是利用机会来保持他们那套陈词滥调，来实际证明他们丝毫没有改变。但是，很明显，改变这个政党的名称，丝毫也改变不了它对工人的态度；改变名称只不过是证明这个党现在已不得不反对和专制制度相勾结的资产阶级而依靠无产阶级。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是很强大有力的。它不但包括了城市的绝大多数资产阶级居民、小工商业者和手工业者，跟着它走的还有农民和尚未得到城市中独立的无产阶级支持的农村无产阶级。

革命的工人政党对于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态度是这样的：同小资产阶级民主派一起去反对工人政党所要推翻的派别；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想要巩固本身地位来谋私利的时候，就要加以反对。

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根本不愿为革命无产者的利益而变革整个社会，他们所要求的社会制度的改变，是想使现存社会尽可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而舒服。因此，他们首先就要求限制官僚制度以缩减国家开支，把主要税收负担转嫁到大土地占有者和资产者肩上。其次，他们要求消除大资本对小资本的压迫，设立国家信用机关，颁布取缔高利贷的法令，这样他们和农民就有可能不从资本家方面取得贷款，而从国家方面根据优惠条件取得贷款；然后，他们再力求用彻底铲除封建制度的手段来在农村中建立资产阶级的财产关系。为要实现这一切，他们就需要有一种能使他们及其

同盟者农民占多数的民主的——不论是立宪的或共和的——政体，并且需要有一种能把公有财产直接监督权以及目前由官僚执行的许多职权转归他们掌握的民主地方自治制度。

其次，他们认为，必须一方面用限制遗产权的办法，另一方面用尽量把各种事业转归国家经营的办法，阻挡资本的统治及其迅速的增长。至于工人呢，那末首先毫无疑问的是他们还应当照旧做雇佣工人，不过这班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想使工人有较高的工资和较有保障的生活，他们希望部分地用国家保证工作的办法，部分地用各种慈善救济的措施来达到这点，——总之，他们希望用可以说是虚假的小恩小惠来收买工人，用暂时改善工人生活条件的方法来挫折工人的革命力量。并不是小资产阶级民主党内所有一切派别都坚持这里列举的一切要求，只有少数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才想使这些要求全部实现。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中的个别人物和派别走得越远，则这些要求中被他们当作本身要求去争取的也越多，而那些把上述种种要求视为自己纲领的少数人，也许会以为这就是一般地对革命所能寄予的最大希望。但是这些要求无论如何也不能使无产阶级政党感到满足。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至多也不过是希望实行了上述要求便赶快结束革命，而我们的利益和我们的任务却是要不间断地进行革命，直到把一切大大小小的有产阶级的统治都消灭掉，直到无产阶级夺得国家政权，直到无产者的联合不仅在一个国家内而且在世界一切占统治地位的国家内都发展到使这些国家的无产者间的竞争停止，至少是直到那些有决定意义的生产力集中到了无产者手里的时候为止。对我们说来，问题不在于改变私有制，而在于消灭私有制，不在于掩盖阶级矛盾，而在于消灭阶级，不在于改良现存社会，而在于建立新

社会。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在革命今后的发展过程中，将取得一个相当时期的优势，这是毫无疑问的。因此，试问，无产阶级以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应对他们采取什么态度：

一、当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也处于被压迫地位的现有关系还继续存在的时候应取什么态度；

二、在最近将来会使他们获得优势的革命斗争中应取什么态度；

三、在这个斗争结束后，在他们的势力超过被推翻各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时候对他们应取什么态度。

第一、目前，在民主主义小资产者到处都受压迫的时候，他们一般地都向无产阶级宣传团结和协调，表示愿意与无产阶级携手合作，力求建立一个包括民主党内一切派别的巨大的反对派政党，就是说，他们极力想把工人拉入这样一个党组织，在这里尽是一些掩盖他们特殊利益的笼统的社会民主主义空话，为着维持极合心愿的和平而不许提出无产阶级的特殊要求。这种联合无疑会使无产阶级受到损害，而只对小资产者有利益。无产阶级会完全丧失它辛辛苦苦争得的独立地位，而重又降为正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附庸。因此，无产阶级对于这种联合应该采取极坚决的拒绝态度。工人，首先是共产主义者同盟，不应再度充当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随声附和的合唱队，而应该努力设法建立一个秘密的和公开的独立工人政党组织，以与那些正式的民主派相并立，并且应该使自己的每一个支部变成工人联合会的中心和核心，在这种工人联合会中，无产阶级的立场和利益问题应该能够进行独立讨论而不受资产阶级影响。资产阶级民主派对于他们跟无产者缔结的这种应该保证无产者与他们具有同等力量和同等权利的联盟，

是持着多么不严肃的态度，这可从布勒斯劳的民主派的例子上看得出来：他们在自己的机关报“新奥得报”上，非常狂暴地攻击他们称为社会主义者的那些独立组织起来的工人。在反对共同的敌人时，不需要任何特别的联合。既然必须进行反对共同敌人的直接斗争，两个党派双方的利益也就会暂时趋于一致，因而将来——也如以前有过的情形一样——自然会产生出这种只适合一定时机的需要的联盟。显然，在当前的流血冲突中，也如在先前各次流血冲突中一样，主要是工人必须勇敢而坚定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来争取胜利。在这个斗争中，小资产者群众必定会和从前一样，行动尽可能拖延，采取犹疑不决和消极的态度，以待将来取得胜利的时候，利用这个胜利机会来谋自己的利益，号召工人镇静下来和回到劳动中去，制止所谓过火行为并剥夺无产阶级所获得的胜利果实。工人无法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采取这种行动，可是工人有能力阻止小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凌驾于武装的无产阶级之上，并逼迫他们接受一些条件，使得资产阶级民主派的统治一开始就具有复灭的根苗，使他们的统治在以后很容易就为无产阶级的统治排挤掉。工人在冲突发生时期和斗争刚结束以后，首先必须尽一切可能反对资产阶级制造和平局面的企图，迫使民主派实现他们现在所说的恐怖言论。工人应该努力设法使直接革命的热潮不致于又在革命刚刚胜利后就被镇压下去。相反，他们应该尽可能支持这种热潮。工人不仅不应反对所谓过火行为，不应反对民众对于可恨的人物或对于那些与可恨的往事有关的官方机构进行报复，不但应该容忍这种举动，而且应该负责加以领导。在斗争时和斗争后，工人在每一场合都应当提出他们本身的要求，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要求相并列。当民主主义的资产者刚一准备

夺取政权时，工人就应当要求他们给予工人以各种保证。在有必要时，工人应以实力争得这些保证，并且一般应当设法使新统治者作出各种让步和诺言；——这是使他们丧失信用的最可靠的手段。工人一般地应该用一切方法尽可能地抑制那种由新的情况所引起的狂喜心理，抑制那种随着每次巷战胜利产生的陶醉心情，而应该对事变有镇定冷静的了解。对新政府公开表示不信任。同时，工人应该立刻成立自己的革命工人政府，如地方自治机关即地方代表会、工人俱乐部或工人委员会以与正式的新政府并立，这样使得资产阶级的民主政府不仅立刻失去工人的支持，并且一开始就看到自己受着全体工人群众所拥护的政权机关的监督和威胁。总之，从胜利的最初一瞬间起，工人所表示的不信任态度就不是针对着已被打倒的反动政党，而是必须针对着自己从前的同盟者，即针对着那个想要利用共同胜利来专门图谋私利的政党。

第二、可是，为了坚决而严厉地声讨这个从胜利的头一小时起就开始背叛工人的政党，工人应该拥有武装和严密的组织。必须立刻使整个无产阶级用步枪、马枪、大炮和弹药武装起来；必须制止过去那种专门对付工人的市民自卫团的复活。在无法做到这点的地方，工人就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不要听从国家政权机关的调动，而要听从由工人所建立的革命地方代表会调动。凡是工人在国家企业中做工的地方，他们都应该获得武器，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指挥的独立军团，或是组成无产阶级近卫军。他们无论如何都不应把武器和弹药交出去；对于任何一种解除工人武装的企图在必要的时候都应该予以武装回击。消灭资产阶级民主党人对于工人的影响，立刻建立起独立和武装的工人组织，造

成各种尽量使暂时不可避免的资产阶级民主党统治感到困难和丧失威信的条件，——这就是无产阶级及共产主义者同盟在即将爆发的起义中和起义后所应注意的主要问题。

第三、新政府只要巩固到一定程度，就会立刻开始反对工人。为了有可能大力声讨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首先必须使工人独立地组织起来并通过自己的俱乐部集中起来。在推翻现存政府以后，只要有可能，中央委员会就要赶快移到德国去，立刻召开代表大会，审查关于把各个工人俱乐部集中起来由设在主要运动中心区里的机关来领导的各种必要的提案。至少要在各省范围内迅速把各个人民俱乐部统一起来，这是加强和发展工人政党的一种最主要的措施。推翻各邦现存政府后，立刻就要选举国民代表会议。这里无产阶级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一、无论如何都不要让地方当局或政府委员用某种诡谲借口把大量工人摈除于选举之外。

二、到处都要尽可能从同盟成员中提出工人的候选人来与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候选人相并列，并且要用一切可能的手段使工人候选人当选。甚至在工人候选人毫无当选希望的地方，工人也一定要提出自己的候选人，以保持自己的独立性，估计自己的力量，并向大家表明自己的革命的立场和自己的党的观点。同时，工人不应为民主派的词句，例如说这种作法将使民主派陷于分裂而使反动派有可能获得胜利之类的词句所欺骗。所有这一类词句，归根到底不外是为了要蒙哄无产阶级。无产阶级党用这种独立行动所能得到的成就，比起几个反动分子参加国民议会所能造成的害处，是重要得多。如果民主派一开始就坚决地用恐怖手段对付反动派，那末，反动派在选举中的作用预先就被消除了。

引起资产阶级民主派与工人发生冲突的第一个问题，将是消灭封建制度的问题。正如在第一次法国革命时期一样，小资产者将把封建地产交给农民作为他们自由支配的财产，就是说，他们将力求继续保存农村无产阶级并造成一个农民小资产阶级，这个农民小资产阶级一定会象法国农民现在的处境一样经受一贫如洗和债台高筑的痛苦。

工人为了农村无产阶级的利益和自己本身的利益，一定要反对这种意图。他们必须要求把没收下来的封建地产变为国家财产，变成工人农场，由联合起来的农村无产阶级利用大规模农业的一切优点来进行耕种。这样，在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发生动摇的情况下，公有制的原则立刻就会获得巩固的基础。正如现在民主派与农民联合起来那样，工人也应当与农村无产阶级联合起来¹⁵⁶。其次，民主派或是直接力求建立一个联邦共和国，或是当他们无力反对建立一个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的时候，他们至少也要设法赋予各个乡镇和各个省区以尽量大的独立自主权，借以使中央政府陷于瘫痪状态。工人应该反对这种意图，不仅要坚持建立统一而不可分割的德意志共和国，并且还要坚决使这个共和国的一切权力集中于国家政权掌握之下。他们不应甘受民主派空谈乡镇自由、空谈自治等等的花言巧语所迷惑。在象德国这样一个还需要铲除许许多多的中世纪残余，还必须打破很多地方性的和省区性的偏狭习俗的国家里，无论如何也不能容许每一村庄、每一城市和每一省都弄出一些新的障碍来阻挠革命活动，因为革命活动只有在集中的条件下才能发挥自己的全部力量。——决不能容许现今这种状况复活起来，因为现今这种状况使德国人民为了同一个前进步骤都不免要在每个城市 and 每个省区里进

行单独的斗争。决不能容许利用所谓自由地方自治来永远保存乡镇所有制，这种所有制比现代私有制更为落后，并且是到处都陷于解体而必然要转变为现代私有制，——因而也就不能容许永远保存各个贫穷乡镇与富足乡镇在这种所有制基础上发生的争执，以及那与全国民法并存的乡镇民法及其各种反对工人的诡谲办法。也如 1793 年在法国那样，目前在德国实行最严格的中央集权制是真正革命党的任务。

我们已经说过，在即将来临的运动中，民主派将会取得统治，他们将不得不提出一些多少带点社会主义性质的措施。这里发生一个问题：工人应该提出一些什么与其相反的措施呢？当然，在运动的初期，工人还不可能提出纯粹共产主义的措施。但是他们可以采取如下两个措施：

一、迫使民主派尽可能多触动现存的各方面的社会制度，破坏现存社会制度的正常发展，使他们自己丧失威信，并尽量把生产力、交通工具、工厂、铁路等等由国家集中掌握。

现在必须指出，这个地方是出于误会。当时因受到波拿巴派与自由派的历史伪造家的欺骗，大家都以为法国中央集权的管理机构是由大革命开始建立的，以为国民公会曾利用这个机构作为战胜保皇主义反动派、联邦主义反动派以及外敌的必要的和决定性的武器。可是，现在大家都已知道的事实是：在整个革命时期，直到雾月 18 日政变时止，各省、各区和各乡镇的管理机构都是由人民自己选出而可以在全国法律范围内完全自由行动的政权机关组成的，这种和美国类似的地方和省区自治制，正是革命的最强有力的杠杆，所以拿破仑在雾月 18 日政变以后，立刻就在这种自治制取消而代之以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度，这种地方行政长官管理制度到现在还保存着，自始就纯粹是反动势力的工具。但是，地方的和省区的自治制虽然不与政治的和民族的中央集权制相抵触，然而它也并不一定与狭隘的县区的或乡镇的利己主义联在一起，这种利己主义现今在瑞士那里已经显得非常丑恶可憎，而南德意志的联邦共和主义者在 1849 年却曾想在德国来施行。（恩格斯在 1885 年版上加的注）

二、工人应当极力引伸那些当然不会采取革命手段而只会采取改良主义手段的民主派所提出的主张；他们应当把这些要求变成对私有制度的直接攻击。例如，假若小资产者主张赎买铁路和工厂，工人就应该要求把这些铁路和工厂作为反动派财产干脆由国家加以没收，不予任何补偿。假若民主派主张施行比例税，工人就应该要求施行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自己主张施行温和的累进税，工人就应该坚持施行累进率极大而使大资本必遭复灭的累进税；假若民主派要求调整国债，工人就应该要求宣布国家破产。这就是说，工人的要求到处都必须针对着民主派的让步和措施来决定。

如果说德国工人不经过全部较长的革命发展的道路，就不能占居统治地位和实现自己的阶级利益，那末这一次他们至少有一个把握，那就是这一出即将开始的革命剧的第一幕，将在他们自己的阶级在法国直接胜利的时候来演出，因而第一幕的发展一定会大大加速。

但是，为了要达到自己的最后胜利，首先还是要靠他们自己努力：他们应该认清自己的阶级利益，尽快地采取自己独立政党的立场，一时一刻也不要由于受到民主主义的小资产者花言巧语的诱惑而离开无产阶级政党保持独立组织的道路。他们的战斗口号应该是：“不断革命”。

1850年3月于伦敦

1850年印成传单

1885年由弗·恩格斯发表在哥丁根和苏黎世出版的卡·马克思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一书的附录中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
第4期上发表的书评

评托马斯·卡莱尔“当代评论。
(一)当前的时代。(二)模范监狱”
1850年伦敦版

托马斯·卡莱尔是唯一直接接受了德国文学极大影响的英国作家。单是为了礼貌，德国人也不能忽略他的著作。

从基佐最近的一个著作（见“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看来我们可以肯定，资产阶级的“天才人物”已经趋于没落。在我们手边的两本卡莱尔的小册子里我们看到和历史斗争的尖锐化相抵触的文学天才没落了，因为他企图违抗历史斗争，坚持自己不为人所承认的、凭直觉产生的预见。

托马斯·卡莱尔的功绩在于：当资产阶级的观念、趣味和思想在整个英国正统文学中居于绝对统治地位的时候，他在文学方面反对了资产阶级，而且他的言论有时甚至具有革命性。例如他

《Latter-Day Pamphlets》. Edited by Thomas Carlyle. 《No. 1: The Present Time. — No. 2: Model Prisons》. London, 1850. — 编者注
见本卷第247—253页。——编者注

的法国革命史，他为克伦威尔的辩护，他的论宪章主义的小册子以及他的“过去和现在”¹⁵⁷都是这样。但是在所有这些著作里，对现代的批判是和颂扬中世纪这种完全违反历史的作法紧密地联系着的，其实这种作法在英国的革命者，如科贝特和一部分宪章主义者中也经常可以看到。过去至少社会发展的某一阶段的兴盛时代使他欢欣鼓舞，现代却使他悲观失望，未来则使他心惊胆怕。在他看来只有集中体现在一人身上，体现在克伦威尔或丹东这样人身上的革命，他才承认，甚至赞扬。这些人就是他的英雄崇拜的对象；他在他的“英雄和英雄崇拜”¹⁵⁸一书中把英雄崇拜说成是解救绝望的现状的唯一办法，说成是一种新的宗教。

卡莱尔的风格也和他的思想一样，它和现代英国资产阶级的柏克司尼弗¹⁵⁹式伪君子的风格是针锋相对的；后者高傲浮夸而又萎靡不振、冗长累赘、不尽的温情劝善的忧虑；这种风格已从它的首创者有教养的伦敦人那里传到整个英国文学界了。和这种文学相反，卡莱尔开始把英语完全当成一种必须彻底加工的原料。他重新搜集古字古语，并依照德语的方式，例如照让·保尔的格式创造新的表达法。这种新风格往往夸张而乏味，但是却又往往绚烂绮丽，永远独特新颖。不过“当代评论”在这方面却表现了明显的退步。

在德国文学的所有代表人物中影响卡莱尔最深的不是黑格尔，而是文学的药剂师让·保尔，这倒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

卡莱尔和施特劳斯所共同推崇的天才崇拜，在这两本小册子里失去了天才，而剩下的只是崇拜。

“当前的时代”一文一开头就说：现代是过去的女儿，未来的母亲，但无论如何它是一个新的时代。

这个新时代的第一个现象就是改革家的教皇。庇护九世手持圣经，想从梵蒂冈的高位上向基督教世界宣布“真理的法律”。

“300多年以前圣彼得皇上收到一封最终决定的法庭判决书，这是一道真实可靠的命令，在天国的法庭中曾记录在卷，而且以后在一切善良的人的心中都了如指掌；这道命令是要皇上自己引退，要他离开，要他不用幻想和亵渎神明的呓语来迷惑我们的头脑；从此他冒着危险继续存在并且必须为了每日自己这样的存在付出全部的代价。这是真理的法律吗？根据这种真理的法律，教皇必须抛弃自己侮辱神和人的、腐朽的、借尸还魂的生命，必须老老实实地死去，让人家埋葬自己。可怜的教皇所实行的却远非如此，虽然整个说来在本质上事情还是这样……改革家的教皇怎样呢？杜尔哥和奈克尔根本不能与此相提并论。上帝是伟大的，当要结束一种使人犯罪的事情的时候，他就召请一个虔诚的人来担负这一工作；这个人会满怀信心地去做，而绝不会悲观失望。”（第3页）

教皇在他的改革宣言中提出了问题，

“蕴蓄着旋风，世界大火、地震……的问题，所有的官方人士都希望，甚至多数都盼望把这些问题拖延到审判的末日，但是审判的末日已经来到，这是可怕的事实。”（第4页）

真理的法律业已颁布，西西里人

“是首先决定在实践中采用上帝所批准的这种新规则的民族：根据真理的法律我们不属于那不勒斯和这些那不勒斯的官吏。我们希望凭着上帝和教皇的恩典得到解放。”

因此发生了西西里的革命。

法兰西民族自认是“救世的民族”，是“优秀的自由战士”，他们害怕可怜的、受轻视的西西里人夺去他们的这一生意（trade）。因此便产生了二月革命。

“好象由于地下交感电流的作用，整个欧洲发生了巨大的、无法控制的爆炸；我们知道1848年是欧洲世界经历过的最可怕的、最倒霉的、最使人吃惊

的而整个说来又最使人感到屈辱的一年……各国的国王和执政者都一下子被吓得目瞪口呆,他们的耳朵里响起了全世界的声音:滚开,你们是蠢材、伪君子、小丑,而不是英雄!滚蛋,滚蛋!在这一年首先发生的最引人注意的事情是所有的国王都鼠窜而逃,他们好象都在哀叹:是的,我们的确是可怜的小丑;你们需要英雄吗?不要杀死我们吧,我们又做得了什么呢?——他们之中没有一个敢回过头来,敢坚持他生死与共的王权。我再重复一下,这就是现代的令人忧虑的特点。在这些新的条件下,民主主义者发现所有的国王都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丑角。国王们由于害怕监狱或其他更坏的东西而拔腿逃遁了(其中有的人可以说是带着无比的丑态逃走的)。各地的人民或民众都是自己进行统治,现在到处公开的无帝王论(Kinglessness)都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无政府状态,如果无政府状态再加上警察那就更好了。1848年3月的历史事件就是如此,它席卷了意大利、法国、普鲁士、奥地利,从波罗的海到地中海,从欧洲的一端到另一端的广大地区。于是欧洲一个国王也没有了,如果不算站在啤酒桶上、通过社论或者和同类人一起聚集在国民议会中发议论的公开《harangueur》〔“演说家”〕,那末一个国王也没有了。在几乎4个月的时间中,整个法国,甚至在很大程度上整个欧洲就象受了一种狂热的驱使一样,成了以巴黎市政厅中的拉马丁先生为领导的汹涌的人群海洋。这位可怜的拉马丁先生在他还有势力的时候,除了一些好听的空话和娇柔软弱之外,一无所长,这在有思想的人看来是个可悲的场面。的确这是个可悲的场面:复原了的‘混沌’的最雄辩的最后的体现、能为自己辩解并满怀信心地用娓娓动听的言语来证明,自己似乎就是‘宇宙’!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你们只需稍加等待:一切气球受到环境的压力,都必然会排出它所盛的气体,并且会立刻难看地瘪下去。”(第6—8页)

谁煽动了这次显然已经具备了燃料的全面的革命的火焰呢?

“是大学生、青年文人、律师、报纸工作者、热情的无经验的肯干的人和粗野的、理应破产的 desperados〔亡命之徒〕。青年人(几乎是儿童)从来没有这样指挥过人类的命运。从第一次发明 senior, seigneur 或‘长者’二字来代表老爷或长官(象我们在各民族的语言中所看到的那样)以来,时代就已经变了!……如果你再仔细观察一下,你就会看见,长者不再受尊敬,并且开始受轻蔑,他似乎还是一个懵懂的孩子,但是没有孩子那种娇态、高尚和充沛的精

力,这种粗野的局面自然很快就会变好,而现在各处已能看到这种情况:人们日常生活的一般需要不能和这种情况相适应,而这些需要不管花多大代价都应当予以满足。在大多数的国家里大概很快会对旧机器进行某种修理,使它具备新的形式和色彩;旧的戏剧性的国王将在承认宪法和国会以及诸如此类的时髦的点缀品的条件下重掌政权,旧时的日常生活又将试图按照旧的方式在各地重新开始。但是这次已没有希望使这种妥协长久继续下去。在这种险恶的动荡中的欧洲社会必然会动摇地前进,象在湍急的无底漩涡与波涛汹涌的海流中漂浮一样,它没有稳固的基础,时而束手无策地倒下去,时而又困难地时间越来越短地立起来,——这种情况一直要到新的岩石基础出现,暴动和暴动必然性的滚滚洪流再行退落时才会消失。”(第8—10页)

即使用这种形式对于旧世界也无可告慰的历史就是这样。继而谈到历史的教训:

“不管我们怎样设想普遍民主,它是这个时代必不可免的事实”(第10页)。民主是什么呢?它必须具备一定的意义,否则它就不能存在。因此全部问题在于确定民主的真正意义。如果这一点我们做到了,我们就能对付民主,否则我们就会倒霉。二月革命是“欺骗的总破产;这就是它的简单的定义”(第14页)。在新时代流行的是幻想和假象,即《shams》〔“诡诈”〕,《delusions》〔“欺骗”〕,《phantasms》〔“幻想”〕和失去了意义而不表示真实关系和事物的名称,一言以蔽之,谎话代替了真实。改革的任务就是要个人和社会与这些假象和幻想决裂。不能否认必须根除一切诡诈(sham)和欺骗。

“自然,这对有些人来讲可能显得奇怪,在所谓有教养阶级中的有健康人的胃口、能畅快地消化布丁的稳健的英国人看来,这可能显得特别奇怪,认为这是一种愚昧无知的观念,完全是埋藏着祸端的古怪观念。在他的一生中,他已习惯于早已失去意义的礼节,习惯于公认的行为规范和只具有礼节性质的庆祝仪式,——用你们破坏偶像的幽默来讲,这就叫做shams;他从来没

有听说过在这些东西中有什么不好的东西，没有这些也能取得成绩。难道棉纱不是自己纺出来的吗？难道牲口不是自己长肥的吗？难道殖民地的商品食物不是从东方和西方运来的吗？难道所有这一切都不能和 shams 和睦共处吗？’（第 15 页）

民主会完成这种必要的改革，会摆脱 shams 吗？

“民主将来通过普选权而建立起来的时候会不会完成这一从幻想到现实，从谎话到真实的有益的普遍过渡呢？会不会逐渐建立起幸福的世界来呢？”（第 17 页）

卡莱尔否定这一点。他把民主和普选权仅仅看做是一种流行病，各国人民由于受了议会政治毫无缺点这种英国人的迷信观点的影响才得了这种病。依靠普选权来治理国家就象绕道合恩角时迷失了航路的海船水手一样：他们不研究风向、气候和使用六分仪，却用投票来选择方向，并宣布多数人的决定是不会错的。无论是对于个人或对于社会来说，问题都只在于发现宇宙的真正调节者，发现和当时的一定任务相关的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这种规律行事。谁给我们揭示这些永恒的规律，我们就跟着谁，“哪怕是俄国的沙皇，宪章派的议会，坎特布里的大主教或是达赖喇嘛”。但是我们怎样去发现上帝预定的这些永恒的意旨呢？采用每人发一张选票然后统计人数的普选制来达到这个目的，无论怎样也是下策。宇宙有它独具的特点，它始终把自己的秘密只显示给少数经过挑选的人，显示给极少数贵人和贤人。因此从来没有一个民族能够在民主的基础上生存。也许有人提出希腊和罗马来，但是现在每一个人都知道，它们根本不是民主政体，这些国家的基础是奴隶制。至于法兰西的各种共和政体就更不用谈了。而典型的北美共和国又怎样呢？美国人到目前为止甚至还不能说已形成

了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美国人是在没有政府的状态下生活着；那里占统治地位的是无政府状态加警察。这种状况之所以能存在完全是由于存在着尚未开发的辽阔土地和由英国带来的对警棍的尊敬心理。随着人口的增长这种情况就会消失。

“美国是否出现过哪怕一种伟大的人类心灵，一个伟大思想和一件值得敬仰与衷心赞扬的伟大而崇高的事业？”（第 25 页）

它只是每 20 年使自己的人口增加一倍——*voilà tout*（如此而已）。

因此，在大西洋的两岸民主制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宇宙本身就是一种君主政体和等级制度。一个国家，不把永远领导和统治愚民的神圣职责赋予最高贵的人以及由高贵的人中选出的僚属，那就不是上帝的王国，就不符合永恒的自然规律。

现在我们也知道现代民主的秘密、来源和必要性了。现代民主的秘密就在于伪装高贵的人（*sham noble*）由于传统和重新创造的幻想而提高了地位，受到了崇拜。

但是，谁该去发现周围嵌着较小的人类的珠宝的宝石呢？当然不是普选制，因为只有高贵的人才能找到高贵的东西。所以卡莱尔宣称，在英国还有一些那样的贵人和“国王”，并在第 38 页上号召他们到他那里去报到。

我们可以看到，“高贵的”卡莱尔完全是从泛神论的观点出发的。整个历史的过程不是由活生生的人民群众（他们自然为一定的、也在历史上产生和变化着的条件所左右）本身的发展所决定，——整个的历史过程是由永恒的永远不变的自然规律所决定，它今天离开这一规律，明天又接近这一规律，一切都以是否正确地认识这一规律为转移。这种对永恒的自然规律的正确认识

是永恒的真理，其他一切都是假的。根据这种观点，一切实际的阶级矛盾，尽管因时代不同而各异，都可以归结为一个巨大的永恒的矛盾，即认识了永恒的自然规律并依照它行动的人（贤人与贵人）和误解它曲解它并和它背道而驰的人（愚人与贱人）的矛盾。因此，历史上产生的阶级差别是自然的差别，人们必须向天生的贵人和贤人屈膝，尊敬这些差别，并承认它们是永恒的自然规律的一部分，一言以蔽之，即应崇拜天才。这样，对历史发展过程的整个了解便简单得象前世纪伊留米纳特和共济会会员的¹⁶⁰陈腐平凡的智慧那样，简单得象“魔笛”¹⁶¹中的普通道德和被弄得极端庸俗腐化的圣西门主义那样。这样，老问题又自然产生了：到底谁该统治呢？这个问题经过十分详细但却非常肤浅浮夸的讨论后，最后得出一个答案：应该由贵人、贤人和智者来统治。因此非常自然地就会得出这样的结论：要统治的人是很多很多的，但是任何时候也不能统治得太多，因为统治就是不断地向群众阐述和解释自然规律的意义。但是怎样发现贵人和贤人呢？没有一种神奇的力量来告诉我们，我们必须去找寻。于是变成纯粹自然差别的历史的阶级差别又登上了舞台。高贵的人之所以高贵，是因为他聪明而博学。所以必须在独享教育权利的阶级即特权阶级中去寻找这样的人，而这些阶级本身也将在它们当中找出这样的人，并对他们想当贵人和贤人的要求作出决定。因此，特权阶级现在即使不成为十足的贵人和贤人的阶级，至少也是说话时“吐字清晰”的阶级；而被压迫的阶级当然是“哑巴，是说话吐字不清晰”的阶级，因此阶级统治又重新得到肯定。所有这些义愤填膺的浮夸叫嚣都变成了对现存阶级统治的较为隐蔽的承认，并且完全变成了不平的牢骚和抱怨，其所以抱怨与不满，原因就是资产

者没有让自己的未被承认的天才人物们领导社会，由于很实际的理由没有接受这些老爷们的荒唐的呓语。浮夸的言谈在这里如何变为自己相反的东西，高贵的有学问的聪明人实际上怎样变为庸俗的愚昧无知的蠢人，关于这点卡莱尔本人就是一个最明显的例证。

由于在他看来，一切都取决于一个强有力的政府，所以他对高喊解放的声音深恶痛绝。

“让我们彼此都互不相干吧，除现金交易外，不要任何关系或联系；根据自愿的契约和供求的规律交易，做够一天工，给够一天钱——这被认为是真正解决人与人之间的一切难题和不公平事件的办法。要矫正人与人之间的相互关系难道除完全断绝这种关系外，就没有别的办法了？”（第 29 页）

这样最终地消灭人与人间的一切联系、一切关系，自然就会达到无政府状态的顶点，达到无法之法的顶点，达到最终破坏联系的联系即政府的顶点。在英国、在大陆上、甚至在“稳健的德国”人们都力图造成这样的状态。

卡莱尔这样继续用许多篇幅发表了狂怒的胡言，荒谬绝伦地把红色共和国，fraternité〔博爱〕，路易·勃朗等和 free trade〔自由贸易〕，废除谷物税等混杂在一起（见第 29—42 页）。于是卡莱尔就把清除传统的封建残余、使国家机构缩减到最必要的最精简的限度、彻底实现资产阶级的自由竞争与废除这些资产阶级关系、消灭资本同雇佣劳动的对立以及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等混为一谈了。这是明显地回到青红皂白一律不分的“绝对的黑夜”！这就是连自己周围事物的眉目都不知道的“博学者”的渊博知识！这就是认为消灭封建主义或自由竞争就会断绝人与人间的一切关系的非凡洞察力！这就是十分郑重地认为父母不再

到市政厅去“结成”婚姻关系就不会再有孩子，从而便窥破了“自然界永恒规律”的卓见！

在这种关于纯粹是胡说八道的智慧的有教训意义的实例后面，卡莱尔又给我们举出一个证据，说明凌空飞翔的高贵气概一旦从格言和词藻的天国堕入现实关系的尘世时，如何立即变成了露骨的卑劣行为。

“在欧洲各国，特别是在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形成了一个长官和指挥员阶级，这个阶级可以说是真实的而不是假想的新的贵族阶级的萌芽——这就是工业的长官，即幸而是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阶级。另一方面，自然也不缺乏需要被领导的人，这就是被我们描写成脱缰劣马的，沦于流浪和饥饿境地的那个可怜的阶级；这个阶级也已在所有其他国家形成并以惊人的速度按几何级数发展着。因此可以完全有把握地说，组织劳动是全世界的普遍的重大问题。”（第42—43页）

当卡莱尔在头40页中用最激烈的辞句对利己主义、自由竞争、人与人封建关系的废除、供给与需求、laissez faire〔听之任之〕¹⁶²、棉纱的生产、现金等一再地大肆攻击之后，我们现在才恍然大悟，所有这些 shams〔诡诈〕的主要代表人物工业资产者不仅属于可敬的英雄和天才之列，甚至是他们中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而在卡莱尔对资产阶级关系和思想的一切攻击中都隐藏着对资产者个人的歌颂。但是看来似乎很令人奇怪，卡莱尔既然找到了劳动大军的统帅和士兵，即找到了一定的劳动组织，而却仍然认为劳动组织是需要解决的大问题。但是切莫在这方面上当！这里的问题不是组织已参加到这个队伍中来的工人，而是组织还未加入的没有统帅的工人，而组织这些工人的任务卡莱尔要亲自动手解

原文是《hodge》，这是对雇农以及一般农民的卑称。——编者注

决。在他这本小册子的末尾我们看见他突然以不列颠的 *in partibus* [在野的]¹⁶³首相的角色出现，把 300 万爱尔兰的和其他地方的穷人、有工作能力的定居的或流浪的赤贫者召集在一起举行习艺所内外的不列颠穷人的全国大会，并向他们发表“堂堂皇皇的”演说；在演说中他首先向这些穷人重复他早已向读者谈过的那些东西，然后向这些精选出来的一伙人说道：

“到处流浪的穷人和懒汉们，你们有些是笨人，许多人是罪犯，所有的人都是不幸者！你们的样子就使我非常惊愕和绝望。你们在这里的共有 300 万人。你们许多人都堕入了一贫如洗的深渊，说起来真可怕，每一个堕进深渊的人又加重了把别人拖进去的链子。站在这个深渊边缘上的还有成千上万数不清的人，而且我听说，每天还要增加 1200 人，他们不断跌下去，一个接着一个跌下去，而链子就越来越重，谁最后还能站得住呢？你们怎么样呢？……我可以告诉你们，其他还站得住的人现在也在和自己的困难作斗争。但是你们精力不足而胃口太大，事情作得少而饮酒过多，这就证明了你们是站不住的。你们要知道，无论谁是自由之子，总之你们不是，而且也不可能；你们不是自由的人，简直是囚徒……你们是天生的奴隶，或者说得好听些，你们是找不到主人的漂泊流浪的奴仆……今后你们可以和我来往，但不是作为光荣的不幸的自由之子，而是作为道地的囚徒，作为不幸堕落的兄弟，来要求我统率你们，如果必要的话，来约束和管制你们……当着苍天、厚土，当着上帝、你们的造物主面前我宣布：我看到你们靠你们兄弟的血汗来维持你们这种生活，感到非常痛心，如果我们不能改变这种状况，死了倒还好些……加入我那爱尔兰、苏格兰、英格兰的新时代的队伍吧，你们这些可怜的游荡的强盗，应当服从、劳动、容忍、自戒，象我们所有的人应当作的那样……你们需要工业的指挥官、工厂的工长、监工和生死的主宰，这些人象拉德孟底士那样公平，那样刚直，只要你们一旦要受军事条令的约束，就会给你们找到这样的人……那时我将对你们每一个人说：这就是你们的工作；你们按照我在这里指出的方法，以军人的英勇服从和坚韧不拔的精神来开始这个工作吧，——那时你们就会很容易地拿到工资……如果你们不服从，畏惧坚苦的劳动，不遵守命令，我将设法劝告你们，说服你们；如果这样无效，我就要鞭打你们；如果这些都白费，最后我就要枪毙

你们。”（第46—55页）

由此可见，天才统治的“新时代”和旧时代不同的地方主要是鞭子自以为是天才。天才的卡莱尔和任何狱卒或穷人的监视人不同的地方只是他有正直的义愤和道德的意识，他盘剥穷人只是为了把他们提到自己的水平。这里我们看到，爱发高论的天才怎样在他的救世义愤之下荒唐地维护甚至加深资产者的一切丑恶。英国的资产阶级为了以贫困吓人而把穷人和犯人相提并论，在1833年通过了济贫法，而卡莱尔却是以贫困产生贫困为理由来控诉穷人犯了叛国罪。正象他以前认为历史地产生的统治阶级——工业资产阶级只是由于居于统治地位而充当了天才一样，现在在他看来，一切被压迫阶级被压迫得愈厉害，就愈被拒于天才之外，就愈成为我们那些不为人所承认的改革家的狂怒的牺牲品。穷人的情况正是这样。但是当谈到最低层的无用的人们，谈到“恶棍”即罪犯的时候，他那高尚的道德上的愤怒就会达到顶点。以上这些人，他是在论模范监狱的小册子中谈到的。

这本小册子不同于第一本小册子的地方在于愤怒更加狂暴，其实作者如此愤怒更加不值得，因为这里的对象是被正式抛弃于现代社会以外的人，是被监禁的人；结果由于这种愤怒甚至连一般资产者为了礼貌关系而表现的那点羞耻也被抛弃了。卡莱尔在第一个小册子中建立一套完整的贵人的等级制度，从贵人中找出最高贵的人，而在这里他也同样地建立一套完整的坏蛋和恶棍的等级制度，竭力寻找坏人中的坏人，英国的最大恶棍，以便痛痛快地把他绞死。假定卡莱尔把这样的人捉到了并且绞死了，那末另外一个人现在是最坏的人又应当被绞死，在他之后又有另外的

一个，这样最后就会轮到高贵的人，更高贵的人，结果就只剩下一个最高贵的人——卡莱尔，他是恶棍的迫害者，同时也是贵人的谋杀者，他连恶棍中的高贵的东西也消灭了；剩下的这个高贵人中最高贵的人，突然变成了恶棍中最卑贱的一个，他作为这样的人便必须绞死自己。于是有关政府、国家、组织劳动、贵人的等级制度等一切问题便迎刃而解，永恒的自然规律最后也就会实现了。

写于 1850 年 3—4 月

载于 1850 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 4 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评科西迪耶尔公民从前的警备队长
阿·谢努的“密谋家，秘密组织；科西迪耶尔
主持下的警察局；义勇军”1850年巴黎版。
评律西安·德拉奥德的“1848年2月
共和国的诞生”1850年巴黎版

如果用伦勃朗的强烈色彩把革命派的领导人——无论是革命前的秘密组织里的或是报刊上的，或是革命时期中的正式领导人——终于栩栩如生地描绘出来，那就太理想了。在现有的一切绘画中，始终没有把这些人物真实地描绘出来，而只是把他们画成一种官场人物，脚穿厚底靴，头上绕着灵光圈。在这些形象被夸张了的拉斐尔式的画象中，一切绘画的真实性都消失了。

固然，现在探讨的这两本著作已经去掉了二月革命的“伟人”以往常常穿着的厚底靴和灵光圈，深入了这些伟人的私生活，让我们看到了他们身穿便服的形象和他们周围形形色色的配角。但是，它们并没有因此而稍微真实地描绘了人物和事件。这两个作者，一个是路易·菲利浦的大名鼎鼎的老牌间谍，另一个是老

《Les Conspirateurs》，par A. Chenu, ex- capitaine des gardes du citoyen Causidière. 《Les sociétés secrètes ; la préfecture de police sous Causidière ; les corps- francs》. Paris, 1850.

《La naissance de la République en février 1848》，par Lucien de la Hodde . Paris, 1850. ——编者注
古代希腊，罗马的一种戏靴。 ——译者注

职业密谋家，后者和警察局的关系也十分暧昧，他的观察力只举出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似乎能在莱茵斐尔顿和巴塞尔之间看见“银峰耀目的阿尔卑斯山的巍峨山脉”，能在克尔和卡尔斯卢厄之间看见“远处山峰消失在地平线上的莱茵阿尔卑斯山”。这类人要著书，——特别是为了表白自己而写作时——，显然也只能写些多少象讽刺画似的二月革命丑闻录。

德拉奥德先生在他的小册子里竭力把自己描绘成库伯小说¹⁶⁴中的间谍。他说8年来他使秘密组织的活动瘫痪了，这样他就为社会立下了功劳。但是，德拉奥德先生距离库伯笔下的间谍还远得很。德拉奥德先生是“喧声报”¹⁶⁵的撰稿人，1839年起是新四季社¹⁶⁶的中央委员会委员，“改革报”创刊以来的编辑，同时也是警察局长德累赛尔雇用的间谍；可是谁也没有象谢努那样使他如此声名扫地。他写这本小册子是直接由于谢努的揭露而引起的，但是他却小心翼翼，深怕有一个字回答谢努对他的议论。可见，至少谢努的回忆录的这一部分是真实的。

谢努说：“我有一次夜里走路，发现德拉奥德在伏尔泰河岸街踱来踱去。当时大雨滂沱，这种情景使我思索起来。这位最令人敬爱的德拉奥德是不是也领秘密津贴？不过我想起了他的歌曲、他歌颂爱尔兰和波兰的美妙诗篇，特别是他为‘改革报’撰写的锋利文章。”（然而德拉奥德先生却竭力标榜自己是缓和“改革报”语气的人。）

——“晚安，德拉奥德，你真见鬼，这样的时候，这样坏的天气，你在这里干什么？——我在这里等一个欠我钱的坏小子，因为他每天晚上都在这个时候经过这里，要他还钱给我，不然……——他用手杖在沿河街的栅栏上狠狠地打了一下。”

德拉奥德尽力想躲开他，向卡鲁赛尔桥走去。谢努向相反的方向走开，不过是为了在研究院的拱门下面躲藏起来。

德拉奥德不一会儿就走回来了，小心翼翼地向下看了一眼，又继续踱来踱去。

“过了一刻钟，我发现一辆马车，车上有两盏小绿灯，恰象我从前的密探给我讲过的那样（他从前是一个间谍，在监狱里他向谢努泄露过许多警察局的秘密和暗号）。马车停在福约兹-奥古斯丁街的拐角。车里走出一个人来；德拉奥德一直向那个人走去，他们交谈了约一分钟，随即我看见德拉奥德做了一个往口袋里装钱的动作。——这件事发生后，我想尽一切办法把德拉奥德排斥在我们的会议之外，首先是不让阿尔伯上圈套，因为他是我们的大厦的柱石。在这之后不几天，‘改革报’就拒绝刊载德拉奥德先生的文章。这一下刺伤了这位作家的虚荣心。我劝他另办一家报纸来进行报复。他接受了这个劝告，甚至跟比尔和杜波蒂一起发表了‘人民报’的创刊启事；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乎完全摆脱了他。”（谢努，第46—48页）

我们看到，这位库伯笔下的间谍变成了一个在政治上干卑鄙勾当的最下流人物，他为了领取 *cadeau* [津贴]，冒着倾盆大雨在街头等候一个极平凡的 *officier de paix* [警官]。此外，领导秘密组织的并不象德拉奥德企图断言的那样是他本人，而是阿尔伯。这一点完全可以从谢努的整个叙述中看得出来。“为秩序服务”的间谍在这里一下子变成了受屈辱的作家，他对“改革报”干脆拒绝接受“喧声报”撰稿人的文章大为不满，因此他跟真正的党派机关报“改革报”决裂了，他给“改革报”撰稿可以为警察局效劳，他与之决裂是为了另办新报纸，而这个报纸至多能够满足他的写作的虚荣心。正象娼妓力图用某种类似感情的东西来为自己肮脏的勾当辩解一样，间谍力图用写作的要求来为自己辩解。他的整个小册子浸透着对“改革报”的仇恨，这是作者的最庸俗的复仇心理造成的。最

后,我们看到,在秘密组织存在的最重要时期,即二月革命的前夕,德拉奥德越来越被秘密组织所抛弃,这就说明,为什么德拉奥德跟谢努相反,硬说秘密组织在这个时期日益崩溃。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谢努在二月革命后揭发德拉奥德的叛卖行为的情形。“改革报”派应科西迪耶尔的邀请在卢森堡宫阿尔伯那里举行了一次会议。出席会议的有蒙尼埃、索布里埃、格朗梅尼尔、德拉奥德、谢努等人。科西迪耶尔宣布开会时说道：

“我们当中出现了叛徒。我们必须组成秘密法庭来审判他”。——格朗梅尼尔是与会者中的年纪最大的人,当选为主席,梯凡被选为纪录。科西迪耶尔以公诉人的身分继续说道:“公民们,我们长期谴责真诚的爱国者。我们万万没有想到有什么毒蛇钻到我们中间来了。今天我要揭发一个真正的叛徒,这就是律西安·德拉奥德!”——德拉奥德一直安然地坐着,当听到这种直截了当的控告时暴跳起来。他要夺门而出。科西迪耶尔马上把门关上,掏出手枪喝道:“你要走开,我就打碎你的脑袋!”——德拉奥德急躁地证明自己无罪。科西迪耶尔说:“好吧,这里有几包文件,里面有1800件给警察局长的情报”,他把专门有关我们每个人的情报发给了我们。德拉奥德始终矢口否认这些经比埃尔签字的情报是他搞的,直到最后科西迪耶尔宣读了一封后来刊印在他的回忆录里的信为止。在这封信里德拉奥德表示愿意为警察局长效劳,信上还署有他本来的姓名。从这时起,这位不幸的人就不再否认了。他企图借口穷困来进行辩解,他说穷困使他产生了投靠警察当局的倒霉念头。科西迪耶尔把手枪递给他——这是德拉奥德的唯一出路。德拉奥德开始恳求他的审判官,请他们宽宏大量,但是他们丝毫无动于衷。与会者博凯忍无可忍,抓起手枪,一连3次递给德拉奥德说:“Allons〔来吧〕,打碎自己的脑袋吧,胆小鬼,胆小鬼,不然我来开枪!”——可是,阿尔伯从他手里夺过手枪说:“冷静点,在卢森堡宫开枪会惊扰所有的人!”博凯喊道:“对,我们应当弄点毒药。”科西迪耶尔说:“毒药?我随身带了各种各样的毒药。”他拿起一个茶杯,斟了一杯水,放了一点糖,然后放进一些白粉末,递给吓得往后退的德拉奥德。“你们打算这样弄死我吗?”——博凯说:“是的,喝吧。”德拉奥德的样子非常可怕。他面色苍白,他那十分鬻曲而又梳得整整齐齐的头发都竖

立起来了。他满脸汗珠。他一面哀求，一面嚎啕大哭。“我不想死！”而博凯依然无动于衷地把茶杯端在他的面前。科西迪耶尔说：“喂，喝吧，一眨眼工夫就完了。”——“不，不，我不喝！”——随后，他摆出凶恶的样子，惊惶地补充说：“呵，我记住这些折磨，将来一定要报仇！”

当大家都相信，任何引起 point d' honneur [荣誉感] 的方法都无效的时候，德拉奥德由于阿尔伯的讲情而得到了宽恕，被解送到康瑟热里监狱去了。（谢努，第 134—136 页）

这位冒牌的库伯小说中的间谍越发变得可怜。他只是靠怯懦来反抗自己的敌人，这就在我们面前完全暴露了他的卑贱。我们责备他，不是因为他没有开枪自杀，而是因为他不开枪打死他第一个碰到的敌人。他后来企图写一本小册子来为自己开脱，在这本小册子里他竭力把整个革命干脆描写成骗局。这本小册子的正确名称应该是“丧魂落魄的警官”。它证明间谍跟“实干派”完全一样，把每次革命都看成是阴谋小集团活动的结果，但是真正的革命是和间谍的想法完全相反的。如果说一切由阴谋小集团或多或少任意挑起的运动始终不过是骚乱，那末从德拉奥德的说法本身就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一方面，正式的共和主义者在二月事件之初对共和国的胜利还没有抱任何希望，另一方面，资产阶级不得不违反本意帮助共和国取得胜利；可见，二月共和国的建立是当时形势所必然产生的结果，那时情况使得与一切阴谋小集团无关的广大无产阶级群众不得不走上街头，使得大部分资产阶级不得不呆在家里或者和无产阶级一起行动。在其他方面，德拉奥德所谈的东西也都十分枯燥无味，不外是些最庸俗的流言蜚语。只有一个情节是引人注意的，那就是 2 月 21 日晚上正式的民主派在“改革报”社举行了会议，在会上首领们发表了坚决反对武装起义的演说。他们演说的整个内容证明，在这一天他们对情势的估计还是正确的。可笑的只是

这些人的口气很夸张,最后自我吹嘘说,似乎他们从一开始就是自觉地有意识地进行革命的。德拉奥德所能举出来的他们最糟糕的行为,就是他们过于长久地让他混在自己中间。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谢努。谢努先生是个怎样的人呢?他是个老密谋家,从1832年起参加过所有的武装起义,在警察中间是人尽皆知的。他被征召入伍后不久便开了小差,尽管他不止一次地参加过密谋活动和1839年的武装起义¹⁶⁷,但是他在巴黎一直没有被发觉。1844年他回到他的团里,令人奇怪的是,虽然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人人皆知,但是师长还是使他免受军事法庭的审判。不仅如此,他在团里服役期限未满竟能回到巴黎。1847年他受到燃烧弹密谋案¹⁶⁸的牵连,在要逮捕他的时候逃掉了,虽然他被 *in contumaciam* (缺席) 判处了4年徒刑,但是仍然住在巴黎。只是在他的同谋者控告他勾结警察以后,他才迁往荷兰,1848年2月21日又从那里返回巴黎。二月革命后,他当了科西迪耶尔的警备队队长。不久科西迪耶尔就怀疑他跟马拉斯特的特种警察有关系(怀疑肯定是有根据的),于是没费多大周折就把他打发到比利时去了,后来又打发到德国。谢努先生或多或少自愿地先后参加了比利时、德国和波兰的义勇军。而这一切是发生在科西迪耶尔的势力已经开始动摇的时候。这时,谢努肯定地说,似乎他已完全制服了科西迪耶尔,他有一次用一封恐吓信就使科西迪耶尔立即释放了他。关于我们这位作者的性格和他所应得的信任我们所能说的就是这些。

妓女力图用来掩饰自己身体不太诱人的地方的大量胭脂香水,在文学上找到了自己类似的东西,那就是德拉奥德用来点缀他的小册子的 *beles prit* (机智俏皮)。相反地,谢努这本书的文笔就

叙述的朴实和生动来说,在许多地方可以和日利·布拉斯¹⁶⁹相媲美。正象日利·布拉斯在种种冒险活动中始终是一个仆人并从仆人的角度来观察一切问题一样,谢努从1832年的武装起义时起,直到被逐出警察局止,始终是一个演配角的秘密活动家;不过,秘密活动家的特别短浅的目光和从极乐宫派到他那里的文学“巨匠”的平庸的文思是很容易区别的。显然谢努也根本谈不上对革命运动有所了解。所以,在他的著作里值得注意的,只是那些多少比较公正地描写他亲眼看到的密谋家和英雄科西迪耶尔的章节。

拉丁语系各民族对密谋的向往以及密谋在西班牙、意大利和法国现代历史中的作用是人所共知的。20年代初西班牙和意大利的密谋家失败后,里昂,特别是巴黎就成了革命团体的中心。大家都知道,1830年以前领导反对复辟的密谋活动的是自由资产者。七月革命之后,共和派的资产阶级代替了他们;在复辟时期已经学会秘密活动的无产阶级,随着共和派资产者在毫无结果的巷战以后惶恐地退出密谋家组织而跃居前列。巴尔贝斯和布朗基用来组织1839年武装起义的四季社已经成为纯无产阶级的组织;在它失败后组织起来的新四季社也是这样。新四季社的首领是阿尔伯,谢努、德拉奥德、科西迪耶尔等也参加了这个组织。密谋家们通过他们的领导人和在“改革报”中有代表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建立了经常的联系,但是他们始终保持很大的独立性。当然,这些密谋家的组织从来没有吸收巴黎无产阶级的基本群众。它们的人数比较不多,而且经常发生变动。这些成员一部分是一贯的老密谋家,即每个秘密组织定期移交给它继承者的那些密谋家,一部分是新招募的工人。

在这些老密谋家中,谢努几乎只描述他自己那一类密谋家,即

职业密谋家。随着无产阶级密谋家组织的建立就产生了分工的必要。密谋家分为两类：一类是临时密谋家，*conspirateurs d'occasion*，即参与密谋，同时兼做其他工作的工人，他们仅仅参加集会和时刻准备听候领导人的命令到达集合地点；一类是职业密谋家，他们把全部精力都花在密谋活动上，并且以此为生。他们是工人和领导人之间的中间阶层，甚至常常钻入后者的行列。

这一类人的生活状况已经预先决定了他们的性格。参加无产阶级密谋家的组织，自然只能使他们得到极其有限的不可靠的生活的来源。因此，密谋家常常不得不伸手向组织要钱。他们有的人甚至直接跟资产阶级社会冲突起来，并且态度庄重地出现在违警法庭上。他们的生活动荡不定，与其说取决于他们的活动，不如说时常取决于偶然事件，他们的生活毫无规律，只有小酒馆——密谋家的见面处——才是他们经常歇脚的地方；他们结识的人必然是各种可疑的人，因此，这就使他们列入了巴黎人所说的那种 *la bohème*〔浪荡汉〕之流的人。这种无产阶级出身的民主派浪荡汉——也有资产阶级出身的民主派浪荡汉，即民主派游手好闲之徒和 *piliers d'estaminet*〔小酒馆的老主顾〕——，不是放弃自己工作因而腐化堕落的工人，便是流氓无产阶级出身并把这个阶级所固有的一切放荡习性带到自己新生活里的人。因此不言而喻，几乎每个密谋案中混杂着一些 *repris de justice*〔惯犯〕。

这些职业密谋家的整个生活带有十分明显的浪荡汉的性质。他们作为招募密谋家的下级军官，从一个酒馆转到另一个酒馆，考查工人们的情绪，物色他们所需要的人，然后用甜言蜜语使这些人参加密谋，并且必然让组织或者新朋友出钱来痛饮一番。一般说来，小酒馆的老板实际上给他们提供了歇脚的地方。密谋家的大部

分时间是在小酒馆里度过的 ;他在这里会见同党 ,会见他小队的成员和他准备招募的人 ;最后小队和小队(组)负责人的秘密会议也在这里举行。在这种不断出入酒馆的气氛中 ,本来就和巴黎无产者一样具有乐天性格的密谋家们 ,很快就变成了十足的 bam-bocheur〔放荡者〕。在秘密会议上象斯巴达人一样严肃的阴沉的密谋家 ,突然温和起来 ,变成深知美酒和女人滋味的到处大名鼎鼎的老主顾。这种酒馆欢乐由于密谋家经常遇到危险而更变本加厉。他每时每刻都有可能被召到街垒上去 ,战死在那里 ;他一举一动都可能碰上警察所设的圈套 ,都有被送进监狱甚至罚苦役的危险。这些危险恰恰就是这种职业的真正魔力 ;危险愈大 ,密谋家愈急于即时行乐。同时 ,他对危险已习以为常 ,因而在很大的程度上把生命和自由置之度外。在监狱里他感觉象在家里和在小酒馆里一样。他天天盼望着起义的命令。巴黎的各次起义所表现的不顾一切的拚命斗争的勇敢精神 ,正是这些老职业密谋家 ,hommes de coup de main〔行动坚决的人〕带来的。是他们筑起了第一批街垒 ,进行了指挥 ,是他们组织了抵抗 ,组织了攻打武器铺的战斗和征用私人武器与弹药的工作 ,是他们在起义时采取冒失卤莽的行动 ,因而常常弄得执政党惊慌失措。总之 ,他们是起义的指挥官。

当然 ,这些密谋家并不满足于一般地组织革命的无产阶级。他们要做的事情恰恰是要超越革命发展的进程 ,人为地制造革命危机 ,使革命成为毫不具备革命条件的即兴诗。在他们看来 ,革命的唯一条件就是他们很好地组织密谋活动。他们是革命的炼金术士 ,完全继承了昔日炼金术士的邪说歪念和狭隘的固定观念。他们醉心于发明能创造革命奇迹的东西 :如燃烧弹 ,具有魔力的破坏性器械 ,以及越缺乏合理根据就越神奇惊人的骚乱等。他们搞这些计

划,只有一个最近的目标,这就是推翻现政府;他们极端轻视对工人进行关于阶级利益的教育,进行理论性质更多的教育。这说明他们对 habits noirs〔黑色燕尾服〕,即代表运动这一方面的多少有些教养的人的憎恶并不是无产阶级的,而是纯粹平民的;但是,因为后者是党派的正式代表,所以密谋家们始终不能完全不依赖他们。habits noirs 有时也会成为他们获取金钱的来源。因此非常明显,密谋家们不管愿意与否都必须追随革命党派的发展。

密谋家生活的主要特点就是他们和警察进行斗争,而他们和警察的关系就象小偷、娼妓与警察的关系一样。警察当局容忍密谋家组织的存在,决不仅仅是因为它们是必然的祸害。它容忍它们是因为它们是容易监视的中心,这个中心集中了这些组织中最敢拚命的革命分子;是因为它们是骚乱的制造所,这种骚乱在法国如同警察本身一样已经成了必要的统治手段;最后是因为它们是警察局物色自己的密探的场所。下等政治警察是从职业密谋家当中招募来的,他们类似最机灵的刑事密探维克多克之流那样,是从上等和下等骗子手(小偷、无赖和假破产者)中搜罗来的,而且他们常常重新干起他们的老行道。密谋家经常要跟警察打交道,他们时时刻刻都会跟警察发生冲突;他们时常跟踪密探,就象密探跟踪他们一样。侦察是他们的的主要工作之一。因此,职业密谋家常常摇身一变而成为警察局雇用的密探,这是不足为奇的,何况还有穷困、监禁、威胁利诱的推动。由于这种情况,密谋家组织内部充满漫无边际的怀疑,这种怀疑完全蒙蔽了它们的成员,使它们把好人看成是密探,而把真正的密探看成是最可靠的人。显然,这些从密谋家中招募去的密探在跟警察当局勾结时大都具有想欺骗警察局的良好愿望,他们在还没有越来越成为自己第一步

的牺牲品以前，有时玩得成两面手法的把戏，而的确他们也常常欺骗了警察当局。不过，这样的密谋家会不会陷入警察给他设下的圈套，这全凭偶然的情况，与其说全凭性格坚定上质量的不同，不如说全凭性格坚定上数量的不同。

谢努所描写的密谋家就是如此；他往往把他们描述得栩栩如生，并且有意无意地把这些人的性格也刻画了出来。其实，他本人——包括他同德累赛尔和马拉斯特的警察局的不大清白的关系——就是职业密谋家的最好的典型。

随着巴黎无产阶级本身开始作为一个党派不断走向前列，这些密谋家就开始失去领导作用，内部开始瓦解，他们在无产阶级秘密组织里遇到了危险竞争，因为这些组织所提出的目的不是直接起义，而是组织和壮大无产阶级。1839年的起义已经带有明显的无产阶级和共产主义的性质。但是，起义之后发生了老密谋家抱怨不已的分裂。分裂是由于工人们要弄清本阶级的利益而引起的，分裂部分地发生在旧有的密谋家组织中，部分地发生在新的宣传组织中。卡贝在1839年后不久便开始积极进行的共产主义宣传，共产主义党派内部发生的争论问题，很快就超过了密谋家的认识水平。谢努和德拉奥德都承认，在接近二月革命的时候，共产主义者无疑已成为革命无产阶级的最强大的一派。密谋家为了不丧失他们对工人的影响以及在对抗 *habits noirs* 中的作用，不得不追随这个运动，接受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的思想。例如，早在二月革命之前以阿尔伯为代表的工人密谋家组织与“改革报”的拥护者之间就发生了矛盾，这个矛盾不久又在临时政府中暴露出来。但是，我们打算把阿尔伯跟这些密谋家混为一谈。从我们所评论的两本著作中可以看出，阿尔伯在和自己这些工具的关系上个人能够占居

独立的地位,因此他决不是靠秘密活动为生的人。

在 1847 年的爆炸事件中,警察的直接打击比在以往任何一次事件中都大,这次事件终于瓦解了最顽固的最倔强的老密谋家的队伍,并把他们一直保存下来的那些小队卷入了直接的无产阶级运动中。

二月革命后,我们又看到这些职业密谋家、密谋家小队的狂热参加者和无产阶级出身而又多半是老密谋家的 *détenus politiques*〔政治犯〕以山岳党人的身分出现在警察局里。但是,职业密谋家是这些人的核心。不难想象,这些手持武器聚集在这里的人由于多半都和警官、军官非常亲密,必然是一个相当狂暴的集团。以前,国民议会的山岳党模仿了旧山岳党,它本身的软弱无力最令人信服地证明了 1793 年的老革命传统在当时已经不够用了,而现在警察局的山岳党人也是如此,这些旧长裤汉一类的人证明,这一部分无产阶级在现代革命中已经不够用了,只有整个无产阶级才能实现革命。

谢努以极其生动的笔调描述了这些警察局中可敬的人的长裤汉式的生活。这些滑稽幽默的场面——显然,谢努先生本人也曾积极参加了演出——有时带有相当粗暴的性质。但是,它们很好地说明了老密谋家,这些 *bambocheurs* 的性格,而且是对路易-菲力浦统治最后几年资产阶级狂欢豪饮生活的一个必要的、甚至是有益的对照。

我们现在只从叙述他们坐镇警察局的战事中举一个例子来看一看。

“拂晓的时候,我发现组长们带着自己的人渐渐走过来,但是他们多半都没有带武器。我让科西迪耶尔注意这个情况。他说:‘我保证给他们武器,你

去找个适当的地方把他们安置在警察局里。’我立刻执行了这个任务，派他们去占领我曾经在那里受过非礼待遇的旧警卫室。不一会我看见他们往回跑。我问他们：‘你们往哪儿跑？’戴维斯回答我说：‘那个地方警察还占着，他们还在那里睡大觉，我们去找东西把他们弄醒，把他们赶出去。’于是他们就顺手拿起通条、刀鞘、对折起来的皮带和扫帚把柄作为武器。然后，这些多少领教过酣睡者粗暴残酷的迫害的好汉们，使尽全身力量向他们扑去，狠狠地教训了他们半个多小时，以致有些人事后成了长期病号。我向他们呼救的地方跑去，费了很大气力才把门打开，原来聪明的山岳党人从里面把门锁上了。当时值得一看的是警察们半裸着身体往院子里跑的情景，他们从楼梯上一下子跳了下来，只是由于熟悉警察局所有的出入口，才得以躲开追逐他们的敌人。我们的山岳党人占领了堡垒，客客气气地接替了堡垒的守备队，胜利地用战败者的遗物把自己装束起来，腰佩宝剑、身披斗篷、头戴他们从前大都望而生畏的三角帽，在警察局的院子里踟蹰了很久。”（第83—85页）

我们了解了山岳党人。现在我们来查看一看他们的领袖，谢努的叙事诗的主人公科西迪耶尔。谢努在许多地方谈到他，而且整本书可以说是针对他而写的。

对科西迪耶尔的主要指责是关于他的品行。所有这些指责不外是说他专搞开空头支票和其他一些弄钱的小诡计，而这些勾当是巴黎的所有债台高筑和喜欢放荡的推销员能够干和经常干的。作为整个商业基础的欺骗、敲诈、投机和交易所的勾当按 Code pénal [刑法典] 治罪的轻重，一般完全取决于资本的多少。至于交易所的勾当和作为法国商业特点的中国式的敲诈，可以读一读傅立叶的“四种运动”、“虚假的行业”、“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以及他的遗著¹⁷⁰，里面有些关于这方面的引人入胜的东西。谢努先生甚至不想证明科西迪耶尔利用他的警察局长的职位营私舞弊的事情。一般说来，假如某个政党的胜利的敌人不得不只限于揭露这种商业道德方面的不关痛痒的事情，那末这个政党是完全可以为

自己庆贺一番的。推销员科西迪耶尔的小实验与 1847 年资产阶级的大丑事相比真有天壤之别！谢努的整个批评之所以有意义，只是因为科西迪耶尔属于“改革报”派，这一派人企图用发扬共和主义美德的庄严保证和阴沉严肃的观点来掩盖革命毅力和革命认识的缺乏。

在二月革命的所有的领袖当中，科西迪耶尔是唯一具有乐天性格的人。他代表革命中的 loustic（乐天派），是老职业密谋家们的十分适当的首脑人。他多情，幽默，是各种酒馆和咖啡馆的老主顾，他信守的原则是自己活，让别人也活，同时又象军人一样地勇敢，样子和蔼可亲，举止落落大方，但实际上却十分奸诈、狡猾和阴险，观察力也异常敏锐，具有一定的革命手腕和革命毅力。科西迪耶尔当时是个真正的平民，他本能地仇恨资产阶级，极为富有一切平民的热情。他刚一安置在警察局里，就秘密地反对“国民报”派，同时也没有忘记前任者的厨房和地下室。他立刻着手组织军事力量，保证自己手中有一个报社，成立俱乐部，安排人事，总之，他一开始活动就信心百倍。警察局在 24 小时之内就变成了一座不怕敌人袭击的堡垒。但是，他的一切计划不是纸上谈兵，就是实际上毫无结果的纯粹平民式的狂妄行动。在矛盾尖锐化的时候，他的命运就和他的组织一样，在“国民报”派和象布朗基那样的无产阶级革命者之间动摇不定，停滞不前。他的山岳党人已经分裂，老的 bamboucheurs 不服从指挥，也已无法再加以制服，而革命的一部分则转向布朗基方面去了。科西迪耶尔本人在他的警察局长和人民代表的官场地位上越来越资产阶级化；5 月 15 日，他小心谨慎地对事件¹⁷¹采取旁观态度，而且以极不体面的方式在议会里为自己辩护；6 月 23 日，他把起义者抛在一旁，让他们听天由命。他因此自

然被逐出了警察局,而且不久以后被迫侨居国外。

下面我们从谢努和德拉奥德的书中摘引几个最值得注意的关于科西迪耶尔的地方。

2月24日晚上,科西迪耶尔刚刚任命德拉奥德为警察局秘书长之后便对他说:

“我这里需要些可靠的人。在行政管理上,一切都要设法走上正轨;我暂时留用旧官员;一俟他们教会爱国者,我们就把他们踢开。这还是次要的问题。问题是要把警察局变成革命的堡垒。请根据这个精神给我们的人发指示;叫他们全部到这里来。假如我们这里能有1000个坚强的志同道合的人,那末一切都会掌握在我们手上。赖德律-洛兰、弗洛孔、阿尔伯和我彼此都很了解,我相信一切都没有问题。我们必须打倒‘国民报’派。然后,把国家建成共和国,不管它愿意与否。”

在这之后紧接着就是巴黎市长加尔涅·帕热斯(“国民报”派将警察置于他的领导之下)的来访。他建议科西迪耶尔放弃警察局的不愉快的职务去担任科姆比耶恩的要塞司令。科西迪耶尔以跟他那宽大的肩膀极不相称的细嗓子回答他说:“我到科姆比耶恩去?这办不到!我必须留在这里。我手下有好几百个能干的弟兄,他们都工作得很出色;我还希望把人数增加一倍。如果您在市政厅觉得缺乏自由意志和勇气,那我可以帮助你们……哈哈, la révolution fera son petit bonhomme de chemin, il le faudra bien! [革命将是逐渐发展的,这是必然的!]——革命?它已经完成!——噢,不,它甚至还没有开始!——可怜的市长完全不知所措。”(德拉奥德,第72页)

谢努所描述的最有趣的场面之一,是新警察局长正在办公时接到警监和 officiers de paix 求见的报告以后接见他们的情况。

“科西迪耶尔说:‘让他们稍等一等,局长在工作。’他又工作了足有半个小时,这才作了接见警监先生们的舞台布置,这时警监们也已经沿着大楼梯列好了队。科西迪耶尔腰佩马刀威武地坐在安乐椅上。两个山岳党人衣冠不整,一脸凶气,脚旁放着火枪,嘴里叼着烟斗,在看守房门。两个队长拿着脱鞘的马刀站在他的写字台两旁。此外,他的总部里面的所有小队长和共和

党人三三两两地站在屋里。所有在场的人都带着大马刀和马枪，卡宾枪和猎枪。所有的人都在吸烟，屋里烟雾腾腾，这就使人们的面孔显得更加阴森可怕，给这个场面增添了一种确实令人毛骨悚然的气氛。客厅中间给警监们留下一块空地方。全体都戴上了帽子，于是，科西迪耶尔下令带他们进来。这正是这些可怜的警监们所期望的，因为他们遭到山岳党人的侮辱和威胁：山岳党人要用种种酷刑对付他们。山岳党人喊道：“匪徒们！现在你们可落到我们手里！你们跑不掉了，你们必须把皮留在这里！”——警监们走进局长办公室时决意要甫出龙潭再入虎穴。走在最前面的一个警监刚一跨进门坎，似乎一时拿不定主意了。所有在场的人投向他的目光是这样的可怕，他不知道应该前进还是后退。最后，他下定决心往前走了一步并且鞠躬敬礼，再前进一步腰弯得低了一点，再前进一步腰弯得更低了一点。警监们全部走进了屋里，向可怕的局长深深地鞠了个躬，局长手按马刀刀柄，冷淡地默默地接受了这种尊敬的表示。警监们诧异地凝视着这种可怖的情景，有些吓得恍恍惚惚，而有些无疑想讨好我们，认为这个场面很动人而且很庄严。——“静一点！”——一位山岳党人以阴沉可怕的音调命令道。在他们都走进来以后，一直不动声色地坐在那里的科西迪耶尔，打破了寂静，以最严厉的音调讲道：

“一个星期以前，你们未必想到在这个地方见到我，有这些忠实的朋友们包围着我。总之，现在他们是你们的统治者了，这些人是你们从前所说的那种脆弱的共和主义者。让你们在这些过去不被你们当人的人们面前发抖吧。你们这些走卒是已被推翻的政府的最恶劣的和最狂热的信仰者，是共和主义者的最疯狂的迫害者，而现在你们却落入你们的死敌的手里，因为在座的没有一个人没受到过你们的迫害。如果我听从人们向我提出的正当要求，我就会采取镇压措施，但是我却宁愿把一切置于脑后。大家都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吧；但是，如果我什么时候听到你们参加任何反动阴谋，我就要象捏臭虫一样把你们捏死。去吧！”

警监们经过了所有的恐惧阶段。他们只挨了局长一顿骂倒也心满意足，于是就高高兴兴地走开了。在下面楼梯上等着他们的山岳党人吵吵嚷嚷地一直把他们送到热留萨莱姆街的尽头。最后一个警监刚一消失，我们马上便哈哈大笑起来。科西迪耶尔觉得自己跟警监们开的玩笑很巧妙，所以喜出望外，笑得比所有的人都厉害。”（谢努，第87—90页）

在科西迪耶尔积极参加的3月17日的事件以后，他对谢努说：“我可以

按我的意愿把群众发动起来去反对资产阶级。”（谢努，第140页）

科西迪耶尔对自己的敌人一直只限于跟他们开开吓唬人的玩笑。

最后，关于科西迪耶尔和山岳党人的关系，谢努写道：

“当我告诉科西迪耶尔他的部下热中于过激行为时，他叹了一口气，但是他的双手全被束缚住了。他手下的绝大部分人和他一起开辟了生活的道路，他们和他一起分享痛苦和欢乐，许多人给他效过力。如果说他不能制止他们，这是他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后果。”（第97页）

我们提醒我们的读者注意，这两本书是在3月10日¹⁷²选举前夕为进行竞选而写的。它们的影响如何，选举结果红色党人获得辉煌的胜利便足以证明。

写于1850年3—4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评艾米尔·德·日拉丹 “社会主义和捐税” 1850年巴黎版

社会主义有两种：一种是“好的”社会主义，一种是“坏的”社会主义。

坏的社会主义是“劳动反对资本”。它是平均地权、消灭家庭关系、进行有组织的掠夺等罪恶的根源。

好的社会主义是“劳动和资本的融洽”。它会消灭愚昧，根除贫困，组织信贷，增加财产，改革税制，一言以蔽之，就是产生“酷似人们所想象的人间天堂那样的制度”。

必须利用好的社会主义来消灭坏的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有一个杠杆，这个杠杆就是预算。但是它还缺少一个推动世界转动的支点。2月24日的革命给它提供了这样的支点：这就是普选权。”

税收是预算的泉源，因此，普选权对预算的影响也就是对税收的影响。通过对税收的这种影响，“好的”社会主义才得以实现。

“法国的年度支出不能超过12亿法郎的税收。为了把开支缩减到这个数目，你们将采取怎样的措施呢？”

“35年来，你们在两个宪章和一个宪法中曾三次写道：所有的法国人都必须根据自己的财产按比例地分担国家的开支。在35年中，这种平等课税的原则始终是一种谎言……”

让我们来看一看法国的税制。

一、土地税。土地所有者缴纳的土地税并不是按比例负担的。

“如果有两个连界的地段在地籍簿上的估价都是一样，那末这两个土地所有者，不管是假的还是真的所有者”，即不管是抵押土地的土地所有者还是没有抵押土地的土地所有者都毫无差别地缴纳同样的税。

其次，土地税和其他的财产税是不相称的。1790年，国民议会通过土地税的时候，它是受了把土地看作纯收入的唯一来源的重农学派的影响，因此把全部税负都加在土地所有者的身上了。可见，土地税是以经济学的错误为根据的。如果实行平均摊税，土地所有者只缴纳他收入的20%，而现在他们却缴纳53%。

最后，土地税按规定本来只应该由土地所有者负担，而不是由土地承租人或佃户负担。但是照日拉丹先生的说法，情况不是这样，土地税总是由土地承租人和佃户负担。

这里日拉丹先生犯了一个经济学上的错误。如果土地承租人是真正的土地承租人，这样，土地税只能由所有者或消费者负担，而决不会由土地承租人负担；如果他们只有租佃关系的外表，而实际上是土地所有者的工作者（在爱尔兰就是这样，在法国也往往如此），他们就要缴纳土地所有者应纳的税，不管是什么税。

二、私人动产税。它是1790年国民议会也曾明令施行的税收，目的是直接向流动资本征税。资本额的大小是以房租来确定的。实际上这种税是落在土地所有者、农民和工业家的肩上，而对食利者几乎甚至完全没有影响。因此这种税完全违背了它的制订者的本来意图。而且百万富翁也可能去住只有两张破椅子的阁楼，这是不合理的，等等。

三、门窗税。它会损害人们的健康。这是使人得不到新鲜空

气和阳光的财政措施。

“在法国几乎半数的住宅只有门而没有窗，或者最多只有一个门和一个窗。”

这种税是由于急需货币在共和国第 7 年 7 月 24 日（1799 年 10 月 14 日）通过的，它只是临时的非常措施，在原则上是遭到反对的。

四、特许税（营业税）。它不是利得税，而是营业税。它是对劳动的处罚。这种税凡是由工业家负担的场合，多半也要由消费者来负担。总之，在 1791 年实行这种税的时候，也只是为了满足暂时的货币需要。

五、注册税和印花税。Droit d' enregistrement〔注册税〕¹⁷³是在弗朗斯瓦一世时代施行的，最初并没有财政的目的（？）。1790 年财产契约的强制注册范围扩大了，税率也提高了。注册税规定多从买卖中征收，少从赠产和遗产中征收。印花税是纯粹财政上的创举，它对不同的利润却征收同样的捐税。

六、饮料税。这种税集中了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它阻碍了生产，是令人愤懑的课得最重的一种税（见本报第 3 期“1848—1849”，“6 月 13 日的结果”）。

七、关税。这是一堆依照传统乱七八糟地堆积起来的关税税率，它们彼此矛盾，没有什么意义，并且危害工业。例如，在法国每 100 公斤原棉就要课以 22 法郎 50 生丁的税。现在再谈下一种税收。

八、入市税¹⁷⁴。这种税连保护民族工业这样的借口都不要了。这是国内的关税。最初它是地方性的济贫捐，而现在全部这种税

收却主要是由最贫穷的阶级担负，并且促使人们在供应给他们的食物中掺假。城市越多，这种税给民族工业造成的障碍也越大。

这就是日拉丹对各种税的评述。读者当然会看出，他的评论是平凡的，但是公正的。他的批评归纳起来就是以下3个论点：

(1) 从来没有一种税是按照它的制订者的意图由应当负担的那个阶级去负担的，而总是转嫁到另一阶级的身上。

(2) 所有的临时税都会固定下来成为永久税。

(3) 任何一种税都不是根据财产多少按比例征收的，都不是公平的、平等的、合理的。

这些反对现行税制的一般的经济观点在世界各国都屡见不鲜。但是法国的税制有一个特点。正象英国人是公法和私法的典型代表一样，法国人在税制方面是真正有历史的民族，虽然他们在其他方面从一般的观点出发，归纳、简化和抛开了传统。

关于这一点，日拉丹说道：

“在法国我们几乎生活在旧制度的所有财政措施的压榨之下。Talle（主要由农民负担的直接税），人头税，aides（间接税），关税，盐税，检验税，注册税，副本税，烟草专卖税，邮务超额利得税，火药交易税，彩票税，村镇的或国家的徭役，宿营迁移税，入市税，河川道路通行税，临时税，——所有这些税，尽管名称可以变更，但实际上都仍然存在，而且一点也没有减轻人民的负担，一点也没有增加国库的收入。我们的财政制度没有任何科学的基础。它不过是中世纪传统的反映，而这种传统本身就是不文明的和带掠夺性的罗马财政的遗物。”

而且我们的先辈在第一次革命的国民议会上就说过：“我们革命的目的只是要把税收掌握在自己手里。”

如果说这种状态在帝国时期，复辟时期，七月王朝时期还能

够继续存在，那末现在已经响起了它的丧钟：

“取消选举特权就必然会取消财政上的一切不平等现象。因此，如果我们不希望暴力代替科学，我们就不能失去时机，必须立即实行财政改革……税收几乎是社会赖以存在的唯一基础……我们却竭力到九霄云外去寻找社会改革和政治改革；最重要的改革就在税收里。你们一找就会找到。”

那末我们找到了什么呢？

“正如我们所理解的，捐税应当是有产者为了保证不会遭到任何妨害自己占有和运用财产的危险而缴纳的保险金……这种保险金应当是按比例缴纳的，它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种税收，如果它不能保证免除危险，不是为商品付出的代价，不是劳力的等价物，都应当废除；只有两种例外：舶来品税 (douane) 和死亡税 (enregistrement)……于是，纳税人就被保险人所代替……谁愿意纳税就纳税，完全听其自愿……我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所有的捐税之所以遭到非难，就是因为它们被称为捐税。一切捐税都应当废除，因为捐税的特征是具有强制性，而保险则是自愿的。”

不应当把这种保险金和所得税混淆起来，保险金其实是资本税，因为它保险的不是收入，而是全部财产。国家就跟保险公司一样，它在承保时所关心的是财产的价值，而不是财产带来的收益。

“在法国国民财富中估计有资产 1340 亿，其中应当减去负债 280 亿。如果岁出预算缩减为 12 亿，那末每年只要从资本中抽 1% 的税就足以使国家变成一个相互保险的大公司。”

从此也就“不再发生革命了”。

“权力这个词为团结这个词所代替：共同的利益变成了联系社会成员的因素。”

日拉丹先生并不满足这种一般的建议，他还给我们制定了一个每个公民都应当向国家索取的保险单或者保险证。

每一年担任以前收税官的职务的人都发给保险人一个“护照大小的共有 4 页的”保险单。第一页是保险人的名字，编号以及

缴款登记栏；第二页是保险人及其家庭的详细情况和自己所作的对他全部财产的详细的并证明可靠的估价；第三页是国家预算和法国的总收支对照表；第四页是各种多少有用的统计资料。这个保险单就成了护照，选举证，流浪工人的小账本之类的东西。这些保险单所记载的东西也成了国家制订四大总簿的根据：人口总簿，财产总簿，国债总簿和抵押借款总簿，这四个总簿合起来就包括了法国全部收入来源的完全的统计数字。

这样一来，捐税实际上就成了保险人为了享有以下特权而纳的保险金：（1）社会保护，诉讼免费，举行宗教仪式免费，教育免费，获得抵押贷款以及向储金局领取养老金；（2）免除和平时期的兵役；（3）保证不虞匮乏；（4）火灾、水灾、雹灾、兽瘟、轮船失事等的损失得到赔偿。

还必须指出，日拉丹先生想用各种罚金、国家财产的收入、保留下来的注册登记费、关税收入以及国家专卖事业的收益等来抵偿国家应付给保险人的赔偿费。

税制改革是一切激进资产者的拿手好戏，是一切资产阶级经济改革的特殊要素。从第一批中世纪的城市小资产者起至当代的英国自由贸易论者止，全部斗争都是围绕着捐税进行的。

捐税改革的目的是废除影响工业发展的旧传统税和缩减国家机关的开支，就是更平等地分摊捐税。资产者愈顽强地追求平等分摊捐税的幻想，实际上这种幻想就愈不能实现。

捐税最多只能在一些次要方面改变直接以资产阶级生产为基础的分配关系，如工资和利润的关系、利润和利息的关系、地租和利润的关系，但是它丝毫动摇不了这些关系的基础。关于捐税的一切争论和探讨都是预先肯定这些资产阶级的关系是万世长存

的。甚至取消捐税也只能加速资产阶级所有制及其内部矛盾的发展。

捐税能使一些阶级处于特权地位，使另一些阶级负担特别沉重，例如我们在金融贵族统治时期看到的情形就是这样。捐税只会使处于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之间的社会中间阶层遭到破产，因为他们的地位使他们不能把捐税的重担转嫁到另一个阶级的身上。

每出现一种新税，无产阶级的处境就更恶化一些；取消任何一种旧税都不会提高工资，而只会增加利润。在革命时期，可以大量增加捐税，利用捐税作为打击私有财产的一种方式，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捐税不是促使进一步采取新的革命措施，便是最后又造成旧的资产阶级关系的复辟。

减低捐税，更公平地分配捐税等等，这是庸俗无益的资产阶级的改革。废除捐税，这是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这种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主要是针对工商业中等阶级和农民提出来的。现在已经生活在至善世界里的大资产阶级自然会鄙视这种至善世界的空想。

日拉丹先生取消了捐税，把它变成了保险金。社会的成员支付一定的保险金就可以彼此保证自己的财产不因火灾、旱灾、雹灾和破产而受到损失，一句话，就可以免除现在妨碍资产阶级享受安乐生活的一切危险。每年缴纳的保险费不仅由所有的保险人来确定，而且还由自己估计自己财产的个人来确定。因此，商业和农业的危机、巨大的损失和破产就消失了，资产阶级生存过程中从产生现代工业起就具有瘟疫性质的一切变动就消失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富有诗意的一面就消失了。于是普遍的信任

和普遍的保险便实现了。公民获得国家的书面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会破产。现行制度的一切阴暗面都被消除，它的所有光明面都大放异彩，总之“酷似资产者所想象的人间天堂”的制度实现了。团结代替了权力，自由代替了强制，管理委员会代替了国家，于是便找到了哥伦布的鸡蛋：每一个“保险人”都根据自己的财产数学般精确地按比例来缴纳保险费。每一个“保险人”都肩负着整个立宪国家，即完备的两院制的担子。众议院的资产阶级反对派怕给国家付钱过多，这就使他们过低地估价自己的财产，贵族院的保守分子一心要保护自己的财产，这就使他们过高地估价自己的财产。从这两个对立派别的立宪游戏中就势必产生真正的均势、财产状况的精确说明和真正按比例负担的保险费。

有一个罗马人希望有一栋玻璃房子，以便使周围的人都能看到他的一切行动。资产者希望他的房子不是玻璃制的，而他邻居的房子是玻璃制的。这一愿望也实现了。例如，某个公民希望我给他一笔垫款或者希望与我合伙。我请他拿出他的保险单来，就能看到关于他的所有公民关系的详尽介绍，就能看到这种介绍对他显然的利益有无保证，上面有无保险公司管理委员会的签字。有一个乞丐来叩门乞讨。要叫他拿保险单来！公民应当肯定他救济了应该救济的人。以前雇一个女仆时，把她带到家里，盲目地予以信任；而现在则是叫她拿保险单来！

“有很多婚事，双方都不太晓得，该如何考虑嫁娶的实际情况，是否彼此的期望过高。”

那就拿出保险单来！将来互相吐露心曲的时候，只要交换保险

单就行了。这样，现在造成人生欢乐与痛苦的欺骗就会消失，真正的真理王国便会实现。而且还不仅如此。

“在现行制度下，法庭需要国家开支750万，如果我们那种制度实现了，违法就将成为国家的收入项目而不是支出项目，因为它们都变成了罚金和赔款。”

多么美妙的思想！

在这个至善的世界里，一切都带来利润：犯罪绝迹，而违法却带来收入。最后，因为在这种制度下财产保险不受任何侵害，国家仅作为普遍替一切利益保险的公司而存在，所以工人就永远有工作。就“不再发生革命了！”

如果忠诚的公民们对这都还不满意，
那末使他们心满意足的还有谁，还有什么东西？

资产阶级国家不过是资产阶级用来对付它的个别成员和被剥削阶级的相互保险的公司，由于统治被剥削阶级日益困难，这种保险必然会日益昂贵，似乎日益脱离资产阶级社会而趋于独立。名称的改变一点也不会改变这种保险的条件。日拉丹先生曾硬说每个人在与保险公司的关系上似乎具有独立性，可是连他自己也不得不立刻否定这种说法。谁过低地估价自己的财产，谁就会吃亏，因为这样保险机构就会按他申报的价格收买他的财产，甚至用奖赏的办法来鼓励别人检举。而且谁要是不愿意拿自己的财产去保险，谁就会处在社会之外，并被宣布为法律保护之外的人。社会当然不能容许在它的内部形成一个危害它生存条件的集团。于是强制、权力、官僚的干涉——这些日拉丹要消灭的东西，就会又出

现在社会上。如果说日拉丹先生也曾离开资产阶级社会一会儿,那末这只是为了经过曲折迂回的道路又回到资产阶级社会。

废除捐税的背后就是废除国家。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把国家的权力降低到北美的国家权力的水平。在北美,阶级矛盾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阶级冲突每一次都由于把过剩的无产阶级人口遣送到西方而得到平息;国家政权的干涉在东方达到了最低限度,在西方则根本不存在。在封建的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一般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德国,在废除国家的口号后面,不是隐藏着畏怯地逃避直接斗争的行为,就是隐藏着瞎吹资产阶级自由,甚至把它吹嘘为各个人的绝对独立和自主的作法,再不然就是隐藏着资产者只要觉得不妨碍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便对一切国家形式都表示冷淡的态度。既然关于“在最高意义上”废除国家的这种宣传,在形式上都如此荒唐,当然柏林的施蒂纳和孚赫之流在这点上就无可厚非了。La plus belle fille de France ne peut donner que ce qu' elle a (法国最美丽的女郎只能给你她所有的东西)。

这样一来,日拉丹先生的保险公司就只剩下一种资本税,这种税不同于所得税并且代替其他一切税。日拉丹先生认为,资本不仅是指投入生产的资本,而且还包括一切动产和不动产。他把这种资本税吹得天花乱坠:

“这是哥伦布的鸡蛋,是建筑在基础上,而不是建筑在尖端上的金字塔,是一股自己开辟河道的急流,是没有革命者的革命,没有退步的进步,没有推动的运动,最后,这是纯朴的思想和真正的规律。”

在日拉丹先生所创造的这些自吹自擂的广告（众所周知，这种广告多得不可胜数）中，资本税的广告无疑是一个杰作。

不过，资本税作为单一税，有其优越性；所有的经济学家，其中也包括李嘉图，都证明单一税有好处。资本税作为单一税，可以一举而消灭所有庞杂的耗费巨大的税务机构，对生产、流通和消费的正常进程产生最小的影响，并且和其他一切捐税不同，征收的范围也包括投入奢侈品方面的资本。

可是，在日拉丹先生看来，资本税的作用还不仅如此，它还具有一种十分特别的良好效果。

数量相等的资本，不管它的利润是6%或3%，或根本没有利润都必须向国家缴纳同样的税。这样，就会使闲置资本投入流通，从而增加了生产资本，而已经投入流通的资本则会加速周转，从而生产更多的产品。这两种情况结果都会使利润和利息下降。可是日拉丹先生的看法却相反，他断言在这种情况下利润和利息都会上升，这真是经济学上的奇迹！把非生产资本变为生产资本和提高资本的生产率一般地会加快和加强工业危机的发展过程，会降低利润和利率。资本税只能加快这一过程，加重危机，从而加快革命因素的增长。就“不再发生革命了！”

日拉丹先生认为，资本税的第二个神效是：它使资本从利润低的农业流入利润较高的工业，使土地价格降低，使土地的占有集中，使农业采取英国那种大规模耕作方式，从而使十分发达的英国工业转移到法国来。不用说，要做到这一点还必须把英国工业的其他条件也搬到法国来，日拉丹先生在这里犯了一个很出奇的错误。法国的农业并不是苦于资本过剩，而是苦于资本不足。英国地产集中和农业发达并不是从农业中抽走资本的结果，相反地，是

工业资本投入农业的结果。英国的土地价格远远超过法国的土地价格；根据日拉丹的估计，英国全部土地的总价值几乎等于法国的全部国民财富，因此，法国土地的价格不仅不会随着土地的集中而下降，相反地，还会上涨。其次，英国地产的集中从地面上消灭了几代人。在法国，同样的集中（资本税必将通过农民的加速破产有助于这种集中）将把这些农民群众赶入城市，从而使得革命更无法避免。最后，如果说在法国已经开始了—一个地产从分散到集中的相反过程，那末在英国大地产又大踏步地走向分散，这就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只要资产阶级关系一般地还存在，农业就必然经常地作循环运动，即从集中到分散，又从分散到集中。

这些奇迹已经谈够了。现在我们来看看抵押贷款。

抵押贷款最初只是为地产设立的。国家发行和钞票完全相同的抵押证券，不同的只是这里作为担保物品的不是现金或金条，而是土地。国家发给欠债的农民利率为4%的抵押证券，以满足抵押贷款人的要求；现在抵押借款不在私人贷款人手里，而在国家手里，而国家把这种债务改为长期债务，因此，贷款人已经永远不可能要求收回债务。法国的全部抵押借款为140亿。虽然日拉丹建议只发行50亿的抵押证券，但是纸币增加到这个数量不仅足以降低资本的价值，而且足以使纸币完全贬值。因此日拉丹还不敢使这种新的证券具有强制比价。为了避免贬值，他建议这些证券持有人兑换 *al pari*（票面价值）为3%的公债券。总结起来，整个交易的结果就是：农民以前按利率5%和抵押证券过户等费1%偿还债务，现在只按利率4%偿还，即少付了2%；国家按利率3%偿还，按4%收回，赚了1%；以前按利率5%取得利息的私人贷款人，在抵押债券贬值的威胁下，不得不以感谢的心情来接受国家给他的3%的

利率，因此损失2%。而且，农民不必再偿还自己的债务，而贷款人则不能再向国家追收他应得的款项。因此，整个交易不过是对抵押贷款人的直接的用抵押证券勉强掩饰起来的掠夺，从5%的利率中夺去2%。这样一来，当日拉丹先生唯一的一次除了改革捐税外还想改变社会关系的时候，他就不得不直接侵犯私有财产，不得成为革命者，否定自己的一切幻想。但是，就连这种侵犯也绝不是从他开始实行的。他的这种要求是从德国共产主义者那里抄袭来的，后者从二月革命以后首次要求把抵押债务变为欠国家的债务¹⁷⁵，当然后者的作法是和日拉丹先生的做法完全不同的，甚至是日拉丹先生所反对的。值得注意的是，当日拉丹先生唯一的一次提出多少有点革命味的措施的时候，他只提出了和缓的办法，而没有勇气提出其他的东西，而这种和缓办法只能使法国的土地分散过程更加持久，只有用几十年时间来削弱这种过程，才能最终又回到现在的这种状态。

读者在日拉丹的整本书里唯一没有读到的就是工人。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本来就一直把事情描写成这样：似乎社会只是资本家构成的，这种描写是为了以后能够从这一点出发来解决资本和雇佣劳动间的纠纷。

写于1850年4月下半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国际述评（二）

（上一期因篇幅所限未能刊登每月述评。现在我们仅把这篇述评中有关英国的部分刊登在这里。）

二月革命纪念日前不久，当卡尔利埃下令砍掉自由之树的时候，“笨拙”¹⁷⁶刊登了一幅自由之树的画，画中有棵树的树叶是刺刀，果实是炸弹，在这棵长满刺刀的法国自由之树的旁边，有一首歌词歌颂一棵出色的结满丰硕果实——pounds, shillings and pences（英镑，先令和辨士）的英国自由之树。但是，这种生意人惯用的恶毒挖苦比起“泰晤士报”从3月10日以来对“无政府主义”的胜利所表示的狂烈愤怒，大为逊色。在英国象在所有其他国家一样，反动政党感到巴黎受到打击，就象它自己受到直接打击一样。

其实，首先威胁到英国“秩序”的并不是来自巴黎的危险，而是这种秩序造成的新的直接后果，是这棵英国自由之树所结的果实——商业危机。

在1月份的述评（本刊第2期）中，我们曾经指出，危机已经逼近。有许多情况使危机加速到来。在1845年最近的一次危机以前，过剩的资本大量投入铁路部门来进行投机。然而，生产过剩和狂热的铁路投机的规模过于庞大，以致于铁路的营业甚至在1848年至1849年的繁荣时期也未能恢复元气，甚至这个部门的最大企

业的股票的价格也还很低。很低的粮食价格和1850年的农村年景也没有给投资创造什么有利的条件，而国家的各种证券已经很不保险，因此不能广泛进行投机。这样一来，繁荣时期剩余资本的通常出路就被堵塞了。剩余资本只好投入工业生产和用来进行殖民地商品以及重要的工业原料棉花和羊毛的投机。由于从前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本相当大的一部分直接投入工业，工业生产自然便异常迅速地发展起来，这就造成了市场商品充斥的现象，从而大大加快了危机的来临。现在，在最大的工业部门和在投机活动中，已经呈现出危机的苗头。一个月来，主要的工业部门棉纺织业完全处于萧条状态，而遭殃的又是棉纺织业中的一些最重要的部门，特别是生产普通成品的纺织业和织布业。棉纱和普通印花布价格下跌的数量已经大大地超过了原棉价格下跌的数量。生产在日益减缩；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开工不足。工厂指望着大陆的春季订货给工业带来暂时的活跃，但是，国内市场、东印度、中国和近东各国的以前的订货现在多半已经退掉，平常能保证生产两个月的大陆的订货由于政局动荡不定也几乎完全没有了。在毛纺织业中，时而而在这一部门，时而在那一部门不断呈现出危机的征兆，根据这些征兆可以预料，目前还相当“不错”的状况不久就会结束。生铁的生产也困难重重。企业主们认为不久的将来生铁跌价是不可避免的，于是力图用组织他们之间的联盟的办法来阻止价格的暴跌。这就是工业的情况。现在来谈一谈投机。棉花跌价，一方面是因为供应又有增加，另一方面是因为工业萧条。殖民地商品的情况也是如此。供应在增加，而国内市场的消费量却在减少。单是茶叶，近两个月来就有25船运到利物浦。连工业区也发生的收缩状态特别严重地影响了对殖民地商品的消费（由于农业区的贫困甚至在繁荣

时期对殖民地商品的消费也处于很低的水平)。由于上述原因,利物浦一家经营殖民地商品的大商号已经破产。

目前即将爆发的商业危机就其影响来说,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严重得多。商业危机是会同农业危机(它是从英国废除谷物税时起就已经开始的,并且由于最近的丰收而愈益加深)一起爆发的。英国第一次同时遭受工业危机和农业危机。这次英国的双重危机由于大陆即将发生动荡而将会来得更快,更广泛和更危险,而大陆的革命由于英国危机对世界市场的影响而将会具有比以前更鲜明得多的社会主义性质。显然,任何一个欧洲国家都不会象德国那样受到英国危机如此直接、广泛和强烈的影响。原因很简单,因为德国是英国在大陆上的最大的销售市场,而德国出口的主要商品羊毛和粮食在英国销路最广。这种情况反映在一句讥讽秩序之友的话里:工人阶级因消费品不足而激怒愤懑,上层阶级则因生产过剩而倾家荡产。

当然,辉格党人将是危机的首当其冲的牺牲品。他们会象以往一样,只要即将来临的风暴一发作,就会把国家政权抛开不管。但是,这一次他们会跟唐宁街¹⁷⁷的官邸永远诀别。即使起初有托利党的内阁来暂时代替他们,这个内阁的基础也是不会巩固的,以工业家为首的所有的反对党都会联合起来反对它。这些反对党手中再也没有象废除谷物法时所用的那种颇受欢迎的万灵妙方来阻止危机了。他们将不得不至少进行一下议会改革。这就是说,他们必将获得的政权,只有在他们把议会的大门为无产阶级敞开,把无产阶级的要求提到下院的议事日程上来并把英国卷入欧洲革命的条件下,才会落到他们手里。

这篇关于即将爆发的商业危机的短文是一个月以前写的,我

们现在只略加补充。通常在春天出现的暂时的旺季这次也终于出现了,但是比往常要差一些。主要生产夏用薄布的法国工业在这次旺季获利特别多。在曼彻斯特、格拉斯哥和西莱丁订货也有所增加。然而,这种工业的暂时活跃是年年春天都出现的,也只能稍微缓和一下危机的发展。

在东印度也出现了商业的暂时活跃。英国货币牌价的较为有利的行情使商人有可能按比平常低的价格出售自己的一部分存货,因而孟买的市场情况有了一些好转。但是这种暂时的、局部的好转,是一种偶然性,是偶然间,特别是在每次危机之初发生的,它对于危机的整个过程影响并不大。

但是,刚刚从美国得到消息说,那里的市场完全处于收缩状态。美国市场是最有决定意义的市场。美国市场商品充斥、美国生意萧条和物价下跌,实际上也就是危机的开始,是这里危机直接、急速和不断影响英国的开始。只要回忆一下1837年的危机,便会明了这一点。在美国只有一种商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那就是美国的公债券,这是唯一能够给我们欧洲秩序之友的资金提供可靠的避难所的国债券。

美国卷入生产过剩所引起的倒退运动以后,可以预料,在最近一个月当中,危机将开始发展得比以前更快。大陆上的政治事件也日益不可遏止地要爆发,本刊不止一次指出的那种商业危机和革命一并产生的现象也愈来愈不可避免。Que les destins s'accomplissent!〔愿预定的事情发生吧!〕

1850年4月18日于伦敦

写于1850年3月中旬至4月18日

原文是德文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卡·马克思 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

我们的读者还会记得,在上一期里 我们曾经指出,法国的金融贵族又当政了。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指出,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结成联盟是为了进行有利可图的交易所投机。自富尔德一参加内阁以后,路易-拿破仑不断向立法议会要钱的行动突然停止了,这件事早已引起人们的注意。但是,在进行最近的选举以后,暴露了一些事实,这些事实非常清楚地说明了波拿巴总统收入的来源。我们这里只举出一个例子来谈一下。

我们的文章中主要将引用冠冕堂皇的选民同盟机关报“祖国报”¹⁷⁸的话。这家报纸的老板是银行家德拉马尔,他本人是巴黎最著名的股票经纪人之一。

趁着3月10日的选举组织了一次,à la hausse(抬高价格的)大规模的投机活动。富尔德先生领导了这一阴谋活动。秩序之良友都参与了这个活动。波拿巴先生的党羽和他本人也为这件事情下了很大本钱。

3月7日3分息的证券上涨了5生丁,5分息的证券上涨了15生丁。这是由于“祖国报”公布了选举秩序之友的初步结果

见本卷第89—93页。——编者注

所致。不过这点涨价对我们的投机者来说太微不足道了,还应当“加油”。3月8日的“祖国报”(3月7日夜里就已出版)在其交易所公报中曾经暗示,对秩序党的胜利不必有丝毫怀疑。同时报纸还写道:

“当然,我们不能否认,资本家们是慎重的;但是,如果说有一种情况使人毫不发生怀疑的话,那就是初选结果公布以后的现在情况。”

要想充分估计“祖国报”的交易所公报和所有报道对交易所的影响,就应当知道,这家报纸是现政府的真正的 *moniteur* (通报),它得到的官方消息比“通报”得到的都早。尽管如此,这次投机还是没有成功。

当3月8日人们知道了军队中的某些有利于红党的选举结果以后,牌价马上就下跌了。投机者们显然都惊慌万状。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来对付。“祖国报”的交易所公报表现得很沉着。选民同盟的所有报纸都被卷入这一运动;对于选票统计中某些无足轻重的差错展开了热烈争论;有一家报纸以显著的地位刊登了一个投票拥护君主主义者的团队的选举结果;最后,共和派的报纸不得不登载官方的辟谣消息,不过这种辟谣的虚伪性没有几天就被揭露了。

经过所有这些努力,在3月9日交易所开市时国家证券的价格有某些上涨,不过上涨没有维持多久。在两点一刻以前牌价相当低;自两点一刻起到交易所下市¹⁷⁹时止牌价步步上涨。关于这个突然转变的原因“祖国报”自己泄露出来了:

“有人断言,一些感到提高牌价对自己非常有利的投机者在交易所快要下市的时候进行大量抢购,以便在选举时使地方振奋起来,并且依赖各地方上的信任而造成再一次抢购,使牌价更为上涨。”

这是一次几百万法郎的交易，由于这次大交易，3分息的证券上涨了40生丁，而5分息的证券上涨了60生丁。

由此可见，有些投机者感到涨价对自己有利，所以在紧要关头，他们再一次进行大量抢购，以便引起进一步上涨。这些投机者是谁呢？事实可以回答这一点。

3月11日交易所里牌价下跌。在变换不定的选举结果面前，投机者的一切企图都失败了。

3月12日牌价又大大下跌，这是因为选举结果几乎已经人所共知，3个社会主义者候选人获得显然多数的选票，这可以说已经是肯定的事实。抬高价格的投机者还企图拚命挣扎。“祖国报”和“晚报”在官方电讯的幌子下登载了纯粹捏造出来的关于地方选举结果的消息。手腕耍成功了。晚间，在图尔托尼180牌价微有上涨。可见，问题完全在于“加油”。“祖国报”登载了如下的一项报道：

“根据到目前为止已得到的有关选举结果的情报，公民德弗洛特仅比公民弗·富瓦多得341票。在机动宪兵队选举之后，选举结果还可能变得对我们候选人有利。有人断言，明天政府将向立法议会提出两项法案——出版法和预选会议法，并且要求立即通过这两项法案。”

第二个消息是捏造的；只是在长期动摇以及经过与秩序党首领长久讨论和内阁更迭之后，政府才决定提出这两项法案。第一个消息更是无耻的谎言：正当“祖国报”发表这个消息的时候，政府已把德弗洛特当选的消息用电报通知了各省。

然而投机成功了：证券上涨了1法郎35生丁，因而投机者先生们赚了三四百万法郎。“财产之友”为了秩序和社会竭力想多抓到一些财富，当然不能受到责备。

在从事这次成功的dodge〔投机勾当〕之后，投机者先生们竟如此厚颜无耻，以至他们马上又进行一次大规模抢购，并以此来刺激其他许多资本家也去抢购。证券上涨很多，甚至从这一次交易所投机中可能获得的利润都已经计算出来了。但是在15日由于卡诺、德弗洛特和维达尔被宣布为人民的代表，而遭到意想不到的打击。牌价突然发生无法制止的猛跌，任何虚伪的消息和捏造的电报都挽救不了我们投机者的失败命运。

卡·马克思写于1850年4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政治
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

德国的所谓革命政党意志消沉到了这种地步，以至于在英法两国可能使人义愤填膺的事情，在德国不仅不令人诧异，而且甚至会博得普遍的赞扬。瓦尔德克先生在陪审法庭上详尽地引用证人的证词说明，他一向是忠心耿耿的立宪主义者，而柏林的民主主义者却凯旋地把他召回家去。格律恩先生在特利尔的公审大会上毫无道理地背弃了革命，而审判厅里的听众却转过身子来，背朝着判了罪的无产者，狂热地祝贺这位被宣判无罪的市侩。

哥特弗利德·金克尔先生1849年8月4日在拉施塔特军事法庭上发表的和今年4月6日和7日在柏林“晚邮报”上刊登的辩护词又提供了一个新例证，说明这类事情只能发生在德国。

我们早已料到，我们在我们党的面前揭露“被俘”的金克尔的这篇辩护词，会惹起所有温情的伪善者和民主主义清谈家的愤懑。这一点我们是毫不在乎的。我们的任务是无情的批判，而这种批判与其针对公开的敌人不如针对伪装的朋友；为了坚持我们的这种立场，我们情愿放弃在民主派当中的廉价的荣誉。我们的斥责丝毫也恶化不了金克尔先生的处境；我们的揭露会使他进入赦免之列，因为我们在揭露中会证明，他说他不是人们所说的那种人的供词是可靠的，并且我们还宣告说，他不仅应该赦免，甚至应

该录用他担任普鲁士国家职务。况且，他的辩护词已经公布于世了。我们将在我们党的面前揭露整个辩护词，而在这里我们只引用其中几个最为显著的地方。

“同样，我从来也没有担任过领导职务，因此我也不能对其他人的行为负责。所以我抗议把我的行为说成是卑鄙龌龊的行为，遗憾的是，据我的了解，卑鄙龌龊终于玷污了革命。”

难道因为金克尔先生“在伯桑松连队里当过小兵”，因为他用这些话来怀疑一切军官，他就没有义务说些至少对他的直接首长维利希有利的话了吗？

“我从来没有在军队里干过事，所以，我没有破坏过誓言，没有用我在为祖国服务时可能获得的军事知识来反对祖国。”

难道这不是对被俘的前普鲁士士兵严森和贝尼高的直接告密吗？（他们两人在这之后不久就被枪毙了）难道这不是证明判决已被枪毙的多尔图死刑是完全正确的吗？

金克尔先生同样地向军事法庭出卖了自己的党：他滔滔不绝地乱谈什么把莱茵省左岸割让给法国的一些计划，并表白自己毫无这种罪恶念头。金克尔先生明明知道，莱茵省并入法国只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这个省在革命与反革命进行决战的时刻将无条件地站在革命一边，不管代表革命的是谁，是法国人也好是中国人也好。他同时也没有忽略用性格脆弱作借口来为自己开脱，他说这种性格使得他与野蛮的革命者不同：他即使不作为一个党员，也会作为个人与阿伦特和其他保守派分子保持良好的关系。

“我的罪过仅仅在于，我在夏天正是继续盼望了你们大家在3月里所盼望的和全体德国人民所盼望的东西！”

他在这里把自己描绘成一心维护帝国宪法的战士，他除了这

个宪法之外，从来没有盼望过什么别的东西。请看，这就是他的声明。

金克尔先生顺便提到他写的一篇有关普鲁士士兵在美因兹进行蹂躏屠杀¹⁸¹的文章，他说：

“我受到怎样的处理呢？当我不在的时候，为了这件事曾两次传我到法院去，因为我不能出庭为自己辩护，所以我被判决剥夺选举权5年（判决是别人转告我的）。剥夺选举权5年——这就是对我的判决；对于一度曾荣幸当选为议员的人来说，这是极端残酷的惩罚（！）。”

“我常常听人说，我是个‘坏普鲁士人’；这个责难很刺激我……那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党目前在我的祖国里遭到了失败。如果现在普鲁士国王将终于奉行人胆的强有力的政策，如果我们的王位继承者，普鲁士亲王殿下能够用宝剑统一德国（用别的方法是办不到的），使德国在我们的邻国面前成为一个伟大而又令人尊敬的国家，保证它有真正的长期的国内自由，使商业活动重新活跃起来，使全德国平均分担目前十分沉重地压在普鲁士肩上的军事负担，并且首先保证我的民族（我认为我是它的代表）的穷人有一块面包，——如果你们的党能够做到这一切，我将跟你们在一起。对我来说，祖国的荣誉和威严比我的政治理想更可贵；我会评价1793年为了法国的利益自愿屈身于拿破仑陛下之前的法国共和主义者（富歇和达来朗？）；如果这样的事会发生在我们这里，如果我的人民再一次给我荣誉，选我当他们的议员，我就会成为首先衷心欢呼‘德意志帝国万岁！’‘霍亨索伦帝国万岁！’的议员中的一个。如果抱有这种见解便是坏普鲁士人，那末在这种情况下我也不愿意成为好普鲁士人。”

“各位先生，请你们在判决那一天由于人类命运的转变而极为不幸地站在你们面前的人以前，也稍微为那被遗弃的妻儿想一想。”

正当他的26位同志被同样的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和被枪决的时候，金克尔先生发表了这个辩护词。那些人在死亡面前的态度是与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金克尔在法官面前的态度迥然不同的。不论怎样,金克尔把自己描绘成一个无辜的人是完全对的。他留在自己党的队伍里完全是出于误会;如果普鲁士政府继续把他关在监狱里,那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残酷行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合写于1850年4月中旬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流亡者委员会的声明

4月14日柏林“晚邮报”登载了下面这篇报道（4月11日于施特廷）：

“在救济伦敦的流亡者的问题上采取了如下办法：必须把款子交给布赫尔，由他同施特里部的施拉姆建立联系，因为其他两个委员会之间意见不一，分配款子有偏心。”

在伦敦实际上只有一个流亡者委员会，即后面署名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在去年9月流亡者开始侨居伦敦时成立的。从此以后，曾试图再建立其他的流亡者委员会，可是没有成功。后面署名的委员会到目前为止对需要救济的所有流亡者（除了四五个没有向我们申请的以外）都给予了帮助（虽然救济数量只能使他们不致挨饿）。但是，由于最近从瑞士被驱逐的流亡者大批而至，本委员会的款子最后几乎用尽。这些款子发放给那些能够证明自己参加过德国革命运动并需救济的人，不分党派，完全一视同仁。本委员会取名“社会民主主义”，不是由于只援助这个党的流亡者，而是由于它可以优先动用这个党的经费，这一点在它去年11月的宣言¹⁸²中已宣布过了。

波兰称作：兹杰辛。——编者注

波兰称作：斯特舍哥姆。——编者注

大概是为了帮助流亡者而准备在瑞士举行的抽彩，引起了谣言，说伦敦这里为流亡者储存了许多钱，因此有人向我们委员会提出了不可能予以满足的要求。另一方面，当时各报也故意散布谣言，说相互倾轧的委员会之间发生纠纷，而使一大笔款子未能拨到伦敦。后面署名的委员会为了弄清楚，是否存在其他委员会和有其他援助流亡者的款项的来源，曾经建议流亡者派代表团去见司徒卢威、鲁道夫·施拉姆和施托尔佩的路易·鲍威尔等人。这件事已经做了。代表团带来了如下的答案：

施特里部的施拉姆声明说，他不属于哪一个流亡者委员会，但是他从来自日内瓦的负责把收款寄回日内瓦的加累尔那里得到一些彩票。说别的委员会存在，恐怕只是纸上空谈。

公民司徒卢威声明说，他没有钱，只有尚未推销的彩票。

公民鲍威尔作了以下的书面解释：

“为了回答流亡者克列奈尔的问题本人声明如下，这里的民主主义同盟流亡者委员会连一个政治流亡者都救济不起，这个团体的出纳处在此类开支方面用完2英镑15先令以后，也将无力赈济。

民主主义同盟救济委员会会长鲍威尔博士

1850年4月8日于伦敦”

司徒卢威先生和施拉姆先生向流亡者建议，从自己人或政治上中立的人中选出流亡者委员会。后面署名的委员会建议流亡者自己对该建议决定取舍。流亡者发表如下声明作为答复：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由于要讨论我们要否把照顾我们的工作交给从我们中间所选出的委员会这个问题，后面署名的流亡者认为自己有责任向现在的委员会声明，无论原来的或不久前新来的流亡者都是真诚地主张，我们对委员会的活动及其在工作方面的辛勤劳动表示深切的谢意，因为那些应当分发的款项，分配得一

直令我们十分满意。我们只有一个愿望：这些同志继续关怀我们，一直到我们大家所盼望的很快会到来的革命使他们不必这样关怀时为止。 致以兄弟般的敬礼

(署名)

1850年4月7日于伦敦”

流亡者自己所写的这个文件，是对上述报道和报刊中其他类似诽谤的最好的回答。但是，如果在广大群众面前揭穿这种言论不是有利于需要援助的流亡者的话，我们是根本不予理睬的。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马克思 (主席)，亨·鲍威尔，
弗·恩格斯，奥·维利希，卡·普芬德

1850年4月20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4月28日
“新德意志报”第102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和报纸校对过的
弗·恩格斯的手稿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在今天贵报上的警察通讯栏里，我们看到福泽吉尔先生、司徒卢威先生和伦敦市政府的委员吉卜斯先生¹⁸³在伦敦市长官邸会谈关于德国流亡者问题的报道。我们声明：下面署名的委员会的委员和从本委员会获得补助金的德国流亡者当中，任何人和这件事情都没有丝毫关系。

我们请求您在贵报最近一期上刊登这篇声明：为了我们民族的利益我们提出抗议，决不让居住在伦敦的许多德国流亡者替他们中间某些人擅自采取的步骤承担责任。

顺致敬意

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委员

1850年5月24日于草市大磨坊街20号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于1934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1850年6月

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

弟兄们！

我们在上一次交同盟特使 转发给你们的告同盟书 中，阐明了工人阶级政党，特别是同盟，无论在目前或革命时期所持的立场。

本告同盟书的主要目的是报告一下同盟的情况。

去年夏天革命政党所遭到的失败一度几乎完全破坏了同盟的组织。积极参加了各种运动的盟员都零落失散，失掉联系，通信地址已经无用，再加之害怕信件被人偷拆，曾经一度无法通信。因此，中央委员会的工作到去年年底为止一直陷于停顿。

由于这次失败带来的最初影响逐渐削弱，德国全国各地都要求建立强大的秘密的革命政党组织。这种要求一方面促使中央委员会决定派遣特使到德国和瑞士，另一方面促使在瑞士建立新的秘密联合会，促使科伦支部试图以本身的力量在德国组织同盟。

亨利希·鲍威尔。——编者注

见本卷第288—299页。——编者注

今年年初，在瑞士，一些因参加过各种运动而多少有点名声的流亡者组成了一个联合会¹⁸⁴，这个联合会的宗旨是，在适当的时机协助推翻各邦政府，并且网罗能够担负领导运动甚至组织政府的工作的人材。联合会不具有任何明显的政党性质，因为它的成员五花八门极为复杂。它的成员来自参加过各种运动的一切派别，从坚定的共产主义者，甚至老同盟盟员起一直到最胆小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前普法尔茨政府委员。

对于当时住在瑞士的这么许多巴登-普法尔茨的官迷和其他的小野心家来说，这个组织是理想的活动地盘。

中央委员会所掌握的、这个联合会发给它的代表的指示是十分难以令人信服的。缺乏明确的政党观点，企图联合现有一切反对派分子组成形式上统一的团体，这一切只不过是被动所提出的许多关于各地的工业、农民、政治和军事情况的问题笨拙地掩藏起来而已。这个联合会的力量也是很有限的。根据我们所掌握的会员名册，瑞士的整个协会在发展最快的时期，会员总共也不过30人。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们当中几乎没有一个工人。从一开始，它就是一支完全由下级军官和光杆军官组成的军队。他们当中有普法尔茨的弗里兹和格莱纳、爱北斐特的克尔纳、济格尔等人。

他们派了两名代表到德国。第一个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霍尔施坦的布龙。他用掩盖和歪曲真相的办法使个别盟员和若干支部一度加入了新的联合会，使他们把这个联合会看作是重建起来的同盟。布龙把有关同盟的情况报告给在苏黎世的瑞士中央委员会，而把有关瑞士联合会的情况又报告给我们。他不仅玩弄这种两面派的手法，而且当他还同我们保持通信关系的时候，他把明显的诽谤性的信件寄给法兰克福上述那些被拉入瑞士联合会的人，

让他们不要跟伦敦建立任何联系。因此，他立即被开除了盟籍。法兰克福事件由同盟特使作了妥善处理。在所有其他方面，布龙效劳于瑞士中央委员会的活动也毫无成就。第二个代表是波恩的大学生叔尔茨，他没有取得任何成就，因为，正如他本人在给苏黎世的信中所写的，“他发现所有可以利用的力量已经都掌握在同盟的手里”。后来，他突然离开了德国，现在他正奔走于布鲁塞尔和巴黎之间，并且受到同盟的监视。中央委员会并不认为这个新的联合会对于同盟有多大威胁，已经派了一位十分可靠的盟员打进瑞士联合会中央委员会，注意这些人的措施和计划反对同盟的程度并报告这些措施和计划的情况。此外，中央委员会派了一名特使到瑞士¹⁸⁵，跟上述那位盟员一起把有用的力量吸收到同盟里来，并在瑞士普遍成立同盟组织。此处引用的消息完全是从十分可靠的文件中取得的。

司徒卢威、济格尔和其他一些当时在日内瓦勾结在一起的人，早就有了另外的类似企图。他们恬不知耻地硬说他们企图组织的联合会就是同盟，甚至为了这个目的竟盗用同盟盟员的名义。当然他们这种谎言是蒙蔽不了任何人的。他们的企图到处碰壁，就连逗留在瑞士的一直没有产生的这个联合会的几个成员最后也不得不加入了上述的组织。但是，这个黑帮愈是软弱无力，它愈是用象“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等这样响亮的称号来炫耀自己。在伦敦这里，司徒卢威还跟其他一些失意的伟人们一起继续按照自己的企图进行活动。他们在德国各地到处散发宣言以及关于参加“全德流亡者中央局”¹⁸⁶和“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¹⁸⁷的号召书，但是，

这一次又完全失败了。

这个黑帮同法国和其他非德国的革命者的所谓联系根本并不存在。它的整个活动不外是当地德国流亡者(他们不会直接触犯同盟,不会带来什么危险,而且很容易控制)相互之间进行小阴谋策划。

所有这类的企图所追求的目的要末是和同盟所追求的目的一样,组织革命的工人政党(在这种情况下,会分散力量、取消政党的集中和威力,因而成为一种非常有害的分散主义),要末只是想重新利用工人阶级政党来解决跟该党要求完全相背或直接敌对的任务。工人阶级政党在一定的条件下完全可以利用其他政党和党派来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它不应当隶属任何其他政党。有些人在最近的运动¹⁸⁸中参加了政府,利用自己的地位来出卖运动并在工人阶级政党想独立活动的时候来镇压它,对这些人始终应当敬而远之。

关于同盟的情况仅报告如下:

一、比利时

在比利时工人当中,同盟象1846年和1847年那样的组织形式,自从1848年一些主要盟员被捕,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无期徒刑¹⁸⁹以后,显然已经不复存在了。整个说来,从二月革命和大部分德意志工人协会¹⁹⁰会员被驱逐出布鲁塞尔的时候起,比利时的同盟已经大为削弱。在现存的警察迫害的条件下,它不能重新大大发展。虽然如此,在布鲁塞尔一直保存着一个支部,它直到目前还存在着,并且正在尽自己的力量进行工作。

二、德 国

中央委员会本打算在本告同盟书中专门报告一下同盟在德国的情况。但是目前还做不到，因为普鲁士警察当局现在正企图搜捕革命政党的某些分布各地的组织。本告同盟书将采取可靠的方法送到德国去，但是在德国国内散发的时候当然可能在什么地方会落入警察之手，因此在起草本告同盟书的时候，不得不注意使它的内容不给警察当局抓到用来反对同盟的把柄。因而，中央委员会这一次仅能报告如下情况：

同盟在德国的主要中心是科伦、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哈瑙、美因兹、维斯巴登、汉堡、息韦林、柏林、布勒斯劳、里赫尼兹、格洛高、莱比锡、纽伦堡、慕尼黑、班堡、维尔茨堡、斯图加特、巴登。

关于总区部规定如下：

汉堡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总区部；息韦林为梅克伦堡的总区部；布勒斯劳为西里西亚的总区部；莱比锡为萨克森和柏林的总区部；纽伦堡为巴伐利亚的总区部；科伦为莱茵省和威斯特伐里亚的总区部。

哥丁根、斯图加特和布鲁塞尔的支部在它们还没有能够把自己的影响扩大到可以成立新的总区部以前，暂时跟中央委员会保持直接联系。

同盟在巴登的情况在收到派到那里和瑞士去的特使的报告以后才能弄清楚。

在象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梅克伦堡等存在着农民和雇农

见本卷第367和373页。——编者注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列赫尼查、格洛古夫。——编者注

的协会组织的地方,同盟盟员给了这些协会以直接的影响,甚至把其中的一些组织完全掌握在自己的手里。萨克森、法兰克尼亚、黑森和拿骚的工人和雇农的协会组织大部分也在同盟的领导之下。工人兄弟会¹⁹¹的一些最有影响的会员也是同盟盟员。中央委员会希望所有支部和盟员都了解到,同盟这样影响工人组织、体操团体、农民组织、雇农组织以及其他组织,是有重大意义的,因此各地都应当尽力做到这一点。中央委员会建议各总区部和跟它们保持直接联系的支部在其最近的来函中报告在这一方面的活动情况。

被派到德国并因活动有成绩而获得中央委员会的表扬的特使,在各地专门吸收了一些最可靠的人入盟,并且把发展同盟的任务交给了他们,因为他们比较熟悉当地的条件。坚定的革命分子能否被直接吸收入盟,这要视当地的条件而定。在条件许可的地方,应当把那些适当的和忠实于革命的、但还不了解目前运动的共产主义结果的人组织起来,成立第二种更为广泛的盟员组织。这个第二种组织的成员应把这种联合会看成是纯地方性和区域性的组织,他们必须始终接受同盟的真正盟员和同盟领导机关的领导。借助于这种比较广泛的联合会,还可以保证对农民协会和体操团体的特别巩固的组织上的影响。组织同盟的细节由总区部讨论决定,中央委员会希望不久的将来总区部也提供关于这一问题的报告。

有个支部建议中央委员会立即召开同盟的代表大会,而且要在德国本土召开。各支部和各区部本身可以知道得很清楚,在当前的条件下,甚至总区部的地方代表会议也不是各地都能够召开的,召开同盟代表大会在目前当然是完全不可能的。但是,只要条件许可,中央委员会就在适当地点召开同盟代表大会。科伦总区部的特

使不久前视察了莱茵普鲁士和威斯特伐里亚。但是科伦还没有收到关于视察结果的报告。我们建议所有总区部只要有可能也应当这样派特使视察本区并尽快地报告视察的结果。最后再补充一点，同盟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跟军队接上了关系。有关同盟在那里可能起的影响的详细报告不久即可收到。

三、瑞 士

现在还没有收到特使的报告。因此，比较详细的情况只能在下一次的告同盟书中再报告。

四、法 国

跟伯桑松和汝拉的其他地方的德国工人的联系将通过瑞士重新建立起来。在巴黎，一直担任当地支部领导工作的盟员艾韦贝克已经声明退盟，因为他认为他的文学活动更为重要。因此与巴黎的联系已经暂时中断，在恢复联系的时候，必须更加谨慎，因为巴黎的盟员把一定数量的完全不适当的、甚至直接敌视同盟的人接收到了自己的队伍里。

五、英 国

伦敦区部是全盟最强大的区部。它特别出色的地方是，它许多年来几乎完全担负了全盟的经费和特使的旅费等开支。近来它由于吸收了新成员而更加壮大起来，它一直领导着当地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¹⁹²，同时还领导着当地德国流亡者的最坚定的一派。

中央委员会通过专门派遣的几个盟员跟法国人、英国人和匈

匈牙利人的最革命的政党建立了联盟。

布朗基所领导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从法国革命派参加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了。秘密的布朗基协会的代表跟同盟的代表保持着经常的正式的联系，并把一些迎接即将来临的法国革命的重要准备工作委托给了同盟代表去做。

革命的宪章派领袖们也经常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保持着密切联系。其机关刊物对我们有所帮助。这个革命的独立的工人阶级政党同比较倾向于和资产阶级妥协的以奥康瑙尔为首的一派之间的分裂，由于同盟代表的帮助而大大提前了。

中央委员会跟最先进的匈牙利流亡者政党也保持着同样的联系。这个政党很重要，因为它那里有许多在革命时期可能服从同盟调配的杰出军人。

中央委员会建议各总区部尽快地在自己的盟员中散发本告同盟书并迅速向中央委员会报告工作情况。中央委员会号召全体盟员抓紧目前各种关系极为紧张、新的革命一触即发的时机加紧活动。

1850年夏季印成传单

1885年由弗·恩格斯发表在哥丁根和苏黎世出版的马克思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一书的附录中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普鲁士流亡者
给“太阳报”¹⁹³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最近，我们这些在信后面署名的、侨居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根据情况深信，不仅普鲁士使馆而且连不列颠政府也对我们异常注意。我们不会特别重视这件事，因为我们很难想象我们会怎样来破坏外侨管理法¹⁹⁴中所谓“维护本王国的和平和安宁”的规定；可是，近来我们经常在报上看到关于普鲁士公使奉命坚决要求把最危险的流亡者驱逐出英国的消息，上周我们还仍然受到英国警探的严密监视，因此我们得出一个结论：必须把这件事情公布出来。

毫无疑问，普鲁士政府在尽力争取使用外侨管理法来对付我们。但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干涉英国政治吗？事实证明，我们做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的。那末，究竟是由于什么原因呢？是因为普鲁士政府需要造成一种假象，好象柏林发生枪击国王的事件，是各地阴谋活动的结果，这一阴谋活动的中心似乎必须在伦敦寻找。

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事实的真相。犯了谋杀罪的泽费洛盖(他明

明是个疯人，这一点我且不来谈）是极端保皇主义的团体“忠实者同盟”的成员，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他已列入这个协会的名册，号码是133，属于柏林第二分部，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不久前他还受到这个协会的资助，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拜费洛盖的文件保存在供职于皇家陆军部的一个极端保皇主义者库诺夫斯基少校的家里，普鲁士政府能否认吗？

在诸如此类的事实面前，硬说革命党同这次谋杀事件有什么瓜葛，真是令人可笑。革命党对普鲁士亲王迅速登上宝座毫无兴趣，而极端保皇主义者对此却兴趣昂然。虽然如此，普鲁士政府还是极力想借这次谋杀事件来惩罚激进的反对派，反对出版自由的新法令和伦敦普鲁士使馆的活动就是证明。

同时，我们得声明，大约在这次谋杀事件前的两星期，有些人来找我们（我们相信这些人都是普鲁士的暗探），勾引我们进行杀害国王的阴谋活动。当然，我们没有上当。

如果不列颠政府想得到有关我们情况的任何材料，我们准备随时供给。但是我们不理解，政府通过密探来监视我们，是想了解些什么。

目前在俄国庇护下得以恢复的神圣同盟，如果能够迫使英国——它的道路上的唯一障碍——实行反动的对内政策，是会非常心满意足的。如果英国在产生反俄情绪、发出政府的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的同时只是由于神圣同盟（普鲁士是其不可分割部分）要进行报复而采用外侨管理法，那末又该怎样对待英国的反俄情绪、英国政府的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呢？

我们相信，神圣同盟的各国政府是欺骗不了不列颠政府的，是不会使内政部采取措施的，采取措施就会使得作为各党和各国流

亡者最可靠的避难所的英国的昔日声誉大受损害。

顺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 | 科伦“新莱茵报”编辑
弗·恩格斯 |
奥·维利希 | 巴登起义军上校

1850年6月14日于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

载于1850年6月15日
“太阳报”和1850年6月15日
“北极星报”第660号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和“北极星报”
校对过的“太阳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伦敦的普鲁士密探”一文的附函
给“旁观者”¹⁹⁵编辑的信
(亲启)

亲爱的先生！

我们不揣冒昧请您把这封附函刊载在您的最近一期报纸上。我们完全有根据认为，政府打算采用外侨管理法，通过议会来恢复这个法令。看来，我们首先会成为这个法令的牺牲者。我们认为，为了保持英国民族的荣誉必须不让这种计划实现；同时我们还认为，我们能够用来对付不列颠政府这种步骤的最好办法莫过于公开地诉诸于社会舆论。因此我们希望您不要拒绝公布我们的信件，您的销路很广的报纸无疑是可以提供公布它的地方的。

如果您希望得到今后的消息，我们很愿意供给您；不要请您告诉我们，何时何地我们能同您会面。

顺致敬意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写于1850年6月14日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于1934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后来手稿中删去下列句子：“不列颠政府用来对付我们和在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广阔范围内所实行的密探制度，也是普鲁士公使多次要求……的充分的证明。”——编者注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伦敦的普鲁士密探

亲爱的先生！

我们这些在信后署名的侨居英国的德国流亡者最近根据情况深信，英国政府对我们异常注意。我们见惯了时常碰到的普鲁士使馆的鬼鬼祟祟的官员（“这个职位没有正式登记过”）；我们听惯了这些 agents provocateurs [挑拨者] 的疯狂的长篇大论和恶毒的建议，我们知道怎样对付他们。普鲁士使馆注意我们，我们并不觉得奇怪——我们能受到它的注意，很引以自豪；但是，使我们觉得奇怪的是，普鲁士密探和英国告密者显然是为了对付我们而建立了亲密一致的关系。

编辑先生，我们实在从来也没有想到，在英国还有象我们在短短一周中荣幸地见到的那么多的警探。不仅如此，我们住宅的门旁，还有些样子极其可疑的人经常守望看，他们非常耐心地记下我们的所有访问者的来往情况，我们每走一步都有他们在跟踪。我们无论坐公共马车或进咖啡馆，都至少会有一个这种不相识的朋友跟随而来。我们不知道作这种惬意事情的先生们是否“在御前供职”，但是我们十分了解，他们大部分都是非常不清白和不怎么受尊敬的人。

请问，这群可怜的密探，这些显然按计件工资从最平庸的报

密者当中招募来的最下流的男性卖淫者，从我们门坎旁搜集到的一点点情报，能给什么人带来点好处呢？难道他们得到的情报——当然十分可靠，——竟如此珍贵，甚至为了它竟不惜牺牲英国人感到骄傲的传统（英国人肯定说他们国内不可能实行无论哪个大陆国家也离不开的那种密探制度）吗？

并且，我们一直愿意尽可能提供政府希望得到的有关我们情况的任何材料。

其实，我们非常了解事实的真相。普鲁士政府利用最近谋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事件，来重新掀起一个反对普鲁士内外政治敌人的运动。它企图借助于分明是一个疯子谋杀普鲁士国王的事件，来狡猾地迫使英国政府对我们采用外侨管理法，虽然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住在伦敦怎么会妨碍“维护本王国的和平和安宁”。

约8年以前，我们在普鲁士曾经反对现存的统治方式，当时政府的官员和刊物声明说：“如果这些先生不喜欢普鲁士制度，他们完全可以自由地离开这个国家。”我们来到国外，是有充分理由的。但是，在国外我们也到处碰到普鲁士的阻难；在法国、比利时、瑞士我们都感到普鲁士大使对我们的迫害。如果我们现在由于普鲁士大使的干涉必须离开我们在欧洲最后剩下的这个避难所，那末普鲁士将会认为自己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

到目前为止，英国一直是在俄国庇护下现在得以恢复的神圣同盟的道路上的唯一障碍；而神圣同盟（普鲁士是它的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最卖力气干的事情是要把敌视俄国的英国引上采取多少象俄国式的对内政策的道路。如果完全由于外国反动政府坚持复仇而重新采用外侨管理法，以此作为对于英国政府最近的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的注释，那末，欧洲实际上会怎样设想这

些外交照会和议会声明呢？

普鲁士政府硬说，枪击普鲁士国王是各地广泛革命阴谋活动的结果，这一阴谋活动的中心应当在伦敦寻找。因此，它第一是取消本国的出版自由，第二是要求英国政府把虚构的阴谋活动的虚构的魁首从英国驱逐出去。

如果考虑一下现任普鲁士国王及其兄弟（王位继承人）的性格和个人品质，那末该是谁对后者迅速继承王位最感兴趣，是革命党还是极端保皇主义者呢？

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在柏林谋杀事件的前两星期内，有一些人来找我们，我们有一切根据认为他们不是普鲁士政府的爪牙，就是极端保皇主义者的爪牙，他们几乎公开地建议我们参加在柏林和其他地方组织谋杀国王的阴谋活动。不用说，这些人没有能使我们受骗。

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就是在谋杀事件发生以后，也还有其他的这类人物来纠缠我们，谈过这一类的话。

请允许我们声明一下，枪击国王的泽费洛盖中士不是革命党人，而是极端保皇主义者。他属于极端保皇主义的“忠实者同盟”第二分部，他在盟员名册上的登记号码是133号。有一个时期，他领取过这个同盟的津贴；他的文件保存在供职于陆军部的一个极端保皇主义者少校的公馆里。

如果这个案件能在什么时候开庭当众审讯（我们对此表示怀疑），那末，大家会清楚地看到，这次谋杀事件有没有煽动者，他们是什么人。

极端保皇主义的“新普鲁士报”¹⁹⁶首先急忙来控告伦敦的流亡者，说他们是这次谋杀的真正凶手。它甚至提出后面署名人之一的

名字，早就肯定说他在柏林住了两个星期，但是，有许多见证人可以作证，他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伦敦¹⁹⁷。我们曾经写信给普鲁士大使本生先生，请他把上述报纸的有关的几张寄给我们。可是，这位绅士不会对我们怎么关心，不能使他表现出象骑士¹⁹⁸那样的 *courtoisie* [文雅尚礼的态度]。

编辑先生，我们认为，在这样的情况下最好是把事实全部公布出来。我们认为，一切对于作为各党和各国流亡者最可靠的避难所的英国的昔日声誉有丝毫损害的事情，英国人该是很关心的。

顺致敬意

卡尔·马克思	科伦“新莱茵报”编辑
弗·恩格斯	
奥·维利希	

1850年6月14日于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

写于1850年6月14日

原文是英文

载于1850年6月15日“旁观者”

俄文译自“旁观者”

卡·马克思 给“地球”报¹⁹⁹编辑的信

亲爱的先生！

请允许我通过贵报使大家注意一个事实，这个事实在一定程度上大概要损害不列颠民族的荣誉。

您知道，领导1849年运动的党失败以后，大陆上的各国政府到处把大批的政治流亡者，特别是德国人，匈牙利人，意大利人，波兰人从他们避难的地方驱逐出去，一直到他们最终在英国得到了保护，获得了安宁为止。

在大陆上，一些仇视自己的政治敌人的政府看起来并不满足于这些成果。普鲁士政府就是其中之一。柏林政府达到使大多数普鲁士流亡者都集中在贵国的目的以后，公然企图用各种办法迫使他们迁往美洲。有些政党在本国自己的报纸上（例如“新普鲁士报”和“国民议会报”）把英国政府描绘成反对全欧洲保守派的雅各宾党人和阴谋家的委员会，而现在它们却对英国的安宁表示极为可疑的关怀，向不列颠政府检举这些外国流亡者，硬说他们干涉了英国的政治，参预了谋杀普鲁士国王的事件。

我也是不管到哪里都受到普鲁士政府迫害的那些人中的一个，这使我感到很荣幸。我在1842年曾担任科伦“莱茵报”²⁰⁰的编辑，在1848—1849年曾担任“新莱茵报”的编辑；这两个报纸都

由于普鲁士政府的极力干涉（直接或间接的）而被封闭。在普鲁士大使馆的直接要求和压力之下，我在1845年和1849年被驱逐出法国，1848年被驱逐出比利时，而在1848—1849年我居住在普鲁士的时候，对我大约进行了10次政治控告，但是，在我两次被陪审法庭宣判无罪以后，当局最后还是拒绝审理这个案件。

然而，甚至在贵国普鲁士政府也不放过我。这里有个证明，最近我收到许多警告信，其中说英国政府根据这类的检举，准备采取一些措施对付我。另一个事实也可以说明这点：几天以来有几个人一直站在我的门旁，每当有人进出时都加以记载。其次，“新普鲁士报”的一项报道也可以证明这点：该报不久以前写道，我正在德国各地旅行，曾在柏林住了两个礼拜，但是我的房主人和其他许多英国人都可以证明，自从我去年迁到这里来以后我一分钟也没有离开过伦敦。这个极端的保皇派报纸在神经错乱的泽弗洛盖的谋杀事件发生后把捏造的我到柏林的旅行和这个事件联系起来，其实这个报纸也许更清楚地知道，是谁参预了这件事（如果真是有人参预的话），因为泽弗洛盖是极端保皇主义派的“忠实者联盟”的第二分部的会员，他除了柏林陆军部的参谋官以外从来没有和其他人有过联系。此外，在伦敦出现的进行煽动活动的普鲁士 *agents provocateurs* [挑拨者] 也可以证明这点，他们在泽弗洛盖谋杀事件前两礼拜到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这里宣传这种谋害活动的必要性，甚至暗示柏林在进行这种阴谋活动。他们愚弄我们没有成功，以后他们便开始参加宪章派召集的会议，以便造成一个印象，似乎外国的流亡者都积极地参加英国的宪章派运动。

最后，编辑先生，请允许我向您，并通过您和舆论提一个问题：是否可以，不列颠政府有可能根据这些材料采取一些措施，

而这些措施在不同的程度上会动摇一个普遍的信念，即不列颠的法律对于任何人，任何踏上不列颠国土的人都给予同样的保护？

余不多谈。

写于1850年6月中旬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
列宁主义研究院于1934年
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卡·马克思 致“新德意志报”²⁰¹编辑的声明

在今年6月22日贵报的一篇杂文里，您责备我说，我维护了工人阶级的统治和专政，而您恰和我相反，认为重要的是根本消灭阶级差别。这个修正，使我莫名其妙。

您非常清楚，在“共产党宣言”第16页上（1848年二月革命之前发表的）写道：“如果说无产阶级在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一定要团结成为阶级，如果说它通过革命使自己成为统治阶级，并以统治阶级的资格运用暴力消灭旧的生产关系，那么它在消灭这种生产关系的同时，就消灭阶级对立存在的条件，就根本消灭一切阶级，从而也就一并消灭它自己这个阶级的统治。”

您知道，还在1848年2月之前我在“哲学的贫困”这本书里在反对蒲鲁东的时候也维护了这样的观点²⁰²。

最后，在您批评的那篇文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3期第32页）里我写道：“这种社会主义（即共产主义）就是宣布不间断的革命，就是实现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把这种专政作为必经的过渡阶段，以求达到根本消灭阶级差别，消灭一切产生这

见本卷第104页。——编者注

些差别的生产关系，消灭一切和这些生产关系相适应的社会关系，
改变一切由这些社会关系产生出来的观念。”

卡·马克思

1850年6月

载于1850年7月4日
“新德意志报”第15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德意志报”

弗·恩格斯 致“新德意志报”编辑的声明

在6月22日贵报的一篇杂文里，承蒙您承认由于“新莱茵报”的封闭在德国的日报中出现了“严重的空白点”，但是您反对下述“恩格斯先生的看法”，即“新莱茵报”是唯一不仅在言论上和—些善良的愿望上代表无产阶级的报纸。

在我那篇载于“新莱茵报”杂志第1期上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文章里，我的确说过，“新莱茵报”是唯一不仅在言论上和—些善良的愿望上代表德国无产阶级的利益的报纸。如果您认为这种看法给“新德意志报”，即已故的法兰克福议会的极左翼的官方报纸带来损失，那末，您就指出“新德意志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什么方式代表了德国的无产阶级或它的阶级利益，这样，您无疑会使工人非常感激。

弗·恩格斯

1850年6月25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7月4日
“新德意志报”第15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德意志报”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威塞尔报”²⁰³编辑部的信

在今年6月22日的贵报上刊载了一篇伦敦通讯,其中有如下的一段: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以及奥古斯特·维利希……在‘旁观者’上写道,普鲁士大使馆的密探步步跟踪他们,等等。‘旁观者’在登载他们的冗长的控诉的时候作了如下的简要评论:‘这种人(即政治流亡者)常容易对这类情况发生误解,并且他们的误解有以下两个原因:一是使他们把自己设想得比本来地位更重要得多的虚荣心,一是意识到本身有罪的思想。流亡者对自由主义的和好客的英国政府表示猜疑只能称作是厚颜无耻的行为。’”

不需要特别熟悉英国报纸的腔调和根深蒂固的一般采用的文风,就会立刻发现,任何一家报刊,尤其是文风细腻而俏皮的“旁观者”,都不可能登出在内容上和形式上那样粗暴的普鲁士式的短评。上面援引的硬说登载在“旁观者”上的那个“评论”,全篇都是记者的无耻捏造。在“旁观者”上不仅没有任何这类的评论,而且相反,这个周报的编辑部在刊登我们的声明的这期上作了如下的说明:

“下面发表的这封信的内容是对我们政府的严正的控告。我们只是从这封信的本身来了解这件事情的,不过控告信讲得如此有根有据,如此详细逼真,不能不加以注意。控告的中心内容是伦敦的普鲁士警探(bloodmen)企

图利用外侨管理法来反对德国流亡者的时候得到了支持。”（6月15日“旁观者”第554页）

为什么贵通讯员先生需要这样捏造，从他给本生先生的信中的那些赞美词句就可看出。不过整个方式表现了普鲁士的奸诈。

我们希望您把我们的这一声明刊载于贵报的最近一期上，以便使贵通讯员独自享受他作为那样聪明的谎言制造者的荣誉。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50年7月2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7月1日
“不来梅每日纪事”报
第314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不来梅每日纪事”报

弗·恩格斯

—

德国农民战争²⁰⁴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夏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署名：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1875年版，该版
原文并根据“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的原文和
1870年版校对过

德国农民战争

德意志民族也有自己的革命传统。在历史上德国也曾出过能和他国最优秀的革命人物媲美的人才。在历史上德意志民族也曾表现过坚韧不拔的精神，如果是在一个中央集权化了的国家，说不定会创造出多么伟大的成果。在历史上德国农民和平民所怀抱的理想和计划，常常使他们的后代为之惊惧。

斗争已经过去两年，目前几乎到处出现消沉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把伟大的农民战争中那些笨拙的，但却顽强而坚韧的形象重行展示于德国人民之前，是很合时宜的。自农民战争以来，300年过去了，有些事物也已改变，然而农民战争和我们今日的斗争相去并不甚远，要反对的敌人大部分还是相同的。1848和1849年到处叛变的那些阶级和那些阶级中的某些集团，其实早在1525年就已经是叛徒了，不过当时是在较低的发展阶段而已。如果农民战争中的粗暴行动在近几年的运动中只是散见于奥顿瓦尔德，黑森林和西里西亚的话，那么这无论如何不能说是现代暴动的优点。

我们现在先简单地回顾一下16世纪初叶的德国状况。

德国工业在14和15世纪已有显著的进步。城市行会手工业代替了比较封建的地方性的农村手工业,并为较广大的地区,甚至为较远的市场生产了。粗毛制品和亚麻布的织造此时已成为分布很广而固定的工业部门;就是比较精细的毛织品和亚麻织品以及丝织品也已在奥格斯堡制造出来。除了纺织业以外,还有那些工艺品生产部门也特别兴盛起来了,它们是靠中世纪末期僧侣的和世俗贵族的奢侈生活来维持的,例如金银工,雕刻,雕花,铜版雕刻,木板雕刻,锻制武器,雕制奖章,旋工等等。一系列的发明都各有或多或少的重要意义,其中具有光辉的历史意义的就是火药和印刷术的发明。所有这些发明,都大大促进了当时手工业的发展。商业也以相同的步伐随着工业前进。汉撒同盟²⁰⁵垄断了海上航路100年之久,遂使整个德国北部脱离了中世纪的野蛮状态。就是从15世纪末起,当汉撒同盟已经敌不过英国人和荷兰人的竞争的时候,尽管已有华斯哥·达·加马的发现,从印度到北方诸国的通商大道还是要经过德国。奥格斯堡依然还是意大利丝织品,印度香料和东方国家一切出产物的集散中心。德国南部的城市,尤其是奥格斯堡和纽伦堡,是当时著名的繁华中心。原料的开采同样也相当发达。德

现在已经毫无疑问地证实了,火药是从中国经过印度传给阿拉伯人,又由阿拉伯人和火药武器一道经过西班牙传入欧洲。(恩格斯在1875年版上加的注)

国矿工在15世纪已是世界上最熟练的矿工。城市的繁荣也把农业从中世纪的简陋状态中解脱出来了。不仅耕地面积扩大了,而且染料植物以及其他输入的植物品种也种植起来了,这些植物需要比较细心的栽培,对整个农业起了良好的影响。

然而德国国民生产的高涨仍然还赶不上其他国家生产高涨的步伐。农业远远落在英国和尼德兰之后,工业远远落在意大利,佛来米和英国之后,而在海外贸易中,英国人,尤其是荷兰人却已经开始排挤德国人。人口依然还很稀少。在德国境内,只是在几个工商业中心及其附近地区才有文明可言。就是这几个中心的利益也极为分歧,几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找到共同之点。南部有另外的贸易联系和销售市场,和北部完全不是一回事;东部和西部几乎没有什么往来。没有一个城市象英国的伦敦一样发展成为全国工商业的中心。国内交通几乎只限于沿海和内河航路,以及由奥格斯堡和纽伦堡经过科伦到尼德兰,经过爱尔福特到北方的几条通商大道。远离这些内河和通商大道有若干较小城市,这些城市与大量的贸易往来无缘,继续停滞在中世纪末期的生活条件下而与世隔绝,只需要很少的外来商品,也只输出很少的产品。在农村居民中,只有贵族才能与外界接触,才有新的欲望;农民群众从来不曾超出最邻近的地方关系以及与此相应的地方眼界的范围。

当时英法两国工商业的成长促使整个国家中各种利益联成一气,因而促成政治上的中央集权;在德国,这个过程却只是环绕着一些地方中心按照省区归并成许多利益集团,因而只是促成政治上的分离。紧跟着又因德国被排挤出世界贸易之外,于是这种分

崩离析状态很快就巩固下来了。随着纯粹封建帝国的解体,统一的纽带断了,大采邑领主们几乎变成了独立的诸侯,一方面是许多帝国城市结成联盟,另一方面是帝国骑士们结成联盟,忽而互相对抗,忽而与诸侯对抗,忽而与皇帝对抗。自己对自己的地位认识不清的帝国当局,动摇于帝国的各种分子之间,因而日益丧失威信。帝国当局企图象路易十一那样实行中央集权化,尽管用尽一切计谋和强力手段,除了维系住当时的奥地利世袭土地外一无成就。在这种混乱局面中,在相互交错的无数冲突中,谁最后得到胜利而且一定得到胜利呢?得到胜利的,就是主张保持帝国崩离析状态而却要实行中央集权的人们,也就是主张在地方省区实行中央集权的人们,也就是诸侯们。这些诸侯与皇帝分庭抗礼,皇帝的地位日益变成与诸侯相似的一个诸侯了。

在这些情形之下,从中世纪保留下来的各阶级的状况已经起了根本的变化,新阶级已经在旧阶级之旁形成了。

从高级贵族中出现了诸侯。他们几乎完全脱离皇帝而独立,并已掌握最大部分统治权。他们自行宣战和媾和,拥有常备军,召开省议会,征收赋税。他们已经把很大一部分低级贵族和城市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他们还不断使用一切手段要将其余的帝国直辖城市及男爵领地吞并。他们对于这些城市和低级贵族实行中央集权,而他们对于帝国政权却是反中央集权。他们对内部的统治已是很专横的。他们多半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召集等级会议。他们任意地征课赋税和搜刮金钱;等级会议对征税的批准权很少得到承认,更少见诸执行。就是在等级会议执行征税批准权的时候,诸侯照例总是通过骑士和上层僧侣两个等级而拥有多数,这两个等级都是既免税而又分享税收的。诸侯们由于奢侈生活,宫廷耗费,常

备军以及政府支出日增而需款日急。赋税重担有加无已。城市多半因享有特权的保护而免担此重负；于是整个税赋的重担就落到农民身上了，既落在诸侯们的农庄雇农身上，也落在农奴，依附农以及隶属诸侯的骑士们的佃农身上。在直接税不够用的地方，间接税就实施了；财政上用尽一切巧立名目的办法，以求填满国库漏洞。如果一切都无济于事，再没有什么可资弥补，也再没有帝国自由市愿意借债，那么他们就在币制上使出最肮脏的手法，铸造劣币，强制抬高或降低币价，一切视国库的方便为转移。把城市特权和其他特权出卖，然后又用强力收回，以便再以更高的价钱卖出；利用反对派的任何企图为口实进行各种各样的洗劫和掠夺；所有这一类的事情，都是当时诸侯们司空见惯的谋取收入的财源。司法也是诸侯们经常出卖的一种不可小视的货色。总之，除此以外，当时的臣民还得满足诸侯们的官吏的私欲，实在尝尽了这种“为民父母”的政府的滋味。

中世纪封建等级制度中的中级贵族几乎完全绝迹。中级贵族不是已经上升为独立的小诸侯，就是下降到低级贵族的行列中。低级贵族，即骑士等级，迅速走向灭亡。很大一部分骑士已经完全贫困而只靠从军或任文职为诸侯服务来维持生活；另一部分骑士还对诸侯履行采邑义务而听其调遣；更小的一部分骑士是直属皇帝的帝国骑士。军事技术的发展，步兵作用的日益增大，火药武器的

农奴制和依附农制是德国封建社会中同时存在的两个主要的封建剥削形式。农奴制中有人身依附关系，是最重的封建剥削形式。依附农制略轻，已无人身依附关系，只有物的依附关系。依附农是通过世袭租佃方式附着于封建主土地，但通过物的依附关系所承担的义务还是非常之重，比农奴差不甚多。骑士们的佃农和诸侯们的农庄雇农都不是主要的形式，而且都可能同时就是依附农。——译者注

改善，都把骑士们这种笨重骑兵在军事上的重要作用消除了，而他们的城堡也不再是不可攻克的了。正如纽伦堡手工业者的情形一样，骑士们也由于工业的进步而成为多余的阶层了。骑士等级需用金钱这件事本身对于骑士等级之趋于灭亡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宫墙内的奢侈生活，比武会和庆宴场上的豪华风尚，武器和马匹的价格，都随着社会发展的步伐而增长了，骑士或男爵们的收入来源却很少增加或全未增加。专为洗劫和掠夺而出击，或拦路行劫，以及诸如此类的高贵职业，都日渐变成太危险的事情。他们自己属下的臣民提供的贡赋很难比往日增多。为了应付日益增长的需要，这些尊贵的老爷们不得不采取和诸侯们一样的手段。贵族榨取农民的手段一年比一年巧妙了。农奴们被榨至最后一滴血，依附农们在各种各样的借口和名称之下被加上新的杂捐和贡赋。徭役，地租，杂捐，接租费，死亡税，保护金²⁰⁶等等，都不顾旧契约而任意增加。法庭拒绝受理案件，而且只干受贿敲诈的勾当。骑士们在再也想不出法子榨取到农民的钱财时，就把农民不问青红皂白地投入牢狱，然后再强迫农民把自己赎回。

低级贵族和其余各等级同样地不能和睦相处。诸侯所封的采邑贵族想直属帝国，帝国骑士想保持不受诸侯干涉的独立地位，因此他们都和诸侯不断冲突。僧侣等级当时高傲的形象，在骑士们眼光中，已完全成为多余的等级。骑士们妒羨僧侣等级的巨大庄园，妒羨他们由于独身和教会规章而积累起来的财富。骑士们和城

当时的“强盗骑士”引起城市以及诸侯的痛恨。有许多惯劫的骑士的城堡都被诸侯的或城市所组织的军队进剿捣毁。——译者注

教皇格利哥里七世下禁止娶妻令以前，僧侣封建主可以娶妻，产业常常通过后代继承而脱出教会的掌握。这道令下以后，产业脱出教会掌握的可能性遂断绝。——译者注

市不断发生纠纷,他们对城市负债,他们靠洗劫城市所辖地区,靠抢劫城市商旅,靠在冲突中从城市掳来的人质的赎金过活。金钱问题越是成为骑士等级生死攸关的问题,骑士等级反对其余等级的斗争也越激烈。

僧侣是中世纪封建主义思想意识的代表,他们所感受到的历史转变的影响也不算小。印刷术的发明以及商业发展的迫切需要,不仅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读书写字的状况,而且也改变了只有僧侣才能受较高级的教育状况。在知识领域中也出现劳动分工了。新出现的法学家把僧侣们从一系列很有势力的职位中排挤出去了。僧侣从此也就多半变成了多余的人;他们日益无所事事和愚昧无知的状况使他们自己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他们越是变成多余的人,他们的人数倒越来越多,这是由于他们拥有巨大的财富,而他们还在用一切手段不断增殖财富。

在僧侣中间有两个极其不同的阶级。僧侣中的封建特权阶层形成贵族阶级,包括主教和大主教,修道院长,副院长以及其他高级僧侣。这些教会显贵或者本身就是帝国诸侯,或者是在其他诸侯的麾下以封建主身分控制着大片土地,拥有许多农奴和依附农。他们不仅象贵族和诸侯一样肆无忌惮地榨取自己属下的人民,而且在办法上还更加无耻得多。除了使用残酷的暴力而外,一切宗教上的诡计也都施用了,除了刑具的威吓外,一切驱逐出教和拒绝赦罪的威吓也实行了,此外还滥用忏悔牧师进行一切诡计图谋,总之是要从所属人民身上敲出最后一文钱,以增添教会的产业。伪造文书是这些尊严的人们经常喜用的欺骗手段。虽然他们除通常的封建征课和贡赋而外还要抽取什一税,但是所有这些收入还是不够挥霍。制造灵异的圣象和圣徒遗物,组织超渡礼拜场,贩卖赦罪

符，这些都被用为重重榨取人民的手段，而且在长时期内收到最好的效果。

这些高级僧侣使用修道士来从事政治性的讹诈和宗教性的讹诈，他们的讹诈行为日益推广，他们的修道士娄罗也不断增多。这些高级僧侣以及他们的无数修道士娄罗，正是人们痛恨的对象，不仅是人民痛恨的对象，并且是贵族痛恨的对象。如果他们是直属帝国的话，他们就总同诸侯们过不去。肥硕的主教们、修道院长们以及他们的修道士娄罗们的放荡生活激起贵族的嫉妒和人民的愤怒。人民不得不担负他们这种生活的重担，他们讲的道越是和他们的生活成鲜明对照，人民的愤怒就越大。

僧侣中的平民集团是由农村传教士和城市传教士组成的。他们不属于教会封建特权阶层，不能分享特权阶层的财富。他们的工作，上级不大过问；虽则他们的工作对教会如此重要，可是在当时被重视的程度却远不能和兵营内的修道士娄罗们的警察活动相比拟。因此他们的待遇就坏得多，他们的俸给多半都很微薄。他们都是市民或平民出身，生活情况和群众甚为接近，因此他们尽管身居僧侣职位，还是得到市民和平民的同情。参加当时的运动，在修道士中只是例外，而在他们中间却是很普遍的。他们为运动贡献出理论家和思想家，其中许多人都代表平民和农民说话，为平民和农民的事业而上了断头台。人民对僧侣的憎恨只是在极个别的情况下才涉及他们。

正如在诸侯和贵族之上有皇帝一样，在高级僧侣和低级僧侣之上也有教皇。正如对皇帝要纳“公捐”²⁰⁷，即帝国税，对教皇也要纳一般教会税，而教皇就是从教会税中去开支罗马宫廷的豪华生活费用的。在任何其他国家都没有象在德国——仗恃僧侣人多势

大——征收教会税征收得这样热心和严格。特别是在主教出缺以后新任要向教皇纳上任年贡²⁰⁸时，征收教会税更是热心和严格。随着耗费的增加，敛钱的新花样，如贩卖圣徒遗物和赦罪符，收取庆祝费等等都发明出来了。大宗钱财就是这样年年从德国流入罗马；由此而增的重压不仅加深了人们对僧侣的憎恨，而且激发了民族意识，特别是激起了贵族们的民族意识，贵族们在当时算是最有民族思想的等级。

随着工商业的兴盛，就从中世纪城市最初的城厢市民中发展出3个截然不同的集团。

高踞在城市社会上层的是富贵家族，即所谓“名门望族”。他们都是最富有的人家。据有政府席位以及一切城市官职的全是他们。因此他们不仅管理城市的收入，而且也吞食城市的收入。他们倚仗其财富，倚仗其久经皇帝和帝国承认的贵族地位，以各种方式来剥削城市公社以及隶属于城市的农民。他们用粮食和货币来放高利贷，把各种垄断权据为己有，把公社中共同享用市有森林及牧场的一切权利一步步取消了，并把这些森林和牧场直接用来为自己的私利服务。他们擅自在大路上，桥头上，城门口抽收关税，还抽收其他捐税。他们出卖行会特权，师傅权，市民权，还出卖法庭裁判权。他们对待城郊农民并不比贵族和僧侣宽厚些；刚刚相反，城市派在乡村的官吏们，全都出身望族，他们在征税工作中除了有贵族的残酷和贪婪外还带上一些官僚制度中的严格性。这样搜刮来的城市收入，经管得极其随意。市政会计，其实纯粹是官样文章，也草率和紊乱到了极点；侵吞和亏空成了家常便饭。这个在一切方面都拥有特权、人数较少、靠亲戚关系和利害关系紧密结合起来的阶级，在当时是如何轻易地从城市收入中大量中饱，我

们只消回想一下1848这一年在许多城市管理机构中揭露出的那种侵吞诈骗的现象，就可以明白了。

城市贵族们曾想尽办法，到处使城市公社的权利不发生作用，特别是在财政事项中不发生作用。后来是这些老爷们的欺诈行为太不象话了，各公社才又行动起来，以求至少要监督城市行政。在大多数城市中，公社也确实恢复了自己的权利。但是，由于各行会间斗争不已，由于城市贵族不肯甘休，并且还由于帝国以及与他们联盟的各城市政府的保护，这些名门望族的官爷们很快又在实际上恢复了他们旧有的独占统治地位，有时是靠诡计恢复的，有时是靠暴力恢复的。16世纪初叶在所有的城市中公社都重行回到反对派的地位。

城市中反对名门望族的反对派分为两个集团，这两个集团都很明确地出现在农民战争中。

市民反对派，就是我们今天的自由派的前身，它包括较富裕的市民和中等市民，以及一部分小市民。所包括的这一部分小市民的多少随各地方情况而不同。市民反对派完全是在合法基础上提出要求。他们要求监督城市行政并分享立法权，无论是通过公社大会本身或是通过公社代表（扩大市政会，公社委员会）来实现此要求，都无不可。再则要求对名门望族的豪绅植党加以限制，要求对极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加以限制，这少数家族的专横独断甚至在城市贵族内部都日益显著了。此外市民反对派最多再要求由他们中间的市民来担任几席政府职位。这个反对派有时也有名门望族中有不满情绪的没落分子参加进来，这个反对派在所有正规的公社大会中，在各行会中，都占大多数。市政会的支持者和较激进的反对派合计起来在真正的市民中只占少数。

我们在下面可以看到，这个“温和的”、“合法的”、“富裕的”、“有教养的”反对派如何在16世纪的运动中扮演着和他们的后代门徒——立宪派——在1848和1849年的运动中完全一样的角色，并且取得完全一样的成就²⁰⁹。

此外市民反对派还很激烈地反对僧侣，僧侣们的腐化生活和放荡行为使他们深恶痛绝。他们要求对这些尊贵人士的卑鄙品行加以惩处。他们要求废止僧侣审判权和僧侣免税权，要求普遍地限制修道士的人数。

平民反对派是由没落的市民和没有市民权的城市居民群众构成的。这些没有市民权的群众包括：手工业帮工，短工，在城市发展较低阶段就出现的人数众多的雏型的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一般地是在过去几乎所有的社会发展阶段中都出现的现象，只是发展程度各不相同罢了。在当时的社会里，由于每一种行业，以至每一种生活领域，都成为无数特权把持着的禁地；由于封建社会的崩溃，所以促成无定业无定居的人数大量增加。在所有发达的国家中，流浪者的人数都从来没有象16世纪上半期那么多。这些流浪者，一部分在战争期间参加了军队，另一部分到处行乞，还有第三部分在各城市靠做短工以及其他不属于行会的工作以糊口。所有这三部分流浪者都在农民战争中起了作用：第一部分在镇压农民的诸侯军队中起了作用；第二部分是在农民秘密结社和农民军中起了作用，在这里随时都表现出他们颓废的影响；第三部分是参加城市党派斗争。然而不可忘记，这一阶级的一大部分，即住在城市的这一部分，在当时基本上还保存着纯朴的农民本性，还远没有发展到今天“已开化的”流氓无产阶级的这种卑贱和堕落的地步。

可见当时城市中的平民反对派是由很复杂的成分组成的。它

把旧封建行会社会的没落成分和正在萌芽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尚未发展起来的无产阶级成分结合起来了。一方面是破产行东,这些人由于享有特权而和当时市民社会秩序还血肉相连;另一方面是被迫离乡背井的农民和被辞退的奴仆,这些人还不可能变成无产阶级。介乎二者之间的是帮工,这些人暂时还不能取得正式的社会地位而其生活状况则和无产阶级甚为接近,这是由当时工业情况以及行会特权限制所决定的;但同时也正是由于这种行会特权的关系,这些人差不多都是未来的可以取得市民资格的师傅。这种复杂成分的混合物的党派态度,当然是非常不稳定的,而且是因地而异的。在农民战争以前,平民反对派在政治斗争中不是作为一个党派出现,而只是作为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出现。他们吵吵嚷嚷,一心只想攫取财物,为了得到几桶葡萄酒就可以供人驱使,就是这样做着市民反对派的尾巴。农民的起义才把他们造成党派,而在这时候他们每有举动以及提出要求时又几乎总是视农民为转移——这正是当时城市还深深附着农村的一个明显的证据。一旦他们以独立姿态出现的时候,他们就要求建立城市对农村的手工业垄断,他们就不愿意废除郊区的封建负担而使城市收入减少,以及其他等等。总而言之,随着他们的独立程度他们越来越成为反动的了,他们屈服于他们本身的小资产阶级成分,为最近3年来现代小资产阶级在民主招牌下演出的悲喜剧提供了典型的序幕。

只是在受闵采尔直接影响的图林根和其他某些受他的弟子直接影响的地方,城市平民集团才被卷入整个风暴中,以致其中萌芽的无产阶级成分在运动中比其他一切成分都暂居上风。这一历史片断,乃是整个农民战争的顶点,乃是围绕着农民战争中最伟大的形象托马斯·闵采尔而表演的,可是这段历史只是昙花一现。他们

何以垮得最快,他们的运动何以在其时带有幻想的色彩,他们的要求何以表现得必然非常不明确,这些都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的社会关系里,正是他们这一集团最少有巩固的立足之地。

处于所有这些阶级(平民反对派除外)之下的,就是全民族中大多数被剥削群众——农民。压在农民头上的是整个社会阶层:诸侯,官吏,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和市民。无论农民是属于一个诸侯,或是属于一个帝国直属贵族,或是属于一个主教,或是属于一个寺院,或是属于一个城市,总之到处他都被当作一件东西看待,被当作牛马,甚至比牛马还不如。如果他是一个农奴,那么他就完全听从主人支配。如果他是一个依附农,那末契约规定的法定负担已经压得他透不过气了,可是这些负担还一天天加重。他必须以绝大部分时间在主人的田庄上劳作;剩下来自己支配的有限几个钟头的劳动所得用得用来缴什一税,地租,杂捐,赋税(Bede),远征税(战争税),本邦税,帝国税。农民若不向主人送钱,非但不能娶妻,连死也不行。除常规徭役而外,农民还得为尊贵的主人采集干草,草莓,复盆子,蜗牛壳,驱赶野兽以供打猎,为主人砍柴等等。捕渔和打猎都是主人才可以干的事;如果野兽践踏了农民的庄稼,农民只许眼睁睁地望着。农民的公社牧场和林地几乎到处都被主人强占。主人象处理财产一样任意处理农民的人身,任意处理农民的妻女。主人有初夜权。主人一时高兴,就可把农民投入监牢;在监牢中,正如今天一定有预审推事等看一样,当日一定有刑具等着农民。主人可任意把农民打死,或者把农民斩首。加洛林纳法典²¹⁰中的各章论到“割耳”,“割鼻”,“挖眼”,“断指断手”,“斩首”,“车裂”,“火焚”,“夹火钳”,“四马分尸”等等,其中没有一项没有被这些尊贵的老爷和保护人随一时高兴就用在农民身上。谁来保护农民呢?法庭上坐着

的都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律师,他们深知拿了钱就该办什么事。帝国官场中各等级本来就是靠在农民身上吮血吸髓过活的。

农民们在这样可怕的压迫之下受着折磨,可是要叫他们起来暴动却不容易。他们散居各地,要取得任何共同协议都困难无比。农民世代相传,习于顺从;在许多地区,已经戒绝使用武器;剥削的重担随主人之不同而或轻或重;所有这些情况,都促使农民默然忍受一切。因此我们在中世纪里找得到很多局部性的农民暴动,但是——至少在德国——在农民战争以前全国性的农民暴动却一次也找不到。面对着农民的是诸侯,贵族和城市的有组织的力量,相倚为盟,严阵以待,此种情况一日不变,农民即无可能独立进行革命。农民只有与其他等级联盟才能有胜利的机会;但是既然所有其他等级一齐剥削农民,农民如何去同他们联合呢?

可见16世纪初叶帝国各种不同的等级——诸侯,贵族,僧侣,城市贵族,市民,平民和农民形成一种极其庞杂的人群,他们的要求极其悬殊而又错综复杂。每一等级都妨碍看另一等级,都不免与所有其他等级处在继续不断的明争暗斗中。整个民族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在法国第一次革命爆发时曾经出现过,在目前最先进的国家中也正以更高的发展阶段的形式出现,但在当时德国的条件下乃完全是不可能的事。只有当被所有其余等级剥削的最下层人民——农民和平民——起来暴动的时候,那种分裂为两大营垒的情形才略有可能出现。今天的德意志民族是由封建贵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构成,实远不若当时情况复杂。我们如果回想一下过去两年中这种阶级结构竟闹成什么样的混乱现象,那末对于当时各种利害关系,各种见解和各种企图的搅扰不清,就容易理解了。

二

地方分权状态以及地方各省的独立地位，各省工商业彼此隔绝，交通条件的恶劣，都使得当时如此繁多的等级要归并成较大的集团几乎是不可能的。这种较大规模的归并是在宗教改革时期随着革命的、政治性的宗教思想之普遍传播才开始的。有些等级赞成这些思想，有些等级反对这些思想；所有这些等级把全民集结成（当然只是很费劲地而且勉强地）三大营垒，即天主教派或反动派，路德式的市民改良派，革命派。这次全民大分野并不彻底，而且在第一第二两大营垒中还有一部分成分相同，这是因为从中世纪沿袭下来的大多数正式的等级此时已处于溶解状态中；又因为地方分权状态暂时地使同样的等级在不同的地方走着完全相反的方向。我们在过去几年间还能在德意志见到这么多完全类似的事实，那末在16世纪更加复杂得多的关系中那些等级和阶级之间好象混淆不清的情形就更不稀奇了。

尽管有了最近时期的经验，可是以德意志思想看来，把中世纪送入坟墓的那些斗争仍只不过是激烈的神学上的争论。据我们的爱国的历史学家和聪明的政治家们看来，只要那个时代的人能够对天国事物取得一致的认识，他们就毫无理由去为人间的事物争吵了。这些思想家们习于轻信，他们总是把某一个时代对本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或者把某一个时代的思想家们对那个时代的一切幻想信以为真。正是这一班人把1789年革命看成只不过是

君主立宪制度优于君主专制制度问题的狂热辩论，把七月革命看成只是“神授”君权无法继续的实际争执，把二月革命看成只是要解决“共和制乎？君主制乎？”问题的尝试，诸如此类，不一而足。其实在这许多次大震荡中，每一次都经过了阶级斗争的搏战，每一次都把斗争内容简明地以政治标语的形式写在旗帜上，可是对于这许多次阶级斗争，我们的思想家们甚至今天还莫名其妙哩，虽然关于这些问题不仅来自外国的消息在大谈特谈，而且从成千上万的国内无产者的愤怒的怨声也可听到的。

16世纪的所谓宗教战争也根本是为着十分明确的物质的阶级利益而进行的。这些战争，同稍后时期英国和法国的国内冲突完全一样，都是阶级斗争。如果说这许多次阶级斗争在当时是在宗教的标志下进行的，如果说各阶级的利益、需要和要求都还隐蔽在宗教外衣之下，那末这并没有改变事情的实质，而且也容易用时代条件来加以解释。

中世纪是从粗野的原始状态发展而来的。它把古代文明、古代哲学、政治和法律一扫而光，以便一切都从头做起。它从没落了的古代世界承受下来的唯一事物就是基督教和一些残破不全而且失掉文明的城市。其结果正如一切原始发展阶段中的情形一样，僧侣们获得了知识教育的垄断地位，因而教育本身也渗透了神学的性质。政治和法律都掌握在僧侣手中，也和其他一切科学一样，成了神学的分枝，一切按照神学中通行的原则来处理。教会教条同时就是政治信条，圣经词句在各法庭中都有法律的效力。甚至在法学家已经形成一种阶层的时候，法学还久久处于神学控制之下。神学在知识活动的整个领域中的这种无上权威，是教会在当时封建制度里万流归宗的地位之必然结果。

由此可见，一般针对封建制度发出的一切攻击必然首先就是对教会的攻击，而一切革命的社会政治理论大体上必然同时就是神学异端。为要触犯当时的社会制度，就必须从制度身上剥去那一层神圣外衣。

反封建的革命反对派活跃于整个中世纪。革命反对派随时代条件之不同，或者是以神秘主义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公开的异教的形式出现，或者是以武装起义的形式出现。说到神秘主义，那末大家知道，16世纪的宗教改革和它就有多么密切的关系；闵采尔也从神秘主义中吸取了许多东西。这些异教的一部分是家长制的阿尔卑斯山牧民反对封建关系侵入他们生活中的一种反作用的表现（韦尔登派²¹¹）；一部分是从封建社会生长出来的城市反对封建主义的一种反对派的表现（阿尔比派²¹²，布里西亚的阿尔诺德等等）；一部分是农民们直接暴动的表现（约翰·博尔，皮卡尔第地方的匈牙利牧师²¹³等等）。韦尔登派的家长制异教，就形式和内容看来，都可以看成和瑞士人的暴动一样是要阻碍历史发展的一种反动企图，而且只有地方性的意义，所以这里可以不必谈它。在其余的两种中世纪异教形态中，我们在12世纪已经可以见到后来

阿尔诺德在12世纪初生于意大利的伯利霞。他是法国早期唯名论哲学家阿贝拉德的弟子。1136年他参加伯利霞反对高级僧侣的斗争。他要求僧侣放弃世俗权力，并将财产交与世俗统治者。1146年他在罗马参加城市民主派反对教皇的斗争。1155年他在罗马被判为异端处死。——译者注

约翰·博尔是英国肯特地方的牧师，是罗拉德派出色的宣教者。当时英国农村中传诵着一句话：“当亚当耕夏娃织的时候，谁是贵族？”这句话就是他说的。博尔对农民宣说：“只要一切还不是公有的，人和人之间的差别还没有消灭，庄主仍然还是我们的主人，英国的事情永远也好不起来”。1381年窝特台勒起义时他还在狱中，农民把他从监狱里解放出来，博尔也立即成为起义农民的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被杀。——译者注

的市民反对派和农民平民反对派两大派对立的先兆。这两大派的对立后来使农民战争归于失败。这一对立还继续存在到整个中世纪末期以后。

城市异教——这才是中世纪真正的公开的异教——主要是反对僧侣，攻击他们的富有和他们的政治地位。正如现在资产阶级要求一个 *gouvernement à bon marché* [廉价的政府] 一样，中世纪市民首先要求一个 *église à bon marché* [廉价的教会]。从形式上看来，凡是异教都是反动的，每一种异教能从教会及教条的向前发展中看到的只是变质与堕落；正因为是这种情形，所以市民异教也要求恢复原始基督教的简单教会制度，要求取消独霸的僧侣等级。若要廉价的设施，就得取消修道士，取消高级僧侣，取消罗马宫廷，一言以蔽之，就得取消教会中一切糟蹋钱的事情。这些城市本身就是共和国，虽则还处于君主保护之下。这些城市在对教皇权力进行攻击时，就破天荒第一次以一般形式提出主张：资产阶级统治的正规形式是共和国。城市异教对一系列教条及教会戒律的敌视，一部分可由上述情形来说明，一部分可由当时城市生活条件来说明。为什么城市异教要如此激烈地反对教会戒律例如禁止娶妻令呢？此中道理没有人比薄伽丘透露得更清楚了。代表这一派的主要人物，在意大利和德国有布里西亚的阿尔诺德，在法国南部有阿尔比派，在英国有约翰·威克利夫，在波

薄伽丘（1313—1375）是意大利诗人。他的名著“十日谈”是一部写实小说集，描写1348年黑死病流行时期佛罗伦萨的社会生活。他在此作中也以最深刻隽永的笔锋描写了牧师僧侣的风俗。——译者注

约翰·威克利夫（1320—1384）是牧师，并为牛津大学教授，对物理学，逻辑和哲学都有研究，曾译圣经为英文，主张用民族语言礼拜。他驳斥没有教皇，教会即不能存在的说法，认为教皇无权从英国收取贡物，建议政府没收

希米亚·有胡斯和加里克斯廷派²¹⁴。为什么反对封建制度的反对派在这里只是以反对僧侣的封建主义的反对派姿态出现呢？其中道理很简单，因为各城市都已被承认为等级，因为各城市在反对世俗的封建主义及其特权时，已经能够用武力或在等级会议中居于有力地位去进行反击了。

在此我们已经可以见到，在法国南部，在英国和波希米亚都有绝大部分的低级贵族加入城市一方共同进行反对僧侣的斗争，加入城市异教。这种现象，可以由低级贵族依赖于城市的地位来说明，还可以由低级贵族和城市对待诸侯和高级僧侣时利害一致来说明。这种现象我们在农民战争中还可见到。

另一种异教则有完全不同的性质，这种异教乃是农民和平民的要求之直接表现，并且几乎总是和起义结合着的。这种异教虽然也同意市民阶级异教关于僧侣、教皇权力以及恢复原始基督教教会制度的一切要求，但是它却走得更远。它要求在教区成员间恢复原始基督教的平等关系，并且承认此种关系也是市民社会的准则。它从“上帝儿女的平等”推论到市民社会的平等，甚至已经多少推论到财产的平等。它要求农民和贵族平等，平民和城市贵族及特权市民平等，它要求取消徭役，地租，捐税，特权，它要求至少消除那些最不堪忍受的财富差别——这些要求，都是带着或多或少的明确性提出来的，而且是作为原始基督教义的必然

教会土地。他宣称“国王的王国直接得自上帝而非得自教皇”。他主张简化礼拜仪式，减低礼拜费用，并把教会改革为不依赖任何外国力量的民族组织。他的号召在伦敦市民中很得人心，并成为15和16世纪一切反天主教会的改革者的先声。后来的罗拉德派也是他的信徒们建立的。

即捷克。——编者注

结论提出来的。这种农民平民异教,在封建制度全盛时期,例如在阿尔比派中,还不易和市民异教分别开来,但在14和15世纪就发展成一种与市民异教鲜明不同的党派见解了。在14和15世纪,农民平民异教通常总是完全独立地出现,与市民异教并立。例如在英国在威克利夫运动之外有瓦特·泰勒起义的宣教者约翰·博尔出现,在波希米亚在加里克斯廷派之外有塔波尔派²¹⁵出现。在塔波尔派里甚至已经在神权政治装璜之下出现了共和制倾向,这种倾向在15世纪末16世纪初更由平民的代表人物在德意志向前发展了。

有些神秘主义宗派的狂想就和上述这种异教形式结合着,例如鞭笞派,罗拉德派²¹⁶等的狂想。这些宗派在被迫害时期还继续保持着革命传统。

平民在当时是完全被摒于正式存在的社会之外的唯一阶级。他们处于封建组织之外,也处于市民组织之外。他们既无特权,又无财产,连象农民和小市民那样一点带着沉重负担的产业也没有。他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是既无产业又无权利的。他们的生活和当时制度毫无直接的关系,当时制度完全不理睬他们。他们是封建社会和行会市民社会解体的生动的象征,同时又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最初的先驱者。

从平民的这种地位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平民集团早在当时就不能仅止于反对封建制度和反对特权自由市民,为什么他们——

鞭笞派是以皮鞭自挝的党人,11世纪出现于欧洲,盛行于13、14、15世纪,自意大利传播于法国南部及荷兰等地。鞭笞派宣称身体上所受的痛苦能够赎免罪恶。此派最初在意大利可作反对皇室、增强教会势力的工具,故教会不加反对。15世纪的鞭笞派揭穿僧侣罪恶,要求教会改革,于是就开始被教会迫害了。——译者注

至少在幻想里——甚至已经超出当时还没有出现什么迹象的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为什么这个完全无产的集团早在当时就不得不把一切建筑在阶级对立基础上的各种社会形态所共有的制度、观点、看法认为都有问题。早期基督教中锡利亚式的狂想²¹⁷就和这类想法很容易联系起来。但是如果这种超出不仅是超出现在,甚至是超出未来,那末这种超出只能是蛮干的超出,空想的超出,而在第一次实际试用之后就不得不退到当时条件所容许的有限范围以内来。对私有财产的攻击,对财产公有制的要求,都不得不烟消云散,结果只是成立了一些原始的慈善团体。暧昧的基督教的平等,至多只能成为资产阶级的“法律之前一律平等”。要消灭一切官厅,最后只有变成要建立民选的共和政府。靠幻想来对共产主义所作的预见,在实际上只能成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预见。

这种蛮干的、但是很可以从平民集团的生活状况得到解释的对于以后的历史的预见,最初是出现在德意志,出现在托马斯·闵采尔及其党人里。诚然在塔波尔派里已经存在过一种锡利亚式的财产公有制,但只是作为纯粹军事措施而存在的。直到闵采尔才把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用来表达一个现实的社会集团的要求,直到闵采尔才以一定的明确性把它表达出来;自闵采尔以后,在每一次的民众大骚乱中都出现这种共产主义思想的微光,直到它渐渐与现代无产阶级运动合流为止。这种情形,正如中世纪自由农民反对封建统治者日益加紧束缚的斗争与农奴和依附农为完全打破封建统治而作的斗争合流一样。

在三大营垒中的第一营垒即保守的天主教营垒中,聚集着所有希望维持现状的分子,即帝国政府,僧侣诸侯以及一部分世俗诸侯,富裕贵族,高级僧侣,城市贵族。聚集在市民阶级温和派路德宗

教改革旗帜下的是反对派中的有产分子,大量低级贵族,市民阶级,甚至有一部分希望没收僧侣产业以肥己并欲乘机脱离帝国羁绊而扩大独立地位的世俗诸侯。至于农民和平民则团结在革命派中,其要求与理论都由闵采尔最鲜明地表现出来了。

路德和闵采尔,就理论说,就性格说,就出现姿态说,都各为其党派的十足的代表。

路德在1517到1525这几年间所经历的变化,恰恰就是现代德国君主立宪派从1846到1849年所经历的变化,恰恰就是一切资产阶级党派经历的变化。资产阶级党派总是在领导运动时,一转眼就被站在它背后的平民党派或无产阶级党派抛到后面去了。

当路德在1517年最先出来反对天主教会的教条和制度的时候,他的反对立场根本还没有明确的性质。这种反对立场并没有超出以往的市民阶级异教所提出的要求的范围,可是也不排斥任何更为激进的思潮,它也不能这样做。因为在最初时机它不能不把一切反对派分子团结起来,不能不表现出最坚决的革命魄力,不能不代表迄今所有异教的全部群众来与天主教正宗信仰对抗。我们的自由派资产者恰恰就是这样,在1847年还是革命的,还自命为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还热中于工人阶级解放事业。路德的健壮的农民本性曾使他在活动的最初阶段中以最激烈的口吻大声疾呼:

“如果他们(罗马僧侣)还要继续妄逞狂暴的话,我以为除了国王和诸侯采用暴力,武装自己,讨伐这些流毒于全世界的恶汉,并且不用语言而用武器去制止他们的罪行而外,没有更好的办法和药方去对付他们了。我们既用刀剑惩治盗贼,绞索惩治杀人者,烈火惩治异教,为什么我们不运用百般武器

来讨伐这些身为教皇,红衣主教,大主教而又伤风败俗不配为人师表的罗马罪恶城的蛇蝎之群,并且用他们的血来洗我们的手呢?”²¹⁸

但是早期的这种火一般的革命热情没有维持多久。路德放出的闪电引起了燎原之火。整个德意志民族都投入运动了。一方面农民和平民把他的反对僧侣的号召和关于基督教的自由的说教看成起义的信号,另一方面较温和的市民和一部分低级贵族参加了他的运动,甚至诸侯们也被卷入了这个潮流。农民和平民相信和他们的一切压迫者算账的日子来到了。市民、贵族和诸侯只想打破僧侣的权力,打破罗马的羁绊,打破天主教等级制度,并没收教产而从中渔利。各种派别形成起来了,并各自找到自己的代表人物。路德不得不在各派中有所抉择。他怎样抉择的呢?这位托庇于萨克森选帝侯保护之下的维登堡名教授,这位一鸣惊人声势煊赫而被一团趋炎附势之徒簇拥着的伟大人物毫不踌躇地抛弃运动中的下层人民,倒向市民、贵族和诸侯一边去了。剿灭罗马的号召销声匿迹了。路德的调子改成和平发展与消极抵抗了(见1520年的“致德意志民族的贵族书”²¹⁹等文件)。当路德被胡登招请去贵族密谋反对僧侣与诸侯的中心爱贝尔堡和他本人与济金根见面时,路德回答道:

“我不愿意靠暴力和流血来维护福音。世界是靠语言来征服的,教会是靠语言来维持的,也还是要靠语言来复兴。反基督的人们不是靠暴力取得一切,也将勿需暴力而消亡。”

从路德有了这样的转变时起,更正确些说,从路德较明确地确定了方向时起,就开始了那一场对教会制度和教条何者要保留何者要改革的讨价还价,就开始了那一场令人厌恶的外交手腕、阴谋诡计、妥协让步,其结果就是奥格斯堡告白²²⁰,这也就是由讨价还

价而得的经过改革的市民教会制度的最后定案。这样的买卖,也就是近年来在德国国民议会,妥协议会,宪法审查会议以及爱尔福特议会中以政治形式所进行得那种令人作呕的买卖。官方的宗教改革之庸俗市民阶级的性质在这些买卖交易中表现得最鲜明不过了。

路德如今公然成为市民阶级改良派的代表人物了,他宣传合法的前进,是自有缘故的。多数城市倾向温和的改良了;低级贵族参加温和的改良的越来越多,一部分诸侯也附和了,另一部分诸侯还动摇着。所以温和的改良必获成就,可以说已有保证,至少在德国大部分地区是如此。在继续和平发展的情况之下,其余地区也不能长久抵住温和的反对派的压力。但是任何激烈的震荡都必然促使温和的党派与极端的平民农民派冲突,必然引起诸侯、贵族和一些城市脱离运动,而结果呢,或者是市民阶级党派被农民和平民抛到后面去,或者是所有参加运动的党派一齐被天主教复辟压倒,二者必居其一。资产阶级只要稍微取得一点点胜利之后,就要利用合法的前进来在革命的风波和复辟的风波之间极力顺风转舵,这种情况我们在最近时期中也看到不少的例子了。

在当时的一般社会政治发展情况之下,任何改变的结果都必然有利于诸侯,必然加强诸侯势力。在如此情形之下,市民阶级的改良越是与平民农民的要求分歧,便越要落入改良派诸侯的控制之中。路德自己越来越变成诸侯的奴仆了,而人民也很懂得应该怎么办。人民说,路德也和其他一些人一样,变成诸侯的仆人了,人民在奥拉闵德投石子打他,这就是人民对付他的办法。

农民战争爆发了,其实是在诸侯和贵族绝大部分都信天主教的地区爆发的。爆发之后,路德却来采取调解的态度。路德极力攻

击这些地区的当政者。他认为暴动之起,都是他们施行苛政之过;并不是农民要反对他们,乃是上帝自己要反对他们。另一方面,当然起义也是亵渎上帝的,违反福音的。于是最后他劝告双方让步,进行和解。

但是这样想化干戈为玉帛的调解建议无济于事,起义迅速蔓延出去,甚至把路德派诸侯、贵族和城市所统治的新教地区也卷了进去,很快就冲出了市民阶级“慎重考虑”的改良的范围。闵采尔所领导的最坚决的一股起义者就把大本营设在最靠近路德的图林根。如果再有一些成就,整个德国就会烽火漫天,路德就会被包围起来,也许就会被作为叛徒而用枪刺解决掉,市民阶级的改良就会被农民平民革命的洪流冲倒。此时就没有什么慎重考虑的余地了。在革命的面前,一切旧仇都抛到九霄云外了;和农民暴徒相形之下,罗马罪恶城的奴仆们都成了无罪的羔羊,上帝的驯良儿女;市民和诸侯,贵族和僧侣,路德和教皇都团结起来“反对杀人越货的农民暴徒”²²¹。

路德喊道:“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无论是暗地里也好公开地也好,都应该把他们戳碎,扼死,刺杀,就象必须打死疯狗一样!所以,亲爱的先生们,想办法吧,救效局势吧,无论谁只要力所能及,都来刺杀他们,击毙他们,扼死他们吧。如果你因此而死,那末再没有比你死得其所得了。”绝不可对农民乱发慈悲。谁怜悯那些为上帝所不怜悯的人,为上帝所要惩罚和毁灭的人,谁就是置身于叛徒之列。如果只要农民拿出一头牛来,而其余的牛他们还可以安然享用的话,他们还得好好感谢上帝呢。诸侯们将要从事造反事件中学会认识贱民头脑里想的是什么,这些贱民是只有用强力来统治的。“圣人说:Cibus,onus et virga asino[驴儿只晓得吃草,负重和挨鞭],农民只有满腹糟糠,他们既不听话,又愚蠢,所以他们必须听鞭声和枪声,这样做对他们正合式。我们应当要求一件事,而这件事乃是为他们好,这件事就是:他们乖乖地过日子;要不然的话,那就没有多少可客气的了。那就让他们尝尝枪林弹

雨的滋味吧,否则他们还会干出千百倍的坏事来呢。”

我们以往的社会主义的、博爱的资产者们恰恰就是用的这样的腔调。当无产阶级在三月革命的日子里出来要求共享胜利果实时,他们的谈吐就和上述一模一样。

路德因为翻译了圣经,于是就给了平民运动一个强有力的武器。路德在圣经译本中使得公元最初几世纪的纯朴基督教和当时已经封建化了的基督教形成鲜明的对照,使得一个不知层次重迭的、人为的封建教阶制度为何物的社会和正在崩溃的封建社会形成鲜明的对照。农民们利用这个武器来从各方面反对诸侯,贵族,僧侣。于是路德把这个武器掉转过来反对农民,他从圣经中拼凑出真正的赞美诗来歌颂那些由上帝委派的官方,这是舐食专制君主残羹的臣仆从来还没有一个人能够做到的。神授君权,忍耐服从,甚至农奴制度都由圣经认可了。不仅农民起义,就是路德本人对僧侣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全部反抗活动都在圣经里被否定了,这样,路德不仅把下层人民的运动,而且连市民阶级的运动也出卖给诸侯了。

最近资产者又给了我们许多否定自己过去所作所为的实例,还用得着——列举吗?

现在再拿平民革命家闵采尔和市民改革家路德对比一下。

托马斯·闵采尔约在1498年²²²生于哈茨的施托尔堡。相传他的父亲死在断头台上,做了施托尔堡伯爵淫威之下的牺牲品。闵采尔早在15岁时就在赫尔中学组织秘密团体反对马格德堡大主教,并一般地反对罗马教会。他对当时神学的渊博知识使他早得博士学位,并取得赫尔一个女修道士寺院见习牧师职位。在这里他已是以前非常蔑视的心情来对待教会教条和仪式;在举行弥撒的时候,他把

圣餐酒饼化为基督血肉之词完全省去,而且照路德描写他的话来说,他是以不信教的态度把圣体吃掉了。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世纪神秘主义者,特别是卡拉布里亚人约阿西姆的锡利亚式的著作。据闵采尔看来,约阿西姆所宣告和描绘的千载天国以及对堕落的教会和败坏的世界的审判末日,随着宗教改革以及当时的大震荡而快要到来了。他所宣说的教义在当地周围地区获得巨大同情。1520年他迁至茨威考成为第一个宣说新教教义的牧师。他在这里碰上有锡利亚式狂想的宗派中的一派,这一派悄悄地在许多地区存在着,表面看来它还是个卑微恭顺与世无争的宗派,然而骨子里却包藏着最下层社会对现状的不满而且正在成长为一个反对派,并且这个反对派此时也越来越公开和坚决地在大庭广众之间加强鼓动了。这个宗派就是再洗礼派²²³,是由尼克拉斯·施托黑领导的。他们宣说审判末日和千载太平都临近了,他们有“幻想,有狂热,有预言的灵明”。不久他们就和茨威考当局发生冲突;虽然闵采尔从未无条件地参加这一派,倒是这一派还受了他的影响,但闵采尔挺身而出保卫他们。当局采取坚决行动来反对他们;他们不得不离开此城,闵采尔也和他们一同离去。这是1521年底的事。

闵采尔来到布拉格,和胡斯派余党取得联系,力图在此取得立足之地。但是他的宣言只是使他不得不又逃出波希米亚。1522年他

约阿西姆是12世纪意大利的神秘主义者,他有永久福音的学说。——译者注

施托黑是茨威考的裁缝,以宣传宗教的共产主义著名。闵采尔也受他的影响,认为他了解圣经高出一切牧师之上。1522年施托黑在图林根和闵采尔一同成为农民战争的领袖。——译者注

任图林根的阿尔斯特德城牧师。他在此已开始对礼拜仪式进行改革。路德还不敢做的事他已做起来了。他完全不用拉丁文了,而且在规定的念礼拜日福音书和使徒书信的时候,他也不只念这两部分而是全部圣经都选念。同时他又组织了附近地区的宣传工作。人民从四面八方来归附他,不久阿尔斯特德就成为整个图林根下层人民反对僧侣的运动的中心。

此时闵采尔主要还是神学家,他的攻击对象几乎还只是僧侣。但是他却不象路德此时那样去提倡平心静气地辩论和和平地前进了,他不是这样,他是把路德早期的激烈的说教继承下来了,并号召萨克森诸侯和人民起来用武力对付罗马僧侣。

“基督就说:‘我来并不带来和平而是带来刀剑’。但是你们(萨克森诸侯)要刀剑干什么呢?你们如果要做主的仆役,那末没有别的任务,就是去驱除妨害福音的恶魔。基督十分严肃地在路加福音第19章27节里下了命令:‘把我那些仇敌拉来,在我面前杀了罢’……不要有这种浅陋的看法,认为主的力量应当勿需你们刀剑之助就可做到这件事,果真如此,你们的刀剑就要在鞘中生锈了。凡是违背主的启示的人们,都必须毫无慈悲地消灭掉,就象希西吉亚,居鲁士,约西亚,丹尼尔和伊利亚消灭巴尔的劣僧们一样,否则基督教会就不会回复本来面目。我们必须在收获的时节在主的葡萄园里拔除莠草。主在摩西申命记第7章说过:‘你们不可怜恤不跟从主,事奉别神的人,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象,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我决不怒斥你们!’”²²⁴

但是对诸侯们的要求并无结果,而革命情绪在人民中间却一天比一天增涨了。闵采尔的理想越来越明朗化,也越来越果敢,于是他就坚决地和市民阶级宗教改革分道扬镳,从此之后他就同时是直接以政治鼓动家的姿态出现了。

他的神学哲学理论不仅攻击天主教的一切主要论点,而且也一般地攻击基督教的一切主要论点。他在基督教外形之下传布一种泛神论,他的泛神论和近代推理思考方法²²⁵相当接近,个别地方甚至着了无神论的边际。他既否认圣经是唯一的启示,也否认圣经是无误的启示。照他看来,真正的、生动活泼的启示应是理性。理性是已经存在于一切时代和一切民族之中,而且还要继续存在下去的启示。把圣经同理性对立起来,这就是以文字毁灭精神。因为圣经所宣说的圣灵并非吾人身外之物;圣灵根本就是理性。信仰不是别的,只不过是理性在人身中活跃的表现,因此非基督徒一样可以有信仰。通过这种信仰,通过生动活泼的理性,人人可以有神性,人人可以升天堂。因此天堂非在彼岸,天堂须在此生中寻找,信徒的使命就是要把天堂即天国在现世上建立起来。既无所谓来世的天堂,当然亦无所谓来世的地狱或万劫不复的地狱。当然也就除凡人的邪欲邪念而外无所谓魔鬼。基督也曾和我们一样地是人,他只是先知和师表。他的圣餐其实只是简单的回省宴会,在宴会上大家享用的饼和酒都不必加上任何神秘的杜撰。

近代哲学曾经在一段时期里不得不掩藏在基督教词令外衣之下,闵采尔宣说上述这些教义也同样是多半掩藏在这些基督教词令之下来进行的。但他那极端异教的基本思想到处都从他的著作里透露出来。可以看出,这件圣经外衣在闵采尔这里远不如在近代某些黑格尔门徒那里那么重要。然而在闵采尔和近代哲学之间却隔着300年之久。

闵采尔的政治理论是和他的革命的宗教观点紧密相连的;他的政治理论远远超出了当时的社会政治条件,就如同他的神学远远超出了当时通行的看法一样。正如闵采尔的宗教哲学接近无神

论一样,他的政治纲领也接近于共产主义。甚至在二月革命前夕,许多近代共产主义派别拥有的理论武库还不如16世纪“闵采尔派”的武库那么丰富。闵采尔的纲领,与其说是当时平民要求的总汇,不如说是对当时平民中刚刚开始发展的无产阶级因素的解放条件的天才预见。这个纲领要求立即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早经预言的千载太平之国;建立天国的途径是恢复教会的本来面目并废除与这种似乎是原始基督教会而实际上是崭新的教会相冲突的一切制度。闵采尔所了解的天国不是别的,只不过是没有什么阶级差别,没有私有财产,没有高高在上和社会成员作对的国家政权的一种社会而已。所有当时政权,只要是不依附和不加入革命的,都应推翻,一切工作一切财产都要共同分配,最完全的平等必须实行。为了不仅在整个德意志,而且在整个基督教世界来贯彻这一切,须建立一个同盟。诸侯和贵族都须邀来参加;如果他们拒绝,同盟就须在最初的时机用武器去推翻或消灭他们。

闵采尔随即着手组织这个同盟。他的说教越来越带上更激烈、更革命的性质;除了攻击僧侣而外,他还以同样的慷慨激昂情绪来猛轰诸侯,贵族,城市贵族。他以火辣的笔调刻画出当时的压迫并把他想象中的社会共和平等的千载太平之国和当时的压迫对照起来。同时他写的革命小册子一个接一个地发表出去;他向四面八方派出密使,而自己留在阿尔斯特德及其周围地区进行组织同盟的工作。

这种宣传的第一个成果,是破坏了阿尔斯特德附近梅勒尔巴赫的圣玛丽礼拜堂,这是按照圣诫而行动的:“你们要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象,用火焚烧他们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上帝为圣洁的民。”(申命记第7章6节)萨克森诸侯亲自到阿尔斯特

德来平息这次骚乱,并传唤闵采尔到城堡去。闵采尔在此发表了一段说教,这一段说教是诸侯们从路德这位“维登堡的行尸走肉”(闵采尔给路德的称呼)口里从来没有听见过的。他主张杀掉那些不敬上帝的统治者,特别是那些把福音弄成异教的僧侣和修道士都应该杀掉,他引新约作他的主张的根据。不敬上帝的人都不该有活着的权利,除非得到上帝选民的恩赦。如果诸侯们不消灭这些不敬上帝的人,那末上帝将从他们手里夺去宝剑,因为用剑之权属于全体教徒。诸侯和贵族就是盘剥偷盗的祸首;他们把一切造物,水中的鱼,空中的鸟,地上的植物,通通攫归私有。然后他们却要来向穷人们宣说清规戒律:你不应该偷窃。他们自己却是见东西就拿,见农民和手工业者就掠夺剥削,而农民和手工业者只消误取一丝一毫,就得上绞索,于是路格纳博士就对这一切祈祷一声:阿门。

“穷人仇恨贵族,这是贵族们自己造成的。他们不愿意去掉骚乱的原因,年长月久,关系怎会好呢?呵!亲爱的君主们,要是我主拿着铁杖把这些旧壶破罐横扫一通,该是多么好啊!我说了这些话,会有人说我是大逆不道。是就是吧!”(见威美尔曼“农民战争”第2卷第75页)

闵采尔把这篇说教付印了;他在阿尔斯特德的承印人受到萨克森约翰公爵的惩罚被逐出境,闵采尔自己被迫令将一切著作交付魏玛公爵政府检查。但是他不理会这个命令。他随即把一篇万分激昂的著作²²⁶拿到帝国自由市缪尔豪森付印,在这篇著作里,他要求人民

“把口子打大些,让全世界人都看清楚摸清楚,到底是那些衮衮诸公亵渎神圣把我主上帝变成描画出来的渺小人物。”

俏皮话:《L ügner》——“说谎者”(闵采尔指路德)。——编者注

他用下述的话来结束这篇著作：

“整个世界必须忍受一次大震荡，这是关乎不敬上帝的人垮台而卑贱的人翻身的事情。”

在封面上，“带着铁锤的托马斯·闵采尔”写了一段警句：

“请你注意，我已把话向你讲清楚了，我已把你置于人们和帝国之上，为的是你能去除根，破坏，击溃，颠覆，同时还能去建设，种植。一座反抗王公、诸侯、僧侣而又护卫人民的铁壁已形成了。他们要战就战吧，胜利是惊人的，不敬上帝的强悍暴君一定灭亡。”

闵采尔和路德及其党羽的裂痕久已存在了。路德曾迫不得已承受某些教会改革，这些教会改革都是闵采尔没有事先问他即已实施的。路德抱着温和改良派对较坚决的急进派恼怒和猜疑的心情去观察闵采尔的行动。1524年春闵采尔即已写信给梅兰希通——庸俗不堪而又病魔缠身足不出户的人的典型——指责他和路德都对运动毫无了解。他们只是要以死背圣经字句的方式来戕杀运动，他们的全部教义都只是咬文嚼字。

“亲爱的兄弟们，勿再等待与踌躇，时机已到，夏天已在门前。幸勿与不敬上帝者为友，他们妨害真言发挥全部力量。勿谄媚你们的诸侯，否则你们自身将与他们同归于尽。你们温文尔雅之士，幸勿见责，我实不能不如此。”²²⁷

路德不止一次邀约闵采尔公开辩论，但闵采尔任何时刻都愿在人民面前应战，却毫无兴趣在维登堡大学有偏见的听众面前作神学的争吵。他不愿意“只为高等学校证明神明的力量”。路德果真有诚意的话，就请他运用他的影响去制止对闵采尔的承印人的迫害，取消检查著作的命令，以便论战可以毫无阻碍地在报刊上展开。

在上述闵采尔的革命小册子出现以后,路德就公开出来做告发闵采尔的告密人了。在他印出来的“为反对叛逆的妖精致萨克森诸侯书”²²⁸中他称闵采尔为撒但魔王的工具,他要求诸侯采取措施,将这些煽动叛乱者驱逐出境,其理由是他们不以宣说邪恶教义为满足,他们还鼓吹暴动并以暴力反抗官厅。

8月1日,闵采尔被传到魏玛宫廷在诸侯面前对被告发的叛乱活动作答辩。许多揭发他的事实当场被举出来,原来他的秘密同盟已被发觉,他和矿工农民们的组织的联系也被发觉。当场已有人用充军来威胁他了。他还没有回到阿尔斯特德,就听说萨克森的格奥尔格公爵要求当地把他交出,原来他亲笔写的同盟书信被截获了,他在书信里要求格奥尔格的臣民起来武装反抗福音的敌人。要不是他已经离开了此城的话,市当局就已把他交出去了。

在这期间,农民和平民中日益愤懑的情绪使得闵采尔的宣传活动格外顺利。闵采尔在再洗礼派中找到极其宝贵的伙友一起进行宣传。再洗礼派本来没有确定的教条,只是靠反对一切统治阶级这一共同目标以及再洗礼派的共同象征而结合起来的;他们在生活习惯上是力修苦行,在宣传鼓动上则狂热不倦,勇敢无畏;这一派人越来越多地团结在闵采尔周围。再洗礼派本身的需要和愿望是由闵采尔替他们明确下来,并形成他们的新教义的。他们因为被搜捕的关系,不容有任何固定住所,于是流浪全德,到处讲说他们的新教义。无数的再洗礼派遭受苦刑,被火焚,或死于其他酷刑之下,但是这些密使的勇敢坚毅是无可动摇的;在人民的慷慨迅速增涨的过程中,他们的活动所取得的成就是无法估量的。因此闵采尔从图林根逃跑出来的时候,到处都找得到准备好的立足之地,他随便走向那一方,都有去处。

闵采尔首先来到纽伦堡²²⁹。约一个月以前,此城附近刚刚有一次农民暴动还没有开始就被镇压下去了。闵采尔就在此地暗中进行鼓动;马上就有一些人出来拥护他的肆无忌惮的神学主张,都认为圣经不必有绝对约束力,七种圣礼是无聊的,并且宣称基督也不过是一个人,而世俗官厅的作威作福乃是亵渎上帝的。路德大叫:“看吧,撒但又在此出没了,阿尔斯特德的妖精!”闵采尔把答路德书在纽伦堡付印²³⁰。他率直地指责路德献媚诸侯,指责他虎头蛇尾,扶持反动派。尽管如此,人民仍将获得解放,那时路德博士的处境将如被擒之狐。——这篇文章由当局下令没收了,闵采尔又被迫离开纽伦堡。

闵采尔于是穿过士瓦本到亚尔萨斯,到瑞士,再回到黑森林南部。在这地区,大半是由他的再洗礼派密使促成的起义,爆发已有数月。闵采尔的宣传旅行,显然对人民党派的组成,对人民党的要求能够获得明确的提法,对起义终于在1525年4月全面爆发,都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闵采尔在此次旅行中还在两方面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一方面是对人民,当时人民唯一能领会的语言是宗教的预言,闵采尔就用这种语言对他们说话,起了显著的作用;另一方面是对志同道合的人们,闵采尔能当面和他们畅谈他的最终目的,也起了特别显著的作用。闵采尔早时在图林根即已聚集了一批最坚决的人在自己周围,这些人不仅来自民间,而且也有些是低级僧侣,他就用这一批人去领导秘密组织,此时闵采尔已成为德国西南部整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他还进行了从萨克森,图林根经过法兰克尼亚,士瓦本直到亚尔萨斯以及瑞士边境的组织联系工作,并把下列这些南德鼓动家,大半是革命的牧师,吸收为他的门徒,吸收来作同盟的领导者,如瓦尔茨胡特的胡布马伊埃,苏黎世的康拉德·

格雷贝尔,格利森的弗兰茨·拉布曼,梅明根的沙佩勒尔,莱普海姆的雅科布·韦埃和斯图加特的曼特尔博士。闵采尔本人多半停留在沙福豪森边境的格利森,由此出发巡游赫部和克勒部等地区。惊惶失措的诸侯和统治者到处对这些新的平民异教进行血腥的迫害,因而促使平民派反叛精神更加昂扬,团结更加坚固。闵采尔在德国南部进行鼓动将近5个月之久,并在密谋接近实现的时刻又回到图林根。他要在此亲自领导起义,其详情后面再谈。

可以看出,两个党派首脑人物的性格和行径都恰恰反映出各自党派的态度。路德动摇不定,当运动日益严重时反而害怕,终至投效诸侯。这一切和市民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完全符合;而闵采尔革命的气魄与果断则在平民和农民的最先进的一派中完全再现出来。所不同者:路德只求道出本阶级大多数人的想法和愿望就已满足,因而轻易地在本阶级内拥有了十分广大的群众基础;而闵采尔却远远超出平民和农民的当时直接的想法和要求,并且建立一个只由当时革命队伍中最精锐分子组成的党,这个党既要站在他的理想这样高的水平之上,又要求有他那样的魄力,那末这个党只可能包罗当时暴动群众中极小的少数。

三

胡斯运动被镇压下去以后约50年,处于萌芽状态的革命精神的最初征象就在德国农民间显露出来了。

1476年在维尔茨堡主教辖区已有了最初的农民密谋活动,这是一块经过胡斯战争,“暴政、苛捐、杂税、争斗、敌视、战争、烧杀、逮捕等等”早已弄得一贫如洗,而又继续遭受主教、僧侣、贵族无耻搜刮的地区。一个年轻的牧人兼乐师,尼克拉斯豪森的汉斯·贝海姆,又叫吹鼓手汉斯,忽然以预言者的身分出现于陶伯尔。他说圣母马利亚曾在他面前显圣,圣母叫他把鼓烧掉,不要再为跳舞和邪恶的狂欢奏乐,而要劝告人民忏悔。所以每人都应戒除罪过,戒除尘世虚浮欲念,抛弃一切浮华虚饰,到尼克拉斯豪森去朝拜圣母,以求赦罪。

在这个地方,也就是在运动的第一个先驱者这里,我们已经可以发现中世纪一切带着宗教色彩的起义以及近代任何无产阶级运动初期都具有的那种禁欲主义。这种严格的禁欲主义的风纪,这种摈弃一切人生享乐的要求,一方面是要面对着统治阶级树立起斯巴达式严格平等原则,另一方面又是一个必经的阶段,如果不经过这个阶段,社会的最下层是决不能发动起来的。社会的最下层要发

我们在自己的大事纪里都是沿用齐美尔曼的材料,一则由于我们缺乏国外的充分资料不能完全依靠他的材料,再则这些材料也能完全满足本著作的要求。——恩格斯原注

展自己的革命毅力,要明确自己和社会其他一切阶层对立的地位,要集结成一个阶级,必须从何下手呢?必须把自己还可以和现存社会制度妥协调和的一切完全抛弃;必须把那种使他们备受压迫的生活有时尚堪忍耐的些微享乐,甚至最残酷的压迫也不能剥夺掉的些微享乐,完全抛弃掉。这种平民的和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无论就它的狂热形式或它的内容看来,都和市民阶级的、路德派的道德以及英国清教徒(和独立派²³¹以及更激进的诸教派有别)所传布的市民阶级禁欲主义大不相同;市民阶级禁欲主义的全部奥秘不过是市民阶级的节俭而已。显而易见,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随着下述两种情况的发生而丧失其革命的性质,一方面是随着近代生产力的发展,消费资料无止境地增产,因而使斯巴达式的平等成为多余之事,另一方面是随着无产阶级在社会上的地位日益革命化,因而也就是无产阶级本身日益革命化。因此这种平民无产阶级的禁欲主义就逐渐从群众中销声匿迹,就是在那些坚持此种禁欲主义的宗派徒众那里,也是或者直接流为市民阶级的吝啬,或者流为一种自鸣清廉的美德,然而实际上仍然不过是一种小市民气的、行会手工艺匠式的省吃俭用而已。无产阶级大众既然几乎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拿来抛弃的,所以禁抑之说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向他们宣传了。

吹鼓手汉斯的忏悔说教深得人心;所有的起义预言者都用他的忏悔说教来开始活动。事实上,只有猛烈的振臂一呼,只有突然一下抛弃了全部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才能把毫无联系、散居四方、并且从小就惯于盲目服从的农民发动起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拜的活动开始了,而且迅速扩大了;人民越是大批地涌来,这位年轻的造反者就越加公开地宣布他的计划。他说,尼克拉斯豪森的圣母向他

宣告,从今后不应再有皇帝,亦无诸侯,亦无教皇,亦无其他教会官厅或世俗官厅;人人都应亲如兄弟,靠自己双手劳动为生,不应比别人有更多的东西。一切息金,地租,徭役,赋税,杂税以及其他贡赋和劳役都应永远废止;各处森林,河流,牧场都应自由使用。

人民以喜悦的心情接受了这个新的福音。这位预言者的名声,“我们圣母的使者”,迅速传播远方。朝圣者一批又一批地从奥顿瓦尔德,从美因河,柯赫尔河,亚格斯特河一带,甚至从巴伐利亚,士瓦本,从莱茵河向他涌来。人们辗转传述他所造的奇迹;人们跪倒在他的面前,向他祈祷象对神圣祈祷一样;人们从他的帽子上撕取一丝绒毛,仿佛就象得到圣物和护符一样。神甫们出来反对他了,把他的幻想说成是鬼怪的妖术,把他的奇迹说成是恶魔的诈骗,但是这一切都是枉费心机。信仰的群众急剧增加,革命的教派开始形成,叛逆的牧人的礼拜日说教吸引了4万以上的人集合到尼克拉斯豪森来。

吹鼓手汉斯在群众面前进行了好几个月的说教。但是他的目的决不限于说教而已。他和尼克拉斯豪森的牧师有秘密来往,还和两个骑士有秘密来往。这两个骑士就是孔茨·冯·通费尔特和他的儿子,两人都接受新教义而且预定是所计划的起义的军事领袖。在圣基利安节前的礼拜日,他终于觉得自己的势力已足够强大,于是发出信号。

他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他的说教:“现在你们回家吧,回去仔细想想至高至尊的圣母向你们宣告了什么。下礼拜六,把妇女、小孩、老人们留在家里;你们,男人们,在圣玛加累特节,就是下礼拜六,再到尼克拉斯豪森来。把你们的弟兄和伙伴都约来,有多少约多少。但来时不要拿着朝圣手杖,而要带着兵器和武装,一手拿烛,一手拿剑和矛或戟。到时圣母将要把她要你们做的事向你们宣告。”²³²

可是在农民大批来到之前，主教 的骑兵已在夜间把这位反叛预言者捕获，带到维尔茨堡宫里去了。在指定的这一天，来了3万4000武装农民，但是他被捕的消息使这些农民大为沮丧。绝大部分散去了；较坚定的一部分集结了将近1万6000人，在孔茨·冯·通费尔德和其子米哈埃尔率领之下一同来到宫前。主教用诺言劝说他们回家；但当他们刚刚开始散去的时候，即遭到主教的骑兵的袭击，很多人被捕，两个人被斩首，吹鼓手汉斯本人则被焚死。孔茨·冯·通费尔德逃亡，直到他把全部财产交给了修道院，才许他回来。到尼克拉斯豪森朝圣这件事仍继续了一些时，然而最后也被禁止了。

在这第一次谋反未成之后，德国又保持了较长时期的平静。直到90年代末，新的农民起义和密谋才又开始。

1491年至1492年的荷兰农民起义是在黑姆斯凯克一战中才被萨克森的阿尔勃莱希特公爵镇压下去的；同一时期在士瓦本北部肯普腾修道院辖区农民也进行过起义；1497年前后夏尔德·埃尔瓦领导的弗里西安起义也是被萨克森的阿尔勃莱希特镇压下去的；所有这些起义，我们都不详论了。一则因为这些起义离真正的农民战争的战场太远，再则因为这些起义直到此时为止还都是自由的农民反抗别人要把封建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斗争。我们现在就来叙述为农民战争作了准备的两大秘密结社：“鞋会”和“穷康拉德”。

在尼德兰引起农民起义的那一次物价腾贵，也于1493年在亚尔萨斯促使农民和平民建立了秘密同盟，还有道地的市民阶级反

对派中的人参加这个同盟，甚至有一部分低级贵族或多或少地也同情这个同盟。同盟的所在地是施勒特斯塔特，祖尔茨，丹巴赫，罗斯海姆，舍尔维勒一带的地区。这些密谋反叛的人们要求掠夺和消灭在当时就和现在一样用高利贷吸尽了亚尔萨斯农民膏血的犹太人，要求实行一次犹太50年豁免节把所有的债务一笔勾销，要求取消赋税、杂税以及其他负担，要求取消教会法庭和罗特维尔的（帝国）法庭，要求征税批准权，要求限制僧侣俸给为每人50至60盾，要求废除秘密忏悔，而在每一教区自行选人组成法庭。谋反者们的计划是等到力量足够的时候，就夺取设防的施勒特斯塔特，没收修道院金库和城市金库，并由此城发难，煽动整个亚尔萨斯反叛。预定在发难的时刻要揭出来的同盟旗帜，上面画着一只农民的鞋，有一根长长的皮带，即所谓的 Bundschuh，这就是同盟的符号。从此时起，在以后20年间，农民反叛密谋都以它为象征，并且都用了“鞋会”的名义。

谋反者们常常是在夜间到寂静无人的洪格贝尔格山上开会。会员入会是经过极为秘密的仪式，并且讲明如有背叛行为，将受最严厉的惩罚。尽管如此，临到1493年受难周，正该攻击施勒特斯塔特的时候，事情还是败露了。官方迅速动作起来；许多谋反者被捕获，被严刑拷打，一部分被肢解或斩首，一部分被砍掉手，砍掉指头，放逐出境。一大批人逃往瑞士。

但是“鞋会”经过这第一次的溃败之后并没有消灭。刚刚相反，这个组织还是秘密存在下去，并且很多流散在瑞士和南德的亡命者都变成了密使，这些密使到处发现同样的压迫引起同样的起义情绪，因而就乘机把“鞋会”传播到现今的巴登全境。南德的农民，坚忍不拔，从1493年起，密谋造反，历时30年之久，把他们因住

地分散而造成的种种困难都一一克服，并在无数次溃散，失败，首领被杀之后，总是再接再厉重整旗鼓，直到最后大规模起义的机会来到——这样的顽强坚忍，实在令人敬佩。

1502年斯拜尔主教辖区还包括布鲁赫萨尔地区在内，当时在这个辖区里秘密农民运动已露形迹。“鞋会”在这地区的重整旗鼓工作确实获得巨大成就。大约有7000人被组织起来，以布鲁赫萨尔和魏茵加腾之间的温特尔格罗姆巴赫为中心，其分支在莱茵河下游遍及美因河地带，上游直达巴登侯爵领地。他们的纲领规定：不再向诸侯，贵族，僧侣缴纳任何捐税，什一税，杂税，赋税；废止农奴制度；没收寺院及其他教会产业分给人民，除皇帝一人而外不承认任何其他君主。

这是农民第一次提出收回教产以造福人民和建立统一而不可分的德意志君主国的两条要求。从此时起，这两条要求经常在农民和平民进步集团中一再出现，直到托马斯·闵采尔把瓜分教产的要求转变成没收教产以行财产公有制的要求，把统一的德意志帝国的要求转变成统一而不可分的共和国的要求。

重整旗鼓后的“鞋会”和原先的“鞋会”一样，有秘密的集会地点，有保密的誓约，有入会的仪式，有“鞋会”旗帜，上面写着“上帝的公道至上”。行动计划和亚尔萨斯“鞋会”的计划相似。计划规定，要突然夺取布鲁赫萨尔，那里的大多数居民都入会了，要在这里组成一支“鞋会”军队，并把这支军队派遣到周围的诸侯领地去发挥流动的集合中心的作用。

谋反者中有一人在作秘密忏悔时把计划告诉了忏悔牧师，这个牧师就把计划告发了。各地政府立即采取对策。“鞋会”组织分布之广，从亚尔萨斯各帝国等级以及士瓦本联盟²³³都很震惊一事

即可看出。他们调集军队，大肆逮捕。马克西米利安皇帝，这“最后一个骑士”，颁布了最残忍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们的计谋。农民们曾在各处集合，进行武装抵抗；可是分散的农民队伍终不能持久。谋反者有些被处死刑，有些逃跑了；但因秘密保守得很好，所以大部分会员，甚至包括领袖在内，都还能留在本地或邻近的领主地区里，完全没有受到惊扰。

在这次新的失败之后，又出现一段较长的阶级斗争似乎趋于平息的时期。其实斗争仍在暗中继续着。16世纪最初几年“穷康拉德”已经在士瓦本建立组织，它显然是和四散的“鞋会”会员的活动有联系的；在黑森林区，“鞋会”以单个的小组形式继续存在着，直到10年以后，一个有魄力的农民领袖出来，才将各处线索重行联系起来，组成一个巨大的密谋团体。两个密谋团体前后紧随出现在公众面前，都是在1513—1515这几年动荡时期里的事。在这时期里，瑞士农民，匈牙利农民和斯洛文尼亚农民同时进行了一系列规模巨大的暴动。

恢复莱茵河上游的“鞋会”的人是温特尔格罗姆巴赫的约斯·弗里茨，1502年密谋中的逃亡者，曾经当过兵，是一个在各方面都杰出的人物。他自逃亡以后，曾在波登湖和黑森林之间许多地方逗留过，最后在布萊斯部的夫赖堡城附近的勒亨定居下来，甚至在这里当上了护林尉。关于他如何以此地为据点进行整顿组织的工作，关于他如何巧妙地把各式各样的人拉进组织，法庭侦查文件中都有极为有趣的细节描述。这位标准的密谋家具有外交天才

在今南斯拉夫西北部。——译者注

部是地理区域名称，这个名称在本书第五章将出现多次。布萊斯部是今德国西南角与法国瑞士接壤一片地区。——译者注

和百折不挠的毅力，他能够把极不相同的各阶级的大量的人兼容并蓄地吸收到“鞋会”中来：骑士，僧侣，市民，平民，农民；看来他很可能甚至还把这些入组织到许多种作用悬殊的密谋活动中去。一切可用的分子他都以最审慎最练达的手腕加以利用。除了用较老练的信使化装成五花八门的人奔走全国之外，他还用些流浪人和乞丐供次要的差遣。约斯和乞丐头子们直接往来并通过他们把为数众多的流浪游民全部都掌握起来。这些乞丐头子们在他的密谋中起着重大的作用。这些乞丐头子的模样都非常奇特：有一个乞丐头子带着一个女孩东游西荡，指称女孩脚受了伤，进行乞讨；他的帽子上有8个以上的徽章，其中有“十四救难神”，有圣阿缔里，有圣母等等，此外还带着长的红胡子，一根安上匕首和针的节疤手杖；另一个乞丐头子用圣瓦伦亭的名义化缘，拿着香料和苦艾籽向行人兜售，穿一件灰色长外衣，戴一顶红帽子，帽上有一个特里延特小娃，身旁佩着一把长剑，腰带上有许多小刀和一把匕首；其余那些乞丐头子都故意显露着伤疤，都穿着类似的奇装异服。这些乞丐头子中至少有10人已经讲定了，以2000盾为报酬，要他们在亚尔萨斯，在巴登侯爵领地，在布莱斯都同时放火，并在萨比林区的教堂集市节这一天至少带看他们的2000人到罗森城来听从曾任过雇佣兵上尉的格奥尔格·施奈德尔指挥，攻取此城。在真正的“鞋会”会员之间，一处一处的联络站已经建立起来了，约斯·弗里茨就和他的主要助手施托费尔（夫赖堡人）不断地骑着马巡回各地，并在夜间检阅新入伙的人马。关于“鞋会”在莱茵河上游和黑森林散布情况，法庭侦查文件中有充分材料可以证明；这些材料中还有这个地区的各地的大批会员的名单，并附有各人相貌特征的记录。其中最多的是手工业帮工，其次是农民和

小店主，还有少数贵族，牧师（勒亨镇本镇的牧师就在内），以及失了业的雇佣兵。我们从这些组成分子中已可看出，“鞋会”在约斯·弗里茨领导之下已较前大为发展，城市平民分子已开始起越来越大的作用。密谋的分支组织遍及亚尔萨斯全境，今日的巴登，一直到维尔腾堡和美因河。较大的集会常是在偏僻的山上召开，并讨论会务，例如在克尼比斯等等山上都开过会。首领们的集会往往也约当地的会员以及较远地区的代表参加，这些会都是在勒亨附近的哈特马特山上召开的，“鞋会”纲领的十四条款就是在这里通过的：除皇帝和教皇（关于后者是根据几个人的意见）而外不承认任何君主；取消罗特维尔帝国法庭，限定教会法庭只能过问宗教事项；凡是所付息金已经和本金数相等的，即一概不再付息；利率不得高于5%；自由渔猎，自由放牧，自由伐木；限制僧侣每人只能领一份薪俸；没收僧侣产业和寺院财宝以充“鞋会”军费；废止一切不公平的赋税和关税；在整个基督教世界实现永久和平；坚决对付“鞋会”的一切反对者；征收会税；夺取一个坚固城市——夫赖堡——以作“鞋会”的中心；一俟“鞋会”队伍集结起来，立即和皇帝进行谈判，倘若皇帝拒绝，就和瑞士谈判——以上就是大家一致通过的各点。我们从各点中可以看出，一方面，农民和平民的要求已采取了越来越明确和坚定的形式，另一方面，对温和怯懦分子也不能不作同样多的让步。

预定在1513年夏末秋初开始行动。只还缺“鞋会”会旗，约斯·弗里茨就到海尔布朗去定制会旗。旗上除各种徽号画图之外还有鞋和一行字：“上帝保佑神圣正义事业！”。但是当他不在的时候，留下的人过早地企图袭击夫赖堡，而且事前就走漏了风声；还有宣传上的一些疏忽使夫赖堡政府和巴登侯爵探出线索，最后由于两

个参加者的叛变，全部密谋被泄露了。侯爵，夫赖堡当局和恩集斯海姆的皇家政府 都立即出动警探和士兵；许多“鞋会”会员被捕获，被刑讯，被处死；可是大多数人这一次还是逃脱了，约斯·弗里茨也在内。这一次瑞士政府大力从事迫害逃亡者，甚至还杀了許多人。但是瑞士政府也和它的邻邦一样无法阻止大多数逃亡者继续藏匿在原居留地附近，甚至又逐渐地回来了。在恩集斯海姆的亚尔萨斯政府最为残暴，它下令处很多人以斩首、车裂、四马分尸等极刑。约斯·弗里茨本人多半藏身于瑞士境内莱茵河河岸，但是他常常到黑森林这一边来，从来没有被捕获过。

为什么瑞士人这一次要和邻邦政府联合起来对付“鞋会”会员呢？次年爆发的一次农民起义可作说明。次年就是1514年，该年农民起义在伯尔尼、左洛图恩、琉森爆发，而且结果竟然扫除了贵族政府和贵族制度。除此以外，农民们还争到一些特权。瑞士的这些地方性起义所以会成功，道理很简单，就是瑞士的中央集权情况还远不如德国。农民们在1525年也到处战胜了地方性的统治者，但却被诸侯们有组织的大军击败，而这种大军正是在瑞士不存在的。

和巴登的“鞋会”同时，而且显然和“鞋会”有直接联系，在维尔腾堡形成了第二个密谋组织。档案证明这个组织从1503年起即已存在，但是自从温特尔格罗姆巴赫溃败以后，用“鞋会”的名称过于危险，因此这个组织就取名为“穷康拉德”。它的根据地是霍亨施陶芬山下的雷姆斯河谷，它的存在至少在民间早已不是什么秘密了。乌尔利希公爵政府的无耻压迫和促成1513年与1514

年骚乱的连年饥馑都使入盟的人数扩大；新颁行的酒税、肉税、面包税以及每一盾每年要上一分尼的资本税成了骚乱爆发的导因。朔恩多夫城铸刀匠卡斯巴尔·普雷吉策尔的家是密谋的首领们集会之处，这个城预定要首先夺取过来。1514年春，起义爆发了。3000——说是5000——农民开到城下，但是又被公爵的官吏用温和诺言劝说撤退了。乌尔利希公爵在许诺废止新税之后就随带80骑赶来，而这时由于有了诺言的缘故，一切都已归于平静。他许诺召集省议会来审查一切控诉。但是密谋的首领们深知乌尔利希只不过是在对人民行缓兵之计，只待招募到足够的军队并把这些军队调集在一起，他就要毁约并强制收税。因此他们就在卡斯巴尔·普雷吉策尔的家，也就是“穷康拉德总部”，部署召集一次同盟大会的工作，向各处要求派人来参加，并向各方面派出密使推动这个工作。雷姆斯河谷的第一次起义的成就提高了运动在各地人民中间的威信；文书和密使到处受到欢迎，所以5月28日温特图尔克海姆大会有维尔腾堡所有各地区派来的很多代表参加。大会决议从速继续进行鼓动，一有机会就在雷姆斯河谷发难，并从此地出动把起义向四面扩大。正当德廷根的一个退伍士兵班特尔汉斯和维尔廷根的一个有声望的农民辛格尔汉斯劝导汝拉山的居民加入同盟的时候，起义就从各方面爆发了。虽然辛格尔汉斯被袭击而且被俘了，可是巴克南格，温能登，马克格伦宁根等城都落入与平民联盟的农民手中了，从魏茵斯堡到勃劳贝伦，从勃劳贝伦到巴登边境全部地区都公开暴动了；乌尔利希不得不让步。但是他一面宣布6月25日召集省议会，同时却写信向四邻诸侯和自由市求援平乱，信中说骚乱危及帝国境内所有的诸侯和权贵，而且“有俨如‘鞋会’的举动”。

在这期间，省议会，即各城的代表和许多要求在省议会上也享有席位的农民代表已于6月18日在斯图加特开会了。高级僧侣们还没有到达，骑士们根本没有被邀。斯图加特的城市反对派以及近在咫尺声势逼人的利奥堡和雷姆斯河谷两支农军都支持农民的要求。农民的代表被接受出席议会了，会上决议把公爵手下3个为民痛恨的顾问朗帕尔特、萨姆、洛歇尔罢免惩处，决议由4个骑士，4个市民，4个农民组成一个参事会辅助公爵，决议给公爵固定的薪俸，决议没收寺院和修道院的财产以充国库。

乌尔利希公爵用政变的手段来对付这些革命的决议。他于6月21日率领他的骑士和顾问驰赴杜宾根，高级僧侣们也随即赶到这里。他命令市民们也到这里来，市民们也照办了。于是他就在这里继续举行没有农民参加的省议会。市民们在这里处于军队威胁之下，就出卖了他们的同盟者——农民。7月8日达成了杜宾根协议，这个协议规定公爵的将近100万债务由国家归还，而公爵权力则应受若干限制，可是他从未遵守这些限制；协议用一些空泛言词来搪塞农民，并且以严禁暴动与结社的惩治法令来对付农民。至于农民在省议会中的代表权当然更谈不上了。农民们声讨这种翻案行为，但是公爵自从等级议会承担了他的债务以后又能借到款项了，所以他立即招募军队，而他的邻邦，特别是普法尔茨选帝侯，也派来支援部队。所以到7月底杜宾根协议已被全邦接受而且效忠宣誓也重新作过了。只有“穷康拉德”在雷姆斯河谷进行抵抗；公爵又亲身驰赴该地，几乎被杀。农民营寨在卡培尔堡建立起来了。可是事情拖延下去，大多数起义者都因缺乏粮食而自行散去，残余部分也因为和几个省议会议员达成一个模棱两可的协议而回家了。这时各城市因为自己的要求已经达到，就掉过头来狂热地反对

农民，这些城市甘愿派一些队伍去支援乌尔利希的部队，于是乌尔利希就毁约袭击雷姆斯河谷，把雷姆斯河谷的城市和村镇劫掠一空。1600个农民被捕，其中有16人立即斩首，其余的大多数被判处沉重的罚款以归乌尔利希的财库。很多人长期禁锢狱中。严厉的惩治法令颁布了，禁止重新结社，禁止农民的任何集会。士瓦本贵族组织了一个专门的同盟来镇压一切起义的企图。“穷康拉德”的主要首领们幸而都逃到瑞士，并且大多数都在几年后又从瑞士零散地回家来了。

和维尔腾堡的运动同时，在布莱斯部和巴登侯爵领地也出现了新的“鞋会”活动的征象。6月间在比尔附近曾有起义，但立即被侯爵菲力浦击溃，为首的古格尔-巴斯提安在夫赖堡被捕并被斩首。

就在1514年这一年春天，在匈牙利也爆发了一次全面的农民战争。当时正进行着一次十字军讨伐土耳其的宣传，并且和往常一样，凡是参加十字军的农奴和依附农都可获自由。将近6万人集合起来，由格奥尔格·多札任指挥。他是塞克列人²³⁴，曾在以往的土耳其战争中显露头角，并因此取得贵族地位。但是匈牙利骑士和贵族们都极不愿有十字军讨伐之举，因为讨伐之举不免夺去他们的财产和农奴。他们向一些农民队伍追赶上来，用武力把他们的农奴抢回去，并加以虐待。当这件事在十字军中传开时，被压迫的农民们怒不可遏。两个最热烈的十字军传教牧师，拉弗连齐和瓦尔纳瓦的革命讲演在军中更加激起对贵族们的仇恨。多札本人和他的部队一样痛恨反叛的贵族；十字军变成了革命军队，他亲自来领导这个新的运动。

他和他的农民部队一起驻扎在佩斯城附近的拉柯什原野。最

初在附近村落以及佩斯城郊和贵族一边的武装发生冲突；马上引起了小规模战斗，终至对落入农民手中的贵族们实行西西里的晚祷²³⁵，并把附近的所有城堡全行烧毁。朝廷出面恫吓，但无济于事。在首都城下对贵族实行第一次人民审判完结以后，多札就开始进一步的行动。他把他的军队分为5路。两路被派到匈牙利北部山区，要在此把大家煽动起来暴动并剿灭贵族。第三路由佩斯城的一个市民安布鲁什·萨列雷施指挥，留守拉柯什监视首都。第四路和第五路由多札和他的兄弟格莱哥尔率领向塞格丁进发。

在这期间，贵族聚集佩斯城并向特兰西瓦尼亚都督约翰·扎波略求援。这时萨列雷施带着农民军中的市民阶级分子投敌了，于是贵族便和布达佩斯的市民们一起击溃并消灭了驻扎在拉柯什的军团。大量俘虏都被惨无人道地处决了，剩下的一部分都被割去耳鼻遣散回家。

多札在塞格丁城下战败，转走恰纳德。他在击破了斯蒂凡·巴托里和查基主教统率的贵族军队后占领了恰纳德，并对包括主教和王室司库泰列基在内的俘虏进行了血的复仇，清算拉柯什的血债。多札在恰纳德宣告成立共和国，宣告废除贵族，宣告人人平等和主权在民，然后向巴托里逃据的泰梅施瓦尔进发。但是，正当他围攻这个要塞达两月之久而且获得安东·霍苏率领的一支新军来增援时，在匈牙利北部的两路部队却经过多次战斗被贵族击败了，约翰·扎波略率领特兰西瓦尼亚军队向多札进击。农民队伍被扎波略击溃了，多札本人被俘，并被活活地放在烧红的宝座上炙

匈牙利称作：塞格得。——编者注

罗马尼亚称作：的密索拉。——编者注

烤，他的部下都被强迫来吃他的肉，只有吃了他的肉的才能饶命。溃散了农民被拉弗连齐和霍苏重新集结起来，但是又被击破，所有落入敌人手中的人都被刺死或被绞死。成千的农民尸体沿路挂起，或者挂在一块焦土的村落入口处。据说，战死或被杀的农民有6万人。贵族们作了安排，要在下次省议会上把奴役农民再度定为国法。

同一时期中在“文地什边区”（就是克伦地亚，克莱纳和施梯里亚）爆发的农民起义是由一个“鞋会”一类的秘密团体组织起来的。这个地区惨遭贵族和帝国官吏的搜刮，土耳其铁骑的蹂躏，受尽饥馑之灾，早在1503年就建立了这个秘密团体，并且曾引起起义。这个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农民和德国农民一样在1513年就又举起《stara prava》〔“旧权利”〕的战旗。这一年他们再度接受招安了。在1514年，当他们更加声势浩大地集结起来的时候，由于马克西米利安皇帝声明同意恢复“旧权利”，他们又接受劝告四散回家了。可是1515年春，一再受骗的人民就格外愤激地起来展开复仇战争了。和匈牙利方面的情形一样，各处的城堡和寺院都被捣毁，农民法官将被俘的贵族判罪斩首。在施梯里亚和克伦地亚，钦命将军迪特利希施坦把起义很快就扑灭了。在克莱纳，只是在袭击赖因城（1516年秋）以后又采用了不亚于匈牙利贵族的无耻行为的奥地利式的残忍手段才把起义镇压下去的。

德国农民遭受一连串这样严重的失败以及贵族们这些大规模的残酷镇压之后，就在一个较长时期内蛰伏不动，这是可以理解

文地什就是斯洛文尼亚的别名。克伦地亚和施梯里亚两地都是今奥地利南部接近意大利和南斯拉夫边境地区；克莱纳是今南斯拉夫西北角接近意大利和奥地利边境地区。——译者注

的。然而密谋活动和局部起义都未完全绝迹。1516年“鞋会”和“穷康拉德”的大多数逃亡者都已经回到土瓦本和莱茵河上游来了，1517年“鞋会”在黑森林又完全恢复活动。约斯·弗里茨始终把1513年旧“鞋会”会旗藏在怀里随身带着，此刻又奔走黑森林各地积极活动。密谋活动又重新组织起来。和4年前一样，又讲定要在克尼比斯山上开会。但是秘密没有保持住，政府闻知此事，并采取了坚决措施。很多人被捕被杀，最积极最练达的会员们不得不逃走。约斯·弗里茨也逃走了，这一次他还是没有被抓住，但是大概不久以后他就死在瑞士，因为从此以后就不再有他的消息了。

四

正当第四次“鞋会”密谋活动在黑森林遭到镇压的时候,路德在维登堡发出了席卷一切等级并震撼整个帝国的运动的信号。这个图林根的奥古斯丁派²³⁶提出的论纲就象火花落入火药桶一样,起了点火的作用。骑士,市民,农民,平民,觊觎主权的诸侯,下级僧侣,隐蔽的神秘派,文学界反对派的博学的布尔勒斯加诙谐作家²³⁷,各有图谋,纵横交错,但是路德的论纲一时却成了他们的共同语言,这个共同语言以出人意料的速度把他们团结起来了。这一切反对派分子仓猝形成的联盟虽然没有维持多久,但却突然一下把运动的惊人力量展示出来,而且把运动飞速推向前进。

但是正由于运动发展得这样迅速,运动中包藏着的分裂的萌芽也就不能不很快地发展起来,至少在被激发起来的群众中间由于整个生活地位而直接对立的成分不能不重新回到平常彼此敌对的状态。早在宗教改革的最初几年,各式各样的反对派群众就已经围绕着两个中心向两极分化了;贵族和市民无条件地团结在路德周围;农民和平民还没有看出路德是自己直接的敌人,但也和从前一样形成一个单独的革命的反对派。不过运动在此时已比路德出场以前要普遍得多,深入得多,因而必然引起两个党派之间的尖锐对抗和直接冲突。这种直接对抗很快就表面化了。路德和闵采尔在书刊上和讲坛上展开了斗争;而诸侯、骑士和城市的军队(绝大部分是由路德派或至少是倾向路德的分子组成的),则击溃

了农民和平民的队伍。

早在农民战争以前，贵族即企图以反对诸侯和僧侣来实现自己的要求，这样的企图已经表明参加宗教改革的各种复杂成分之间的利害和要求是如何地分歧。

前面已经讲过16世纪初叶德国贵族处于何种地位。他们正在沦为日益强大的世俗诸侯和僧侣诸侯的附庸。同时他们也看出，正和他们没落的步调一致，帝国政权也在没落，帝国也正在分解成许多独立自主的诸侯王国。他们明白他们的没落和德意志民族的没落是一致的。还须指出，贵族，尤其是帝国直辖贵族，由于他们的军人职业以及他们在和诸侯的关系上所处的地位，乃是直接代表帝国和帝国政权的等级。当时贵族是最有民族意识的等级；帝国政权越强有力，诸侯越弱越少，德国越统一，他们也就越强有力。因此骑士等级普遍地不满意德国的可怜的政治地位；不满意帝国在对外关系上的软弱无力，这种软弱无力的程度还随着皇室通过继承权而把新的省份接二连三地收归帝国版图的情况而日益加深；不满意的德国在德国内部策划阴谋；不满意德国的诸侯勾结外国反对帝国政权。贵族们的一切要求都不免要总合成改革帝国这一要求，而改革帝国就要以诸侯和高级僧侣作牺牲品。进行这个总合工作的人就是德意志贵族理论方面的代表人物乌尔利希·冯·胡登，他是和贵族军事方面和政治方面的代表人物弗兰茨·冯·济金根一起进行这个工作的。

胡登以贵族的名义提出的改革帝国的要求是很明确很激进的。他提出的就是要废除一切诸侯，要将教会主权和产业全部还俗，要建立以君主为首的贵族民主制，大约就象从前的波兰共和国极盛时代的情况一样。胡登和济金根相信，只要把特殊军人阶级

即贵族的统治建立起来，把分裂国家的祸首即诸侯都废除，把僧侣的权力都取消，把德国从罗马教权统治下解脱出来，就可以使帝国重新统一，自由和强盛。

以农奴制为基础的贵族民主制，例如波兰的贵族民主制，又例如被日耳曼人侵占的各国在最初几百年间所存在的那种形式略有不同的贵族民主制，都是属于最原始的社会形态中的一种形态，以后都很自然地发展成为完备的封建等级制度，而封建等级制度显然已经是更高的阶段了。所以纯粹的贵族民主制在16世纪的德国是不可能的事。贵族民主制已不可能建立了，因为在德国已存在着强有力的城市。另一方面，也不可能建立象英国那种使封建等级君主制转变成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的低级贵族和城市的联盟。德国的旧贵族都保存下来了；英国旧贵族却被蔷薇战争²³⁸消灭得只剩下28家，并为资产阶级出身和有资产阶级倾向的新贵族所代替了。在德国，农奴制还依然存在，贵族们的收入财源是封建性的；在英国，农奴制几乎完全废除了，贵族就是单纯的资产阶级地主，其财源是资产阶级性的收入——地租。最后，专制君主的中央集权制，在法国自路易十一以来就由于贵族和资产阶级的矛盾而产生并且日臻完备，而这种中央集权制在德国则绝不可能，因为在德国根本没有或只有极不完备的实行民族中央集权制的条件。

在这种情况下，胡登越努力实际推行他的理想，他必须作的让步也就越多，他的帝国改革计划的轮廓也就必然越模糊。贵族与诸侯周旋，日益显得无能为力，可见得贵族靠自己是没有足够力量完成改革大业的。贵族需要有同盟者，而可能的同盟者只有城市、农民以及声威远播的改革运动理论家。但是城市深深领教过贵族，绝不会信任贵族，绝不肯和贵族建立任何联盟。农民身受贵族

敲骨吸髓的剥削和虐待,理所当然地要认贵族为他们的死敌。那些改革运动的理论家不是跟着市民,诸侯走,就是跟着农民走。贵族们主张帝国改革的主要目的是要抬高贵族的地位,那末他们能够有什么好处许给市民和农民呢?在这种情况下,胡登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在他的宣传文件中绝少提到或绝口不提贵族,城市和农民将来的相互关系问题,他把一切罪恶都归之诸侯和僧侣以及对罗马的依赖关系,并且劝说市民为自身利益计也应在未来的诸侯和贵族的斗争中至少要保持中立。关于废除农奴制以及农民对贵族的负担,胡登都一字不提。

当时德国贵族与农民的关系同1830年和1846年的暴动中波兰贵族与他们的农民的关系完全一样。和现代的波兰的起义中的情形一样,当时在德国只有一切反对党派结成联盟,尤其是贵族要与农民联盟,才能使运动成功。但是恰恰这种联盟在两方面的情况中都是不可能的。贵族既没有到不得不放弃政治特权以及在农民身上享有的封建权利的地步,革命农民也不会根据还很渺茫的希望就和贵族,也就是压迫他们最厉害的这一等级结盟。和1830年波兰的情形一样,1522年的德国贵族已争取不到农民了。除非完全废除农奴制和依附农制,取消一切贵族特权,才有农村人民和贵族联合的可能。但是贵族和一切特权等级一样,丝毫不愿自动地放弃特权,放弃特殊地位,放弃其收入来源的绝大部分。

于是到斗争爆发的时候,贵族毕竟是以孤军与诸侯搏斗。诸侯在过去两百年间不断夺取贵族的地盘,在这一次当然也就轻而易举地制伏贵族,这是早在意料中的事。

斗争过程本身是大家知道的。胡登和早被公认为德国中部贵族政治军事首领的济金根于1522年在兰都组成一个以6年为期的

莱茵、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贵族同盟，声称是为自卫而组织的。济金根一半靠自己筹款，一半靠和附近的骑士联合起来组成了一支军队，他在法兰克尼亚，莱茵河下游，尼德兰和威斯特伐里亚组织了招募兵员和部队增援的工作，并于1522年9月向特利尔选帝侯大主教宣战，开始敌对行动。但当济金根进抵特利尔城郊的时候，他的增援部队被诸侯迅速出兵截断；黑森伯爵和普法尔茨选帝侯都驰援特利尔，济金根不得不退守兰德施土尔城堡。胡登和其余战友竭力求援，可是联盟的贵族被诸侯集中而迅速的行动吓倒，食言不救济金根。济金根身负重伤，然后放弃兰德施土尔，随即死去。胡登不得不逃往瑞士并于几个月后死于苏黎世湖中的乌福瑙岛上。

斗争失败，两位领袖身死，贵族力量作为一个不依附于诸侯的独立集团被粉碎了。从此以后，贵族只得为诸侯服务和听从诸侯指挥。此后不久即爆发的农民战争迫使贵族更深地投入诸侯直接的或间接的庇护之下，同时也证明了德国贵族宁肯在诸侯统治之下继续剥削农民，却不愿意公然和解放了的农民结盟来打倒诸侯和僧侣。

五

自从路德对天主教会等级制度宣战，把德国一切反对派分子都发动起来的时刻起，没有一年农民不起来照样重提自己的要求。从1518到1523年在黑森林和士瓦本北部，地方性的农民起义接踵而起。自从1524年春天以后，这些起义都带有系统性了。这一年4月马赫塔尔修道院的农民拒绝徭役和贡赋；5月圣布拉济延农民拒绝履行农奴义务；6月梅明根附近的施泰茵海姆农民宣告不愿缴纳什一税以及其他赋税；7月和8月图尔郇农民起义，但是一则由于苏黎世人的调停，再则由于瑞士当局处决了很多人，进行残酷镇压，起义又被平息下去。最后在伯爵领地施图林根爆发了一次更为坚决的起义，这次起义简直就可算作农民战争的开始。

施图林根农民突然拒绝向伯爵缴纳贡赋，集合成强大队伍并在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下于1524年8月24日开往瓦尔茨胡特。他们在此和市民联合创立了一个新教兄弟会。这些市民所以很愿意促成此种联合，是因为他们当时正在反对奥地利边区政府²³⁹对他们的牧师巴尔塔扎尔·胡布马伊埃进行宗教迫害，此人乃是托马斯·闵采尔的友人兼弟子。这个同盟组织规定每星期要收3个克里泽的盟捐，就当时币值论是巨大的数目，还派遣密使到亚尔萨斯，摩塞尔，整个莱茵河上游以及法兰克尼亚去到处吸收农民入盟，宣告同盟的目标是要消除封建统治，破坏所有城堡寺院，消灭除皇帝一人而外的一切统治者。盟旗是德意志三色旗。

起义迅速蔓延今巴登北部全境。士瓦本北部贵族恐慌万状，他们的兵力几乎全部在意大利正与法国弗朗斯瓦一世作战。他们无计可施，只好借谈判迁延时日，一面筹款招兵，以待力量充足时即以“烧杀掳掠”²⁴⁰来惩戒无法无天的农民。从此时起，那种周密策划的反复行为，那种背信食言，阴谋诡计，就已开始了。贵族和诸侯在整个农民战争期间都是以玩弄这些手法而著称的，而这些手法也是他们对付散漫而难于组织起来的农民的最厉害的武器。德国西南部的诸侯，贵族和帝国城市结成的士瓦本联盟出面斡旋，但却没有对农民保证作任何真正的让步。农民还继续行动。从9月30日到10月中，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穿过黑森林到达乌拉赫和福特万根，把他的队伍扩增至3500人，并以这支队伍在埃瓦廷根（距施图林根不远）布防。贵族可以调动的不过1700人，而这1700人还是四分五裂的。贵族被迫进行停战谈判，果然在埃瓦廷根营地达成停战协议。贵族答应与农民订立善意的条约，或者直接由双方订立，或者通过仲裁法庭来订立；还答应由施托卡赫地方法院来审查所有的申诉。贵族军队和农民都解散了。

农民一致协议定出十六条款，准备要求施托卡赫法院同意。这些条款都很温和。他们要求废止狩猎权和徭役制，要求取消沉重的赋税和一般的领主特权，要求保障免遭任意逮捕，保障不受法庭的不公平的任意审判的侵害——此外就不再要求什么了。

可是，农民一回到家里，贵族又要求他们继续履行全部在争议中的义务，直到法院作出决定。农民当然拒绝这个要求，并要这些领主到法庭去解决这个问题。斗争重新开始。农民又集合起来，诸侯和贵族也集中了他们的军队。这次运动又扩大了，超出布莱斯部之外深入到维尔腾堡地区。瓦尔德堡的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就

是农民战争中的阿尔巴，他统率的军队监视农民，袭击个别增援队伍，但不敢进攻主力。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和农民首领进行谈判并且还零星地达成了一些协议。

12月底施托卡赫地方法院开始审理案件。农民对法庭全由贵族组成提出抗议，而他们所得到的回答是，宣读了一份皇帝的诏书²⁴¹。审理拖延时日，而贵族，诸侯，士瓦本联盟当局都在这期间休整备战。此时斐迪南大公除统治着当时还是奥地利的世袭领土外还统治着维尔腾堡、巴登黑森林和亚尔萨斯南部，他下令用最残酷的手段对付造反的农民。他下令要对农民加以拘捕，严刑拷打，定杀无赦，用尽一切方法消灭他们，要把农民的家业烧毁，要把农民的妻小逐出本地。由此可见诸侯和贵族是如何实行停战，而他们所了解的善意的调停和审查农民的申诉究竟是什么了。斐迪南大公从奥格斯堡富豪威尔塞家族借来款项，急速地整顿军备；士瓦本联盟还规定要分3期募齐捐款和兵员。

以上这些起义恰恰发生在托马斯·闵采尔在南方高原地区²⁴²逗留的5个月期间。关于他对运动的爆发和进程曾有影响这一点，固然没有直接的证据，但是这种影响间接地完全可以证实。农民中较坚决的革命家多半都是他的弟子，都拥护他的理想。当时的人都认定“十二条款”和高原地区农民的“书简”（Artikelbrief）都出自闵采尔之手，其实至少十二条款肯定不是闵采尔制订的。闵采尔在回图林根的途中还发出一个坚决革命的文告给起义的农民²⁴³。

这时自从1519年起就被逐出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公爵也想借

阿尔巴是尼德兰属西班牙时西班牙派来压迫尼德兰人民的统治者。——译者注

农民之助实现他的夺回本邦疆土的阴谋。他自被逐以来就力图利用革命派并且不断支持革命派,这确是事实。从1520到1524年间在黑森林和维尔腾堡发生的大多数地方性骚乱中都有他的名字搅在里面,而这时他却准备从他的霍恩特威尔城堡出发直接向维尔腾堡攻击了。不过他只是被农民们利用,对农民从来没有影响,更谈不到取得农民的信任。

这个冬季就这样过去了,两方中没有一方能够采取任何决定性的步骤。诸侯老爷们不敢轻举妄动,农民起义却正扩大影响。1525年1月,多瑙河,莱茵河,雷赫河之间的整片土地上群情激昂,2月,风暴就爆发了。

正当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统率的黑森林-赫部农军和维尔腾堡的乌尔利希一道起事并且还有一部分人参加了他劳而无功的向斯图加特进军的时候(1525年2—3月),2月9日,农民就在乌尔姆城附近的里德起义了。他们集结在巴尔特林根附近一个由沼泽掩蔽着的营地,树起红旗,组成巴尔特林根农军,由乌尔利希·施米特领导。这支农军有10000—12000人。

2月25日在舒森,由于谣传军队正开来对付也在此地出现的不满分子,上阿尔部农军就在此集结起来了,共有7000人之多。肯普腾人民在整个冬季都与他们的大主教争执不休,也于2月26日集结起来加入他们的队伍。梅明根和考夫拜伦两城有条件地参加了运动;可是城市在这个斗争中所持的暧昧态度,在此已经暴露出来。3月7日12梅明根条款在梅明根被全部上阿尔部农民接受了。

湖军是在接到阿尔部农民的通知后由艾特尔·汉斯领导在波登湖建立的。这支湖军也很快地扩大了。指挥部在伯马廷根。

在下阿尔部，在奥克先豪森和谢伦堡地区，在策伊尔和瓦尔德堡地区，在特鲁赫泽斯领地，农民也起义了，而且早在3月初就发动了。这支下阿尔部农军有7000人之众，驻在乌尔察赫附近。

这4支农军都接受了梅明根条款，这个梅明根条款比赫部农军的条款还要温和得多，而且在牵涉到武装农民对贵族和政府的态度各点上，也表现得显然缺乏果断。农民有时也有的一点果断，都是在战争过程中，当他们对敌人的手法有了一些领会之后，才表现出来的。

与这些农军同时，在多瑙河建立起第六支农军。农民从乌尔姆直到多瑙维特的整片地区，从伊勒，罗特，比伯尔几条河谷来到莱普海姆，并在此建立了营寨。15个地方的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来了，从117个地方派来了增援部队。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是乌尔利希·雪恩，他的讲道牧师是莱普海姆牧师雅科布·韦埃。

所以在3月初，士瓦本北部6处营寨约有3万至4万起义农民武装起来了。这些农军的品质是很复杂的。革命派——闵采尔派——在各军中都只占少数。这一派人数虽少，可是在各处都形成农民阵营的核心和骨干。农民希望以威胁态度去迫使贵族让步；只要贵族对农民保证让步，农民群众总是愿意和贵族达成协议。再则当事情旷日持久而诸侯军队又迫近的时候，他们就不再恋战，而那些手中还有些东西怕受损失的农民大半就跑回家去了。此外还有到处流浪的流氓无产阶级大批加入农军，这些流氓无产阶级分子败坏纪律，败坏农民士气，而且经常是说来就来，说走就走。就此已足以说明为什么农军一开始就各处都只取守势，各营寨都士气低沉，说明这些农军即使撇开他们战术的缺陷和良将稀少两点不论也绝对不是诸侯军队的敌手。

还在农军进行集结期间，乌尔利希公爵就带着募集的军队和一些赫部农民从霍恩特威尔向维尔腾堡袭击。如果农民此时从另一方面进攻瓦尔德堡的特鲁赫泽斯·冯的军队的话，士瓦本联盟就完了。但是由于农军只取守势，特鲁赫泽斯竟能立即和巴尔特林根农军，阿尔部农军以及湖军协议停战，进行谈判并订期于 Judica（鸠迪加）礼拜日（4月2日）²⁴⁴这一天解决此次事件。在这期间他就能够进击乌尔利希公爵，占领斯图加特，并迫使乌尔利希公爵于3月17日就已重行撤离维尔腾堡。然后他回师直指农民，但是在他自己的军队中的雇佣兵竟抗命拒绝进击农民。特鲁赫泽斯对哗变士兵加以安抚，稳定了军心，于是将军队开往乌尔姆，在乌尔姆搜集新的支援力量。他派了一支监视部队留守在特克河附近的基尔赫海姆。

士瓦本联盟终于抽出手来并纠集了它的第一批各方分摊的兵员，于是抛弃假面具，宣称它“决心依靠武器和上帝的帮助来对付农民们的无法无天的举动”²⁴⁵。

在这期间农民们严格遵守停战协议。他们为 Judica 礼拜日的谈判拟定了他们的要求，即有名的“十二条款”。他们要求由公众来选举和罢免僧侣，废止小什一税，并将大什一税²⁴⁶除了支付传教士俸给之外其余数目都用于公共事业，废除农奴制、渔猎特权与死亡税，限制过分的徭役、赋税与地租，归还强占公众及个人的林地、牧场与特权，消除司法及行政工作中任意妄为现象。由此可见在各农军中温和妥协派还大占优势。革命派以前在“书简”中早已提出纲领。这封致全体农民的公开书简要求全体农民加入“基督教同盟与兄弟会”，要求他们或者通过和平手段——“这大概是办不到的”，或者通过暴力来取消一切负担。书简还用“世俗的斥

革”来威胁所有拒绝加入的人，这就是说，谁拒绝加入就和谁断绝社交，断绝他和同盟成员的一切来往。所有的宫城、寺院和教堂都须同样要按照世俗的斥革的要求来处理，除非贵族、僧侣和修道士们自动离开这些地方，和其他的人们一样迁住普通房屋并且还加入基督教同盟。这项激烈的宣言显然是在1525年春起义之前拟定的，它的主题就是革命，就是打倒现存统治阶级，而“世俗的斥革”仅意味着压迫者和叛徒应该处死，城堡应焚毁，寺院教堂没收，其所藏财宝均须换成现金。

然而在农民还未及把十二条款提交指定的仲裁法官之前，他们已听到士瓦本联盟毁约而且军队已经迫近的消息。他们立即采取措施。阿尔部人，巴尔特林根人和湖军农民在盖斯伯伦召开了一次大会。4支农军混合起来，改编成4个纵队，还决议没收僧侣财产，变卖他们的财宝以充军费，焚毁他们的城堡。于是“书筒”也和正式的十二条款一起成了他们指导战斗的准则，而约定要来缔结和约的 Judica 礼拜日却成了总起义的日期。

各处群情日益激昂，农民和贵族之间的地方性冲突继续不断的发生，6个月来在黑森林的暴动日益扩大并且蔓延到多瑙河地区和雷赫河地区的消息，这一切就足够说明何以在德国^{2/3}地区农民暴动会迅速地接二连三地发生。同时，所有各处的暴动同时发生这一事实就证明领导运动的人们就是通过再洗礼派以及其他密使来组织运动的那些人们。在维尔腾堡地区，在尼喀河下游，在奥顿瓦尔德，在下法兰克尼亚和中法兰克尼亚都是在3月后半月就已爆发骚乱了；而各处都是在事前就已指定4月2日这个 Judica 礼拜日为总暴动的日子，各处都已在4月的第一星期里实行决定性的出击，实行群众起义。阿尔部农民，赫部农民，湖

军农民也于4月1日用敲警钟和群众大会的办法把所有有作战能力的男人都召集入营，并和巴尔特林根农民同时对各城堡和寺院展开敌对行动。

在法兰克尼亚，运动集中在6个中心，在4月的最初几天里各处都爆发起义。在诺德林根城附近这时建立起两处农民营寨，城里的革命党派以安东·福尔奈尔为首领借农民之助而取得上风，福尔奈尔被任命为市长，还使这个城市参加了农民的行动。在安斯巴赫地区农民从4月1日至7日到处起义，起义还从这里蔓延到巴伐利亚去。在洛腾堡地区农民从3月22日起就已拿起武器；洛腾堡城里名门望族的统治于3月27日被斯蒂凡·冯·门钦根所领导的小市民和平民推翻了；但是由于农民的赋税恰恰是这个城的主要财源，所以新政府对农民的态度是动摇和暧昧的。在维尔茨堡教会²⁴⁷辖区内，农民和各小城市在4月初普遍都暴动起来了；在班堡主教辖区内，总暴动在5天之内就迫使主教屈服了。在北方，在图林根边境，也集结成强大的比尔德豪森农民阵营。

在奥顿瓦尔德，风暴在3月26日就已爆发，这里的革命派首领是文德尔·希普勒和格奥尔格·梅茨勒。希普勒是一个贵族，曾任霍根洛埃伯爵的总管，梅茨勒是克劳特海姆附近的巴伦堡的旅店主。农民从四面八方奔向陶伯尔河。从洛腾堡郊外营寨来的2000人也加入了。在各地援军都到齐以后，就由格奥尔格·梅茨勒统领全军于4月4日向雅格斯特河畔的雪恩塔尔寺院进军，尼喀河谷的农民也到此地来加入他的队伍。尼喀河谷农民是由海尔布朗附近的伯肯根的旅店主叶克来恩·罗尔巴赫领导的，他们于Judica 礼拜日在弗莱恩、藏特海姆等地宣告暴动。同时，文德尔·希普勒率领一批党羽袭取艾林根，并把四周农民都吸引到运动中来了。在雪恩塔

尔，有两支农民纵队接受了十二条款，并正向各城堡及寺院组织攻击行动，这两支农民纵队合并组成华美军。华美军约8000人兵力，有炮和3000支枪。法兰克尼亚的一个骑士弗洛里安·盖尔也加入华美军并且组成黑军，这是一支主要是从洛腾堡和艾林根地方团练中征集来的人组成的精锐部队。

维尔腾堡官方派驻尼喀苏尔姆的长官，路德维希·冯·黑尔芬施太因伯爵开始了敌对行动。他把落到他手中的农民不问青红皂白一律处死。华美军向他进击。黑尔芬施太因杀人如麻，以及刚刚来到的莱普海姆农军败北、雅科布·韦埃被杀、特鲁赫泽斯的残暴等消息，使农民怒不可遏。黑尔芬施太因避走魏茵斯堡，即在此地遭受攻击。城堡遭到弗洛里安·盖尔猛攻，此城经苦战之后被攻下，路德维希伯爵与许多骑士一起被俘。第二天是4月17日，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和农军中最坚决的一些人一道审讯这些俘虏，并判处其中14人，叫黑尔芬施太因排在前列，驱赶他们从刺杀着的梭镖行列中走过。这种最侮辱的死法就是黑尔芬施太因过去对待俘虏们用的办法。魏茵斯堡被占领以及叶克来恩在黑尔芬施太因身上所施的恐怖报复手段都对贵族们起了作用。勒文斯坦伯爵们参加了农民联盟；霍根洛埃的伯爵们早就参加了，可是还没有出过力，也立刻把要他们供应的大炮和火药送来。

首领们商量是否要拥圭茨·冯·贝利辛根为领袖，“因为他可能把贵族们拉到他们这一边来”。这个建议获得赞同，而弗洛里安·盖尔在农民和首领们的这种情绪中看出反动的萌芽，于是带着他的黑军脱离华美军，自奔前程，最初是流动在尼喀河流域，后来又流动在维尔茨堡地区，到处捣毁城堡和僧侣巢穴。

于是剩下的农军就首先向海尔布朗进发。在这个强大而自由

的帝国城市里，和几乎所有的城市的情形一样，和名门望族对峙的是市民的反党派和革命的反党派。这个革命的反党派和农民有秘密谅解，他们在一次骚乱过程中于4月17日就已打开城门迎接格奥尔格·梅茨勒和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农民领袖们带领他们的人占领了此城；此城被吸收入兄弟会，并提供了1200盾现款，还提供了一队志愿军。只有僧侣们和条顿骑士团²⁴⁸的产业遭到洗劫。22日，农民们留下少数留守部队之后又撤走了。海尔布朗被指定为各地农军联系中心，事实上各地农军也派来代表，商量共同行动和共同要求。但是市民反对派和自从农民进城以来就与市民反对派结成联盟的名门望族此时又在城里占居上风，他们对任何坚决的步骤都加以阻挠，只等待着诸侯军队的到来，以便最后明目张胆地出卖农民。

农民向奥顿瓦尔德进发。4月24日，圭茨·冯·贝利辛根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在此以前没有几天他曾先去投靠普法尔茨选帝侯，后来又来投靠农民，后来又去投靠选帝侯。此时他不得已而加入新教兄弟会，并即任华美白军（与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相对而言）总指挥职。可是他同时是农民的俘虏，农民们不放心地监视着他，并且限定他要按照首领们的意见行事，不许他作任何未得首领们同意的事。圭茨和梅茨勒带着农民群众通过布欣开往阿莫巴赫，他们在此从4月30日停留到5月5日并掀起整个美因兹地区的叛乱。贵族们到处都被迫参加暴动并因此而保全了他们的城堡；只有寺院都被焚烧洗劫了。农军士气显然低落了，最有魄力的人们都和弗洛里安·盖尔或者和叶克来恩·罗尔巴赫一道走了。罗尔巴赫在占领海尔布朗以后也走掉了，显然是因为他审判过黑尔芬施太因伯爵，所以无法再在一支想和贵族妥协的农军中呆下去。急欲和贵

族谅解这件事本身就已是士气沮丧的标志。于是文德尔·希普勒提出一个很适当的改组农军方案：录用每天都有来应募的雇佣兵，取消以往每月征召新兵遣散旧兵的办法而经常保持这些多少受过训练而又武装起来的兵员。可是全军大会把这两点建议都否决了；农民们已经傲慢起来了，而且把整个战争看作一种聚众劫掠的勾当，既然如此，雇佣兵的竞争对他们就很不合适，而且他们只要把口袋装满以后，就毫无阻拦地自行回家。在阿莫巴赫，事情甚至演变到这样的地步：海尔布朗顾问汉斯·柏林要求农军的首领和顾问们同意“十二条款陈情书”，这是一封公函，其中甚至十二条款的仅有的一些尖锐词句也被删除，改成农民恭顺请愿的口吻。这一次这件事情连农民们都受不了；农民们大哗，拒绝同意这个“陈情书”，并且坚持原来的条款。

在此期间维尔茨堡地区也发生了决定性的转折。4月初农民暴动刚起来的时候，主教就退守维尔茨堡附近设防的弗劳恩堡并驰书各方求援无效，终于被迫暂时屈服。5月2日召开了一个也有农民代表出席的省议会。但在任何结果都还没有的时候就查获一些信件，这些信件证卖了主教的叛逆活动。省议会立即散会，造反的市民农民和主教的部队之间又开始敌对行动。主教本人于5月5日逃往海得尔堡；次日弗洛里安·盖尔和黑军就已来到维尔茨堡，和他一起来的还有法兰克尼亚陶伯尔河农军，这是由梅根特海姆农民、洛腾堡农民和安斯巴赫农民组成的。5月7日圭茨·冯·贝利辛根也率领华美白军来到，并开始围攻弗劳恩堡。

在林普尔格地区以及在厄尔万根和哈尔一带，早在3月底4月初就建立起另一支农军，即盖尔多夫农军或称普通华美军。这支农军来势凶猛，把这整片地区都卷入暴乱之中，把许多寺院和城堡

都烧毁，霍亨施陶芬城堡也在其列，还强迫所有的农民跟着走，强迫所有的贵族，甚至连林普尔格的酒保们，都加入基督教兄弟会。5月初这支农军向维尔腾堡进击，但被劝诱撤退。德意志小国林立的割据状态在当时也和1848年一样，很少给各邦的革命者共同行动的余地。被限制在一小块领土上的盖尔多夫农军，在这块土地上战胜了一切反抗之后，必然要自趋瓦解。他们和格缪德城达成协议，并只留下500武装农民就自行解散了。

在普法尔茨，4月下旬就在莱茵河两岸都有农军建立起来。他们破坏了许多宫城和寺院，并于5月1日占领哈特高地的纽施塔特，在此以前一天，渡河而来的布鲁赫莱茵农民已经迫使斯拜尔城缔结协定。冯·哈贝伦元帅仅有少数选帝侯部队，无法对付农民，5月10日，选帝侯不得不和造反的农民缔结协定，他在协定中向农民保证要开一次省议会来祛除农民的各种负担。

在维尔腾堡，起义很早就在个别地区爆发了。在乌拉赫阿尔卑斯出区，农民们早在2月间就已结成同盟来反对僧侣和领主，3月底，勃劳贝伦农民，乌拉赫农民，闵辛根农民，巴林根农民，罗森斐尔德农民，都起义了。盖尔多夫农军在戈宾根附近，叶克来恩·罗尔巴赫在布拉肯海姆附近，被击败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在普富林根附近，都侵入维尔腾堡境内并掀起农村人民的骚乱。在其他地方也爆发了严重的骚乱。普富林根在4月6日就已不得不向农民投降。奥地利大公的政府狼狈不堪。这个政府根本没有钱，军队也很少。各城市各城堡处境极劣，既无守军，又无军火。甚至阿斯贝尔山也几乎毫无防御。

政府企图征集各城市的后备军来对付农民，结果倒使它自己陷于一时手足无措之境。4月16日波特瓦征集的后备军拒绝开拔，

不去斯图加特，却走上波特瓦附近的弗伦施坦山，他们在此形成一个市民农民阵营的核心，而且发展迅速。同一天，查伯尔部的暴动也爆发了；毛尔布朗寺院被洗劫，许多寺院和城堡都被夷为平地。许多增援队伍从邻近的布鲁赫莱茵赶来入伙。

弗伦施坦山上农军首领由马特恩·费尔巴哈尔担任。费尔巴哈尔是波特瓦市政官，是市民反对派领袖之一，富于妥协性，是出于不得已才跟农民走的。在此期间他仍然还是很温和，他阻止对各城堡实行“书简条款”，他处处谋求农民和温和派市民之间的融洽一致。他阻止维尔腾堡农民和华美白军联合，后来还劝说盖尔多夫农军退出维尔腾堡。由于他倾向于市民，他曾于4月19日被撤换，但是在第二天就已重新被任命为首领。少了他，就不行。甚至在4月22日叶克来恩·罗包巴赫带着200名坚定的弟兄来加入维尔腾堡农民队伍的时候也没有其他办法，只有让费尔巴哈尔留任下去，由他自己来严格监视他的行动。

4月18日政府试图和弗伦施坦山上的农民们进行谈判。农民坚持政府必须接受十二条款，而政府的全权代表们自然不能同意这个要求。于是农军开始行动。20日农军抵劳芬，并在此地最后拒绝了政府代表的提议。22日，农军有6000人之众进抵比梯海姆，并威胁着斯图加特。此城政府官员大半逃走，由一个市民委员会来主持行政。在此城的公民中，也和其他各城市一样，存在着名门望族、市民反对派、革命平民三派。后面的两派于4月25日向农民打开城门，斯图加特立即被占领。此时维尔腾堡暴动农民已自称为华美基督教农军，这支华美基督教农军的组织工作就是在斯图加特城完成

的 ;薪饷 ,战利品分配以及给养等等也定出了固定的规章。脱伊斯·格伯领着一队斯图加特军来加入了农军。

4月29日 ,费尔巴哈尔率领整支农军去抵挡在朔恩多夫附近侵入维尔腾堡地区的盖尔多夫农军 ,把这整片地区吸收入盟 ,因而就劝说盖尔多夫农军撤退了。费尔巴哈尔就是这样防止了他自己农军中由罗尔巴赫领导的革命分子和毫无顾忌的盖尔多夫农军会合 ,因而也就防止了这些革命分子增强地位而危及他自己。他在接到特鲁赫泽斯逼近的消息以后 ,就从朔恩多夫开拔去迎击特鲁赫泽斯 ,并于5月1日驻扎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

以上把德国境内第一批农军活动的那一地区的起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描述过了。在我们细述其他各批农军情况(图林根与黑森 ,亚尔萨斯 ,奥地利和阿尔卑斯山区)之前 ,我们不可不先报道特鲁赫泽斯进军消灭这第一批起义农民的情况 ,特鲁赫泽斯在这个进军过程中最初是孤军作战 ,后来就得到许多诸侯和城市的支持。

我们曾叙述到特鲁赫泽斯到达乌尔姆附近的情况。他于3月末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留下一支监视部队由迪特利希·施佩特指挥以后 ,即转往乌尔姆。特鲁赫泽斯的军团在招集了到乌尔姆来集中的联盟增援部队以后才将近1万人之众 ,其中有7200名步兵 ,这是唯一的一支堪称有力向农民进攻的军队。各增援部队汇集乌尔姆进行得很迟缓 ,一部分原因是在骚乱各邦中征募困难 ,一部分原因是各地政府缺少金钱 ,而且还因为各地需有少数部队防守要塞和城堡 ,所以极难调动。至于不属于土瓦本联盟的诸侯和城市所能调用的部队是如何地少 ,我们早已见到。所以一切都视格奥尔格·特鲁赫泽斯率领的联盟军队所能取得的成就而定。

在此期间 ,巴尔特林根农军已开始在里德周围地区捣毁城堡

和寺院,特鲁赫泽斯首先就转来攻击巴尔特林根农军。农民们在联盟军队迫近时即后退,被迫绕道逃出沼泽地带,渡过多瑙河,奔往士瓦本阿尔巴的森林中。在这些地带,作为联盟军队主要力量的骑兵和大炮对农民们无可奈何,特鲁赫泽斯就不再追他们了。他进击莱普海姆农军。莱普海姆农军有5000人在莱普海姆附近,有4000人在敏迭尔河谷,有6000人在伊勒提森附近,他们正掀起全区暴动,破坏寺院城堡,准备以所有3支队伍进取乌尔姆。看来此时在这些农民中间已有点士气沮丧,因而这支农军作战也没有什么把握了,这应归咎于雅科布·韦埃从一开始就力求和特鲁赫泽斯进行谈判。但是特鲁赫泽斯这时已有足够的军力为后盾,所以根本不予理会,反而于4月4日在莱普海姆附近进攻农军主力并完全击溃了它。雅科布·韦埃和乌尔利希·雪恩以及另外两位农民领袖被俘斩首;莱普海姆投降了,经过在附近地带几番追击之后,全区都被征服了。

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因为要求进行洗劫和发放额外粮饷而哗变,这件事再一次地打断特鲁赫泽斯的军事行动,一直到4月10日为止。然后他才向西南方进击巴尔特林根农军,这支农军在这期间正侵入他的领地瓦尔德堡,采尔和沃尔菲格并围攻他的各处城堡。特鲁赫泽斯在此也发现农民中间是分裂的,他就在4月11日和12日用各个击破的办法把巴尔特林根农军也完全击溃了。农军残部由僧侣弗洛里安率领向湖军方面撤退。于是特鲁赫泽斯又转而进击湖军。在这期间,湖军不仅多次出击,而且已使布霍恩(弗里德里希斯哈芬)和沃尔马廷根两城加入兄弟会,并于13日在萨勒姆寺院召开大军事会议,决议迎击特鲁赫泽斯。各处立即响起警钟,在伯马廷根营寨集合起来的有1万人,还有被击败的

巴尔特林根农军也加入了。4月15日他们与特鲁赫泽斯一战得胜，特鲁赫泽斯不想把他的军队在一次决定性战役中孤注一掷，宁愿谈判，当他听说阿尔部农军和赫部农军也迫近时，谈判之心更切。于是他于4月17日在魏茵加腾与湖军和巴尔特林根农军缔结了一个表面看来对农军相当有利的协定，农军们毫不迟疑地同意了。特鲁赫泽斯更进而诱使上下阿尔部农军代表都接受了这个协定，然后开往维尔腾堡。

特鲁赫泽斯的奸计把他从必不可免的灭亡中挽救出来。假若他不是善于愚弄软弱、狭隘而又绝大部分已经士气消沉了的农民以及他们的多半懦弱无能而又贪图贿赂的首领们的话，那末他和他的小小的军队就已被围困在兵力合计至少为25000—30000人的4支队伍中而且势必被消灭。但是他的敌人是狭隘的，这是农军群众中总不可免的情形。因而使他有可能恰恰是在敌人只须一击即可结束整个战争——至少在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的时刻逃脱了敌人的打击。湖军农民信守协定，竟至于拿起武器去反对自己的同盟者赫部农军，最后当然还是被欺骗了；阿尔部农军也被他们的首领们指使加入这个背叛行动中，虽然他们马上就退出这一行动，可是特鲁赫泽斯在此期间却逃出险境了。

赫部农军虽然没有参加魏茵加腾协定，可是却做了一件具有极端的极端的地方狭隘性和顽固的褊狭性的事，把整个农民战争都断送了。当特鲁赫泽斯和他们谈判一无成就而向维尔腾堡开拔以后，他们尾随着他并继续留守在他的侧翼，可是他们竟不去和维尔腾堡华美基督教农军一致行动，其理由是因为维尔腾堡农民和尼喀河谷农民也曾一度拒绝援助他们。因此，当特鲁赫泽斯已经离开他们的家乡很远之后，他们就泰然地撤退并向夫赖堡开去。

我们曾经叙述到由马特恩·费尔巴哈尔率领的维尔腾堡农民驻在特克附近的基尔赫海姆，而由特鲁赫泽斯留在此处交迪特利希·施佩特指挥的监视部队则撤到乌拉赫去了。费尔巴哈尔在一度企图攻取乌拉赫没有成功之后即转往纽廷根，并向邻近所有暴动农军求援，以便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果然从维尔腾堡平原地区以及从葛伊都有可观的增援部队来到。特别是有两支强大的农军开拔前来了，这两支农军是由葛伊农军以撤退到维尔腾堡西部的莱普海姆农军残部为核心集结起来，并从整个尼喀河谷和纳哥尔德河谷上游一直到伯勃林根和利奥堡都掀起暴动，他们于5月5日在纽廷根和费尔巴哈尔会师。特鲁赫泽斯在伯勃林根附近和这些联合起来的农军接触。他们的人数，他们的大炮和他们的阵地都使特鲁赫泽斯震惊；特鲁赫泽斯立即用其惯技开始谈判并和农军们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当农民们的警惕性刚一受到麻痹的时候，他就于5月12日还在停战协定期间袭击农民，迫使农民进行决定胜负的一战。农民们进行了英勇持久的抵抗，一直到最后由于市民阶级的叛变，伯勃林根落入特鲁赫泽斯之手为止。农军左翼因此失却根据地陷入包围之中。于是胜败之局决定了。没有严格纪律的农民们陷入混乱状态中，随即狂奔逃命；所余未被联盟的骑兵杀戮或俘虏的人也丢掉武器逃回老家去了。华美基督教农军完全瓦解了，整个维尔腾堡的暴动也随之而完全被平息了。脱伊斯·格尔伯逃往埃斯林根，费尔巴哈尔逃往瑞士，叶克来恩·罗尔巴赫被俘，并被解至涅卡尔加塔赫，特鲁赫泽斯在此把他捆在一根柱子上，周围堆满木柴，把他活活地用慢火烧死，特鲁赫泽斯本人和他的骑士们在旁宴饮取乐，欣赏这种贵族的活剧。

特鲁赫泽斯从涅卡尔加塔赫侵入克莱赫部以支援普法尔茨选

帝侯的军事行动。普法尔茨选帝侯在此期间集结了部队，在接到特鲁赫泽斯获胜的消息后立即对农民毁约而于5月23日袭击布鲁赫莱茵，在遭到猛烈抵抗之后攻下并烧毁了马尔施，洗劫了许多村子并占领了布鲁赫萨尔。特鲁赫泽斯同时还袭击艾宾根并俘获当地运动的领袖安东·埃森胡特，选帝侯立即把埃森胡特和其他12位农民领袖一起处死。布鲁赫莱茵和克莱赫部于是被平定，还被勒索了将近4万盾。特鲁赫泽斯的军队经历以上各战役之后减为6000人，选帝侯的军队是6500人，这两支军队联合起来向奥顿瓦尔德前进。

伯勃林根失败的消息使得恐慌心情到处在起义者之间散布开来。陷于农民高压之下的各个帝国自由市忽然又都轻松起来。海尔布朗是第一个采取步骤和士瓦本联盟妥协的帝国自由市。海尔布朗有农民办公室，各农军代表正在这里商讨以全体起义农民名义向皇帝和帝国提出的建议。这些商谈本来是要达成一个普遍适用于整个德国的建议案，在这些商谈过程中再度表明没有一个等级已经发展成熟到足以能从自己的立场出发来革新整个德国局面，连农民等级也没有发展到这样的程度。事情摆得很清楚：要达到上述目的，不得不争取贵族，尤其是不得不争取市民等级。文德尔·希普勒因此就把商谈的领导权拿到他手中去了。文德尔·希普勒在运动的所有领袖们中间是最正确地认识到现状的。他不是象闵采尔一样的有远见的革命家，也不是一个象梅茨勒或罗尔巴赫一样的农民代表人物。他的多方面的经验，他在实践中得到的对于各个等级相互间的地位的知识，都使得他不会只代表卷入运动的等级中的一个等级来反对其他等级。闵采尔是当时处于现存一切正式社会关系之外的那一阶级的代表人

物，也就是无产阶级的萌芽的代表人物，而文德尔·希普勒可以说是全民族的一切进步势力的中间状态的代表人物，恰恰和闵采尔预测到共产主义的情形一样，文德尔·希普勒预测到近代资产阶级社会。他所主张的一些原则，他所提出的一些要求，虽然都不是立刻可以实现的，但是他的这些原则和要求却是封建社会的当前解体状态的稍加理想化的必然结果；而农民们一旦决心来为整个帝国制定法律草案的时候，那末除了同意他的这些原则和要求而外别无他法。所以农民们所要求的中央集机制就在海尔布朗采取了一种更为确定的形式，这种形式与农民们对中央集权制的想法有天渊之别。例如，这种中央集权制在统一币制和度量衡，在废除帝国内关税等方面规定得更仔细些，简言之就是在符合城市市民的利益远比符合农民的利益为多的各种要求上规定得更仔细些。所以对贵族作了许多让步，这些让步十分近乎近代的赎买办法，其最终目的是要转变封建土地所有制为资产阶级土地所有制。总而言之，农民的要求一经概括到一个“帝国改革”方案中去以后，这些要求即使不是以市民阶级的当前要求为依归，也必然是从属于市民阶级的最终利益。

正当这个帝国改革方案还在海尔布朗进行辩论的时候，“十二条款陈情书”的作者汉斯·柏林已离城迎接特鲁赫泽斯，以名门望族和市民阶级的名义谈判本城投降问题。城里反动派的阴谋活动支持了这一叛逆行动，文德尔·希普勒不得不和农民们一起逃走。他去到魏茵斯堡，企图在此招集维尔腾堡农军残部和少数有战斗准备的盖尔多夫农军。但是普法尔茨选帝侯和特鲁赫泽斯又迫近了，他又不得不离开此地而去维尔茨堡发动华美白军。联盟部队和选帝侯部队此时征服了整个尼喀河地区，迫使农民们重新宣誓效

忠,焚毁了许多村镇,凡曾逃跑而被他们俘获的农民都被刺杀或绞死。为了报复黑尔芬施太因被杀之仇,魏茵斯堡被焚毁无遗。

在维尔茨堡近郊联合起来的农军这时包围了弗劳恩堡,并于5月15日,在还没有攻破缺口之前就向堡垒进行勇猛的冲锋,这次冲锋失败了。在战壕里留下了400名最优秀的人员,或死或伤,多半属于弗洛里安·盖尔军中的人。两天以后,即17日,文德尔·希普勒来到并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他提议只留4000人在弗劳恩堡,而将全部约2万人之众的强大主力部队就在特鲁赫泽斯的眼前开到雅格斯特河畔的克劳特海姆立下营寨,所有的增援部队就可以集中到这里来。这个计划是卓越的;只有依靠团结群众和人数众多才能希望打败此时已有1万3000人之众的诸侯军队。然而农民中军心涣散和士无斗志的情形已经过于严重,已没有进行任何坚决果敢的军事行动的可能。圭茨·冯·贝利辛根在此以后不久就公开变成叛徒,他可能对阻碍农军的行动出过不少力气,因而希普勒的计划就从未实现。计划没有实现,而各农军倒象往常一样陷入分裂状态了。直到5月23日华美白军在法兰克尼亚农民答允尽速接应之后才行动起来。26日,驻在维尔茨堡的安斯巴赫各旗军队在接到侯爵已对农民开始敌对行动的消息以后都被调回来了。围城军残部和弗洛里安·盖尔的黑军一起在离维尔茨堡不远的海丁斯斐尔德严阵以待。

华美白军于5月24日来到克劳特海姆,很少准备战斗的姿态。许多人在此地听说他们的村子在此期间已经投效特鲁赫泽斯了,就以此为口实而回家去了。农军更向尼喀苏尔姆开去并于5月28日

和特鲁赫泽斯谈判。同时派出驿使到法兰克尼亚,亚尔萨斯和黑森林-赫部农军处要求火速驰援。圭茨·冯·贝利辛根从尼喀苏尔姆开回艾林根。农军天天都要散失一些人;圭茨·冯·贝利辛根也在行军中途不见了;他轻骑回家了,在此以前他早就通过他的老战友迪特利希·施佩特为他倒戈的事和特鲁赫泽斯谈过了。在艾林根附近,由于误传出敌人迫近的消息,束手无策垂头丧气的群众突然恐慌万状,农军秩序大乱,纷纷走散,梅茨勒和文德尔·希普勒费了大力才纠集约2000人再开到克劳特海姆去。在这期间,法兰克尼亚征集的5000人的农军开来了,可是由于圭茨显然为贩卖目的而安排的从侧面通过勒文施坦到艾林根的行军计划,这支农军和华美军并没有相遇,就开到尼喀苏尔姆去了。这个由几旗华美白军占领着的小城正被特鲁赫泽斯围攻。法兰克尼亚农军于夜间到达并已看见联盟营寨的火光,但是它的领袖们没有胆量,不敢袭击,而且退到克劳特海姆去了,最后他们就在这里见到华美白军残部。尼喀苏尔姆既无人解围,就于29日向联盟军投降了,特鲁赫泽斯立即处决了13个农民,然后追逐农军,一路烧杀劫掠,无所不为。在尼喀河,柯赫尔河,雅格斯特河整个河谷中,凡是特鲁赫泽斯所过之处,都是一片瓦砾,树上挂着农民尸体。

联盟军队在克劳特海姆附近与被特鲁赫泽斯从侧翼压迫向陶伯尔河畔的科尼斯霍芬撤退的农民相遇。农民们有8000人和32门炮,他们就在此地严阵以待。特鲁赫泽斯靠丘陵和森林的掩护而偷偷地迫近他们,派遣几路人马包抄过来,于6月2日以优势兵力向他们猛烈袭击,结果农民们尽管对各路人马都进行了最顽强的抵抗一直到深夜还是完全被击溃了。和历次的情形一样,这次也主要是由“制农民死命”的联盟的骑兵来消灭造反军的,这支骑兵在

农民们已遭到枪炮火力的进攻而大为震动之后再追击他们，把他们完全击溃，然后一个个地杀死了他们。究竟特鲁赫泽斯用他的骑兵进行了怎样一种战争，在农民军中的300个科尼斯霍芬市民的命运可作证明。这300个市民在战斗中间被杀得只剩15人，而这15人中有4人后来还被斩首了。

特鲁赫泽斯压伏了奥顿瓦尔德、尼喀河谷和下法兰克尼亚农民之后，他还进行扫荡，焚毁所有村庄，处死无数农民，平定了全境，然后开往维尔茨堡。他在中途获悉第二支法兰克尼亚农军由弗洛里安·盖尔和格莱哥尔·冯·布尔格-贝恩海姆率领正停留在祖尔茨多夫附近，他立即向这支农军进攻。

弗洛里安·盖尔自从猛攻弗劳恩堡未成以来主要是从事于和诸侯及各城市，特别是和洛腾堡城及卡季米尔·冯·安斯巴赫侯爵谈判他们加入农民兄弟会的事，谈判突然被科尼斯霍芬失败的消息打断。弗洛里安·盖尔的农军就和格莱哥尔·冯·布尔格-贝恩海姆率领的安斯巴赫农军合而为一。这支农军是新近才建立起来的。卡季米尔侯爵善于用真正的霍亨索伦方式在他的境内制止农民暴动，一半用花言巧语，一半用大军威胁。任何外地农军，只要不吸收安斯巴赫臣民参加，他就对他们完全保持中立。他总设法把农民的怨恨引向教产方面去，然后企图在一旦教产还俗时从中渔利。同时他不断准备武装，伺机而动。伯勃林根之战的消息一到，他立即对他境内的造反农民进行战斗，劫掠焚毁了许多村庄，绞杀了许多农民。然而农民迅速集结起来，并在格莱哥尔·冯·布尔格-贝恩海姆指挥之下于5月29日在温茨海姆附近打败了他。当农民还正向他追击的时候，受重压的奥顿瓦尔德农民求援的消息来到，农民立即向海丁斯斐尔德开去并从此地和弗洛里安·盖尔一起又开往

维尔茨堡（6月2日）。农民在此地很久未得到奥顿瓦尔德方面的消息，就留下5000人，而以4000人尾随其余农军开去——其余的人都走散了。他们听信了讹传的科尼斯霍芬战果的消息，正很放心，不料就在祖尔茨多夫附近遭特鲁赫泽斯的袭击，结果大败。特鲁赫泽斯的人马照例惨杀农民，血流成河。弗洛里安·盖尔纠集他的黑军残部600人杀出重围开往英果尔施塔特镇。200人占领了教堂及公墓，400人占领了城堡。普法尔茨选帝侯军追击而来，一支1200人的马队攻占此镇并放火焚烧教堂；未被烧死的农民，又被杀死。然后普法尔茨军把城堡的残破墙垣打出缺口，企图一鼓而下。两度被掩蔽在一堵内墙后面的农民击退，官军把这第二堵墙也击垮了，然后进行第三次冲锋，终于达到目的。盖尔的人有一半被杀，他幸而和最后的两百人一起逃脱了。但他逃匿之处在第二天（降灵节星期一）就已被发现；普法尔茨军包围了他藏匿所在的森林，把这支农军杀光了。在这两天之中只俘虏17人。弗洛里安·盖尔和很少的几个最坚决的人一起又杀出重围，转投盖尔多夫农军，这支农军这时又集结了7000人之众。但是当他来到的时候，他发现，由于令人沮丧的消息从各方面传来，这支农军又大半走散了。他还力图纠合离散的农民于森林中，可是在6月9日就在哈尔附近遭官军袭击，在战斗中身亡。

特鲁赫泽斯早在科尼斯霍芬战胜之后就立即报信给弗劳恩堡被困者，此时他就向维尔茨堡进军。市政当局已和他暗中串通，所以联盟军队于6月7日就把此城连同驻扎在内的5000农民一起包围起来，并于次晨不费一兵一弹就开进市政当局自行打开的各城门。由于维尔茨堡“名门望族”的这次叛变，最后一支法兰克尼亚农军就被解除武装，所有的领袖都被俘。特鲁赫泽斯立即将81人斩首。

于是法兰克尼亚各色诸侯接踵来到维尔茨堡,有维尔茨堡主教,有班堡主教,有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这些贵人们分担了各种任务。特鲁赫泽斯和班堡主教一起进军,主教此时立刻撕毁他和他的农民订立的协议,把他的领地交付联军群氓蹂躏,烧杀虏掠,无所不为。卡季米尔侯爵蹂躏了他自己的领土。泰宁根被焚毁;无数村庄被洗劫或付之一炬;同时侯爵在每一个城市都进行了血腥的审判。他在艾施河畔的纽斯塔特斩了18个人,在马克特-毕格尔斩了43个造反的人。他由此地开往洛腾堡,此时洛腾堡的名门望族已实行反革命并把斯蒂凡·冯·门钦根逮捕起来了。洛腾堡的小市民和平民对待农民的态度是这样地暧昧,他们直到最后一刻还拒绝给农民任何援助,他们狭隘自私成性,坚持压制农村手工业以照顾城市行会,只是极不乐意地放弃了城市从农民的封建负担里取得的收入,现在他们不得不自食其果了。侯爵斩了他们16人,当然首先是斩门钦根。维尔茨堡主教以同样方式巡视他的境内,到处焚烧劫掠,庐舍为墟。他在胜利进军中处决了256个造反的人,在回到维尔茨堡的时候,还斩了13个维尔茨堡市民以庆祝其大功告成。

在美因兹地区,斯特拉斯堡主教,威廉总督未遇抵抗即恢复了秩序。他只处决了4个人。莱茵部本来也曾骚动,可是大家早都各自回家了,而佛罗文·冯·胡登(乌尔利希的堂弟)还要补剿一番,杀了12个乱党领袖,于是莱茵部完全“平定”了。法兰克福也曾经经历相当的革命运动,最初是靠市政当局的退让,后来是靠征集的军队压制住了。在莱茵普法尔茨,自从选帝侯毁约以后又有约8000农民集结起来再来焚烧寺院和城堡,但是特利尔大主教取得冯·哈贝伦元帅的支援,于5月23日已在普费德斯海姆附近击败他们。惨案不一而

足(仅在普费德斯海姆一地就有82人被杀),7月7日魏森堡被占领,此地的起义就告结束。

此时在所有的农军中只剩下两支未被征服:赫部-黑森林农军与阿尔部农军。斐迪南大公已经用这两支农军来进行阴谋诡计。和卡季米尔侯爵以及其他诸侯利用起义来吞并教会领地和诸侯领地的情形一样,斐迪南大公极力利用起义来扩大奥地利王室的势力。他已和阿尔部农军首领瓦尔特·巴赫并和黑部农军首领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谈判过,要求他俩指使农民宣告加入奥地利方面;两个首领虽然都是买得通的,可是他俩在农军中也不能为所欲为,只能做到阿尔部农军和斐迪南大公协议停战并对奥地利保守中立,如此而已。

赫部农军从维尔腾堡地区撤退途中破坏了一批城堡并从巴登侯爵境内取得一些援军。他们于5月13日向夫赖堡进军,于18日开始轰击此城,23日此城投降,他们高举旗帜开入城内。他们由此地向施托卡赫和拉多夫策尔开去并与两城守军长处进行小规模战争,但无战果。两城以及贵族和邻近各城都根据魏茵加腾条约乞援于湖军农民,而湖军中以前曾造过反的农民竟有5000人之众起来反击自己的盟友。这些农民的地方狭隘性竟强烈到如此地步。只有600人拒绝战斗,要加入赫部农军而被杀害。然而赫部农军也被买通了的布尔根巴赫的汉斯·弥勒诱使放弃围攻,汉斯·弥勒随即逃走,而农军也大半溃散。残部借希尔青根隘道深沟高垒以自卫,7月16日,在此被抽调前来的官军击败并被消灭了。瑞士数城出面为赫部农军斡旋缔成和约,然而和约终未能使汉斯·弥勒免于杀身之祸。汉斯·弥勒虽有背叛农民之功,仍在劳芬堡被捕斩首。在布莱斯部,夫赖堡也于此时(7月17日)背弃了与农

民的同盟,而且派军队来对付农民;然而由于诸侯军力微弱,在此也于9月18日缔成奥芬堡条约²⁴⁹,宗德部亦参加在内。黑森林的8个集团和克勒特部农民都还没有解除武装,此时为冯·祖尔茨伯爵的苛政所逼,再次起义,于10月间被击溃。11月13日,黑森林农民被逼订立条约²⁵⁰,12月6日,莱茵河上游起义的最后一个堡垒瓦尔茨胡特城陷落。

阿尔部农军自从特鲁赫泽斯撤军以来又向各寺院城堡进击并对联盟军队的蹂躏进行猛烈的报复。他们遇着的官军为数不多,这些军队只能进行零星小规模袭击,决不能深入森林追击他们。6月,在一向还相当中立的梅明根城爆发了反对名门望族的运动。这次运动只是偶然碰上几支联盟部队临近,并且及时赶来支援这些城市贵族,才被压制下去了。平民运动的传教士和领袖沙佩勒尔逃往圣加伦。此时农民开抵城郊,正欲轰击城垣,适接特鲁赫泽斯从维尔茨堡发来的消息。6月27日,农民分两路取道巴本豪森和奥伯君茨堡迎击特鲁赫泽斯。斐迪南大公再次企图把农民争取到奥地利王室一边来。他根据他和农民缔结的停战协定,要求特鲁赫泽斯不要再向农民挺进。可是士瓦本联盟命令特鲁赫泽斯进攻农民,只是不许放火滥烧,然而特鲁赫泽斯心中有数,尽管他很有可能把这些从波登湖到美因河接二连三暴行惯了的雇佣兵控制住不许放火,但是他决不放弃他的这种首要的而且最起决定性作用的战争手段。农民以伊勒河路易巴斯河为掩护设防,有2万3000人之众。特鲁赫泽斯面对农民阵线布阵,有1万1000人。两军阵地都很坚强。马队在当前地势上不能起作用。如果说特鲁赫泽斯的雇佣兵在组

今称洛伊巴斯。——编者注

织、军需供应和纪律方面优于农民，那末阿尔部农军却有大量作过战的士兵和有经验的军官，并且有很多优良大炮。7月19日联盟军开始炮轰，20日双方继续炮战，都无战果。21日，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率领3000雇佣兵来加入特鲁赫泽斯的队伍。弗龙兹堡认识农军中许多在远征意大利时曾为他的部下的军官，他就和他们联系商谈。在军事手段无济于事之时，倒戈阴谋奏效了。瓦尔特·巴赫，许多旧军官和炮手都卖身求荣。他们故意让农民的全部弹药储藏毁于炮火，并劝说农军作迂回运动。但是农军刚一离开原来的坚固阵地，马上陷入埋伏中，这是特鲁赫泽斯和巴赫及其他叛徒串谋预设的埋伏。农军的指挥者就是这些叛徒，他们此时托词进行侦察离开了队伍，并已启程前往瑞士，因此农军更加无法抵御。两路农军全被击溃，第三路农军是由路易巴斯的克诺普夫率领，还能秩序井然地撤退。这路农军在肯普腾附近的柯伦堡山重振旗鼓，却被特鲁赫泽斯包围起来了。特鲁赫泽斯在此也不敢进攻他们，他切断农军的给养线，并即放火焚烧周围约200个村庄，这样来瓦解农民的士气。饥饿和眼见家室被焚的景象，终于迫使农民降服了（7月25日）。立即被处死者有20人以上。路易巴斯的克诺普夫是这路农军的唯一领袖，他不竖降旗，逃往布勒琴士，但他在此被捕，经过长期监禁之后，被处绞刑。

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民战争于是结束了。

六

正当士瓦本爆发第一批运动的时候，托马斯·闵采尔又赶回图林根，并且自2月底或3月初起即定居于帝国自由市缪尔豪森，此城是他的党的力量最强的地方。他成了整个运动的牵线人；他深知在德国南部即将普遍暴发风暴，他就着手把图林根变成德国北部运动的中心。他找到的是一块大有可为的地盘。图林根是宗教改革运动的策源地，此地本身群情已经激昂万分了；不仅流行的革命的宗教政治理论，而且还有被压迫农民物质上的缺乏，也都把邻近各邦，黑森，萨克森和哈茨地区的总起义的条件准备成熟了。尤其是在缪尔豪森，整个小市民阶级群众都已被争取到极端的闵采尔路线这一边来，并且迫不及待地期待着凭他们在人数方面的优势去和作威作福的名门望族较量高低的时机赶快到来。闵采尔为了避免在适当时机到来以前操之过急，不得不亲自出面劝告大家忍耐一下；然而在此领导运动的他的学生普法伊费尔，却已蛮干起来，将局面弄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不能按兵不动，而于1525年3月17日，即还在德国南部总起义之前，缪尔豪森就已发生革命了。原有的城市贵族议会被推翻了，政权转入新选出来的“永久议会”手中，永久议会的主席就是闵采尔²⁵¹。

这是一个极端党派的领袖所难于应付的最糟的事情了。如果这样一个领袖在自己所代表的阶级进行统治的时机还未成熟，为了这个阶级统治必需贯彻一些措施的时机还未成熟，而这个领袖

在这种时期中被迫出来掌握政权,这是最糟不过的事了。他所能做的事,并不取决于他的意志,而是取决于不同阶级的矛盾尖锐化的程度,取决于历来决定着阶级对立的发展程度的物质生活条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发展程度。他所应做的事,他自己的党要求于他的事,又不取决于他,但也不取决于阶级斗争及其条件的发展程度;他为他一向鼓吹的理论和要求束缚住了,这些理论和要求又不是从当时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地位得出来的,也不是从当时生产条件和交换条件的或多或少是偶然的水平中得出来的,而是从他对于社会政治运动的总趋势的几分远见中得出来的。于是他就不免地陷入一种无可救药的进退维谷之境:他所能做的事,是和他一向的整个主张、他的原则、他的党的直接利益不相容的;他所应做的事,则是无法实行的。总而言之,他是被迫而不代表自己的党,自己的阶级,却去代表当时运动使其统治条件已成熟的那一阶级。他不得不为运动本身的利益而保护异己阶级的利益,他不得不以一些空话、诺言来应付自己的阶级,硬说那个异己阶级的利益就是自己的利益。任何人陷入这样的苦境,都是无可救药,注定要失败的。在现代我们还经历过同样的事例,我们只须回想一下无产阶级代表们²⁵²在最近法国临时政府中所处的地位即可了然,他们本身虽然还只代表着无产阶级发展的最低阶段。谁根据二月政府的经验——不谈我们的高贵的德国临时政府和帝国摄政²⁵³——还能贪图官方地位,就必然或者是格外地愚蠢,或者至多是口头上的极端革命派罢了。

然而闵采尔作为缪尔豪森永久议会首脑所处的地位比任何一个现代革命的执政者还要冒险得多。他的理想是他本人才开始隐隐约约想到的;为实现他的理想,不仅当时的运动,连他所处

的整个世纪也都不够成熟。他所代表的阶级才刚在形成中，距离发展齐全而力能推翻并改造整个社会之境还很遥远。他所幻想的社会变革，在当时的物质条件中过于缺乏基础，甚至这些物质条件正在准备着的一种社会制度和他所梦想的社会制度是刚刚相反的。但是他还受着他一向宣说的基督教的平等和福音的财产公有教义的约束：他不能不为实现他的教义至少作一番尝试。一切财产公有，一切人有同等的劳动义务，一切官厅都应废除，都是已经宣告了的。可是在实际上缪尔豪森仍然还是一个共和制帝国直辖市，拥有几分民主化的政体，拥有一个处于市民大会控制之下的由普选产生的参议会，拥有一个草草组成的贫民救济机构。当时的新教市民们一听说推翻现社会都谈虎色变；所谓推翻现社会，事实上从未超出提前建立后来的资产阶级社会的一种软弱而不自觉的尝试的范围。

闵采尔本人似乎已经感觉到他的理论和当前现实之间的巨大鸿沟，他的天才想法在拥护他的群众的单纯的头脑中越遭到歪曲，这个鸿沟就越不能不呈现在他的眼前。他以他自己也少有的热忱来组织并扩大运动；他向各方面发出书信，派遣心腹使节。他在书信和宣教中流露出一股革命的狂热，这股狂热与自己早期的写作相较也很令人惊讶。闵采尔所写的革命小册子中青年天真的风趣完全消失了，他早年惯用的思想家的平静练达的笔调也再看不到了。闵采尔此时已完全成为革命的预言者；他不断煽动群众对统治阶级的仇恨，他激发最狂野的热情，并且只用旧约预言者吐露宗教狂热和民族狂热的那种猛烈的语调来说话了。从闵采尔此时努力以求的作风中就可看出他所要影响的民众究竟是处于什么样的文化水平了。

缪尔豪森的榜样以及闵采尔的鼓动都迅速传播远方。在图林根，在艾希斯费尔德，在哈茨，在萨克森公爵领地，在黑森与富尔德，在上法兰克尼亚，在福格特兰德，农民到处起义，集结成农军并焚毁城堡寺院。闵采尔一般被公认为整个运动的领袖，而缪尔豪森仍然是运动的中心。此时在爱尔福特有一个纯市民的运动获得胜利，在此占统治地位的党派仍然继续对农民采取摇摆不定的观望态度。

在图林根诸侯们对农民开始时是惊惶失措束手无策，和在法兰克尼亚和士瓦本的情形一样。直到4月底最后几天黑森邦伯才拼凑成功一支军队——这个黑森邦伯就是菲利浦邦伯，新教及资产阶级宗教改革史籍对于他的虔敬上帝盛加赞扬，而我们对于他对农民的无耻行为却要略赘数语。菲利浦邦伯通过几次迅速进兵和断然行动，平定了他的领土的绝大部分，然后募集新兵，侵入直到此时还是他的采邑领主的富尔德修道院长境内。他于5月3日击败富尔德农军于弗劳恩堡，平定全境，并即乘此机会不仅脱离修道院长的统治，甚至还把富尔德修道院长领地变成一块黑森采邑——当然是留待以后使这些教会领地还俗。然后他就攻取爱森纳赫和朗根萨尔查，并即与萨克森公爵部队汇合，进取起义大本营缪尔豪森。闵采尔在弗兰肯豪森附近集结了他的兵力约8000人，有大炮数尊。图林根农军的战斗力远不及上士瓦本和法兰克尼亚农军在和特鲁赫泽斯周旋时所发挥的战斗力，这支农军武装很坏，纪律很差，打过仗的老兵很少，各种领导人物的极缺乏。闵采尔本人显然没有任何军事知识。然而诸侯们认为在此也适用特鲁赫泽斯常常用以取得胜利的 strategy：背信食言。5月16日，他们开始谈判，缔结了一个停战协定，但后来就在停战期限还未满之前，突然袭击农民。

闵采尔率领着他的人马驻守在今天仍称为什利亚赫特堡的这座山上，以车垒²⁵⁴为掩护。农军中锐气消沉的情况已经愈益严重了。诸侯们发出诺言，如果农军活捉闵采尔交献，则农军将被赦罪。闵采尔叫众人围成一个圆圈，并叫大家讨论诸侯们的要求。一个骑士和一个僧侣表示赞成投降，闵采尔立刻将两人带到圆圈中间，当场斩首。坚决革命的人们欢呼赞成这一当机立断的恐怖行动，这一行动使农军又略为镇定一些；但若不是发现诸侯雇佣兵在包围全山之后不顾停战协议而以密集队形攻上山来的话，那末农军最后还是会绝大部分不战而逃的。农军在车辆后面迅速展开阵势，但是炮弹和枪弹已向半无防御而又不惯作战的农民射击，雇佣兵已进抵车垒前面了。经过短暂的抵抗之后，车辆阵线就被突破，农民的大炮被夺，农民被击溃了。他们狂奔乱窜地逃跑，结果就更加容易落入包围部队和骑兵的手中，这些部队杀得他们横尸遍野，血流成河。8000农民中有5000人以上被杀；其余逃往弗兰肯豪森城中，而诸侯的骑兵也和他们同时进城。此城失守。闵采尔头部负伤，在一间房子里被发现而就擒。5月25日，缪尔豪森也投降了！一直留守此城的普法伊费尔逃走了，但在爱森纳赫地区被擒。

闵采尔在诸侯面前被严刑拷问，然后斩首。他以生平的大无畏精神从容就义。他被害时至多不过28岁。普法伊费尔也被斩首，此外还有其他无数的人也被斩首。在富尔德，那位“博爱的”黑森的菲利浦，开始制造血案；他和萨克森诸侯下令用剑杀死造反的人，在爱森纳赫杀死24人，在朗根萨尔查杀死41人，弗兰肯豪森战役

即战斗山。——编者注

以后杀死300人，在缪尔豪森杀死100人以上，在盖马尔附近杀死26人，在丘恩格达附近杀死50人，在桑格豪森附近杀死12人，在莱比锡杀死8人，至于只被打成残废的，受刑更轻的，以及城镇村庄被洗劫被焚毁的事，就不必提了。

缪尔豪森丧失了帝国自由市主权而被并入萨克森领土，正如富尔德修道院辖区被并入黑森邦伯领地一样。

诸侯们率军穿行图林根森林，此时从比尔德豪森营寨开来的法兰克尼亚农民已经在此和图林根农民会合，并焚毁了许多城堡。双方会战于梅宁根城下；农民被击败，即向城中撤退。此城突然闭门不纳他们，并要从背后进攻他们。农军因盟友的倒戈而惊惶失措，于是向诸侯投降，并且还在谈判过程中就已溃散了。比尔德豪森阵营早已解散；因此这支农军溃散以后，萨克森，黑森，图林根，上法兰克尼亚的暴动队伍的最后残余就被消灭了。

亚尔萨斯的起义比莱茵河右岸的起义爆发得晚一些。斯特拉斯堡主教辖区的农民快到4月中才揭竿而起，他们起来之后，上亚尔萨斯和宗德部农民就跟着起来。4月18日，一支下亚尔萨斯农军洗劫了阿尔多夫寺院；另外几支农军在艾伯斯海姆和巴尔附近以及在维勒河谷和乌比斯河谷建立起来了。这些农军很快就集中建来组成了下亚尔萨斯农民大军，并开始攻占城池以及破坏寺院。各地每3个男人就要征一人编入农军。这支农军的十二条款较之士瓦本法兰克尼亚农军的要激进得多²⁵⁵。

下亚尔萨斯农军的一路人马于5月初集中在圣伊波利特附近，企图夺取此城而没有成功，但于5月10日取得贝尔肯，13日取得拉波茨魏勒，14日取得赖辛维尔。这些城市都是在各城市民同意之下取得的。此时第二路人马由艾拉兹姆·格尔伯率领出发奇袭斯特

拉斯堡，但并没有成功，于是这路人马转向佛日山进发，破坏了毛尔闵斯泰尔寺院并围攻萨比林，此城于5月13日向农军投降。他们由此地向洛林边境进发，并在毗连边境的这一部分公爵领地上引起骚乱，同时他们就在山区各关隘布防。在萨尔河畔的哈尔比茨海姆附近和纽堡附近都有庞大的营寨建立起来；在萨尔格闵德附近有4000洛林德国农民布防；最后还有两支农军先头部队掩护前线和右翼，一支是佛日山的柯尔本农军在施图采尔布朗附近，一支是克勒堡农军在魏森堡附近，而左翼则延伸到上亚尔萨斯农军所在地。

上亚尔萨斯农军从4月20日开始行动，已于5月10日迫使祖尔茨，12日迫使格布魏勒，15日迫使曾海姆及附近地区与农民结盟。奥地利政府和周围的帝国直辖市虽然立即联合起来反对他们，但是力量太弱，不能对他们进行顽强的抵抗，更不用说向他们进攻了。因此除极少数城市而外，整个亚尔萨斯到5月中旬都落入起义者手中。

但是要来压制大逆不道的亚尔萨斯农民的官军已经迫近了。这些官军是法国人，这些法国人在这里使贵族统治复辟了。洛林的安东公爵早在5月6日就率领一支3万人的军队出发了，这支军队里有法国贵族的精兵，有西班牙，皮蒙特，伦巴第，希腊，阿尔巴尼亚援军。5月16日，他在卢普施坦附近和4000农民接触，不费气力就把农民打败，17日他已迫使被农民占领的萨比林向他投降。可是还在洛林官军进城并解除农民武装的过程中投降协议就被撕毁了；处于无防御状态的农民被雇佣兵袭击，绝大部分被杀。其余的下亚尔萨斯农军各部队都自行解散了，于是安东公爵就向上亚尔萨斯农军进击。上亚尔萨斯农军曾经拒绝开到萨比林支援下亚尔

萨斯农军,此时就在舍尔维勒附近遭到洛林官军全军猛击。他们抵抗得非常勇敢,但因敌人拥有无比优势——30000对7000——而许多骑士又倒戈了,特别是赖辛魏耶尔守城官的倒戈,所以他们虽然拚死抵抗,仍归无效。上亚尔萨斯农军被彻底击败而溃散了。于是公爵以习用的残酷手段平定了亚尔萨斯全境。只有宗德部未蒙公爵光顾,得免于难。奥地利政府于是声言要把公爵请到国内来,威胁本国农民于6月初缔结恩集斯海姆协定。但是奥地利政府自己立即又破坏了这个协定并把运动的宣教者和领袖成批地绞杀。农民们于是重新起义,这次起义到宗德部农民加入奥芬堡协定时(9月18日)才告结束。

现在只剩奥地利阿尔卑斯地带的农民战争还须报道。这些地带以及毗邻的萨尔茨堡大主教辖区都是自从恢复 *stara prava* (旧权利) 运动以来始终处于反对政府和贵族的地位,也是改革教义的沃土。宗教迫害和横征暴敛促使起义爆发。

萨尔茨堡城在农民和矿工支持之下,自从1522年以来就因本城的城市特权以及宗教争端的关系而和大主教结怨了。1524年底,大主教以募得的雇佣兵袭击此城,用城堡的大炮威吓此城并追究异教宣教者。同时他还征课新的苛税,因此激怒全体居民达于极点。1525年春,全境农民和矿工与士瓦本,法兰克尼亚起义和图林根起义同时突然起事,组成农军,以普拉斯勒和魏特莫泽尔为首领,解放了此城,并围攻萨尔茨堡城堡。他们和西德农民一样结成一个基督教同盟,并把他们的要求编成条款,而在这里是十四条²⁵⁶。

在施梯里亚,上奥地利,克伦地亚和克莱纳,新的非法的捐税,关税和告示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的最切身的利益,农民也于1525年春起义。农民们夺取了许多城堡,并在哥伊斯附近打败 *stara prava* 运

动的征服者老将军迪特里希施坦。虽然政府故弄玄虚,居然招安了一部分起义者,可是大伙仍然保持团结,并和萨尔茨堡农民联成一气,因而整个萨尔茨堡地区以及上奥地利,施梯里亚,克伦地亚,克莱纳等地的绝大部分都在农民和矿工的掌握中。

在提罗耳,改革教义同样深入人心。闵采尔的密使在此地曾经进行活动,其成效甚至比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其他各地更多。斐迪南大公在此地区也迫害新教义的宣教者,并以新的专横的财政措施侵犯居民权利。结果也和其他各地一样,起义也在1525年春爆发。起义者的最高首领是闵采尔派,名盖斯迈尔,他是全部农民首领中唯一具有军事天才的人。起义者们夺取了许多城堡并严厉惩治劣僧,尤其在南部,在艾契地区是如此。弗拉尔堡农民也起义并参加了阿尔部农军。

大公从各方面受到压力,于是接二连三地对造反人民让步,这些造反人民就是不久以前他还要用烧杀虏掠的手段加以消灭的呢。他决定召开各世袭领地的省议会,并在议会开会前这个时期和农民缔结停战协定。在这期间他就集结力量,以求越快越好地能以另外一套语言来对付这些“罪恶多端的人们”。

这个停战协定自然没有被遵守多久。迪特里希施坦的钱财耗尽了,他开始在公爵封土内进行搜刮。他的斯拉夫族部队和马札尔族部队又肆意对居民进行无耻的蹂躏。于是施梯里亚人民又起义了,他们在7月2日到3日的夜间袭击迪特里希施坦将军于施拉明格,把所有不说德语的人都杀了。迪特里希施坦本人被俘。3日晨,农民们开了一次陪审法庭,并且从俘虏中提出40个捷克贵族和克

罗地亚贵族来判处死刑。他们都立即被斩首了。这件事起了作用；大公立刻答应了5个公爵封地（上奥地利和下奥地利，施梯里亚，克伦地亚，克莱纳）内各等级的一切要求。

在提罗耳，省议会的要求也获允准，因而北部就平定了。然而南部人民坚持原先的要求，不同意省议会的软弱决议，仍然没有放下武器。在12月里，大公才在这里用武力恢复了秩序。他毫不犹豫地落入他手中的许多暴乱煽动者和领袖处死了。

8月初，格奥尔格·冯·弗龙兹堡率领1万巴伐利亚兵向萨尔茨堡开来。这支强大兵力以及农民间出现不和的情况，迫使萨尔茨堡起义者与天主教缔结协定，协定在9月1日订立，也已被大公接受。然而这两个诸侯在此期间加强军力到足够的程度，登时破坏协定，因而又迫使萨尔茨堡农民重新起义。建义农民支持过了冬季，盖斯迈尔在春季里来到他们这里，并即对从各方面迫近的官军展开辉煌的战斗。在1526年五六两月里，他在一系列的漂亮仗里接二连三地打败巴伐利亚军，奥地利军，士瓦本联盟军和萨尔茨堡天主教雇佣兵都打败了并且迫使各敌军长久不能汇合。在这期间盖斯迈尔还找到机会去围攻拉德施塔特。最后由于被优势敌军从各方面包围起来，他不得不退却，杀出重围，率领残部由奥地利阿尔卑斯山中穿过到达威尼斯境内。威尼斯共和国和瑞士成了这位不屈不挠的农民领袖进行新密谋的据点；他活动了一年之久，想把这两国卷入对奥战争中，如果成功，那他就有可能重新掀起农民起义。可是正在洽商这件事的过程中，他竟死于刺客之手。只要盖斯迈尔还活着，斐迪南大公和萨尔茨堡天主教就不得安枕。他们收买了一个匪徒，这个匪徒竟于1527年使这位危险的造反人物脱离人世了。

七

盖斯迈尔退到威尼斯地区以后，农民战争的最后一幕就告结束了。各处农民重新陷入他们的教会领主、贵族领主或城市贵族领主的奴役之中；各处和农民缔结的协定都被撕毁，胜利者对战败者极尽掠夺搜刮之能事，因而使一向承当的负担更加重了。德国人民进行的最伟大的革命尝试，以忍辱失败而告终了，而且暂时还使压迫倍增。然而从长远看来，使农民阶级处境更加恶化的还不能说是起义被镇压下去这件事。凡是贵族，诸侯，僧侣们能够年复一年地从农民身上榨取到的东西，在战前就都已榨取到了；当时德国农民从自己的劳动产品中所能得到的份额，仅限于维持自己生存以及延续后代所必需的最低限度的一部分生活资料，这一点是和现代无产者相同的。所以一般说来农民身上再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榨取的了。许多富裕中农自然是破产了，大量依附农沦为农奴，整片的公社地产被没收，大批农民由于家宅被毁，田园荒芜，饱经祸乱，流浪四方，或变为城市平民。但是战争和祸乱成为当时的家常便饭，农民阶级痛苦已深，而捐税还在增加，使他们的生活状况继续恶化。以后各次宗教战争以及连绵不断毁灭生命财产的三十年战争使农民遭受灾难之惨重远远超过农民战争；尤其是三十年战争把用于农业生产的最主要的一部分劳力消灭了，同时又有许多城市被破坏了，因此，农民、贫民和破产市民都长期陷入最艰苦的爱尔兰的贫困境地。

遭受农民战争的打击最大的是僧侣。他们的寺院和教堂被焚毁了，他们的金银财宝被抢劫，不是卖给外国，就是被熔化了，他们的储备物资都耗尽了。在各地都是他们的抵抗力最小，而人民仇恨的怒火却是最集中地针对着他们。其他等级，即诸侯，贵族和市民阶级，甚至眼见众怒所指的高级僧侣处境困难而暗中称快。农民战争使教产还俗以利农民成为通俗的想法，世俗诸侯以及一些城市则极力设法使教产还俗按照对他们最有利的方式来进行，而在新教各邦中，高级僧侣的产业很快就转入诸侯或城市贵族手中。就是僧侣诸侯们的权势也已受到侵害，世俗诸侯们很善于在这方面去利用人民的仇恨。所以我们曾看到富尔德修道院长如何从黑森的菲利浦的采邑领主地位降为他的臣属的情况。所以肯普腾城竟强迫诸侯修道院长将他在此城享有的一系列重要特权廉价地卖给此城了。

贵族也大受打击。他们的城堡大半被毁，很多最体面的家族破落了，只有靠伺候诸侯维持生存。他们在农民面前无能为力已是完全注定了；他们到处都被击败；被迫投降；只有诸侯的军队才挽救了他们。他们日益丧失其帝国直属等级的意义而沦为诸侯的臣属。

整个看来，城市也没有从农民战争得到什么好处。名门望族的统治几乎到处都重新巩固起来；市民阶级反对派受挫，很久不能重振。旧有的城市贵族的成规惯例继续维持下去，在各方面都阻碍着工商业的发展，一直拖到法国革命时期。诸侯们还认为市民或平民党派在斗争中是在城市包庇之下才取得暂时的成就的，所以城市要对此事负责任。从前已经属于诸侯领土的城市，于是不得不支付巨额赔款，城市特权被剥夺，在诸侯们奴役之下听凭勒索（如

弗兰肯豪森,阿伦施塔特,施马尔卡尔登,维尔茨堡等等),帝国直辖市被并入诸侯领土(例如缪尔豪森),或者至少要受毗邻的诸侯的托管,许多法兰克尼亚的帝国直辖市就是如此。

在这些情形之下,归根结底从农民战争取得好处的只有诸侯。本文一开头即已谈到德国农工商业的发展很差,使德国人统一为一个民族国家没有任何可能,只可能有局部的和省区的中央集权化,因而在分裂割据状态之下代表这种局部的中央集权势力的诸侯,形成了从当时社会政治关系的任何变动中都必能得到好处的唯一等级。当时德国的发展水平是这样低,而同时各省区的情况又这样不同,致使世俗诸侯邦之外,还有独立自主的僧侣辖区,城市共和国以及独立自主的伯爵和男爵能够同时存在;虽然这种发展很缓慢很拖沓,但是是趋向于省区的中央集权化,这就是说,要使其余的帝国等级从属于诸侯统治之下。因此在农民战争结束的时候只有诸侯能够有所得。事实也正是如此。诸侯们不仅由于僧侣,贵族,城市这些竞争者都削弱了而得到相对的利益,他们还由于靠牺牲所有其他等级拿到 *spolia opima* (主要战利品) 而得到绝对的利益。教产是以最有利于他们的方式还俗了;一部分半破落或全破落的贵族不得不逐渐降伏于他们的统治之下;向城市和农民搜刮勒索的金钱流入他们的金库,同时由于取消了那么多的城市特权,他们要在财政措施上为所欲为就更加有余地了。

德国的分裂割据状态之加甚与加强是农民战争的主要结果,同时也是农民战争失败的原因。

我们已经见到德国是处于怎样的分崩离析状态之下,不仅分成无数独立而几乎完全互不相干的省区,而且整个民族在每一个这样的省区中都分裂为各种复杂的等级与等级集团。诸侯和僧侣

之外，在农村中还有贵族和农民，在城市里还有城市贵族，市民和平民，全是一些利害即或不相冲突也是彼此悬殊的等级。在所有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之上，还有皇帝和教皇的利害关系。我们已经见到，这些复杂的利害关系终于经过困难而不满地，而且随各地情况不同而又很不一律地形成了三大派；尽管好不容易才形成这几派，每一等级还是一反条件所许的民族发展之道而行，都是各行其是地去搞运动，因而不仅和所有的保守派等级发生冲突，而且也和其他反对派等级发生冲突，终于不得不一齐垮台。济金根暴动中的贵族是这样，农民战争中的农民是这样，全部驯服的宗教改革运动中的市民也是这样。甚至农民和平民在德国大多数地区中也是没有共同行动，而是互相为难。我们也已经见到究竟是什么原因使阶级斗争如此支离破碎，因而使革命运动遭致完全失败，使市民阶级运动半途而废。

地方和各省的分裂割据状态以及由此必然产生的地方狭隘性和省区狭隘性如何毁坏了整个运动；市民、农民、平民都如何不能采取集中的全民性的行动；例如农民们如何在每一省区都各行其是，向来不肯支援邻区的起义农民，因而在各次战役中都被官军各个击破，而官军人数不过是全部起义群众的 $\frac{1}{10}$ ——所有这一切读者都可以从上面的叙述中看得很清楚。某些农军和敌人缔结的各种停战协定和协议恰巧成了背叛共同事业的行动，而历次农军的联合都不是为了使他们自己的行动一致一些，而只是在同共同的敌人交锋时吃了败仗才来联合，这些情形最鲜明地说明各省区农民互不关切的毛病之深到了什么程度。

在此又很自然地可以和1848—1850年的运动作一番比较。1848年反对派各阶级之间也是利害冲突，各行其是。资产阶级已充

分发展，不能再忍受封建官僚专制制度的存在，而它自己的力量又还不足以马上使其他各阶级的要求从属于它这个阶级的要求。无产阶级还过于软弱，不能期望迅速跳过资产阶级阶段而立即夺取政权，但是资产阶级统治的滋味，它在专制制度之下又已经尝够了，而资产阶级的解放就是它自己的解放的看法，又因它本身已经大为发展而不再相信了。本民族的群众，即小资产阶级，小工场主（手工业者），农民，都被他们的暂时还是天然的同盟者资产阶级认为已太革命而遗弃，而有时又被无产阶级认为不够先进而遗弃；他们自己之间又不一条心，因而一事无成，而且对左右两面同是反对派的人们都持反对态度。最后可以这样说：1525年农民之间的地方狭隘性并不比1848年参加运动的所有阶级之间的地方狭隘性还更严重些。成百的地方性革命，紧跟着也有成百的顺利进行的地方性反革命，小国林立状态保持不变等等，这一切都令人信服地证明了上述情况。谁要是在1525年和1848年两次德国革命及其结局之后还会梦吃联邦共和国，那末他没有别的去处，只配送到疯人院里去。

然而这两次革命，即16世纪的革命和1848—1850年的革命，尽管完全类似，却也大有本质的区别。1848年的革命如果没有证明德国的进步的话，那末却证明了欧洲的进步。

从1525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诸侯。从1848年的革命中得利的是谁呢？大诸侯，奥地利与普鲁士。站在1525年的小诸侯背后的，是用捐税锁链把这些小诸侯束缚起来的小市民，站在1850年的大诸侯背后，站在奥地利和普鲁士背后的，是很快就通过国债制服了这些大诸侯的现代大资产阶级。而站在大资产阶级背后的是无产阶级。

1525年的革命是一次德国地方事件。当德国人进行农民战争的时候，英国人，法国人，捷克人，匈牙利人都已进行过他们的农民战争了。如果德国已是分崩离析的话，那末欧洲就更加分崩离析。1848年的革命不是德国地方事件，它是伟大的欧洲事件的一个部分。在1848年革命的整个进程中，它的动因并不是局限于一个国家的窄狭范围之内，甚至不是局限于一个大洲的窄狭范围之内。可以说，曾为此次革命舞台的这些国家，对于此次革命的发生，恰恰起作用最少。这些国家或多或少是一些不自觉又无心无意的原料，要在现在全世界都参加的这一次运动的进程中被重新塑造一番。这一次运动在我们的现存社会制度之下看起来当然只能是一种外来的力量，但它结果正是我们自己的运动。因此从1848到1850年的革命就不能象1525年的革命那样结束。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
协会的声明²⁵⁶

兹向星期二在大磨坊街召开的协会例会主席声明，我等退出协会。

亨·鲍威尔，卡·普芬德，
约·格·埃卡留斯，塞·载勒尔，
卡·马克思，康·施拉姆，弗·恩格斯，
斐·沃尔弗，威·李卜克内西，
海茵，豪普特，格·克洛泽

1850年9月17日于伦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给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先生的信²⁵⁷

致亚当、巴特尔米和维迪尔先生

亲爱的先生们，

我们荣幸地通知各位，我们早已认为各位所说的协会实际上已经瓦解。现在要做的只剩下一件事，就是销毁原则协定。亚当先生或者维迪尔先生最好在这个星期日10月13日中午劳驾到麦克尔士菲尔德街索荷六号恩格斯先生这里来一趟，当面烧毁上述文件。

顺致敬意

恩格斯，马克思，哈尼

1850年10月9日于伦敦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手稿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约·格·埃卡留斯的
“伦敦的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
斗争”一文的编者按语²⁵⁸

本文的作者是伦敦一家缝纫店的工人。我们要问一问德国资产者，他们有多少能够如此抓住现实运动的本质的著作家呢？

无产阶级还在街垒里和战场上赢得胜利之前，就以一系列的精神的胜利宣告自己统治的来临。

读者会看到，在这里用以反对资产阶级社会和它的运动的，是纯唯物主义的、更自由的、不会由于任何情绪变化使自己走入歧途的见解，而不是魏特林和其他从事写作的工人企图用来反对现存制度的那种温情说教的心理上的批判。手工业者力图抵抗其半中世纪的手工业的衰败，渴望作为手工业者联合起来，这主要是德国的情况，法国在很大程度上也是如此，而在英国，手工业者在与大工业的斗争中遭到失败被看成是一种进步而受到欢迎，同时在手工业的失败和大工业的产生中人们开始意识到并且发现了历史本身所产生的、它每天所创造的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条件。

写于1850年10月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弗·恩格斯 废除国家的口号 和德国“无政府之友”²⁵⁹

“共产党人认为废除国家的意思只能是废除阶级的必然结果，而随着阶级的废除自然就没有必要用一个阶级的有组织的力量去统治其他阶级了。在资产阶级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把国家的权力降低到北美的国家权力的水平。在北美，阶级矛盾还没有获得充分的发展；阶级冲突每一次都由于把过剩的无产阶级人口迁往西方而得到平息；国家政权的干涉在东方达到了最低限度，在西方则根本不存在。在封建的国家里，废除国家就是要废除封建制度，建立一般的资产阶级国家。在德国，在废除国家的口号后面，不是隐藏着畏怯地逃避直接斗争的行为，就是隐藏着瞎吹资产阶级的自由，甚至把它吹嘘为各个人的绝对独立和自主的作法，再不然就是隐藏着资产者只要觉得不妨碍资产阶级利益的发展便对一切国家形式表示冷淡的态度。既然关于‘在最高意义上’废除国家的这种宣传在形式上都如此荒唐，当然柏林的施蒂纳和孚赫之流在这点上就无可厚非了。La plus belle fille de France ne peut donner que ce qu'elle a[法国最美丽的女郎只能给你她所有的东西]。”（“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4期第58页）

消灭国家，实行无政府主义在德国已成为时髦的口头语。蒲鲁

东的个别的德国门徒²⁶⁰、柏林的“最高的”民主派和甚至已被遗忘的斯图加特议会、帝国摄政²⁶¹中的“最高尚的国粹派”，都按照他们自己的一套办法学会了这一套表面极左的辞句。

所有这些派别都一致力图保存现在的资产阶级社会。但是它们要保护资产阶级社会，也就必然要保护资产阶级的统治，在德国甚至要保护资产阶级统治的成果；它们和资产阶级的正式代表不同的地方，不过是它们具有一种表面看来是“先进的”、“最进步的”人物的不寻常的外形。这种外表在实际生活中一遇到冲突就消失了；这些无政府主义的代表一遇到革命危机中的真正无政府状态，当群众〔和国家政权〕互相使用“暴力”的时候，总是又千方百计地来消除这种无政府状态。这种臭名远扬的“无政府主义”的含义，最终在比较发达的国家里总是用“秩序”二字来表达。德国的“无政府之友”和法国的“秩序之友”就是完全 *entente cordiale*〔一致〕的。

无政府之友的不属于法国人蒲鲁东和日拉丹的那部分，即他们的来自德国的思想方法都有一个共同的来源，那就是施蒂纳。一般说来，德国民主派在德国哲学分裂时期继承了它的大部分一般的辞句。德国的最近的一些学者（尤其是费尔巴哈和施蒂纳）的概念和辞句，还在2月以前就以杂乱不明的形式深入了平庸的小说文

见本卷第338—339页。——编者注

后来在手稿上删去了成果二字前面的“政治的”一词。——编者注
手稿中删去了“当国家政权在群众政权面前消失的时候”（《wo die Staatsmacht vor der Macht der Massen verschwand》）等字。在后来的一篇未修改过的手稿中有《gegeneinander》（“互相”）一词，这说明在加上《wo die Massen》（“当群众”）几字后，漏掉了《und die Staatsmacht》（“和国家政权”）几个字，因此在俄译文中在括弧内添了这几个字。——编者注

学的思想和报刊文学之中，而后者又成了三月革命后的民主派领袖的主要论据。施蒂纳鼓吹的无国家论创造了一个特别有利的条件，使蒲鲁东的无政府主义和日拉丹的消灭国家的主张具有德国哲学所固有的“最高的意义”。施蒂纳的“唯一的及其财产”²⁶²一书诚然已被人遗忘，但是他的思想方法，特别是他对国家的批判却可以在无政府之友那里重新发现。如果说我们过去已经研究了这些先生取之于法国的文献资料²⁶³，那末现在为了分析他们取之于德国的资料，我们就必须再次深入钻研已经过时的德国哲学。如果必须进行一场德国式的平淡的论战，那末遇到这种和那种观点的祖宗总比遇到旧货商要愉快得多。

诗神，请为我再准备一次飞马，
让我飞向那古老的理想的国土！²⁶⁴

在谈论上面得到的施蒂纳的那本著作以前，我们必须回忆一下“那古老的理想的国土”和那已被忘却的本书问世的时代。那时普鲁士资产阶级抓住政府财政困难的机会，立刻着手攫取政权，就在这个时候，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也和资产阶级的立宪运动一起日益蓬勃地开展起来。社会上的资产阶级分子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还需要无产阶级的支持，因此他们不得不处处把自己装扮成某种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保守的和封建的党派也不得不向无产阶级许下诺言。在资产阶级和农民进行反对封建贵族和官僚的斗争的同时，无产者进行了反对资产者的斗争；在它们之间有一些中间的社会主义派别，代表各色各样的社会主义：如反动的社会主义、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所有这些斗争、这些趋向都受到压制，由于国家政权、书报检查和禁止集会结社等的限制而无法表现出来。在德国哲学取得它最后的微不

足道的胜利的时候，各党派的情况就是如此。

书报检查制度从它实行之日起就迫使多少有点不称心的人采取尽量抽象的表达方式；当时恰好处于黑格尔学派土崩瓦解时期的德国哲学传统就提供了这种表达方式。反对宗教的斗争还在继续进行。在报刊上进行反对现存政权的政治斗争愈困难，这种斗争也就愈尽力采取宗教斗争和哲学斗争的形式。形式非常杂乱不明的德国哲学，就成了“有教养的人”的共同财产，而它愈成为共同财产，哲学家们的观点就愈杂乱不明、头绪不清和庸俗不堪，这种混乱和庸俗在“有教养的”人们的心目中树立的威信也愈高。

“有教养的人”的头脑混乱得令人吃惊，而且这种情况有增不已。它真是德国、法国、英国、古代、中古和近代思想的混合物。这种混乱状态所以这样严重，由于所有这些思想都是从第二手、第三手以至第四手上得来的，因而已被歪曲得面目全非。惨遭这种厄运的不仅有英法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而且还有德国人（例如黑格尔）的思想。正如我们看到的，当时所有的著作，特别是施蒂纳的著作都证明了这点，而且现代的德国著作至今都还受着这种后果的强烈影响。

在这种乱七八糟的情况下，哲学上的假战斗被当做了真战斗的反映。哲学上的每一次“新的变革”都引起了“有教养的人”的普遍注意。在德国这种人包括人数众多的懒汉、候补法官、候补教师、不变运的神学家、没有生意的医生、文人等。在这些人看来，每一次发生这样的“新的变革”都意味着克服和最终消除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例如，只要某位哲学家对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进行任何批判，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就会死亡，就会被抛置于历史发展之外，实际上也就被消灭了。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等等的情况也是这

样。究竟这些发展阶段实际上被“消灭”、“超过”和“消除”到什么程度，这在以后革命时期，它们开始起主要作用，而破坏它们的那些哲学家也无人再提起的时候，就会很清楚了。

混乱的形式和内容，无谓的妄自尊大和浮夸的胡言乱语，极端的庸俗和贫乏的辩证法，这就是这种德国哲学在它最后阶段上的特征，所有这些都超过了过去任何时候在这方面出现的一切。能够与此相提并论的只有那些采取难以想象的轻信态度的人，因为他们把一切都信以为真，都认为是最新的东西，是“从未有过的东西”。德意志民族，如此“认真的”……

弗·恩格斯写于1850年10月

原文是德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27年

俄文译自手稿

“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第6期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国际述评（三）

从5月到10月

最近6个月的政治运动跟6个月以前的政治运动有本质的不同。革命政党到处被挤出政治舞台，胜利者们互相争夺胜利果实：在法国，是各派资产阶级在争夺，在德国，是各邦君主在争夺。争吵得非常激烈，表面看来，公开的决裂和以武力解决争端是不可避免的了。但是，不动干戈，并且为了以后重新开始准备虚张声势的战争而一再用和平协议来掩饰犹豫不决，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我们首先来考查一下发生这种表面的风波的实际基础。

1843—1845年是工商业繁荣的几年，这个时期的繁荣是1837—1842年几乎连年工业萧条的必然结果。象往常一样，繁荣很快就产生了投机。投机常常是发生在生产过剩已经非常严重的时期。它是生产过剩的暂时出路，但是，这样它又加速了危机的来临和加强危机的力量。危机本身首先是爆发在投机领域中，而后来才波及到生产。因此，从表面上看来，似乎爆发危机的原因不是生产过剩，而是无限制的、只不过是生产过剩之征兆的投机，似乎跟着而来的工业解体不是解体前急剧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过是投机领域内发生破产的简单反映。由于我们现在无法全面叙述1843—1845年后爆发的危机的全部历史，我们只能指出生产过剩

的一些最为显著的征兆。

在1843—1845年的繁荣时期开始的投机活动，主要是在铁路经营方面，这里投机所依靠的是实际需要：由于1845年的物价上涨和马铃薯病灾而造成谷物贸易的投机，1846年棉花欠收后造成棉花贸易投机，随着英国侵入中国市场而来的投机造成对东印度和中国的贸易的投机。

英国铁路系统的发展早在1844年就已经开始，不过只是在1845年才达到最大的规模。在这一年里，登记成立铁路公司的申请书竟达1035份之多。1846年2月，很多申请注册的设计方案被拒绝之后，由于设计方案批准生效而应当向政府缴纳的款项仍达1400万英镑之巨；而在1847年，英国这一类收入的总额已达4200万英镑以上，其中英国本土铁路占3600万英镑，国外铁路占550万英镑。铁路投机的繁荣时期是1845年夏秋两季。当时股票价格不断上涨，投机者的利润很快地把各个阶级都卷入了这个漩涡。公爵和伯爵跟商人和工厂主争相参加有利可图的各铁路线的董事会。下院议员、法官和神甫也广泛参加这些董事会。即使只有一点点储蓄的人，即使只能弄到一点点贷款的人，都干起了铁路股票的投机。铁路报纸从前有3家，现在有了20多家。一些大报馆常常在一周之内就能收入14000镑的铁路广告费。工程师很缺，因此他们的薪水很高。承制广告、设计图和地图等的印刷商、石印商、装订商和纸张商等和为雨后春笋般建立起来的许多新的董事会和临时委员会等的办公室承制家具的家具商都赚了一大笔钱。由于英国和大陆的铁路系统确实有了发展并且因此而产生了投机，这个时期逐渐形成了象约翰·罗和南海公司²⁶⁵时期那样的投机取巧的风气。千百条线路的设计毫无实现的希望，其实设计者本人也根本不想真正实

现这些设计，整个问题仅仅在于让经理去挥霍寄存代付金和从出卖股票中获取利润。

1845年10月发生了剧变，很快就成为真正的恐慌。早在1846年2月以前（当时必须向政府交付寄存代付金），最不现实的设计就已经破了产。1846年4月，这种情况已经影响到大陆的股票交易所。在巴黎、汉堡、法兰克福、阿姆斯特丹，股票不得不按极为低落的价格抛售，结果使得许多银行家和经纪人遭到破产。铁路的危机一直继续到1848年秋天，而危机所以拖得这么久是由于普遍的收缩状态的影响和付款要求的提出，由于比较可靠的设计也相继破产；另外由于在投机的其他领域中，如工商业中，也爆发了危机，铁路的危机更加尖锐了，这就使得比较老的可靠的股票逐渐跌价，直到1848年10月跌到了最低的水平为止。

1845年8月，不仅发生在英国和爱尔兰，而且发生在大陆上的马铃薯病灾，首先引起了社会的注意，这是现存社会的根基腐烂的最初征兆。同时还传来了肯定证明谷物也将要欠收的消息。由于上述两种情况，在整个欧洲市场上谷物价格猛烈上涨。在爱尔兰发生了严重的饥荒，使得英国政府不得不贷给这个国家800万英镑，平均每个爱尔兰人1镑。在因遭到损失达400万英镑的水灾而更加贫困的法国，欠收情况空前严重。在荷兰和比利时欠收情况也很严重。继1845年欠收之后，1846年发生了更严重的欠收，马铃薯又一次遭受了病灾，虽然并不严重。这就为更加猖狂的谷物投机打下了完全现实的基础，而1842—1844年的丰收几乎长期使这种投机无法开展。1845—1847年，英国输入的谷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谷物价格一直上涨到1847年春天，当时从各国传来了关于新收获的矛盾百出的消息和各国政府采取了一些措施（如开放港口自由输

入谷物等),因而来了一个动摇时期,最后,到1847年5月,谷物价格达到了最高水平。在这一个月里,英国每夸特小麦的平均价格上涨到102 5先令,而有几天竟达到115和124先令。但是,很快就得到了关于气候和丰收的确实良好的消息,于是价格跌落了,7月中旬平均价格只不过是74先令。在8月中旬最后肯定1847年的收成超过平均水平之前,由于若干地区的气候不佳,价格又有些回升。当时已经没有任何东西能够阻止价格下跌。英国的输入完全出乎预料,9月18日平均价格已经跌到49 5先令。可见,在16个星期当中,平均价格的波动幅度是53先令。

在整个这一期间,不仅铁路危机继续不断,而且恰恰在1847年4、5月谷物价格最高的时候,信用系统也完全受到破坏,金融市场也完全遭到瓦解。尽管如此,谷物投机商在8月2日以前还是经住了价格下跌的打击。8月2日这一天,国家银行把最低贴现率提高到5%,而把所有两个月以上的期票的贴现率提高到6%。紧接着,谷物交易所里发生了许多大规模的破产,其中最著名的是英格兰银行的经理罗宾逊先生的破产。仅伦敦一地,就有8家大谷物公司破产,它们的债务达150万英镑以上。地方的谷物市场已经完全瘫痪,这里,特别是在利物浦,破产也同样迅速地相继而来。大陆上也发生了这种破产的现象,发生的早迟,由于距离伦敦的远近而不同。从谷物价格最低的9月18日起,英国的粮食危机才算是过去了。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商业危机本身,谈一谈金融危机。1847年前4个月,工商业的整个情况看来还是令人满意的,不过炼铁业和棉

1夸特合2 909公石。——译者注

纺织业则是例外。1845年的铁路热潮所造成的规模巨大的生铁生产，由于生铁生产过多，销售量缩减，自然也就遇到困难。在为东印度和中国市场生产的主要工业部门棉纺织业中，早在1845年为这些市场生产的商品就已经过剩，因而很快就出现了生产有某些下降的情况。1846年棉花的欠收，原料和成品价格的上涨以及由此造成的消费量的减少，更加加重了这个工业部门的收缩状态。1847年头几个月，在整个郎卡郡生产大为缩减，棉纺织业的工人已经遭到危机的打击。

1847年4月15日，英格兰银行把最短期的期票的最低贴现率提高到5%；它甚至不顾开期票的公司的性质，而限制应当贴现的期票的总额；最后，它向获得贷款的商人断然宣布，象以往一样，期限一满，就不再续贷，而要归还贷款。过了两天，当它的每周结算表公布的时候才发现，银行部的准备金已经下降到250万镑。所以银行采取了这些措施来阻止黄金流出它的地下室，重新增加现金储备。

黄金和白银从银行外流是由种种原因造成的。第一，消费和几乎所有商品价格昂贵，需要大量流通货币，特别是黄金和白银，以便进行零售交易。第二，铁路建设方面的不断投资造成从该行提取大量存款的必要性，仅4月一个月铁路建设的投资就有4314000英镑。建设国外铁路的一部分资金直接流出了国外。食糖、咖啡及其他殖民地商品输入过多，大大超过需要，这些商品的需要量和价格由于投机更加上升，欠收消息引起棉花抢购因而使棉花输入过多，特别是谷物再度欠收所引起的谷物输入过多，这一切多半都要求支付现金或成条的贵金属，这也就使得黄金和白银大量流出国外。尽管该行采取了上述措施，但是贵金属流出英国的现象一直

继续到8月底。

英格兰银行的规定和关于它的准备金很少的消息,立即造成金融市场的收缩状态,引起很大恐慌,这次恐慌笼罩了整个英国商业,其强烈程度,只有1845年的恐慌才能与之相比。在4月的最后几周和5月的前4天,几乎所有的信用交易都告停顿。但是,在这个期间没有发生过特别严重的破产。商业公司之所以能维持下去,完全是因为支付了高额利息和被迫按招致破产的价格出卖了自己的存货和国债券等等。甚至许多资本十分雄厚的公司在最初的危机中也得救了,这也无非是给它们以后的破产打下基础而已。受到直接威胁的第一个危险已被克服这个事实,大大有助于信心的增强;从5月5日起,金融市场的收缩状态开始有了明显的缓和,而到5月末,惊慌几乎已经平静下来。

然而,过了几个月,于8月初在上述的谷物贸易中的破产情况发生了,一直继续到9月;破产情况还没有结束,危机便在所有商业部门,特别是在与西印度、东印度和毛里求斯岛有来往的商业部门中变本加厉地发展起来,而且,这种情况是在伦敦、利物浦、曼彻斯特、格拉斯哥等市场上同时发生的。在9月,仅伦敦一地,就有20家公司破产,它们的债务总额达900万至1000万英镑。

“我们当时经历了英国商业王朝的复灭,这种复灭并不亚于我们近来时有所闻的大陆各政治公司的复灭。”

这番话是迪斯累里于1848年8月30日在下院说的。与东印度进行贸易的公司的破产一直继续到年底为止,而在1848年前几个月,当开始传来关于加尔各答、孟买、马德拉斯和毛里求斯岛的有关公司遭到破产的消息时,又重新发生了。

产生这种商业史上罕见的大量破产的原因是,普遍的过分的

投机以及由此而引起的殖民地商品输入过多。长期以来人为地维持高昂价格的这些商品，还在1847年4月的恐慌之前就已经开始部分地跌价了；但是全面价格下跌只是在本次恐慌以后，在整个信用系统已经瓦解，各公司不得不相继赶紧大量抛售的时候，从6、7月到11月发生了价格暴跌，以致那些历史最悠久、实力最雄厚的公司也遭到破产。

在9月，破产的还只是纯商业性的公司。10月1日，英格兰银行把短期期票的最低贴现率提高到5.5%，同时宣布今后不再发放以任何国债券作抵押的贷款。无论股份银行和私人银行家已经都经不住这种压力了。“利物浦皇家银行”、“利物浦银行公司”、“南北威尔士银行”、“新堡联合股份银行”等等在几天之内就相继垮台。同时，英国各地的许多比较小的私人银行也宣告破产。

随着这种作为10月份特征的银行普遍停止支付，利物浦、曼彻斯特、奥尔丹、哈里法克斯、格拉斯哥等地的从事有价证券、期票和股票交易的交易所经纪人，航运、茶叶和棉纺织品交易方面的经纪人，铁厂厂主，铁商，棉纺厂、毛纺厂、印花布厂的老板大批破产。据图克²⁶⁶先生说，这次破产不论就其数量和资本总额来说，在英国商业史上都是空前的，大大超过了1825年危机时期的破产。10月23日至25日，危机达到了顶点，所有商业活动都完全停顿下来。当时西蒂的代表团达到了废除已故的罗伯特·皮尔爵士发明的成果，即1844年的银行法²⁶⁷的目的。这样就立即结束了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部，具有各自的现金储备的局面。如果旧制度再继续存在两三天，两个部中的一个部，即银行部就必然会在发行部积存了600万镑黄金的时候遭到破产。

还在10月份，危机就开始影响到大陆。在布鲁塞尔、汉堡、不来

梅、爱北斐特、热那亚、里窝那、库尔特莱、圣彼得堡、里斯本和威尼斯，同时发生了大规模破产的现象。当危机的力量在英国逐渐削弱的时候，它在大陆上却加强了，并且蔓延到从来没有触及到的地方。在情况最坏的时期，期票行情对英国是有利的，因此，它从11月起不仅从俄国和大陆，而且从美洲越来越多地吸收了黄金和白银。由此而产生的直接结果就是，随着英国金融市场的活跃，在其他商业世界的金融市场上出现了收缩状态，从而在这些地方也普遍发生了危机。于是在11月英国境外的破产户开始有所增加；这时在纽约、鹿特丹、阿姆斯特丹、哈佛尔、贝云、安特卫普、蒙斯、的里雅斯特、马德里和斯德哥尔摩发生了大规模破产的现象。12月，马赛和阿尔及利亚也爆发了危机，而在德国危机开始更加剧烈。

现在我们就要谈到爆发法国二月革命的时期了。如果我们看一看戴·莫·伊文思在他著的“1847—1848年商业危机”²⁶⁸（1848年伦敦版）一书中所引用的破产户统计表，我们就会看到，由于这次革命，英国一个大公司也没有破产。而由于这次革命而遭到破产的，只是一些交易所的经纪人，这是因为所有大陆的国债券都突然跌了价。象这样的交易所经纪人的破产，当然也发生在阿姆斯特丹、汉堡等地。英国统一公债跌价6%，而在七月革命以后只跌价3%。可见，对交易所经纪人来说，二月共和国只比七月王朝危险两倍。

二月事件后笼罩着巴黎并与革命同时波及到整个大陆的恐慌，在其发展过程中跟1847年4月伦敦发生的恐慌有许多共同之处。信用活动突然停顿，交易活动也几乎完全停止；在巴黎、布鲁塞尔和阿姆斯特丹，所有的人都涌向银行，把纸币兑换成黄金。一般说来，在有价值证券交易领域以外，破产的情况还是很少的，而

且这些为数不多的破产事件也未必能够认为是二月革命的必然结果。巴黎银行家停止支付（这在大多数情况下只是暂时性的）一方面与有价证券交易有关，另一方面不过是预防性的措施，而完全不是因为真的没有支付能力；这样做，或者只是为了使临时政府大伤脑筋，给它找麻烦，迫使它让步。至于说大陆其他地区银行家和商人的破产，现在还无法断定，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这次破产是继续不断和逐渐蔓延的商业危机的结果，在多么大的程度上早已摇摇欲坠的公司为了寻找有利的出路利用了当时的情况，在多么大的程度上这次破产确是由于革命引起恐慌而造成损失的结果。但是，不管怎样，有一点是无疑的，那就是商业危机给1848年革命的影响要比革命给商业危机的影响不知大多少倍。3月到5月期间，英国已经得到了革命的直接好处：革命促使大量资本从大陆流入英国。从这时起，英国的危机可以说是已经过去了；所有的商业部门情况有了好转，新的工业周期开始明显地趋向繁荣。大陆革命对英国工商业发展的影响是有多么少，下面的事实可以证明，英国棉花加工量从4亿7500万磅（1847年）增加到7亿1300万磅（1848年）。

在英国，这次新的繁荣时期在1848、1849和1850三年当中已经明显地表现出来。从1月到8月底的8个月中，英国的输出总额，1848年为3163万3214镑，1849年为3926万3322镑，1850年为4385万1568镑。在谈到工商业部门（生铁生产除外）中所呈现的这种巨大高涨时，还必须补充一点：这3年当中各地农业都获得了丰收。1848—1850年，英国每夸特小麦平均价格跌到36先令，在法国跌到32先令。在这次繁荣时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投机的3条主要途径已经被堵死了。铁路建设的速度已降到其他工业部门的一般

水平 ;谷物贸易由于连年的丰收没有给投机提供进行活动的余地 ;国债由于革命而丧失了稳定性 ,没有这种稳定性 ,就不可能进行任何大规模的有价证券的投机活动。在历次繁荣时期 ,资本总会增加。一方面 ,扩大了的生产提供新的资本 ,另一方面 ,危机时期闲置的货币资本会脱离闲置状态 ,而投入市场。这种剩余资本在 1848— 1850年由于投机无路必然会直接投入工业 ,这样就更加速了生产的增加。虽然这种现象还没有人能够说明 ,但是这种现象在英国是多么惹人注目 ,下面1860年10月19日的“经济学家”杂志的天真议论可以证明 :

“值得注意的是 ,目前的繁荣时期与以往历次的繁荣时期根本不同。在以往历次的繁荣时期常常是一种毫无基础的投机激起了种种无法实现的希望。有时开采国外矿山 ,有时建设数目超过半个世纪的铁路。甚至这类投机有了牢靠的基础 ,所指望的收入也常常只有经过相当长的时期才能得到 ,不论收入是来自金属生产还是来自新交通线的建设和市场的开辟都是如此。这样的投机是不会马上见利的。但是 ,目前我们的繁荣的基础是直接有用的物品的生产 ,这些物品一到市场 ,几乎立刻就会进入消费的领域 ,给生产者带来相当可观的利润 ,促使他们去增加生产。”

说明1848年和1849年工业大量增产的最明显的例子是主要工业部门——棉花加工业。1849年 ,美国棉花收获量超过以往的任何一年 ,达275万捆 ,大约相当于12亿磅。棉纺织业的扩大跟输入这样增加是非常适应的 ,因而1849年底的储存甚至比以前欠收年以后的储存还要少。1849年 ,加工成纱的棉花达7亿7500万磅以上 ,而在以往最繁荣的一年1845年 ,也只不过加工了7亿2100万磅。棉纺织业的扩大还可以从下面的事实中看出 :棉花价格由于1850年稍微减产而暴涨 (55%)。在纺织业的所有其他部门 ,如丝织品、毛织品、混合织品和麻织品的生产中也有不小的进展。这些工业部门

的产品的输出，特别是在1850年，大有增加，虽然1850年棉纺织品的输出由于棉花欠收而大大减少，而该年的输出总额则增加了很多（比1848年增加1200万，前8个月比1849年同期增加400万）。尽管羊毛价格暴涨（看来暴涨1849年就已由投机造成，并且一直继续到现在），但是羊毛加工业仍在不断扩大，每天都有新纺织机投入生产。麻织品的输出在以往麻织品输出量的最高的一年1844年，为9100万码，价值为280万镑，而在1849年却达到1亿零700万码，价值300万镑以上。

英国工业增长的另一证明，是主要的殖民地商品，特别是咖啡、糖和茶叶的消费量不断增长，虽然这些商品，至少是前两种商品的价格在不断上涨。在当时的情况下，消费量的增长直接依赖于工业的扩大，是更加明显的，因为大规模铁路建设所建立起来的容量极大的市场从1845年起就早已缩小到平日的规模，近几年来谷物价格的低落也不能使农业区的消费量有所增加。

由于1849年棉纺织业的巨大发展，在同年最后几个月产生了把商品运到东印度市场和中国市场的新企图。但是这些市场上还没有卖出去的大批存货使这一企图很快就破产了。这时，由于原料和殖民地商品的需要量的增加，产生了对这些商品进行投机的企图，但是由于供应突然增加和1847年的创伤还记忆犹新，而这个企图也不得不很快地就放弃了。

此外，由于太平洋上即将开辟新航线，由于不久前荷兰殖民地的开放（这一点留待后面再谈），以及由于1851年将举办大型工业博览会，工业将会更加繁荣。当整个大陆还醉心于革命的时候，英国资产阶级在1849年就极其冷静地宣布举办这个博览会。它举办这个博览会，就会使它从法国到国的所有仆从面临一次严重的

考验，使他们在这次考验中必须表明，他们如何利用了自己的时间；就连全俄罗斯的万能沙皇本人也不得不命令他的许多臣下参加这次重大的考验。这次产品和生产者的全世界大会的意义是非常重大的，不论是给我们大陆民主主义庸人添了不少麻烦的布勒琴士和华沙的君主会议，不论是形形色色的 *in partibus*〔在异国的〕临时政府为了拯救人类而一再策划的欧洲民主主义者大会²⁶⁹，都是根本不能与之相比的。这个博览会是集中力量的令人信服的证明，现代大工业以这种集中的力量到处破坏民族的藩篱，逐渐消除生产、社会关系、各个民族的民族性方面的地方性特点。正当现代资产阶级关系已经各方面遭到破坏的时候，展览会在一个不大的地方展出现代工业积累起来的全部生产力，这同时也就是展示在动荡不定的社会的深层已经创造了的和正在一天天创造的建设新社会的物质。世界资产阶级以这个博览会在现代的罗马建立起自己的百神庙，洋洋自得地把它自己创造的神仙供在这里。它这样就在实践上证明，德国思想家年年反复说的“公民的无力和不满”，只不过是这些先生自己对理解现代运动的无力，自己对这种无力的不满。资产阶级庆祝它的这个伟大节日的时候，正是它的整个威严快要丧失，从而将非常明显地向它证明，它所创造的力量如何摆脱它的控制的时候。或许将来在一次博览会上，资产者不再作为这种生产力的所有者出现，而仅仅作为这种生产力的向导者出现。

正象1845年和1846年的马铃薯病灾一样，从今年年初起棉花欠收引起了资产阶级的普遍恐慌。当大家都知道1851年棉花产量

供一切神的寺庙，公元二世纪建于罗马。——译者注

决不会比1850年多的消息之后,这种恐慌就更加厉害了。棉花欠收在以前的时期并没有多大的意义,而在目前棉纺织业正在扩大的情况下,却具有重大的意义,已经开始严重地阻碍了棉纺织业的生产活动。资产阶级刚刚忘却它整个社会秩序的基础之一马铃薯遭到危险这个异常痛心的发现,而恢复常态的时候,现在又看到它的第二个基础棉花也遭到同样的危险。如果说,一年棉花稍微减产,预计第二年也会如此减产,这就能够在最繁荣的时期引起了严重的恐慌,那末今后几年棉花真正连年欠收,势必会把文明社会暂时抛进野蛮状态。黄金和生铁的世纪早就过去了:19世纪的科学、世界市场和巨大的生产力注定会开创棉花的世纪。同时,英国资产阶级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地感觉到,掌握着迄今尚未打破的对棉花生产的垄断的美国,对于它具有多么大的控制力。所以,它立即不惜一切力量来消除这种垄断。不仅在东印度,而且在纳塔尔和澳洲北部,甚至在世界上一切气候和条件允许种植棉花的地方,都要千方百计地鼓励种植棉花。同时,同情黑人的英国资产阶级发现,“曼彻斯特的繁荣取决于人们将如何对待得克萨斯、亚拉巴马和路易西安纳的奴隶,这是一个奇异而又可怕的事实”(1850年11月21日“经济学家”),英国最重要工业部门的基础是美洲联邦的南部诸州所存在的奴隶制度,这些地区的黑奴起义会破坏整个现代生产体系,当然,这对那些不久前为了解放自己殖民地的黑奴而拨出2000万镑²⁷⁰的人来说,是一个极其可悲的事实。但是,这个事实同时也会促使奴隶制问题(这个问题在不久前再一次成了美国国会长期剧烈争论的主题)得到唯一可能的、现实的解决。美国棉花生产是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只要工业一发展到无法再忍受合众国对棉花的垄断的地步,其他国家的棉花生

产就会蓬勃发展起来,而且现在棉花生产几乎到处都只能靠自由工人的劳动来进行。一旦其他国家的自由劳动能够为工业提供足够的棉花,而且自由劳动的价格比美国的奴隶劳动便宜,那时美国的奴隶制就会跟美国的棉花垄断一起完蛋,并且奴隶也会获得解放,因为他们当奴隶已经没有什么用了。同样的,一旦欧洲的雇佣劳动不再不再是生产的必要形式,而甚至成为生产的障碍,那时它也将会被消灭。

如果1848年开始的工业发展的新周期象1843—1847年的周期那样发展下去的话,那末1852年就会爆发危机。为了说明历次危机之前因生产过剩而产生的难以控制的投机即将来临的征兆,我们在这里提出一个事实,那就是英格兰银行的贴现率两年来一直没有超过2%。如果英格兰银行在繁荣的年月里使利息率维持低的水平,那末其他金融商人就只好把利息率压得更低,正象英格兰银行在危机的年月里把利息率提得很高,而其他金融商人把利息率提得更高一样。正如我们在上面所看到的,在繁荣时期剩余资本会不断投入信贷资本市场,依照竞争的规律,它就会自然而然地使利息率大大降低,而信用的增加会使利息率降到更低的水平,因为信用随着普遍的繁荣而逐渐扩大,从而减少了对资本的需要量。政府在这样时期有可能降低统一公债的利息率,而土地所有者有可能按较为有利的条件恢复自己的抵押贷款。这样,信贷资本市场上的资本家的收入就会减少 $\frac{1}{3}$,或者甚至还要多一些,而所有其他各种资本家的收入却会增加。这种状况继续得愈久,他们就愈不得不拚命地为资本寻找更有利的出路。生产过剩使得大批新建设计划产生,其中只要有一些计划实现就足以使大量资本投入这一方面,直到投机逐渐具有普遍性为止。但

是，我们知道，在这样情况下，投机只有两条主要道路：一是棉花，一是加利福尼亚和澳洲的发展所造成的世界市场上的新联系。我们可以看到，投机活动的范围这一次要比以往的任何一次繁荣时期都广阔得多。

我们再来看一下英国农业区的情况。那里的普遍的收缩状态由于谷物税的废除和与此同时的丰收已成为经常性的了，虽然这种情况由于繁荣时期消费量的剧增而有一定程度的缓和。同时还应当补充一点，在谷物价格很低的情况下，农业工人的处境无论如何总还是比较有利的，虽然程度上在英国要比在那些地产分成小块的国家差一些。在这种条件下，争取恢复谷物关税的保护关税派的宣传还在农业区里继续进行，虽然这种宣传比以前更低沉更隐蔽了。很显然，当工业繁荣和农业工人的不太坏的处境还继续保持的时候，这种宣传就永远不会起什么作用。但是，只要危机一发生和一波及到农业地区，农业的收缩状态就会在农村中引起一场不寻常的风波。这一次，工商业危机将破天荒第一次跟农业危机同时爆发，在引起城市和乡村、工厂主和土地所有者互相斗争的一切问题上，两派将得到两支大军的支持：工厂主将得到工业工人群众的支持，土地所有者将得到农业工人群众的支持。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北美合众国。1836年的危机是这里的第一次危机，也是最猛烈的一次危机，它几乎一直继续到1842年，其结果是美国信用系统发生了彻底的变革。合众国的商业是在这种比较牢固的基础上恢复起来的：当然一开始还很缓慢，从1844—1845年起，这方面的繁荣才完全表现出来。欧洲物价的昂贵和欧洲各地的革命，正是美国获利的源泉。从1845年到1847年底，由于谷物大量输出和1846年棉花价格高昂，美国获得了大量的利润。1847

年的危机只是轻微地触动了美国一下。1849年,美国棉花收获量超过了以往的任何一年,1850年,美国由于在欧洲棉纺织工业得到新发展的时候发生棉花欠收,而赚了将近2000万美元。1848年各国的革命使大量欧洲资本输入合众国,其中一部分是移民带来的,一部分是在欧洲购买了美国国债券。对美国有价证券的需求的增长,大大提高了它们的价格,因而这种证券近来已成为纽约狂热投机的对象。所以,不管资产阶级反动报刊怎样否认,我们仍然认为,我们欧洲的资本家所信任的唯一国家形式是资产阶级共和国。一般说来,资产阶级对任何国家形式的信任只有一种表现形式,那就是它在交易所里的牌价。

然而,合众国之所以更加繁荣,更重要的是由于另外一些原因。人口稠密的区域——北美联邦的市场——以惊人的速度向两个方向扩展。由于自然的繁育和移民的不断增长,人口的增加使整个的所有的州和地区都住满了人。威斯康星和艾奥华几年工夫就变成了人烟比较稠密的地区,在密士失必河上游所有的州,移民大大增加。苏必利尔湖地区矿山的开采和整个五湖地区谷物生产的增加,促进了商业和这个巨大内地水道上的航运事业的新发展。这种发展由于国会的最近一次会议通过关于给对加拿大和新苏格兰的贸易以很多优惠条件的法令而更为加速了。这样一来,西北部各州有了完全新的意义,而俄勒冈却几年工夫就沦为殖民地,得克萨斯和新墨西哥遭到吞并,加利福尼亚受到侵占。加利福尼亚金矿的发现使美国的繁荣达到了顶点。我们在本刊第2期就已经指出(早于欧洲的一切期刊)这一发现的特殊意义和它给世界贸易

带来的必然结果。它的意义并不在于由于发现新的金矿而增加了黄金的数量，虽然这种交换手段的增加自然不能不对整个贸易发生有利的影响。它的意义在于加利福尼亚丰富的矿藏对世界市场上的资本起了推动作用，使整个美国西海岸和亚洲东海岸都欣欣向荣，使加利福尼亚和所有受加利福尼亚影响的国家形成新的销售市场。加利福尼亚市场本身就已经很可观了：一年以前，那里才有10万居民，而如今至少有30万居民，他们差不多都是只采掘黄金，不作其他事情；他们用黄金换取其他市场供应给他们的生活必需品。但是，加利福尼亚市场要跟太平洋沿岸所有市场的日益增长的容量相比，跟智利和秘鲁、西墨西哥、散得维齿群岛的贸易的惊人发展相比，跟亚洲和澳洲与加利福尼亚之间突然发生的联系相比，还并不算大。由于加利福尼亚的发展，必须建立完全新的世界交通线，将来这些交通线的作用很快就会超过所有其他的交通线。通往太平洋（太平洋实际上只是现在才发现并将成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大洋）的主要的贸易路线今后是经过巴拿马地峡。以修建公路、铁路和运河的办法来开辟经过这个地峡的道路，对世界贸易来说现在已成为最迫切的需要，同时这些工程各处已经着手进行。从查理斯到巴拿马的铁路已经在修建。美国公司为了先用横断大陆的道路，然后再用运河把两大洋联系起来，正在尼加拉瓜的圣胡安河流域进行勘测。关于其他的线路——经过达连地峡的道路，经过新格拉纳达的阿特拉托的道路，经过退宛退伯克地峡的道路——美英报纸也正在讨论。在目前突然发觉整个文明世界对中美地势懵然不知的情况下，很难肯定哪一条线路更适于开凿大运河。不过，根据已知的有限材料来判断，沿着阿特拉托河的道路和经过巴拿马的道路具有最大的优点。随着开辟经过地峡的道

路,海洋航运业也迫不及待地需要迅速发展。南安普顿与查理斯之间,纽约与查理斯、法尔巴来索、利马、巴拿马之间,阿卡浦尔科和旧金山之间已经建立航线;但是这为数不多的几条航线及其有限的船只是远远不够的。扩大欧洲与查理斯之间的航运是日益迫切需要的了,而亚洲、澳洲和美洲之间的频繁交往要求开辟从巴拿马和旧金山到广州、新加坡、悉尼、新西兰和太平洋的重要停泊地散得维齿群岛的规模巨大的新航线。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由于迅速的殖民地化和加利福尼亚的影响,发展得比太平洋所有其他地区都快;它们再也不能容忍跟文明世界远隔4—6个月的这么长的帆船航行路程了。澳洲殖民地(新西兰除外)的总人口,由1839年的17万零676人增加到1848年的33万3764人,就是说,在9年当中增加了99.5%。英国本身也不能让这些殖民地没有航线;目前英国政府正在进行有关敷设一条衔接东印度邮线的路线的谈判,不论英国政府能否做到这一点,与美洲、特别是与加利福尼亚(去年从澳大利亚迁来8500人)的船舶来往的需要本身很快就会使自己得到满足。老实说,自从有了这种全世界海洋航行的必要的时候起,地球才开始成为圆的。

航线这样即将扩大的规模由于上述的荷兰殖民地门户的开放,由于轮船(愈来愈明显,轮船载运移民比帆船又快,又省,又有利可图)数量的增加而将会愈来愈广阔。从格拉斯哥和利物浦到纽约除了已经航行的轮船外,在这条航线上还有新型船只,同时在鹿特丹和纽约之间还将开辟一条新航线。目前资本都怎样竭力在海洋航运业中寻找投资场所,下列事实可以说明:航行在利物浦与纽约之间的互相竞争的船只不断增加,从英国到海角殖民地和从纽约到哈佛尔开辟了两条完全新的航线,纽约目前都只是议

论许多这类的设计方案。

资本如此流入远洋航运业和经过美洲地峡的运河的建设,已经为这一方面的疯狂投机打下了基础。这种投机的中心必然是纽约,因为它得到加利福尼亚的黄金最多,并且已经掌握了大部分对加利福尼亚的贸易,这样,它在美洲所起的作用,完全就象伦敦在欧洲所起的作用一样。纽约已经成为整个大西洋航运业的中心;太平洋上的所有船只也都属于纽约各公司,几乎所有这方面的新设计都出自纽约。在纽约已经开始了远洋航线方面的投机。开设在纽约的尼加拉瓜公司也开始了以开凿经过巴拿马地峡的运河为中心的投机活动。这里不久就会发生疯狂的投机,即使英国资本大量投入这类企业,即使伦敦交易所将充满类似性质的一切设计,纽约这一次仍然会成为整个这种投机的中心,而象1836年一样会首先遭到破产。有许多设计是会流产的,但是,正象1845年英国铁路网是从疯狂的投机中发展起来的一样,这一次全世界的航运业(虽然只具有总的轮廓)也将会从疯狂的投机中发展起来。即使许多公司会遭到破产,轮船还依然存在,而这些轮船将加倍发展大西洋上的运输,开辟太平洋上的交通,把澳大利亚、新西兰、新加坡、中国跟美洲联系起来,把环球旅行时间缩短到4个月。

英国和美国的繁荣很快又反过来影响了欧洲大陆。还在1849年夏天,在德国,特别是莱茵省,工厂生产情况就不坏,而从1849年底起,工商业开始普遍地活跃起来。这种再度出现的繁荣,我们德国的市民天真地认为是恢复秩序和安宁的结果,其实这完全是英国恢复繁荣和在美洲市场、热带市场上工业品需要量增加的结果。1850年,工商业有了更大的发展;完全象在英国一样,突然出现了资本过剩的现象,金融市场开始空前地活跃起来;关于法兰

克福和莱比锡的秋季博览会的报道,对于利害相关的资产者是一个极大的安慰。正如抱有纯粹伦敦式优越感的“经济学家”所讽刺地指出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事件和黑森选帝侯的事件²⁷¹,围绕着建立德意志联邦问题的斗争以及普鲁士和奥地利的威胁性的通牒,一分钟也不能阻止住这些繁荣征兆的发展。

从1849年,特别是1850年初起,法国也出现了这样的征兆。巴黎的工业都开足马力进行生产,卢昂和缪尔豪森的棉纺织厂的生产情况也相当好,虽然在这些地区也象在英国一样,原料价格昂贵是个障碍。同时,西班牙的广泛进行关税改革和墨西哥降低各种奢侈品的关税,也大大促进了法国的繁荣。法国商品对这两个市场的输出大大增加。由于资本的增加在法国产生许多投机企业,名义上这些企业是为了大规模开采加利福尼亚金矿。大批的公司相继成立,它们以小额股票和高唱社会主义的广告直接面向小资产者和工人的腰包,但是这完全是一种法国人和中国人所独有的纯粹的欺骗。其中有一家公司甚至直接受到政府的庇护。法国进口税,1848年的前9个月为6300万法郎,1849年的前9个月为9500万法郎,1850年的前9个月为9300万法郎。而1850年9月份,进口税比1849年同月又增加了100余万法郎。1849年出口也有所增加,而1850年增加得更多。

法兰西银行根据1850年8月6日的法令恢复兑现,就是繁荣再度来临的最令人信服的证明。1848年3月15日,该行曾受权停止兑现支付。当时,流通的银行券,其中包括外省银行发行的,共达3亿7300万法郎(1492万镑)。1849年11月2日,流通的银行券是4亿8200万法郎,或1928万镑,这就是说,增加了436万镑,而1850年9月2日是4亿9600万法郎,或1984万镑,即增加了将近500万

镑。同时，没有发生过银行券贬值的现象；相反的，银行券流通额增加的同时，该行地下室里存的黄金和白银日益增多，因此，1850年夏季金银储备达到了将近1400万镑，这在法国是空前的数额。该行能够这样增加自己的银行券流通额并把自己的流动资本增加1亿2300万法郎，即500万英镑，这一事实显然证明，我们在本刊以前的一期中断定金融贵族不仅没有在革命中垮台反而更加巩固了原是正确。从下面对法国近几年的银行法的概述中可以更为明显地看出这种结果。1847年6月10日，法兰西银行受权发行票面额200法郎的银行券。在这以前，银行券的最低票面额是500法郎。1848年3月15日的法令宣布，法兰西银行发行的银行券为法定支付手段，于是该行就解除了为银行券兑换硬币的责任。它有权发行银行券的数额限定为3亿5000万法郎。同时它还受权发行票面额为100法郎的银行券。4月27日的法令规定各个外省银行合并于法兰西银行；1848年5月2日的另一法令允许银行把银行券的发行额增加到4亿4200万法郎。1849年12月22日的法令规定银行券的最高发行额为5亿2500万法郎。最后，1850年8月6日的法令又重新规定银行券可以兑现。银行券流通额不断增加，整个法国信贷都集中在法兰西银行的手中，所有法国的黄金和白银都贮存在该行的地下室里，——这些事实使蒲鲁东先生得出结论说，法兰西银行现在必须脱掉旧的蛇皮，变成蒲鲁东式的人民的银行。其实，蒲鲁东甚至用不着了解从1797年到1819年英国的银行限制的历史，只要看一看海峡的对岸，就可以知道，这个据他看来在资产阶级社会历史中前所未

闻的事实正是资产阶级社会中极为正常的现象，只不过现在在法国是第一次出现而已。我们可以看到，那些在巴黎随着临时政府大唱高调的冒牌革命理论家也象临时政府中的先生们自己一样，对所采取的措施的性质和结果这个问题一无所知。

尽管法国目前出现了工商业的繁荣，但大部分人口，即2500万农民却依然由于严重的不景气而痛苦不堪。近几年的丰收使法国谷物价格跌得比英国还要低，农民因高利贷和苛捐杂税而负债累累和穷困不堪，他们的处境远远不能认为是美妙的。但是，近3年来的历史十分清楚地证明，居民中间的这个阶级根本没有能力首倡革命。

在大陆上，不论危机时期和繁荣时期都比英国来得晚。最初的过程始终是发生在英国，英国是资产阶级世界的造物主。资产阶级社会经常反复经历的周期的各个阶段，在大陆上是以第二次和第三次的形式出现的。首先，大陆对英国的输出要比对任何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但是，这样对英国的输出却又取决于英国的情况，特别是海外市场的情况。其次，英国对海外国家的输出要比整个大陆对这些国家的输出多得不可比拟，所以大陆对这些国家输出的多寡始终要取决于英国对海外的输出量。因此，即使危机首先使大陆爆发革命，那末危机的原因仍然还是产生在英国。在资产阶级躯体中，猛烈的震荡在四肢自然要比在心脏发生得早一些，因为心脏得到补救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另一方面，大陆革命对英国的影响的程度同时又是一个晴雨计，它可以测知，这种革命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实际上给资产阶级制度的存在条件以实际的威胁，在多么大的程度上仅仅触及这种制度的政治设施。

在这种普遍繁荣的情况下，即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正以

在资产阶级关系范围内一般可能的速度蓬勃发展的时候，还谈不到什么真正的革命。只有在现代生产力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这两个要素互相发生矛盾的时候，这种革命才有可能。大陆的秩序党各派的代表目前所进行的无休止的争吵是彼此为了使对方丢丑，而决不能导致新的革命；相反的，这种争吵之所以可能，只是因为目前社会关系的基础十分巩固——这一点反动派并不清楚——，十分资产阶级化。一切想阻止资本主义发展的反动企图都会象民主主义者们的切道义上的愤懑和热情的宣言一样，必然会被这个基础碰得粉碎。新的革命只有在新的危机之后才有可能。但是新的革命的来临象新的危机的来临一样是不可避免的。

现在我们来谈一谈近6个月来发生的政治事件。

在英国，每一次的工业繁荣时期都是辉格党人（他们把王国中最矮小的人约翰·罗素勋爵看作他们的理想的化身）取得胜利的时期。内阁明明知道进行次要的小改革的方案会遭到上院的否定，或者它自己在会议的最后借口时间不够而把方案撤回，但它还是把它们提交给议会讨论。时间不够常常是因为在起初枯燥无味的饶舌过多，议长通常尽可能拖到最后才出面制止，说明这个问题议会不宜讨论。在这样的时候，自由贸易派和保护关税派之间的斗争便流于纯粹的空谈。广大的自由贸易派热中于实际享有贸易的自由，既没有时间，又没有心思去比较明智地争取自由贸易的政治结果；而保护关税派却一味发泄可笑的伤心的牢骚和进行反对城市工业发展的威胁。各个政党继续进行斗争只是为了装装样子，以便经常彼此提醒对方不要忘记它。在最近的一次议会会议之前，工业资产阶级为了鼓吹财政改革吵得天翻地复，而他们在议会里却只限于理论上的空泛议论。在会议的前夕，科布顿先生在谈到俄国的贷款

的时候,再次表示要向沙皇宣战并以冷嘲热讽的口吻谈论着伟大的彼得堡穷汉;6个月之后,他竟参加了和平大会²⁷²,这场可耻的滑稽戏,这次大会的唯一结果就是:俄基布韦族的印第安人把和平的号角交给了尧普先生,而使得站在讲台上的海璠先生大为不满,同时美国佬艾利修·巴里特这位戒酒的倡导者来到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哥本哈根,想使有关的政府相信他的善良愿望。似乎争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整个战争当冯·加格恩先生干预,而不是费奈迭干预的时候,就可能严重起来!

希腊问题的辩论²⁷³是议会闭幕会上的真正重大的政治问题。大陆的一切专制主义反动派为了击败帕麦斯顿,跟英国托利党结成了联盟。路易-拿破仑为了取悦沙皇尼古拉和阿谏法国的民族虚荣心,甚至从伦敦招回了法国大使。整个国民议会对断绝跟英国的传统联盟这一勇敢的行动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这一事实使帕麦斯顿有可能在下院扮演争取全欧的公民自由的战士的角色。他获得了46票的多数,而这种既无力又荒唐的联盟的结果就是外侨管理法没有恢复。

如果帕麦斯顿在他反对希腊的行为和反对欧洲反动派的议会演说中表现了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精神,那末英国人民利用海璠先生逗留伦敦的机会大大显示了一下自己的对外政策²⁷⁴。

如果人民在伦敦大街上追逐了奥地利的军事代表,那末以奥地利的外交代表为代表的普鲁士也就遭到了适应于奥地利的地位的不幸。大家还记得,英国最滑稽的人物信口开河的著作家布鲁姆由于著作家本生不懂人情和厚颜无耻而在贵夫人的哄堂大笑中把

印第安之一族,分布在苏必利尔地区。——译者注

本生赶出上院的旁听席的情景。本生先生对这种侮辱泰然处之，就好象他所代表的伟大国家需要这样似的。他好象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根本不想离开英国。他的一切个人利益使他留恋着英国。他以后将继续利用自己的外交地位，从议论英国国教中捞些资本，给他的儿子在英国国教会中找个好的位置，给他的女儿在英国任何一个等级的绅士中物色个未婚夫。

罗伯特·皮尔爵士的逝世大大加速了旧政党的瓦解。从1845年起成为他的主要支柱的所谓皮尔派，在他死后就完全解体了。皮尔死后，几乎所有的政党把他捧为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不管怎样，他比起大陆上的“政治家”，有一个优越之处，那就是他不单单是一个野心家。其次，这位出身于资产阶级，曾作过土地贵族的领袖的人的政治智慧在于他认识到在现今的时代里只有一种真正的贵族，那就是资产阶级。在这方面，他利用了他在土地贵族中间的领导作用，经常迫使土地贵族向资产阶级让步。例如，他利用天主教徒的解放²⁷⁵和警察改革²⁷⁶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权力，1818年²⁷⁷和1844年的银行法加强了金融贵族地位，1842年的关税改革²⁷⁸和1846年的自由贸易法²⁷⁹使土地贵族直接成为工业资产阶级的牺牲品。贵族的第二个台柱是“铁公爵”，这个滑铁卢的英雄象绝望的唐·吉珂德一样，始终如一地支持棉纺织业骑士皮尔。从1845年起，托利党就把皮尔看成是叛徒。皮尔之所以能控制下院，是因为他那动听的辞令非常容易理解。只要读一遍他那最出色的演说便能看出，这些演说尽是一些空话，中间巧妙地拼凑了大量统计材料。几乎所有的英国城市都打算为这位废除谷物税的人建立纪念碑。一

家宪章派报纸在暗指皮尔1829年所组织的警察时问道：这些皮尔纪念碑对我们有什么用处呢？英格兰和爱尔兰的每个警察便是皮尔的活的纪念碑²⁸⁰。

在英国最近哄动一时的事件是，罗马教皇任命魏兹曼先生为韦斯明斯特大主教并封为红衣主教，把英国划分为13个天主教区。基督全权代理人所采取的这个完全出乎英国国教会预料的步骤，又一次证明大陆上一切反动派迷恋一种幻想，即在他们不久前靠服务于资产阶级而取得胜利的同时，现在也自然应当随之恢复整个封建专制的社会秩序及其所有的宗教属性。在英国，天主教的唯一支柱是社会上的两个极端的阶级，即贵族和流氓无产阶级。流氓无产阶级是由爱尔兰人和他们的后裔构成的平民，按其身世来说是天主教徒。而贵族阶级沉醉于崇尚皮由兹主义²⁸¹之雅事，直到最后转入天主教教会开始成为一种风气为止。当英国贵族在它反对进步的资产阶级的斗争中不得不愈来愈多地暴露自己的封建性的时候，自然必定会产生下述情况，即贵族阶级的宗教思想家，高教会派的正统神学家在跟资产阶级非国教派教会²⁸²的神学家作斗争时愈来愈不得不承认从他们的半天主教的教条和仪式中所得出的结论，甚至英国国教会的个别反动信徒会愈来愈经常地转向原始的唯一救世教会。这些无关紧要的现象在英国天主教神甫的脑海中引起了一种整个英国很快转向天主教的最美妙的希望。但是，再度把英国视为罗马行省和必须更加强转向天主教的倾向的罗马教皇的新训谕²⁸³起了相反的作用。皮由兹派突然看到他们玩弄的中世纪的把戏产生严重后果以后，怒气冲冲地退了回来，皮

由兹派的伦敦大主教立即发表声明，表示放弃自己的一切糊涂观念并宣布要对教皇的权力进行不调和的斗争。资产阶级对整个这出喜剧感到兴趣的，只是这出喜剧使它可以趁机向高教会派及其大学展开新的攻击。负责提供关于大学情况的报告的调查委员会，在下一次会议上将会掀起热烈的争论。当然，人民群众对魏兹曼红衣主教是没有什么兴趣的。相反的，在目前消息来源贫乏的情况下，他们却给报界提供了理想的材料来发表抨击庇护九世的长篇文章和愤慨言论。“泰晤士报”甚至要求政府在教皇国内煽动起义和唆使马志尼先生和意大利侨民攻击教皇，以惩罚他的侵犯行为。帕麦斯顿的机关报“地球”报把教皇的训谕跟马志尼最近发表的宣言作了非常巧妙的对比。它说，教皇要求对英国进行宗教统治，并且任命 *in partibus infidelium* [在异国的]²⁸⁴ 大主教。在伦敦这里以反教皇者²⁸⁵ 马志尼先生为首的在异国的意大利政府召开会议。马志尼先生不仅要求在教皇领地内取得而且实际上正在享有的领导权，目前也带有纯宗教的性质。教皇的训谕具有纯宗教的内容，马志尼的宣言也是一样，两者都宣传宗教，诉诸信仰，它们的格言是 *Dio ed il popolo*，即神和人民。马志尼先生至少是他所面向的大多数人民的宗教代表（因为除了神和人民的宗教之外，意大利几乎没有其他的宗教），而教皇则不是这样的代表，除了这一点之外，请问，这两种要求还有什么两样呢？不过，马志尼利用这个机会更进了一步。也就是说，他完全是为了购买武器和军事装备，而跟意大利国民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起，现在从伦敦发行了制宪议会曾经批准的1000万法郎的债券（面额100法郎）²⁸⁶。不能否认，这笔贷款要比奥地利在伦巴第发放的不成功的志愿公债²⁸⁷ 有更大的希望。

英国最近给予罗马和奥地利的确实严重的打击,是英国与撒丁的贸易协定。这项协定破坏了意大利关税同盟的奥地利计划,保证英国贸易和英国资产阶级政策在北意大利有相当牢靠的阵地。

迄今尚存在的宪章派组织也在土崩瓦解。还留在该派里面的小资产者跟工人贵族联结在一起,组成纯民主主义的派别,它的纲领只限于人民宪章和一些小资产阶级的改革。生活在真正无产者条件下的工人群众是属于宪章派的革命派。前者的首领是菲格斯·奥康瑙尔,后者的首领是朱利安·哈尼和厄内斯特·琼斯。追求曼斯特——古代国王后裔的称号的爱尔兰士绅老奥康瑙尔是古老英国的真正代表,不管他的出身和政治倾向如何。他的本质是保守的,他不论对工业进步和对革命都恨之入骨。他的整个理想充满宗法的小资产阶级的精神。他在自己的身上集中了无数的矛盾,这些矛盾都在某种平凡的 common sense〔常识〕中得到解决和调和,使他能够年复一年地每周在“北极星报”上撰写长信,而每封新的信总是与以前的信发生明显的矛盾。正是因为这样,奥康瑙尔认为自己在3个王国中是始终一贯的人,是20年来预言了一切事件的人。他有宽大的肩膀,宏亮的声音,高明的拳术,据说有一次他凭着这种拳术捍卫了诺定昂市场,使之免遭两万多人的人群的骚扰(这些都是旧时英国的代表的特征)。显然,象奥康瑙尔这样的人必然是革命运动的巨大障碍。但是,这样的人也有可取之处,即跟他们在一起和跟他们斗争时会克服大量早已养成的偏见,运动一旦最后制服了这些人,就会永远摆脱他们所代表的偏见。奥康瑙尔必将在运动的过程中死亡,不过他会因此也象拉马丁和马拉斯特两位先生一

样可能取得“正义事业的殉道者”的称号。

宪章派的两派的主要分歧之点是土地问题。奥康瑙尔和他的一派企图利用宪章来把部分工人安置在小块土地上，最后使地产小块化成为英国的普遍现象。大家知道，他借助于股份公司实行这种小规模的土地小块化的企图是如何破产的。每一次资产阶级革命都有把大片地产划小的倾向，虽然这种倾向始终伴随着小地产必然走向集中，必然在与大农业生产斗争中遭到灭亡的倾向，但是它有时能使英国工人产生一种印象，似乎奥康瑙尔提出的土地小块化是种革命的东西。宪章派的革命派提出没收一切私有土地的要求以与这种地产小块化的要求相对抗，他们要求不分配土地，使土地仍归国有。

尽管存在这种分歧和宣布了两种截然不同的要求，但是对废除谷物法时的情况记忆犹新的宪章派仍然意识到，在即将来临的危机中他们又会不得不跟工业资产者即财政改革的拥护者一道，帮助他们击败他们的敌人，从而获得他们一定程度的让步。在即将来临的危机中，宪章派的立场必然是这样的。在英国只有实行宪章，才能开始真正的革命运动，正象在法国只有赢得共和制以后，六月决战才有可能一样。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法国。

在人民坚持下，4月28日举行了新的选举，这样，人民自己把自己跟小资产阶级一道在3月10日的选举中所取得的胜利化为乌有了。维达尔不仅在巴黎当了选，而且在下莱茵地区也当了选。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代表力量很大的巴黎委员会，促使他接受下莱茵地区的委任状。3月10日的胜利已丧失了它的决定性的意义；最后的决定又被拖延下来，人民的紧张情绪也松弛了，他们已经习

惯于合法的胜利而不愿去争取革命的胜利了。最后,温情的小市民的社会幻想家欧仁·苏被提名为候选人这件事,完全使3月10日选举失去了革命意义(其意义在于恢复六月起义的声誉);无产阶级至多不过把这件事看成是献媚于轻佻女郎的玩笑。由于敌人不坚决而胆量更大的秩序党,反对这个良善的候选人,而提出了一个应该体现六月胜利的候选人。这位可笑的候选人是斯巴达式的家长勒克莱尔,不过他身上的英雄甲冑被报纸扯成了碎块,在选举中遭到了惨败。4月28日选举的新胜利鼓舞了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山岳党已经心花怒放了,认为它可以用纯合法的方式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用掀起一场使无产阶级再度登上前台的新的革命;它确信,在1852年新的选举中一定能借助普选权把赖德律-洛兰先生安置在总统座位上,并保证山岳党在国民议会里占居多数席位。新的选举,提名苏为候选人以及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的情绪,使秩序党完全相信,山岳党和小资产阶级在任何情况下都决心保持安然自得的态度,所以秩序党以废除普选权的选举法回答了这两次选举的胜利。

政府极为谨慎,自己不对这项法案负责任。它向多数派作了假的让步,把这项法案的起草工作交给了多数派的首脑17个城主²⁸⁸。这样一来,就不是政府向国民议会提议,而是国民议会的多数派向自己提议废除普选权。

5月8日,这个法案提交议会审核。所有社会民主主义报刊都开始异口同声地劝说人民要保持体面,要保持 *calme majestueux* [最大的冷静],要安然等待,要信赖自己的代表。这些报纸的每一篇论文都承认,革命首先会消灭所谓革命报刊,可见现在的问题是报刊自卫的问题。冒牌的革命报刊暴露了自己的秘密。它签署了自

己的死刑判决书。

5月21日，山岳党将问题提交初步讨论，要求否决整个提案，理由是它违反宪法。秩序党回答说，宪法在必要时是要违反的，但现在还用不着，因为宪法可以做各种解释，只有多数派才有权决定哪种解释是正确的。山岳党对梯也尔和蒙塔郎贝尔的肆无忌惮的野蛮进攻，报以彬彬有礼的人道态度。山岳党引证了权利的基础，秩序党给它指出了产生权利的基础——资产阶级所有制。山岳党哀求地说：难道他们真的要不顾一切地挑起革命吗？秩序党回答说：革命是不会使我们惊慌失措的。

5月22日，问题的初步讨论以462票对227票的多数而告结束。有些人曾经十分庄严而认真地证明说，国民议会和每个议员一旦使赋予他们代表权的人民丧失了权利，自己也就丧失代表权，正是这些人仍然泰然自若地坐在自己的席位上，他们不是自己去行动，而是突然让全国行动起来，以请愿的方式行动起来；甚至当5月31日法案已经顺利通过的时候，他们还是安然不动。他们由于企图为自己雪耻，而写了一份记录他们与强奸宪法毫无关系的事实的抗议书，但是，就连这份抗议书，他们也没有公开发表，而偷偷地塞进议长的衣袋里。

屯驻巴黎的15万大军，最后的决定无限期的拖延，报刊提出的保持冷静的号召，山岳党和新当选的议员的胆小怕事，小资产阶级的最大的冷静，而主要是工商业的繁荣，阻碍了无产阶级进行任何革命的试图。

普选权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大多数人民都上了有教育意义的一课，普选权在革命时代所能起的作用也不过如此。它必然会被革命或者反动所废除。

在随后不久发生的事件中,山岳党表现了更大的毅力。陆军部长奥普尔在国民议会的讲坛上把二月革命称作是不详的灾难。山岳党照例以大吵大嚷表示正义的不满,但是议长杜班不让山岳党的演说家发言。日拉丹提议山岳党立刻全体退出会场。结果,山岳党依然就席不动,而且拉丹则作为一个不够资格的人被驱逐出山岳党。

选举法还需要有个补充,即制定新出版法。后者不久就会问世。经过秩序党的大量修正而变得更加严厉的政府提案,规定要增加保证金,规定对报纸上刊载的小说附加印戳费(这是对欧仁·苏当选的报复),对周刊和月刊上满一定页数的一切作品都要征税,最后,规定报纸上的每一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署名。保证金的规定扼杀了所谓革命报刊;人民把这些报纸的死亡看成是废除普选权的报应。但是,新法案的意图和作用不仅仅指向这一部分报刊。当报刊是匿名的时候,它是广泛的无名的社会舆论的工具;它是国家中的第三种权力。每篇文章都署名,就使报纸纯粹成了或多或少知名的人士的作品文集。每一篇文章都降到了报纸广告的水平。在这之前,报纸是作为社会舆论的纸币流通的,现在报纸却变成了令人难以相信的单户期票,它的可靠程度和流通情况不仅取决于开支票者的信用,而且还取决于背书人的信用。秩序党的报刊不仅煽动废除普选权,而且还煽动对“坏”报刊采取极端严厉的措施。然而,就连“好”报刊,也由于不详的匿名而不合秩序党的口味,尤其不合它的外省的各个代表的口味。秩序党希望只跟领取稿酬的著作家打交道,想知道他们的名字、住址和相貌。“好”报刊埋怨人家以忘恩负义的恶劣态度来酬谢它的功劳是白费力气的。法案通过了,而署名的要求首先打击了它。共和主义政论家是相当著名

的，但是，当这批神秘人物突然表现为象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一样的卖身求荣、见钱眼开、为了金钱而一生为什么都作辩护的 penny- a- liners [不值钱的文人]，或者表现为象卡普菲克那样以国家要人自居的老废物，或者表现为象“辩论日报”的勒姆安先生那样的卖弄风骚的下流作家的時候，被吹嘘为国家之智慧的“辩论日报”、“国民议会报”、“立宪主义者报”等等可尊敬的报馆便陷于愚蠢透顶的地步。

在讨论出版法的时候，山岳党已经如此下流，竟一味给路易-菲力浦时代的老知名之士维克多·雨果先生的高谈阔论拍手喝采。

从选举法和出版法通过时起，革命的和民主的党派就退出了官场的舞台。议会闭会不久，在议员动身回家之前，山岳党的两派——社会主义民主派和民主社会主义派——发表了两篇宣言，即两份 *testimonia paupertatis* [贫困证明书]，用以证明，虽然权力和成功从来没有在他们那一边，但是他们却一向都是站在永恒的正义和一切永恒的真理的方面。

现在来谈一谈秩序党。“新莱茵报”杂志在第3期第16页上写道：“波拿巴反对那些联合起来的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实际政权的法律基础——共和国；秩序党反对波拿巴的复辟欲而保卫着自己共同统治的法律基础——共和国；正统主义者反对奥尔良党人，奥尔良党人反对正统主义者而保卫着 *status quo* [现状]——共和国。秩序党中所有这些集团各自 *in petto* [心里]都有各自的国王，都有各自的复辟王朝，同时又都为反对自己敌方的篡夺欲和谋叛而坚持着资产阶级的共同统治，坚持着它们各自的要求借以互相抵消而又互相保留的统治形式——

共和国。……当梯也尔说‘我们保皇党人是立宪共和国的真正支柱’时，他甚至连没有料想到他的话里竟包含有这末多的真理。”

Républicains malgré eux〔不得已的共和派〕这出喜剧，即反status quo的喜剧和现状的不断巩固；波拿巴与跟国民议会之间的一贯冲突；秩序党内经常出现的分裂为几个组成部分的危险；它的各派经常的重新团结；每一派都想把对共同敌人的每一次胜利变成自己的暂时同盟者的失败的企图；相互的仇视，陷害，谋杀，常常拔剑动武，而结果总是 baiser - Lamourette〔拉摩勒特式的接吻〕²⁸⁹，——整个这一出平平淡淡的谬误喜剧从来没有演得象最近6个月那样精彩。

秩序党同时把选举法也看作是对波拿巴的胜利。波拿巴政府把自己提案的草拟工作和对这项提案的责任交给了十七人委员会，这难道还不是波拿巴政府放弃了政权吗？难道波拿巴对抗国民议会的主要本钱不就是他有600万选民吗？在波拿巴这方面看来，选举法是对议会的让步，他用这种让步换得了立法权和行政权之间的协调。下贱的冒险家要求把他的薪俸增加300万法郎来酬劳这种让步。国民议会在它宣布法国绝大多数人民不受法律保护的情况下，能否跟行政权发生冲突呢？国民议会十分气愤；看来它决心要采取极端措施了；它的委员会否决了提案；波拿巴的报刊通过指出人民被抢劫和被剥夺了选举权的办法也采取了严厉的口气。进行了许多喧嚷的企图达成协议的活动；议会终于在事实上作了让步，但同时在原则上却进行了报复。国民议会不同意在原则上把年俸固定增加300万法郎的要求，而决定只拨给波拿巴216万法郎

见本卷第88—89页。——编者注

暗喻莫里哀的喜剧“打出来的医生”。——编者注

的临时补助金。它对此并不满意，它之所以作了这种让步，只是因为秩序党的将军和波拿巴的自告奋勇的庇护者尚加尔涅主张这样做。这样，这200多万的款子实际上不是决定给波拿巴的，而是表决给尚加尔涅的。

波拿巴全然以赏赐者的心情接受了这个 *de mauvaise grâce* [勉强] 抛掷的施舍。波拿巴的报刊重新对国民议会进行了攻击，而当讨论出版法过程中首先针对代表波拿巴私人利益的二流报纸提出了关于文章署名的修正案的时候，波拿巴派的主要机关报“权力报”对国民议会进行了肆无忌惮的猛烈攻击。内阁阁员不得不在国民议会面前斥责这家报纸；“权力报”的主编被传来向国民议会请罪，并被科以最高的罚金5000法郎。次日，“权力报”刊载了一篇更蛮横的文章攻击议会，而政府为了报复起见，以破坏宪法的罪名控告了几家正统派的报纸。

最后，提出了议会会议延期的问题。波拿巴为了行动不受国民议会的任何阻碍，需要会议延期。秩序党一方面为了自己的各个流派进行阴谋活动，另一方面为了各个议员的个人利益，也需要会议延期。两者为了巩固和扩大各省的反动派的胜利都需要会议延期。因此议会把它的会议从8月11日延期到11月11日。但是，因为波拿巴毫不隐讳地一心想要摆脱国民议会的讨厌的监督，所以议会使它的信任票本身具有了不信任总统的性质。没有一个波拿巴分子参加由28人组成的在议会休假时期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常设委员会²⁹⁰。为了向总统证明多数人对制宪共和国的忠诚，没有选波拿巴分子，反倒选了几个“世纪报”和“国民报”的共和派分子。

在议会会议延期前不久，尤其在刚刚延期的时候，看来，秩序

党的两大派奥尔良派和正统派要准备和解,和解的基础就是它们斗争时所标榜的两个皇室的合并。报纸上满是圣列奥纳尔德斯的路易-菲力浦的病床前所讨论的和解计划;但是路易-菲力浦的逝世突然使情况简单化了。路易-菲力浦是个篡位者,亨利五世曾被她劫夺过,而巴黎伯爵由于亨利五世无嗣便成了他的合法继承人。现在已经没有任何借口来反对两个王朝的利益的结合。但是资产阶级的两个流派恰恰现在才终于明白,使它们分裂的并不是对这个或那个皇室的温情的爱恋,相反的,是它们的不同的阶级利益使两个王朝分了家。正统派象他们的竞争者到圣列奥纳尔德斯去谒见路易-菲力浦一样,到维斯巴登谒见亨利五世,在那里获悉路易-菲力浦逝世的消息。他们立刻组织了 *in partibus infidelium* [在野]²⁹¹ 内阁,其成员主要是上述保护共和国贞操的委员会的委员,这个内阁趁党内发生冲突的时机立刻直言不讳地宣布他的权利是上帝恩赐的。奥尔良派看到这个宣言²⁹²在报刊上使对方丢了丑而兴高采烈,竟毫不掩饰他们公开敌视正统派的态度。

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各省议会都开会了。它们大多数都赞成用或多或少的保留条件来限制修改宪法,就是说,它们赞成君主制复辟,但又不加以比较确切的说明;赞成“解决问题”,但同时又认为自己权力和胆量都太小,因而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波拿巴派急忙从延长波拿巴总统任期的角度来解释这种修改宪法的希望。

统治阶级决不能容许用合法的宪制的方法解决问题,就是说,决不能容许波拿巴在1852年5月辞职,同时由全国选民选举新总统,在新总统上任后几个月之内由为修改宪法而选出的特别议院来修改宪法。新总统选举之日,必定是正统派、奥尔良派、资产阶

级共和派、革命派等一切敌对政党相逢之日。结果必然要发生各个派别之间的暴力冲突。即使秩序党能够一致推出一个皇室之外的中立候选人，波拿巴也会反对这个候选人。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得不经常加强行政权的力量。行政权一加强，它的执有者波拿巴的地位也就加强了。因此，秩序党为加强其共同的实力而采取的每一步骤，也就加强了想登王位的波拿巴的战斗力的，增加了他在紧急关头以武力阻挠用制宪方法解决问题的可能性。那时，波拿巴在其反对秩序党的斗争中会不惜破坏宪法的一个基础，正象秩序党在其反对人民的斗争中不惜破坏宪法的另一基础，即废除普选权一样。很可能，他甚至会诉诸普选权来反对国民议会。总之，制宪的解决办法会使整个政治 *status quo* [现状] 岌岌可危，而资产者觉得在 *status quo* 动荡不定的后面是混乱，无政府状态，内战。他们好象觉得，在1852年5月头一个星期日，他们的一切买卖活动，期票，婚约，公证书，抵押，地租，房租，利润，一切契约和收入来源都将朝不保夕，——他们不能让自己冒这样的危险。在动荡不定的政治 *status quo* 的背后潜伏着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于崩溃的危险。对资产阶级来说，唯一可能解决的办法就是延期解决的办法。它只能用破坏宪法和延长总统任期的办法来挽救立宪共和国。这就是秩序党报刊在省议会会议后对所热中的“解决问题”的办法经过了长期而深入的辩论而做的结论。由此可见，可耻的是强大的秩序党认为自己不得不认真对付这个可笑的平庸的它所仇恨的人物假波拿巴。

这个齷齪的人物对愈来愈使他成为必要人物的真正原因却糊里糊涂。他的党十分明了，波拿巴的作用日益增长是当时的环境造成的，而他本人却相信，这完全是他的名字的魔力和他一贯模仿

拿破仑造成的。他的雄心一天比一天大。他以周游法国回答了对维斯巴登和圣列奥纳尔德斯的拜谒。波拿巴分子对他这个人的魔力不抱什么希望，所以他们派出成火车成马车的流氓无产阶级组织十二月十日协会的成员到处跟着他捧场喝采。他们根据该城市对总统接待的情况，通过自己的傀儡之口说出或者意味着共和主义的温顺的话，或者意味着坚忍和倔强的精神的话，作为总统施政的座右铭。尽管施用了一切花招，但是这次出访还是极不象个凯旋的游行。

波拿巴确信他用这种办法把人民鼓动起来了，于是他着手在军队里进行宣传。他在凡尔赛附近的萨托里平原上举行了盛大的阅兵式，在阅兵时，他力图用大蒜腊肠、香槟酒和雪茄烟来收买兵士。如果真拿破仑在其侵略性远征的困难当中善于靠突如其来的表现家长式的关怀来鼓励疲劳的士兵，那末假拿破仑则以为，士兵高喊《Vive Napoléon, vive le saucisson》〔“拿破仑万岁，腊肠万岁！”〕，即“腊肠万岁，小丑万岁！”，就是向他表示感谢。

这次阅兵式的结果，暴露出了波拿巴和陆军部长奥普尔方面跟尚加尔涅方面长期隐伏的纠纷。秩序党认为尚加尔涅是它的真正中立的人物，因为这个人谈不上有什么想登王位的野心。秩序党指定他作为波拿巴的继承人。加之，尚加尔涅由于在1849年1月29日和6月13日的行为，竟成了秩序党的伟大统帅，在胆怯的资产者看来成了以蛮横的干涉砍断了革命的戈尔迪之结的新亚历山大。其实他跟波拿巴一样的可怜，他以这种极便宜的手段变成一个有势力的人物，被国民议会捧出来作为总统的监视人。他自己以波

俏皮话：《Wurst》——“腊肠”《Hanswurst》——“小丑”。——编者注
见本卷第124页脚注。——译者注

拿巴的庇护者的身分卖弄过风骚——如在讨论总统的薪俸时就是如此——,并且对待波拿巴和阁员们愈来愈高傲。当人们预料新选举法公布时会发生暴动的时候,他不许他的军官接受陆军部长或总统的任何命令。报刊方面也帮助吹捧尚加尔涅这个人。秩序党由于完全没有什么杰出人物,而不得不把一个人描绘成它整个阶级中并不存在的有力人物,以这种办法把他吹捧为一个巨人。关于尚加尔涅是“社会中坚”的神话就是这样产生的。尚加尔涅能把整个世界担在自己的双肩上的无耻的欺骗和神秘的骄傲,跟萨托里阅兵时和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事件形成了十分可笑的对比。这些事件无可争辩地证明,只要波拿巴这个极端渺小的人物灵机一动,就足以使资产阶级恐慌心理的幻想产物——巨人尚加尔涅降为一个平庸人物,就足以把这位拯救社会的英雄变成领取抚恤金的退伍将军。

波拿巴有一次曾唆使陆军部长跟讨厌的庇护者因纪律问题而发生冲突,来对尚加尔涅进行报复。最近在萨托里举行的阅兵式,终于使旧怨公开爆发了。当骑兵团列队通过波拿巴面前并高呼反宪法口号《Vive l'Empereur》〔“皇帝万岁!”〕时,拥护制宪的尚加尔涅的不满达到了极限。波拿巴为了逃避在议会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对这些口号进行不愉快的辩论,把陆军部长奥普尔撤了职,任命他为阿尔及利亚的总督。他任命一个十分可靠的帝国时代的老将军担任了陆军部长的职务,这位老将军的粗暴丝毫不亚于尚加尔涅。但是,为了不让人觉得奥普尔的免职是对尚加尔涅的让步,波拿巴同时又把伟大的社会救星的心腹诺马耶将军从巴黎调到南特。诺马耶是在最近一次阅兵式上使步兵在拿破仑继承人面前默默走过的罪魁。由于诺马耶的被调而感到自己被触犯的尚加

尔涅开始表示抗议,进行恫吓。结果白费力气。经过两天的谈判,调动诺马耶的命令在“总汇通报”上发表了,秩序的英雄除了服从纪律或提请辞职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办法。

波拿巴跟尚加尔涅的斗争是他跟秩序党的斗争的继续。因此,11月11日国民议会在不祥的征兆下召开了新的会议。但是,这将是杯水之浪。一般地说,旧把戏还会重演。尽管秩序党各派的原则维护者嚎啕大叫,秩序党的多数人仍然不得不延长总统任期。仅仅因为缺钱就已经屈服的波拿巴,不管自己过去进行了怎样的抗议,也要把这种延长的权力当作纯粹从国民议会手里得到的职权接受下来。这样,问题的解决就延搁下来, *status quo* 就保持下去;秩序党的各派互相攻击,互相削弱;使对方无地自容;对共同的敌人、即全国群众的镇压就会加强,以至最后归于消灭,直到经济关系本身终于重新达到很高的发展水平,甚至使所有这些互相争吵的政党跟它们的立宪共和国由于新的爆炸而粉身碎骨为止。

不过,为了安慰资产者,还需要补充一点,波拿巴与秩序党之间的斗殴,使交易所里许多小资本家破了产,使他们的资本转到交易所大豺狼的腰包里去了。

德国近半年来的政治事件充其量不过是普鲁士欺骗自由派,奥地利欺骗普鲁士的一出喜剧。

1849年,看来问题在于普鲁士在德国的霸权;1850年,问题在于奥地利和普鲁士之间的分权;1851年,问题将完全在于普鲁士以怎样的形式隶属于奥地利并作为悔过的罪人返回完全重建的联邦议会的怀抱。普鲁士国王希望由于1848年3月21日他那不幸的柏林御驾巡游²⁹³受到酬谢而捞到的小德意志²⁹⁴,却变成了小普鲁

士。普鲁士必须老老实实地承受任何侮辱并退出大国之列。甚至连有关联邦的一点点幻想也由于它的政策的计谋平平淡淡没有远见而破灭了。普鲁士假惺惺地硬说联邦具有自由主义性质，它这样用它向来不重视的立宪的妄想使哥达党²⁹⁵的谋士们糊涂起来；不管怎样，普鲁士本身由于整个工业的发展，连年的赤字和国债，成了一个十足的资产阶级国家，因而它无论怎样逃避或反抗，也越来越陷入了立宪主义。如果哥达党的谋士终于发现，普鲁士怎样无耻地对待他们的智慧和尊严，如果甚至加格恩或勃律盖曼也终于以正当的不满背弃了十分露骨地玩弄祖国的统一和自由的政府，那末那些被普鲁士纠集在自己的羽翼之下的小鸟——小国的君主不会给普鲁士带来多大的愉快。这些公侯只有在极端受压迫和无保护的情况下才寄身于渴望并吞²⁹⁶的普鲁士老鹰的利爪之下。为了借助于普鲁士的干涉，威胁和示威使其臣民象从前一样唯命是从，它们不得不付出很高的代价——签订奴役性的军事条约，建立招致破产的军营和用实施联邦宪法的办法打开合并的近景。而普鲁士本身竭力设法使它们不致遭受这种新灾难。普鲁士到处恢复反动的统治，而随着反动势力的加强，小国的君主纷纷脱离普鲁士，投入奥地利的怀抱。既然它们很快又可以按照三月事件以前的方式进行统治，那末专制的奥地利对它们来说就要比普鲁士更亲近一些，因为普鲁士既不能成为专制主义的，又不想成为自由主义的。况且，奥地利的政策并不是要吞并小国，相反的，是要保存它们作为重新恢复的联邦议会的不可分割的部分。这样，普鲁士就只好眼看着前几个月普鲁士军队拯救过的萨克森脱离了它，眼看着汉诺威和黑森选帝侯国脱离了它，现在，巴登不顾本国还驻有普鲁士的警备队也跟着其他小国脱离了它。普鲁士为了支持汉

堡，梅克伦堡，德骚和其他地方的反动势力化了不少力气，但是得利的不是普鲁士，而是奥地利，这一点它现已从两个黑森的事件²⁹⁷中看得清清楚楚。这样，碰了壁的德国皇帝至少相信一点：他生活在背信弃义的时代里，如果说他现在不得不眼看着失掉他的“右手，即联邦”，那是因为这只手早就麻木不仁了。这样一来，奥地利现在已经把它的霸权扩大到整个德国南部，甚至德国北部的一些重要的小国也成了普鲁士的敌人。

最后，奥地利十分猖狂，竟公然依靠俄国公开反对普鲁士。它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和黑森选帝侯国两个问题上就是这样作的。

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德意志的宝剑”签订了真正普鲁士的单独的和约，把自己的同盟者出卖给力量占优势的敌人。英国、俄国和法国决定终结各公国的独立并把这一愿望写在奥地利所参与的备忘录里。奥地利以及跟它结成联盟的德意志各邦政府根据伦敦的备忘录，在新恢复的联邦议会中表示赞成德意志联邦对霍尔施坦进行有利于丹麦的干涉，而普鲁士则企图继续奉行两面政策，驱使斗争的双方服从被多数的、同时实力最强的政府所否决了的、尚不存在和无法肯定的“联邦仲裁法庭”；普鲁士尽管用了一切手法，但是除了大国怀疑它有革命阴谋和收到许多使它很快失掉实行“独立”外交政策的兴趣的威胁性照会之外，它毫无所得。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人很快就有可能回到本邦君主的慈父般的保护之下，而允许贝泽勒尔和雷芬特洛夫两位先生统治自己的人民，虽然所有的军队都站在他们一边，仍然证明它还需

指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编者注

要丹麦的鞭子来教育自己。

黑森选帝侯国的运动²⁹⁸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证明德意志小国的“叛乱”会导至什么结果的无与伦比的例子。市民对骗子手哈森普弗鲁克进行的合乎道义的反抗实现了向这种情况所能要求的一切；议会步调一致，居民万众一心，官吏和军队都站在市民一边；所有的对立因素都已消除，君主们，滚出国家 这个号召自然而然地实现了，骗子手哈森普弗鲁克跟他的内阁一起垮台了；一切事情都是按预订计划进行的，——一切政党都严格遵守了法律规定，避免了任何过火行为，而反对派不费吹灰之力就取得了立宪派反抗史上的最辉煌的胜利。现在一切政权都掌握在市民手中，他们的等级委员会在任何地方也没有碰到一点反抗，这正是他们应当表现自己的时候。现在他们已经看到，驻守边境的不是黑森选帝侯国的军队，而是准备开进这个国家并在24小时内结束市民统治的整个伟业的外国军队。只有现在才开始不知所措和忍受耻辱。如果说他们从前是不能后退，那末现在他们是不能前进。黑森选帝侯国拒绝纳税这件事比以往的任何事件更令人信服地证明，小国范围内的一切冲突在多么大的程度上变成纯粹的滑稽剧，而这种滑稽剧的唯一结果总是外国进行干涉和用废除君主和宪法的办法来消除冲突。这个事实证明，小国的小市民以爱国主义的坚强意志捍卫三月革命的任何一点微小成果使之免遭必然侵害的一切光荣的战斗是多么可笑。

在联邦成员国黑森选帝侯国（必须使它从普鲁士的怀抱里挣脱出来），奥地利直接出面反对它的竞争者。奥地利正是要煽动选帝侯反对宪法，而后马上把他置于自己的联邦议会的保护之下。为了使这种保护有实力作后盾，为了在黑森选帝侯国事件中打垮普

鲁士对奥地利的统治的反抗和以威胁手段迫使普鲁士重新参加联邦议会，奥地利和南德意志的军队现已屯驻在法兰克尼亚和波希米亚。普鲁士也武装了起来。报纸大肆刊载各种有关军团的进军和反进军的消息。所有这一切喧嚷正象法国秩序党跟波拿巴的争吵一样，是不会有结果的。无论普鲁士国王和奥地利皇帝都做不了主，只有俄国沙皇才能作主。反叛的普鲁士最后必定会向沙皇的命令屈服，斗争的双方就可以不流一滴血，和平地坐在联邦议会里，但是，它们互相之间的无谓的嫉妒，它们与自己臣民之间的分歧以及它们对俄国最高统治权的不满都不会因此就有任何减少。

我们现在来谈一谈最抽象意义上的国家，即全欧的人民、流亡的人民。我们不准备谈德国、法国、匈牙利等流亡者的个别支部；它们的 *haute politique* [高等政策] 不过是纯粹的 *chronique scandaleuse* [丑闻录]。但是，*in partibus infidelium* [在野] 的全欧人民最近有了一个欧洲中央委员会这样的临时政府。这个委员会的成员是朱泽培·马志尼，赖德律-洛兰，阿伯特·达拉什（波兰人）和阿尔诺德·卢格，卢格为了证明他的参加是正当的，谦逊地签上了头衔：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虽然很难指出什么样的民主主义会议使这四位福音传播者担负了他们的职位，但是不能否认，他们的宣言包含着大批流亡群众的信仰的象征，并以相应的形式概括了这些群众从近来的革命中取得的精神成果。

宣言一开始就出色地列举了民主力量。

“为了取得胜利，民主力量还缺少什么呢？……缺少组织…… 我们有教派，但没有教会，有不成熟的自相矛盾的哲学体系，但没有宗教，没有使信仰者团结在共同口号之下并使他们的劳动协调一致的集体信仰…… 我们

有一天将会团结一致，并在我们当中的优秀人物统率之下共同前进……，这一天将是战斗的前夕。在这一天我们清点一下我们的队伍，我们将会知道我们是怎样的人，我们将会意识到自己的力量。”

为什么革命到现在还没有取得胜利呢？因为革命政权手中的组织比政府手中的组织力量薄弱。流亡者临时政府的第一个法令就是这样说的。

它说现在必须用组织信仰者的军队和创立宗教的办法来挽救这种不幸。

“但是，为此必须克服两个巨大的障碍，消除两个严重的糊涂观念：一是对个人权力的夸大，一是理论的冷酷的排他性…… 我们不当说‘我’，我们应当学会说‘我们’…… 那些意气用事和拒绝纪律和组织所要求的轻微牺牲的人，他们会由于过去的习惯而否定他们自己所宣传的共同信仰…… 理论的排他性是对我们的基本教条的否定。谁说我已经发现政治上的真理，谁把接受它的体系当作承认兄弟般合作的条件，谁就是仅仅为了确定他本身的‘我’，而否定人民，即否定世界规律的一致的进步的解释者。谁确信在目前能以自己智慧的孤立劳动（无论这种劳动有多大的威力）彻底解决群众所关心的问题，谁就放弃真理的永恒源泉之一，即放弃被吸引来参加行动的人民的集体直观，而注定由于自己知识贫乏犯下错误。彻底解决是胜利的秘密……

我们的体系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只能是解剖尸体，发现病症，分析致死的原因，而对领悟生命和理解生命是无能为力的。生命，这就是运动中的人民，这就是由于互相接触，由于预言家对伟大事业（这个事业必然是靠自发的闪电般地突然在大街上进行的联合而完成的）的预感而力量空前壮大的群众；生命，这就是这样一种行动，它能使希望、自我牺牲、爱和热情的一切尚在沉睡的力量达到最紧张的程度，能表现人的统一的本性和他的全部创造力。在开辟新纪元的一个历史关头中，工人的握手将比近两千年来（旧社会）的冷酷无情的智力劳动或伟大的死人的无比智慧更多地告诉我们未来的组织的情况。”²⁹⁹

括弧里的话是作者的。——译者注

由此可见，这一派夸夸其谈的谬论归根到底只不过是普通的庸人之见，根据这种意见，似乎革命的失败是由于个别领袖争相沽名钓誉，由于互相敌对的人民导师意见发生分歧而造成的。

在我们的福音传播者看来，各个阶级和各个阶级的各个派别之间的斗争（它的个别发展阶段也就是革命）不过是互相矛盾的体系的存在可悲结果，其实完全相反，不同体系的存在是阶级斗争存在的结果。单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宣言的作者是否认阶级斗争存在的。他们借口反对空谈家，而取消任何明确的内容，任何明确的政党的观点，否认各个阶级有权表达自己的利益，提出与其他阶级相对立的要求。他们建议这些阶级忘记利益的对立，在十分庸俗而又露骨的态度暧昧的旗帜下求得和解，其实这种暧昧态度是在调和一切政党利益的幌子下掩盖着仅仅一个政党——资产阶级政党的利益的统治。如果考虑一下这些先生近两年来在法国、德国、意大利所获得的经验，甚至很难令人相信，虚伪地用拉马丁的关于友谊的词句来掩盖资产阶级利益的行为是无意识的。同时，这些先生对“体系”的了解多么深刻，从下面一点就可以看出：他们认为，似乎这些体系中的任何一个都不过他们的宣言的整个智慧的一部分，这种智慧片面地把收集在宣言中的自由，平等等词汇之中的任何一个都当成了基础。他们对社会组织概念描写得很令人惊奇：街头集会，骚动，握手，这样，就一切都不成问题。在他们看来，革命只不过是推翻现存的政府；如果达到了这个目的，那就是取得了最后的“胜利”。那时，运动、发展、斗争就会停止，欧洲共和国和永世逍遥自在的黄金时代就会在那时将居于统治地位的欧洲中央委员会的庇护下宣告开始。这些先生不仅憎恶发展和斗争，而且憎恶思

维，即冷酷的思维，——好象任何一个思想家，包括黑格尔和李嘉图在内，任何时候都可能走到象他们把这种稀薄的污水泼在群众头上那样冷酷无情的地步！人民勿须乎关心明天，可以从脑子里除去一切思想；当伟大的具有决定意义的日子一来临，人民只要一触动就会激动起来，这样，他们就会奇妙地看穿关于未来的谜。这个放弃思维的号召是专门直接欺骗最受压迫的阶级的企图。

“难道这样我们就是说（欧洲中央委员会的一位委员问另一个委员）我们应当不带旗帜上街吗？难道我们就是说我们打算在我们的旗帜上只写上否定两个字吗？人们是不会怀疑我们做这类事情的。我们作为很早就参加人民的斗争的人民代表，绝不会使人民空虚的。”

相反的，这些先生为了证明自己思想的丰富，给我们开了一张真不愧为列保莱罗³⁰⁰式的单据，列举了作为“民主党”当前共同基础的永恒真理和整个过去时代的成果。这个单据是以如下有教益的“我主”来概述的：

“我们相信人类的能力和力量会朝着为我们预定的道德规律向前发展。我们相信联合是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正确的手段。我们相信，要解释道德的规律和进步的规范不能指望任何一个阶级和任何个人，而只能指望受到国民教育的启蒙并为自己那些打了美德和智慧烙印的杰出代表所领导的人民。我们相信个人和社会二者的神圣性，两者既不当互相排斥，也不应当互相斗争，而应当为了一起相互臻于完善很好地配合起来。我们相信自由，没有自由，也就没有任何人类的责任，我们相信平等，没有平等，自由只能是欺骗，我们相信友爱，没有友爱，自由和平等就会成为没有目的的手段，我们相信联合，没有联合，友爱就会成为无法实现的纲领，我们相信作为进步环境的家庭，团体，国家和祖国，人们应当在每一个这种环境中一直发展到认识和实现自由、平等、友爱和联合的地步。我们相信劳动的神圣性，我们相信劳动

创造出来作为劳动的标志和成果的私有财产，我们相信社会通过贷款为体力劳动提供材料以及通过教育为智力和身心劳动提供材料的义务……

简而言之，我们相信这样的社会制度，即它的顶峰是神及其规律，而它的基础则是人民……”

总起来说，就是进步——联合——道德规律——自由——平等——友爱；联合——家庭，团体，国家——财产的神圣性——贷款——教育——神和人民——*Dio e popolo*。这些词句在1848年从法国革命到瓦拉什革命的各国革命的一切宣言中都出现过，正因为这样，它们在这里才作为新革命的共同基础而出现。所有这些革命没有一次不宣布财产的神圣性，而财产在这里被奉为劳动的成果。一切资产阶级的财产到底有几分是“劳动的成果和标志”，这一点亚当·斯密要比我们这些在他以后80年的革命倡导者知道得更清楚。至于说向社会主义作的如下让步，即社会应当通过贷款保证社会劳动所需要的每一种材料，那末，每个工厂主通常贷给工人的钱只够买他们在一星期内加工用的材料，信贷系统目前已经普及到财产的不可侵犯性所能容许的程度，而贷款本身归根结底也不过是资产阶级财产的一种形式。

这种福音的本质无非是这样状况的一种社会，在那里神是上层，而人民，或者以后所说的人类是基础。也就是说，这些人相信的是现存社会，因为，大家知道，在这个社会里神是顶峰，而平民是基础。如果说马志尼提出的神和人民，*Dio e popolo* 这个口号在神与教皇对立，人民与君主对立的意大利还能有些意义的话，那末把德国假启蒙的败类中最轻浮的人约翰奈斯·隆格这种抄袭来的东西当成必定解决时代之谜的口号，就未免太过分了！同时，我们的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证明，这个学派的人很容易习惯于

组织和纪律所要求的轻微牺牲,很容易拒绝理论的冷酷的排他性。卢格这一次成功地评价了神与人的区别³⁰¹,因而使利奥大为高兴。

宣言的结尾说:

“问题在于制定欧洲民主主义的宪法,在于编制预算,即建立人民的国库,问题在于组织倡导者的军队。”

卢格为了成为这种人民预算的首倡者,曾向阿姆斯特丹的民主主义庸人们发出了号召,并向他们进行了解释,说明他们的特殊使命是付钱。荷兰处于危机中!

1850年11月1日于伦敦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

载于1850年“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第5—6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为驳斥阿·卢格而发表的声明

今年1月17日的“不来梅每日纪事”报在1月13日的伦敦通讯中，针对“新莱茵报”和本声明的署名者，登载了一大堆编造得很不高明的荒谬言论，无中生有的难以理解的谣言、拙笨的诽谤和高傲的训斥。

类似这位伦敦记者的“杰出的坚定的人们”³⁰²经常用模仿别人的方法来回答他们招架不住的批评：他们用自己的粪便向对方抛掷。Chacun selon ses facultés [各显神通]。

我们把对“新莱茵报”的刁猾的诬蔑留给它的“坚定的杰出的”创造者。至于他对我们退出设在大磨坊街的协会的行动的善意诽谤，我们得作如下声明：

恩格斯和马克思无论在退出协会以前和以后，从来没有管理过协会的出纳处。他们虽然管理过流亡者的出纳处，但是他们在他们以前在出纳处的工作经过检查而被认为正确无误之后就退出了这个出纳处。说什么他们退出协会似乎是为了免交每月9个辨士的会费，这种说法是一个一文不值的人捏造出来的，可不是吗，为了这个目的，他们之中的一个到了曼彻斯特，而另一个打算到海外！

在充满正当不满的心灵深处是藏不住最奇异不过的珍珠的！

在德国的我党同志都知道我们退出上述协会和我们跟协会领导人分裂的真正理由。这些理由他们是赞同的，但是不宜公开³⁰³。在目前情况下，在德国甚至连狡猾的警察局奸细都不能强迫我们做进一步的解释，更何况“不来梅每日纪事”报的笨头笨脑的奸细。

最后我们只指出一点，把自己的粪便从伦敦往“不来梅每日纪事”报上撒的不是别人，而正是波美拉尼亚的思想家。“新莱茵报”经常把他作为值得艺术家耗费笔墨的对象来加以描绘，同时我们在另外一个地方根据他的著作把他描写成“流泄一切污秽语言和德国民主主义的一切矛盾的臭沟”³⁰⁴。一句话，不来梅的朋友不是别人，而正是我们的“阿尔诺德·文克里特·卢格”，欧洲中心的民主主义战车的第五个辐条。这样，对“新莱茵报”的咒骂便是可以理解的了。

卡尔·马克思，弗里德里希·恩格斯

1851年1月27日于伦敦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于1930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波美拉尼亚是波罗的海边普鲁士的一个州，卢格的家乡。这个字的另一意义是犬之一种。此处系双关语。——译者注

弗·恩格斯 给“泰晤士报”编辑的信

敬爱的先生！

在今天的贵报上，我发现有路易·勃朗先生的一封信，谈到2月24日在伦敦举行的“平等者宴会”³⁰⁵，谈到布朗基先生从贝尔-伊尔-安-麦尔监狱寄给这次宴会的著名的献词。请允许我对这封信谈几点意见。

在宴会上，布朗基的名字用很大的字母写在会场的墙壁上面，与其他一些民主主义的英雄和殉难者列在一起。在这次集会上竟有人即席致词纪念“诽谤的牺牲者”——马拉、罗伯斯比尔……和布朗基！所有宴会上的献词和演说词都规定在2月15日以前交给“这次成功的动人的盛会的组织者”的委员会。勃朗先生是这个委员会的委员，因此他当然事先就同意这个关于布朗基先生的献词。现在勃朗先生怎么能又让布朗基先生成为“诽谤的牺牲者”，称布朗基先生是

“那些在狂怒之下就企图侮辱有声望的人并且只要有可能就断送最美好事情的倒霉的人们中的一个？”

勃朗先生硬说献词并不是关在贝尔-伊尔监狱中的许多人寄来的，而完全是布朗基先生一个人的事情。当然，布朗基先生也许是由他所签署的献词和文件的起草人。但是，这里所谈的献词全文

是由平等之友协会同意和发表的,这在法国是人人皆知的事情。这个协会的成员里面有拥护布朗基先生的贝尔-伊尔监狱的囚徒,因为布朗基先生象路易·勃朗先生的保护人巴尔贝斯一样,在囚徒中间也有自己的朋友。

说到“动人的成功的盛会”和1000多名不同民族的人的统一,就不应当忘记,由于事情关系到勃朗先生,所以这个动人的场面只不过是反对赖德律-洛兰先生的“兄弟般的”示威,只不过是报复——勃朗先生自己公开宣布了这一点——赖德律-洛兰先生、马志尼先生等参加的“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没有吸收他勃朗参加。

至于谈到路易·勃朗先生的“声望”,他最好今后暂且不要再涉及这个须要慎重的问题,因为他的“声望”在不久以前遭受蒲鲁东先生的严重打击以后,现在还没有恢复。

看样子,勃朗先生尽力喧嚷自己的流亡者和被驱逐者这样的地位,是想维护自己,以免受到布朗基先生的攻击。但是,难道路易-菲利浦的后裔不也是被驱逐者吗?蒲鲁东先生并不是安居在皮卡第莱87号(这个避难所对于撰写奥维狄乌斯式的“哀歌”是很不适合的)的被驱逐者,而是法律手中的囚徒。难道勃朗先生因此而减弱了对他攻击的火力吗?

看样子,勃朗先生要责备布朗基先生的是,他把自己的献词发表在“反革命的报刊”上。勃朗先生很清楚:自1850年5月起,在法国再也没有“革命的”报刊了。路易·勃朗先生,您请求“泰晤士报”编辑接受“您的好意”,那么请问,是从什么时候起,“泰晤士报”在您的眼里成为民主的、社会主义的和革命的报纸呢?

为了使大家有可能评判引起勃朗先生如此愤怒的这个不寻常的文件(它到目前为止还是法国报刊普遍注意的对象),我请您注

意一下它的全部译文，我相信它会引起英国人民的注意³⁰⁶。

敬爱的先生，请接受我衷心的感谢。

弗·恩格斯写于1851年3月5日

原文是英文

俄译文第一次由苏共中央马克思
列宁主义研究院在1934年发表

俄文译自手稿

署名：弗尔塔斯

弗·恩格斯 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 可能性与展望³⁰⁷

我认为，1852年巴黎任何革命取得胜利，都必然会立即引起神圣同盟对法国的战争。

这个战争将完全不同于1792—1794年的战争，那个时代的事件决不能与之相比。



国民公会在军事上粉碎联军所造成的奇迹，比较仔细地加以研究之后，就显得大为减色；拿破仑对于国民公会的14个集团军的藐视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许多场合是有理由的。拿破仑常说，联军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它自身的失策，这无疑是对的。甚至在圣海伦岛上，他仍然认为卡诺是庸才。

1792年8月，9万普奥军队侵入法国。普鲁士国王原想直捣巴黎，但不伦瑞克公爵和奥地利的将军们却不同意。于是指挥便不统一了；前进运动忽慢忽快，计划经常改变。在越过了阿尔良高地的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编者注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starting with 'Handwritten text in German...'".

弗·恩格斯的“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手稿的第一页

弗·恩格斯的“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
可能性与展望”手稿的第一页

小道后，杜木里埃在瓦尔米和圣门乌尔德遮断了敌军的道路。联军本来可以绕过他，让他安然留在原地不动，然后他也许不得不尾随联军之后向巴黎推进，而且只要联军行动稍微正确，他甚至从后方也不会使联军遭受危险。同时，联军也可以不冒任何危险就把他打垮，这并不费力，因为联军的数量多，而且如法国人自己也承认的，质量又好。但是他们并不这样做，而只是在瓦尔米进行滑稽的炮轰，当在此地战斗时，甚至在以纵队冲锋之际，联军将军们还三番五次改变战术：时而由坚决的变成软弱的，时而又由软弱的变成坚决的。两次冲锋，无论就军队的数量来看，或是就力量和毅力来看，都是很可怜的，这不是士兵的过错，而是由于指挥的不坚决。这与其说是冲锋，倒不如说是佯攻。全线的坚决猛攻，无疑地会使法国义勇军和士气沮丧的现役步兵团陷于复没。在战斗以后，联军又犹豫不决停在原地，一直到疫病开始在兵士中蔓延起来为止。

热马普之役³⁰⁸，杜木里埃之所以获胜是因为他第一次半本能地用集中大军的方法去对抗奥地利式分兵把口、拉长阵线（由奥斯坦德到麦士河）的方法。但在第二年春天他自己由于幻想夺取荷兰却犯了同一错误，而奥军则集中兵力进攻。结果便造成涅尔文登的会战³⁰⁹和比利时的丧失。在涅尔文登之役，特别是在这次战役的较小的战斗中，可以看出，法国义勇军——这些不在杜木里埃亲身指挥之下而被如此称赞的英雄们——打起仗来决不比1849年南德的“人民自卫团”更好些。

不久杜木里埃叛变，万第暴动，军队溃散，士气沮丧。如果13万奥军和英军坚决地向巴黎挺进，革命也许会被镇压下去，巴黎也许会被夺取。正象一年以前一样，他们如果不是作了那样的蠢事，就会攻

下巴黎了。但是可敬的联军首脑们不这样做，他们却围攻要塞，并竭尽全力，不惜战略上的巨大损失，而墨守成规地一点一滴去争取区区的小利，在这上面他们整整费去了6个月的时间。

在拉斐德叛变之后，法军还有近12万人。1792年，义勇军大约有6万人。在1793年3月又征集了30万人。这样一来，在8月间宣布征兵制 [levée en masse] 以前，法国军队至少应有30万—35万人。征兵制的实行应使这个数字增加约70万人。如果把一切可能的淘汰数字除去，法国人在1794年初，约能出兵75万人去抵抗联军，即说，远多于联军开去进攻法国的人数。

1793年从4月到10月，法军到处挨打，但这些打击，由于联军拖延的战术，没有取得决定的战果。从10月起，战斗互有胜负，到冬季战争中止；1794年春，根据征兵制征集的军队开赴前线，全部加入战斗；结果，5月在所有战线上都获得了胜利，最后于6月在弗略吕斯的胜利³¹⁰决定了革命的命运。

因此，国民公会及其以前的8月10日的内阁³¹¹，是有足够时间作军事准备的。但是从1792年8月10日到1793年3月，一点事情也没有做；义勇军几乎未被重视。1793年3月才征集了30万人；自此时起至第二年3月，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和充分的自由来进行军事准备，而在基伦特党人倾复后的10个月内，革命的政党完全有行动的自由。在拥有2500万人口——其中包括能持武器的正常名额100万兵士——的国家中，只要有一年的时间，建立一支75万（人口的3%）人的作战军队去抵抗外敌，是不需要任何魔法的，不管这件事在当时是如何地新奇。

所有国内的起义，除了万第以外，我认为在军事上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除了里昂和土伦起义以外，其余的都仅在6个星期内

不费一枪一弹就被扑灭了。里昂是被按征兵制征集的新兵夺回的，而土伦则是因拿破仑巧妙的袭击和坚决的进攻，以及它的守卫者的错误而收复的。

在1794年与联军作战的75万人之中，至少有君主政体下的老兵10万人和其他兵士15万人，其中一部分是义勇军，一部分则是由第一次30万人的征集中召来的，他们有的已连战18个月，有的12个月，这些人对于战争已经习惯。此外，在50万新兵中至少有一半参加过1793年9、10、11月的会战，至于刚参军的，在开赴前线作战之前也应当受过3个月以上的训练。拿破仑在他论西班牙远征的著作中，曾计算过训练随营学校（*école de bataillon*）所需的时间是三四个星期。如果不把下级和中级军官计算在内（当时联军一般地说在这方面占有很大的优势），那末1794年的法国军队绝不是一群纷扰的、粗野的、“为共和国牺牲”的思想所鼓舞的志愿兵，而是无疑地与敌军相等的 *avery fair army*（一支优良的军队），因为他们当时有足够的时间进行组训，而联军又采用了一种特有的不求战果的战法，这种方法只能使久经锻炼而主要适宜于进攻的军队军心涣散，而使年轻的、只限于防御的敌人军队受到训练和锻炼。毫无疑问，1794年法国将军们虽然也犯了不少错误，但比敌方将军们却高明得多；但是如果除开国民公会议员们自己作了些蠢事的某些特殊情形以外，断头台则保证了指挥的统一和动作的协调。Le noble Saint-Just en fit plusieurs（尊贵的圣茹斯特就犯过一些这样的错误）。

关于众兵战术的几点说明：

（1）众兵战术的未定形的概念最初是由热马普胜利的机动而产生的，这个机动与其说是出于自觉的军事计谋，毋宁说是出于

本能。法军的低劣状态是产生这种概念的基础，他们需要数量上的优势，以使自己多少感觉到自己的兵力有把握；数量用来弥补纪律的不足。卡诺在制定这种战术方面并没有起过显著的作用。

(2) 众兵战术还完全没有制定，——例如在1794年土哥英³¹²和弗略吕斯战役中这种战术并没有采用（当时法军和卡诺本人犯了极大的错误），一直到1796年拿破仑在他6天的皮蒙特远征中，成功地 en détail [各个] 歼灭了优势的敌人兵力以后，才给人们启示了这种战术的思想，而在这以前，人们曾使用了这种战术，但并不懂得它。

(3) 谈到卡诺本身，那末这个家伙愈来愈使我怀疑；我自己显然不能对他作最后的判断，因为我手头没有他给将军们的紧急信件。但就已有的材料来判断，他主要的功劳似乎只是在于他的前任者帕希和布朔特的极端的愚昧无知和碌碌无能，以及公安委员会中其他一切人员对军事的一窍不通。这真是所谓：Dans le royaume des aveugles, le borgne est roi [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卡诺是老工兵军官，曾在北军中任国民公会的代表。他知道，要塞、军队需要什么样的物资，法国人缺少什么。除此以外，他自然也明白象法国这样的国家要用什么方法才能动员军事资源；但是在革命的征兵的制度下，在即使不如此也会有许多东西白白浪费掉的条件下，只要能达到主要的目的——迅速动员资源，这些资源或多或少的浪费是无足轻重的，所以不必认为卡诺有什么了不起的天才，才能说明他所获得的成就。有人说众兵战术确实是卡诺 pour sa part [本人] 发明的，这特别使我怀疑，因为他所作的1793—1794年的最广泛的计划，恰恰是建筑在相反的作战方法之上的；他不但没有集中，反而分散使用了法国军队，他对付敌人侧

翼所采用的作战方式,使敌人反而能够集中自己的力量。卡诺后来的事业也不完全与他天才的荣誉相称,例如,他在执政内阁等时期的崇高的德行,他所指挥的有名的安特卫普保卫战(一般地说,要塞的防卫正是使平凡的、墨守成规的、但赋有一定坚持性的军官出名的一种差事;况且1814年安特卫普的围攻,并没有继续到3个月);最后,当1815年联军以120万人的集中的大军完全按照另外一种作战方法来与拿破仑周旋时,他那强使拿破仑采用1793年方法的企图,以及总的来说他那庸俗的作风——所有这一切都不能说明卡诺有天才。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个正直的人能够象他那样在热月、果月、雾月等政变³¹³之后居然还站得住脚。

Summa summarum〔总而言之〕,国民公会能够得救的唯一原因是联军的兵力没有集中,这就使国民公会有整整一年的时间进行军事准备。它得救的原因是和老弗里茨在七年战争中得救的原因是一样的;1809年威灵顿在西班牙也以同样的原因得了救,虽然那里法军无论在数量上或者在质量上比所有的敌军强大2倍以上,只是因为拿破仑不在西班牙,法军元帅们以各种各样的方式相互倾轧,而使自己的大批兵力处于瘫痪状态。

二

目前,联军早已摆脱了1793年所犯的严重错误;他们出色地集中了自己的兵力,而且在1813年便已集中完毕。1812年俄国战役使俄国在大陆战争上成为整个神圣同盟的中心。俄国军队构成基

本的核心，普鲁士、奥地利和其他国家的军队只是在以后才集结在这个核心的周围。俄国军队在联军侵入巴黎之前一直是主力。亚历山大（更确切地说是他背后的俄军总参谋部）事实上是各国军队的主帅。但是自1848年后，神圣同盟便已建立在更加坚固的基础之上了。1849—1851年反革命的发展，使法国以外的整个欧洲大陆对俄国的关系犹如莱茵联邦和意大利对拿破仑的关系一样。这是一种纯粹的附庸关系。尼古拉——id est（即）帕斯凯维奇——是神圣同盟 *en cas de guerre*〔战时的〕必然的独裁者，正如同涅谢尔罗迭是 *en temps de paix*〔平时的〕必然的独裁者一样。

其次，至于谈到现代的军事学术，那末拿破仑已经使之十分完善。在下述的某种情况到来之前，将帅们，在情况允许下，除了仿效拿破仑的前例以外，便没有什么别的可作了。但现代的军事学术已普及于全世界。在普鲁士，每个少尉还在应贵族士官考试之前就已经背熟这门科学，至少背熟其中可以死记的那一部分。至于奥军，那末他们在匈牙利战争中认清了并在以后撤换了他们那些糊涂的、特殊奥地利式的将军们——所有的文迪施格雷茨派、韦尔登派、圭茨派，以或其他老朽。而拉德茨基在意大利进行的两次战争则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我们已不是在新莱茵报时期写文章，也就不必再抱任何幻想——第一次非常之好，第二次简直是杰作。在这方面他得到了谁的帮助，是无关重要的；只要明白这个老头子有 *bon sens*〔非常清晰的头脑〕能吸取别人天才的思想就够了。如果不是由于意大利将军们可恶的指挥、他们经常的动摇、他们之间的不统一、查理·阿尔伯特的阴谋和敌对营垒内反动贵族和僧侣的援助，使拉德茨基的任务更容易完成，那末1848年在培斯克拉、曼都亚、列纳哥和维罗那4个要塞之间的防御阵地（这个阵地

是在四边形的四周都有很好的掩护)以及拉德茨基在这个起义的国家中间于未得援助之前对这个阵地所进行的防御,可以说是军事学术上的范例。同样也不应当忘记:他驻屯在世界上最富饶的国家中,因此他一点都不必忧虑他的军队的给养。

1849年战争对奥地利人来说史无前例的。皮蒙特人以其集中的兵力在诺瓦拉和摩尔塔拉(这条阵线约3德里长)附近切断到都灵的道路(这原是上策),或者从这条线上用两三个纵队去进攻米兰,他们却占领了由塞斯塔到比森萨的阵地,这条阵线长达20德里,而皮蒙特军的人数为7万人,就是说每一德里只有3500人。同时从一翼到另一翼的距离足有三四日的行程。这是对于米兰的一个可怜的分进合击,而且他们的兵力到处都是不够的。在拉德茨基看出了意军采取的是1792年奥军旧的作战方法之后,他便象拿破仑以前那样和他们作战。皮蒙特军的阵线被波河截为两段,这是一个极大的错误。拉德茨基就在波河附近冲破阵线,打入一个6万人的楔子,由此就把南面的两个师与北面的3个师切断;然后迅速地以他的全部兵力进攻北面的3个师(差不多集中有35000人),把他们追逐到阿尔卑斯山,而使皮蒙特军的两个军彼此隔断,同时也与都灵隔断。这个在3天内结束战争的、几乎完全是抄袭拿破仑1809年在阿本斯堡和埃克缪尔附近的机动³¹⁴(拿破仑式机动中最天才的一个)无论如何证明了:奥军已不再墨守他们的旧习,象检阅式那样“缓步前进”³¹⁵。在这次机动中,具有决定意义的恰恰就是运动的迅速。贵族和拉莫里诺的叛变,使奥军轻而易举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特别因为这个叛变供给了奥军以意军部署和计划的确实情报。萨伏依旅在诺瓦拉不作战而进行抢掠的那种可耻行为也有同样的意义。但从军事的观点来看,皮蒙特军的不合理部署和拉德茨基

的巧妙机动已足以说明取胜的原因。这两个事实在任何情形下都必然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最后,俄国人因其军队的性质而不得不遵循非常接近于现代的军事体系。他们军队的主要部分,是由大量半野蛮因而行动笨拙的步兵和人数众多的、同样半野蛮的非正规的轻骑兵(哥萨克)组成的。在决战中,在大的战斗中,俄军从来都是以大兵群作战的。苏沃洛夫还在进攻伊斯迈拉和奥查可夫时便已明白了这个必要性。这个军队所缺乏的运动性,部分地为非正规的骑兵所弥补,因为后者从四面八方围绕着它来进行机动,由此就隐蔽了它的一切运动。但正是由于俄国军队人数多、不灵活,所以它最适合于构成联军的核心、主要支柱和骨干,因为联军的行动总是要比民族军队的行动稍为迟钝些。俄军在1813和1814年出色地完成了这种作用,在这几年中几乎没有一次会战部署中俄国军队不采取密集的纵队,这种纵队在纵深和密度方面都大大超过其他一切军队。

1812年以后,我们几乎不能把法军看做是拿破仑传统的优先的继承者。这些传统或多或少已被一切大的欧洲军队所接受。主要在帝国的最后几年内,这些传统在所有这些军队中都引起了革命。拿破仑的体系,只要它与某一个军队的性质相适合,便在战略上和战术上为所有这些军队所采用。在这里也表现出资产阶级时代的平均化的影响;旧的民族的特点在军队里也正在消失:法国军队、奥地利军队、普鲁士军队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甚至于英国军队,现在都成为或多或少同样适应于拿破仑式机动的机器。不过这绝不是说,它们在其他方面,如在白刃战等方面没有各种不同的

特点。但在一切欧洲（大的）军队中只有半野蛮的俄国军队能运用特有的战略和战术，因为只有它还没有成熟到采用充分发展了的现代的作战体系。

至于法国人，那末由于他们在阿尔及利亚进行小规模战争，甚至失去了拿破仑大规模作战的传统的线索。这种强盗式的战争对纪律所起的坏影响是否能为那些使军队习惯于战争的优点所补偿；这个战争是否能使人们习惯于征战的生活，或者恰恰相反地因过度疲劳而耗尽他们的精力；最后，这个战争是否会使将军们丧失大规模作战所需要的 *coup d'oeil* [判断力]；——这些都还有待于证明。但无论如何，法国骑兵在阿尔及利亚在某种程度上是变坏了。它已不会运用密集队形的突击（这才是骑兵力量之所在），而习惯于散乱行动的方式，但是在这种方式中，哥萨克人、匈牙利人和波兰人总是比它高明。在将军们当中，乌迪诺在罗马城下丢了丑，而只有卡芬雅克一人在6月战斗中出了名；但所有这些还决不是 *grandes épreuves* [大的考验]。

因此，总的说来，机会，在战略和战术的优势的意义上说，对联军和革命至少是相同的。

三

但是，使一个完全新的阶级得到统治的新的革命，是否会和第一次革命一样，创造出新的兵器和新的作战体系，而现在的拿破仑的体系与之相比就如同七年战争时代的体系与第一次革命时代的体系相比是同样过时和同样无用的呢？

现代的作战体系是法国革命的必然产物。它的前提是资产阶

级和小农的社会和政治的解放。资产阶级出钱，农民当兵；两个阶级解除封建的与行会的枷锁，是产生现今的庞大的军队所必需的条件；而与社会发展的这个阶段相联系的财富和文化的水平，同样是保证现代军队有必要数量的武器、弹药、粮食等，培养必要数量的有素养的军官，以及士兵本身智力发展所必需的条件。

我现在就以拿破仑使之完善的那种现代军事体系来作例子。现代军事体系的两个枢纽是：人员、马匹和大炮这些进攻工具的大量使用和这些进攻工具的运动性。运动性是庞大人数的必然结果。现代的军队不能象七年战争时期的小部队那样几个月内只在约20德里的地区上来回运动。他们不能把一切必要数量的粮食都携带在野战仓库中。他们不得不象成群的蝗虫那样扰害他们所占领的地区，在骑兵所能及的范围内四面八方去征发粮秣，而且当一切都吃尽的时候就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仓库贮藏只要能供应意外的需要就够了。这些仓库时常告罄而又重新加以充实，它们必须跟随军队迅速转移，所以只有在极少的情况下才备有充分的存粮以供应军队一个月左右的需要。因此，现代的军事体系不可能在贫困的、半野蛮的和人口很稀少的国家内长期采用。这就是法军在西班牙慢慢崩溃而在俄国迅速崩溃的原因。但是另一方面，西班牙人也因法军的侵略而解体，他们的国家被弄得枯竭不堪。但俄国却不能长期采用它所特有的不灵活的以大兵群作战的军事体系，甚至在波兰也不成。在它本国的领土内，只要没有铁路，这个体系便完全不能应用。如果俄国不得不在第聂伯河或者德维纳河进行防御战，那末这个国家就会土崩瓦解了。

军队的这种运动性，也是和兵士的一定的文化水平相联系的，因为他们在许多场合必须善于独立行动。这里是指下列各点而言，

巡逻、粮秣征发、前哨勤务等大为发展；每个兵士要有较大的积极性；兵士常常必须单独行动并依靠自己的智力行事；散兵战获有重大意义而其结果则视每一单个兵士的知识、*coup d'oeil* 和精力如何而定，——所有这些都要求士官和兵士具有比在老弗里茨军队里所曾有的更高的文化水平。但是，野蛮的或半野蛮的民族在群众中没有这样的文化水平，使得他们一方面能够训练和机械地教练不加选择而征集的50—60万人，而另一方面又能够发展或者保持这些人在小规模战争中所需的这种 *coup d'oeil*。野蛮人由于本性是具有这种强盗式的 *coup d'oeil* 的。例如哥萨克就是这样；但是另一方面，他们却不适合于执行正规的军事勤务，正如同农奴出身的俄国步兵不适合于真正的散兵战一样。

作为现代军事体系的前提的这个普遍的、平均的文化水平，只是最先进的国家的士兵才有：例如在英国，那里的兵士虽然都是最粗野的农民出身，可是也进过城市里的文明的学校；在法国，那里的军队是由解放了的小农和城市游民(*remplacés*)组成的；在德国北部，那里的封建制度或者已被完全消灭，或者多多少少采取了资产阶级的形式，所以在那里军队有相当一部分名额由城市补充；最后，从最近几次战争来判断，这样的文化水平，甚至在从封建成分最少的地区所招募的那一部分奥地利军队中也是有的。除了英国以外，到处都是以小农经济为军队的基础，而且小农在地位上愈接近于自由的私有者，则军队就愈适合于现代的军事体系。

但是不仅是单个兵士的运动性，而且军队本身的运动性也以适应于资产阶级时代的文化水平为前提。革命前的军队的不灵活，

——由希望解除兵役义务的有产阶级的代表雇来代他们当兵的。——编者注

正是封建制度的反映；仅仅载运军官财物的行李车辆本身就阻碍了一切运动。军队和整个生活一样是以缓慢的速度前进的。君主专制中正在兴起官僚制度在军用物资管理方面，固然提供了一些办法，但同时它和 haute finance〔大金融家〕的勾结却造成了 en gros〔无穷的〕弊端。如果说官僚制度曾给军事以某种利益的话，那末它所固有的形式主义和守旧精神给军队造成的弊害却加倍地大了。老弗里茨这个人就是最好的一个例证。俄国直到今天还吃着这些缺点的亏。到处被掠夺和被撞骗的俄国军队却真正地挨饿，兵士在行军中象苍蝇似的一群群死去。只有资产阶级国家才供给它的军队以比较充足的粮食，因此才能希望他们有充分的运动性。

如此看来，运动性在各方面都是资产阶级军队的特质。但是运动性不仅是军队众多性的必要的补充，而且甚至常常可以代替后者（譬如1796年拿破仑的皮蒙特之战）。

但是众多性，和运动性一样，也是现代文明军队的特征。

尽管补充军队的方法（如募兵制、普鲁士的后备兵制、瑞士的民军制、法国的征兵制）各不相同，但近60年来的经验证明：在资产阶级和自由小农的制度下，在任何一个民族战争中，被召入伍的都没有超过全体人口7%，而参战的大约只有5%。在法国，如1793年秋人口为2500万，那末根据这个计算，全部应有兵士175万人，其中作战军队应为125万人。后者当时在边境，在土伦和万第（这里把交战双方的人数都计算在内），所以说125万人是确实存在的。在普鲁士，目下人口约有1600万人，其7%和5%应各为112万人和80万人。但普鲁士兵力的总和，连现役军和后备军合计在内，也很难达到60万人。这个例子证明：对于一个民族甚至5%已经是

够多了了。

Eh bien (我们再进一步看看)。如果说法国和普鲁士能够比较容易地武装5%的人口，而在紧急时甚至7%，那末奥地利即使在非常紧张的情况下也只能达到5%，而俄国则3%也不易办到。就奥地利说，如其人口为3500万，那末5%便应为175万人。在1849年，奥地利竭尽全力也只动员了约55万人。匈牙利人——其兵力在科苏特文告中加多了一倍——大概有35万人。如果我们再加上不是逃避了征集、便是在皮蒙特军队中作战的50万伦巴第人，那末我们便得总数95万人，也就是说不到全体人口的 $2\frac{2}{3}\%$ 。同时，处于特殊条件之下的克罗地亚边境各省至少尚能征调自己人口的15%。俄国，根据最低的计算，有人口7200万人，按5%计算，应征集军队360万人。但是，它的正规军和非正规军合在一起从来没有超过150万人；在这个数目当中，在它本土内，它最多能有100万人的现役军队。换句话说，它的兵力的总和从未超过 $2\frac{1}{12}\%$ ，而现役军队则从未超过 $1\frac{7}{18}\%$ 或1.39%。原因非常简单，就是因为幅员广阔而人口稀少，交通工具缺乏，国民生产低微。

进攻工具的大量出现和运动性一样，也是文化发展到较高阶段的必然结果；特别是武装力量和人口总数的现代的比例，是与资产阶级解放以前的任何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不一致的。

因此，现代的作战方法是以资产阶级和农民的解放为前提的，它是这个解放的军事上的表现。

科苏特（1802—1894），匈牙利革命家，为民族独立运动之倡导者，1849年曾建立匈牙利政府，宣布脱离奥地利帝国，但自俄军侵入后即失败而逃至美国。——译者注

无产阶级的解放在军事上同样也将有它自己的表现，并将创造出自己特殊的、新的作战方法。Cela est clair〔这是很明显的〕。现在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可以预言：这个新的作战方法的物质基础将是什么。

但是，行将到来的革命最初采用的作战方法距真正解放了的无产阶级将要采用的方法还很远，就如同现在尚未定形而且部分地还作其他阶级尾巴的德法无产阶级之夺取政权距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还很远是一样的，因为工人阶级的真正解放在于消灭一切阶级矛盾。

在法国和德国，无产阶级真正解放、一切阶级差别全部消灭和一切生产资料全部社会化〔vollständige Konzentrierung〕的前提是：第一，英国参加这个过程；第二，德法现有的生产资料至少增加一倍。新的作战方法也正是以这个为前提的。

拿破仑在军事科学上卓越的改革不能视为奇迹；新的军事科学是新的社会关系的必然产物，就象革命和拿破仑所创造的军事科学是革命所产生的新关系的必然结果一样。同样，也正象无产阶级革命在工业上不是消灭蒸汽机，而是增加它的数量一样，在军事上，它的任务也不在于减少军队的众多性及其运动性，而恰恰相反，在于把两者提升到更高的水平。

生产力的增长是拿破仑作战方法的前提；新的生产力同样是军事上每一种新的成就的前提。铁路和电报现在已给了有才干的将军或陆军部长一个在欧洲战争中采取完全新的策略的机会。生产力的逐渐提高，以及随之而来的人口的逐渐增多，同样也提供了征集更庞大的军队的可能性。如果法国的人口不是2500万而是3600万的话，那末这个数量的5%就不是125万，而是180万人。在

上述两种比例中，文明国家的实力与野蛮国家的相比是相对地增高了。只有前者才有繁密的铁路网，他们的人口譬如比俄国的人口增加要快一倍。所以说，所有这一切论点都证明：西欧对俄国的臣服愈来愈可能性愈少，至于长期臣服，那就简直不可能了。

但是，随阶级的消灭而产生的新的作战方法的力量并不在于：一个民族应动员的5%将随人口的增多而成为一个愈来愈大的数字，而是在于：可服兵役的人数已不是全部人口的5%或7%，而是12%到16%，即是说由成年的男性人口（由18岁到30岁或者甚至到40岁的一切健康的男子）的一半到 $\frac{2}{3}$ 。但是如果说俄国不在它的国内一切社会的和政治的组织上，特别是在它的生产上实行全部的改革，就不能把它的军事力量由2%到3%提高到5%，那末德国和法国不改革其生产而使之增加一倍以上，也同样不能把它们所拥有的军队由5%增加到12%。只有由于利用机器等，每一个工人的平均劳动生产率增加一倍，才能使一倍以上的劳动力从生产中解放出来，而这也只能维持一个短的时期；事实上从来没有一个国家能够使它5%的人口长期服兵役。

如果具备适当的条件，如果国民生产能充分提高和集中，如果阶级消灭，——这是绝对必要的（普鲁士一年的志愿兵³¹⁶，只要他不是后备军的士官或军官，由于他的贵族的社会地位，与农民和工匠来比，从来都不是好的兵士），那末可能征集的限度将完全由能持武器的人口的数量来决定；也就是说，在危急之际可在最短时间内武装15—20%的人口，并使12—15%的人口加入作战军队。但这样庞大的人数又以更大的运动性为前提，而且这种运动性要比现代军队的运动性高得多。如无完备的铁路网，这样庞大的人数便无法集中，无法供给粮食和弹药，无法由一地转运至他地。而

不采用电报,就绝对不可能指挥他们。而且因为在这样庞大的人数之下,战略家和战术家(战场上的指挥官)不能集于一身,所以在这里就要有分工了。战略行动,——各军队集团行动的协调——应当由一个中枢地点用电报线路来指挥;至于战术行动的指挥则由各别的将军来实施。显而易见,在这样条件之下,战争可能而且应当在一个比拿破仑时代所需要的更短促的时间内结束。由于大量的耗费,是需要这样的,而由于这样庞大的人数所施行的任何一次突击必然将有决定的意义,而是必然要这样作的。

因此,按其众多性和战略的运动性来说,这些军队将具有空前惊人的力量。而这样的兵士在执行巡逻勤务时、在散兵线上以及在战场上的战术运动性也将达到更高的程度。在力量、技巧和机智方面,这些兵士一定会超过现代社会所能有的一切兵士。不过可惜,所有这一切只有经过许多年以后,才能实现,而到那时由于无势均力敌的敌人,这样人数众多的战争根本不能发生。但在无产阶级革命的初期,对所有这一切也还缺少基本的前提;尤其是1852年。

现在法国无产阶级所占的人口的百分比,与1789年相比恐怕还没有增加一倍。无产阶级当时——至少在1792和1794年间——的思想准备和 *in tension*〔紧张的情况〕都不亚于在最近期间。但那时已经看出,在与残酷的内部骚动相伴而生的革命战争的时期内,无产阶级大部必然要用来担负对内的任务。同样的情形现在也将要发生,并且恐怕还要比以前更多地发生,因为立即发生内战的机会,随着联军的前进,而逐渐增加。因此无产阶级只能派出较少的一部分人到作战军队里去。补充后的主要来源仍然是城市的下层分子和农民。换句话说,革命将被迫采用在我们时代一般作战所采用的那些手段和方法来进行战争。

只有教条主义者才会提出这样的问题：能否在作战军队占人口4—5%的条件下找出新的办法和发明利用这些力量的一种新的有效的方法。正如同纺织机的生产率如果不用蒸汽力代替人力，也就是说如不创造与旧的手织机大不相同的新的生产工具，便不能增加3倍一样，在军事学术上也不能利用旧的手段去达到新的结果。只有创造新的、更有威力的手段，才能达到新的、更伟大的结果。每个在战史上因采用新的办法而创造了新纪元的伟大的将领，不是新的物质手段的发明者，便是以正确的方法运用他以前所发明的新器材的第一人。在图伦和老弗里茨的时代之间，在步兵学上发生了革命，由刺刀代替了戈矛以及燧石枪代替了火绳枪。老弗里茨在军事科学上的伟大功绩就在于：他在当时作战方法的范围内第一个改造并改良了旧式的战术而使之适合于新式武器。同样，拿破仑的不朽的功绩就在于：他发现了在战术和战略上唯一正确使用广大的武装群众的方法，而这样广大的武装群众之出现只是由于革命才成为可能；并且他把这种战略和战术发展到那样完善的程度，以致现代的将军们一般地不仅不能胜过他，而且只能试图在自己最光辉和最成功的作战中抄袭他罢了。

Summa summarum .革命将以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来与现代的军事手段和现代的军事学术作战。军事天才存在的机会，在联军方面至少和在法军方面是同样大的：ce seront alors les gros bataillons qui l' emporteront〔多兵之旅必获胜〕。

四

现在我们就来考察一下，两方面究竟能将多少兵力调动到战

场上去，同时又怎样运用它们。

(1) 俄国 俄国军队在平时名义上是由110万兵士组成，但实际上大约只有75万兵士。自1848年后，俄国政府就竭力使战时编制的实数达150万人。尼古拉和帕斯凯维奇尽可能到处亲自检查编制的情形。所以应当承认，俄国现在至少已使它的军队达到平时编制110万人的满额，从这个数目中最高限度应当除去：

高加索守军.....	100000人
俄国本部守军.....	150000人
波兰各省守军.....	150000人
病员、特种勤务部队等.....	150000人
总计.....	550000人

因此，只剩下55万人可以用于国外的军事行动。这比俄国在1813年实际派遣到国外的多不了许多。

(2) 普鲁士 如第一和第二级后备军、超级后备军以及一切可能征集的人员被召入伍时，战时至少可以由65万人组成一支很好的军队。但目下政府至多仅能动员55万人。我们现在就拿50万作为计算的基础。从这个数目中还必须除去守备队等，其数量略多于第二级后备军（15万人）；超级后备军和下年度定额兵员的渐次召集——这是尼古拉所关心的，以及俄国军队继续不断的过境，保证普鲁士有充分的预备队以防国内的起义。除此而外，普鲁士军队病员的百分比将会较小，因为他们是在本国集中，他们到莱茵的路程比俄国军队为短。但是，如同对待俄国军队一样，我去其一半，而认为只有另外一半，即25万人可以自由调动。

(3) 奥地利 服役的和休息的兵士——但后者是可以和普鲁士的后备军一样迅速归队的——至少有60万人。这里,我照样去其一半,因为对于帝国 $\frac{2}{3}$ 的版图来说,随奥地利军队之后行进的俄国军队,在奥地利新的预备队未编成之前,至少可以当作国内的预备队,镇压起义的策源地。因此,可以自由调动对敌作战的只剩下30万人。

(4) 德意志联邦 因为一些小邦都在莱茵附近,同时一切联盟的军队都要通过它们的领土,所以它们差不多完全不需要本国的警备部队去对付地方居民;不但如此,经过联军与法国斗争的最初胜利之后,预备队将由北到南遍布德国全境。所以德意志联邦最低限度可出12万人。

(5) 意大利政府、丹麦、比利时、荷兰、瑞典等国的军队,我暂以8万人来计算。

这样,按上述的计算,联军的总数为130万人,他们或者现在正服兵役,或者可以立即征召入伍。所有这些数字都是故意加以缩减的。我对病员作了很大的扣除,因此仅仅由恢复健康的人员以及其他人员,在战争开始后的两个月内即可编成一支35万人的第二批军队,开到法国的边境附近。但是这第二批军队的数量一定还要大得多,因为目下没有一个政府会这样愚蠢,以致在战争开始,作战军队出动后,不立即尽量多地征集新兵,而紧接着第一批军队之后开出。

如果按照下列计划行动,第一批军队(130万人)大约可在两月内全部集中起来。普军和奥军能够将上述的定员于两月之中完全动员起来,这一点在去年11月动员之后是用不着怀疑的;至于说到俄国军队,那末他们的3个最后的集中地点首先是柏林、布

勒斯劳 和克拉科夫或维也纳(见下文)。每天以5德里 计算,由彼得格勒到柏林差不多有45日的行程,由柏林到莱茵有16日的行程,总共61日的行程。由莫斯科到布勒斯劳有48日的行程,由布勒斯劳到美因兹有20日的行程,总共68日的行程。由基辅到维也纳有40日的行程,由维也纳到巴塞尔有22日的行程,总共62日的行程。如果再加上俄国军队特别是在上述的强行军之下所绝对必需的休息日,那末显而易见:就是驻防于莫斯科、彼得格勒和基辅的军队也只需3个月的工夫就完全能够到达莱茵;而且假定军队完全是徒步前进,不乘火车和马车。但这两种运输工具在德国几乎到处可以使用,而在俄国和波兰至少部分地区可以使用,这两种工具的使用一定会使军队的运输缩短15—20天。但俄国军队的主力现在已经集结在波兰各省,而且因为政治情况有发生危机的可能,所以将有更多的武装力量派到那里。这样,俄军运动的出发地点将不是彼得格勒、莫斯科和基辅,而是里加、维也纳、明斯克、杜布诺和卡麦涅茨,因此距离就大约缩短60德里,即是说减少12日的行军和4日的休息。同时,相当大的一部分步兵——特别是驻屯在较远的营地的——可以在休息日(每隔3天)至少乘车移动5英里;这样,对于这一部分军队,休息日也可以计算在行军的日数里。至于炮兵器材、弹药和粮食,在这样条件之下则可自由地利用铁路运输。炮兵的马匹和炮手可以行军队形前进或乘车,所以无论如何要比以前的方法更加迅速地到达目的地。

从上述的一切,我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就是在革命爆发后两个月,没有任何东西可以阻碍联军以下列序列集中到莱茵:

波兰称作:弗罗茨拉夫。——编者注

1德里或1地理里等于7公里420公尺。——编者注

第一批军队

1. 在莱茵和皮蒙特的第一线：

普军、奥军等.....	750000	1050000
俄军.....	300000	

2. 第二线：

相隔10日行程的预备队——俄军.....	250000
总计.....	1300000

(如上所述)

第二批军队

1. 联军次要成员的预备队，正在集中的

普军、奥军等.....	200000	350000
2. 在途中的相隔20日行程的俄军预备队.....	150000	

两批军队总计.....	1650000
-------------	---------

实际上，在现代的条件之下，只要五、六个星期便可把30万俄军调动到莱茵，而在同一时间，普军、奥军和次要联盟国军队亦可将上述的兵员开到莱茵；但是考虑到任何联军都可能发生的意外的障碍，我就算它整整两个月。联军在拿破仑于易北河战役后登陆时的部署，就他们进入法国的便利这点上说，很难象目下这样有利；不但如此，当拿破仑与英军和普军在滑铁卢大战的时候，俄军已到达莱茵。

现在要问法国有什么样的人力后备可抵御联军呢？

(1) 现役部队约45万人，其中5万人在阿尔及利亚，不能调出；在其余40万人当中还应除去病员、最低数量的要塞守备队以及在国内不稳的地点驻屯的少数部队；因此可以调用的至多有25万人。

(2) 目下的“红党”惯用的方法——重新征召服役期满

的兵士入伍——作为强迫手段至多对于6个年龄,也就是对于由27岁到32岁的成年人是有效的。每一种年龄必须在征召时出8万人。由于阿尔及利亚战争和该地气候所受的损失,12年内的普通死亡率,不适合于服兵役者的淘汰,侨民以及在行政机构本来就已濒于崩溃的时候以某种方法避免归队的人,——所有这些使这6个年龄的以前的新兵归队的总数由48万至多减少到30万人。在这个数目中,还应当除去补充要塞守备队的15万人,这15万人主要是靠比较年长的并且大多是已婚者来补充的。这样,只要采取稍好的办法,剩下的15万人是很容易在两个月内动员起来的。

(3)有人民自卫团、志愿军、义勇军 *levée en masse* (实行征兵制), 还有一切属于这种二等炮灰的人。在这一类人中,除了还需征集的豹一万多的 *gardes mobiles* (别动队) 之外,没有一个人比德国的任何一个市民自卫团兵士更善于使用兵器。固然,法国人学会这行要快些,但是两个月仍然是很短的期间。拿破仑之所以能够使他的新兵在4个星期之内从随营学校毕业,那只是因为他有最优良的干部,可是最近的革命的第一个结果将是现役干部本身的解体。而且,大家都知道,我们法国的革命者,是最相信传统的人,他们无疑将首先高喊 *levée en masse* (实行征兵制) *Deux millions d'hommes aux frontières* (200万兵士到国境上去)! 如果联军将重复 1792—1793 anno (年) 那样的大错,如果有充分的时间来逐步训练200万人,当然,有200万兵士是件漂亮的事。可是这是谈不上的。相反的,在两个月内还会有100万准备作战的敌兵出现在国境上,因此问题将在于如何对抗这百万大军而有取胜的机会。

如果法国人重新盲目地抄袭1793年的传统,那末他们又将以200万人来作实验,而这就是说,他们好大喜功,以致由于时间短

促其真正的结果将等于零。在没有干部的条件下8个星期内训练和编成150万人，实际上就是无谓地消耗一切人力和资源，就是使军队甚至得不到一个适用的营。

但是，如果他们有一个能干的陆军部长，稍微熟悉革命战争和迅速编组军队的方法，同时如果在他的道路上没有因不学无术和追求名望而产生的那些愚蠢的障碍，那末这又当别论。只有这样的人才能在可能范围内掌握住自己，才能有所作为。那样，他必须大体上遵从下列的计划。

武装力量首先由两个部分构成：(1) 担任国内勤务的城市无产阶级自卫军和乡村中的农民自卫军（只要后者是可靠的）；(2) 抵抗侵略的正规军。

要塞由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卫军来守卫。从军队中只可拨出最必要的一部分部队来担任这个任务。至于巴黎、斯特拉斯堡、里昂、麦次、里尔、发隆西纳等最重要的要塞兼大城市的防卫，除了它们原有的自卫军和近郊的若干农民队伍以外，再有少数现役部队就够了。由失业工人组成而不担任国内勤务的那部分无产阶级自卫军，应当集中在教练营地，由不适宜于野战勤务的老军官和士官来担任教练，以补充作战军队中的伤亡。这个营地可以建立在奥尔良附近，这样它也可以用来威胁正统派的区域。

法国境内现役部队的数量必须增加两倍，就是说，它应由40万人增加到110万人。要达到这个数量，可用以下的方法。应当把每一营变为一团，同时必然要提升军官和士官的职务，这将大大促使他们尊重革命，其功效将不亚于断头台和军事法庭。在这种情形之下，干部必然将增加，但应当尽可能逐渐增加。必须把军官尽量争取到自己方面来。在不可能用魔法于两个月内造就新的军官的

条件下,这是非常重要的。此外,在法国军队的中下级指挥官中还有足够的民族意识,因而在稍加提升和陆军部有力领导之下,在战争胜利的机会存在的条件之下,再加上对叛徒和逃兵的几个示范的处罚,这类军官在最初时期即完全可以利用。军事学校的学生以及 Ponts et chaussées [交通部] 的职员可以充当出色的炮兵军官和工兵军官;并且经过几次会战之后便会在下级军官中出现军事天才(这在法军中是极其常见的),他们只要经过一次战斗,便能够指挥步兵连。至于兵士,那末他们是由下列必要数量的人员组成的:

现役部队.....	400000
新征的后备兵.....	300000

留待召集和训练的有50万人,总计120万人,如果去掉10万病员,则为110万人。在这个名额中可以用于作战的有:

正规兵.....	250000
后备兵.....	150000
新募兵.....	400000
总计.....	800000

将来会证明:用这样一个军队可作些什么。在两个月内训练40万到50万新募兵以补充现役军队并把他们与正规军的兵士和归队的老兵补充到同一个团和同一个营里,只要 le lendemain de la révolution [在革命后的第二天] 就立即着手工作,这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所有这些人员都是来加强步兵和炮兵的,因为在两个月之内可以训练成步兵甚至训练成能初步操纵大炮的炮手,但绝不能训练成骑兵。所以骑兵数量的增长将是不会很大的。

整个这一动员计划是以必须有一位精明的陆军部长作前提

的，他要善于正确地估计政治局势，擅长战略、战术，熟知各种兵器的使用法，同时还要具有充分的精力、机敏和 *decisiveness* [决心]。另外还需要那些和他在政府同事的笨伯们给他以完全的行动自由。但是，法国的“红”党到哪里去找这样一个人呢？相反的，一切的机会都说明我们将要看到一幅平常的图画，也就是要找到一个不学无术的家伙，他作为一个 *bon démocrate* [很好的民主主义者]，自认为而且被人认为可以担任任何职务，他企图仿效卡诺，颁布征兵的法令，坚决地破坏一切；他的进取心将很快地消失，那时他就把一切事业委之于旧制度的平庸官吏的常规旧习，让敌军迫近巴黎城下。但为了对付欧洲的联军，在我们的时代，帕希、布朔特以及甚至卡诺已经是不够的，而应当有相当于拿破仑这样的人，不然他们所遇到的得是些特别愚蠢的敌人或者他们得特别走运。

不应当忘记，当我们作上述的联军兵力的计算时，我们一直注意到以最低的数字来估计军队总数而以最高的数字来估计一切的扣除；这样一来，只要指挥稍微令人满意一点，敌人军队的数量就会比我们所指出的为多，而集中这些军队所需的时间则比我们所措出的为少。但是对于法国，我的假定都是根据相反的原则：即是我以最大限度来推算法国人所能支配的时间，以最高数字来推算他们所能编成的兵员，并作了最低限度的扣除；因此，在革命支配之下的军队的总额被我用尽可能大的数字加以估计。换句话说，假使不把意外的情况以及联军方面犯大错误的可能性估计在内，所有这些推算将描绘出一幅对革命非常有利的局势的图景。

同时在上述的假定中，我是从革命和敌军的侵犯不会立即在国内引起内战的这一点出发的。在目前，即是说在法国最后一次内

战以后的60年，我们不能确定地说，热狂的正统派除了昙花一现的暴动以外还能作出什么。但是显而易见，随着联军的前进，象1793年里昂和土伦的那样起义的机会，将会增长，一切在政治上被击败的阶级和政党暂时联合的机会也将会增长。但是纵然如此，我们也还可以设想一种对革命最有利的机会，即是，革命的无产阶级和农民自卫军能够胜利地解除暴乱的各县和各阶级的武装。

对于革命有利的机会也许由于德国、意大利及其他国家可能的起义而出现，关于这些机会，我们下面来叙述。

五

现在我们来谈谈军事行动本身。

假如在地图上把圆规的一脚按在巴黎，而等于巴黎到斯特拉斯堡的距离为半径划一个圆的话，那末这个圆在南部将在庞-迭-博富阿森附近与格勒诺布尔和莎姆伯里之间的法国边境相交，再沿边境向北经过日内瓦、汝拉山脉、巴塞尔、斯特拉斯堡和哈格瑙，然后沿莱茵河一直到达河口，只在个别地方离开该河，但是也不超过两天的行程。如果莱茵河成为法国的边境的话，那末在这个边境的全长上，从它不再以阿尔卑斯山为屏障的这个地点起一直到北海止，巴黎大约与这一边境的任何一点都是等距离的。如果是这样的话，以巴黎为中心的法国的军事体系也许完全和地理条件相适应。在这一假定之下，由莎姆伯里到鹿特丹便成为一条正弧线，在这条弧线上，唯一暴露的法国边境的各点，同时是最接近于其首都的各点，距巴黎便相等了，其距离大约为70德里，或

者14日的行程。同时这个边境又可为广阔的河流所掩护。主张莱茵河是法国天然国境的实际的军事根据便在这里。

但是莱茵河的这个同样特殊的地形，又使它成为一切向巴黎分进合击作战的出发点，因为要使几支军队能够同时到达巴黎并同时由各方面威胁它，这些军队必须从与巴黎等距离的各个地点同时出动。虽然分进合击的行动，在集中的地点位于敌军的势力范围内，特别是与敌军的作战根据地相符的条件下是非常危险的，但一切反革命的联军对法国所发动的军事行动都必然带有分进合击的性质。其理由如下：（1）夺取巴黎即等于夺取整个法国；（2）边境上位于法军行动范围内的任何一个地点，都不能使之暴露，因为不然，法军便可向敌军后方派遣军队而在他们的本国内发动起义；（3）任何联军所必须征调来进攻法国的军队，需要许多作战线来保证供应。

必须以两个集团军来保卫的这段边境，是由莎姆伯里到鹿特丹。西班牙边境暂时可不必注意。由瓦尔河到伊泽尔河的意大利边境有阿尔卑斯山为屏障，同时又沿着逐渐离开巴黎的这一方向向前伸展，形成上述圆周的切线。这个边境只有在下列的场合之下才须注意：（1）萨伏依雅阿尔卑斯山设堡的隘口，特别是塞尼山隘落于法军之手时；（2）意图在沿岸进行牵制战时，但对于这个一定要有特别的理由；（3）法国军队在其他一切方向都保证了边境的安全之后，想仿效1796年拿破仑的先例，在这里转为进攻时。在一切其他可能的情况下，这一段边境是不值得注意的。

这样看来，积极的军事行动，无论对于联军或者对于法国都仅限于由莎姆伯里或者伊泽尔河到北海的这条线和位于该线和巴黎之间的那部分领土上。而且正是法国的这一部分领土，就地形构

成来讲，好象专为防御而设，同时在这里山脉和河流的分布从军事观点来看是最有利的。

由罗尼河到摩塞尔河，边境为漫长的、只有在很少的几个地方才能勉强通过的一条山脉——汝拉山——所掩护；佛日山与之相接，其延长线又有霍赫瓦尔特山和伊达瓦尔特山；这两个山脉与边境平行延伸，此外，佛日山又为莱茵河所掩护。在摩塞尔河和麦士河之间，通巴黎的道路为阿尔登所遮断，在麦士河的彼岸又为阿尔良所遮断。暴露的只剩下由松布尔到海的这一区域，但是在那里军队愈前进，危险就愈大，因为如果强大的法军稍稍采取巧妙的战法时，他们就有由比利时截断而被驱下海去的危险。不仅如此，由罗尼河到北海的全线布满要塞，其中有些要塞如斯特拉斯堡控制着整整的几省。

由汝拉山与佛日山连接点向西南沿奥佛尼蜿蜒着一条山脉，它形成北海及大西洋与地中海之间的分水岭。由此向南流的是索恩河，而彼此平行向北流的则有摩塞尔河、麦士河、马尔纳河、塞纳河和云纳河。在上述的每两条河流之间以及在云纳河和罗亚尔河之间，又蜿蜒着许多绵巨的山脉形成支脉，这些河流彼此分隔开并为很少的几条道路所切断。固然，整个山区大部分都适于各兵种通行，但却是很贫瘠的。大的军队不能在那里支持很长的时期。

如果敌人的军队通过这个山区，甚或通过位于麦士河流域和塞纳河流域之间的同样贫瘠的山地，香槟，那末他们就进入塞纳河流域。这里正充分说明了巴黎的位置在军事上的显著的优点。

塞纳河流域由其发源地直到瓦斯河口是由许多弧形的河流构成的，这些河流都朝向西北，差不多彼此平行着，如云纳河、塞纳河、马尔纳河、瓦斯河和埃斯尼河；这些河流中的每一条都有

许多流向同一方向的支流。所有这些弧形的河谷都在彼此相去不远的距离内会合,而巴黎则位于这些会合点的中央。由地中海和些耳德河之间的一切陆地边界到巴黎去的主要道路都沿这些河谷延伸,而汇合于巴黎附近。因此保卫巴黎的军队常常可以在比较短的时间内集中起来并且比进犯的军队更容易地由一个受威胁地点调动到另一地点,因为两同心圆中内圆有较短之周界。辉煌地发挥这个优点,也就是沿内圆周界不懈地移动,曾使拿破仑在他1814年著名的战争中以少数兵员牵制联军全部兵力于塞纳河流域达两月之久。

弗·恩格斯写于1851年4月

原文是德文

第一次载于1914年12月4、11日

俄文译自“新时代”

“新时代”第9、10期

卡·马克思 1848年11月4日通过的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³¹⁷

宪法前面有一个冠冕堂皇的总纲；其中值得注意的有如下几点：

1 . 宣布法兰西为共和国。2 . 法兰西共和国是民主、统一和不可分割的国家。3 . 它的原则是自由、平等、博爱，它的基础是家庭、劳动、财产和社会秩序。5 . 它尊重其他民族的独立，也要其他民族尊重它的独立。它决不发动任何侵略战争，永不使用武力去反对任何民族（但是，罗马呢！³¹⁸）的自由。

六月起义以前，国民议会曾制订过宪法。其中除了其他许多承认人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款以外，还有如下几条：

第6条 教育权是全体公民通过国家的免费教育全面发展身心和智力的权利。

第7条 劳动权是每个社会成员以自己劳动维持生活的权利。因此，社会必须保证一切具有劳动能力的人在无法通过其他途径找到工作的时候能够获得工作。

第9条 救抚权是孤儿、病弱者和年老者受国家救抚的权利。

当资产阶级由于1848年6月的胜利而嚣张起来的时候，它把这3条从

宪 法

中删除了。现在宪法是这样写的：

“第一章

最高权力属于法兰西全体公民。这种权力是不可剥夺的、是不能转移的。任何个人、任何一部分人民均无权擅自行使这种权力。”

“第二章 宪法保障的权利

第2条 非依法律之规定，不得逮捕和监禁任何人。”

“第3条 凡居住在法兰西领土上的公民，其住宅不得侵犯，非遵照法律规定的手续，不得侵入公民住宅。”

请注意，法兰西宪法在这里也和其他一切地方一样都保障了自由，但是总是附带着一些法律已经规定的或者可能另行规定的例外情况。同时，拿破仑皇帝，复辟时期和路易-菲力浦所规定的一切例外情况不仅原封未动，而且在六月革命之后还大大增加了。例如，1849年8月9日公布的关于戒严状态（应由国民议会宣布，而在国民议会休会期间应由总统宣布）的法律规定，军事当局有权将一切政治犯交给战地军事法庭审判。其次，这项法律还规定，军事当局不论白天和黑夜均有权进入任何人的住宅进行搜查，有权没收各种武器，驱逐一切在被宣布戒严状态的地点没有住所的人。

至于外国人，他们在法兰西国土上所享受的唯一“权利”就是，只要警察当局认为必要，他们就随时会被捕和被驱逐出境。

至于法国人，任何一个官吏下一道命令，就可以逮捕任何法兰西公民。

“第4条 除专门任命的法官外，不得对任何人进行审判。不得以任何名义和任何借口设立特别法庭。”

我们已经知道，在“戒严状态”下军事法庭排挤一切其他法庭。不仅如此，国民议会为了审判一部分政治犯在1848年建立了以“最高法庭”为名的“特别法庭”，而在六月起义之后，国民议会根本没经任何审判就把1万5000名起义者流放到殖民地去了！

“第5条 废除政治犯的死刑。”

但是，政治犯被流放到寒热病流行的地区，在那里被处死刑无非是时间稍微晚一些，痛苦更大一些。

“第8条 公民有结社、组织和和平的非武装的集会，递交请愿书以及在报刊上和用其他任何方式发表意见的权利。在行使这些权利的时候，除了要保证其他公民有平等权利和维护社会安全之外，不受任何其他限制。”

以“社会安全”为理由的限制使上述权利根本无法行使，这一点从下面的几个事实中可以明显地看出：

1. 出版自由。—— 1848年8月11日和1849年7月27日公布的两项法律不仅恢复了关于报纸交保证金的规定，而且恢复了和加强了拿破仑皇帝和在他以后所规定的一切限制。

1850年7月23日的法律增加了保证金的数额和扩大了有关一切周报、杂志和其他期刊等等的法律的有效范围³¹⁹。此外，这项法律要求每篇文章都要有作者的署名，并且重新规定向报纸征收印花税。不仅如此，这项法律还规定向报纸登载的小说、纯文艺性的报刊作品征收印花税；如不遵行上述的一切规定，按照法律，便有受到巨额罚金的处分的危险。自从上述的法律颁布以后，革命报刊完全绝迹了。每一周总有一家报纸或一本小册子成为法庭迫害的对象，遭受罚款和查禁，为了反对这些迫害，革命报刊进行了

长期的斗争。资产阶级要在陪审法庭上来消灭工人的报纸。

这种制度在1850年7月30日的恢复剧本检查的法律中达到了顶点。这样，言论自由便从它的最后的文学掩避所中被驱逐出来了。

2. 结社和集会权。——1848年7月28日—8月2日的法令，使俱乐部受到警察局的许多限制，几乎丧失了一切自由。例如，俱乐部无权通过带有立法性质的决议等等。这项法令使一切非政治性的组织和私人集会完全置于警察的监护之下，听受警察的任意摆布。

1849年6月19日—22日的法律规定，政府在一年内有权利封闭一切俱乐部和禁止未经政府同意的集会。1850年6月6日—12日的法律规定，把这种权力再授予政府一年，实际上这种权力已经扩大到那些不合政府口味的议会竞选集会上。结果，从1848年7月起，所有的俱乐部和集会，除保皇派和波拿巴派的 *cercles*〔俱乐部〕之外，实际上都停止了活动。

1849年11月29日的法律规定，凡是联合起来争取提高工资的工人一律判处3个月以内徒刑和3000法郎以下的罚款。这项法律并且还规定，工人在徒刑期满后要受警察当局5年的监视（这就意味着贫困、破产和迫害）。

结社和集会权就是如此。

“第9条 教学自由权。教学自由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和在政府的监督之下享受之。”

这里是在重演老把戏。“教学自由”，但是“须依照法律规定的条件”，而这些条件恰恰是一些完全消灭这种自由的条件。

1850年3月15日的法律将整个教学系统置于教会的控制之下。

这个部门的主管机关是4名法国大主教所领导的最高人民教育委员会。这项法律规定，所有地方学校的教员，即使他们是市镇委员会或老教区委员会推荐的，都必须服从 *recteurs*，即督学的意志。教员必须接受与军队中的服从和纪律相类似的条件，服从督学、市长和牧师；可见，根据上述法律，教学自由归结起来，就是没有民政当局和教会当局的允许，谁也无权教学。

“第11条 财产权不受侵犯。”

“第14条 保障国家债务。”

“第15条 征税只能为了社会的需要。每个公民须根据本人的财产和可能纳税。”

第三章 国家权力

此章规定：

“1. 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不得世袭。”

“2. 权力分立是自由政府的基本条件。”

在这里我们看到了旧宪法的克汀病。“自由政府”的条件不是权力的分立，而是权力的统一。国家机构不可能过于简单。骗子手耍的花招常常就是使国家机构复杂化，把它弄得莫名其妙。

第四章 立法权

立法权完全由包括阿尔及利亚和殖民地的议员在内的750名

法国共有3万8004个市镇，小者不满100人，大者有巴黎一类的大城市。——译者注

一种痴呆病。——译者注

议员组成的议会来行使。为修改宪法而召开的会议必须有900名代表出席。选举制度是按居民的人数制定的。下面4条,我们认为有必要照抄下来。

“第24条 选举权是直接的和普遍的,投票采取秘密方式。”

“第25条 凡年满21岁,没有被剥夺政治权和公民权的法国人,均为不受任何选举资格限制的选民。”

“第26条 凡年满25岁的选民均可以当选为议员,而不受居住资格的限制。”

“第27条 剥夺法兰西公民的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所依据的条件由选举法规定之。”

上面引用的几个条款表述的精神跟宪法里所有其他条款的精神毫无二致。“凡是法国人均为享有政治权力的选民”,但是“选举法”必须规定,哪些法国人不应享有政治权利!

1849年3月15日的选举法把政治犯除外的一切罪犯都划入这个范围。而1850年3月31日的选举法不仅把政治犯,不仅把所有被认为藐视早已确定的社会舆论和出版法的罪犯一律划入这个范围,而且实际上规定了居住资格,从而使 $\frac{2}{3}$ 的法国人不能参加投票!

在法国,“选举权是直接的和普遍的”这句话就是这么一回事。

“第28条 凡担任国家职务领取薪俸的人不得同时担任人民的代表。议员在其从事立法活动期间不得担任任何属于行政权的领取报酬的职务。”

这两个原则受到下列规定的限制,实际上几乎是一纸空文。

“第30条 选举采取按名单投票方式,各省分别在选区的主要居民点进行。”

“第31条 国民议会任期为3年,期满时必须举行新的选举。”

“第32条 国民议会应连续开会,但是它有权休会并在休会期间任命一

个由25名议员和议会常务局的成员组成的委员会作为自己的代表。该委员会有权在紧急情况下召集议会会议。”

第33—38条 议员可以重选。他们不受过去颁布的任何命令的约束，他们不受侵犯，不得由于在国民议会里发表意见而遭受迫害和担负责任。他们可以得到他们不得拒绝的薪金。

至于“议员的不受侵犯性”和他的“发表意见的自由”，国民议会的多数在6月13日以后通过了一项新的规章，决定国民议会议长有权谴责议员，处以罚款，剥夺他的薪金和暂时把他驱逐出会场，——这样一来，也就最后消灭了“言论自由”。1850年，国民议会通过了一项法律，根据这项法律，议员甚至在会议期间可以因债务诉讼而遭到逮捕和在一定期间内如不还清债务而被剥夺其人民代表的资格。

所以，无论议员的议论自由或议员的不受侵犯性在法国都是不存在的，而所存在的只有债权人的不受侵犯性。

第39—42条 议会会议必须公开。但是，议会可以根据一些议员的要求宣布为秘密委员会。议会的决议只要获得过半数议员的赞同，就具有法律效力。除紧急情况外，不经过每隔5日宣读一次的三读程序，不得通过法律。

这种从英国“宪法”抄袭来的程序，在法国没有在任何一个重要场合中遵守过，甚至在应当认为最为必要的情况下也未能这样做。例如，5月31日的选举法在一读之后就通过了。

第五章 行政权

第43—44条 行政权由总统行使。总统必须是年逾30岁，从未丧失过法国国籍，在法国出生的法国人。

法兰西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路·拿·波拿巴不仅丧失过法国国籍，不仅当年当过英国特种警察，而且甚至还入过瑞士国籍。

第45—70条 共和国总统任期为4年，期满后不经过4年不得重新当选。这样的限制也适于他的六亲等以内的亲属。选举必须在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举行。即使总统在其他日子当选，他的任期仍然到他当选后的第四年的5月的第二个星期日为止。总统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必须获得绝对多数的选票才能当选。如果没有一个候选人获得半数选票或200万张以上的票数，那末总统可以由国民议会从5名得票最多的候选人当中选举。

总统必须宣誓忠于宪法，他可以通过内阁阁员将提案提交国民议会审核，可以向军队发布命令，但是不得亲自指挥军队；他无权割让法国的任何一部分领土，解散或中止议会会议和停止宪法的效力。他出面进行谈判和批准一切条约，但是这些条约只有经过议会批准才具有约束力。他不经议会同意无权宣战，他有赦免之权，但无权宣布大赦。最高法院判决的犯人只有国民议会才能予以赦免。总统可延迟公布法律，要求议会重新加以讨论，但是在这种情况下讨论是最后的一次。总统可以任命大使和内阁部长，可以将市长、省委员会委员、国民自卫军的军官和民选的负责人员免职3个月。总统的一切命令，除部长本人的免职令以外，均须由部长签署。总统、部长和政府官员都在自己部门中对政府的一切行动负责。总统的任何可能给予议会以压力，阻挠或破坏议会正当行使其职权的行动，均被看成是叛国的行为。在这种情况下，总统的权力应立即予以剥夺，违抗总统的命令则成为每个公民的义务，授予总统的权力应立即转交给国民议会，而最高法院的成员必须马上集会，召集陪审员就席，以便审判总统和他的同谋者。

总统应有官邸，他的年俸为60万法郎，或2万4000镑（他目前领取216万法郎，或8万6400镑）。部长 *ex officio*〔按其职务〕出席国民议会，他们认为需要作几次演说，就可以发表几次演说。总统在当选后的一个月內指定3个副总统候选人，国民议会在这3个候选人当中选举共和国副总统。副总统要进行跟总统同样的宣誓，他不得跟总统有亲属关系，当总统无法行使职权时，他代行总统的职权，国务委员会开会时，他担任主席。如果总统职位由于总统逝世或某种其他原因而空缺，则必须在一个月之内进行总统的新的选举。

第六章 国务委员会

第71—75条 国务委员会是唯一讨论应当由内阁提出和可能由国民议会提出的提案的咨议机关。

第七章 国内行政机关

此章是有关官员、高级负责人员、市镇和地方委员会的。唯一能够兑现和在最大可能范围内实施的一个条款写道：

“第80条 总统可以解散省委员会、县委员会和市镇委员会，但须经国务委员会同意。”

第八章 司法权

老实说，此章只不过是拿破仑皇帝的法律的再版。但是，下列几点补充是值得注意的：

“寄语人民”上误印为《clergy》——“牧师”；看来，应当是《clerks》——“官员”。——编者注

“第81条 诉讼是代表法兰西人民进行的，因而一律免费。”

这是多么不切合实际，谁也不肯免费去砍掉脑袋！

第91—100条是关于最高法院的。它具有审判总统的特殊权力，提交它审判的有部长和所有国民议会认为应当由它审判的政治犯。

组成这个“最高法院”的成员是5名由上诉法院（法国的高等法院）从它的成员中选出的法官和36名从各省委员会的成员中挑选出来的陪审员。这是极端贵族化的机关。这个法庭直到目前为止审判过的唯一的一批人是，1848年5月15日的案件的被告（在我们面前出现的是巴尔贝斯、布朗基等人的名字）和参预1849年6月13日事变的议员们。

1848年8月7日的法律规定，凡是没有阅读和写作能力的人一律从陪审员的名单中去掉，也就是说，占 $\frac{2}{3}$ 的成年居民从这个名单中去掉！

第九章 武装力量

一切原有的军法都原封未动。士兵犯罪不受民间法庭审判。下面的条款可以说明这个宪法的精神。

“第102条 每个法国人，除法律规定的情况外，都必须服兵役和在国民自卫军中服务。”

每个有钱的公民都可以免除服兵役的义务。

根据目前正在讨论的二读已经结束的法律，工人阶级全部被排斥出国民自卫军！不仅如此，总统有权在任何地区解散国民自卫军一年，而实际上，国民自卫军在法国一半领土上已经解散了！

第十章 特别法律

第110条 “国民议会将宪法寄托在全体人民的警惕性和爱国主义上”，而将“警惕的”和“爱国的”人民寄托在最高法院的宽厚和仁慈上！6月13日就是如此！

第十一章 宪法之修改

“第111条 如果国民议会在闭会期间要全部或部分修改宪法，则应采取如下的方法：

议会所提出的要求只有经过每隔一月举行一次的三论会才能成为法律，同时通过决议时需要有 $\frac{3}{4}$ 的票数，而投票人不得少于500名。为修改宪法而召开的国民议会只有3个月任期，并且除非有异常重要的理由，不得讨论其他任何问题。”

这就是“法兰西共和国宪法”，这就是运用宪法的方法。读者马上就会看出，这个文件从头到尾是一大套掩饰极其奸诈的意图的漂亮话。宪法的措词本身使破坏宪法成为不可能的事情，因为每个条款都包含着相反的一面，而完全取消条款本身。例如：“投票是直接的和普遍的”——“除法律将来规定的情况外”。

因此，不能说1850年5月31日的法律（它剥夺了 $\frac{2}{3}$ 的居民的选举权）完全违反宪法。

宪法一再重复着一个原则：对人民的权利和自由（例如，结社权、选举权、出版自由、教学自由等等）的调整和限制将由以后的组织法加以规定，——而这些“组织法”用取消自由的办法来“规定”被允诺的自由。奥地利和普鲁士资产阶级从法国原版中抄袭来的这种花招就在于，赋予完全的自由，宣布冠冕堂皇的原则，把有关如何运用这些原则的问题即细节留待以后的法律来加

以解决；在1830年的法兰西宪法和在它以前通过的一些宪法里就用过这种花招。

人民！你们不仅对原则，而且对细节³²⁰可以抱有自己的主张，但是你们得首先取得政权。英国议会里的斗争正是围绕着这个问题进行的！

在整个宪法里，唯一无保留条件的肯定的条款，是关于总统选举的条款（第45条）和关于修改宪法的条款（第111条）。这是唯一可能破坏的条款，因为只有这些条款不包含任何矛盾。

这两项条款是1848年的制宪议会用来直接对付波拿巴的，因为波拿巴用阴谋手段取得了总统的宝座，使议员们感到恐惧。

这个虚伪的宪法中常常出现的矛盾十分明显地证明，资产阶级口头上标榜是民主阶级，而实际上并不想成为民主阶级，它承认原则的正确性，但是从来不在实践中实现这种原则，法国真正的“宪法”不应当在我们所叙述的文件中寻找，而应当在根据这个文件通过的我们已经向读者简要地介绍过的组织法中寻找。这个宪法里包含了原则，——细节留待将来再说，而在这些细节里重新恢复了无耻的暴政！

在法国，专制统治是多猖狂，下面一些为了对付工人而采取的限制可以证明。

每个工人都要从警察局领个小本子，小本子的封面上写着他的姓名、年龄、籍贯、职业或工作以及他的特征。工人必须在小本子上写明雇用他的主人的姓名和离开主人的原因。而且不仅如此，小本子还要交给主人，主人再把它连同该工人的鉴定一起转交给警察分局。当工人辞工的时候，他必须从警察局领回小本子，没有小本子作证明，就无法到别的地方工作。这样一来，工人的生计就完全

操在警察局的手里。而且还不仅仅限于这些,这个小本子还要当护照用。如果警察局认为哪个工人是危险分子,它就在小本子上注明:«bon pour retourner chez lui»〔应当返乡〕,这个工人就得返回原籍。这些可怕的限制是无需作什么注释的。让读者来充分想象它们所起的作用和考查它们所产生的全部后果吧。无论封建时代的农奴和印度的穷人的地位都不如法国工人的低。所以,法国工人迫切地期待起义时刻的来临,这是不足为奇的。他们的不满情绪具有暴风骤雨的性质,这是不足为奇的。工人们在1830年表现了宽厚精神;他们在1848年也表现了宽厚精神;但是从那时起,他们的自由被一部分一部分地出卖,他们的鲜血流成了河川,每个法国监狱都挤满了无期徒刑的囚犯,1万5000人被一批批地流放到殖民地,而现在工人们正遭受着我们在这里所描绘的可怕的专制统治。资产阶级害怕人民,他们使尽最后的力量来多少推迟一下清算时刻的来临,这是不足为奇的。但是,他们的队伍内部是不统一的。在他们当中有许多许多勾心斗角的野心家,最突出的是

拿破仑的阴谋。

目前问题在于,总统的任期是否会延长,宪法是否会修改。拿破仑不公开破坏宪法,就无法连任,因为,第一,他只有在他任期满后经过4年才能重新当选,第二,宪法只有在 $\frac{3}{4}$ 的多数议员的同意之下才能修改。而主张修改宪法的人还不能掌握这样的多数,因此,再次当选为总统按照宪法是办不到的。

因此,拿破仑只能二者取其一:或者向宪法挑战,诉诸干戈,以斗争来解决问题,或者遵照法律在规定日期放弃自己的职权。在后一种情况下,卡芬雅克将会当选为总统,这样,资产阶级共和国就会大功告成。而在第一种情况下,前途会变得更加复杂。

正因为如此,拿破仑目前正力图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资产阶级敌视拿破仑,——这一点人民是知道的,这是他们相互联系的因素。但是,拿破仑跟资产阶级一样,都是人民对压迫者所怀有的那种憎恨的对象;如果他能够从自己的肩上丢下这个包袱,把它完全转移到资产阶级的肩上,那就会消除一个大障碍。

从他不久前在第戎发表的演说中可以看出,他正是要努力实现这一点。他曾说道:

“一切糟糕的法律都是国民议会通过的,而我提出的一切好的法律,国民议会不是加以否决,就是以修正案加以破坏。它反对我的一切改善你们处境的意图,并且在没有任何障碍的地方制造障碍来阻挠我的措施。”

可见,他正力图回避打击,而使打击转向国民议会。同时,军队与其说拥护国民议会,不如说拥护他,而人民贫困不堪,几乎一有点变动都会被大多数人看成是一种好转,因为有觉悟的人还只是少数。

这样,如果资产阶级面对拿破仑的决心,敢于在卡芬雅克的领导下起来斗争,人民必定会起来反对资产阶级,而拿破仑就会站在人民一边。他们联合起来,力量就会比国民议会更强大。但是,那时就会面临一个紧急关头;国民议会看到人民可能取得胜利,就会两害相权取其轻。他们宁肯要拿破仑帝国或专制,而不要民主共和国和社会共和国,因此,他们会跟总统达成协议。总统由于对民主主义者的统治害怕的程度并不亚于议会本身,必将接受议会的帮助。军队,或者至少由于危险和斗争看来会赋予“光荣”而心情激动的那一部分军队,会更加紧密地靠拢拿破仑;斗争必将采取另外的方式,这将是军队和资产阶级反对人民的斗争。结局如何将取决于人民的勇敢、自觉和团结。拿破仑的阴谋在于,一开始利用

人民反对资产阶级，然后利用资产阶级反对人民，最后利用军队反对这两者。

未来蕴藏着重大的事变，而法国目前的情况正是历史所提供的最值得注意研究的对象之一。

卡·马克思写于1851年6月上半月

载于1851年6月14日

“寄语人民”第7期

原文是英文

俄文译自“寄语人民”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附 录

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

救济德国政治流亡者的呼吁书

目前，德国在进行军事镇压的极为混乱的情况下出现了“秩序和宁静”；在死神的隆隆炮火下变成烟雾弥漫的城市废墟上恢复了“财产和人身的不可侵犯性”；军事法庭来不及把一个又一个的“叛乱者”的头颅送入坟墓；监狱已经容纳不了所有的“叛国犯”，而唯一还存在的法律就是战地军事法庭的法律，在这样的时候，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无家可归，流落国外。

他们的人数一天天增多，同时这些失掉祖国的人的贫困也日益加深；他们到处流浪，早上不知道晚上在何处能找到过夜的地方，而晚上又不知道明日早晨在何处能获得一块面包。

无数的流亡者遍布瑞士、法国和英国的各个城市。不幸的人来自德国各地。凡是在维也纳街垒中与黑黄联盟进行过战斗以及同耶拉契奇的骑兵团进行了厮杀的人，凡是从普鲁士军阀弗兰格尔和勃兰登堡那里逃跑的人，凡是在德勒斯顿持枪捍卫过帝国宪法的人，凡是在巴登共和国军队中同联合一起进行十字军讨伐的君主们作过战的人，——不论他们是自由党人或是民主党人，是共和主义者或是社会主义者，他们这些各种各样的政治学说和利益的拥护者，现在由于共同的命运都是遭受驱逐和贫困而团结起来了。

一半国民身穿破衣烂衫伸手向人求乞。

在伦敦，我们的流亡的同胞也在这世界繁华都城的寒冷街头寻找栖身之所。每一艘横渡海峡的轮船都从大海彼岸载来一批一

批失掉祖国的人；在伦敦各个街道上都可以听到流亡者用我们祖国语言发出的怨声。

这种贫困情况使住在伦敦的许多德国的自由的朋友深受感动。今年9月18日召开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来到这里的德国流亡者的全体大会，共同组织了民主党人救济委员会。当选的有下列人员：卡尔·马克思（曾任“新莱茵报”编辑），卡尔·布林德（曾任巴登-普法尔茨政府驻巴黎公使），安东·菲斯特尔（曾在维也纳任奥国国会议员），亨利希·鲍威尔（伦敦鞋匠），以及卡尔·普芬德（本市油画家）。

这个委员会将每月向全体大会提出公开的报告，同时把报告简要地在德国报纸上发表。为了避免一切谣言起见，通过一项决定：今后委员会的任何委员都不应当从委员会的出纳处领取任何补助全。如果委员会的某个委员将来必须申请补助，他从这时起就不能再做委员会的委员。

朋友们和兄弟们，我们请求你们尽力而为。如果你们希望那化为灰烬的和被束缚的自由重新得到恢复，如果你们同情你们的先进的优秀战士所受的苦难，那末用不着我们特别劝说，你们就会响应我们的号召。

捐款请寄：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鞋匠亨利希·鲍威尔。

信封上请注明：“流亡者委员会收”。

德国政治流亡者救济委员会

安东·菲斯特尔，卡尔·马克思，卡尔·布林德，
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

1849年9月20日于伦敦

伦敦德国流亡者 救济委员会的报告

今年11月18日召开了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住在伦敦的大部分政治流亡者全体大会，会上听取了以前的一次会议上选出的救济委员会的财务报告。

从今年9月22日起共收入：

	镑	先令	辨士
(1)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	2	8	4 ¹ / ₂
(2) 伦敦德国读者协会.....	2	15	—
(3) 伦敦“北极星报”编辑部	—	5	—
(4) 伦敦埃德乌斯公民	—	1	—
(5) 伦敦济费尔特公民募集	—	9	6
(6) 伦敦哥林盖尔公民.....	1	5	9
(7) 伦敦亨·鲍威尔公民募集	7	1	9
(8) 经海德克尔公民转来巴黎德国工人捐款 ...	—	12	1
(9) 经克雷普公民转来哈得兹菲尔德捐款.....	3	—	—
(10) 普鲁士施特廷 捐款.....	18	14	—
总计.....	36	12	5 ¹ / ₂

波兰称作：兹杰辛。——编者注

从今年9月22日至11月18日发给流亡者：

	镑	先令	辨士
(1) 克列奈尔.....	2	17	2
(2) 钦斯基.....	3	17	4
(3) 弗辽利希.....	2	2	1
(4) 亨泽尔.....	3	7	6
(5) 埃格奈尔.....	1	19	—
(6) 弗·曲普费尔	1	11	17
(7) 伊·曲普费尔	1	4	4
(8) 布莱，贝尔克曼，奥佐巴，威谢尔， 布劳利茨基和克莱因等流亡者共	2	8	10
(9) 给有家眷的流亡者商人朔普通 票一张	4	—	—
(10) 印刷费和捐款簿费	1	15	2 ¹ / ₂
总计	26	3	$\frac{1}{2}$
收入总数	36	12	$\frac{1}{2}$
支出总数	26	3	$\frac{1}{2}$
现存	10	9	5

其次，收到的衣服已分发给流亡者。

上述财务报告经大会一致通过。一切支出都有单据，哈得兹菲尔德和施特廷的捐款人没有出席这次大会，大会将建议他们委派人来查阅单据。

委员会由于安·菲斯特尔和卡·布林德两位委员的离开已人数不全，另外有人企图另组织一个与我们委员会相对立的、不属于工人教育协会和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的委员会，因此本委员会已把委任状退还给协会。

关于这个问题，协会通过了如下的决议：

(1)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赞同以前的委员会的活动，并从自己内部选出5个委员，组成新的委员会，称为“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上届委员会的现款移交给这个委员会。

(2) 委员会主要是救济社会民主党党员。但是，在财力允许的范围内，委员会也不拒绝救济其他党派的流亡者。

(3) 委员会每月向工人教育协会提出财务报告，然后进行改选。报告将在“德意志伦敦报”、“北极星报”、法兰克福的“新德意志报”、科伦的“西德意志报”、汉堡的“北德意志自由报”、柏林的“民主权”、“瑞士国民报”、纽约的“快邮报”和“国家报”上发表。

(4) 捐款人有权亲自出席听取每月的财务报告，当他们不在伦敦的时候可以指派自己的代理人，检查账簿、单据和现款。

(5) 工人教育协会选举下列人员为委员会委员：卡尔·马克思，奥古斯特·维利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亨利希·鲍威尔，卡尔·普芬德。

委员会将公布上述报告和工人教育协会的决议，并请把捐款送交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亨利希·鲍威尔。

委员会委员

卡尔·马克思，奥古斯特·维利希，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亨利希·鲍威尔，
卡尔·普芬德

1849年12月3日于伦敦

载于1849年12月12日
“西德意志报”第173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德意志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卡尔·马克思主编的“新莱茵报。 政治经济评论” 招股启事

大家都知道，“新莱茵报”是从1848年6月1日至1849年5月19日在卡尔·马克思领导下在莱茵河畔科伦出版的日报。本报非常成功地代表了最彻底的德国民主主义的方向，因此，尽管有各种禁止出版的阻碍和宣布戒严状态，尽管对本报进行了诉讼和迫害，尽管有极大的困难，尽管对本报采取敌对行动和设置各式各样的障碍，但是，在它总共只存在11个月当中，就已经拥有5600订户。本报编辑两次被陪审法庭宣告无罪以后，普鲁士政府就只好采取粗暴的镇压的办法，来消灭这个使它非常恐惧的报纸。去年5月里在莱茵普鲁士发生的地方起义被镇压下去以后，政府就利用过去到处建立的军阀统治，以暴力把本报的编辑驱逐出普鲁士，因此使“新莱茵报”不能再继续出版。

“新莱茵报”的编辑在去年夏天参加了革命运动，有的在南德，有的在巴黎，以后他们大多数又聚集在伦敦，决定在这里继续出版报纸。最初它仅能以评论刊物的形式每月出版一次，篇幅近5印张。但是，只有编辑部能够以后一期跟着一期间隔时间更短地出版，这个企业才会完全达到自己的目的——经常而深刻地影响舆论，而在经济方面也才会有很大的希望。因此，编辑部打算在经济条件一旦允许的时候，就使“新莱茵报”每两周出版一次，每次

5印张，或者，有可能的时候就出版象英美周刊那样的大型周报，而只要情况允许回到德国，就立刻再把周报改为日报。

根据初步计算，“评论”只要两周出版一次，印数3000份，每年可收入1900塔勒。

为了企业能够自立，使“评论”每两周或一周发行一次，必须要有500镑的资本，为此，现在开始认购股票，条件如下：

1. 每股50法郎，在领收据时一次付清，以后再以收据换取正式股票。

2. 每个股东承担的责任只限于他所具有的股票数量以内。

3. 股东有权指定自己在伦敦的代表，对整个账目进行检查。

4. 每年召开全体大会4次，听取关于整个企业的发展情况和经济状况，通过关于监督业务经营的今后措施的决议。关于企业状况的报告用石印发送每个股东。

5. 企业所获得的利润在“新莱茵报”还不可能每周出版以前均转入资本。在这一任务实现以后，利润分做3部分， $\frac{1}{3}$ 作准备金， $\frac{1}{3}$ 作股息分给股东，其余 $\frac{1}{3}$ 归编辑部。

“新莱茵报”出版负责人康·施拉姆

1850年1月1日于伦敦

由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参与写成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于1930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 委员会的报告

1. 支 出

			磅	先令	辨士
1849年11月	16次补助金	每次7先令	5	12	—
1849年12月	29次补助金	每次7先令	10	3	—
	3次补助金	每次4先令	—	12	—
	1次补助金	6先令	—	6	—
	1次补助金	3先令	—	3	—
	2次补助金	每次5先令	—	10	—
	1次补助金	5先令6辨士	—	5	6
	1次补助金	8先令	—	8	—
	1次补助金	12先令	—	12	—
	4次补助金	每次10先令	2	—	—
1850年1月	20次补助金	每次7先令	7	—	—
	1次补助金	2先令6辨士	—	2	6
	3次补助金	每次4先令	—	12	—
2月1日—23日	18次补助金	每次7先令	6	6	—
	2次补助金	每次5先令	—	10	—
	1次补助金	2先令	—	2	—
	5次补助金	每次10先令	2	10	—
	1次补助金	3先令	—	3	—
	1次补助金	13先令	—	13	—
	2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3辨士	—	2	6
	1次补助金	1先令	—	1	—
114次补助金 总计.....			38	13	6
邮费、印花税、取款费和办事处用具费.....			1	5	1
总计.....			39	18	7

支出中包括给当时得到工作的各个流亡者购买工具、衣服等等贷款26镑；贷款人答应以后归还。

2. 收 入

		镑	先令	辨士
11月19日	出纳处现金	10	9	5
12月1日	工人教育协会	—	3	6
12月10日	经科伦“西德意志报”转来 赔偿费30塔勒.....	4	1	—
12月15日	巴黎德国工人.....	2	5	10
12月17日	经罗斯托克的杜尔克教授 先生转来	16	12	6
2月11日	辛辛纳提的救济委员会	20	18	—
2月20日	息韦林的工人.....	3	—	—
	总计.....	57	10	3
	支出（如上所示）.....	39	18	7
	出纳处积余.....	17	11	8

上述财务报告是于3月4日在这里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会议上提出和批准的。捐款人或者其代表可以查阅会计的单据和账簿。

本报告写妥后，从科伦和纽约收到两笔汇款，这项收入将列入下次的报告中。同时，由于从瑞士和法国不断有人被驱逐出境，这里需要救济的流亡者人数剧增。几乎每天都有新的流亡者来到这里，他们大部分人不仅需要给予微薄的普通补助金，而且迫切需要给予补助来购置衣服。在这样的情况下，由于其他和其他组织也曾想募款援助这里的流亡者，大概是没有成功，结果所有来到这里的流亡老大都向我们申请帮助，于是本委员会的负担就更重了。幸赖这里的德国工人和流亡者本身的努力，某些流亡者

才谋得了职业。但是，在其他地方流亡者容易找到的很多专门职业，在这里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由于在人口过剩的伦敦的激烈竞争，他们却找不到。何况新来的流亡者非常之多，以致需要援助者的名单每周都在增加。

虽然委员会掌握的经费开支极为节省，定期补助金已经根据本地高昂的生活必需品的价格而减到最低限度，可是委员会的基金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很快就会用完。我们甚至担心，不久就无力使这里的失业的流亡者摆脱流浪的生活和极端的贫困。

因此我们再次请求在德国国内的党给予一些经济上的帮助。我们提醒党注意一点，如果说在瑞士和法国贫困的流亡者人数在减少，那末在伦敦贫困的流亡者人数就更为增加了。我们希望手拿武器为德国人民的自由和荣誉而斗争的人们，不致于在伦敦街头向人求乞。

所有捐款请寄：伦敦索荷广场第恩街64号亨利希·鲍威尔先生。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亨·鲍威尔，

奥·维利希，卡尔·普芬德

1850年3月初于伦敦

载于1850年3月21日

“西德意志报”第68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德意志报”

俄译文第一次全文发表

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³²¹

第一条

协会的宗旨是推翻一切特权阶级，使这些阶级受无产阶级专政的统治，为此采取的方法是支持不断的革命，直到人类社会制度的最后形式——共产主义得到实现为止。

第二条

为了促进这个宗旨的实现，协会必须使共产主义革命政党的一切派别加强团结合作，按照共和主义的友爱的原则来消除民族分立。

第三条

协会的创立委员会构成中央委员会；它可以在一切必要的地方设立和中央委员会保持联系的委员会。

第四条

协会的会员人数不限，但接收会员时必须全体通过。选举在任何情况下都必须采取无记名投票的方式。

第五条

协会的全体会员必须宣誓保证严格遵守本章程第一条的规

定。第一条所表述的主旨如果在修改时遭到削弱,会员即不承担他所负的义务。

第 六 条

协会的一切决定必须经过三分之二的多数票通过。

茹·维迪尔, 奥古斯特·维利希,

乔·朱利安·哈尼, 亚当,

卡·马克思, 弗·恩格斯

起草于1850年4月中旬

俄译文由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
研究院于1926年第一次发表

原文是法文

俄文译自手稿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 委员会的报告

收 入

		镑	先令	辨士
2月25日	出纳处积金	17	11	8
	纽约社会改革同盟	30	18	5
3月13日	科伦流亡者委员会	36	—	—
	工人教育协会会员阿·弗·	—	5	—
3月18日	经汉堡的维赫曼先生转来.....	6	—	—
4月16日	经比雷菲尔的雷姆佩尔先生转来...3	—	—	—
	经爱·巴· 的恩格斯先生转来.....	1	—	—
4月20日	一批英国工人	—	7	—
		95	2	1

支 出

3月	53次补助金 每次7先令	18	11	—
3月	7次补助金 每次10先令	3	10	—
3月	1次补助金 9先令6辨士	—	9	6
3月	1次补助金 2先令8 ¹ / ₂ 辨士	—	2	8 ¹ / ₂
3月	6次补助金 每次5先令	1	10	—
3月	2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	—	2	—
3月	2次补助金 每次4先令	—	8	—
3月	1次补助金 2先令	—	2	—
	贷款.....	2	3	—
	邮费和零星开支.....	—	8	8
		27	6	10 ¹ / ₂

大概是指爱北斐特·巴门。——编者注

			镑	先令	辨士
4月	56次补助金	每次6先令	16	16	—
4月	18次补助金	每次5先令	4	10	—
4月	2次补助金	每次2先令6辨士	—	5	—
4月	14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6辨士	1	1	—
4月	52次补助金	每次7先令	18	4	—
4月	1次补助金	8先令	—	3	—
4月	54次补助金	每次3先令	8	2	—
4月	49次补助金	每次3先令6辨士	8	11	6
4月	1次补助金	6先令4辨士	—	6	4
	零星开支.....		—	6	5
			58	10	3
			85	17	1 ¹ / ₂
	结余.....		9	4	11 ¹ / ₂

1849年9月18日成立的委员会自建立以后,在这段比较长的时期中大约救济了100个流亡者,它经手的款项总计161镑7先令8¹/₂辨士。此外,这里的工人教育协会靠募款满足了个别流亡者的急迫需求。它还给其他流亡者找到了工作,并把自己的房屋和报纸供给所有的流亡者利用。

向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提出并经批准的上述财务报告的有关账簿和单据,存在委员会的会计那里,捐款人或者他们的代表可以进行查阅。

最近,司徒卢威、博布钦、施托尔佩的鲍威尔等先生认为需要用自己的名义,从德国为流亡者募集大量款子。为此,他们在自己的周围集结了一些流亡者,并且在昨天会上组织了他们自己的委员会。显然,组织这个平行的委员会的新计划比起过去失败的

计划，不会更多地妨碍我们的活动。

正如财务报告指出的，委员会出纳处的余款已经寥寥无几，它的经费勉强只够用一星期。可是，每天都收到流亡者的救济申请书。因此我们再次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要使流亡者处于困境之中，尽可能快些把自己的捐款寄给伦敦索荷广场英王街21号卡·普芬德会计。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马克思（主席），

奥古斯特·维利希，

卡·普芬德，弗·恩格斯，

亨利希·鲍威尔

1850年4月23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5月10日
“北德意志自由报”第34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北德意志自由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伦敦的德国流亡者

近来，救济这里的德国流亡者的捐款收到的非常之少，因此这些流亡者遭受极大的贫困。他们某些人至今都没有找到自己专长的工作，几乎已有整整一个星期在街头和公园中过夜，确实在忍饥挨饿。各种人和各种组织都借口各委员会之间有分歧，似乎在流亡者中分配捐款对党员有偏心，都拒绝寄钱来。这种情况是司徒卢威、博布钦等先生们造成的，因为他们宣扬说，本委员会只援助“共产主义者”。

这里我们再一次地声明，凡是能够证明他是德国流亡者并且确实需要救济的每一个人，我们都一视同仁地给予了救济。这从我们的账簿和单据中可以看出，我们随时都愿意让捐款人或者他们的代表检查这些账目和单据。下面署名人之一的维利希在司徒卢威、博布钦等先生们所领导的委员会全体会议上向领取委员会补助金的流亡者问道，有谁问过他们是不是“共产主义者”？任何人都没有说过这种话。

我们声明，司徒卢威、博布钦等先生们的上述断言是一种谎话和诬蔑。因此，各个人和各个组织用来拒绝支援伦敦流亡者的借口也是站不住脚的。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马克思，卡·普芬德，奥·维利希，

弗·恩格斯，亨·鲍威尔

1850年6月14日于伦敦

信件和捐款请寄伦敦索荷广场英王街21号卡·普芬德。

载于1850年6月25日

“西德意志报”第149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西德意志报”

伦敦社会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1850年5、6、7月的报告

收 入

		镑	先令	辨士
4月24日	按上次报告结存现金.....	9	4	11 ^{1/2}
5月	经谢特奈尔公民转来哈瑙捐款13镑， 扣除所得税7先令9辨士	12	12	3
	一个英国人捐款	—	2	—
	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寄来20镑和 5镑.....	25	—	—
		46	19	2 ^{1/2}
6月	从特利尔寄来.....	2	2	6
	巴黎德国工人捐款.....	1	18	6
	经佩茨累尔公民转来	—	5	—
		4	6	—
7月	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寄来	30	—	—
	从科伦寄来	—	11	4
	从维斯巴登（工人联合会）寄来.....	4	10	—
	从汉堡（“北德意志自由报”）寄来.....	11	11	10
	伦敦工人教育协会捐款.....	7	9	6
	从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寄来...20	—	—	—
	从纽施塔特（哈尔特）寄来.....	4	—	—
	从汉堡（“自由射手”报发行科）寄来...20	—	10	10
	从拉绍德封寄去.....	5	—	—
	从汉堡（圣格奥尔格工人联合会）寄 来	—	17	6
		104	11	—

支 出

			镑	先令	辨士
从4月24日 至5月30日	128次补助金 每次3先令6辨士	22	8	—	
	27次补助金 每次3先令	4	1	—	
	26次补助金 每次2先令	2	12	—	
	31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	1	11	—	
	25次补助金 每次5先令	6	5	—	
	临时补助金	1	5	—	
	流亡者皮鞋修理场设备费	—	14	—	
	零星开支	—	6	11	
		39	2	11	
6月	58次补助金 每次2先令	5	16	—	
	59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	2	19	—	
	25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6辨士	1	17	6	
	临时补助金	—	10	—	
	零星开支	—	11	6	
		11	14	—	
7月	28次补助金 每次2先令	2	16	—	
	24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	1	4	—	
	93次补助金 每次6辨士	2	6	6	
	临时补助金	1	6	—	
	流亡者膳宿费				
	7镑 9先令6辨士				
	5镑 — —				
	5镑10先令—				
	5镑10先令—	35	9	6	
	6镑 — —				
6镑 — —					
为工人购置杂物	6	—	—		
流亡者贷款	7	12	6		
有家眷的流亡者贷款	1	—	—		
零星开支	—	19	3 ¹ / ₂		
		58	13	9 ¹ / ₂	
总计	109	10	8 ¹ / ₂		

	镑	先令	辨士
收入总额.....	155	16	2 ¹ / ₂
支出总额.....	109	10	8 ¹ / ₂
现存	46	5	6

上述财务报告是在今年7月30日工人教育协会会议上提出和批准的。捐款人及其代表可以查阅账簿和单据。

因为6月份捐款收到很少，流亡者常常感到十分窘困，所以决定为流亡者建造宿舍和饭厅。这里的工人教育协会，以及已找到工作的那部分流亡者，靠自己的捐款，就可能实现这个计划。以后收到的款子，可以用来购置些屋内所必需的用具。目前宿舍有18个流亡者住宿，饭厅约有40个流亡者用餐。首先要吸收流亡者中失业的鞋匠替他们的同志修理必要的靴鞋。然后委员会拨出款项并采取必要措施，在上述的房子里为流亡者组织生产作坊，使他们能够解决自己的一部分生活问题。

如果这种第一次尝试成功了，那末，将更大规模地组织这项工作，并且把工作情况及时地通知大家。委员会希望，当流亡者自己还不能维持自己的生活的時候，救济流亡者和安排他们进行劳动，这两项措施会得到德国大量捐款的支援。

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卡尔·马克思，弗·恩格斯，奥·维利希，

卡尔·普芬德，亨·鲍威尔

1850年7月30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8月7日
“北德意志自由报”第425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北德意志自由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共产主义者同盟 中央委员会的决议

1850年9月15日

1. 中央委员会由伦敦迁到科伦，委托科伦区部建立新的中央委员会。
2.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宣告无效，委托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章程。
3. 撤销以前的伦敦区部，设立两个各自独立的区部，两者都只跟共同的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

1850年9月15日由马克思
和恩格斯参预拟定
载于1851年6月1日“德勒
斯顿新闻通报”第180号
引自1850年12月1日
“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中央
委员会公告”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1850年9月15日的 中央委员会会议³³²

出席会议的有马克思、恩格斯、施拉姆、普芬德、鲍威尔、埃卡留斯、法佩尔、维利希、列曼。

弗伦克尔因事缺席。

由于本次会议是非常会议，上次会议的记录不在手头；因此记录无法宣读。

马克思：这次会议星期五未能召开，因为跟协会³²³委员会会议时间有冲突。既然维利希召集了区域会议，——我不想提出这个会议是否合法的问题——这次会议必须今天举行。

我提出下列3点意见：

1. 中央委员会从伦敦迁到科伦；它的职权在今天的会议结束之后立即移交给该地的区域委员会。这项决议应通知在巴黎、比利时和瑞士的盟员。在德国，由新的中央委员会自己去通知。

理由：我曾经反对沙佩尔提出的关于在科伦建立全德区域委员会的建议，因为我不想破坏中央权力的统一。现在，既然出现了一系列新的情况，所以在我们的建议中这一点就不提了。无论在上次会议进行谴责投票的时候和现在在区部召开全会的问题上以及

星期一（在这里和后面，在注线下面引有1850年9月15日的会议记录的两个不同手稿副本之间的重要出入。——编者注）

在协会和流亡者委员会³²⁴里，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都公开起来反对多数派。因此，在这里中央委员会无法继续存在下去。如果中央委员会的统一不能继续保持，它必然会陷于分裂并形成两个同盟。但是，因为党的利益高于一切，我才提出这个出路。

2. 现行的同盟章程应当废除，责成新的中央委员会草拟新盟章。

理由：1847年代表大会通过的盟章，曾于1848年由伦敦中央委员会做了修改。现在情况又有所变化。在最后的伦敦盟章中，原则性的条款软弱无力。在一些地方两个盟章都发生效力，在另一些地方则一个盟章也没有，或者采用完全是擅自制定的盟章。可见，在盟内完全是一片混乱。况且，最后的盟章已经公开，因而不能继续再使用。所以，我的建议实际上就是要以真正的盟章³²⁵来改变没有盟章的局面。

3. 在伦敦组织两个区部，这两个区部彼此丝毫不发生任何关系，其唯一的联系就是双方都属于同盟，都与同一个中央委员会通信。

理由：正是为了同盟的统一，才需要在这里建立两个区部。除了私人的矛盾之外，甚至在协会里也出现了原则性的矛盾。恰恰在最近一次关于“德国无产阶级在未来革命中的立场”问题的辩论当中，中央委员会的少数派发表了一些跟上次的通知信，甚至跟宣言³²⁶直接相抵触的观点。他们用阿谀德国手工业者民族情感的德意志民族观点代替宣言的全面的观点。他们提出唯心主义观点代替宣言的唯物主义观点。他们不是把现实关系、而是把意志描绘

成革命中的主要东西。我们对工人们说：为了改变现存条件和使自己有进行统治的能力，你们或许不得不再经历15年、20年、50年的内战，而他们却相反地对工人们说：我们必须马上夺取政权，要不然我们就躺下睡大觉。正象民主党人使用的“人民”这个词是一句空话一样，他们现在使用的“无产阶级”这个词也是一句空话。为了实现这句话，他们不得不把一切小资产者说成是无产者，这就是说，他们 de facto〔实际上〕是代表小资产者，而不是无产者。他们不得不用革命的词句代替实际的革命发展。这次辩论最后说明，私人决裂的内幕是一些什么样的原则性分歧，而现在已经到了采取措施的时候了。正是这些对立的见解成了两派各自的战斗口号；某些盟员把宣言的维护者称为反动分子，企图以这种办法使他们威信扫地，但是，这对他们来说是完全无所谓的，因为他们并不追求威信。由于这一切，多数派有机解散伦敦区部并把少数派作为不同意同盟原则的人开除出去。我不想提这样的意见，因为这样可能引起无益的争吵，因为这些人就其信仰来说还是共产主义者，虽然他们目前所发表的观点是反共产主义的，至多只能说这些是社会民主主义的。但是不言而喻，留在一起则纯粹是白白浪费时间。沙佩尔常常说要分裂——那就分裂吧，我对待分裂是严肃的。我以为，我找到了我们既可以分道扬镳而又不致引起党的分裂的途径。

我在这里声明一下，依我看来愿意加入我们的区部的最多有12个人，也可能少一些，我情愿把所有其余的人交给少数

这种观点
最后明显地
中央委员会少数派

派。如果这个建议将被通过，我们当然也就不能留在协会里了；我和多数派将退出大磨坊街的协会。归根结蒂，问题不在于两派之间存在敌对关系，相反的，而是在于要停止纷争，为此要中断一切关系。我们一起留在同盟和党内，但是我们要停止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关系。

沙佩尔：正象在法国无产阶级跟山岳党³²⁷和“新闻报”决裂一样，在这里一些代表党的原则的人跟组织无产阶级的人正在决裂。我赞成迁中央委员会和修改盟章。科伦人了解德国的情况。我还认为，在新的革命中将会出现一批比所有在1848年享有声誉的人行为更好的人。至于原则性的分歧，埃卡留斯提出了一个引起今天的辩论的问题。我说出了在这里遭到抨击的见解，因为我对这个问题总是很热情的。问题在于，是我们自己要动手砍掉别人脑袋，还是让人家来砍掉我们的脑袋。在法国快要轮到工人的头上了，从而在德国也快要轮到我们的头上了。如果不是这样，我当然就会寻求安静去了，那时我的物质状况就会不同了。如果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我们会采取一些保证无产阶级获得统治的措施。我是这种见解的狂热的拥护者。而中央委员会却喜欢相反的东西。但是，如果你们不想再跟我们打交道，好吧——我们就分道扬镳。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中我一定会被送上断头台，但是我要回德国。如果你们想要组织两个区部——那就组织好了，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同盟就会垮台，以后我们再在德国相逢，也许那时我们又走一条道路。我是马克思个人的朋友，如果你们想要分裂，好吧——那我们走我们

的，而我们走我们的。但是在这种情况下必然得组织两个同盟。一个是为那些靠笔杆活动的人而组织的，另一个则是为了那些用其他方式活动的人而组织的。我不赞成那种认为资产阶级将会在德国党握政权和我在这一方面是个盲目的狂热者的说法；我不是这样的人，我根本没有做过这种事情。但是，在伦敦这里有两个区部，两个协会，两个流亡者委员会，那还不如组织两个同盟，完全决裂。

马克思：沙佩尔误解了我的意见。只要我的意见被通过，我们就各走各的路，两个区部彼此互不相干，同时双方的人也停止相互之间的一切关系。但是，它们是在同一个同盟之内，受同一个委员会的领导。甚至你们可以给自己留下绝大多数的盟员。至于说个人的牺牲，我为阶级，而不是为个人作的牺牲不比其他任何人少。说到热情，为了加入你认为眼看就会取得政权的党，这种热情需要的并不多。我一向反对无产阶级的反复无常的意见。我们献身的党，幸运的恰恰是还不能取得政权。无产阶级即使取得政权，它推行的不会直接是无产阶级的措施，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措施。我们的党只有在条件允许实现它的观点的时候，才能取得政权。路易·勃朗便是一个说明取得政权为时过早会得到什么结果的很好例证³²⁸。况且，在法国无产阶级将不是单独地，而是跟农民和小资产者一起取得政权，因此必须推行的不是自己的，而是它们的措施。巴黎公社³²⁹证明，为了做出一些事情，并不需要参加政府。可是，当时一致同意告同盟书的少数派其他成员，譬如公民维利希，为什么不发言呢？我们不能也不想拆散同盟，我们只是想把伦敦区部分

你们走你们的
中央委员会

为两个区部。

埃卡留斯：是我提出了问题，我确实想对这个问题展开讨论。至于沙佩尔的意见，我在协会里已经解释过，为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幻想，为什么我不相信我们的党在即将来临的革命之后能立即取得政权。那时，我们的党更需要的是在俱乐部里活动，而不是在政府里。

公民列曼一言不发就退出会场。公民维利希也采取同样的作法。

第一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弃权。

第二点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第三点也全体通过。沙佩尔又弃权。

沙佩尔声明对我们大家提出抗议。“现在我们完全分开了。在科伦我有熟人和朋友，他们宁肯跟着我走，而不会跟你们走。”

马克思：我们是按照盟章办事的，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具有法律效力。

在宣读记录之后，马克思和沙佩尔声明，他们在科伦没有就这件事写过文章。

有人问沙佩尔，他对记录是否有反对意见。他说没有什么反对意见，因为他认为任何反对意见都是多余的。

埃卡留斯提议大家在记录上签名。这个意见被通过。沙佩尔声明他不签名。

1850年9月15日写于伦敦。

经过宣读，表决和签名。

在第二个记录副本上没有这个句子。——编者注

在第二个副本上没有这几个字。——编者注

签名的有：中央委员会主席卡·马克思
书记弗·恩格斯，亨利希·鲍威尔，
康·施拉姆，约·格·埃卡留斯，
卡·普芬德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56年的
“社会历史国际评论”第1卷
第2部分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手稿的翻版照片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8月1日至9月10日的报告

收 入

		镑	先令	辨士
8月	现金	46	5	6
	贝尔格小姐募集	12	—	—
	汉堡圣格奥尔格工人联合会交来.....	2	10	—
	同上.....	1	10	—
	从纽施塔特（哈尔特）寄来.....	8	—	—
	卡·弗洛利先生交“德意志伦敦报”编辑 部转来	—	8	—
9月	巴黎德意志工人协会交来.....	2	—	—
	约翰·贝尔格先生募集.....	17	10	—
	总计	90	3	6

支 出

8月	流亡者膳宿支出	28	9	3
	制刷作坊修建费.....	7	10	—
	购皮革等	—	13	6
	56次补助金 每次6辨士	1	8	—
	23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	1	3	—
	6次补助金 每次2先令6辨士.....	—	15	—
	各种补助金	—	5	6
	4次补助金 每次10先令	2	—	—
	流亡者贷款.....	8	4	—
	给4个流亡者迁居美国的路费	5	—	—
	迁居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路费.....	7	3	—
	零星开支、邮费、取款费等	—	11	3

9月	膳宿支出	14	4	8
	39次补助金 每次6辨士	—	19	6
	2次补助金 每次1先令	—	2	—
	1次补助金 10先令 	—	15	—
	1次补助金 5先令	—	—	—
	按交款人贝尔格先生的指示分配	8	15	—
	流亡者贷款	1	18	—
	零星开支	—	6	10
	总计	90	3	6

因为存在到目前为止的社会民主主义委员会的所有下面署名的4个委员，在提出本报告的时候，声明自己退出这个委员会，所以大磨坊街的协会指定了一个委员会来检查账簿和单据；委员会已于上月15日提出报告，认为一切账目完全清楚。

下面署名的人认为，有必要把所有与他们在委员会的工作有关的账簿和单据留在一直担任委员会会计的卡·普芬德(索荷广场英王街21号)那里，因为他们不仅退出了委员会，而且也不担任协会的委员了，这些文件可能在大家有什么疑点的时候是必要的。

因此，请交款人指定在伦敦的代表来检查存放在上述会计那里的账簿和单据。

卡尔·马克思，亨·鲍威尔，

卡·普芬德，弗·恩格斯

1850年9月18日于伦敦

载于1850年9月27日

“德意志伦敦报”第287号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德意志伦敦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致 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建议书

从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开除一切宗得崩德³³⁰的盟员，首先是开除下面7个人——沙佩尔、维利希、谢特奈尔、列曼、迪茨（奥斯渥特）、格贝尔特和弗伦克尔，并且把这项决定通报同盟的所有的区部和支部，同时通知伦敦的宗得崩德和它的领导人。

1. 宗得崩德的成员向同盟之外的秘密协会的领导人、各民族的流亡者报道了，而且是歪曲地报道了伦敦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分裂情况。

2. 他们公然违抗合法的科伦中央委员会，违反它的决议；他们派出特使到德国各地建立宗得崩德。

3. 他们过去和现在一直在破坏同盟伦敦区部机关交给秘密协会会员的一切义务。

4. 他们从同盟分裂时起就在破坏秘密协会的一切规章，所以他们继续留在同盟的队伍里，只会助长他们瓦解同盟的活动。

1850年11月11日由马克思和
恩格斯参预拟定
载于1851年6月1日
“德勒斯顿新闻通报”第180号
引自1850年12月1日
“科伦中央委员会公告”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科伦中央
委员会公告”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

(卡·马克思加了字句的全文)³³¹

1 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目的是以宣传和政治斗争的一切手段达到破坏旧社会——推翻资产阶级，在精神上、政治上和经济上解放无产阶级和实现共产主义革命。在无产阶级的斗争必须经过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同盟始终是整个运动的利益的代表者，同样，它始终力求把无产阶级的一切革命力量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并把它们组织起来；它是一个秘密的组织，这个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未达到最终目的前不得解散。

2 必须具备下列条件的人才能成为同盟的盟员：

(1) 不信仰一切宗教，平日不参加任何宗教团体和一切仪式（民法规定必须遵守的仪式除外）；

(2) 了解无产阶级革命的条件、发展道路和最终目的；

(3) 拒绝参加任何组织，拒绝支持任何敌视同盟的宗旨或可能阻挠实现这一宗旨的个别要求；

(4) 具有宣传的能力和热情、坚定不移的信念、革命的毅力；

(5) 严格遵守同盟一切活动的秘密。

3 接收盟员的决定必须支部一致通过。接收盟员的工作通常

黑体加着重点的话是马克思加的。——编者注

应由支部会议的主席主持。被接收入盟的人必须严肃地保证无条件地服从同盟的决议。

4. 不遵守盟员条件的人应当开除盟籍。开除盟员的决定须经支部多数通过。中央领导机关可以在区部总支部呈请之下开除整个支部。开除盟员必须通报全盟；同盟必须对开除的盟员以及一切可疑分子进行监督。

5. 同盟的组织系统如下：支部 区部 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

6. 支部至少须有居住同一地区的3个人组成。每个支部选举一名主席主持会议，一名副主席管理出纳。

7. 一国或一省的支部隶属于总支部、即中央委员会任命的区部。支部只直接跟区部发生关系，区部只直接跟中央委员会发生关系。

8. 支部应定期召开会议，至少两个星期一次；它至少一个月向区部书面报告一次，各区的总支部至少两个月向中央委员会书面报告一次；中央委员会每3个月作一次有关同盟情况的报告。

9. 支部和区部的主席和副主席每年改选一次，选举人可以随时罢免他们；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只有代表大会才能罢免。

10. 每个盟员必须每月交纳盟费，盟费的最低额由代表大会规定。盟员所交的盟费，一半交区部，一半上缴中央委员会；盟费用来支付组织工作方面的费用，散发宣传品和派遣特使。区部负担与支部通信的费用。盟费每3个月向区部上缴一次，而区部把总额的一半上缴中央委员会，同时向自己的支部报告盟费的收支情况。中央委员会向代表大会报告盟费的收支情况。特别费用由特别收入开支。

11. 中央委员会是全盟的执行机关。它的成员不少于3人。中央

委员会由代表大会指定为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区部选举和补选；中央委员会只向代表大会报告工作。

12 代表大会是全盟的立法机关。代表大会由区域会议的代表组成。区域会议的每5个支部选一名代表参加代表大会。

13. 区域会议是区的代表机关。它每3个月在区的中心召开一次会议，在总支部委员会的领导下讨论区组织的事务。每个支部各派一名代表参加。区域会议必须在每年7月中旬召开一次会议，选举参加同盟代表大会的代表。

第五条 支部

第九条 接收盟员

第六条 区部

第十条 开除盟员

第七条 中央委员会

(财务)

第八条 代表大会

14. 区域选举会议闭幕两个星期以后，代表大会一般地在中央委员会的所在地召开，如果中央委员会没有另外指定地点的话。

15. 代表大会听取中央委员会关于它的全部活动和同盟情况的报告；中央委员会出席代表大会会议，但没有表决权。代表大会阐明同盟必须遵循的政策的原则，决定修改盟章的问题并指定中央委员会下一年度的所在地。

16 中央委员会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召开非常代表大会。在这种情况下，非常代表大会应当由各区所选的最近一届代表大会的代表组成。

17. 同一支部内的个别盟员之间的争执由支部最后解决；同一区部内的个别盟员之间的争执由各区的总支部最后解决；不同

区部的个别盟员之间的争执由中央委员会最后解决；对中央委员的个人性质的控诉应转交代表大会。同一区部内的支部之间的争执由区的总支部解决；支部和它的区部之间的争执或区部之间的争执由中央委员会解决；同时，在第一种情况下，可以诉诸区域代表会议解决；在第二种情况下，可以诉诸代表大会解决。代表大会还应当解决中央委员会和同盟下级委员会之间的一切意见冲突。

起草于1850年12月1日

俄译文第一次发表于1948年的
“历史问题”第11期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弗·恩格斯
所抄的手稿

奥·布朗基献词³³²的 德文译文的前言 (附献词全文)

几个可耻的瞒哄人民的骗子，所谓的欧洲社会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其实是欧洲中央的一伙败类的委员会，在维利希先生和沙佩尔先生等人的领导下在伦敦纪念了二月革命一周年。伤感的善于辞令的社会主义的代表路易·勃朗为了阴谋反对另一个人民的叛徒赖德律—洛兰，加入了这个二流野心家的集团。他们在自己的宴会上宣读了似乎是寄给他们的各地的献词。虽然他们尽了一切努力，但是他们从德国没有乞求到任何一篇献词。这是德国无产阶级发展的一个良好的征兆！

同时，他们还写信给革命共产主义的高尚的蒙难者布朗基，也提出了请求。他寄来了如下的献词：

人民要警惕

什么样的暗礁在威胁着未来的革命 就是昨日的革命碰上的那块暗礁：穿上护民官外衣的资产者的令人痛心的威信。

赖德律-洛兰、路易·勃朗、克莱米约、马利、拉马丁、加尔涅-帕热斯、杜邦·德·累尔、弗洛孔、阿尔伯、阿拉戈、马拉斯特！

这是个令人忧郁的名单 这是些在民主欧洲的一切马路上用鲜血的字母

写成的不祥的名字。

临时政府扼杀了革命。它得对一切的不幸和千千万万牺牲者的鲜血负责。

反动派扼杀民主，不过是作了它本行的事情。被轻信的人民当作自己领导者的、把人民出卖给反动派的叛徒，犯了滔天罪行。

可鄙的政府，它不顾人民的呼声和请求而规定45生丁的税金，因而激怒了充满绝望情绪的农民。

它保留君主的总部、君主的法庭、君主的法律。叛变！

它在4月16日迫害巴黎的工人；它把里摩日的工人关进监牢；它在27日枪杀卢昂的工人；它释放所有屠杀工人的刽子手，它欺骗和陷害一切忠心耿耿的共和主义者。叛变 叛变！

使1848年革命遭受一切毁灭性灾难的是它，完全是它的惊人罪过。

啊，罪大恶极的人是常见的，但是在他们当中最坏的就是那些在被他们的花言巧语所蒙蔽的人民看来是自己的剑和盾的人，就是那些被人民热情地宣告为自己未来的主宰的人。

如果在未来的人民凯旋之日，由于群众的健忘和宽容而哪怕使一个这种辜负群众的信赖的人上台执政，对我们也是个不幸。如果那样，革命就会第二次垮台！

愿工人们永远记住这些可恶的人的名单；如果即使有一个名字，是的，即使有一个名字将来列入革命政府，那就让全体工人一起高喊：“叛变！”

如果演说、誓言和政纲又仅仅是扯谎和欺骗，如果那些骗子手又回来搞那些鬼把戏，那便是更加疯狂的反动派的一连串行动的第一环。如果他们有一天敢于重新露头，那就应该对他们咒骂和报复。如果糊涂的人群再一次地落入他们的圈套，那末人们将会为这些人感到羞愧和可怜。

除了把二月革命的阴谋家永远赶出市政厅之外，还必须防止新的叛徒。

凡是靠着无产阶级上了台而不立即采取下列措施的政府都会是叛变的政府：

- (1) 完全解除资产阶级近卫军的武装。
- (2) 武装一切工人，成立他们的军事组织。

当然，此外还需要采取许多其他措施，但是采取了这种作为人民安全的预先保障和唯一保证的第一个行动，许多其他措施也就会自然由此而产生。

一件武器也不应留在资产阶级手里，否则就没有活路。

目前正在相互争取群众同情的各种学派的拥护者们，将来是能够实现他们的进行改革和为民造福的诺言的，但是，得有个先决条件，即他们不是舍本逐末。

如果人民由于极端迷恋理论而不关心唯一实际的可靠的因素——力量，那末他们得到的只能是悲惨的失败！

武器和组织——这就是进步的主要工具，是消除贫困的有决定意义的手段。

谁有剑，谁就有面包！有了武器就会使人叩头，手无寸铁的人群就会被驱散。法国竖着工人的刺刀——这就是社会主义的降临。

对武装起来的无产者来说，没有什么办不到的事情，一切障碍，任何反抗都会一扫而光。

但是，陶醉于马路上的无聊散步、种植自由树和律师的响亮空谈的无产者开始是得到圣水，然后是侮辱，最后是霰弹和永远的贫困。

让人民来选择吧！

1851年2月10日于

贝尔- 伊尔- 安- 麦尔监狱

1851年春以单行本在
伯尔尼出版

原文是德文

俄文译自单行本

“前言”的俄译文第一次发表

注 释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
生平事业年表

索 引

注 释

注 释

- 1 自从“新莱茵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科伦合办的,自1848年6月1日出版到1849年5月19日)这份革命无产阶级的登峰造极的机关报(弗·伊·列宁语)停刊以来,马克思从来没有放弃过以某种形式重新出版自己机关刊物的想法。马克思把自己的意图写信到瑞士告诉了恩格斯,邀他到伦敦来一同着手创刊工作。马克思采取了一些办法来筹集资金、寻找出版商等,结果获得了成功,在1849年12月中旬康拉特·施拉姆以出版者的身分同汉堡舒贝特书局签订了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 Politisch- ökonomische Revue》)的合同。杂志的任务,是根据对前一时期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总结1848至1849年的革命,说明新的历史形势的特点,进一步研究革命的无产阶级政党的策略。杂志的大部分材料(论文、短评、书评)都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的,同时他们也约请他们的拥护者如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格·埃卡留斯等为杂志写稿。此外,在第一期上刊载了卡·布林德的短评“巴登的奥地利普鲁士党”。在第四期上刊载了法国民主主义者路易·曼拿尔的诗。

封面上注明的出版地点,除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在地伦敦以及杂志印刷地汉堡以外,还有纽约,因为1848—1849年德国革命的参加者有许多人流亡在美国,马克思和恩格斯希望在那里找到发行杂志的基地。他们估计有可能出现新的革命高潮,所以打算在不久以后改为周刊,然后再改为日报(见本卷第600—601页)。但是这一计划没有实现。杂志总共出了6期,最后一期合刊(五、六期合刊)出版于1850年11月底。由于德国警察的迫害和资金的缺乏,以后一切继续出版的意图都失败了。

马克思在1849年12月19日把“启事”原文寄给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约·魏德迈，请他登在“新德意志报”（《Neue Deutsche Zeitung》）上，于是“启事”登在1850年1月16、26日及2月5日的第14、23、31号上。“启事”还登在下列各报上，海尔曼·贝克尔在科伦出版的“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1850年1月8日第6号；“伯尔尼报”（《Berner Zeitung》）1849年12月27日第361号；“杜塞尔多夫日报”（《Düsseldorfer Zeitung》）1850年1月10日第9号以及“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1850年1月10日第8号。——第3页。

- 2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是英国的周报，宪章派的中央机关报，每周出版一次。创办于1837年，出版到1852年为止，出版地最初是里子，1844年11月起迁往伦敦。该报的创办人和编辑为菲·奥康瑞尔，乔·哈尼也是编辑之一。自1843至1850年，该报发表过一些恩格斯的论文和短评。——第7页。
- 3 “泰晤士报”（《The Times》）是英国最大的一家保守派报纸，1785年创办于伦敦。——第7页。
- 4 这里指的是小资产阶级政论家卡·海因岑发表在“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1844年11月9日和16日第241和242号上的政论文章“革命的教训”。这篇政论文用蛊惑煽动性的激进的词句来打击伦敦的一切德国革命流亡者。1849年11月23日有一个署名“反社会主义者”的人在“泰晤士报”上发表了一封信，援引卡·海因岑的话，呼吁英国内务大臣“在24小时中把宣传这些恶毒学说的人赶出英国”。

“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是伦敦德国流亡者办的周报，自1845年4月出版到1851年2月，该报在物质方面受失去权位的公爵卡尔·不伦瑞克的支持。主编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路易·班贝尔格尔。自1849年至1850年该报主要刊登卡·海因岑、古·司徒卢威及其他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论文；此外，也转载了“共产党宣言”（1848年3月）、卡·马克思写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的第一章

(1850年4月) 卡·马克思及弗·恩格斯合著的“国际述评(三)”的一部分(1851年2月)以及许多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署名的声明。——第7页。

- 5 卡·马克思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是一篇连载文章,总题目叫“从1848到1849年”,是专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的。这本著作对法国的整个一段历史时期作了唯物主义的阐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战略上的一些极其重要的原则。这本著作最初计划包括4篇文章:“1848年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6月13日在大陆上产生的后果”和“英国的现状”。但是在杂志的第1、2、3期上只发表了三篇:“1848年六月失败”,“1849年6月13日”和“1849年6月13日的后果”。1849年六月事件对大陆的影响以及英国的状况在杂志的其他文章中,尤其是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的国际述评中都得到了阐述。1895年“法兰西阶级斗争”以单行本的形式在柏林出版,书中并载有恩格斯写的导言。在这一版中,恩格斯增添了第四章,这一章就是:“国际述评(三)”(见本卷第511—514页和520—531页)中有关法国事件的部分。恩格斯给这一章标的题目是:“1850年普选权的废除”;1895年2月13日他给理·费舍的信上说:这第四章“才真正使得这本著作完整了,没有它,这本小册子就带有片段的性质”。

当时前3章的标题也有所改:1.“从1848年2月到1848年6月”,2.“从1848年6月到1849年6月13日”,3.“从1849年6月13日到1850年3月10日”。在本版中前3章的标题均依照杂志的原样不变,第四章则用1895年版的标题。——第9页。

- 6 1832年6月5日—6日的巴黎起义,是由共和党左翼和包括人民之友社在内的秘密革命团体组织的。反对路易—菲力浦政府的拉马克将军的出殡是起义的导火线。参加起义的工人构筑了许多街垒,异常英勇顽强地进行了自卫战。

1834年4月里昂的工人起义,是在共和党的秘密组织人权公民权协会的带领下进行的,它是法国无产阶级最早的群众性的发动之一。这次起义得到其他城市的,特别是巴黎的共和党人的支持,但终于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 1839年5月12日的巴黎起义是在奥·布朗基和阿·巴尔贝斯的领导下、由秘密的共和主义社会主义的四季社所发动的,在这次起义中,革命工人也起了主要作用。这次起义被军队和国民自卫军镇压下去了。——第12页。
- 7 罗伯尔·马凯尔是个典型的狡猾投机的骗子手。这个典型人物是法国名演员弗雷德里克·勒美特尔塑造的,由于奥诺莱·多米耶给他作了一组漫画而长久流传下来。罗伯尔·马凯尔的形象是对七月王朝时期金融贵族统治的讽刺。——第14页。
- 8 宗得崩德是瑞士经济落后的7个天主教州在1843年组织的单独同盟,其目的是要反抗在瑞士实行进步的资产阶级改革,维护教会和耶稣会教徒的特权。这个同盟的反动企图遭到了40年代中叶在大部分的州和瑞士议会里占了优势的资产阶级激进派和自由派的反对。1847年7月,议会决定解散宗得崩德,因此宗得崩德在11月对其他各州采取了军事行动。1847年11月23日宗得崩德的军队被联邦政府的军队击溃。在宗得崩德进行战争期间,以前加入神圣同盟的反动的西欧强国奥地利和普鲁士企图干涉瑞士,维护宗得崩德。基佐保护了宗得崩德,这实际上就是采取了支持这些西欧强国的立场。——第15页。
- 9 1847年春在比桑歌(安德尔省)在附近农村中居住的饥寒交迫的工人的带领之下,发生了袭击投机商的粮仓的事件;居民和军队发生了流血冲突。政府对比桑歌事件采取了残酷的镇压措施:1847年4月16日把4个直接参加这次事件的人判处死刑,其他的很多人被罚做苦役。——第16页。
- 10 “国民报”(《Le National》)是1830—1851年在巴黎出版的法国日报,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党人的机关报。这一派在临时政府中的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有马拉斯特、巴斯蒂德和加尔涅—帕热斯。——第17页。
- 11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是从1631年起在巴黎出版的日报,19世纪40年代是拥护波旁王朝复辟的正统主义者的机关报。——第19页。

- 12 在临时政府成立的最初几天就存在选择法兰西共和国国旗的问题。巴黎的革命工人要求宣布1832年六月起义时在巴黎工人区高举的红旗为国旗。资产阶级的代表则坚持要采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和拿破仑一世帝国时候所用的蓝白红三色的法国旗帜。这种旗帜直到1848年革命时仍然是聚集在“国民报”周围的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标志。工人代表最后被迫同意宣布三色旗为法兰西共和国的国旗。但是在旗杆上系上了一个红色的旗缘。——第22页。
- 13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是法国的日报，政府的官方机关报，它从1789年至1869年用这个名称在巴黎出版。“通报”各期必定刊载政府的法令、议会的公告以及其他官方的文件；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会议的报告曾刊载在该报上。——第22页。
- 14 Jacques le bonhomme 或 Jacques Bonhomme（意即笨伯雅克），是法国贵族给农民取的轻蔑的绰号。——第26页。
- 15 指1825年法国国王拨给贵族的一笔款项，这笔款项是用来补偿贵族在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期中被没收的财产的。——第27页。
- 16 拉查罗尼是意大利游手好闲的流氓无产阶级的鄙称。这些人不止一次地被反动的君主专制集团利用来反对自由主义和民主主义的运动。——第28页。
- 17 根据1834年通过的“济贫法”，只允许用一种办法来救济贫民，即把他们安置在习艺所里；这里工人们从事的工作生产率低、单调而且累人；当时人民都称习艺所为“穷人的巴士底狱”。——第29页。
- 18 指3月18日国民自卫军总部的选举和4月9日制宪国民议会的选举。团结在布朗基和德萨米等人周围的巴黎工人坚持要延期选举，理由是必须在居民中进行适当的解释工作。——第30页。
- 19 1848年5月15日人民群众的革命发动是在进一步推进革命和支持意大利、德国、波兰的革命运动的口号下进行的；在这次发动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以布朗基等为首的巴黎工人。涌入制宪议会会场的示威者要求议会实现诺言，给工人以面包和工作，成立劳动内阁；他们企图驱

散制宪议会,成立新的临时政府。5月15日的人民发动结果被镇压下去了,它的领导人布朗基、巴尔贝斯、阿尔伯、拉斯拜尔等都被逮捕。——第34页。

- 20 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153—156页。——第36页。
- 21 “改革报”(《La R éforme》)是法国的日报,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党人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的机关报;1843年至1850年在巴黎出版。1847年10月至1848年1月恩格斯在该报上发表了许多文章。——第39页。
- 22 指1848年8月28日“辩论日报”的社论。
“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 ébats》)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政治和文学辩论报”(《Journal des D 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 éraires》)的简称,1789年创刊于巴黎。七月王朝时期为政府的报纸,奥尔良派资产阶级的机关报。1848年革命期间,该报反映了所谓秩序党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第41页。
- 23 据圣经上的传说,犹太国的第一个国王扫罗在和腓尼基人作战中消灭了数千敌人,在扫罗庇护下的卫士大卫则消灭了数万人。扫罗死后大卫承继了犹太的王位。——第49页。
- 24 百合花是波旁王朝的徽号,紫罗兰是波拿巴党人的标志。——第50页。
- 25 马克思引用的是刊载在1848年12月21日“新莱茵报”第174号上的12月18日巴黎通讯,通讯下面标有斐迪南·沃尔弗的通讯代号。这里的这句话很可能是马克思本人写的,因为报纸的全部材料都经他缜密地校审过。——第51页。
- 26 迈达斯的耳朵,按古代神话,是阿波罗赏给弗利基亚国王迈达斯的一对驴耳。——第53页。
- 27 海地共和国总统苏路克1849年8月26日自封为皇帝,他是个著名的残忍凶狠、爱好虚荣的人。反对波拿巴的报刊称路易·波拿巴总统

为苏路克。

杜山—路维杜尔是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在海地岛上黑人反对西班牙人和英国人的统治的革命运动的领袖。——第53页。

- 28 指英国将军乔·蒙克 ;1660年他曾利用他手下的政府军队来恢复斯图亚特王朝。——第61页。
- 29 1849年3月7日—4月3日在布尔热对1848年5月15日事件(见注19)的参加者进行了审判 ;布朗基被处以10年的单独监禁 ,德弗洛特、索布里埃、拉斯拜尔、阿尔伯等人 ,有的被判处期限不等的徒刑 ,有的被流放到殖民地。——第70页。
- 30 布莱阿将军曾指挥一部分军队镇压巴黎无产者六月起义 ,于1848年6月25日在枫丹白露哨兵站为起义者打死 ,因此起义的参加者有两人被处死刑。——第70页。
- 31 在第一版以及以后各版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一书中都误为5月29日。实际上立法议会开幕于1849年5月28日。——第72页。
- 32 第V条是指宪法的序言部分 ;宪法本文中的条款是用阿拉伯数字表示次序的。——第75页。
- 33 山岳党活动家会议是在1849年6月12日夜在傅立叶派的“和平民主日报”(《La Démocratie Pacifique》)编辑部举行的(该报于1843—1851年在巴黎出版 ,由维·孔西得朗主编)。会议的参加者拒绝使用武力 ,决定只举行和平示威游行。——第78页。
- 34 1849年6月13日“宪法之友社民主联合会”在发表于206号“人民报”(《Le Peuple》)上的宣言中 ,号召巴黎公民参加和平示威游行 ,抗议政府的“蛮横要求”。——第78页。
- 35 山岳党的宣言载于1849年6月13日的“改革报”、“和平民主日报”以及蒲鲁东的“人民报”上。——第79页。

- 36 马克思指的是由3个红衣主教组成的委员会 ;该委员会依靠法国军队的支持 ,在推翻了罗马共和国之后 ,在罗马恢复了反动的制度。红衣主教穿的是红色衣服。—— 第83页。
- 37 “世纪报”(《Le Siècle》)是1836—1839年在巴黎出版的日报 ;19世纪40年代 ,它反映了单纯要求温和的宪政改革的那部分小资产阶级的观点。—— 第84页。
- 38 “新闻报”(《La Presse》)是1836年在巴黎创刊的资产阶级日报 ;1848—1849年是资产阶级共和派的机关报 ;后来变成波拿巴派的报纸。—— 第84页。
- 39 指尚博尔伯爵(自封亨利第五) ,他是法国波旁王朝长辈系统中的王位僭望者。尚博尔在德国西部的经常驻地除维斯巴登外就是爱姆斯。—— 第85页。
- 40 1848年二月革命后逃出法国的路易—菲利浦住在伦敦近郊的克勒蒙特。—— 第85页。
- 41 “出乎真意”(《in toto proprio》)是一种不经红衣主教同意、一般地只谈教皇区内部事务的特别教皇文书的开头语。这里是指1849年9月12日教皇庇护九世发表的文告。—— 第86页。
- 42 引自德国诗人格·海尔维格的“来自山上”(《Aus den Bergen》)。见格·海尔维格的“人之歌”(《Gedichte eines Lebendigen》)。—— 第86页。
- 43 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取得胜利 ,而不能单独在一国取得胜利这个结论 ,在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1847年)一书中成了一个最后确定的公式 ,这个公式在垄断资本主义以前的时期是完全正确的。在新的历史条件下 ,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弗·伊·列宁根据他发现的资本主义在帝国主义时代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规律 ,得出了一个新的结论 :社会主义革命能够首先在几个甚至一个国家内取得胜利 ,而不可能同时在所有的国家或大多数的国家中取得胜利。这个新的结论是列宁在“论欧洲联邦口号”

- (1915年)一文中首次提出来的。——第92页。
- 44 总数不符 :应该是5亿7817万8000 ,而不是5亿3800万 ;显然数字印错了。但是这对总的结论并无影响 ;不管按哪个数字平均每人的纯收入都不到25法郎。——第98页。
- 45 加尔省由于议员博恩的死亡 ,曾举行补选。拥护山岳党的候选人法汪在36000票中得了2万票 ,以多数票当选。——第99页。
- 46 1850年3月10日立法议会举行补选 ,政府为了对选民施加压力 ,把法国领土分成了5大军区 ,结果巴黎及其邻近的几省就处在其他4个区的包围之中 ,而这4个区的领导人都是一些恶名昭彰的反动分子。共和派的报纸为了强调这些反动将军的无限权力和土耳其帕沙的专横权力是一模一样的 ,所以称这几个区为帕沙辖区。——第100页。
- 47 指1849年10月31日路易·波拿巴总统致立法议会的信件 ,他在这个信件中通知说 ,已批准巴罗内阁辞职 ,另组新阁。——第100页。
- 48 新任命的巴黎警察局长卡尔利埃在1849年11月10日的信件中号召组织“反社会主义的社会联盟” ,以保卫“宗教、劳动、家庭财产和善良”。这个信件公布在1849年11月11日的“通报”上。——第100页。
- 49 “拿破仑”(《Le Napoléon》)是波拿巴派的日报 ,路易·波拿巴的机关报 ;1850年1月6日至5月19日在巴黎出版。——第101页。
- 50 自由之树是1848年二月革命胜利后在巴黎街道上种植的。种植自由之树(通常是橡树或白杨)在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期间就已经成了法国的传统 ,并且当时国民公会也对此作了明文规定。——第105页。
- 51 七月纪念柱 是1840年为纪念1789年7月14日攻破巴士底狱而在巴黎建立的 ;自1848年二月革命后 ,柱上又装饰了纪念花圈。——第105页。
- 52 F .Vidal .《De la répartition des richesses》.Paris ,1846 .——第106页。

- 53 科布伦茨 是西德的一个城市，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反革命流亡者的中心。——第109页。
- 54 蒲鲁东的这个观点是在他批驳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弗·巴师夏的一篇论战文章中谈到的，这篇文章发表在1849年11月—1850年2月的“人民之声”（《Voix du Peuple》）报上，并于1850年又以单行本形式在巴黎出版，标题是“无息贷款。弗·巴师夏先生和蒲鲁东先生的辩论”（《Gratuité du crédit. Discussion entre m. Fr. Bastiat et m. Proudhon》）。——第113页。
- 55 1797年英国政府颁布了一道专门的银行限制令，规定钞票的强制比价，废除钞票兑换黄金的办法。到1819年才恢复了钞票兑换黄金的制度。——第113页。
- 56 指巴黎商人亚力山大·勒克莱尔，他由于作为国民自卫军和他的儿子们一起参加镇压1848年六月起义的暴行，而获得了荣誉勋章。——第115页。
- 57 指1850年5月1日内政部长为起草新选举法所任命的委员会，委员会由17个奥尔良党人和正统主义者（立法会议员）组成。把这些人称为城主，是说这些保皇党人妄想攫取政权，他们的意图是反动的。城主这个称呼，是从维·雨果的一部以城主为名的历史剧中引用来的。——第115页。
- 58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是法国正统君主派的日报，1848—1857年在巴黎出版。1848—1851年它反映了拥护两个保皇派——正统主义者和奥尔良党人合并的人的观点。——第118页。
- 59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nel》）是法国资产阶级的日报；1815—1870年在巴黎出版；在40年代是奥尔良党人温和派的机关报；它在1848年革命时期反映了聚集在梯也尔周围的反革命资产阶级的观点；1851年12月政变后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118页。
- 60 指两个文件：一是发表在1850年8月11日“1850年人民”（《Peuple de 1850》）报第6号上的“山岳党告人民书”，一是发表在1850年8月14日

该报第7号上的“告人民书”。——第118页。

- 61 Baiser Lamourette (拉摩勒特式的接吻), 指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一段有名的插曲。1792年7月7日立法会议员拉摩勒特提议以兄弟般的接吻来结束一切党派纷争。在他这个提议的影响下, 各敌对党派的代表热烈地彼此拥抱了, 但是不出人们所料, 这些虚伪的“兄弟般的接吻”第二天就被忘却了。——第119页。
- 62 “权力报”(《Le Pouvoir》), 是波拿巴派的机关报, 1849年出版于巴黎, 主编是格朗尼埃·德·卡桑尼亚克。——第120页。
- 63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第32条规定, 在立法议会休会期间要设立常设委员会, 由议会选出的25个委员和议会常务局组成。1850年这个委员会实际上由39人组成: 常务局11人, 庶务3人和选举产生的委员25人。——第120页。
- 64 In partibus infidelium (直译是在异国) ——天主教主教被任命为非基督教国家的纯粹名义上的主教时, 其头衔上添有这种字样。马克思和恩格斯经常用这个辞来指完全不顾国内实际情况而在国外成立的各种流亡政府。
这里是指预定在正统派的王位僭望者尚博尔取得政权时所要成立的由德·列维斯、圣蒲利斯特、贝利耶、帕斯托里和德斯卡尔等组成的内阁。——第121页。
- 65 指所谓的“维斯巴登宣言”, 这个宣言是正统派在立法议会的秘书德·巴特米受尚博尔伯爵的委托于1850年8月30日在维斯巴登草拟的。在宣言中规定了正统主义者执政后所要采取的政策; 尚博尔伯爵扬言要“正式地断然取消一切告人民书, 因为这些文告就等于否定传统的君主政治的伟大的民族原则”。这个声明由于以议员拉罗什雅克兰为首的一些君主主义者的抗议, 在报刊上引起了热烈的论战。——第121页。
- 66 “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是一本论述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史的著作。当恩格斯同遭受失败的起义军的最后一批战士一起到达瑞

士后,很快就开始撰写这本书。马克思于1849年8月上半月从巴黎就写信给恩格斯谈到此事,根据他的意见,恩格斯决定把他的书写成一本抨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小册子。他最初打算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这本著作,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雅·沙贝利茨和约·魏德迈的协助下找到了出版商。然而由于马克思已采取措施出版自己的杂志,恩格斯便放弃了原先的打算。显然,在瑞士恩格斯是把主要注意力放在搜集材料上;10月里,由于他迁居英国(马克思已在那里),而暂时停止了这个工作。在伦敦,他又继续写这本书,该书的头两章——“莱茵普鲁士”和“卡尔斯卢厄”刊载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上。全书于1850年2月写成。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作者在世时没有再版过。该书德文本,由弗·梅林于1902年第一次转载在“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文学遗产”(《Aus dem literarischen Nachlass von K. Marx, F. Engels und F. Lassalle》)汇集第3卷内。——第127页。

- 67 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南德广泛流行的一首副歌。——第129页。
- 68 “在大海怀抱中的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是争取把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从丹麦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的战士们所唱的一首歌曲。——第129页。
- 69 帝国宪法是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议会通过的。它反映了当时议会中民主党和自由资产阶级中间派之间的妥协,它里面矛盾百出。它规定了民主自由,同时又把行政权授与以皇帝为首的帝国政府。与土地有联系的封建劳役和租税并未废除,而必须要赎买。这部宪法是统一德国的一个步骤;但它的主要缺点在于,正如恩格斯指出的,只是一纸空文,没有实行其各项条文的任何力量。几乎所有德意志大邦(普鲁士、萨克森、巴伐利亚、汉诺威等等)的政府都拒绝承认这部宪法;只有在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的领导下在莱茵省、德勒斯顿、巴登和普法尔茨发动武装斗争的人民群众是它的唯一保护者。——第129页。
- 70 德国各城市的“三月同盟”是法兰克福议会左派分子于1848年11月底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组织的“中央三月同盟”的分支。“三月同盟”的

- 领导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弗吕贝尔、西蒙、卢格、福格特等，用空话代替了革命行动，他们表现出畏首畏尾、犹豫不决、同反革命进行斗争时无能为力。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自己的许多著作中无情地批判了“三月同盟”及其小资产阶级领导者的活动。——第129页。
- 71 格留特利的誓言 是关于建立瑞士联盟的一种传说。相传这3个州的代表于1307年在格留特利（或留特利）会合，宣誓忠于联盟，共同反对奥地利的统治。——第130页。
- 72 法兰克福议会的极左派（卢格、施略费尔、齐普，特留茨什列尔等人）主要是代表小资产阶级，但也得到部分德国工人的支持。这一派宣称忠于共和国，用革命方法进行斗争，可是在采取革命措施和动员群众反对反革命的进攻时，却常常表现得畏首畏尾和犹豫不决。这一派的领袖具有小资产阶级联邦主义观点，因而他们不能在德意志民族统一问题上采取明确的立场。1849年4月至5月，保守派和大多数自由派的代表退出议会后，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左派和极左派）在议会中获得了多数。1849年5月30日由于受到驱逐的威胁，这个议会把会址迁到斯图加特（维尔腾堡的主要城市）。维尔腾堡政府奉行了观望的中立政策。在这个城市中，议会继续执行制止人民参加公开革命斗争的政策。由于普鲁士国王拒绝接受王位、帝国摄政奥地利大公约翰的叛变，议会于1849年6月6日从自己的委员中选出了由弗·拉沃、卡·福格特、格·西蒙、弗·许列尔和阿·贝黑尔等5人组成的帝国摄政。帝国摄政企图靠国会的帮助保证革命获得胜利，但是遭到了完全的失败。6月18日，国民议会为维尔腾堡的军队所驱散。——第130页。
- 73 关于梅洛斯拉夫斯基的进军的预约稿，“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未曾发表。——第133页。
- 74 1849年5月3—8日在德勒斯顿发生了武装起义。萨克森国王拒绝承认帝国宪法和任命极端反动分子钦斯基担任首相，是这次起义的导火线。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几乎没有参加斗争，工人在街垒战中起了主要作用。起义的领导者是赛·契尔奈尔、米·巴枯宁等人。为了回答德勒斯顿街垒战战士们求援的呼吁，莱比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 只作了口头宣言。莱比锡的市参议会和市民自卫团不仅拒绝援救德勒斯顿的起义军，而且残酷地镇压了那些想阻止莱比锡卫戍部队开往德勒斯顿去的工人和手工业者在莱比锡发动的起义。——第134页。
- 75 拿破仑法典 (Code Napoléon) 是拿破仑于1804年公布的民法，在德国西部和西南部法国人占领的区域内甚流行，莱茵省归并于普鲁士后在该省仍继续采用。恩格斯称它为“资产阶级社会的经典法律全书”。——第135页。
- 76 后备军是一支包括常备军和预备军中退伍的、年长的兵役义务者的武装部队。按照普鲁士的法律，只有在战时才能征召后备军。——第138页。
- 77 法兰克福帝国内阁 是根据1848年6月28日作为中央临时政府的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决议成立的。这个实际上既不掌握预算也不掌握军队的政府，没有任何实际力量。不久，它就变成了反革命的帮凶。——第139页。
- 78 民主主义者在特利尔工人和附近居民点的支援下于1849年5月17—18日袭击卜留姆军械库。夺取武器和发动保卫帝国宪法的起义，是这次参加袭击者的目的。虽然军械库一度被起义者所占领，可是运动很快就被开来的政府军队镇压下去。——第145页。
- 79 三色旗 在这里是指黑红黄三色的旗子，是争取德意志民族统一的运动的旗帜。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这面三色旗被宣布为德国的国旗。——第145页。
- 80 “新莱茵报”被封后，该报编辑前往巴黎的有卡·马克思、斐·沃尔弗、恩·德朗克。在巴黎，这时山岳党和革命俱乐部准备发起反对执政的秩序党的群众运动。——第154页。
- 81 1849年5月12日在奥芬堡（巴登）召开了巴登人民同盟代表大会，大会的领导人只要求改组内阁和召开制宪议会。只有在巴登军队投到人民这边来之后，在1849年5月13日的群众大会上，才提出了比较革命的要求，并成立了巴登委员会，夺取了全部政权。——第155页。

- 82 参议会是法兰克福自由市的管理机关之一；兼有立法和行政的职能。——第156页。
- 83 “坚决前进俱乐部”是1849年6月5日在卡尔斯卢厄成立的，它联合了对布伦坦诺政府采取投降政策和在政府中加强右派分子的活动表示不满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和主义者的比较激进的一派（司徒卢威、契尔奈尔、海因岑等人）。俱乐部建议布伦坦诺把革命推向巴登和普法尔茨境外，在政府中增加激进分子。俱乐部的委员接到否定的回答后，于6月6日试图以武装示威游行来威胁政府。但是政府得到了市民自卫团和其他武装部队的援助，迫使他们缴械投降。于是“坚决前进俱乐部”被封闭了。——第159页。
- 84 古·司徒卢威认为必须反对的“人类六大祸害”是：君权、氏族贵族、官吏、常备军、僧侣、财政巨头的统治。（参看载于1849年10月26日“德意志伦敦报”上的“古·司徒卢威来信”）——第161页。
- 85 指1848年巴塞尔附近比尔斯费尔顿出版的古·司徒卢威的小册子“德国人民的基本权利”（G. Struve. 《Die Grundrechte des deutschen Volkes》. Birsfelden bei Basel, 1848）。——第162页。
- 86 在卡尔斯卢厄等级代表议会大厅内举行了布伦坦诺政府会议。——第163页。
- 87 阿塔·特洛尔是海涅写的同名长诗中的人物。这本诗对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进行了讽刺。阿塔·特洛尔即普遍平等论的信徒的原形，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流亡中的大人物”一书中所指出的，就是阿尔诺德·卢格。
1848—1849年，阿·卢格在柏林出版了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报纸“改良报”（《Die Reform》）。——第168页。
- 88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是德国日报，巴登政府以及1849年布伦坦诺政府的官方报纸。——第169页。
- 89 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是1848年10月26日至30日在柏林举行的第二次民主代表大会上选出来的。中央委员会于1849年5月底委任马

- 克思为德斯特尔委员会的委员。——第171页。
- 90 指聚集在“改良报”周围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这一伙人。这些人的首领是赖德律-洛兰和路易·勃朗。他们的代表曾提出实行民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要求。相当一部分法国工人也受了这些社会民主主义者的影响。——第171页。
- 91 “飞行传单”(《Fliegende Blätter》)是德国的一种讽刺性周刊,于1845年在慕尼黑创刊。——第172页。
- 92 指“城乡信使”报(《Bote für Stadt und Land》),它是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的官方报。唯一的一篇在1849年6月3日该报第110号上刊载的恩格斯的文章,标题是“普法尔茨和巴登的革命起义”(见本版第6卷)。——第178页。
- 93 蔬菜水果商场是在凯则尔斯劳顿的一个买卖水果和蔬菜的室内商场,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中央办公机关就设在那里。——第178页。
- 94 轻骑兵(cheveux-légers)是在某些西欧国家以军刀、手枪和马枪武装起来的轻骑兵团的称呼。——第179页。
- 95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是德国日报,1616年出版,19世纪中叶成为自由派的报纸。——第179页。
- 96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是德国日报,该报自1802年起即以此名在科伦出版。在1848—1849年反映了普鲁士自由资产阶级怯懦的和背叛的政策。该报曾经常猛烈地攻击“新莱茵报”。——第179页。
- 97 这句话是从1819年约·亨·福斯翻译的荷马著“伊利亚特”的德译本中摘引来的(诗歌的第2部分,第408诗句等)。——第181页。
- 98 柏林工人和手工业者要求康普豪森—汉泽曼政府把武器发给人民的行动遭到失败后,1848年6月14日用袭击办法占领了军械库。柏林工人的发动是自发的和没有组织的。开来的增援部队和资产阶级的市民自卫团队伍一齐很快地驱散了人民,解除了他们的武装。——第182页。

- 99 恩格斯把布伦克尔和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的著名统帅欧根·萨沃斯基相比，是有意讽刺他。——第185页。
- 100 毕斯托——莎士比亚的一些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亨利五世的一生”）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个二流子、吹牛家和撒谎者。
福斯泰夫——莎士比亚的著作（“温莎的风流娘儿们”、“亨利四世”）中的一个人物；他是个吹牛家、胆小鬼。——第194页。
- 101 这句话是从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于1847年4月11日在普鲁士联合议会开会时发表的御前演说中摘引来的。——第197页。
- 102 见注83。——第203页。
- 103 指1849年伯尔尼版“梅洛斯拉夫斯基将军关于巴登战役的报告”（《Rapports du Général Miroslawski sur la campagne de Bade》. Berne, 1849）。——第209页。
- 104 G. Struve. 《Geschichte der drei Volkserhebungen in Baden》. Bern, 1849. ——第212页。
- 105 弗·齐茨在1848年9月17日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人数众多的人民大会上，对法兰克福议会的消极怠工、对它在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上所持的卖国政策提出抗议，他反对把任何贺词寄给国会并宣称“坚决行动的”时刻现在已经来临。——第217页。
- 106 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是1840年2月由正义者同盟的卡·沙佩尔、约·莫尔及其他活动家在伦敦创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组成后，在协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地方组织。1847和1849—1850年马克思和恩格斯积极参加了协会中的活动。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大多数委员同宗派主义冒险集团的少数委员（维利希、沙佩尔）之间的斗争中，协会站在少数委员的一边（见本卷第484页），因此1850年9月17日马克思、恩格斯及其许多战友退出了协会。自50年代末起，马克思和恩格斯重新参加了教育协会的活动。这个协会一直存在到1918年，为英国政府所封闭。在20世纪有许多俄

国政治流亡者访问过这个协会。——第218页。

- 107 科伦工人联合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于1848年4月13日在科伦创立的。起初，在联合会中起领导作用的是安·哥特沙克，他在“真正社会主义”的影响下，站在宗派主义立场上。他忽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任务，奉行抵制间接选举全德和普鲁士国民议会的政策，反对支持民主派候选人，煽动性地要求立即建立“工人共和国”。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反对哥特沙克的宗派主义政策的斗争巩固了联合会，改变了它的政治路线。到1848年8月，联合会已有7000会员。哥特沙克被捕后，7月6日莫尔被选为联合会主席，这个职务他担任一直到1848年9月，此后由于有被捕的危险，被迫侨居国外。1848年10月马克思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而从1849年2月起沙佩尔被选为联合会的主席。联合会这时实行了改组。2月25日通过的新章程宣布，提高工人的阶级觉悟和政治觉悟是联合会的首要任务。1849年德国反革命得胜后，科伦工人联合会丧失了它的政治性质，变成了普通的工人教育协会。——第218页。
- 108 1848年9月25日科伦当局在资产阶级的支持下，逮捕了科伦工人运动的许多活动家，打算煽起一场风潮后，再镇压无产阶级运动。然而，在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下的科伦工人，没有受到煽动的影响，没有进行过早的起义。9月26日科伦宣布处于戒严状态，“新莱茵报”及其他民主派报纸暂停出版。恩格斯和其他许多撰稿人被迫侨居国外。——第218页。
- 109 当巴登-普法尔茨军队退却时，1849年6月23日在一支部队中发生了哗变。士兵们在自己的指挥官托梅领导下，曾企图逮捕梅洛斯拉夫斯基和济格尔并把他们出卖给普鲁士军队。——第219页。
- 110 参看约·菲·贝克尔和克·埃塞伦“1849年南德五月革命史”1849年日内瓦版第430—433页（Joh. Phil. Becker und Chr. Essellen. 《Geschichte der süddeutschen Mai- Revolution des Jahres 1849》。Genf, 1849, S. 430—433）。——第227页。
- 111 在夫赖堡的巴登制宪议会是1849年6月底从卡尔斯卢厄迁来的。——

第228页。

- 112 编入本卷的书评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和第4期,文章没有署名。1892年恩格斯在为马克思写的传略中写道“……此外,他还写过(和恩格斯一起)许多书评和政治评论”。在1886年恩格斯还在世的时候,“新时代”杂志编辑部根据他平时的意见和指示用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名义再版了评阿·谢努和律·德拉奥德的小册子的文章。有一些书评,例如评艾·日拉丹和基佐的著作的文章很可能是马克思写的,而评托·卡莱尔的著作的文章则可能是恩格斯写的。但是因为不能完全肯定,所以所有的书评都是作为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著作载入本卷。——第236页。
- 113 “德国记者”(《Korrespondent von und für Deutschland》)——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报纸,从1806年起在纽伦堡出版。——第236页。
- 114 道梅尔的“新时代的宗教”一书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绪论”,为该书的第1卷,第二部分是“本文”,为该书的第2卷和第3卷。看来,马克思手边只有第1卷和第2卷。——第236页。
- 115 忠实的埃卡尔特是德国中世纪的传说里的英雄,是个忠实人物、可靠的卫士的典型。——第237页。
- 116 引自席勒的诗“钟之歌”。——第237页。
- 117 指道梅尔的著作:“古希伯莱人对火和火神摩洛赫的崇拜”1842年不伦瑞克版(《Der Feuer- und Molochdienst der alten Hebräer》Braunschweig, 1842)和“基督教古代的圣礼”1847年汉堡版(《Die Geheimnisse des christlichen Alterthums》.Hamburg, 1847),书中含有许多不科学的毫无根据的假设。——第238页。
- 118 新可兰经的各章是对道梅尔的“穆罕默德及其著作”1848年汉堡版(《Mahomed und sein Werk》.Hamburg, 1848)一书的讽刺;阿刺伯文称可兰经的各篇为 cyp^{si}(章)。——第238页。
- 119 指克尼格的著作“对人的态度”1804年汉诺威版(《Ueber den Umgang mit Menschen》.Hannover, 1804),在这本书中作者规定了在

和别人交往时应遵守的行为规范。这本书谈的皆是一些肤浅的看法和人所共知的真理。——第240页。

120 道梅尔在其著作中的这个地方引用了克洛普什托克的“到处是神灵”的颂歌（《Dem Allgegenwärtigen》）。——第241页。

121 诺斯特拉达莫司是16世纪法国著名的星象学家，查理九世的医生，诺斯特拉达莫司的预言是用诗的形式写的，其特点是极为模糊而难解。

苏格兰人的洞察力是一种能洞察未来和普通人无法看到的现象的能力，根据迷信，传说苏格兰山区的居民具有这种能力。

动物的磁性是18世纪奥地利医生麦斯默尔的学说，他认为用催眠性的暗示可以影响人的行为。——第241页。

122 引自歌德的著作“威廉·麦斯特的修业时代”，其中有几个场面描写献身科学和艺术的人可怜地依附于有爵位的大人物。——第242页。

123 1848—1849年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圣保罗教堂举行了会议。——第243页。

124 引自路·西蒙1849年4月11日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演说。——第243页。

125 1849年3月28日法兰克福国民议会派遣代表前往柏林，请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宣登皇位。代表团失败而归，因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不得德意志各邦君主的认可就拒绝从议会手中接受皇位。——第244页。

126 在现在评论的这本小册子中，西藏写道，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坚决谴责了维尔腾堡国王反对帝国宪法的言论，协助了巴登和普法尔茨的武装斗争以捍卫帝国宪法。西藏还引证了1849年6月8日他到斯图加特后议会的娄罗们所通过的决议。但是这个把巴登置于帝国（即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保护之下的决议纯粹是宣言性质的文件。议会害怕广泛的人民运动，而没有给起义者任何具体的援助；另外议会不听马克思和恩格斯于1849年5月和法兰克福左派领袖谈判时提出的建议，

拒绝号召巴登和普法尔茨的起义部队来进行自卫。——第245页。

127 指1694年创立英格兰银行一事。该银行的创始人以贷款的形式交给政府一笔基金；这就是国债的基础。——第248页。

128 指1640年在里斯本、1647—1648年在那不勒斯、1674—1676年在墨西哥爆发的反对西班牙统治的人民起义。——第250页。

129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第4期和解5—6期的双刊号上的国际述评的标题只是Revue（评论），而且没有署名。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和书信中的许多言论证明，这些评论是他们二人合写的。

本篇和第二篇、第三篇国际述评（见本卷第343和492页）的标题都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254页。

130 指反革命的大资产阶级和反动的普鲁士王室为共同反对人民的民主要求在1848年革命一开始时达成的协议。但是，随着反革命地位的巩固，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开始感到自己的同盟者是一种累赘，并且愈来愈加紧阻止大资产阶级的立宪的要求。后者一面继续维持跟王室的同盟关系，一面在普鲁士议会中假作“反对派”。1848年12月5日，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解散了普鲁士制宪议会，在当天就“赐与了”宪法，宪法的基础是普鲁士制宪议会1848年讨论过的并为照顾封建政党的利益做了修改的方案。宪法承认国王有权改变两院的任何决议，有权“在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不仅可以不通过两院公布法律，而且还可以修改宪法的个别条款。但是在这个宪法里还保留了某些民主果实，如普选权等。这一点保证了1849年1月的第二院，即下院选举时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能够当选，这些资产阶级自由主义分子曾经批评了国王，常常惹得国王不愉快。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49年4月解散了议会，1849年5月30日公布了新选举法，新选举法规定了以高额财产资格和不平等的各阶层的代表人数为基础的三级选举制。国王用这种手段使得下院当选的议员多数是顺从的人，因而在1849年8月7日的会议上通过了政府提出的宪法。——第254页。

131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1850年1月7日的信件发表在1850年1月11日“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第9号上。这封信的

内容是要修改1848年12月5日的普鲁士宪法草案。——第254页。

- 132 根据1850年1月31日两院通过的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同意的宪法，在普鲁士保留主要由封建贵族代表组成的上院（贵族院）和按三级选举制选举出来的下院。宪法规定政府有权设立特别法庭，审理背叛国家和危害国内外安全的案件。为了保留国民兵役法，即全民兵役制，宪法规定凡有作战能力的普鲁士居民都由反动的普鲁士政府调配。根据宪法第40条，保留了地产长子继承权——封建的土地所有权继承形式，按这种继承形式，所有权不得转让，归长子所有。——第254页。
- 133 联合议会 是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为了获得向国外借款的保证以摆脱财政困难，于1847年4月在柏林召集的各省等级议会的联合会议。联合议会是在1847年4月11日召开的。由于国王拒绝满足议会资产阶级多数派的最微薄的政治要求，后者拒绝给国王以借款的保证。国王为了进行报复于同年6月解散了联合议会；这样就加重了国内的反抗情绪，加速了德国的革命。——第255页。
- 134 指普鲁士国民议会的左翼议员柏林的贝·瓦尔德克和特利尔的卡·格律恩的诉讼案件。他们在1849年因自己的政治活动被控。这两次诉讼案件明显地暴露了普鲁士政府的下流手段：它在跟自己的对手斗争时不惜伪造证据；另一方面，“民主主义”的代表瓦尔德克和格律恩在法庭上的表现很可耻，他们贪生怕死，背叛革命，千方百计地证明自己对于普鲁士政府的忠心。虽然这样，出席法庭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听众还为瓦尔德克和格律恩喝彩。——第255页。
- 135 引自阿伦特的诗“德国人的祖国”。——第255页。
- 136 指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这样一种企图：联合汉诺威和萨克森的君主以及和这些君主联合在一起的17个其他德意志邦的君主，共同统一德国（奥地利除外），受普鲁士的领导，从而实现建立“小德意志”的计划。这个计划受到右翼自由派，即退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并于1849年6月组成所谓哥达党的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的支持。后者积极参加了德国议会的选举；德国议会曾于1850年3月20日在爱尔福

特召开会议，通过了按反革命精神修改的全德宪法新草案。后来的事件证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法兰克福议会寿命不长的预言是正确的。在奥地利君主和俄国沙皇的压力下，一些从前支持普鲁士的德意志各邦转到了奥地利一边，而普鲁士政府由于不敢违抗尼古拉一世，于1850年4月29日解散了爱尔福特议会。——第255页。

- 137 老鼠与青蛙之战是一部希腊诙谐叙事诗，荷马的叙事诗的模拟诗，作者不详。——第255页。
- 138 Interim——临时协议。这里是指普鲁士和奥地利在1849年9月所签订的关于在德国宪法问题未获得最后解决以前共同领导德国事务的条约。根据这项加强德国反动力量的协议，成立了奥普联合委员会，实际上恢复了联邦议会；这个协议是跟普鲁士的统一计划背道而驰的。——第256页。
- 139 海外贸易公司 (Seehandlung)，这是1772年在普鲁士设立的贸易信用协会；该协会享有许多重要的国家特权，它给予政府巨额的贷款，实际上充任了政府的银行家和财政经纪人。1904年该协会正式改为普鲁士国家银行。——第256页。
- 140 边境人是奥地利帝国南部地区（16至19世纪的军事边境地区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斯拉窝尼亚和巴纳特）的居民，他们为了使用土地必须在边境上服兵役。——第256页。
- 141 1808年亚历山大一世跟法国大使科林库尔谈话时用的说法。——第257页。
- 142 指由于土耳其政府拒绝按照奥地利和俄国的皇帝的要求交出匈牙利和波兰政治流亡者，俄国和土耳其的外交关系发生破裂（1849年11月12日至12月31日）这件事。——第257页。
- 143 参万得拉 是叙利亚的城堡，在1831年至1833年埃及和土耳其的战争中，于1832年曾被埃及军队占领。

圣让得阿克 是委拉克罗斯（墨西哥）的城堡，是墨西哥独立战争时期留在西班牙人手里的最后一个城堡，1825年光复。——

第258页。

- 144 所谓“雇佣兵条约”在这里是指瑞士各州与欧洲国家签订的提供雇佣兵的条约。这些条约是从15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签订的；在18至19世纪的一系列的资产阶级革命当中，瑞士雇佣兵充当了保皇派反革命势力的武器。

所谓“诸旧州”是指13、14世纪形成瑞士联邦的最早核心的瑞士山区诸州。——第259页。

- 145 见注45。——第260页。

- 146 指1846年6月英国议会通过的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所谓谷物法是为限制和禁止谷物进口，是为大土地所有者的利益而制订的。1846年通过废除谷物法的法案，是在自由贸易的口号下反对谷物法的工业资产阶级的胜利。——第261页。

- 147 弗·恩格斯专门为英国读者写的“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与宪章派革命的一翼及其领袖如乔·哈尼和厄·琼斯等建立了紧密联系的一个证明。乔·哈尼从1849年6月到1850年9月在伦敦发行了“不列颠和外国政治、历史和文学民主评论”（《The Democratic Review of British and Foreign Politics, History and Literature》）月刊。在这个杂志上，除了刊载恩格斯这篇文章以外，还刊登了节译的卡·马克思的“法兰西阶级斗争”第一章。从1850年7月1日起哈尼还发行了“红色共和党人报”（《The Red Republican》），在这上面刊登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这个刊物于1850年11月停止出版。从12月起，哈尼开始发行新的周刊“人民之友”（《Friend of the People》），一直出到1851年夏天，恩格斯曾答应为这个周刊写一系列的批判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文章。但是，不久哈尼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分裂的时候采取了暧昧的立场，他和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代表建立了友好关系，这样就使得马克思和恩格斯与之断绝了关系。马克思和恩格斯继续保持同厄·琼斯的联系，让一些自己的最亲近的拥护者参加琼斯创办的“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周刊的工作，帮助他们写作（如格·埃卡留斯，康·施拉姆，

- 威·皮佩尔)。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支持宪章派的报刊的时候,力求发扬40年代革命的宪章运动的传统,向英国工人的群众性运动灌输革命的理论。——第269页。
- 148 曼彻斯特学派是反映工业资产阶级利益的经济思想中的一派。这一派的拥护者即自由贸易论者坚持贸易自由和国家不干涉经济生活。自由贸易论者的宣传中心是曼彻斯特,在曼彻斯特领导这一运动的是1838年组织反谷物法同盟的两个纺织厂主科布顿和布莱特。在40至50年代自由贸易论者组织了一个英国自由党左翼的单独的政治集团。——第269页。
- 14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较晚的一些著作中对10小时工作制法令作了更为详尽的评介(见卡·马克思“国际工人协会成立宣言”和“资本论”第一卷)。——第271页。
- 150 指人民宪章,这个宪章是1838年宪章派提出的,它包含了实行普选权和创造一系列条件保证工人确实拥有普选权的要求,如议会每年改选一次,议员领薪金,秘密投票,平均分配选区以及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第272页。
- 151 财务法庭于1850年2月曾宣判被控告破坏10小时工作制法案的厂主无罪。这个决定事实上等于取消该法案,因此引起工人的反对;于是1850年8月5日议会颁布了新法令,规定女工和童工每日劳动10个半小时和每天劳动开始和结束的时间。
财务法庭(Court of Exchequer)是英国最老的法庭之一,起初主要担负财政职能,在19世纪执行了英国最高司法机关的职责。——第273页。
- 152 指19世纪30—40代在工业资产阶级的压力之下所颁布的一系列的法令,其目的在于反对买卖官职和授予贵族家族的代表以挂名领高薪的职位。——第281页。
- 153 济贫法于1833年在英国议会中进行过讨论,1834年在议会中通过。这个法令的内容见注17。——第281页。

- 154 航运法 (Navigation laws) 是1833年和以后的数年中通过的, 它禁止英国商品用外国船只运输; 这些法令于1849年废除。——第282页。
- 155 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于1850年3月底, 秘密地散发于亡命国外的以及德国国内的盟员中。1851年这个文件由于几个盟员被捕而被普鲁士警察查获, 刊登在德国资产阶级报纸“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ener Journal und Anzeiger》)上, 后又转载于“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Die Kommunisten - 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一书中; 这本书是由两个警官维尔穆特和施梯伯编写的, 恩格斯称这两人是“两个最无耻的警棍”。在本卷中, 这篇告同盟书是按照恩格斯校订过的、1885年他收入马克思的“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一书德文版作为附录的原文刊印的。——第288页。
- 156 这里所谈的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是和马克思、恩格斯在40年代到50年代对革命前景的整个估计有密切关系的。当时马克思主义的两位创始人象后来的列宁一样, 认为资本主义已经衰朽, 社会主义就要到来。马克思和恩格斯从这一点出发, 在“告同盟书”中反对把没收地主的土地交给农民, 而主张变为国家财产, 交给联合起来的农业无产阶级的工人使用。
- 列宁根据俄国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经验和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经验, 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关于土地问题的观点。他认为, 在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 在无产阶级革命之后首先保留大规模的农业企业是合适的, 他写道: “但是如果夸大或死板地执行这个条例, 绝对不容许把从剥削者那里剥夺来的一部分土地无代价地分给附近的小农, 有时也分给中农, 那就大错特错了。”(“列宁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31卷第138页) ——第297页。
- 157 托·卡莱尔“法国革命史”1837年伦敦版1—3卷(Th. Carlyle. 《The French revolution: a history》. Vol. 1—3, London, 1837)。托·卡莱尔“奥列佛·克伦威尔书信演说集”1845年伦敦版1—2卷(Th. Carlyle. 《Oliver Cromwell's letters and speeches》. Vol. 1—2, London,

1845)。

托·卡莱尔“宪章运动”1840年伦敦版(Th. Carlyle. 《Chartism》. London, 1840)。

托·卡莱尔“过去和现在”1843年伦敦版(Th. Carlyle. 《Past and Present》. London, 1843)。恩格斯针对这本书写了一篇评论“英国状况。评托马斯·卡莱尔的‘过去和现在’”(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6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卷第626—655页)。——第301页。

158 托·卡莱尔“历史上的英雄、英雄偶像崇拜和英雄事迹”1846年伦敦版(Th. Carlyle. 《Heroes, herowarship and the heroic in history》. London, 1846)。——第301页。

159 柏克司尼弗是查理·狄更斯著“马丁·切斯维特的一生”中的人物,是个伪善者。——第301页。

160 共济会派是一种宗教的哲学流派,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产生于英国,后来以“共济会会员”秘密支部的形式传布于许多国家,它的活动就是一些神秘的典礼和秘密的仪式。共济会派宣传了资产阶级的道德思想。他们的哲学观点主要是自然神论,即所谓的“理性的宗教”。共济会派的特点是信仰万世不变的决定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在他们看来,伟大人物的智慧在于识破这个规律,并使自己在道德上臻于完善。共济会的会章,一般都充满了神秘的个人偶像崇拜的精神,普通的会员只是他们领导人的工具,只是盲目地执行他们领导人的意志。

伊留米纳特派是共济会中的一派,在18世纪后半世纪主要是在巴伐利亚活动。——第307页。

161 “魔笛”是莫扎特利用爱·施卡奈德尔的歌词谱成的歌剧。这部歌剧以天真的童话般的形式表达了这样的思想:谁真正理解了自然界蕴藏的力量,并且始终不渝地遵循它的规律行事,谁就会得到好报,而恶人则会得到恶报。——第307页。

162 *laissez faire, laissez aller* (听之任之)是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经济学家的信条;他们主张贸易自由,国家不干涉经济范围内的事务。——第309页。

- 163 In partibus infidelium 见注64。——第310页。
- 164 菲·库伯的长篇小说“间谍”中的主人公哈尔威·比尔奇由于信仰和爱国心的驱使而作了间谍工作。——第314页。
- 165 “喧声报”（《Le Charivari》）是法国资产阶级共和派的讽刺性报纸，1832年起在巴黎出版；在七月王朝时期曾尖刻地抨击过政府；1848年转向反革命阵营。——第314页。
- 166 秘密的新四季社是在1839年四季社复灭后不久成立的，它似乎是四季社的继续。该社的骨干是工人，参加该社的还有大学生。该社的成员就观点来说倾向于革命的巴贝夫主义并受德萨米空想共产主义思想的强烈影响。——第314页。
- 167 见注6。——第318页。
- 168 指密谋家小集团、秘密的革命组织的成员用自制的燃烧弹进行恐怖活动的冒险企图。警察局的奸细从一开始就混入了这一冒险行动中，他们把密谋家的活动系统地报告了警察局。这使警察局得以把密谋的参加者一网打尽。后来，1847年对密谋家进行的审判表明，警察局的奸细在秘密组织里扎了多么深的根子。——第318页。
- 169 阿·勒·勒萨日的著名小说“圣蒂利扬那的日利·布拉斯的冒险故事”。——第319页。
- 170 指沙·傅立叶的下面几本著作“关于四种运动和普遍命运的理论”（《Théorie des quatre mouvements et des destinées générales》）；“虚伪的、零散的、可恶的、虚假的行业，和与它相对立的自然的、联合的、诱人的、真实的行业”（《La fausse industrie morcelée, répugnante, mensongère et l'antidote, l'industrie naturelle, combinée, attrayante, véricide》）；“关于普遍统一的理论”（《Théorie de l'unité universelle》）；这部著作第一版称作：“论家务农业协作”（《Traité de l'association domestique agricole》）。在傅立叶的遗著当中，1845年发表在“法郎吉”（《La Phalange》）杂志上的未完成的著作“论三种外在统一”（《Des trois unités externes》）部分地谈到贸易问题。恩格斯

- 把这个著作中的许多片断译成了德文并在1846年把它们刊登在“德国公民手册”上（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7年人民出版社版第2卷第654—661页弗·恩格斯的“‘傅立叶论商业的片断’的前言和结束语”）。——第325页。
- 171 指1848年5月15日的事件，见注19。——第326页。
- 172 1850年3月10日，法国举行了立法议会议员的补选，以递补被开除的山岳党人。选举结果，民主社会主义阵营获得胜利。——第329页。
- 173 注册税(Droit d'enregistrement)是办理买卖合同、遗赠文约、法庭判决等文件的注册备案手续所纳的税。文件经过这样注册，一方面证明它是真实可靠的，另一方面也是国库收入的一个来源。——第332页。
- 174 入市税是城市对运入市内的日用品所课的税。——第332页。
- 17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在德国的要求”一文中已经提出这一原理（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5卷第3—5页）。——第342页。
- 176 “笨拙”（《Punch》）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幽默周刊“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的简称，1841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43页。
- 177 唐宁街是伦敦中心的一条街，政府的所在地。——第345页。
- 178 选民同盟(Union électorale)——1850年3月，把奥尔良派、正统派、波拿巴派、天主教派等等统一起来的保皇主义党派的联盟以这个名义参加了法兰西立法议会的补充选举。
- “祖国报”（《La Patrie》）——法国的日报，创办于1841年。在1850年该报代表了联合在一起的保皇派，即所谓秩序党的利益，成为他们的选举联盟的机关报。后来成了波拿巴派的报纸。——第347页。
- 179 在巴黎交易所，从下午1点到3点进行交易。——第348页。
- 180 指意大利林荫街的图尔托尼咖啡店。在交易所关门后，在这个咖啡店

里和它附近地区进行交易活动。图尔托尼咖啡店和它邻近地区与正式交易所不同，因此被称作“小交易所”。——第349页。

- 181 1848年春，在美因兹发生过几起市民自卫团和普鲁士士兵之间的流血冲突事件。这些事件在德国引起了广泛的反应，并且成为法兰克福议会讨论的题目；议会只是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而委员会也只是在美因兹市民自卫团已被普鲁士士兵缴械的时候提出了自己的报告而已。——第353页。
- 182 指1849年11月18日在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伦敦的德国政治流亡者全体大会上共同通过的决议。1849年12月3日伦敦的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报告中援引了这一决议（见本卷第597—599页）。——第355页。
- 183 古·司徒卢威和托·福泽吉尔自称是伦敦德国政治流亡者的代表，向临时代理伦敦市市长职务的吉卜斯请求保证在伦敦不能维持生活的100个德国流亡者得到工作。吉卜斯以许多英国工人也处于相同的境遇为理由，拒绝了请求。关于这件事情的短评登载在1850年5月24日的“泰晤士报”上。——第358页。
- 184 指在瑞士的德国流亡者所组织的命名为“革命集中”的秘密组织。它的中央委员会设在苏黎世，其领导人是1849年5月德勒斯顿起义的领导人之一契尔奈尔；在这个组织里起主要作用的是弗里兹、格莱纳、济格尔、泰霍夫、叔尔茨、约·菲·贝克尔、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积极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中参加该组织的有德斯特尔、布龙等人，另外还有受共产主义者同盟委派进行活动的威廉·沃尔弗。1850年7、8月间，“革命集中”组织的领导人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就两个组织合并问题进行了谈判。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种建议，因为它违背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坚持成立无产阶级政党独立组织的原则。1850年年底，由于德国政治流亡者被大批驱逐出瑞士，“革命集中”组织便解散了。——第360页。
- 185 马克思和恩格斯从1850年5月9日威廉·沃尔弗的长信中获悉“革命集中”组织的活动情况和这个组织的代表布龙在德国的阴谋以后，便委

派恩·德朗克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特使前往瑞士。德朗克在1850年7月3日写给中央委员会的信中和1850年7月3日和18日写给恩格斯的两封信中，详尽地报告了他在德国和瑞士的顺利的活动。——第361页。

- 186 司徒卢威1849年10月迁居英国后，跟海因岑、鲁道夫、施拉姆、卢格、鲍威尔(来自施托尔佩)和一些其他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一起，竭力阻挠成立无产阶级独立组织的工作，进行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阴谋。他们在1850年1、2、4月，多次召开了德国流亡者会议，建立了他们单独的民主主义同盟。4月，他们在伦敦的德国流亡者中间散发了“告全体德国流亡者兄弟书”，在其中宣布了“全德流亡者中央局”领导下的德国民主主义流亡者的统一组织的成立，并且还该文件送到了德国。——第361页。
- 187 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是根据马志尼的倡议于1850年6月在伦敦成立的。马志尼早于1849年底在瑞士就在这一方面采取了一些初步措施。联合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流亡者组成一个国际组织的企图受到司徒卢威和卢格的全力支持。卢格经司徒卢威的推荐，作为德国民主派的代表加入了委员会。这个组织在其成员和思想观点方面的矛盾非常大，因此它并没有存在多久；由于意大利和法国的民主主义流亡者之间的关系恶化，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到1852年3月实际上就已经瓦解了。马克思在“国际述评(三)”(见本卷第535—540页)中对它的1850年7月3日的成立宣言做了彻底的批判。——第361页。
- 188 指1849年春夏两季在德国西南部爆发的维护帝国宪法的起义。——第362页。
- 189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6年初侨居布鲁塞尔的时候，在这里建立了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团结了进步的德国和比利时的社会主义者。由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成功的活动，正义者同盟改组为共产主义者同盟，在这之后，在布鲁塞尔，1847年8月在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比利时社会主义者当中的最革命分子、如象日果和特德斯科，都积极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布

鲁塞尔支部的活动。1848年法国二月革命以后，比利时政府对革命的德国流亡者马克思、威廉·沃尔弗和其他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大肆进行迫害，使他们被迫离开了比利时。1848年8月，由于比利时国王列奥波特的反动政府为了迫害民主主义者而制造的所谓里斯康土的诉讼案，特德斯科和支部的其他比利时成员遭到法庭的审判。特德斯科和许多其他比利时民主主义者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为无期徒刑。——第362页。

- 190 德意志工人协会是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对居住比利时的德国工人进行政治教育和宣传科学共产主义思想而于1847年8月底在布鲁塞尔建立的。在马克思和恩格斯及其战友们的领导下，协会成为公开的联合在比利时的德国革命无产者的中心，并跟佛来米和瓦隆工人俱乐部保持了直接的联系。协会的优秀分子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布鲁塞尔支部。协会对于布鲁塞尔民主协会的建立起了重要的作用。布鲁塞尔德意志工人协会的活动由于比利时警察当局逮捕和驱逐了它的成员，在1848年法国资产阶级二月革命之后不久就停止了。——第362页。
- 191 工人兄弟会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斯·波尔恩于1848年在柏林建立的德国工人和手工业者的组织。波尔恩是工人运动中改良主义路线的代表，他把兄弟会的活动局限于组织经济罢工和力图实现有利于手工业者的狭隘的行会性质的措施（如给小生产者贷款和组织合作社等）。兄弟会的纲领是片断的被曲解的“共产党宣言”的思想和路易·勃朗及蒲鲁东的小资产阶级学说的混合物。但是，兄弟会的一些时常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领导下的地方分会，在1848—1849年革命事件的直接影响下积极参加了革命斗争。1849年春季，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提出了筹建摆脱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他们为了筹建这种政党曾经想利用工人兄弟会的组织。1850年，政府禁止了兄弟会的活动，但是它的若干分会还继续存在了许多年。——第364页。
- 192 见注106。——第365页。

- 193 “太阳报”(《The Sun》)是英国资产阶级自由派的日报,从1798年至1876年在伦敦出版。——第367页。
- 194 1848年的外侨管理法是英国议会由于大陆上的革命事件和1848年4月10日宪章派的示威运动而通过的。根据这个法令,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下令把外国人驱逐出英国。——第367页。
- 195 “旁观者”(《The Spectator》)是英国自由派的周报,从1828年起在伦敦出版。——第370页。
- 196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 ische Zeitung》)是极端反动的德国日报,从1848年6月起在柏林开始出版;是反革命的宫廷权奸和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机关报。这个报还称为“十字报”(《Kreuzzeitung》),因为在报头上画有十字。——第373页。
- 197 指马克思而言。在1850年5月25日“新普鲁士报”上刊载的一篇短讯竟说什么马克思由于准备谋杀普鲁士国王,曾周游过德国和访问过柏林。——第374页。
- 198 马克思暗指本生的男爵称号。——第374页。
- 199 “地球”(《The Globe》)是英国一家报纸“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的简称,1803年在伦敦出版,辉格党机关报,在该党执政的时期是政府的官方报纸。1866年起成为保守党的机关报。——第375页。
- 200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自1842年1月1日至1843年3月31日在科伦出版。该报系莱茵资产阶级代表创办,对普鲁士专制政体抱有对立情绪。该报曾约请一些青年黑格尔分子撰稿。1842年4月马克思开始为“莱茵报”撰稿,同年10月起,成为该报编辑之一。“莱茵报”也发表了弗·恩格斯的许多文章。在马克思担任编辑期间,该报日益具有明显的革命民主主义性质。政府为“莱茵报”规定了特别严格的检查制度,后来把它封闭了。——第375页。

- 201 “新德意志报”（《Neue Deutsche Zeitung》）是1848—1850年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的民主派报纸。该报的编辑是奥·吕宁，他在40年代中期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代表之一，在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吕宁对卡·马克思著的“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弗·恩格斯著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予以特别的注意，在自己的报纸上对已出版的4期“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都作了评论。——第378页。
- 202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卡·马克思著的“哲学的贫困”，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91页和197—198页。——第378页。
- 203 “威塞尔报”（《Weser-Zeitung》），德国自由资产阶级的报纸，1844年创刊于不来梅。——第381页。
- 204 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是1850年夏天在伦敦写的，载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5、6期合刊号。恩格斯在叙述历史事实时所用的材料，主要是引自德国民主主义者历史学家威·齐美尔曼的“德国农民战争史”（W. Zimmermann《Allgemeine Geschichte des grossen Bauernkrieges》. Th. 1—3, Stuttgart, 1841—1843）。
- “德国农民战争”在1870年又以单行本的形式出版，作者还为这一版写了导言，来说明农民作为无产阶级同盟军所起的作用。这部著作由于深受德国工人读者的欢迎，又于1875年再版，恩格斯将导言又作了增补。在80年代恩格斯还打算重新修订“德国农民战争”，补充大量新的德国历史的材料。1884年12月31日他在给左尔格的信上写道：“我打算彻底修订我的‘农民战争’，农民战争将是整个德国历史的基础。”“资本论”第2、3卷的出版工作以及其他迫切的事情使恩格斯未能实现这个计划。保存下来的只是准备补充“德国农民战争”的未完成的手稿和许多札记草稿。——第383页。
- 205 汉撒同盟 是德国中世纪北海、波罗的海沿岸以及与这两个海相连的河流两岸的城市所结成的贸易和政治的同盟；同盟的目的在于垄断欧洲北部的贸易。汉撒同盟的极盛时代是在14世纪的后半期。——第

386页。

- 206 接租费 是向小份地所有者征收的一种封建赋税。

死亡税 (Sterbefall, Todfall) 是领主根据封建权利对于已死农民的份地和财产所征收的遗产税 (在法国称为“死手权”); 在德国封建主一般是向继承人征收好家畜。

保护金 (Schutzgelder) —— 封建主征收这种税, 作为领主对自己的仆从进行所谓的“保护”、法庭“辩护”的报酬。—— 第390页。

- 207 “公捐”(《gemeiner Pfennig》) 是人头税和财产税合并而成的一种税。这种税主要落在农民的肩上。—— 第392页。

- 208 上历年贡是被教皇任命担任教会职务(有俸圣职)的人向罗马教廷缴纳的一次贡赋。此项贡赋在大多数情况下等于恩赐的职位的一年收益; 担任此职务的人则向居民横征暴敛百倍地收回他上任时所缴纳的贡赋。—— 第393页。

- 209 恩格斯指1848—1849年革命时期在法兰克福国民议会和德意志各邦的国民议会中占居多数的德国资产阶级自由派。自由派在革命的最初几个月里在一些邦(如普鲁士)领导了“立宪政府”, 但是后来被官僚和贵族的代表所代替。立宪派力图保留王权, 作为抵制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支柱, 他们只用一个自由资产阶级的宪法来限制王权。立宪派对反动派所采取的妥协政策以及和他们所干的叛卖勾当是德国1848—1849年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第395页。

- 210 指查理五世刑律 (Constitutio criminalis Carolina), 1532年由累根斯堡议会通过; 这部刑律以处刑极其残酷著称。—— 第397页。

- 211 韦尔登派 是一个教派, 12世纪末产生于法国南部下层城市平民之中。据说, 创立者是把所有家产都周济贫民的里昂富商比埃尔·韦尔登。韦尔登派主张放弃私产, 谴责天主教教会积累财富的现象, 号召恢复基督教早期的习俗。韦尔登派的学说在瑞士西南部和萨伏依山区农民中特别流行, 在这里它带有保护原始公社制度和宗法关系的残余的色彩。—— 第401页。

- 212 阿尔比派是一个教派，12—13世纪流行于法国南部和意大利北部的城市中，它的发源地是法国南部阿尔比城。阿尔比派反对天主教的豪华的仪式和教阶制度，它以宗教的形式反映了城市工商业居民对封建制度的反抗。法国南部的部分贵族也加入了阿尔比派，他们企图剥夺教会的土地。1209年教皇英诺森三世曾组织十字军征伐阿尔比派。经过20年战争和残酷的镇压，阿尔比派运动终于失败。——第401页。
- 213 1251年法国农民起义（所谓的“牧童”起义）的领袖之一，名叫雅科布的牧师。据史实证明他是匈牙利人。——第401页。
- 214 加里克斯廷派是捷克的胡斯派民族解放和改革运动（15世纪上半期）中的一派，这个运动所反对的是德国贵族、德意志帝国和天主教会。加里克斯廷派（即不仅要求赐与面包而且赐与一杯酒的圣杯派）所依靠的是市民和部分捷克贵族，他们的要求仅限于建立民族的捷克教会，没收教会财产。——第403页。
- 215 塔波尔派（以运动中心塔波尔城而得名）是胡斯运动的第二派。与加里克斯廷派相反，他们是革命民主派。塔波尔派的要求反映了农民群众和城市平民要消灭整个封建制度的意向。加里克斯廷派贩卖塔波尔派的行为曾被封建的反动阵营利用来镇压胡斯运动。——第404页。
- 216 鞭笞派是一个宗教禁欲主义派别，从13世纪到15世纪盛行于欧洲。鞭笞派宣称自我折磨能够赎免罪恶。
罗拉德派（直译是：“咕咕啾啾的祷告”）是英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宗教派别（产生于14世纪），极端敌视天主教会。罗拉德派采用了英国宗教改革者威克利夫的学说，从这个学说中作出了更为激进的结论，用神秘的宗教形式来反对封建特权。罗拉德派中许多人（其中大都是人民群众和许多下层教会的代表）曾参加1381年的瓦特·泰勒起义。从14世纪末叶起罗拉德派遭受到残酷的迫害。——第404页。
- 217 锡利亚式的狂想（来自希腊文“锡利亚斯”——一千）是关于耶稣再生和建立公正的、普遍平等和幸福的“千年王国”的宗教神秘学说。锡利亚教义产生在奴隶制度解体时期，劳动人民由于遭

- 受难以忍受的压迫和痛苦而从这种救世的狂想中寻找出路。这种信仰盛行于早期基督教时期，其后经常重新出现在中世纪各种教派的学说中。——第405页。
- 218 恩格斯引用的这句话是齐美尔曼从路德那里引用来的（见 Zimmermann, Th. 1, Stuttgart, 1841, S. 364—365）。——第407页。
- 219 M. Luther. 《An den Christlichen Adel deutscher Nation: von des Christlichen standes besserung》. Württemberg, [1520]。恩格斯借用齐美尔曼书中的引文。——第407页。
- 220 奥格斯堡告白 是对路德教基础的陈述。1530年新教徒向在奥格斯堡开帝国会议的卡尔五世皇帝提出这个告白。它是以市民的“廉价教会”的理想（废除豪华的仪式，简化教会的等级等等）去适应王公利益的产物。他们宣布以领主王公来代替教皇作为教会首脑。皇帝拒绝接受奥格斯堡告白。同意路德新教改革的王公与皇帝所进行的战争于1555年以奥格斯堡宗教和平协定而告结束。根据这个协定，每个王公有权自行决定其臣民的宗教信仰。——第407页。
- 221 这是路德在1525年5月即农民战争最剧烈的时候所发表的《W yder die mörderische und reubischenn Rottenn der Pauren》这篇文章的题目。后面所引的话都是利用齐美尔曼书中的引文。——第409页。
- 222 齐美尔曼在他的著作的第一版中写的是这个年代，但根据后来可靠的材料，托马斯·闵采尔是生于1490年左右。——第410页。
- 223 再洗礼派 是那些要求成年时再洗礼的派别的称呼。——第411页。
- 224 “对诸侯讲道。解释先知但以理的另一区别，由上帝的代言者托马斯·闵采尔在阿尔斯特德宫内对肯干的被爱戴的侯爵们和萨克森的执政者们进行讲解”。1524年阿尔斯特德版（《Die Fürstenpredigt. Auslegung des andern Unterschieds Danielis des Propheten, gepredigt auf dem Schlo zu Allstedt vor den tätigen, teuren Herzogen und Vorstehern zu Sachsen durch Thomas Mün-

- tzler, Diener des W orts Gottes》. Allstedt, 1524)。恩格斯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12页。
- 225 恩格斯指的是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施特劳斯和其他青年黑格尔派的观点,按他们早期著作,他们在宗教问题上是个泛神论者。——第413页。
- 226 指1524年在缪尔豪森出版的闵采尔的文章,题目是:“根据路加对福音的证明来公开驳斥不忠实世界的错误信仰,使可怜的和不幸的基督教界知道它的迷途”(《Ausgebrückte Entblössung des falschen Glaubens der ungetreuen Welt durchs Zeugnis des Evangelions Lucæ, vorgetragen der elenden erbärmlichen Christenheit zur Erinnerung ihres Irrsals》)。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15页。
- 227 见 Zimmermann, Th. 2, Stuttgart, 1842, S. 75. ——第416页。
- 228 M. Luther. 《Eyn brieff an die Fürsten zu Sachsen von dem auffrurischen geyst》. Wittenberg, 1524. ——第417页。
- 229 根据后来可靠的材料证明,闵采尔起初是出发到帝国直辖市缪尔豪森,1524年9月他由于参加了城市平民的骚乱又在那里被驱逐出去。闵采尔以后由缪尔豪森到了纽伦堡。——第418页。
- 230 1524年闵采尔致路德的印刷的回信上,标题是:“论据充分的辩护词和对维登堡的过着安逸生活、由于曲解圣经而使不幸的基督教蒙受了最无耻的诬蔑的无神论者的答复”(《Hoch verursachte Schutzrede und Antwort wider das geistlose, sanftlebende Fleisch zu Wittenberg, welches mit verkehrter Weise durch den Diebstahl der heiligen Schrift die erbärmliche Christenheit also ganz jämmerlich besudelt hat》)。——第418页。
- 231 独立派是16世纪下半叶在英国产生的宗教政治派别,是中等工商业资产阶级和“新的”资产阶级化了的贵族反对专制政体和英国国教会的派别。在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独立派组成了一个单独的政党,在1648年末取得了政权。——第421页。

- 232 恩格斯采用齐美尔曼引自汉斯·杜达尔的话。——第422页。
- 233 德国西南部帝国直辖市的王公、贵族和贵族上层人物的士瓦本联盟建立于1488年。它的主要目的是反对农民和平民运动。领导这个反动联盟的德国西南部的王公还力图利用它来巩固他们的独裁政权。该联盟有自己的司法行政机关和军队。1534年由于内部纠纷而告解散。——第425页。
- 234 塞克列人是居住在德兰斯瓦尼亚东部山区的匈牙利人。——第432页。
- 235 指西西里岛上的人民为反抗1267年夺取了南部意大利和西西里的法国安茹王朝的统治所举行的起义。1282年3月31日晚在巴勒摩起义的人民消灭了数千法国的骑士和士兵。——第433页。
- 236 恩格斯指的是1517年10月31日路德（路德开始自己的宗教生涯时是图林根奥古斯丁派修道院的一个普通的修士）钉在维登堡一个教堂门上的95信条。信条中对出卖赦罪符和滥用天主教会的事实进行了猛烈的攻击。信条中，体现平民理想的路德宗教学说也具有了初步轮廓。——第436页。
- 237 布尔勒斯加 是诙谐讽刺文学的体裁之一，流行于文艺复兴时代的作家以及人道主义的思想家中间；他们用这种文体来嘲笑宫廷诗歌华丽的风格和封建社会上层的拘泥习俗。——第436页。
- 238 蔷薇战争（1455—1485）是两个争夺王位的英国封建家族的代表之间即约克族和郎卡斯特族之间的战争。约克人的徽章上饰有白色蔷薇，郎卡斯特人的徽章上则饰有鲜红色蔷薇。在约克派方面的有经济比较发达的南部的一部分大封建主，有骑士和市民；支持郎卡斯特派的则有北部诸郡的封建贵族。这次战争几乎完全消灭了古老的封建家族，在英国建立了新的都铎王朝，实行了专制政体。——第438页。
- 239 奥地利边区政府是指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及其直属藩臣分散在士瓦本北部和黑森林地区的统治机关。——第441页。
- 240 当贵族已经聚集起反革命力量的时候，士瓦本联盟的讨伐军的统帅

- 特鲁赫泽斯向1525年2月15日赫部起义的农民发出的最后通牒中的一句话，引自齐美尔曼的著作。——第442页。
- 241 根据马克西米利安大帝的旨意，地方法庭的法官只能由“高贵的”阶层的代表担任。——第443页。
- 242 南方高原地区按字面讲是高原地区。在这里是指上巴登，即与瑞士接壤的巴登南部山地。16世纪时，这个地区只有一部分属于巴登侯爵，其他部分则属于奥地利的布萊斯部或是由较小的教会的和世俗的封建主管辖。——第443页。
- 243 指的是1525年初在纽伦堡出版的一本匿名的小册子：“为说明激愤是否正当以及在和政权的关系方面他们应该做些什么和不应该做些什么这件事，致高等德意志民族和其他许多地区所有义愤填膺举行起义的农民的会议的文告。它是根据上帝的圣书，在编写和阐述时曾得到南方高原地区的同僚们的完全同意”（《An die Versammlung ge- meiner Pawerschaft, so in Hochtentscher Nation und viel anderer Ort, mit empörung und iffruhr entstanden, ob ihr empörung billicher oder unbillicher gestalt geschehn, und was sie der Oberkeit schuldig oder nicht schuldig seind, gegründet aus der heil göttlichen Geschrift, von Oberlendi- schen Mitbrüdern guter mahnung ausgangen und beschri- ben》）。威·齐美尔曼认为这篇文告的作者是托·闵采尔。——第443页。
- 244 鸠迪加礼拜日（是从*judex*——法官一字而来，直译为“审判的星期日”）是四旬斋的第五个星期日。——第446页。
- 245 这个决议是1525年3月当士瓦本联盟的代表还在和起义者进行谈判的时候在乌尔姆的联合政权会议上通过的。在乌尔姆档案中有一个文件记载有这个决议。齐美尔曼引用了这个文件（见Zimmermann, Th. 2, Stuttgart, 1842, S. 111—112）。——第446页。
- 246 大什一税和小什一税是有益于天主教会的两种不同的税。这种税的

- 税额和性质在德国不同的地区也有所区别，多半是大大超过了农民生产的产品的¹/₁₀。通常是非粮食作物征收小什一税，而粮食作物则征收大什一税。——第446页。
- 247 维尔茨堡教会 是管理维尔茨堡教区的宗教委员会，该会主持人维尔茨堡主教同时还有法兰克尼亚公爵的封号。——第448页。
- 248 条顿骑士团 是1190年十字军远征时建立的德意志僧侣骑士团。骑士团在德国和其他国家夺得了许多领地，由骑士团的高官即团长（或共杜拉）来治理。13世纪时，用征服和消灭当地立陶宛居民的办法而取得的东普鲁士由骑士团进行统治。东普鲁士就成了骑士团对波兰、立陶宛和俄罗斯各公国进行侵略的堡垒。1237年骑士团和另一个德国骑士团即也是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立风骑士团联合了起来。在1242年楚德湖之战（冰上激战）和1410年格吕沃尔德之战失败以后，骑士团就一蹶不振，后来只保全了不大的一份领地。——第450页。
- 249 奥芬堡条约是1525年9月18日布莱斯部起义者与奥地利政府签订的，条约规定恢复农民过去所负的徭役并施行严格取缔农民团体和“异教徒”的条例，而政府应当赦免普通的运动的参加者的罪刑，只处以较轻的罚金。起义的领袖们则没有受到政府的赦免。可是，当起义者刚放下武器的时候，甚至对这个不利于农民的条约奥地利政府和地方封建主们也马上背信弃义地加以破坏，并且大批地屠杀了起义者。——第466页。
- 250 根据1525年11月13日与奥地利政府所签订的条约的条件，黑森林农民必须再一次向哈布斯堡王朝保证恢复他们过去所承担过的徭役，并且不得阻碍胜利者在运动的中心瓦尔茨胡特城进行屠杀。但是瓦尔茨胡特城的保卫者又支持了好几个星期，只是由于市民阶级上层分子的叛变该城才落入敌手。——第466页。
- 251 后来的历史研究者断定闵采尔在缪尔豪森的“永久议会”中并没有担任正式的职务，但是他出席了这个议会的会议，指导了它的工作，所以他实际上领导了这个新的革命政府。——第468页。

了改变自己本身，培养自己进行政治统治的能力，你们也许不得不忍受15年，20年，50年的内战和国际冲突，但是你们却相反地说：‘我们必须立即夺取政权，不然我们干脆躺下睡大觉。’我们特别向德国工人指出德国无产阶级不够成熟，而你们却用最粗劣的方式阿谀民族感情和德国手工业者的等级偏见，当然这种说法是比较受欢迎的。正象民主派把人民这个词变成圣物一样，你们用无产阶级这个词来玩这套把戏。你们象民主派一样，用关于革命的高谈阔论代替革命的发展……。”（见卡·马克思“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本版第8卷）

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同盟中央委员会迁到科伦，委托科伦区域委员会组织同盟的新的中央委员会。投票赞成这项提案的有马克思，恩格斯，康·施拉姆，亨·鲍威尔，埃卡留斯和普芬德等6名中央委员；其余4名中央委员——维利希，沙佩尔，列曼和弗伦克尔表示反对。处于少数地位的4名委员退出了会场，并诉诸伦敦区部的盟员，得到了他们的支持。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多数会员也站在维利希和沙佩尔分裂派的一边，这就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和他们的拥护者退出这个协会。——第484页。

257 1850年4月中旬，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共产主义者同盟跟旅居伦敦的布朗基派法国流亡者和宪章主义者的革命派代表达成了一项有关建立“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协议。当时签署了共有6项条款（见本卷第605—606页）的原则协定（奥·维利希起草）。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分裂以后，法国布朗基派流亡者倒向以维利希和沙佩尔为首的宗派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少数派的一边，并跟他们一起走上了跟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结成亲密同盟的道路。在这种条件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850年10月初认为撕毁同布朗基派的协定是适宜的。发表的这个文件就是指这件事。——第485页。

258 格·埃卡留斯的“伦敦缝纫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一文曾刊载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它是在马克思直接指导下写成的，并经马克思校阅过。对全文的分析证明，这篇文章中的一些原理是马克思本人提出的。——第486页。

259 这是弗·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5期写的一篇文章，但没有写完。写这篇文章的动机是由于爱·梅因、尤·孚赫、路·布尔和麦·施蒂纳等几个柏林青年黑格尔派分子在报纸上发表了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无政府主义的言论。他们在1842年参加了“自由者”小组，而从50年代初起则集结在“晚邮报”（《Abend-Post》）的周围。在经济观点方面，这些文学家们拥护自由贸易。他们在政治方面的特点是对普选权和人民代议制采取轻视态度，极端的个人主义和颂扬无政府状态，认为这是“高级民主”和“自由人类联合”的实现。这个集团的反民主和反革命的倾向还表现在下面这点：1850年在他们机关报的名字下还加了“民主报纸”的字样；同时“晚邮报”声明说，要达到一种无政府状态，在这种无政府状态下人似乎“不是别人的奴隶，也不是群众的奴隶”。“晚邮报”开始有步骤地反对“民主行列内维护法制的人们”，反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同样也反对“革命的恐怖”。这些无政府主义的和半无政府主义的思想显著地传布到一部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中间。

标题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加的。——第487页。

260 看来，恩格斯是指卡·格律恩和阿·卢格，他们把蒲鲁东的个别著作译成德文并在报刊上宣传这些著作。——第488页。

261 这里是指斯图加特议会代表路·西蒙和卡·福格特（卡·福格特也是帝国五摄政之一）。卡·福格特和路·西蒙于1850年在杂志“德意志月刊”（《Deutsche Monatsschrift》）（斯图加特）上发表了许多文章，颂扬无政府状态并主张取消一切国家制度。——第488页。

262 Max Stiner.《Der Einzige und sein Eigenthum》.Leipzig, Verlag von Otto Wigand, 1845.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思想体系”一书中对这本书进行了彻底的批判（见本版第3卷）。——第489页。

263 指对艾·德·日拉丹的“社会主义和捐税”一书的评论（见本卷第330—342页）。——第489页。

264 摘自维兰特的诗“奥拜龙”。——第489页。

- 265 南海公司是在对南美和太平洋诸岛进行贸易的名义下于1712年前后成立的；而其真正的目的是从事国债券的投机。这个公司从政府那里获得了一系列的特权和垄断权，其中包括纸币发行权，展开了大规模的投机活动，结果在1720年宣告破产。——第493页。
- 266 见托马斯·图克“从1793年到1837年的货币流通状况下的价格史”1838年伦敦版第1—2卷(Th. Tooke. 《A History of Prices, and of the State of the Circulation, from 1793 to 1837》. Vol. I—II, London, 1838)。马克思从这本书中做了许多摘录，广泛地引用在这篇国际述评中。——第498页。
- 267 1844年的银行法规定英格兰银行分为两个完全独立的各自掌握现金储备的部门：一是银行部，专管银行业务，二是发行部，从事银行券发行工作。这些银行券必须有可靠的保证金作为经常存在的专用现金蓄备。——第498页。
- 268 戴·莫·伊文思“1847—1848年商业危机”1848年伦敦版(D. M. Evans. 《The commercial crisis 1847—1848》. London, 1848)。马克思从这本书上做了许多摘录，引用在这篇著作里。——第499页。
- 269 1850年10月11日，奥地利，巴伐利亚和维尔腾堡的君主在布勒琴士集会，签订了一项协定，旨在反对普鲁士争取德意志联邦中的霸权的野心。1850年10月28日，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和奥地利皇帝弗兰茨·约瑟夫，普鲁士政府元首勃兰登堡大公在华沙会晤；后者曾被迫让步。这两次会议表明了奥地利作用的加强和普鲁士地位的削弱。
in partibus (在异国的) 临时政府——见注64。——第503页。
- 270 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一项取缔殖民地的奴隶制度的法案。为了给予使用奴隶的农场主以补偿，曾拨款两千万英镑。——第504页。
- 271 指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反抗丹麦的民族解放战争。这场战争从1848年3月开始断断续续地一直进行到1850年6月底。在法国二月革命和德国三月革命的影响下，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为了达到跟德国合并的目的，奋起反抗丹麦的统治并建立了以奥古斯丁堡公爵，贝泽勒尔和雷苏特洛夫为首的临时政府。这个政府曾向德意志联

邦议会和普鲁士求援。普鲁士统治集团考虑到德国社会舆论站在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一边，于是发动了虚张声势的反对丹麦的战争，他们在战争过程中步步出卖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革命军队。1848年8月，普鲁士和丹麦在马尔摩签订了为期7个月的叛卖性的停战协定；按照停战协定的条件，实际上取消了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的一切民主成果。因为交战双方之间的矛盾没有获得解决，所以7个月期满以后，在1849年3月战争又重新爆发。这场不分胜负的军事行动以普鲁士的新的出卖行为而告终；普鲁士不顾德国的民族利益，于1850年6月2日与丹麦签订了和约。什列斯维希和霍尔施坦的居民由于不满意这个投降性的协定，决定靠自己力量继续进行战争。但是，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军队在伊什德特战役（1850年7月24到25日）中被丹麦军队击溃，从而停止了反抗。

黑森选帝侯事件——见第485页和注298。——第511页。

- 272 指资产阶级和平主义者1850年8月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召开的国际会议。在会议上起主导作用的是美国资产阶级慈善家艾里修·巴利特、英国自由贸易派首领科布顿和德国自由主义者、黑森前自由主义政府首脑尧普；参加会议的还有英国教友会派的代表。会上的发言都具有假仁假义的性质。——第515页。
- 273 1850年英国议会对希腊问题的辩论，起因是英国政府向希腊政府提出了强硬的美敦书，派遣英国舰队封锁了比里尤斯。采取这一行动的理由是受英国保护的葡萄牙商人巴希弗哥在雅典的住宅里遭到抢劫。俄国和法国都反对英国这种行动，法国政府从伦敦召回了自己的大使。在辩论时，帕麦斯顿勋爵在下院发表了演说，以公民权利和自由的卫护者的姿态蛊惑人心地揭露了欧洲反动国家的政策。——第515页。
- 274 1850年奥地利元帅，极端残暴地镇压了匈牙利和意大利的革命运动的刽子手海瑙逗留伦敦期间，巴克莱-彼尔金斯公司造酒厂的工人把他痛打了一顿。这一行动博得了英国人民群众的热烈赞扬。——第515页。
- 275 天主教徒的解放——1829年英国议会取消了对天主教徒政治权

- 利的限制。天主教徒多半是爱尔兰人，他们获得了被选入议会的权利和担任某些政府职务的权利；同时，选民的财产资格却被提高了4倍。英国统治阶级指望用这个花招把爱尔兰资产阶级和信天主教的土地所有者的上层吸引到自己这方面来，从而分裂爱尔兰的民族运动。——第516页。
- 276 罗·皮尔担任内务大臣时首创了一套现代资产阶级式的英国警察组织。1829年，他实施了关于首都警察直属内政部和关于在伦敦建立专门警察部队的法律。在英国其他地区警察暂时还隶属于地方当局，但是内政部有权共同领导和监督地方警察的行动。这个措施加强了资产阶级国家的警察权力。——第516页。
- 277 1818年在英国议会中提出了一项1819年才批准的法案，根据这项法案，英格兰银行必须从1823年起恢复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工作。银行券兑换黄金的工作实际上到1821年就已经完全恢复了（参看注55）。——第516页。
- 278 1842年的关税改革以后，降低了谷物和一系列进口商品的入口税。为了补偿国库的亏损，决定征收所得税。——第516页。
- 279 见注146。——第516页。
- 280 引自“皮尔的纪念碑”一文，这篇文章刊载于左翼宪章主义者乔治·哈尼主编的宪章派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报”（《Red Republican》）1850年8月17日第9号。——第517页。
- 281 皮由兹主义——19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英国国教会中的一个流派。这个名称是由它的创始者之一皮由兹的名字而来的，皮由兹是牛津大学的神学家，他号召在英国国教会里恢复天主教的仪式和某些天主教的教条。皮由兹主义是英国贵族阶级的斗争在宗教上的反映。英国贵族阶级当时力图保持自己在国内的影响，而反对大都属于各种新教派的工业资产阶级。——第517页。
- 282 高教会派——英国国教会中的一派，它的信仰者多半是贵族，它保持了古老的豪华的仪式，强调与天主教的传统联系。与高教会派相对立

的，是英国国教会中的另一派、低教会派，它主要是传播在资产阶级和下层神甫中间。低教会派的拥护者在礼拜时着重宣扬资产阶级基督教的道德。

非国教派——多少摆脱了正式英国国教会的教条的宗教流派的代表。——第517页。

283 指1850年9月30日的教皇训谕。——第517页。

284 见注64。——第518页。

285 在天主教会分裂期间（14—15世纪），屡次同时选出两个教皇，他们互相宣称对方是篡夺者，“反教皇者”。——第518页。

286 罗马共和国的制宪议会是在1849年1月21日选出来的；它的成员多半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即马志尼的拥护者。制宪议会剥夺了教皇的参政权并采取了一系列进步的社会措施。1849年7月罗马共和国复灭以后，大批议员逃亡到英国，由这些人在那里组成了意大利临时国民委员会；马志尼和他的拥护者参加了这个委员会。国民委员会受它的选民委托，进行有利于国家事业的贷款并处理一切有关意大利公民的问题。——第518页。

287 1850年春天，奥地利政府在伦巴第-威尼斯地区发行了1亿2000万里拉的所谓自愿公债。但是公债在居民当中没有取得任何成就，而强制推行。——第518页。

288 见注57。——第521页。

289 见注61。——第525页。

290 见注63。——第526页。

291 见注64。——第527页。

292 见注65。——第527页。

293 在1848年3月18日柏林起义胜利之后，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带着黑红黄三色袖徽在普鲁士道都大街上巡游了一番，向人们

- 表示他是统一德国的维护者。他在这一天发出的告“人民和德意志民族”书中，庄严地保证要把统一德国的事业掌握在自己的手里。——第531页。
- 294 小德意志——将德国统一为普鲁士领导的国家而把奥地利排斥在外的计划。企图实现这个计划的行动之一是1849年建立了在普鲁士国王领导下的17个德国君主的联帮。1850年这个联邦瓦解了。——第531页。
- 295 哥达党成立于1849年6月，它的成员是反革命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即在普鲁士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拒绝国民议会给他加冕和国民议会左翼多数派通过关于实行全国摄政的决议之后退出法兰克福议会的右翼自由主义者。这个党由于害怕革命的胜利，而提出下述目标：把全德国统一在霍亨索伦王朝的普鲁士的领导之下，并把奥地利排斥在外。这个党的首脑是达尔曼，西姆桑，巴塞尔曼，亨·加格恩，卡·勃律盖曼等人。——第532页。
- 296 并吞——从前服从全国政权的德国诸侯直接听命于德国较大的君主；这里是指普鲁士想领导德国各君主的企图。——第532页。
- 297 黑森-达姆斯塔特大公国和黑森-加塞尔(黑森选帝侯国)选帝侯国在1849年同意参加在普鲁士领导下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国家(普鲁士联邦)，1850年，它们在奥地利和俄国的压力之下退出联邦而投靠了奥地利。——第533页。
- 298 1850年9月，在黑森选帝侯国爆发了选帝侯和他的反动大臣哈森普弗鲁克跟议会之间的立宪冲突。哈森普弗鲁克解散了议会并宣布全国戒严，因而引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选帝侯和哈森普弗鲁克由于无力镇压这种运动，曾向重建的联邦议会和奥地利求援，虽然黑森选帝侯国已经参加了以普鲁士为首的德意志各邦的统一国家。为此，奥地利和普鲁士双方发生冲突而使两国采取了军事行动。——第534页。
- 299 欧洲民主主义中央委员会的宣言“各族人民建立民主主义的组织”最初是发表在这个团体的机关刊物“流亡者”(《Prosarit》)1850年8月号上。——第536页。

- 300 列保莱罗——莫扎特的歌剧“唐璜”中的人物，是唐璜的仆人。——第538页。
- 301 这里是暗喻30年代末反动的教权主义历史学家，政论家亨·利奥和资产阶级急进主义者，青年黑格尔分子阿·卢格之间发生的争论。利奥是黑格尔哲学的激烈的反对者，他在自己的小册子“黑格尔门徒”（《Die Hegelingen》1838年哈雷版）里指责阿·卢格和所有青年黑格尔派相信无神论，指责他们看不见神和人之间的区别。——第540页。
- 302 这个说法出自1851年1月17日“不来梅每日纪事”（《Bremer Tages-Chronik》）报上阿·卢格写的一篇通讯。这家报纸是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杜隆在1849—1850年用“每日纪事”的名字出版的，1851年1月改名为“不来梅每日纪事”。——第541页。
- 303 马克思和恩格斯退出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原因见注106和256。——第542页。
- 304 对卢格的类似的评介写在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流亡中的大人物”（见本版第8卷）中。——第542页。
- 305 “平等者宴会”，是1851年2月24日为纪念二月革命三周年在伦敦举行的国际会议。宴会的组织者是：路易·勃朗领导下的一部分法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布朗基流亡者协会的首领——巴特利米、亚当等人，还有维利希和沙佩尔宗派集团。马克思和恩格斯为了获得情报，派自己的拥护者康·施拉姆和威·皮佩尔也去参加宴会，但是他们被逐出会场，并遭到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拥护者的毒打。在监狱里的奥·布朗基把准备好的献词预先寄到了伦敦，这篇献词揭露了路易·勃朗和其他临时政府的成员。宴会的组织者故意压下了这篇献词，不让出席宴会的人知道。——第543页。
- 306 “平等者宴会”的组织者不让出席的人知道的那篇奥·布朗基的献词全文曾发表在许多法国报纸上。马克思和恩格斯把这篇献词译成了德文和英文，并且加上了简短的按语。德文译本出版了3万份，流传在德国和英国（见本卷第630—632页）。——第545页。

- 307 这篇文章是恩格斯于1851年4月写的，本来没有打算发表，恩格斯在1851年4月3日给马克思的信中曾答应写一篇文章，“从军事观点来详细阐述”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前景，并且答应写好后寄给马克思，这篇文章就是为实现这个约言而写的。手稿在恩格斯死后才于1914年首次发表在德国社会民主党的理论性机关刊物“新时代”（《Die Neue Zeit》）上。当时，手稿上的日期被弄错了，而所加的标题“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前提”也与内容不太符合。这篇手稿编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版第8卷时仍沿用了这个标题。本版的标题经过校正，已和手稿内容相吻合。——第546页。
- 308 在1792年11月6日热马普（比利时）战役中，法国军队在杜木里埃的指挥下大胜奥军。——第549页。
- 309 在杜木里埃指挥下的法国军队于1793年3月18日和奥地利元帅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在涅尔文登（比利时）交战时遭受失败。——第549页。
- 310 法国军队在1794年6月26日弗略吕斯（比利时）战役中，击溃了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这一胜利使法国革命军能够进入比利时国境，占领比利时领土。——第550页。
- 311 指1792年8月10日人民起义后组成的吉伦特派内阁。——第550页。
- 312 在1794年5月18日土哥英（法国）战役中，莫罗将军指挥的法国军队战胜了科布尔克公爵的军队。——第552页。
- 313 热月9日（1794年7月27—28日）是指那天发生的反革命政变，政变的结果是雅各宾派政府的倒台和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建立。卡诺积极参加了这一政变的准备工作。
- 果月18日（1797年9月4日）是指资产阶级政府即执政内阁在拿破仑·波拿巴支持下所进行的国家政变，政变目的是防止建立君主政体。卡诺由于接近保皇主义阴谋分子而处于危险地位，于是逃出法国。

- 雾月18日（1799年11月9日）是指拿破仑·波拿巴发动的国家政变，政变的结果是建立了他的军事专政。卡诺虽然有时也怯弱地表现了反对拿破仑的立场，但他是赞成国家政变的。——第553页。
- 314 在阿本斯堡和埃克缪尔附近的战役是1809年奥法战争时，拿破仑军队和奥地利军队1809年4月在累根斯堡（巴伐利亚）地区5日战役的两个阶段。累根斯堡战役以奥军的失败和撤退而告终。——第555页。
- 315 引自1813—1815年德国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的歌曲。——第555页。
- 316 根据普鲁士的法律，凡受过适当教育，拥有足够的钱财来购买军服、武器和支付自己伙食费用的青年人，均可成为服役一年的志愿兵。期满后，他们可以有权要求升为预备军或后备军的军官。——第563页。
- 317 “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载于宪章主义者革命派的机关报“寄语人民”1851年第7期，它是评论欧洲各国宪法的第一篇论文。杂志编辑厄·琼斯力图约一些欧洲工人民主运动的著名活动家撰写论文。本文出自马克思手笔，这从1851年5月23、25和30日琼斯给马克思的书信，以及本文和“拿破仑第三政变记”一文所作的对照中得到证实。在计划写的评论文章中另外仅仅有一篇文章“普鲁士宪法”，发表在“寄语人民”上。这篇文章不是马克思写的。——第578页。
- 318 马克思指的是1849年法国政府对罗马共和国的武装干涉。详见本卷第61—67页。——第578页。
- 319 根据法国在1819年就通过的出版法，出版物登记时，保证金的多寡则取决于它的出版期数和出版地点，保证金最高的是每周出版3期以上、在巴黎及其附近3个省出版的刊物。1850年7月23日的法律把这种最高保证金又扩大到在里昂和位于这个城市周围的罗纳省出版的刊物。——第580页。
- 320 英国宪章派在其宣传中所指的细节就是人民宪章的第2条到第6条，这几条包括如下几点要求：每年举行议会选举，议员领取薪俸，秘密投票，选区一律平等和废除议员候选人的财产资格。革命的宪章派认为这些要求是实现宪章第一条所规定的普选权的必要保证。——第589页。

321 见注257。——第605页。

322 在这次发表的1850年9月15日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的记录当中，从前仅知道马克思在他“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真相”（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2版第8卷第431页）一文中引证的摘录。此外，从1850年12月1日科伦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中也知道了这次会议通过的决议（见本卷第615页）。这个记录最初全文发表在“社会历史国际评论”1956年第1卷第2部分（《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Volume 1，part 2，1956）上。为这次发表而写的序言中说道，这个记录全文是按不知姓名的人所摄制的副本刊印的，而在注线下面注明与恩格斯写的记录底稿有出入的地方。

但是，经过对社会历史国际研究院（阿姆斯特丹）提供给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两个上述文件的摄影副本的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们断定，两个文件都只是同盟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的副本。这两个副本之中的一个是出自在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后被中央委员会派到科伦去传达中央委员会通过的决议的海·威·豪普特的手笔。第二个副本是谁摄制的，迄今还不能肯定。

本卷发表的记录全文是按照豪普特写的副本刊印的，记录的两个不同手稿副本之间的重要出入均注在注线下面。——第616页。

323 指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第616页。

324 指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第617页。

325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572—577页）是1847年12月在同盟第二次代表大会上通过的。1848年下半年，同盟伦敦中央委员会对盟章做了修改，从而削弱了这个文件的原则意义。在新盟章的第一段，代替关于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最终目的明确规定——推翻资产阶级，确立无产阶级的统治和建立没有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提出了建立社会共和国的含糊的要求。莫尔在他1848—1849年冬天去德国时曾在德国各个支部当中广泛传达了盟章。1849年3月，盟章全文在黑特采尔领导的柏林的一个支部的成员被捕时落入警察当局的手中，并在1850年8

- 月审讯黑特采尔小组时作为一个证据。1850年12月，科伦中央委员会根据马克思的指示起草了新的盟章（见本卷第626—629页）。——第617页。
- 326 指1850年3月的“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和“共产党宣言”（见本卷第288—299页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卷第461—504页）。——第617页。
- 327 山岳党是1848—1851年法国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中的一派，它代表以赖德律-洛兰为首的结合在“改革报”周围的一群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主义者的政党；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们参加了这个党。——第619页。
- 328 指路易·勃朗作为“工人的代表”参加1848年2—5月间的法国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一事。以路易·勃朗为首的工人问题政府委员会的活动没有任何实际结果，同时路易·勃朗的妥协政策使一部分工人离开了革命斗争。——第620页。
- 329 指1789—1794年的巴黎公社。公社在形式上只是城市的自治机关，而实际上它从1792年起领导了巴黎群众为实施坚决的革命措施而进行的斗争。公社在推翻君主政体，在确立雅各宾专政、执行限价的政策、通过旨在镇压反革命的嫌疑犯处治法等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在热月9日（1794年7月27日）的反革命政变后，公社组织被消灭。——第620页。
- 330 宗得崩德（特别联盟）是马克思和恩格斯给予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称呼。这个集团在1850年9月15日以后脱离共产主义者同盟，成立了单独的组织和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宗得崩德的活动帮助了普鲁士警察当局发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德国地下支部，使警察当局得到借口在1852年审讯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的著名活动家。——第625页。
- 331 共产主义者同盟章程是科伦的同盟中央委员会在1850年9月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以后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指示草拟的。1850年12月10

日，这份盟章同中央委员会的其他一些文件一起送交同盟的伦敦区部，1851年1月5日得到伦敦区部会议（马克思出席了这次会议）的批准。

盟章全文（马克思没有加标记的）在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被捕时连同其他文件一起被普鲁士警察当局劫走，并被发表在维尔穆特和施梯伯合著的“19世纪共产主义者的阴谋”（《Die Kommunisten- Verschwörungen des neunzehnten Jahrhunderts》）一书中。——第626页。

332 见注305和306。——第630页。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生平事业年表

(1849年8月——1851年7月)

1849

- 8月26日 左右马克思被逐出巴黎 来到伦敦 在这里一直住到逝世。
- 8月底—9月初 马克思和以前伦敦中央委员会一些委员重新组织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 8月底—9月 恩格斯在洛桑(瑞士)写了“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的纲要 ;在日内瓦与威·李卜克内西会晤 ,李卜克内西很快就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
- 9月初 马克思加入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领导的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
- 9月—12月 马克思紧张地准备出版继续“新莱茵报”的刊物。为了筹集经费、寻找出版商和撰稿人 ,他请求朋友和熟人们给以帮助 ,因此写信到科伦、杜塞尔多夫、法兰克福、汉堡、巴黎及其他城市去。
- 9月15日 恩格斯在伯尔尼与威·沃尔弗会晤。
- 9月17日左右 马克思的妻子和孩子从巴黎到达伦敦 ;马克思全家暂时住在莱斯特广场的住所里 ,不久就搬到伦敦近郊切尔西安德森街4号住宅。
- 9月18日 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和德国政治流亡者全体大会把马克思选入伦敦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
- 9月20日 马克思和委员会其他委员一起在第一篇为救济伦敦德

- 国流亡者募捐的呼吁书上签字 ;这篇呼吁书刊载于许多德国报纸上。
- 10月初 恩格斯根据马克思的建议 ,离开瑞士前往英国 ,以便同马克思一起工作。由于法国政府拒绝给予他过境的权利 ,他决定取道意大利前往英国。
- 10月5日 恩格斯抵热那亚 ,于10月6日由这里乘船前往英国。
恩格斯在致左派宪章主义者领袖乔·哈尼的信中说 ,他将于11月中旬到达英国 ,并请哈尼转告马克思。
- 10月中旬左右 马克思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奥·维利希会晤 ,维利希是经恩格斯的介绍从瑞士来的 ;根据马克思的建议 ,维利希参加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 1949年11月—
1850年9月 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里发表演说 ,阐述了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共产党宣言”中的主要原则。同时他在家里对共产主义者同盟的积极活动家们也多次详细地讲解了这些问题。马克思本来打算把其中一些讲稿在“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上发表 ;马克思这个意图未能实现。
- 11月10左右 经过5个星期的航行 ,恩格斯到达伦敦。
恩格斯加入了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 ;他参加了出版新刊物的准备工作。恩格斯到伦敦后不久就成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会员。
- 11月18日 由于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司徒卢威、海因岑等)企图建立自己的流亡者救济组织 ,借以把伦敦流亡者中的无产阶级分子置于自己的影响之下 ,马克思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其他领导者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全体大会上把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改组成了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大会批准了委员会的新成员 ,其中包括马

- 克思和恩格斯。
- 11月28日 恩格斯为宪章派的“北极星报”写了一篇短评“德国社会民主主义者和‘泰晤士报’”，目的是驳斥卡·海因岑污辱德国革命党的名誉的蛊惑性演说。12月1日该报登载了这篇短评。
- 12月3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参与拟定的社会民主主义德国流亡者救济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上签字。
- 12月15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草拟关于“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即将出版的“启事”。这篇“启事”载于1849年12月底—1850年初德国和瑞士各报上。
- 12月25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圣诞节。
- 12月31日 马克思、恩格斯和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其他委员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组织的新年晚会，许多国家的革命流亡者的代表，其中包括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的代表也出席了这次晚会。

1850

- 1月—2月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着手改组共产主义者同盟。
- 1月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招股启事”的起草工作。

马克思和恩格斯坚持独立组织工人的政党，拒绝参加伦敦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的领袖古·司徒卢威、鲁·施拉姆、路·班贝尔格等人预定在1月3日召开的合并会议。马克思和恩格斯说明拒绝参加的理由是被邀请人的名单是任意制定的，其中竟没有一个多年来领导伦敦德国革命流亡者的工人。

-
- 1月2日 马克思接到鲁·施拉姆第二次邀请他出席1月3日会议的请帖,他未予答复。
- 1月初 马克思写信给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勒泽尔,建议他在科伦,可能的话也在莱茵省其他城市建立同盟的支部。他指出,由于言论和出版自由实际上已被废除,必须恢复秘密同盟,因为在最近期间共产主义的宣传只能秘密进行。
- 1月初—2月初 马克思紧张地准备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写“1848—1849年”连载文章的第一篇,标题为“1848年6月的失败”。1895年恩格斯再版了这篇连载文章,标题为“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
- 1月10日 为了宣传“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杂志,筹集出版的经费以及同盟其他宣传方面所需的资金,根据马克思的提议,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决定派康·施拉姆作为同盟的特使到美国去,同时把伦敦宪章主义者和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的许多委托交付给他。马克思请求德国党内朋友们供给康·施拉姆路费。由于缺少必要的用费,康·施拉姆没有去成。
- 1月底 由于马克思生病以及他在准备杂志材料时发生许多困难,“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的付印工作拖延下来。
- 1月3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为杂志写“国际述评(一)”的主要部分。
- 2月初 勒泽尔提出一个疑问,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应根据什么材料进行宣传,马克思回答说,应当根据“共产党宣言”进行宣传,因为1847年的同盟章程已经过时,而1848年伦敦中央委员会拟定的章程这里尚未通过;新章程要在即将举行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代表大会上才能拟定出来。

- 2月2日左右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的稿件寄给汉堡出版商去排印；由于排印的困难和怕遭受迫害的出版商舒贝特本人的拖延，这一期的印刷工作进行得很缓慢。
- 2月中旬 恩格斯为宪章派的杂志“民主萨论”撰写“10小时工作制问题”一文；该文于3月2日发表。
- 2月25日 恩格斯在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为庆祝1848年法兰西共和国国庆所组织的宴会上发表演说。恩格斯在结束他的演说时，举杯祝贺巴黎1848年6月起义的参加者。
- 2月底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国际述评（一）”的补充。
恩格斯写完“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书的最后几章。
- 3月 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英国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一文。
- 3月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起草的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第二个报告，得到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大会的批准。在这个报告中，号召“德国本国的党”加紧募款，以救济革命流亡者，这篇报告发表于3月21日“西德意志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 3月6日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1期在汉堡出版。这一期载有：卡·马克思的“1848年6月的失败”一文和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前两章。
- 3月7日左右 马克思写完“1848—1849年”连载文章的第二篇，标题为“1849年6月13日”。
- 3月7日左右—3月底 马克思写“1848—1849年”连载文章的第三篇，标题为“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在这篇文章中，马克思确立了无产阶级必须同农民结成联盟的思想，并且指

- 出,革命共产主义的实质就是:宣布不断的革命,承认无产阶级的阶级专政是消灭阶级差别所必经的过渡阶段。
- 3月中旬—4月18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国际述评(二)”,主要是阐述英国经济状况。
- 3月底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2期在汉堡出版。其中载有:卡·马克思的“1848—1849年”连载文章的第二篇,标题为“1849年6月13日”,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第三章,以及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许多书评和“国际述评(一)”。
- 马克思和恩格斯合写第一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这篇文件总结了1848—1849年的德国革命,尖锐地批评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号召大家加强同盟并建立独立的无产阶级政党,制定了无产阶级在即将到来的革命中的斗争策略。“同盟书”中包含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的基本原理。
- 3月底—4月初 为了实现各地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改组,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同盟中央委员会派亨·鲍威尔作为特使去德国,并让他带去“告同盟书”的原文。
- 4月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维利希作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代表同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和革命宪章主义者保持经常的联系;他们参加了把这3个组织的代表联合起来的“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的创立工作。
- 马克思写“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一文。
- 由于未付房租,马克思的家具被查封;全家只好暂住旅馆,不久便迁到第恩街64号的住宅。
- 4月5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为庆祝罗伯斯比尔的生日而组织的国际大会。恩格斯在演说中号

- 召说,必须对英国人的革命传统给以应有的评价,并强调指出,象平等派这种党派早在英国革命时期就产生了,在结束演说时,他举杯祝贺英国工人。康·施拉姆同恩格斯一样,代表德国共产主义者发表了演说,在演说中捍卫了马克思关于必须实行工人专政以便完全消灭阶级和产生阶级的一切社会条件的思想。他在结束自己的演说时,举杯祝贺法国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奥古斯特·布朗基。
- 4月9日—5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了许多信给约·魏德迈和特·舒斯泰尔,请他们在德国组织募款工作来援助德国流亡者。
- 约4月中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所领导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派德朗克作为特使赴瑞士,并委托他同在苏黎世的威·沃尔弗一起恢复和巩固共产主义者同盟的支部,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导的“革命集中”这一秘密组织的阴谋活动进行斗争。德朗克还被派往巴登和共产主义者同盟地方组织建立联系。
- 4月中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一文,这篇文章向无产阶级政党揭露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这个典型代表人物在法庭上的胆怯行为。
- 日左右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三期在汉堡出版。其中载有:卡·马克思的“1848—1849年”连载文章的第三篇,标题为“1849年6月13日事件的后果”和弗·恩格斯的“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的最后一章。
- 4月20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代表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草拟一篇声明,驳斥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们所散布的诽谤讨论。这篇声明载于4月28日“新德意志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
- 4月23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委员会其他委员在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正式报告上签字，报告中揭穿了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司徒卢威、博布钦、在施托尔佩的鲍威尔等人反对无产阶级政党的阴谋诡计。报告的最后号召德国社会民主党不要使流亡者在物质上处于困境。这个报告载于5月10日“北德意志自由报”以及其他报纸上。
- 约5月间 马克思和恩格斯受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的委托和匈牙利流亡者的左翼建立联系。
- 5月1日左右 恩格斯写信给威·沃尔弗，转达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给他的任务：监视“革命集中”的活动，系统地把它的情况汇报给中央委员会。
- 5月6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警告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者之一帕迪贡，不要同司徒卢威领导下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协会接近，并且预告说，不然，共产主义者同盟将和布朗基主义者协会断绝友好关系。
- 约5月中旬 马克思在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组织的一次郊游中，认识了被瑞士驱逐出境然后到伦敦来的威·李卜克内西。
- 5月19日左右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第四期出版。这一期载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合写的书评，“国际述评（二）”和“哥特弗利德·金克尔”，以及马克思的“路易-拿破仑和富尔德”和恩格斯的“英国10小时工作制法案”两篇文章。
- 6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第二篇“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详细地报道了比利时、德国、瑞士、法国和英国的组织的情况，并对同盟的基层小组作了策略和组织方面的指示。
- 6月14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以及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其他委员在一篇声明上签字，这篇声明驳斥了小资产阶级

- 流亡者的领袖们对委员会提出的诬蔑性控告。声明载于6月25日“西德意志报”及其他报纸上。
- 马克思和恩格斯寄给英国的“太阳报”，“旁观者”，“地球”报，“北极星报”一些公开信，信中抗议英国政府在普鲁士政府的坚决要求下对伦敦的政治流亡者实行警察监视，抗议英国反动集团企图在英国恢复外侨管理法。
- 6月25日 马克思写了一篇声明给法兰克福的“新德意志报”编辑奥·吕宁，批评他对“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所写的书评曲解了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专政的原理。
- 恩格斯也针对奥·吕宁的那篇书评给“新德意志报”写了一篇声明，在这篇声明中，他坚持了自己对“新莱茵报”的如下评价，即这是一个坚定地卫护无产阶级在1848—1849年德国革命中的革命立场的唯一刊物。
- 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声明发表于7月4日的“新德意志报”。
- 约7月间 马克思利用关于英国和欧洲大陆的价格史、银行系统史和经济危机史方面的专门著作，以及全套伦敦的“经济学家”杂志，深入地研究了近10年来的经济史。
- 7月 马克思和恩格斯领导的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为流亡者建立宿舍、食堂并且为需要工作的人建立生产作坊。
- 7月3日以后 马克思和恩格斯接到德朗克向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做的报告，报告详细地叙述了他在加强瑞士同盟方面的活动以及同“革命集中”的领导者进行谈判的情况。马克思为了卫护无产阶级政党的独立性，建议中央委员会拒绝“革命集中”提出的关于合并的提议。
- 7月30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伦敦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

- 的其他委员在关于1850年5月、6月和7月委员会工作的报告上签字。这个报告发表于8月7日“德意志自由报”。
- 7月底 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里,马克思、恩格斯和中央委员会大部分委员同维利希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原因是后者要求在组织上靠近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组织。
- 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说,1847年的经济危机已成过去,在资产阶级社会的生产力开始普遍繁荣和蓬勃发展的条件下,根本谈不上真正的革命。对形势所作的这种新估计在“国际述评(三)”中得到了阐述,它决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新策略路线,即无产阶级政党逐步地细心地准备未来的革命战斗。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里开始捍卫这个策略。
- 8月27日—28日左右 在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会议上,维利希和以马克思为首的委员会的多数派发生了剧烈的冲突。维利希声明退出委员会。
- 在翌日召开的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大会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地批评了在会上声明退出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维利希。
- 夏末 恩格斯写完了“德国农民战争”,他在这本书里尽力想在反动势力开始猖獗的情况下,使德国人民意识到自己的革命传统。
- 9月10日 恩格斯出席了“民主派兄弟协会”大会,这次大会是为了向巴克莱、彼尔金斯啤酒厂中痛打了匈牙利人民的刽子手奥国元帅海瑙的工人表示支持而召开的。恩格斯在他的演说中感谢英国工人给了他的同乡海瑙以应有的教训。
- 9月10日—15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亨·鲍威尔和普芬德声明退出社

- 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设立的工作检查委员会认为收支单据完备无误。
- 9月15日 马克思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上尖锐地批评维利希和沙佩尔不正确地估计了政治局势，从而采取了冒险政策。马克思指出，他们用“革命的”词句代替了对现实关系的唯物主义的 analysis。会上发生了分裂。委员会的多数支持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路线。不顾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反对，决定把中央委员会迁往科伦，科伦区部受命组织新中央委员会。
- 9月17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科伦共产主义者9月14日的来信，信中要求他根据所发生的事件修改“共产党宣言”，然后进行再版，要求他完成政治经济学的写作，因为出版这本书对宣传工作有很大意义。
- 9月17日 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退出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因为协会大部分委员都站在维利希和沙佩尔的一边。
- 9月18日 马克思、恩格斯以及亨·鲍威尔和卡·普芬德在社会民主主义流亡者委员会的最后一个报告（从1850年8月1日至9月10日）上签字。这个报告发表于9月27日的“德意志伦敦报”。
- 9月24日 马克思通过中央委员会特使豪普特写信告诉科伦的勒泽尔，共产主义者同盟发生了分裂。
- 9月28日左右 马克思接到勒泽尔9月25日的来信。信中说，由于伦敦发生分裂，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区域委员会初步同意担负中央委员会的职责，并且要求把一切必要的文件和地址寄去。
- 9月底—10月初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给自己党内朋友威·沃尔弗，约·魏德迈，恩·德朗克等人的信中谈到共产主义者同盟所发生的分裂。

-
- 马克思重又执笔写那本1844年春就打算动笔的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著作。他经常到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去研究约·斯·穆勒,约·富拉顿,罗·托伦斯,托·图克及其他经济学家的著作。
- 10月 恩格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写一篇文章。这篇文章的目的是反对集聚在“晚邮报”周围的一部分以前的青年黑格尔派发表的无政府主义演说。原稿没有完成。
- 10月9日 拥护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亚当·维迪尔和巴特尔米提议,在一起讨论关于“世界革命共产主义者协会”今后是否存在的问题,马克思和恩格斯声明拒绝这个建议,理由是这个协会实际上已不存在。
- 约10月间 马克思帮助埃卡留斯为“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撰写和校审“伦敦裁缝业,或大小资本的斗争”一文,并给这篇文章写了编者按。
- 11月1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写完“国际述评(三)。从5月至10月”,这篇文章分析了英国、法国、美国和德国这个时期的经济发展和政治事件,指出革命运动未来的变化,批判了欧洲小资产阶级民主派首领的冒险计划。
- 11月9日 宪章派的机关报“红色共和党人报”开始登载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英译本。
- 11月11日 以马克思和恩格斯为首的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向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提议,把在伦敦创立的进行分裂活动的组织的领导人,如维利希、沙佩尔、谢特奈尔、迪茨、列曼、格贝尔特和弗伦克尔等从盟内开除出去,并将此事通报全盟。
- 11月中旬 恩格斯迁居曼彻斯特,重新参加“欧门-恩格斯”公司

- 的工作,主要是想在物质上帮助马克思,使他能够继续研究经济理论。从这时起,马克思和恩格斯之间几乎每日都有信件往来。
- 11月29日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最后一期合刊(5—6)在汉堡出版,其中刊载了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写的“国际述评(三)从5月至10月”,弗·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并且转载了“共产党宣言”的第三章。
- 11月底 恩格斯在曼彻斯特着手系统地研究军事问题。
- 1850年11月底—1851年2月 马克思同科伦和汉堡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以及出版商们商谈以季刊形式继续出版“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问题。
- 12月 马克思同科伦的海·贝克尔通信,商谈出版自己的文集的问题。
马克思全家迁居索荷广场第恩街28号。
- 12月3日后 马克思接到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豪普特关于汉堡同盟状况的报告。
- 12月18日 马克思接到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送来的1850年12月1日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和同盟新章程草案。
- 12月30日 马克思及其夫人和不久前来到伦敦的恩格斯参加了“民主派兄弟协会”举行的新年晚会。恩格斯在他的讲话中详尽地说明了大陆上革命失败的原因。
- 12月底 恩格斯开始学习俄文。
- 1 8 5 1
- 1月—12月 马克思继续紧张地研究政治经济学;经常去大英博物馆图书馆;同出版商商谈出版他的批判资产阶级政治

- 经济学和探讨无产阶级经济理论的著作。
- 1月5日 马克思参加共产主义者同盟伦敦区部的会议，会上批准了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中央委员会提出的新章程。
恩格斯出席曼彻斯特宪章主义者大会。在大会上，特地从伦敦赶来的厄·琼斯捍卫了左派宪章主义者的纲领。
- 1月8日左右 恩格斯通知马克思说，他打算在曼彻斯特最革命的宪章主义者中宣传“共产党宣言”中的思想。
- 1月27日 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声明，驳斥“不来梅每日纪事”1月17日登载的阿·卢格的文章对“新莱茵报”以及马克思和恩格斯进行的恶毒攻击。这篇声明寄给了不来梅“威塞尔报”编辑部，但未予刊载。
- 1月底—二月初 恩格斯为哈尼编辑的宪章派的机关报“人民之友”写了一系列文章，内容是反对领导欧洲民主派中央委员会的一些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如马志尼、赖德律- 罗兰、卢格等人。
- 2月12日 恩格斯告诉马克思说，他参加建立曼彻斯特左派宪章主义者新的地方组织的工作。
- 2月中旬 马克思和恩格斯表示不赞成哈尼参加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路易·勃朗等人）与维利希、沙佩尔和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一起于2月11日召集的国际大会，因为他们对马克思、恩格斯及其拥护者进行了肆意诽谤。由于哈尼参加了这个会议，恩格斯取回了为他的“人民之友”杂志所写的文章。
- 2月21日 马克思劝告革命宪章主义者厄·琼斯不参加路易·勃朗和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与维利希和沙佩尔集团为纪念1848年二月革命三周年而共同举行的国际大会，即“平等者宴会”。

-
- 2月24日 为了获取情报，马克思派康·施拉姆和威·皮佩尔出席国际“平等者宴会”。维利希和沙佩尔的拥护者将施拉姆和皮佩尔逐出大厅，并把他们毒打了一顿。
- 2月26日 恩格斯得到马克思的同意，给哈尼写了一封信，尖锐地谴责了哈尼参加“平等者宴会”以及接近维利希和沙佩尔的行为。
- 2月28日 马克思向科伦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报道了2月24日的“平等者宴会”的详细情况，并要求他们把这些情况广泛地传达给德国工人。
- 3月3日—4日左右 恩格斯到马克思这里来了几天，为的是采取一些行动来揭露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朗多尔夫，路易·勃朗，沙佩尔，维利希及其拥护者在2月24日的宴会上所表现的行为。马克思和恩格斯把奥古斯特·布朗基寄给“平等者宴会”而被宴会组织者隐藏起来的献词译成英文和德文。附有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序言的献词德译文印数达3万册，广泛传布于德国和英国。
- 3月5日 恩格斯请求“泰晤士报”编辑发表他揭露“平等者宴会”的组织者的一封公开信，他并且随信附上布朗基的献词英译文。这封信“泰晤士报”没有发表。
- 4月 恩格斯完成标题为“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一文的手稿。在这部军事著作中，恩格斯第一次对军事学术的发展作了唯物主义的解释。
- 4月—5月初 马克思和海·贝克尔通信，商谈出版他的“哲学的贫困”一书德译本的问题。该书未能出版。
- 4月—5日 马克思研究关于利用电力来提高土壤肥沃程度的问题的著作。
- 4月2日左右 马克思在给丹尼尔斯的信中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哲学观

-
- 点,他认为,丹尼尔斯还没有完全摆脱费尔巴哈的影响。
- 4月底 海·贝克尔发行的“卡尔·马克思文集”第一册在科伦出版。其中包括“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一文和1842年所写的第一篇论文“第六届莱茵省议会的辩论”的一部分。由于海·贝克尔被捕,第一册问世后出版即告停顿。
- 5月24日—28日左右 马克思从德国收到许多关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彼·诺特容克、海·贝克尔、彼·勒泽尔的被捕和被加上叛国罪名的消息,他把这消息告诉了恩格斯。为了同科伦保持联系,马克思与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贝尔姆巴赫律师经常通信。
- 5月底 为了满足丹尼尔斯的请求,马克思表示愿意替他的人类学文集作序,并且表述了如下的思想:“共产主义者应当指出,只有在共产主义关系下,工艺学上已经达到的真理方能在实践中实现”。
- 6月上半月 为了支持厄·琼斯出版“寄语人民”杂志,马克思撰写“法兰西共和国宪法”一文。该文发表于6月14日的“寄语人民”杂志。马克思和恩格斯虽然这时已同哈尼绝交,但是仍然继续为琼斯编辑的一些宪章派的机关报撰稿,帮助琼斯写了一些文章,进行了这些机关报的一般编辑工作。
- 7月31日 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中说,他打算同威·沃尔弗一起为德国美国报界编写通讯稿。恩格斯在回信中支持这个计划,认为这是“以石印方法继续出版‘新莱茵报’”的一个机会。

人名索引

二 画

丁盖尔施泰特, 弗兰茨(Dingelstedt, Franz 1814—1881)——男爵, 德国诗人和作家, 最初是小资产阶级反对派政治诗的代表者, 40年代中叶为宫廷剧作家; 君主主义者。——第237页。

四 画

巴罗, 奥迪隆(Barrot, Odilon 1791—1873)——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2月以前是自由主义王朝反对派的领袖; 1848年12月—1849年10月领导秩序党(君主专制派的反革命联盟)所支持的内阁。——第17、41、52—54、57—60、65、76、83、86、88、245页。

巴赫, 瓦尔特(Bach, Walter)——德国雇佣兵, 曾参加1525年德国南部的农民起义; 阿尔部农军的领袖之一; 在起义的紧要关头叛卖了农民, 逃匿于瑞士。——第465、467页。

巴里特, 艾利修(Burritt, Elihu 1810—1879)——美国语言学者, 资产阶级慈善家和和平主义者, 曾组织过许多国际和平代表大会。——第515页。

巴托里, 斯蒂凡(Bathory, Stephan 死于1535年)——德兰西瓦尼亚大封建家族的代表; 曾指挥镇压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军队。——第433页。

巴拉盖·狄利埃, 阿希尔(Baraquay d'

Hilliers, Achille 1795—1878)——法国将军, 第二共和时期的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 波拿巴主义者。——第83页。

巴涅尔, 洛朗·安都昂(Pagnerre, Laurent Antoine 1805—1854)——法国出版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1848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第63页。

巴罗什, 比埃尔·茹尔(Baroche, Pierre Jules 1802—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 法学家, 第二共和时期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 秩序党信徒; 1849年任上诉法庭总检察官, 波拿巴主义者, 1851年政变前后曾数度入阁。——第107页。

巴师夏, 弗雷德里克(Bastiat, Frederic 1801—1850)——法国庸俗经济学家, 资本主义的辩护士。——第13页。

巴尔贝斯, 阿尔芒(Barbès Armand 1809—1870)——法国革命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领导人之一; 1848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制宪议会的议员, 因参加1848年5月15日事件被判处无期徒刑, 1854年大赦时被释放。——第60、107、319、544、587页。

巴特爾米, 艾曼纽尔(Barthelémy, Emmanuel 约1820—1855)——法国工人, 布朗基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和1848年巴黎六月起义时期秘密革命团体的参加者, 后流亡英国, 曾为伦敦法国布

- 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的领导人之一,1855年因刑事罪被处死刑。——第485页。
- 巴斯蒂德,茹尔(Bastide, Jules 1800—1879)——法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资产阶级共和派报纸“国民报”的编辑之一(1836—1846);曾任外交部长(1848年5—12月)。——第45页。
- 巴黎伯爵——见路易·菲力浦·阿尔伯。
- 巴登侯爵——见菲力浦一世。
- 韦埃,雅科布(W ehe, Jacob 死于1525年)——莱普海姆的传教士,闵采尔的信徒;1525年是莱普海姆农军的领袖之一;农军失败后被杀。——第419、445、449、455页。
- 韦尔登,弗兰茨·路德维希(W elden, Franz Ludwig 1782—1853)——男爵,奥地利将军,1848年参加向革命的意大利进军;在镇压1848年10月起义后任维也纳卫戍司令;1849年4—5月指挥镇压匈牙利革命的奥地利军队。——第554页。
- 韦冈德(W eigand 1522—1556)——班堡主教,镇压1525年法兰克尼亚起义农民的组织者之一。——第464页。
- 戈克,阿曼特(Gögg, Amand 1820—1897)——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委员;70年代倾向德国社会民主党人。——第167、210页。
- 戈尔盖,阿尔都尔(Görgey, Arthur 1818—1916)——1848—1849年为匈牙利革命军事活动家,匈牙利军队总司令(1849年4—6月);曾依靠反动军官和资产阶级中的反革命派,对革命战争实行怠工。——第170页。
- 丹东,若尔日·雅克(Danton, George Jacques 1759—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之一;雅各宾党人右翼领袖。——第147、301页。
- 扎波略,亚诺什(约翰)(Z rny, Janos 1487—1540)——德兰斯凡尼亚州长;曾率领军队镇压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1526年被封为匈牙利国王。——第433页。
- 日拉丹,艾米尔·德(Girardin, Emile de 1806—1881)——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在30—60年代曾断续地担任“新闻报”编辑,以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1848年革命前反对基佐政府,在革命期间是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曾任立法会议员(1850—1851),1850年为所谓的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117、330—342、488、523页。
- 不伦瑞克公爵,卡尔·威廉·斐迪南(Herzog von Braunschweig, Karl- Wilhelm- Ferdinand 1735—1806——)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统率奥匈军队,进攻革命的法国。——第546页。
- 文迪施格雷茨,阿尔弗勒德(W indischgrätz, Alfred 1787—1862)——公爵,奥地利元帅,1848年指挥镇压布拉格和维也纳的起义;1848—1849年率领奥地利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第554页。
- 比尔,维克多(Pilhes, Victor)——法国记者,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改革报”的拥护者,第二共和时期是立法会议员。——第315页。

五 画

- 邓宾斯基, 亨利克 (Dembinski, Henrik-1791—1864)——波兰将军,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1848—1849年革命时期是匈牙利革命军的领袖之一。——第132、152页。
- 弗洛孔, 斐迪南 (Flocon, Ferdinand 1800—186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改革报”编辑之一, 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17、327、630页。
- 弗里兹, 彼得 (Fries, Peter)——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的委员; 后来流亡瑞士。——第360页。
- 弗洛里安——见格莱泽尔, 弗洛里安。
- 弗龙兹堡, 格奥尔格 (Fruntsberg, Georg 1473—1528)——土瓦本联盟的德国雇佣军司令; 曾参加镇压1525—1526年土瓦本和萨尔茨堡大主教辖区的农民起义。——第467、477页。
- 弗兰格尔, 弗里德里希·亨利希·恩斯特 (Wrangel, Friedrich Heinrich Ernst 1784—1877)——将军, 普鲁士反动军阀的主要代表之一; 1848年11月参加柏林反革命政变和解散普鲁士国民议会。——第595页。
- 弗伦克尔 (Fränkel)——在伦敦的德意志工人, 1847年是共产主义者同盟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参加者, 1849—1850年为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同盟分裂后参加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625页。
- 弗洛里斯的 (卡拉布里亚的) 约阿希姆 (Joachim of Floris [Calabria] 约1132—1202)——意大利神甫, 中世纪神秘主义者, 宣传基督“再临”的思想; 他的学说被天主教会宣布为异教徒学说。——第411页。
- 弗朗斯瓦一世 (François I 1494—1547)——法国国王 (1517—1547)。——第332、442页。
- 弗里德里希二世 (Friedrich II 1712—1786)——普鲁士国王 (1740—1786)。——第248、553、559、560、565页。
- 弗里德里希三世 (Friedrich III 1463—1525)——萨克森选帝侯 (1486—1525); 路德的保护人, 闵采尔的迫害者。——第407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 (Friedrich-Wilhelm II 1744—1797)——普鲁士国王 (1786—1797)。——第546页。
- 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 (Friedrich-Wilhelm IV 1795—1861)——普鲁士国王 (1840—1861)。——第154、254、255、266、372、531—533页。
- 卡贝, 埃蒂耶纳 (Cabet, Etienne 1788—1856)——法国政论家, 空想的和平共产主义的卓越代表人物, “伊加利亚旅行记”的作者。——第31、323页。
- 卡诺, 拉查尔·尼古拉 (Carnot, Lazare Nicolas 1753—1823)——法国数学家和物理学家, 政治和军事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倾向雅各宾党人, 1794年参加热月9日的反革命政变。——第106、546、552、553、573页。
- 卡诺, 拉查尔·伊波利特 (Carnot, Lazare Hippolyte 1801—1888)——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

- 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教育部部长，制宪议会议员；秩序党的坚决反对者。——第106、107、350页。
- 卡莱尔,托马斯(Carlyle,Thomas 1795—1881)——英国作家,历史学家,宣扬英雄崇拜的唯心主义哲学家,观点和40年代封建社会主义相近,站在反动的浪漫主义立场批判英国的资产阶级,后来倾向托利党,1848年后成为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工人运动的露骨的敌人。——第300—305、308—310页。
- 卡季米尔(Casimir 1481—1527)——勃兰登堡-安斯巴赫侯爵,霍亨索伦王朝法兰克尼亚的代表;血腥地镇压安斯巴赫和洛腾堡农民-市民起义的组织者。——第460—464页。
- 卡尔利埃,比埃尔(Carlier, Pierre 1799—1858)——巴黎警察局长(1849—1851),波拿巴主义者。——第100、101、343页。
- 卡利埃尔,摩里茨(Carri e, Maritz 1817—1895)——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美学教授。——第237页。
- 卡普菲格,让·巴蒂斯特·奥诺莱·雷蒙(Capefigue, Jean Paptiste Honor   Raymond 1802—1872)——法国政论家和历史学家;君主主义者。——第118、524页。
- 卡芬雅克,路易·欧仁(Cavaignac, Louis Eug  ne 1802—1857)——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侵略阿尔及利亚的参加者,1848年二月革命后是阿尔及利亚总督,以在战争中采取野蛮手段著称;从1848年5月起为法国陆军部长,极端残酷地镇压巴黎工人的六月起义,曾为政府首脑(1848年6—12月)。——第35、36、40、44、45、48—52、56、58、63—65、71、78、557、591页。
- 布龙,卡尔(Bruhn, Karl生于1803年)——德国记者,流亡者同盟和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50年被开除出盟;曾担任汉堡拉萨尔派机关报“北极星报”的编辑。——第36Q、361页。
- 布林德,卡尔(Blind, Karl 1826—1907)——德国记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为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50年代是伦敦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后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159、167、596、598页。
- 布尔格-贝恩海姆,格莱哥尔(Burg-Bernheim, Gregor)——1525年安斯巴赫侯爵领地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第462页。
- 布赫尔,洛塔尔(Bucher, Lothar 1817—1892)——普鲁士官吏,政论家;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中间派左翼;1848年革命失败后流亡伦敦;后为民族自由主义者,支持俾斯麦。——第355页。
- 布莱特,约翰(Bright, John 1811—1889)——英国厂主,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自由贸易论者,反谷物法同盟创立者之一;自60年代末起为自由派政党领袖之一;曾历任自由党内阁的大臣。——第91、270页。
- 布莱阿,让·巴蒂斯特·菲德尔(Brea, Jean Baptiste Fidele 1790—1848)——法国将军,反动分子,曾参加镇压1848年的六月起义,为起义者枪决。——第70页。
- 布朗基,路易·奥古斯特(Blanqui, Louis Auguste 1805—1881)——法

- 国革命家，空想共产主义者，密谋活动的倡导者，秘密的“四季社”和1839年5月12日起义的组织者；1848年革命时期站在法国无产阶级民主运动极左翼的立场，曾被多次判处徒刑。——第31、60、104、106、107、319、326、366、543、544、587、630页。
- 布朔特，让·巴蒂斯特·诺艾尔 (Bouchotte, Jean Baptiste Noël 1754—1840) —— 法国军官，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活动家，雅各宾党人，陆军部长（1793—1794）。——第552、573页。
- 布鲁姆，亨利 (Brougham, Henry 1778—1868) —— 英国法学家和文学家，辉格党的卓越活动家，上议院议长（1830—1834）。——第515页。
- 布伦坦诺，罗仑兹 (Brentano, Lorenz 1813—1891) —— 巴登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职业是律师；1848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的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领导巴登临时政府，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来流亡美国。——第158、159、162—165、168—170、174、175、204、210、228、233、235页。
- 布伦克尔，路德维希 (路易) (Blenker, Ludwig 1812—1863) —— 退伍的德国军官，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来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29、183—186、194、198、219、224、226、228页。
- 布阿吉尔贝尔，比埃尔 (Boisguillebert, Pierre 1646—1714) —— 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前驱者，法国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创始人，著有“法国评论”（《Le détail de la France》）和其
- 他许多经济学著作。——第95页。
- 布里西亚的阿尔诺德 (Arnoldus Brixien-sis 约1100—1155) —— 意大利中世纪改革家，城市下层群众反对罗马和其它城市的教皇与教会封建主运动的思想家；以异教徒名义被处死。——第401、402页。
- 瓦尔道，麦克斯 (Waldau, Max 1825—1855) —— 理查·格奥尔格·豪恩席尔特的笔名，德国作家。——第237页。
- 瓦尔德克，贝奈狄克特·弗兰茨·利奥 (Waldeck, Benedictus Franz Leo 1802—1870) —— 德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激进主义者，职业是律师；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副议长和左派领导人之一；后为进步主义者。——第255、351页。
- 瓦尔纳瓦 (巴尔纳巴什) (Barnabè) —— 匈牙利牧师，1514年匈牙利农民战争的积极参加者。——第432页。
- 加尔涅-帕热斯，路易·安都昂 (Garnier-Pages, Louis Antoine 1803—1878) —— 法国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员和巴黎市长。——第327、630页。
- 加格恩，亨利希 (Gagern, Heinrich 1799—1880) —— 男爵，德国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温和的自由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和议长，属于中间派右翼，曾任帝国首相（1848年12月—1849年3月），1849年5月后为哥达党的领袖之一。——第515、532页。
- 加累尔，阿伯特 (Galeer, Albert 1816—1851) —— 瑞士教师和文学家，民主主义者，1847年曾参加反对瑞士宗得崩德的战争，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的起义。——第356页。

- 加特雷尔 (Gatterer) —— 见恩格哈尔特, 马格达琳娜·菲莉萍娜。
- 汉泽曼, 大卫 (Hansemann, David 1790—1864) —— 大资本家, 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 1848年3—9月任普鲁士财政大臣, 实施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 第137页。
- 汉诺威王朝 (The Dynasty of Hanover) —— 英国的王朝 (1714—1901)。—— 第248页。
- 皮尔, 罗伯特 (Peel, Robert 1788—1850) —— 英国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温和派的领袖, 曾任内政大臣 (1822—1827和1828—1830) 和首相 (1841—1846), 在自由党的支持下废除了谷物法 (1846)。—— 第498、516、517页。
- 古德省, 米歇尔 (Goudchaux, Michel 1797—1862) —— 法国银行家, 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1848年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 第42页。
- 古格尔-巴斯提安 (Gugel- Bastian 死于1514年) —— 1514年巴登侯爵领地农民密谋的组织者, 在夫赖堡被杀害。—— 第432页。
- 卢格, 阿尔诺德 (Ruge, Arnold 1802—1880) —— 德国政论家, 青年黑格尔分子, 资产阶级激进派, 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50年代是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领袖之一, 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 第535、539—542页。
- 本生, 克利斯提安·卡尔·约西亚斯 (Bun- sen, Christian Karl Josias 1791—1860) —— 男爵, 普鲁士外交家, 政论家和神学家, 接近普鲁士宫廷, 曾任驻伦敦大使 (1842—1854)。—— 第374、382、515页。
- 司徒卢威, 古斯塔夫 (Struve, Gus- tav 1805—1870) ——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新闻记者; 1848年巴登起义和1849年巴登- 普法尔茨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巴登委员会委员; 革命失败后离开德国; 流亡英国的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导人之一; 曾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 第129、159—162、165、185、212—214、356、358、361、609、610页。
- 尼古拉一世 (Николай II 1796—1855) —— 俄国皇帝 (1825—1855)。—— 第260、503、515、554、566页。
- 石特拉塞尔, 弗里德里希 (Strasser, Friedrich) —— 奥地利艺术家, 1848年奥地利革命的参加者, 1849年为巴登- 普法尔茨革命军的中校。—— 第198页。

六 画

- 艾特尔, 汉斯 (Eitel, Hans) —— 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湖军(士瓦本)的领袖; 曾同特鲁赫泽斯签订魏茵加腾条约, 条约签订后解散了自己的军队。—— 第444页。
- 艾释黎, 安东尼 (Ashley, Anthony 1801—1885) —— 英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 大地主, 40年代在议会中领导托利党的慈善派。—— 第270、277、280、284页。
- 艾韦贝克, 奥古斯特·海尔曼 (Ewerbeck, August Hermann 1816—1860) —— 德国医生和文学家, 正义者同盟巴黎组织的领导者,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退盟。—— 第365页。
- 艾森胡特, 安东 (Eisenhut, Anton 死于1525年) —— 艾宾根 (普法尔茨) 的神甫; 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为当地农民和

- 市民起义的领袖。——第458页。
- 艾希费特, 卡尔 (Eichfeld, Karl) —— 退伍的巴登军上尉, 属于民主派, 1849年是巴登临时政府的陆军部长。——第165页。
- 多札, 迪约尔吉 (格奥尔格) (Dóza, Georg 约1474—1514) —— 德兰斯瓦谢克列尔区的小贵族; 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 起义失败后被贵族严刑拷问。——第432、433页。
- 多札, 格莱哥尔 (Dóza, Gregor 死于1514年) —— 迪约尔吉·多札之弟, 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参加者; 同其兄一起被俘处死。——第433页。
- 多尔 (Doll) ——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莱茵普鲁士人, 推销员; 1848年巴登共和派起义的参加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的师长。——第226、227、231页。
- 多尔图, 麦克斯 (Dortu, Max 1825—1849) —— 德国革命民主主义者, 退伍的普鲁士军官, 柏林1848年3月18日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被普鲁士战地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第352页。
- 迈斯纳, 阿尔弗勒德 (Meiner, Alfred 1822—1885) —— 德国民主派作家, 在40年代中叶是“真正社会主义”诗人的代表; 后为自由主义者。——第237页。
- 迈尔霍弗 (Mayerhofer) —— 1849年为巴登临时政府国防部副部长, 曾采取背叛行动, 拒绝执行必要的军事措施。——第160、165页。
- 达拉什, 阿伯特 (Darasz, Albert 1808—1852) —— 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波兰流亡者民主组织的积极活动家, 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第535页。
- 达来朗-贝里戈尔, 沙尔·莫里斯 (Talleyrand - Périgord, Charles Maurice 1754—1838) —— 公爵, 著名的法国外交家, 曾任外交部长(1797—1799, 1799—1807, 1814—1815); 法国出席维也纳会议的代表(1814—1815); 以自私和政治上毫无原则著称。——第353页。
- 安 (Anne 1665—1714) —— 英国女王(1702—1714)。——第248页。
- 安东 (Anton 1489—1544) —— 洛林公爵(1508—1544); 血腥地镇压1525年亚尔萨斯农民起义的组织者; 宗教改革的反对者。——第474页。
- 安内克, 弗里德里希 (Anneke, Friedrich 1818—1872) —— 普鲁士的炮兵军官; 1846年因政治信仰被革除军职;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 1848年为“新科伦报”编辑; 1849年任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中校, 后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部方面。——第181、182、211页。
- 列曼, 阿伯特 (Lehmann, Albert) —— 在伦敦的德国工人, 正义者同盟和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 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50年同盟分裂后参加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625页。
- 列萨日, 阿兰·勒奈 (Lesage, Alain René 1668—1747) —— 法国作家, 著名小说“圣蒂利扬的日利·布拉斯的冒险故事”的作者。——第319页。
- 列米尼耶, 让·路易·欧仁 (Lerminier, Jean Louis Eugène 1803—1857) —— 法国法学家和奥尔良派政论家, 30年代末为保守主义者, “法兰西学院”比较法教授(1831—1839), 由于学生抗议而高

- 职。——第61页。
- 圭茨 (Götz) —— 见贝利辛根, 圭茨·冯。
- 圭茨, 克利斯提安 (Götz, Christian 1783—1849) —— 奥地利将军; 1848—1849年镇压意大利和匈牙利革命的参加者。——第554页。
- 吉拉尼, 弗里德里希·威廉 (Ghillany, Friedrich Wilhelm 1807—1876) —— 不大著名的德国历史学家和神学家。——第237页。
- 吉纳尔, 奥古斯特·约瑟夫 (Guinard, August Joseph 1799—1874) —— 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为制宪议会议员, 曾积极参加1849年6月13日山岳党的发动。——第107页。
- 亚当 (Adam) —— 法国工人, 布朗基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的秘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 1850年为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第485、606页。
- 亚历山大一世 (Александр I 1777—1825) —— 俄国皇帝 (1801—1825)。——第554页。
- 齐茨, 弗兰茨 (Zitz, Franz 1803—1877) —— 德国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1849年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129、183、185、188、217页。
- 齐赫林斯基 (Zychlinski) —— 德勒斯顿五月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第204、208、222页。
- 托梅 (Thome) —— 巴登团长, 1849年任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师长, 在运动末期采取投降立场。——第219页。
- 西蒙, 路德维希 (Simon, Ludwig 1810—1872) —— 特利尔的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曾流亡瑞士。——第243、246页。
- 毕若·德·拉·比贡利, 托马·罗伯尔 (Bugeaud de la Piconnerie, Thomas Robert 1784—1849) —— 法国元帅; 七月王朝时期的下议院议员, 奥尔良党人, 1848—1849年为阿尔卑斯山部队的总司令; 立法议会议员。——第54页。
- 华斯哥·达·加马 (Vasco da Gama 1469—1524) —— 葡萄牙航海家, 1497—1498年发现绕过非洲到达印度的航路。——第386页。
- 伏尔泰, 弗朗斯瓦·玛丽 (Voltaire, François Marie 1694—1778) —— 法国自然神论哲学家, 讽刺作家, 历史学家, 18世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的卓越代表, 反对专制制度和天主教。——第85页。
- 伊文思, 戴维·莫利厄 (Evans, David Morier 1819—1874) —— 英国经济学家。——第499页。

七 画

- 克尼格, 阿道夫 (Knigge, Adolphe 1752—1796) —— 德国作家。——第240页。
- 克尔纳, 海尔曼·约瑟夫·阿洛伊斯 (Körner, Hermann Joseph Alois 1805—1882) ——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画家;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爱北斐特1849年5月起义的领袖之一; 起义被镇压后流亡瑞士, 后又流亡美国。——第360页。
- 克洛泽, 格 (Klose, G) —— 伦敦的德国

- 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时期拥护马克思。——第484页。
- 克鲁格，威廉·特劳戈特(Krug Wilhelm Traugott 1770—1842)——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第237页。
- 克雷通，尼古拉·约瑟夫(Creton, Nicolas Joseph 1798—1864)——法国律师；第二共和时期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奥尔良党人。——第94页。
- 克莱米约，阿道夫(Cremieux, Adolphe 1796—1880)——法国律师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40年代的自由主义者；1848年革命时期为临时政府委员，第二共和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第17、63、630页。
- 克伦威尔，奥利弗(Cromwell, Oliver 1599—1658)——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为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化的贵族的领袖，1653年起为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的摄政。——第252、301页。
- 克雷门特(Clement)——军官，1849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营长。——第205、208页。
- 克诺普夫(Knopf)——见施米德，约尔克。
- 克尼里姆(Knierim)——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营长。——第211、212、213页。
- 克洛普什托克，弗里德里希·哥特利勃(Klopstock, Friedrich Gottlieb 1724—1803)——德国诗人，德国资产阶级启蒙运动初期的代表人之一。——第241页。
- 杜克累尔，欧仁(Duderc, Eugène 1812—1888)——法国记者和政治活动家，“国民报”编辑(1840—1846)，1848年5—6月任财政部长。——第63页。
- 杜邦·德·累尔，雅克·沙尔(Dupont de l'Eure, Jacques Charles 1767—1855)——法国政治活动家，自由主义者；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和1830年革命的参加者；40年代是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为临时政府主席。——第17、630页。
- 杜山-路维杜尔，弗朗斯瓦·多米尼克(Dit Toussaint Louverture, François Dominique 1743—1803)——海地黑人革命运动的领袖，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反抗西班牙和英国的统治。——第53页。
- 杜班，安得列·玛丽·让·雅克(Dupin, André Marie Jean Jacques 1783—1865)——法国法学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立法会议长(1849—1851)；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117、523页。
- 杜波蒂，米歇尔·奥古斯特(Dupoty, Michel August 1797—1864)——法国政论家，曾参加共和主义民主派的许多报纸的出版工作。——第315页。
- 杜弗尔，茹尔·阿尔芒·斯坦尼斯拉(Dufaure, Jules Armand Stanislas 1798—1881)——法国律师，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48年是制宪议会的议员，1848年10—12月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内政部长。——第48、51、93页。
- 杜木里埃，沙尔·弗朗斯瓦(Dumouriez, Charles François 1739—1823)——18世纪末资产阶级革命时期的法国将军和政治活动家，吉伦特派；1792—1793年指挥北部的革命军队；1793年3月背叛革命。——第549页。

- 贝姆, 约瑟夫 (Bem, Joseph 1795—1850) —— 波兰将军, 民族解放运动的活动家, 1830—1831年起义的参加者; 1848年参加维也纳革命斗争; 匈牙利革命军领导者之一; 后在土耳其军队服务。——第152页。
- 贝克尔, 麦克斯·约瑟夫 (Becker, Max Joseph 死于1896年) —— 莱茵省的工程师, 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 流亡瑞士, 后又到美国。——第198、199页。
- 贝克尔, 约翰·菲利浦 (Becker, Johann Philipp 1809—1886) —— 制刷工人, 30—40年代参加德国和瑞士民主运动, 曾参加反对宗得崩德的战争; 1848—1849年革命的积极活动家; 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指挥巴登人民自卫团, 1848—1849年革命后转向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立场, 60年代是第一国际的积极活动家, 曾参加第一国际的各次代表大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165、214、216、225—232页。
- 贝尼高 (Bernigau 死于1849年) —— 科伦民主主义者, 曾为普鲁士军官, 1848—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1849年被战地军事法庭判处死刑。——第352页。
- 贝海姆, 汉斯 (Boheim, Hans 死于1476年) —— 牧人, 尼克拉斯豪森的人民传教士, 维尔茨堡主教辖区及其附近地区的农民运动的鼓吹者; 后被烧死。——第420—423页。
- 贝利耶, 比埃尔·安都昂 (Berryer, Pierre Antoine 1790—1868) ——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第二共和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正统主义者。——第87页。
- 贝利辛根, 圭茨·冯 (Berlichingen, Götz von 1480—1562) —— 德国骑士, 曾企图利用1526年农民起义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被选为华美农军首领, 在紧要关头出卖了农民。——第449—451、460、461页。
- 贝泽勒尔, 威廉·哈特维希 (Beseler, Wilhelm Hartwig 1806—1884) —— 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1848年为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临时政府的首脑; 法兰克福国民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第533页。
- 亨利四世 (Henri IV 1553—1610) —— 法国国王 (1589—1610)。——第249页。
- 亨利五世 (Henri V) —— 见尚博尔, 昂利·沙尔。
- 亨利八世 (Henry VIII 1491—1547) —— 英国国王 (1509—1547)。——第251页。
- 沃邦, 塞巴斯提安·勒·普雷特 (Vauban, Sébastien le Prestre 1633—1707) —— 法国元帅, 军事工程师, “王室什一税” (《La Dime royale》) 的作者。——第95页。
- 沃尔弗, 斐迪南 (Wolff, Ferdinand) —— 德国政论家, 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年革命后逃离德国, 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拥护马克思; 后来脱离了政治活动。——第484页。
- 沃尔弗, 威廉 (Wolff, Wilhelm 1809—1864) —— 德国无产阶级革命家, 职业是教师, 西里西亚农奴的儿子; 学生运

- 动的参加者,1834—1839年被关在普鲁士监狱,1846—1847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通讯委员会委员;1848年3月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1849年为“新莱茵报”编辑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361页。
- 沃尔波尔,罗伯特(Walpole, Robert 1676—1745)——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领袖,曾任首相(1721—1742);依靠议会的多数建立了不受国王控制的内阁制;曾经广泛行贿。——第249页。
- 希普勒,文德尔(Hipler, Wendel 死于1526年)——德国贵族,1525年参加法兰克福尼亚农民起义;“海尔布朗纲领”的主要起草人;农民起义失败后逃走,1526年被捕,死在狱中。——第448、451、458—461页。
- 希尔什菲尔德,摩里茨(Hirschfeld, Moritz 1791—1859)——普鲁士将军,1849年进攻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者的军团司令。——第195页。
- 沙佩尔,卡尔(Schapper, Karl 约1812—187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9年2—5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6年重又和马克思接近;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第218、625、630页。
- 沙佩勒尔,克利斯托夫(Schappeler, Christoph 1472—1551)——神学博士,宗教改革的拥护者,1524—1525年属于梅明根(上士瓦本)平民反对派。——第419、466页。
- 里奥泰,卡尔·尼古劳斯(Riotte, Karl Nico laus 约生于1816年)——德国民主主义者,律师,1849年普鲁士议会议员,爱北斐特1849年5月起义时的安全委员会委员;后流亡美国。——第146页。
- 里哈尔特(Richard 1467—1531)——特利尔的选帝侯和大主教(1511—1531),宗教改革的激烈反对者,曾参加镇压1522—1523年的骑士起义和1525年的农民起义。——第440、464页。
- 李嘉图,大卫(Ricardo, David 1772—1823)——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最著名的代表人之一。——第340、538页。
- 李卜克内西,威廉(Liebknecht, Wilhelm 1826—1900)——德国工人运动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创始人和领袖之一;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484页。
- 利奥,亨利希(Leo, Heinrich 1799—1878)——德国历史学家和政论家,极端反动的政治和宗教观点的辩护人,普鲁士容克地主的思想家之一。——第540页。
- 严森,约翰·约瑟夫(Jansen, Johann Joseph 1825—1849)——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8年为科伦工人联合会的活动家之一,哥特沙克的支持者;因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被枪杀。——第352页。
- 孚赫,茹尔(尤利乌斯)(Faucher, Jules 1820—1878)——德国政论家,青年黑格尔分子;德国自由贸易的积极拥护者,50年代初叶宣传资产阶

- 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观点。——第339、487页。
- 门钦根, 斯蒂凡 (Menzingen, Stephan 死于1525年)——德国骑士; 1525年3月领导洛腾堡小市民和平民起义; 起义失败后被处死。——第448、464页。
- 谷兹科夫, 卡尔 (Gutzkow, Karl 1811—1878)——德国作家, “青年德意志”文学团体的代表人物之一, 1838—1842年为“德意志电讯”杂志的编辑。——第237页。
- 狄摩西尼 (Demosthenes 公元前384—322)——古希腊的大演说家和政治活动家。——第87页。
- 辛格尔汉斯 (辛格尔, 汉斯) (Singerhans)——“穷康拉德”同盟的领导人, 1514年士瓦本山区和维尔腾堡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第430页。
- ### 八 画
- 拉托, 让·比埃尔 (Rateau, Jean Pierre 1800—1887)——法国律师, 第二共和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波拿巴主义者。——第58、61页。
- 拉斐德, 玛丽·约瑟夫·保尔 (Lafayette, Marie Joseph Paul 1757—1834)——法国将军,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是大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第550页。
- 拉伊特, 让·厄内斯特 (La Hitte, Jean Ernest 1789—1878)——法国将军, 波拿巴主义者; 曾任外交部长 (1849—1851)。——第106页。
- 拉菲特, 雅克 (Laffitte, Jacques 1767—1844)——法国大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分子, 金融资产阶级的代表。——第12页。
- 拉马丁, 阿尔丰斯 (Lamartine, Alphonse 1790—1869)——法国诗人, 历史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40年代为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1848年任外交部长, 是握有实权的临时政府的首脑。——第17、23、31、35、520、537、630页。
- 拉科夫 (Rakow)——军官, 曾参加1848年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解放战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巴登革命军凯则尔苏顿营营长。——第194页。
- 拉吉耶, 费里克斯 (Raguilliet, Felix 1778—1863)——1830—1831年波兰起义军总参谋长, 流亡法国,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曾代理普法尔茨武装部队总司令职务。——第181页。
- 拉斐尔·桑蒂 (Raffaello Santi 1483—1520)——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的伟大画家。——第313页。
- 拉布曼, 弗兰茨 (Rabmann, Franz 死于1525年)——人民传教士, 闵采尔的信徒, 曾参加黑森林和克列特部的农民和平民起义; 1525年秋被俘处死。——第419页。
- 拉弗连齐——见梅萨罗什, 拉弗连齐。
- 拉克罗斯, 倍尔特兰·特奥巴特·约瑟夫 (Lacroix, Bertrand Thobald Joseph 1796—1865)——法国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路易·波拿巴任总统时期是公共工程部长; 1850年起为波拿巴主义者。——第78页。
- 拉德茨基, 约瑟夫 (Radetzky, Joseph 1766—1858)——伯爵, 奥地利元帅, 1831年起指挥在意大利北部的奥地利军队, 1848—1849年残酷镇压意大利的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第555、

- 556页。
- 拉莫里诺, 吉罗拉莫 (Ramorino, Gerónimo 1792—1849) —— 意大利将军, 意大利 1848—1849 年革命时期指挥皮蒙特军队, 采取叛变的策略, 使反革命的奥地利军队获得了胜利。——第 555 页。
- 拉斯拜尔, 弗朗斯瓦 (Raspail, François 1794—1878) —— 卓越的法国学者, 自然科学家, 政论家和社会主义者, 靠近革命无产阶级; 曾参加 1830 年和 1848 年革命, 制宪议会议员。——第 18、31、44、51、60 页。
- 拉罗什雅克兰, 昂利·奥古斯特·若尔日 (La Rochejaguelein, Henri Auguste George 1805—1867) —— 侯爵, 法国政治活动家, 参议院议员、正统派领袖之一, 1848 年是制宪议会议员; 后为第二帝国时的参议员。——第 19 页。
- 阿斯通, 路易莎 (Aston, Luise 1814—1871) —— 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德国女作家。——第 237 页。
- 阿拉戈, 多米尼克·弗朗斯瓦 (Arago, Dominique François 1786—1853) —— 法国著名天文学家, 物理学家和数学家;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七月王朝时期的共和主义者, 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 积极支持镇压巴黎无产阶级的六月起义。——第 630 页。
- 阿伦特, 恩斯特·摩里茨 (Arndt, Ernst Moritz 1769—1860) —— 德国作家, 历史学家, 语言学家; 曾积极参加德国人民反对拿破仑统治的解放战争; 仍未摆脱民族主义的束缚; 主张君主立宪; 1848 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中间派右翼。——第 255、352 页。
- 阿尔伯 (Albert 1815—1895) (本名为亚历山大·马丁) —— 法国工人, 社会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曾领导秘密革命组织, 1848 年为临时政府委员。——第 17、20、33、314—317、319、323、327、630 页。
- 阿尔巴, 费南多·阿瓦勒斯 (Alba, Fernando Alvarez 1507—1582) —— 公爵, 尼德兰的西班牙总督; 16 世纪尼德兰资产阶级革命时极其残酷地镇压人民起义。——第 443 页。
- 阿尔勃莱希特三世 (Albrecht III 1443—1500) —— 萨克森公爵; 曾率领讨伐军镇压 1491—1492 年尼德兰人民起义和 1497 年弗里西安农民起义。——第 423 页。
- 罗, 约翰 (Law, John 1671—1729)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和财政学家, 曾任法国财政大臣 (1719—1720); 以发行纸币进行投机活动最后彻底破产而闻名。——第 493 页。
- 罗素, 约翰 (Russell, John 1792—1878) —— 英国国家活动家, 辉格党领袖, 曾任首相 (1846—1852 和 1865—1866)。——第 514 页。
- 罗赫纳, 格奥尔格 (Lochner, Georg 1798—1882) —— 德国语言学家。——第 237 页。
- 罗尔巴赫, 叶克莱恩 (Rohrbach, Jaeklein 死于 1525 年) —— 1525 年法兰克福尼亚农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以坚决反对贵族著称; 根据特鲁赫赫斯的命令被处以酷刑。——第 448—454 页。
- 罗伯斯比尔, 马克西米利安 (Robespierre, Maximilien 1758—1794) —— 18 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杰出活动家, 雅各宾派的领袖, 革命政府的首领。——第 46、147、543 页。

- 帕西, 伊波利特·菲利贝尔 (Passy, Hippolyte Philibert 1793—1880)——法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 奥尔良党人, 七月王朝时期曾多次参加政府, 第二共和时期担任财政部长。——第86、93页。
- 帕希, 让·尼古拉 (Pache, Jean Nicolas 1746—1823)——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 曾任陆军部长 (1792年10月—1793年1月), 巴黎市长 (1793年2月—1794年5月)。——第552、573页。
- 帕麦斯顿, 亨利·约翰 (Palmerston, Henry John 1784—1865)——英国国家活动家, 最初是托利党人, 1830年起为辉格党的领袖之一, 依靠该党右派; 曾任外交大臣 (1830—1834, 1835—1841和1846—1851), 内政大臣 (1852—1855) 和首相 (1855—1858 和 1859—1865)。——第515、518页。
- 帕斯凯维奇, 伊万·费多罗维奇 (Паскевич, Иван Федорович 1782—1856) 俄国元帅, 曾指挥俄国军队镇压 1830—1831 年的波兰起义; 1849年又指挥俄国军队镇压匈牙利革命。——第554、566页。
- 波拿巴, 日罗姆 (Bonaparte, Jérôme 1784—1860)——拿破仑第一之弟, 威斯特伐里亚国王 (1807—1813)。——第87页。
- 波拿巴, 拿破仑·约瑟夫·沙尔·保尔 (Bonaparte, Napoleon Joseph Charles Paul 1822—1891)——日罗姆·波拿巴之子, 路易·波拿巴的堂兄弟, 第二共和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第87页。
- 波伊克尔, 爱德华·冯 (Peucker, Eduard von 1791—1876)——普鲁士将军, 曾任帝国政府陆军大臣 (1848—1849), 1849年指挥帝国军队同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作战。——第139页。
- 苏, 欧仁 (Sue, Eugène 1804—1857)——法国作家, 著有一些小市民的伤感的社会小说。——第101、115、117、521、523页。
- 苏路克, 法斯廷 (Soulouque, Faustin 约 1782—1867)——黑人, 海地共和国总统, 1849年自封为皇帝, 号法斯廷一世。——第53页。
- 苏沃洛夫, 亚历山大·瓦西里也维奇 (Суворов, Александр Васильевич 1730—1800)——伟大的俄国元帅。——第556页。
- 奈, 埃德加尔 (Ney, Edgar 1812—1882)——法国军官, 波拿巴主义者, 路易·波拿巴总统的副官。——第86页。
- 奈克尔, 雅克 (Necker, Jacques 1732—1804)——法国政治活动家, 18世纪70—80年代曾数度被任命为财政总管, 在资产阶级革命前夕曾企图进行某些改革。——第263页。
- 奈林格尔 (Nerlinger)——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曾参加1849年奥芬堡民主运动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第228页。
- 尚博尔, 昂利·沙尔 (Chambord, Henri Charles 1820—1883)——伯爵, 波旁王朝长系的最后代表, 查理十世之孙, 法国王位僭望者, 自封亨利五世。——第85、121、527页。
- 尚加尔涅, 尼古拉·安·德奥杜尔 (Changarnier, Nicolas Anne Théo dule 1793—1877)——法国将军和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君主主义者; 第二共和时期为制

- 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1848年6月后为巴黎卫戍部队和国民自卫军司令，曾参加驱散巴黎1849年6月13日的示威游行。——第54、61、72、79、84、120、124、125、526、529、530、531页。
- 居比耶尔，阿梅德·路易（Cubières, Amédée Louis 1786—1853）——法国将军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39年和1840年任陆军部长，1847年因营私舞弊被降职。——第93页。
- 居茨拉夫，卡尔·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Gützlaff, Karl Friedrich August 1803—1851）——在中国的德国传教士。——第264、265页。
- 弥勒，汉斯（Müller, Hans 死于1525年）——1525年黑森林农民的领袖；背叛农民起义；起义失败后被处死。——第441、442、444、465页。
- 弥勒，雅科布（Müller, Jakob）——德国法学家，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基尔海姆博兰登民政委员；起义被镇压后流亡美国。——第188页。
- 法卢，阿弗列德（Falloux, Alfred 1811—1886）——法国政治活动家和作家，正统主义者和教权主义者，1848年解散国家工厂的发起者和镇压巴黎六月起义的鼓吹者，曾任教育部长（1848—1849）。——第53、64、77、86页。
- 采尔，弗里德里希（Zell, Friedrich 1814—1881）——特利尔律师，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第139页。
- 劳麦，弗里德里希（Raumer, Friedrich 1781—1873）——德国反动的历史学家。——第237页。
- 雨果，维克多（Hugo, Victor 1802—1885）——法国的伟大作家，第二共和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第87、118、524页。
- 叔尔茨，卡尔（Schurz, Karl 1829—1906）——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曾流亡瑞士，后为美国国家活动家。——第361页。
- 金克尔，哥特弗利德（Kinkel, Gottfried 1815—1882）——德国诗人和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被普鲁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逃出监狱后流亡英国；在伦敦的小资产阶级流亡者的领袖之一，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第204、220、222、351—354页。
- 芬奈尔·冯·芬奈堡，丹尼尔（Fenner von Fenneberg, Daniel 1820—1863）——奥地利军官，1848年维也纳国民自卫军司令，后为普法尔茨革命军司令和参谋长，占领兰都要塞的计划失败后被撤职。——第181页。
- 林普尔克（Limpurg）——法兰克尼亚的伯爵家族。——第451、452页。
- 庇护九世（Pius IX 1792—1878）——罗马教皇（1846—1878）。——第64、86、302、517、518页。
- 姆尼夫斯基，泰奥菲尔（Mniewski, Theophile 1809—1849）——波兰革命家，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团长，1849年在拉施塔特被普鲁士战地军事法庭枪决。——第209页。
- 舍夫茨别利，安东尼（Shaftesbury, Anthony 1671—1713）——伯爵，英国哲学家，道德论者，自然神论的卓越代表，政治活动家，辉格党人。——第249页。

九 画

施蒂纳，麦克斯（Stirner, Max 1806—

- 1856)——卡斯巴尔·施米特的笔名;德国哲学家,青年黑格尔分子;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之一。——第339、487—490页。
- 施拉姆,鲁道夫(Schramm, Rudolph 1813—1882)——德国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年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革命后流亡英国;反对马克思;60年代时拥护俾斯麦。——第355、356页。
- 施拉姆,康拉德(Schramm, Conrad 约1822—1858)——德国革命家,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起流亡伦敦,“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的发行人,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支持马克思;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和战友。——第6、484、601页。
- 施林凯,路德维希(Schlinke, Ludwig)——普鲁士退伍军官,商店职员,1848年布勒斯劳革命发动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军需官。——第231页。
- 施佩特,迪特利希(Spät, Dietrich 死于1536年)——德国贵族,特鲁赫泽斯讨伐军的队长。——第454、457、461页。
- 施米德,约尔克(Schmid, Jorge 死于1526年)——绰号叫“克诺普夫”,上土瓦本的农民;1525年农民战争的参加者,阿尔都农军的领袖之一;农军失败后被处死。——第467页。
- 施米特,乌尔利希(Schmidt, Ulrich)——铁匠,1525年土瓦本农民起义的巴尔特林根农军领袖。——第444页。
- 施术特,尼古拉斯(Schmitt, Nicolaus 约1806—1860)——德国记者和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任普法尔茨革命临时政府的内政部长,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第189页。
- 施奈德,弗兰茨(Sznayle, Franz 1790—1850)——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将军。——第181—183、187、192、193、197、209、212页。
- 施特劳斯,大卫·弗里德里希(Strau, David Friedrich 1808—1874)——德国哲学家和政论家,著名的黑格尔左派分子,1866年后成为民族自由主义者。——第301页。
- 施奈德尔,格奥尔格(Schneider, Georg)——法国雇佣军的退伍军官;曾参加“鞋会”的密谋,1513年准备上莱茵的农民起义,未获成功。——第427页。
- 施特恩堡,亚历山大·冯(Sternberg, Alexander von 1806—1868)——男爵,德国反动作家,美化中世纪封建贵族社会。——第237页。
- 施托尔希,尼克拉斯(Storch, Nicholas)——茨威考的织工,16世纪初是再洗礼派的地方教派的首脑,在闵采尔的影响下成为反对教会和世俗封建主的人民起义的鼓吹者。——第411页。
- 施托费尔(Stoffel)——1513年上莱茵和黑森林“鞋会”的农民密谋的组织者之一;密谋暴露后即隐匿。——第427页。
- 勃朗,路易(Blanc, Louis 1811—1882)——法国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者,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领袖之一,历史学家,1848年临时政府成员和卢森堡委员会主席;采取同资产阶级妥协的立场,1848年8月流亡英国。——第17、19、20、24、29、31、33、41、42、65、70、106、308、543、544、630页。
- 勃鲁姆,罗伯特(Blum, Robert 1807—

- 1848) —— 德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记者; 领导法兰克福国民议会中的左派; 1848年10月参加维也纳保卫战; 反革命军占领维也纳后被杀害。—— 第129、185页。
- 勃拉迪耶, 比埃尔 (Pradie, Pierre 1816—1892) —— 法国律师, 资产阶级共和党人, 第二共和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曾写一本小册子来捍卫共和国, 反对路易·拿破仑。—— 第261页。
- 勃律盖曼, 卡尔·亨利希 (Brüggemann, Karl Heinrich 1810—1887) —— 德国资产阶级政论家, 自由主义者; 1845—1855年为“科伦日报”主编。—— 第532页。
- 勃兰登堡-安斯巴赫, 侯爵—— 见卡季米尔。
- 勃兰登堡, 弗里德里希·威廉 (Brandenburg, Friedrich Wilhelm 1792—1850) —— 伯爵, 普鲁士将军, 普鲁士反动内阁的头脑 (1848—1850)。—— 第595页。
- 科布顿, 理查 (Cobden, Richard 1804—1865) —— 英国厂主, 资产阶级政治活动家, 自由贸易论者, 反谷物法同盟的发起人之一, 曾参加许多和平代表大会, 如1850年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代表大会。—— 第91、262、263、286、514页。
- 科贝特, 威廉 (Cobbett William 1762—1835) —— 英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著名的小资产阶级激进主义的代表, 为争取英国政治制度民主化而斗争。—— 第301页。
- 科苏特, 拉约什 (Kossuth, Louis 1802—1894) —— 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 在1848—1849年革命中领导资产阶级民主派, 匈牙利革命政府的首脑; 革命失败后逃出匈牙利。—— 第168、178、193、203、561页。
- 科尔文-维尔苏比茨基, 奥托 (Corvin-Wiersbitzki, Otto 1812—1886) —— 普鲁士退伍的陆军中尉, 民主主义者, 曾参加1848年巴登共和派起义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 拉施塔特的总参谋长。—— 第216页。
- 科西迪耶尔, 马尔克 (Caussidiere, Marc 1808—1861) —— 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34年里昂起义的参加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组织者之一; 1848年二月革命后担任巴黎警察局长, 制宪议会的议员, 1848年6月流亡英国。—— 第24、42、70、313、316—319、324—329页。
- 威廉 (Wilhelm 约1470—1541) —— 斯特拉斯堡主教 (1506—1541); 1525年参加镇压美因兹教区的农民起义。—— 第464页。
- 威尔塞 (W elser) —— 15—16世纪奥格斯堡商人和银行家, 曾贷款给欧洲的许多君主。—— 第443页。
- 威灵顿, 阿瑟 (Wellington, Arthur 1769—1852) —— 公爵, 英国统帅, 国家活动家, 托利党人, 曾任首相 (1828—1830)。—— 第516、553页。
- 威克利夫, 约翰 (Wycliffe, John 约1320—1384) —— 英国宗教改革家; 市民和骑士利益的代表者; 曾为建立独立的不受罗马控制的英国教会而斗争, 天主教会宣布他为异教徒。—— 第402、404页。
- 威廉一世 (Wilhelm I 1797—1888) —— 普鲁士亲王, 普鲁士国王 (1861—1888), 德国皇帝 (1871—1888)。—— 第

- 195、203、368页。
- 胡斯, 杨 (Hus, Jan 约1369—1415) ——捷克宗教改革的领袖, 布拉格大学教授, 捷克民族解放运动的鼓吹者; 被控告为异教徒, 被火烧死; 捷克人民的民族英雄。——第402。
- 胡登, 乌尔利希·冯 (Hutten, Ulrich von 1488—1523) ——德国人道主义诗人, 宗教改革的拥护者, 德国骑士阶级的思想家之一, 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参加者。——第407、437—440、464页。
- 胡登, 弗罗文 (Hutten, Frowen) ——乌尔利希·冯·胡登的堂兄弟, 服务于美因兹选帝侯宫廷; 1525年参加镇压农民起义。——第464页。
- 胡布马伊埃, 巴尔塔扎尔 (Hubmaier, Balthasar 死于1528年) ——瓦尔茨胡特的神甫, 神学博士, 闵采尔的拥护者, 鼓吹人民的宗教改革, 被火烧死。——第418、441页。
- 查基, 米克洛什 (Csaky, Miklos 死于1514年) ——恰纳德主教; 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时被起义者所杀。——第433页。
- 查理 - 阿尔伯特 (Charles - Albert 1798—1849) ——皮蒙特国王 (1831—1849)。——第65、554页。
- 查理一世 (Charles I 1600—1649) ——英国国王 (1625—1649), 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被处死。——第251页。
- 查理十世 (Charles X 1757—1836) ——法国国王 (1824—1830)。——第107页。
- 哈尼, 乔治·朱利安 (Harney, George Julian 1817—1897) ——英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 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 “北极星报”、“红色共和党人”、“人民之友”、“民主评论”以及其他宪章派刊物的编辑, 和马克思、恩格斯有联系。——第485、519、606页。
- 哈贝伦, 威廉 (Habern, Wilhelm) ——普法尔茨元帅, 普法尔茨路易选帝侯的司令; 曾参加镇压1525年普法尔茨的农民起义。——第452、464页。
- 哈菲兹, 沙姆谢丁·穆罕默德 (Hafitz, Shems - ed - Deen Mohammed 约1300—1389) ——波斯大诗人, 塔吉克文学的古典作家, 塔吉克人。——第239页。
- 哈森普弗鲁克, 汉斯·丹尼尔 (Hassenpflug, Hans Daniel 1794—1862) ——德国反动的国家活动家, 1832年为黑森选帝侯国的司法大臣和内政大臣, 1850年任内阁总理, 专制主义的拥护者。——第534页。
- 迪茨, 奥斯渥特 (Dietz, Oswald 约1824—1864) ——维斯巴登的德国建筑家,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 曾流亡伦敦, 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 同盟分裂后参加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 后来参加美国内战。——第625页。
- 迪斯累里, 本杰明, 贝肯斯菲尔德伯爵 (Disraeli, Benjamin, Earl of Beaconsfield 1804—1881) ——英国国家活动家和作家, 在40年代参加“青年英国”社, 后成为保守党领袖, 1868年和1874—1880年任首相。——第497页。
- 迪特利希施坦, 济格蒙德 (Dietrichstein, Sigismund 1484—1540) ——施梯里亚总督; 帝国军司令, 曾镇压1515—1516年奥地利阿尔卑斯山区的农民起义, 1525年起义时期被起义者俘掳, 后被释放。——第434、476页。
- 洛克, 约翰 (Locke, John 1632—1704) ——

著名的英国二元论哲学家，感觉论者，资产阶级经济学家。——第249页。

洛歇尔(Lorcher)——维尔腾堡乌尔利希公爵顾问。——第431页。

济格尔，弗兰茨(Sigel, Franz 1824—1902)——巴登退伍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巴登革命运动的参加者，曾任总司令，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时期为巴登革命军副总司令；流亡瑞士和英国；1852年迁居美国，站在北部方面积极参加美国内战。——第157、164、219、224—232、360、361页。

济金根，弗兰茨·冯(Sickingen, Franz von 1481—1523)——德国骑士，曾参加宗教改革运动；为1522—1523年骑士起义的领袖。——第407、437、440、481页。

约翰(Johann 1468—1532)——萨克森公爵，1525年起为萨克森选帝侯；闵采尔的迫害者之一，镇压1525年图林根农民起义的组织者。——第415页。

约斯，弗里茨(Joss, Fritz 约死于1517年)——16世纪初德国南部农民的秘密组织和密谋活动的杰出组织者。——第426、429、435页。

耶拉契奇，约瑟夫(Jellacic, Joseph 1801—1859)——伯爵，奥地利将军，克罗地亚总督，积极参加镇压匈牙利和奥地利的1848—1849年革命。——第595页。

柏拉图(Plato 公元前约427—约347)——古希腊唯心主义哲学家，奴隶主贵族的思想家。——第47页。

契尔奈尔，赛米尔·埃尔德曼(Tzschirner, Samuel Erdmann 约1812—1870)——德国律师，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时期萨克森

议会中极左派的领袖，德勒斯顿1849年五月起义的领导者之一，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后又流亡英国。——第189页。

十 画

格雷，乔治(Grey, George 1799—1882)——英国国家活动家，辉格党人，内政大臣(1846—1852，1855—1858和1861—1866)和殖民大臣(1854—1855)。——第284页。

格朗丹，维克多(Grandin, Victor 1797—1849)——法国厂主，众议院议员(1839—1848)；第二共和时期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态度最保守。——第12页。

格尔伯，艾拉兹姆(Gerber, Erasmus 死于1525年)——1525年亚尔萨斯起义农民的领袖之一；起义失败后于萨比林附近被俘牺牲。——第473页。

格尔伯，脱伊斯(Gerber, Thues)——斯图加特市民军(1525年同维尔腾堡费尔巴赫尔起义军合并)的领袖，维尔腾堡农民起义失败后逃往埃斯林根。——第454、457页。

格律恩，卡尔(Grün, Karl 1817—1887)——德国政论家，在40年代中叶是“真正的社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1848—1849年革命时期为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普鲁士国民会议员。——第351页。

格莱泽尔，弗洛里安(Greisel, Florian)——牧师，1525年士瓦本农民战争的积极参加者；士瓦本农民签订魏茵加腾条约后隐居于瑞士。——第455页。

格奥尔格(Georg 1471—1539)——萨克森公爵(1500—1539)；镇压图林根起义

- 农民的组织者之一。——第417页。
- 格贝尔特, 奥古斯特 (Gebert, August) —— 梅克伦堡的木匠, 瑞士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曾迁往伦敦, 共产主义同盟分裂后参加了维利希和沙佩尔的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625页。
- 格雷贝尔, 康拉德 (Grebel, Conrad) —— 苏黎世再洗礼派的领导人, 闵采尔的信徒, 在德国南部曾进行革命的宣传。——第418、419页。
- 格兰尼埃·德·卡桑尼亚克, 阿道夫 (Granier de Cassagnac, Adolph 1806—1880) —— 法国记者, 无原则的政论家, 1848年革命前是奥尔良党人, 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第二帝国时期为立法团的代表。——第118、524页。
- 格兰梅尼尔 (Grandmenil) —— 法国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活动家, “改革报”的创始者和发行人之一。——第316页。
- 格莱纳, 路德维希 (Greiner, Ludwig) —— 德国法学家,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是普法尔茨革命临时政府的委员; 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 后转美国。——第188、189、360页。
- 马拉, 让·保尔 (Marat, Jean Paul 1743—1793) —— 法国政论家,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雅各宾党人的领袖之一。——第543页。
- 马利, 亚历山大 (Marie, Alexandre 1795—1870) ——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 1848年为临时政府公共工程部长, 后为卡芬雅克政府的司法部长。——第29、630页。
- 马克思, 卡尔 (Marx, Karl 1818—1883) (传记材料)。——第5、154、166、167、169、171、343、347、357、358、369—379、381、382、484、485、541、542、599、600、604、606、609、611、614、616、620—622、624页。
- 马尔歇 (Marche) —— 法国工人, 1848年代表人民要求临时政府实行劳动法。——第19页。
- 马特维 (约1468—1540) —— 1519年起为萨尔茨堡大主教; 主张残酷地迫害宗教改革的拥护者和血腥地镇压1525年的起义农民和市民。——第475、447页。
- 马志尼, 朱泽培 (Mazzini Giuseppe 1805—1872) —— 意大利革命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意大利民族解放运动的领袖之一, 1849年是罗马共和国临时政府首脑, 1850年是伦敦欧洲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组织者之一。——第518、535、539、544页。
- 马蒂约·德·拉·德罗姆, 菲利浦·安都昂 (Mathieu de la Drôme, Philippe Antoine 1808—1865) —— 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第二共和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会议员, 倾向山岳党; 1851年政变后流亡比利时。——第61页。
- 马拉斯特, 阿尔芒 (Marrast, Armand 1801—1852) —— 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 温和的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的领袖之一, “国民报”编辑, 1848年为临时政府委员和巴黎市长, 制宪议会议长 (1848—1849)。——第31、40、44、46、48、63、71、72、260、318、323、520、630页。
- 马格德堡大主教 —— 见恩斯特第二。
- 马克西米利安一世 (Maximilian I 1459—1519) —— 德国皇帝 (1493—1519)。——第426、434、443页。
- 秦恩, 克利斯提安 (Zinn, Christian) ——

-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凯则尔斯劳顿的记者，1849年普法尔茨革命军上尉。——第193、223页。
- 泰勒，瓦特 (Tylei, W at 死于1381年)——1381年英国最大的一次农民起义的领袖。——第404页。
- 泰霍夫，古斯达夫·阿道夫 (Tehow, Gustav Adolphe 1813—1893)——普鲁士军官，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柏林1848年革命事件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军总参谋长，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是瑞士“革命集中”流亡者联合会的领导人之一；1852年迁澳大利亚。——第182、212页。
- 泰列基，伊什特万 (Teleki, Istvan 死于1514年)——匈牙利枢密官，后为司库，1514年农民起义时被起义者所杀。——第433页。
- 埃尔瓦·夏尔德 (Aylva Sjøerd)——1497年法国农民起义的领袖。——第423页。
- 埃卡留斯，约翰·格奥尔格 (Eccarius, Johann Georg 1818—1889)——德国裁缝，正义者同盟盟员，后为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后来参加英国工联主义运动。——第484、486页。
- 埃克尔曼，约翰·彼得 (Eckermann, Johann Peter 1792—1854)——德国作家，“同歌德晚年时期的谈话”一书的作者和出版者。——第237页。
- 埃梅尔曼，卡尔 (Emmermann, Karl)——莱茵省的林务官，曾指挥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分队；革命失败后流亡瑞士。——第222页。
- 特雷拉，乌利希 (Trelat, Ulysse 1795—1879)——法国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共和主义者，1848年是制宪议会议员；公共工程部长 (1848年5—6月)。——第33页。
- 特罗钦斯基，费里克斯 (Troczinski, Pelix)——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国外，曾任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波兰部队指挥官。——第198页。
- 特鲁赫泽斯，格奥尔格 (Truchsess Georg 1488—1531)——土瓦本联盟军队司令官，镇压1525年起义农民和城市下层群众的主要组织者。——第442—448、449、454—464、466、467、471页。
- 特利尔大主教——见里哈尔特。
- 海瑙，尤利乌斯·雅科布 (Haynau, Julius Jakob 1786—1853)——奥国元帅，残酷镇压1848—1849年意大利和匈牙利的革命运动。——第84、515页。
- 海茵 (Hein)——伦敦的德国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时期支持马克思。——第484页。
- 海因岑，卡尔 (Heinzen, Karl 1809—1880)——德国激进派政论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反对马克思和恩格斯；曾参加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一个很短的时间，后流亡瑞士，后来又流亡英国；1850年秋最后迁居美国。——第7、8、169页。
- 海茵茨曼，阿列克西斯 (Heintzmann, Alexis 约生于1812年)——普鲁士法学家，自由主义者，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的安全委员会委员，后流亡伦敦。——第147页。
- 恩格斯，弗里德里希 (Eagels, Friedrich 1820—1895) (传记材料)。——第8、145、149、151、157、164—172、178—181、184、187—193、196—232、343、357、358、367—374、380—382、484、

- 485、540、542、599、600、604、606、607、611、614、624页。
- 恩斯特(Ernst 1464—1513)——马格德堡大主教(1476—1513)。——第410页。
- 恩格哈尔特, 马格达琳娜·菲莉萍娜(Engelhard, Magdalena Philippine 1796—1831)——不甚著名的德国女诗人。——第237页。
- 席尔, 斐迪南·冯(Schill, Ferdinand von 1776—1809)——普鲁士军官, 同拿破仑军队作战的游击队长, 1809年曾企图举行武装起义; 后战死。——第157页。
- 席勒, 弗里德里希(Schiller, Friedrich 1759—1805)——伟大的德国作家。——第236、237、244页。
- 席梅尔普芬尼希, 亚历山大(Schimmel-pfennig, Alexander 1824—1865)——退伍的普鲁士军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流亡国外, 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83、198—202页。
- 班堡主教——见韦冈德。
- 班特尔汉斯(Bantelhans)——“穷康拉德”同盟的领导人, 曾领导维尔腾堡和士瓦本山区1514年农民起义。——第430页。
- 班贝尔格尔, 路德维希(Bamberger, Ludwig 1823—1899)——德国政论家, 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后为自由主义者, 国会议员。——第183、216页。
- 拿破仑第一·波拿巴(Napoléon I Bonaparte 1769—1821)——法国皇帝(1804—1814和1815)。——第14、50、52、53、71、94、96、99、101、121、125、135、185、298、528、546、551—558、560、562、564、565、569、573、575、577、579、586页。
- 拿破仑第三·路易·波拿巴(Napoléon III Louis Bonaparte 1808—1873)——拿破仑第一的侄子, 第二共和国总统(1848—1851), 法国皇帝(1852—1870)。——第44、50—58、60、61、63、64、66、69、70、74—76、85—88、93—96、99—101、105—107、119—125、260、347、515、525—531、535、585、589—591页。
- 乌迪诺, 尼古拉·沙尔·维克多(Oudinot, Nicolas Chales Victor 1791—1863)——法国将军, 奥尔良党人, 1849年曾指挥进犯罗马共和国的军队。——第65、66、74、75页。
- 乌尔利希(Ulrich 1487—1550)——1498年起为维尔腾堡公爵, 1519年被逐; 企图利用1525年农民起义恢复自己的统治; 1534年重就维尔腾堡公爵之位。——第429—432、443—446页。
- 通费尔特, 孔茨(Thunfeld, Kuntz)——德国骑士, 维尔茨堡主教的藩臣; 曾参加1476年尼克拉斯豪森(维尔茨堡主教辖区)汉斯·贝海姆的农民密谋活动。——第422、423页。
- 通费尔特, 米哈埃尔(Thunfeld, Michael)——同其父孔茨·通费尔特一起参加1476年尼克拉斯豪森(维尔茨堡主教辖区)汉斯·贝海姆的农民密谋活动。——第422、423页。
- 倍林, 汉斯(Berlin, Hans)——海尔布朗市参事, 1525年起义农民占领该城后, 企图迫使起义者接受比较温和的纲领; 随即投奔起义的镇压者方面。——第

451、459页。

库伯·菲尼莫尔(Cooper, Fenimore 1789—1851)——著名的美国浪漫主义作家。——第314—317页。

伦勃朗(Rembrandt 1606—1669)——伟大的荷兰艺术家。——第313页。

祖尔茨,鲁道夫(Sulz, Rudolph)——伯爵,罗特维尔帝国法庭法官;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是镇压德国南部农民起义的组织者之一。——第466页。

纳茨梅尔(Natzmer 卒于1890年)——普鲁士军官;1848年6月14日指挥守卫柏林军械库的部队,拒绝向人民射击;被判处15年徒刑,1849年逃跑参加巴登-普法尔茨起义,起义失败后流亡瑞士,后来来到英国,1852年起又流亡到澳洲。——第182页。

爱尔维修,克劳德·阿德里安(Héluvétius, Claude Adrien 1715—1771)——杰出的法国哲学家,机械唯物主义的,无神论者,法国的革命资产阶级的思想家之一。——第72页。

朗帕尔特,格雷哥留斯(Lamparter, Gregorius 1463—1523)——维尔腾堡公爵乌利希的顾问。——第431页。

索布里埃,玛丽·约瑟夫(Sobrier, Marie Joseph 约1825—1854)——法国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1848年3月创办了巴黎市政府机关报“巴黎公社”。——第316页。

涅谢尔罗迭,卡尔·瓦西里也维奇(Hesselrode, Карл Васильевич 1780—1862)——伯爵,沙皇俄国的国家活动家和外交家,外交大臣(1816—1856)。——第554页。

十一画

梅尔济(Mercy)——巴登大尉,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的参加者;曾担任第三师师长,1848—1849年革命失败后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219、220、223、224、226页。

梅茨勒,格奥尔格(Metzler, Georg)——1525年奥登瓦尔德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华美军的司令,属于温和派;华美军被击溃后逃跑。——第448—450、458、461页。

梅萨罗什,拉弗连齐(Meszáros, Laurence 死于1514年)——策格列德的牧师,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后被匈牙利贵族俘掳,杀害。——第432、434页。

梅兰希通,菲利浦(Melanchton, Philipp 1497—1560)——德国神学家,路德最亲密的助手,和路德一起竭力使路德派适合诸侯的利益,敌视闵采尔的革命思想。——第416页。

梅洛斯拉夫斯基,路德维克(Mieroslawski, Ludwig 1814—1878)——波兰政治军事活动家,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曾参加1846年波兹南起义的准备工作;1848年三月革命时被释放;1848年领导波兹南起义,后来领导西西里岛起义者的斗争;1849年在巴登-普法尔茨起义期间指挥革命军;在50年代和波拿巴主义者集团有联系;1863年波兰起义期间被任命为波兰民族政府的执政,起义失败后流亡法国。——第132、164、169、170、181、182、194、201、209、214、215、219、224、225页。

莫罗,让·维克多(Morau, Jean Victor

- 1763—1813)——法国将军,曾参加法兰西共和国反对欧洲联军的战争,1800年在霍根林登附近击溃奥军。——第231页。
- 莫尔,约瑟夫(Mall, Joseph 1812—1849)——德国和国际工人运动的杰出活动家,职业是钟表匠;正义者同盟的领导者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1848年7月至9月为科伦工人联合会主席,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在牟尔克战役中牺牲。——第231页。
- 莫伊勒,海耳曼(Müller, Hermann 1813—1882年左右)——不著名的德国民主派作家,流亡者同盟盟员,后为正义者同盟盟员。——第237页。
- 勒姆安,让(Lemoine, Jean 1814—1892)——法国政论家,“辩论日报”驻英国记者,后为主编。——第118、524页。
- 勒克莱尔,亚历山大(Leclerc, Alexandre)——巴黎商人,秩序党的拥护者,曾参加镇压1848年工人的六月起义。——第115、521页。
- 勒文施坦(Löwenstein)——伯爵,法兰克福尼亚的一个小诸侯家族的代表人物。——第449页。
- 曼特尔,约翰(Mantel Johann 约1468—1530)——德国神学者,斯图加特的传教士,闵采尔的信徒。——第419页。
- 曼托伊费尔,奥托·泰奥多尔(Manteuffel, Otto Theodor 1805—1882)——男爵,普鲁士国家活动家,贵族官僚的代表,内政大臣(1848—1850),首相(1850—1858)。——第168、201页。
- 曼托伊费尔(Manteuffel)——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尉官,曾参加体育运动的组织;奥托·泰奥多尔·曼托伊费尔的亲属。——第201页。
- 康德,伊曼努尔(Kant, Immanuel 1724—1804)——杰出的德国哲学家,18世纪末至19世纪初德国唯心主义的创始人。——第89页。
- 康普豪森,卢道夫(Camphausen, Ludolph 1803—1890)——德国银行家,莱茵省自由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1848年3—6月任普鲁士首相,奉行与反动派妥协的叛卖政策。——第137页。
- 康拉德三世(Conrad III, 1466—1540)——维尔茨堡主教(1519—1540);血腥镇压1525年法兰克福尼亚农民起义和城市下层群众运动的组织者之一。——第451、452、464页。
- 盖尔,弗洛里安(Geier, Florian 死于1525年)——德国骑士,站在1525年起义的农民方面;曾指挥黑军,在战斗中牺牲。——第449—451、460—463页。
- 盖斯迈尔,米哈埃尔(Geismaier, Mikhael 约死于1527年)——提罗耳和萨尔茨堡教区农民起义的最有天才的领袖之一;矿工的儿子,萨尔茨堡主教的秘书,后管理关税。——第476—478页。
- 梯凡,让·洛朗(Tiphaine, Jean Laurent 约生于1805年)——法国民主主义者,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改革报”的拥护者。——第316页。
- 梯也尔,阿道夫(Thiers, Adolphe 1797—1877)——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曾任总理(1836, 1840),第二共和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奥尔良党人,共和国总统(1871—1873),屠杀巴黎公社的刽子手。——第83、86、89、101、116、119、251、522、

- 525页。
- 荷马 (Homerus) —— 传说中的古希腊叙事诗人,“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的作者。——第255页。
- 基佐, 弗朗斯瓦·比埃尔·吉约姆 (Gizot, François Pierre Guillaume 1787—1874) —— 法国资产阶级历史学家和国家活动家,从1840年至1848年二月革命期间实际上操纵了法国的内政和外交,他所代表的是大金融资产阶级的利益。——第12、15、16、36、45、53、61、83、89、247—252、300页。
- 雪恩, 乌尔利希 (Schön Ulrich 死于1525年) —— 1525年农民战争的参加者;莱普海姆农民军的领袖之一,后被俘处死。——第445、455页。
- 莎士比亚, 威廉 (Shakespeare, William 1564—1616) —— 伟大的英国作家。——第193、223页。
- 戚美尔曼, 威廉 (Zimmermann, Wilhelm 1807—1878) —— 德国历史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1—1843年出版的“德国农民战争史”的著者。——第415、420页。
- ## 十二画
- 博尔, 约翰 (Ball, John 死于1381年) —— 英国的乡村牧师,人民传教士,1381年英国农民起义领袖之一。——第401、404页。
- 博凯, 让·巴蒂斯特 (Bocquet, Jean Baptiste) —— 法国教师,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改革报”的拥护者,1848年革命开始时是巴黎第十二区的区长助理,5月15日示威游行的参加者;后流亡英国,亚·伊·赫尔岑的朋
- 友。——第316、317页。
- 傅立叶, 沙尔 (Fourier, Charles 1772—1837) —— 伟大的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第325页。
- 博布钦, 弗里德里希·亨利·卡尔 (Bobzin Friedrich Heinrich Karl 生于1826年) —— 德国手工业者,1847年布鲁塞尔德国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和司徒卢威一起领导伦敦德国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流亡者协会。——第609、610页。
- 博马舍, 比埃尔·奥古斯丹 (Beaumarchais, Pierre Augustin 1732—1799) —— 杰出的法国剧作家。——第60页。
- 博伊斯特, 弗里德里希 (Beust, Friedrich 1817—1899) —— 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职,1848年是科伦工人联合会委员会委员,“新科伦报”编辑之一(1848年9月—1849年2月),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革命后流亡瑞士,教育学教授。——第208页。
- 博林布罗克, 亨利 (Bolingbroke, Henry 1678—1751) —— 英国自然神论哲学家,政治活动家,托利党领袖之一。——第249页。
- 普芬德, 卡尔 (Pfinder, Karl 约1818—1876) —— 德国工人,小型的精细画家,正义者同盟盟员,伦敦德意志工人教育协会的积极活动家,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第一国际总委员会委员;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拥护者和朋友。——第357、484、596、599、604、609、611、614、624页。
- 普拉斯勒, 卡斯巴尔 (Prassler, Kaspar) —— 祖尔茨堡教区起义农民和矿工的领袖。——第475页。

- 普雷吉策尔, 卡斯巴尔 (Pregizer, Kaspar) —— 朔伦多尔夫 (维尔腾堡) 的刀剑匠, “穷康拉德” 的组织者之一; 1514年维尔腾堡农民和市民起义的参加者; 起义失败后逃跑。——第430页。
- 普法伊费尔, 亨利希 (Pfeifer, Heinrich 死于1525年) —— 人民传教士, 闵采尔的信徒, 1525年缪尔豪森市民起义的领导者之一; 后被处死。——第468、472页。
- 普鲁士亲王——见威廉一世。
- 普法尔茨选帝侯——见路德维希五世。
- 黑克尔, 弗里德里希·卡尔 (Hecker, Friedrich Karl 1811—1881) —— 巴登的共和主义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年4月巴登起义的领导人之一, 后流亡美国, 参加美国内战, 站在北部方面。——第129、146、185、226、234页。
- 黑格尔, 乔治·威廉·弗里德里希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770—1831) —— 德国最大的哲学家, 客观唯心主义者, 非常全面地发展了唯心主义的辩证法。——第244、265、301、413、490、538页。
- 黑森伯爵——见菲利浦一世。
- 黑尔芬施太因, 路德维希 (Helfenstein, Ludwig 约1498—1525) —— 伯爵, 魏茵斯堡 (维尔腾堡) 的奥国总督, 以背信弃义和残酷无情地对待农民著称。——第449、450、460页。
- 菲斯特尔, 安东 (Füster, Anton 1808—1881) —— 奥地利神学家, 维也纳大学教授, 1848年为国会议员,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曾流亡伦敦, 后又流亡美国。——第596、598页。
- 菲克勒尔, 约瑟夫 (Fickler, Joseph 1808—1865) —— 德国新闻记者,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1848—1849年的巴登民主运动的领导人之一, 1849年为巴登临时政府委员。——第159页。
- 菲利浦一世 (Philipp I 1479—1533) —— 巴登的侯爵; 1525年参加镇压德国南部的农民起义。——第428、432、465页。
- 菲利浦一世 (Philipp I 1504—1567) —— 黑森伯爵; 曾参加消灭1522—1523年的骑士起义; 镇压1525年图林根农民起义的组织者。——第440、471、472、479页。
- 费奈迭, 雅科布 (Venedey, Jacob 1805—1871) —— 德国激进政论家, 1848年为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 属于左派; 在1848—1849年革命后成为自由派。——第255、515页。
- 费尔巴哈, 路德维希 (Feuerbach, Ludwig 1804—1872) —— 马克思以前德国最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第488页。
- 费尔巴哈尔, 马特恩 (Feuerbacher, Marten) —— 市参议会议员, 格罗斯-波特瓦 (维尔腾堡) 市民反对派领袖之一; 1525年领导维尔腾堡起义农民和市民的华美基督教军队; 起义者失败后逃往瑞士。——第453、454、457页。
- 富歇, 约瑟夫 (Fouché, Joseph 1759—1820) ——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拿破仑帝国时代的活动家, 革命时期是雅各宾党人, 拿破仑第一的警务大臣; 以毫无原则著称。——第100、353页。
- 富吉耶-丹维尔, 安都昂·刚丹 (Fouquier-Tinville, Antoine Quentin 1746—1795) —— 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卓越活动家, 1793年任革命法庭的公诉人。——第66页。
- 富尔德, 阿希尔 (Fould, Achille 1800—

- 1867)——法国银行家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后为波拿巴主义者,1849—1867年曾数次担任财政部长。——第27、44、57、89、92—94、347页。
- 斯密, 亚当 (Smith, Adam 1723—1790)——英国经济学家,资产阶级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最杰出的代表之一。——第539页。
- 斯图亚特王朝 (Stuarts)——统治苏格兰 (1371年开始)和英格兰 (1603—1649, 1660—1714) 的王朝。——第250页。
- 萨格, 约翰奈斯 (Ronge, Johannes 1813—1887)——德国牧师,“德国天主教徒”运动的发起人之一,利用天主教来为德国资产阶级服务; 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 革命失败后流亡英国。——第236、539页。
- 尧普, 亨利希·卡尔 (Jaup, Heinrich Karl 1781—1860)——德国法学家,自由主义者,黑森-达姆斯塔德政府首脑 (1848—1850), 1850年8月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和平代表大会主席。——第515页。
- 琼斯, 厄内斯特·查理 (Jones, Ernest Charles 1819—1869)——杰出的英国工人运动活动家,无产阶级诗人和政论家,宪章派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寄语人民”和“人民报”编辑,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朋友。——第519页。
- 凯撒 (凯尤斯·尤利乌斯) (Caesar, Caius Julius 公元前约100—44)——著名的罗马战略家和国家活动家。——第86页。
- 闵采尔, 托马斯 (Münzer, Thomas 约1490—1525)——德国的伟大革命家,宗教改革时期及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
- 的农民和平民的领袖与思想家,他宣传空想平均共产主义的思想。——第396、401、405、410—419、425、436、441、443、445、458、468—472、476页。
- 斐迪南一世 (Ferdinand I 1503—1564)——奥地利大公,德国皇帝 (1556—1564)。——第443、465、466、476、477页。

十三画

- 奥赛, 沙尔 (Haussez, Charles 1778—1854)——法国政治活动家,极端的革命分子, 1829年是海军大臣。——第106页。
- 奥普尔, 阿尔丰斯·昂利 (Hauptoull, Alphonse Henri 1789—1865)——法国将军,正统主义者,后为波拿巴主义者; 陆军部长 (1849—1850)。——第88、99、105、117、124、125、259、523、529、530页。
- 奥康瑙尔, 菲格斯 (O'Connor, Feergus 1794—1855)——宪章运动左翼领袖之一,“北极星报”的创办人和编辑, 1848年后成为改良主义者。——第366、519、520页。
- 奥斯渥特 (Oswald)——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普法尔茨革命军的营长,普法尔茨临时革命政府的军事委员。——第210页。
- 奥斯特勒, 理查 (Oastler, Richard 1789—1861)——英国政治活动家,倾向托利党,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贸易派的斗争中主张通过立法限制劳动日。——第277、280、285页。
- 奥尔良公爵 (Duc d'Orléans)——见路易-菲力浦。
- 奥艾尔巴赫, 倍尔托特 (Auerbach, Ber-

- thold 1812—1882) —— 德国自由派作家; 后为俾斯麦的辩护士。—— 第237、239页。
- 奥维狄乌斯(普卜利乌斯·奥维狄乌斯·纳佐)(Publius Ovidius Naso 公元前43年—公元17年左右) —— 杰出的罗马诗人。—— 第544页。
- 奥博尔斯基, 路德维克(Oberski, Ludwig 1787—1873) —— 波兰上校, 革命家, 1830—1831年波兰起义的参加者, 流亡者, “民主派兄弟协会”的活动家, 1849年为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师长。—— 第219、220、225页。
- 奥伦治公爵威廉三世(William III of Orange 1650—1702) —— 尼德兰总督(1672—1702), 英国国王(1689—1702)。—— 第248、250页。
- 奥尔良公爵夫人叶列娜(Orléans, d', [Hélène Louise Elisabeth] Duchesse 1814—1858) —— 出生于梅克伦堡大公家, 路易-菲力浦的长子斐迪南的孀妇。—— 第86页。
- 路德, 马丁(Luther, Martin 1483—1546) —— 卓越的宗教改革活动家, 德国新教(路德教)的创始人, 德国市民阶级思想家, 在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 站在诸侯方面反对起义农民和城市贫民。—— 第399、405—412、415—419、436、441页。
- 路易·波拿巴(Louis Bonaparte) —— 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拿破仑(Louis-Napoléon) —— 见拿破仑第三。
- 路易九世(或称圣路易)(Louis IX, 或 Saint Louis 1215—1270) —— 法国国王(1226—1270)。—— 第85页。
- 路易十一(Louis XI 1423—1483) —— 法国皇帝(1461—1483)。—— 第388、438页。
- 路易十三(Louis XIII 1601—1643) —— 法国国王(1610—1643)。—— 第249页。
- 路易十四(Louis XIV 1638—1715) —— 法国国王(1643—1715)。—— 第94、248页。
- 路易-菲力浦(Louis-Philippe 1773—1850) —— 奥尔良公爵, 法国国王(1830—1848)。—— 第12—14、17、45、48、50、52、82、86、89—91、93、121、247、260、261、313、324、527、544、579页。
- 路特希尔德, 詹姆斯(Rothschild, James 1792—1868) —— 巴黎路特希尔德银行行长。—— 第14页。
- 路德维希五世(Ludwig V 1478—1544) —— 普法尔茨选帝侯(1508—1544); 曾参加镇压1522—1523年的骑士起义; 镇压1525年法兰克福尼亚农民起义的组织者之一。—— 第431、444、450、458、459、463页。
- 路特希尔德家族(Rothschild) —— 金融世家, 在欧洲各国拥有许多银行。—— 第15、261、266页。
- 路易-菲力浦-阿尔伯(Louis Philippe Albert 1838—1894) —— 奥尔良公爵, 巴黎伯爵, 国王路易-菲力浦的孙子, 法国王位僭望者。—— 第121、527页。
- 塞万提斯·德·萨维德拉, 米格尔(Cervantes de Saavedra, Miguel 1547—1616) —— 伟大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 第157、242、516页。
- 塞巴斯提昂尼, 奥拉斯(Sebastiani, Horace 1772—1851) —— 伯爵, 法国元帅, 外交家; 曾任外交部长(1830—1832), 驻伦敦大使(1835—1840)。—— 第36

页。

载勒尔,塞巴斯提安(Seiler, Sebastian)——德国政论家,1846年为布鲁塞尔共产主义者通讯委员会委员,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德国1848—1849年革命的参加者。——第484页。

道梅尔,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Daumer, Georg Friedrich 1800—1875)——德国作家,著有宗教史。——第236、241页。

圣茹斯特,路易·安都昂(Saint-Just, Louis Antoine 1767—1794)——18世纪末法国资产阶级的著名活动家,雅各宾党人的领袖之一。——第551页。

雷芬特洛夫,弗里德里希(Reventlow, Friedrich 1797—1874)——德国保守派政治活动家,什列斯维希-霍尔斯坦临时政府委员(1848)。——第533页。

薄伽丘,卓万尼(Boccaccio, Giovanni 1313—1375)——文艺复兴时代意大利最大的小说家和诗人。——第402页。

十四画

维利希,奥古斯特(Willich, August 1810—1878)——普鲁士军官,因政治信仰退职,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1850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分裂时期成为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的领袖之一;1853年流亡美国,站在北部方面参加美国内战。——第152、171、183—185、190—193、197—205、208—213、216、217、219、220、225—227、229—232、352、357、369、374、381、599、604、606、609—611、614、625、630页。

维多克,弗朗斯瓦·欧仁(Vidocq, François Eugène 1775—1857)——法国的刑

事犯,警察局密探;一般认为“维多克回忆录”一书出于他的手笔;他的名字已成为狡猾的密探和骗子的代名词。——第322页。

维迪尔,茹尔(Vidil, Jules)——法国军官,社会主义者,伦敦法国布朗基主义流亡者协会委员会委员。——第485、606页。

维达尔,弗朗斯瓦(Vidal, François 1814—1872)——法国经济学家,社会主义者,1848年卢森堡委员会书记,立法会议会议员(1850—1851)。——第105—107、114、350、520页。

维维延,亚历山大·弗朗斯瓦(Vivien, Alexandre François, 1799—1854)——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奥尔良党人,1840年任司部长,1848年任卡芬雅克政府公共工程部长。——第48页。

维尔茨堡主教——见康拉德三世。

福适,莱昂(Faucher, Leon 1803—1854)——法国资产阶级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马尔萨斯派经济学家,秩序党的领袖之一,内政部长(1848年12月—1849年5月),后为波拿巴主义者。——第12、53、59、62页。

福格特,卡尔(Vogt, Karl 1817—1895)——德国自然科学家,庸俗唯物主义,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1848—1849年是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6月是帝国五摄政之一;1849年逃离德国;马克思在“福格特先生”小册子(1860)中揭露他是路易·波拿巴的走狗。——第255页。

福尔奈尔,安东(Farner, Anton)——诺德林根(法兰克福尼亚)帝国城市市长;1525年参加农民起义并领导城市平民。——第448页。

福泽吉尔, 托马斯 (Fothergill, Thomas)——英国军官, 1850年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在伦敦所组织的德国流亡者同盟的名誉书记。——第358页。

蒙特, 泰奥多尔 (Mundt, Theodor 1808—1861)——德国作家, “青年德意志”的代表之一, 后来在布勒斯劳和柏林教文学和历史。——第237页。

蒙尼埃 (Monnier)——法国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 1848年二月革命后任警察局秘书长。——第316页。

蒙塔朗贝尔, 沙尔 (Montalembert, Charles 1810—1870)——法国政治活动家和政论家, 第二共和时期是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奥尔良党人, 天主教党的首领; 在政变时期支持路易·波拿巴。——第94、116、522页。

歌德, 约翰·沃尔夫干格 (Goethe, Johann Wolfgang 1749—1832)——德国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第208、237、241页。

蒲鲁东, 比埃尔·约瑟夫 (Proudhon, Pierre Joseph 1809—1865)——法国政论家, 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 小资产阶级的思想家, 无政府主义的创始人之一, 1848年为制宪议会议员。——第113、378、487、489、512、544页。

豪普特, 海尔曼·威廉 (Haupt, Hermann Wilhelm 约生于1831年)——德国商人, 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 科伦共产党人审判案的被捕者之一, 在审讯期间作了贩卖性的供述, 审判前即被释放, 逃往巴西。——第484页。

赫希斯特, 恩斯特·海尔曼 (Höchstler, Ernst Hermann 约生于1811年)——爱北斐特律师, 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

者, 1849年5月爱北斐特起义时期安全委员会的主席; 起义失败后逃离德国; 以后放弃政治活动。——第146、147、159页。

十五画

德朗克, 恩斯特 (Dronke, Ernst 1822—1891)——德国政论家, 最初是“真正的社会主义者”, 后来是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和“新莱茵报”编辑之一; 1848—1849年革命后流亡英国; 后来放弃了政治活动。——第361页。

德雷埃尔 (Dreher)——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 卡尔斯卢厄人民自卫团的营长。——第191、198、200、201、202、228页。

德斯特尔, 卡尔·路德维希·约翰 (D'Estler, Karl Ludwig Johann 1811—1859)——德国社会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 职业是医生; 共产主义者同盟科伦支部的成员, 1848年是普鲁士国民议会的议员, 属于左派; 1848年10月起为德国民主主义者中央委员会委员, 在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中起了卓越的作用; 后来流亡瑞士。——第171、175、176、178、189、210、217、228页。

德拉马尔, 德奥多·卡季米尔 (Delamare, Théodore Casimir 1797—1870)——法国银行家; 政论家, 从1844年起控制了“祖国报”; 波拿巴主义者。——第347页。

德弗洛特, 保尔 (De Flotte, Paul 1817—1860)——法国海军军官, 民主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 布朗基主义者, 巴黎1848年5月15日事件和六月起义的积极参加者, 立法议会议员 (1850—1851)。——第191、198、200、201、

- 202、228页。
- 德拉奥德，律西安 (Delahodde 或 de la Hodde, Lucien 1808—1865) —— 法国政论家，复辟时期和七月王朝时期秘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警探。—— 第313—318、323、327页。
- 德累赛尔，加布里埃尔 (Delessert, Gabriel 1786—1858) —— 巴黎警察局长 (1836—1848)。—— 第314、323页。
- 图克，托马斯 (Tooke, Thomas 1774—1858) —— 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倾向古典学派；曾抨击李嘉图的货币论。—— 第498页。
- 图伦，昂利·德·拉·图尔·多韦尔尼 (Turenne, Henri de la Tour d' Auvergne 1611—1675) —— 子爵，著名的法国将军。—— 第565页。
- 赖哈德，约瑟夫·马丁 (Reichard, Joseph Martin 1803—1872) —— 德国法学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法兰克福国民议会议员，1849年普尔茨革命临时政府委员，起义被镇压后流亡美国。—— 第181页。
- 赖德律·罗兰，亚历山大·奥古斯特 (Ledru-Rollin, Alexandre Auguste 1807—1874) —— 法国政论家和政治活动家，小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领袖之一，“改革报”编辑；1848年是临时政府委员，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的议员，领导山岳党；1849年6月13日后流亡英国。—— 第17、27、31、39、41、51、59、63—65、71、72、74—76、80、93、107、115、327、521、535、544、630页。
- 摩莱，路易·马蒂约 (Molé, Louis Mathieu 1781—1855) —— 伯爵，法国国家活动家，奥尔良派，总理 (1836—1837，1837—1839)，第二共和时期为制宪议会和立法议会议员。—— 第83、84页。
- 鲁道夫第二·冯·谢伦堡 (Rudolf II von Scherenberg) —— 维尔茨堡主教 (1466—1495)；1476年曾镇压贝海姆·汉斯所领导的农民起义。—— 第423页。

十六画

- 霍苏，安东 (Hosszú, Anton) —— 1514年匈牙利农民起义的领袖之一。—— 第433、434页。
- 霍亨洛埃 (Hohenlohe) —— 伯爵，法兰克尼亚诸侯的代表。—— 第448、449页。
- 霍伊斯纳，卡尔 (Häusner, Carl) —— 德国工程师，1849年曾指挥巴登-普尔茨起义军莱茵黑森部队。—— 第183页。
- 霍亨索伦王朝 (Hohenzollern) —— 勃兰登堡选帝侯 (1415—1701)，普鲁士国王 (1701—1918) 和德国皇帝 (1871—1918) 的王朝。—— 第197页。
- 鲍威尔，路易 (Bauer, Louis) —— 德国医生，普鲁士国民议会议员，属于左派，1849年迁居伦敦，在这里和德国流亡者中的资产阶级人士来往，伦敦民主主义同盟救济委员会主席。—— 第356、609页。
- 鲍威尔，亨利希 (Bauer, Heinrich) —— 德国工人运动的卓越活动家，正义者同盟的领导人之一，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委员，职业是鞋匠；1851年流亡澳洲。—— 第357、359、484、596、597、599、604、609、611、614、624页。
- 诺阿克，路德维希 (Noack, Ludwig 1819—1885) —— 德国神学家和哲学家。—— 第237页。
- 诺马耶，马克西米利安·若尔日·约瑟夫 (Neumayer, Maximilian George Joseph 1789—1866) —— 法国将军，秩序

党的拥护者。——第125、530、531页。
 诺伊豪斯 (Neuhaus) —— 图林根的医生，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革命军的指挥官。——第223页。
 默尔德斯，弗洛里安 (Mordes, Florian) —— 1849年巴登临时政府的内政部长。——第160页。

十七画

谢努，阿道夫 (Chenu, Adolphe) —— 七月王朝时期法国秘密革命组织的参加者，警探。——第313—319、323—329页。
 谢特奈尔，奥古斯特 (Schärtner, August) —— 海瑙的桶匠，1848年革命和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后流亡伦敦，开设小旅店，店中留住了德国小资产阶级流亡者，共产主义者同盟盟员，同盟分裂后参加了维利希和沙佩尔冒险主义宗派集团。——第612、625页。
 戴斯特，让·巴蒂斯特 (Teste, Jean Baptiste 1780—1852) —— 法国律师和国家活动家，奥尔良党人，历任七月王朝时期贸易大臣，司法大臣和公共工程大臣，由于贪污舞弊被告发。——第93页。
 赛居尔·达居塞，雷蒙·保尔 (Segur d'Aguesseau, Baymond Paul 1803—1889) —— 法国律师和政治活动家，所有的执政党都参加过；立法议会中的秩序党代表。——第107页。

十八画

萨姆，康拉姆 (Thumb, Conrad 1465—1525) —— 维尔腾堡公爵乌尔利希的顾问。——第431页。
 萨克斯，汉斯 (Sachs, Hans 1494—1576) —— 德国手工业者，宗教改革

时期的诗人和作曲家，路德的拥护者，纽伦堡音乐学校的创办人和领导者。——第242页。

萨德勒，迈克尔·托马斯 (Sadler, Michael Thomas 1780—1835) —— 英国经济学家和政治活动家，资产阶级博爱主义者，倾向托利党。——第277、285页。
 萨菲尔，摩里茨·哥特利勃 (Saphir, Moritz Gottlieb 1795—1858) —— 奥地利的幽默家，诗人。——第237页。

萨列雷施，安布鲁什 (Szécsényi, Ambros) —— 佩斯的公民，参加过1514年匈牙利起义，曾指挥部分农军，后出卖起义者，投向贵族。——第433页。

萨克森选帝侯——见弗里德里希三世。

萨尔茨堡大主教——见马特维。

魏斯 (Wei) —— 德国医生，1849年巴登-普法尔茨起义的参加者，茨魏布吕肯民政委员。——第198、199页。

魏特林，威廉 (Weitling, Wilhelm 1808—1871) —— 德国工人运动初期的卓越活动家，空想平均共产主义学说的创始人，职业是裁缝。——第486页。

魏兹曼，尼古拉斯 (Wiseman, Nicolas 1802—1865) —— 英国天主教神甫；1850年罗马教皇任命他为韦斯明斯特大主教和红衣主教。——第517、518页。

魏特莫泽尔，艾拉兹姆 (Weitmoser, Erasmus) —— 德国手工业者，1525年农民战争时期萨尔茨堡矿工军和农民军的领袖。——第475页。

二十四画

让，保尔 (Jean Paul) —— 约翰·保尔·弗里德里希·李希特尔 (Johann Paul Friedrich Richter 1763—1825) 的笔名，德国讽刺作家。——第301页。

报 刊 索 引

三 画

“飞行传单”(Fliegende Blätter)——慕尼黑出版。——第172页。

四 画

“太阳报”(Sun)——伦敦出版。——第367、369页。

“世纪报”(Le Siècle)——巴黎出版。——第84、103、121、260、526页。

“文艺杂谈”(Blätter für literarische Unterhaltung)——莱比锡出版。——第237页。

“不来梅每日纪事”(Bremer Tages-Chronik)——第382、541、542页。

“巴伐利亚农村信使”(Bayerische Landbote)——慕尼黑出版。——第238页。

五 画

“民主报”(Demokrat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599页。

“民主评论”(The Democratic Review)——伦敦出版。——第275页。

“北极星报”(The Northern Star)——伦敦出版。——第7、8、369、519、597、599页。

“北德意志自由报”(Norddeutsche Freie Presse)——汉堡出版。——第599、609、612、614页。

“立宪主义者报”(Le Constitution-

nel)——巴黎出版。——第118、542页。

“卡尔斯卢厄日报”(Karlsruher Zeitung)——巴登出版。——第169、179页。

六 画

“权力报”(Le Pouvoir)——巴黎出版。——第120、526页。

“农村信使”(Landbote)——见“巴伐利亚农村信使”。

“自由射手”(Der Freischütz)——汉堡出版。——第612页。

“西德意志报”(Westdeutsche Zeitung)——科伦出版。——第6、599、603、604、611页。

“地球和旅行家”(The Globe and Traveller)——伦敦出版。——第375、518页。

七 画

“快邮报”(Schnellpost)——见“德意志快邮报”。

“改革报”(La Réforme)——巴黎出版。——第39、59、314—317、319、323、326页。

“每日纪事”(Tages-Chronik)——见“不来梅每日纪事”。

八 画

“国家报”(Staatszeitung)——见“纽约国家报”。

“国民报”(Le National)——巴黎出版。——

—第17、18、23、32、40、45—51、53、54、59、60、62、63、67、68、71、72、78、81、84、103、106、121、326、327、526页。

“国民议会报”(L'Assemblée nationale)——巴黎出版。——第118、260、375、524页。

“法兰西报”(La Gazette de France)——巴黎出版。——第19页。

“法兰克福报”(Frankfurter Journal)——第179页。

“和平民主日报”(La Démocratie pacifique)——巴黎出版。——第78页。

九 画

“总汇报”(Allgemeine Zeitung)——奥格斯堡出版。——第238页。

“总汇通报”(Le Moniteur universel)——巴黎出版。——第22、34、36、66、82、86、89、125、348、531页。

“科伦日报”(Kölnische Zeitung)——第179页。

“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politiques et littéraires)——巴黎出版。——第41、118、524页。

十 画

“班堡报”(Bamberger Zeitung)——第238页。

“拿破仑”(Le Napoléon)——巴黎出版。——第101页。

“祖国报”(La Patrie)——巴黎出版。——第347—349页。

“旁观者”(The Spectator)——伦敦出版。——第370、374、381、382页。

“泰晤士报”(The Times)——伦敦出版。——第7、8、343、518、543、544页。

“威塞尔报”(Weser-Zeitung)——不来

梅出版。——第381、382页。

“纽约国家报”(New-Yorker Staatszeitung)——第599页。

“纽伦堡信使”(Nürnbergischer Bote)——见“德国记者”。

十一 画

“寄语人民”(Notes to the People)——伦敦出版。——第592页。

“笨拙,或伦敦喧声”(Punch, or the London Charivari)——第343页。

“莱茵政治、商业和工业日报”(Rheinische Zeitung für Politik, Handel und Gewerbe)——科伦出版。——第375页。

十二 画

“晚报”(Le Moniteur du soir)——巴黎出版。——第349页。

“晚邮报。民主派指纸”(Abend-Post. Demokrat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351、355页。

“喧声报”(Le Charivari)——巴黎出版。——第314、315页。

十三 画

“新时代”(Die Neue Zeit)——斯图加特出版。——第577页。

“新闻报”(La Presse)——巴黎出版。——第84、103页。

“新奥得报”(Neue Oder-Zeitung)——布勒斯劳出版。——第294页。

“新普鲁士报”(Neue Preussische Zeitung)——柏林出版。——第373、375、376页。

“新德意志报”(Neue Deutsche Zeitung)——美因河畔法兰克福出版。——第357、378、379、380、596、599页。

- “新莱茵报。民主派机关报”(Neue Rheinische Zeitung. Organ der Demokratie)——科伦出版。——第5、6、35、36、50、137、154、166、172、177、189、369、374、375、380、541、542、554、592、600、601页。
- “新莱茵报。政治经济评论”(Neue Rheinische Zeitung. Politischökonomische Revue)——伦敦,汉堡出版。——第5、6、9、111、118、127、129、133、236、242、246、253、268、287、300、312、329、332、342、343、346、350、354、378、380、383、486、487、507、524、540—542、600、601页。
- “瑞士国民报”(Schweizerische National-Zeitung)——巴塞尔出版。——第267、599页。
- “德国记者”(Korrespondent von und für Deutschland)——纽伦堡出版。——第236、238页。
- “德国旁观者”(Deutscher Zuschauer)——曼海姆出版。——第159页。
- “德意志伦敦报”(Deutsche Londoner Zeitung)——伦敦出版。——第7、599、623、624页。
- “德意志快邮报”(Deutsche Schnellpost)——纽约出版。——第599页。
- “德勒斯顿新闻通报”(Dresdener Journal und Anzeiger)——第615、625页。
- “经济学家”(The Economist)——伦敦出版。——第501、504、511页。
- “慕尼黑农村信使”(Münchener Landbotein)——见“巴伐利亚农村信使”。

二十一画

“辩论日报”(Débats)——见“政治和文学辩论日报”。

十五画

“德国记者”(Korrespondent von und für

译 后 记

本书内“德国农民战争”一文是由北京大学熊伟根据德文本译出、经洪谦校阅的；除技术规格、名词等按我局规定统一外，我局对译文基本上未加改动。“1852年神圣同盟对法战争的可能性与展望”一文，已有曹汀的译本，现由他本人又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作了修改，我局统一了规格和名词，并根据德文本略加改动。“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和“中央委员会告共产主义者同盟书。1850年3月”采用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选”两卷集的译文，并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进行了一些修改。“德国维护帝国宪法的运动”一文，在校阅过程中个别地方参考了沈炼之的译文（1958年人民出版社版）。

除上述著作外，其余文章都是根据“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俄文第二版译出的。参加翻译工作的有冯世熹、孙魁、钱文干、汤景福、孙开焕等。译文最后由纪涛、张纪恒校订。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